

王光祈文集

时政文化卷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王光祈文集·

WANGGUANGQI WENJI



王光祈文集

——时政文化卷——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本卷前言

本辑选录了王光祈1918—1936年所写的除音乐以外的部分著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多方面。选辑这部分文章的目的是：

（一）王光祈是“五四”时期的一个闪光人物。他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奔走呼号，指点江山，争国权、惩国贼，高举时代的旗帜，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研究“五四”爱国运动，不能不研究王光祈。

（二）王光祈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是学会的核心和灵魂。他创办和编辑了《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两种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介绍了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恽代英等加入该会。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洗涤污浊之旧乾坤，建立“青春年少，独立富强”之新中国。李大钊说：“光祈是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所以，要研究“五四”时期的社团史，就不能不研究王光祈。

（三）王光祈是“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工读互助团”的创始者、组织者。他幻想通过“工读互助”建立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工读互助团”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社会文化名流的支持和赞赏。毛泽东除列名“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外，还准备在湖南仿办。“工读互助团”是“五四”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大实践。所以，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不能不研究王光祈。

（四）王光祈逝世后，在南京的追悼会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代表致挽词说：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重要人物。王光祈1920年赴德

国至1936年逝世，前后16年，除音乐著述外，撰写的其它文稿，粗略估计，至少在200万字左右，内容涉及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以，要研究20世纪中德文化交流史，也不能不研究王光祈。

（五）王光祈不仅是著名的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词，具有音乐韵律，颇有杜甫的诗风，寄意深远，运笔凝重，感情悲慨愤激，爱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当时正值“五四”时期，新诗尚处于开拓阶段，他的新诗（包括歌词）虽正式发表的为数不多，但无论从语言、艺术形式还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方面来说，王光祈的作品都属于上乘之作。

本集是为了全面了解研究王光祈而编选的文献资料，是王光祈的呐喊，是王光祈的足迹，是王光祈的情怀，是王光祈的思考。虽然文章表现出的思想还不够深刻，闪现出的火花也还不够耀眼，甚至于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我们相信大家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前辈。

王光祈奋斗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重。

毕 兴

2009年9月

本卷编辑说明

本卷收录了王光祈1914—1936年间写作的有关时政、文化、诗词方面的文献。本卷的收录，以能体现王氏主要思想、观点为重点。

本卷分为“报刊文章选编”、“著作选编”和“诗词选编”三部分：

“报刊文章选编”收集了王光祈从1918年到1931年刊登在《晨报》、《每周评论》、《新青年》等报刊上的有关政论、时评、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本部分所收录的文章，按报刊分类，以报刊名称之拼音首字母为序进行编排；同属一种报刊的文章，则以刊载时间的先后排序。

“著作选编”选录了1924年至1939年间出版发行的王光祈的非音乐类著作共计8种，其中包括由上海中华书局编入《国防丛书》的4种。本编所收录的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有些著作，本卷在力求保存原著框架结构的前提下，采取了节选的方式，对删略的章节和部分文字，以脚注形式予以标明。

“诗词选编”收录了王光祈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以及后来经各种途径得以公开的诗词和歌词。

本卷除对原著按今天的阅读习惯规范了标点符号以及于个别地方进行必要的注释外，均尽量保持原貌。对于原始文献中出现的与今天习惯译法明显相异的译文，在本《文集》附录部分提供有《中西文译名对照表》，以备参阅。

编　者
2009年9月

本册目录

第二编　著作选编

第三编　诗词选编

第一编　报刊文章选编

《晨报》[①]

择　业[②]

这回欧战的原因，有的说是竞争海上自由，有的说是法意两国想恢复他们的国土。这些不算是真正原因，甚么是真正原因呢？就是十九世纪一百年中那些学者在那里埋头发明科学，不提防被人误用，在黑暗一方面拿着去助长他们的罪恶，守护他们的罪恶。德国的物质文明，在欧洲总算是首屈一指了。国力一天强似一天，野心亦一天大似一天，直到如今惹出一个滔天大祸来，方才放手。德国有一位克虏伯发明这杀人最便利的器械，徐柏林发明这空中打仗的飞艇。在当时哪一个不恭维他？如今呢？那德国人民已经把那克虏伯先生拿来监禁起来了。这回欧战死了一千余万人，这克、徐两先生所发明的器械的力量居多。若是这克、徐两先生肯把他们发明的天才做出有益于人的机械，我们人类一定是感激不尽的了，哪里还有恨怨他的道理？诸位想一想，这择业问题关系有多么重呀。

① 《晨报》是由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治团体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 年 8 月创刊于北京，原名《晨钟报》，1918 年 9 月，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北洋政府封闭。同年 12 月，改名《晨报》继续出版。1919 年 2 月 7 日，副刊性质的第 7 版进行了改革，成为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此版在李大钊主持下，发表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专著。1920 年起，此版逐渐主要用来提倡新文学。1921 年 10 月 12 日，第 7 版正式定名为“晨报副刊”（也称“晨报副镌”），4 开 4 版，单独发行。同《觉悟》、《学灯》、《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大副刊。1928 年 6 月停刊。

② 原文自 1919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分三期连载，今合为一篇。

俄哲托尔斯泰，他本生在一个富贵人家，他却愿在田野间寻讨生活。对于一切物质上的发明，少有赞美许可的，独对于这水利机械的发明，他倒狠赞成。因为这个发明于农事发达上有重大关系，是有益于平民的。

我们中国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恶习，就是以那奴颜婢膝的官僚为无上尊荣，以那咬文嚼字的名士为一种最清高的职业。本来在中国营业最利市的，自然是官僚第一了。做文官的可以刮地皮，做武官的可以扣粮饷，最善于沽名钓誉的总算是名士第一了。俗话说的名士爱钱，道士好色，已经把那些斗方先生形容的淋漓尽致了。无奈那些腐败家庭对于子弟，总希望他得一官半职或者造成一个咬文嚼字的名士。若是子弟稍稍老实一点，只好送去学些手艺。为父兄的，时常长吁短叹，以为这个子弟不能光宗耀祖了！他哪里知道，这二十世纪是劳动家的世界！这些官僚名士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若是还不改良，我恐怕这二十世纪已没有这种废物立脚的地方了。

十九世纪军国主义盛行时代是讲究全国皆兵，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是讲究全国皆工。要是终日坐在家里毫不做事，搓几圈雀牌、抽几支香烟，仗着自己的金钱掳夺他人的生产，那就完全是强盗行为了。托尔斯泰说的"没有工作便没有生活"，蒲鲁东说的"拥着私产以夺他人生产是为强盗"。可见我们人类是人人都应该作工的。我所说的作工，不管你是用脑力用体力，凡作成有益他人事业，都叫作工。我如今且把这择业的原则说出来与大家研究研究。

（一）自己愿意的。我们所择的职业，一百人中就有九十个不是自己愿意的。因为在我们自由意志之外，常常有一个力量来鼓动摆弄我们，使我们自己常常为他驱使。譬如在军国主义的时代，人人皆以当兵卫国是好的了，所以一般人皆喜挂名军籍，发明军事用品。又如古代斯巴达风俗以能偷盗为勇，故一般儿童多变为盗贼。又如中国社会皆以做官为荣，故一般人都欲跑入此界。其实当兵的沙场丧命，为盗的刑律处罚，做官的钻营奔走，都是于人类生命名誉有重大关系的，为甚么偏要去做呢？因为他是受了国家的诱迫，社会的鼓动，家庭的束缚，久而久之，遂成一种伪道德恶风气。在他本人最初的一个念头，未必肯愿如此。故我们择业，必先把一切诱迫、鼓动、束缚摆脱干净，然后再由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一种职业，是与我们性情相近的，良心所安的，我们一生的生活就不至枯寂无味龌龊卑鄙了。

（二）人类必需的。我们有多少职业专是娱乐自己个人的，或是有害他人的，譬如那些斗方先生，他终日都在那里做诗填词，我请问他除了自己一个人快乐外，对于他人有甚么好处？要是他自己不穿衣不吃饭不住房也就罢了，偏偏他所消费的又与别人一样，这叫做分利而不生利的人，我们是要排斥的。又有许多人，将那有用的田地去种植罂粟；又如那商家专做那操纵市面的生意，不但是人类不需，而且是害人的了。所以，

我们择业不仅是图自己快乐或利益，一定是要人感必需的。

（三）可以普遍的。有许多发明家、制造家、著作家所做的事情，专是为少数人谋娱快的。譬如发明家发明了一样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专是矜奇炫异，博富贵人家的欢心，以助他们穷奢极欲，我平民是没有这财力来购买的。又如文学家著了许多文字，专是供给那富贵人家赏玩的，不是我们平民大家可以消遣的。我们现在择业须先存一个“为大多数谋幸福”的心，凡事均须求其普遍通俗，也就不是与少数人当奴隶了。

（四）可以公开的。秘密二字为万恶根源。现在有多少职业生怕被人侦知，如造枪炮的兵工厂，禁止外人参观；如制造丸药的大药房，生怕泄漏秘密——“因为里头有吗啡”；如和尚道士的符箓、政客强盗的阴谋、卖荣的议员、卖淫的暗娼，还有许多居间营业的敲诈手段，都是不可告人的。俗语说的“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恐怕不可告人的职业真是数不胜数了。我们现□□□□要光明磊落的，不要鬼鬼祟祟的。

以上所说的四种原则，你择业的时候仔细思量一番，照着做去。不管你是在精神界或是直接有益于人的，或是间接有益于人的，你只要每日作工八小时，你也就对得住你的衣食住了。若是你照上述的方法做去，你还是穷的了不得，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光景，那就是现在社会制度的根本不良了，这社会革命四字我们也就不能顾忌了。

学生与劳动①

我有一位朋友新从日本回来，我问他在东京时候还有几位好学的朋友么？他答应道：在东京的时候倒还有几位好学的朋友，但是他们一回中国便都不愿意再读书了！我听这两句话，十分诧异，十分悲观。

我立刻就与我那位朋友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东京时好学，一入中国便不好学”？研究的结果，得了三种缘故：第一是因为政治不良的缘故；第二是因为社会腐败的缘故；第三是因为学生自身的缘故。如今且听我慢慢的说来。

第一个缘故就是政治不良。欧美日本各国的政治，虽尚未到至美至善的地步，但是他们政治上的秩序是异常整齐严肃的。政府对于学者提倡奖励自不用说，即学者自身对于自己的前途亦有一定方向，尽力发挥他的本能，是一步一步做去的，不是全凭侥幸

① 原文自1919年2月25日至28日分四期连载，今合为一篇。

的。我们中国政治上的秩序，既极凌乱，因之大家都怀了一个侥幸心。不但学政治法律的人只想做官，就是学工业实业的人，亦多想跑入政界。但是中国政界向来专由一班专吃政治饭的包办，是一个官吏万能的时代，哪能容你这些新进的专门学者？若是自己不趁早打个正经主意，自然是一生光阴大概都要消磨于希望之中了，还有什么时候来读书呢？又有一种人看见那些最时髦的人物所有的富贵势位均不是由读书得来，又见许多不合时宜的学者终身坎坷困苦，就觉得古人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在”是欺人之语了！要想飞扬腾达，还须在读书以外另想别的法子。还有一种人，看见国内政治凌乱，以为不可救药，从此亦不再读书了。总而言之，因为政治不良的缘故，大家都不肯读书了。

第二个缘故，就是社会腐败。欧美社会是活社会，中国社会是死社会。因我们中国古来有人主张“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他所指的“士”，就是现今所说的智识阶级；他所指的“农”，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劳动阶级。学问既为那些士人所专有，自然是这些“农工商”与那些“士”就慢慢的生疏客气起来了。这种风气直到如今还是丝毫未改，所以现在的学生与社会依然是格格不相入的。社会上既不尊重学者，亦不需要学者，学生对于社会遂存了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念头，不知不觉的便慢慢厌世起来，亦不肯再读书了。学者为社会的灵魂，社会既无灵魂，也就成了死社会了。欧美社会既是一个活社会，所以学者有所主张，社会上也就有人照着实行。社会上需要学者的程度日日增加，学者对于社会的责任亦觉日日加重，与我们中国社会恰是两样。

第三个缘故，就是学生时代专倚赖父兄供给，决不加入社会活动。毕业以后一入社会，看见五花八门的，神经为之昏乱。又加倚赖性质早已养成，一切生活不知从何着手，终日都在奔忙，还有什么时候来读书呢？所以中国学生的生活遂打成两极。学生时代只读书不入社会，毕业后只入社会不读书。现在国内外毕业的学生当不止数十万，为什么学术始终不进步呢？这就是大大的一个病根。上次汤化龙先生游美通信中，他说美国现任陆军总长的少公子一面在小学校读书，一面为人送牛乳卖报纸。我又看见黄炎培先生的考察教育日记，他说有一位美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与人当听差。这两桩事情，我想中国人听了必大大的称奇：为什么现任陆军总长还不拿钱供给儿子读书？而且他的儿子尚在小学校读书，亦未到独立生活的年龄，何必分他求学的宝贵光阴，偏偏要叫他卖报纸送牛乳呢？那位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是可笑，既有毕业文凭，何不去求一官半职，乃甘居人下，做一个听差？真是毫无志气！

我对于这些批评观察暂且不论，如今再举两个例来。我认识一位美国人，他曾举办了四个大学（并不是卖文凭的大学）；我又知道一位英国人，他一人得了三个博士，但是我细细考察他的生活，乃与刚才所举的卖报纸、送牛乳、当听差的生活差不多，我乃大彻大悟的明白过来，才知道欧美人在学生时代，都喜欢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毕业以后

仍是继续劳动，继续读书。他的生活，是无所谓贵贱的，是终身一致的，他的思想、学术、人格都是一种向上的，不为生活所累的。

所以我现在要由这个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里头寻出一个极有兴趣的新生活来。就是学生与劳动这个意思，就是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大家如欲从事这种新生活，必先打破一种传说及习惯。

第一种就是读书不可分心的传说。所谓心不可分的意思，若是专指娱乐游戏而言，尚有几分道理。（其实尚须活看，因作工时便作工，游戏时便游戏，是两无妨碍的，若专是工作，毫不游戏，那便成了机械了。英文有一句格言，即系此意：Work While You Work，Play While You Play.）若是读书之外便不准从事他种生活，那就是真正荒谬了。古今中外伟人学者，由艰难困苦中磨练出来的，差不多十之六七。当其他在艰难困苦中，有谁帮助他？无非辛辛苦苦自食其力罢了！若上述的传说是打破的，那历史上的伟人学者，应皆出自钟鸣鼎食之家了。

第二种就是以工作为贱业的习惯。列位须知，现在是二十世纪劳动主义盛行的时代，这只吃不做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若是你及早从事工作，你还可以算是一个先知先觉，适应世界潮流。一般有世界智识的人，见你工作，便知道你是个有心人。其余讥笑你的人，那都是一种无感觉的草木禽兽。你还顾忌他，怕他笑么？你若是打不破这种习惯，“新生活”三个字，你永远不能见面了。

以上所说的都是攻击这不良的传说习惯，如今且说这新生活，对于我们个人的好处。（一）养成独立生活；（二）熟悉社会情状；（三）养成耐劳习惯；（四）炼成强壮身体。此四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我详细解说。惟我所主张的劳动，是偏重用体力的方面。本来用脑力也算工作，不过我觉得于身体无大益处，而且现在的学生，多自命能以智识（即用脑力的工作）贡献于社会。其实他所贡献的智识，对于社会有无益处，还是一个疑问，倒不如踏踏实实用自己体力，做些有益于人的事业，也就对得住他的衣食住了。

俄哲脱尔斯泰说的“吾人以半日的工作即容易得衣食住的代价，以其余半日用在娱乐及修学上面，因工作而人类的身心得健全，社会的疾病便减绝”，这几句话是极有价值的。脱尔斯泰每年三季住在乡间从事农业生活及制靴的工作，其余一季往莫斯科从事有益平民的著作，也算得言行一致了。

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我对于现在的新潮流有一种见解，就是：

（一）与其灌输各种主义，不如提倡劳动教育。因主义是容易输入的，教育不是一时办得到的。

（二）与其提倡劳动革命，不如鼓吹一般人工作。因革命是容易激动的，工作是需相当时间然后始能养成习惯的。

（三）与其鼓吹一般人工作，不如自己首先实行工作。因徒托空谈是无实效的，身体力行是感人最深的。

（四）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

我既抱有以上几种见解，所以我决定作工。有至亲爱的朋友问我道："你将来的前程如何?"我只回答道："终身工作，终身读书，草草劳人，无可告慰。"

俄罗斯之研究[①]

有许多人听说俄罗斯的过激派三个字，他便喜欢的连嘴都闭不拢来。又有许多人听说过激派三个字，他便愤怒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请问他喜些什么？怒些什么？过激派的主义，你都知道吗？过激派的现状，你也知道吗？我恐怕能够回答这问题的人，狠是不多!

这回俄罗斯革命，总算是二十世纪一桩大事。那些过激派的举动，究竟是祸是福，总应该大家细细的研究。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果然有些真理，我们可以采纳一二；要是过激派的主义毫无道理，我们亦可以辩驳一二。这种责任差不多全负在新闻记者身上。不幸我国的报章，对于国外新闻，大概都取材于路透电、日本报纸上海英文报及数家通讯社，其中尤为翻译日本报纸为拿手好戏。列位想想：这素抱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口中的过激派，已非真正的过激派。我们就据这种消息，断定过激派的主义行为，未免牛头不对马嘴了！我在上海报上，看见一段新闻，先把他抄出来，与大家看看，然后再来批评批评。

妇人国有之奇闻

俄国北境传来消息：称过激派政府，已实行妇人国有之政策。有数城之政府，已设立专司自由恋爱之官。洁身自爱之妇人，有不遵政令者，已受笞刑。其例文

① 此文于1919年3月1日和3月2日分两篇连载，今合为一篇。3月1日所刊应为"俄罗斯之研究"（一），原刊误为"俄罗斯之研究"（四）。

云：凡女子年至十八岁者，即为国有。既至此年，如不到自由恋爱部注册，即施以重罚。既注册后，则可任意于十九岁至五十岁男子中，择一人为同居之夫婿，不必问其人之允否。其被择之人，亦不许驳拒。至于男子，亦可于年过十八岁之女子中，择选为妻。此等择选，每月举行一次。恋爱自由之衙署，有独立之权。凡在十九岁至五十岁之男子，为利国计，可于注册之妇女中选取，不必问其允否，由如此结合所生之儿女，皆为国有云。

我今天先批评他这个题目上"国有"二字的错处。

俄罗斯的过激派，又叫做广义派（Bajkeaim）。一九一八年一月召集农工兵大会，外交委员托梦斯基出席说道："我们的革命是广义的革命。"他的意思，这种革命，是不以政治自划的，国界自划的。要由政治及于经济的，要由国内及于世界的。俄罗斯至今只有一个人民委员会，并不取政府形式的组织。当他们组织这人民委员会的时候，所宣布的宗旨，（一）无政府，（二）废私产，（三）废宗教，（四）停战（与德奥停战）。他们对于国内的组织，据一九一八年一月农工兵大会的决议如下："我俄罗斯之旧国，泱泱大观。在国家主义的眼光看来，自应设法保存，永久不替。但是由进化人类的眼光看起来，便大有不同。从前人民为国家的个体，如今人民为社会的分子，国家如何了无关系。故吾俄罗斯同胞，破除历来偏见，决意打破俄罗斯大国，而为适合民众之组织。苟求民族之自由，虽分之至于无量数小组织，亦在所不恤。"又托俄罗斯基[①]对于派遣外交大使之意见，以为向来外交大使，系由政府派出，对于他国政府办理交涉。这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的替身。在国家主义之下，才应如是。若在社会革命的俄国，则不然。因为我们革命，是平民劳动者的革命。所以派往各国的代表，不必理会各国的政府，也不要请求各国承认，自己做自己的事罢了。其主要任务，却为联络人民，扶助他们劳动者，普及我们"颠覆帝国主义资本阶级政府"的主张。

照这样看起来，现在的俄罗斯过激派，不但不保存自己的国家，而且不承认他人的国家，是一种"非国家主义"。连国家都没有，这"国有"二字是从何处生出来呢？

我现在再批评这条新闻内容的错处。

过激派既是信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要点，就是"解放"二字。强国对于弱国解放，国家对于人民解放，男子对于女子解放，资本家对于劳动家解放，宗教上的解放，学术上的解放。这些主张，有无真理，是另自一个问题。总之，对于女子，是主张解放的。要如这条新闻记载，那就不是解放，是专与解放为难了。

现在俄罗斯的人民委员会中，有一位救济部长就是女子，名叫郭冷苔，是过激派中

① 托俄罗斯基：根据上下文，此处疑为刊误，应为"托梦斯基"。

一个女杰。

又据日本"新社会"杂志上所登载的 Bolsheviki 之建设的设施，将过激派的现状，说的甚详。现在俄罗斯无论男女，凡在十八岁以上，皆有选举权。至于男女间的离婚结婚的手续，也是办理的狠有秩序的。

又据去年"东方杂志"的插画，其中有一篇过激派执政时之俄京，内有几位工人之妻，自请为前敌的看护妇。

据以上几个例看起来，第一，过激派是极尊重女子人格的。第二，俄罗斯的女子是了解过激派主义的。要是上海某报所登载"妇人国有"的新闻果系确实，我想，那些最爱自由的俄罗斯女子，早已革起过激派的命来了。

又有人说这"国有"二字，疑是"公有"二字之误。又有人说这过激派是主张"公妻制度"的。此种说法更属可笑。这些都是我们东方人的口吻，他为什么不说公夫制度呢？因为东方人向来不尊重女子人格，视妻如一种物品，为男子所有。今看见最新学说，有主张打破婚姻制度之说，遂以为前日个人所有之妻，今将进而为共众所有。总之，"所有"两个字的观念，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改不过来了。所以什么"公有"、"公妻"等话，也不免冲口而出了！殊不知果然是废除婚姻制度，那夫妻两个字的名目，早已不成立了。

听说现在英国有一种公共育婴院。因为女子既要到社会上服务，所生子女，无暇养育，故送到公共育婴院。这是欧洲女子注重社会事业、鄙薄家庭生活的结果，也是欧洲女子的人生观。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现在过激派，或也有同样之组织。凡自由恋爱所生之子女，自己无暇养育，即送入公共育婴院。此事或者有之。若是照着上海某报那条新闻逐句解释，就令人莫明其妙了。这种新闻本无批评辩驳的价值，不遇有些新闻记者，居然将这"妇人国有"四字写上他的评论，亦可算太不小心了！

我著这篇文章的意思，第一并不是为过激派辩护；第二我对于俄罗斯的近情，亦异常隔阂，不过还希望大家，无论赞成反对，总应该细细研究，不可盲从，亦不可妄诋。现在我拟了三种办法，来请教请教。

（一）发起一个俄罗斯研究会，将过激派的主义与他的现状，及反过激派的主张与他现状，细细研究。用正确的眼光，作有统系的记载，随时印行小册。

（二）由数家报馆合作组织一个通信社。多订几份俄文报纸，（不管他是过激派或反过激派的机关报，都要多订几份。）聘请两位熟习俄文的，专翻译俄罗斯消息，作一种有统系的记载。如上海各报的"北京通信社"一样。

（三）每家报馆编辑俄罗斯新闻的人，不可多任他事。不但是要他晚间编辑俄罗斯新闻，而且要他白天研究俄罗斯近情，（如欧美报纸，及哈尔滨海参威俄人所办之英文

报，均可取材。）在现间没有新闻学大学以前，这种办法亦可以补救新闻记者毫无常识之弊了。而且编辑数年新闻，也可以得些专门智识，比他的脑子里尽装些什么合肥河间东海西林，高明得多呢。

什么是“善”①

此文系若愚君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之演说。兹承录寄本社，特登于左，以供群览。

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是“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是“好的”，甚么是我们应该做的，甚么是我们应该赞成的。

甚么是“好的”这句话是狠难定的。因为同是一件事情，在古来叫做好的，到现在也许叫做不好的；在古来叫做不好的，到现在也许叫做好的。又在那个地方叫做好的，到这个地方又叫做不好的了；或是那个地方叫做不好的，到这个地方又叫做好的了。譬如前清时的革命党，都说他是造反，是犯罪的人，到了民国来，大家又称他为伟人、为元勋了。又如台湾地方的生番，以杀人愈多为愈好，但是在我们中国看起来，那就是野蛮行为了。照这样看来，在前清那个时候叫做不好的，我们现在也许叫做好的；在台湾那个地方叫做好的，在我们这个地方也许叫做不好的。所以我说什么是“善”这句话是狠难定的。

但是我们若是毫不知什么是“善”，我们决定自己的行为与批评他人的行为，就没有一个标准了。譬如黑夜行路的人，没有月色，没有灯光，便不知道往东呢还是往西呢。

你若是知道甚么是“善”，甚么是“不善”，你就知道甚么事该做，甚么事不该做了，你也知道甚么人做的事是狠好的，甚么人做的事是不好的了。

甚么叫做好的善的？就是：

对于我们公众有利益的，就叫做好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也就是我应该赞成的。

譬如你是一位瓦工，你是一位土工，你修了一座桥，你筑了一条马路，这是顶好的。因为你修的桥，你筑的马路，我们大家都可以走走，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有利益的。

---

① 原文于1919年4月26日、27日分两篇连载，今合为一篇。

若是你替有钱的人盖上一座大花园，修了一座大洋房，只有他一家人可以快活的，可以消遣的，就不算是顶好的，不算是应该做的。因为你为的是少数人的快活，当了少数人的奴隶。所以，你们以后做事，一定要先想一想：我做的这样事，是对于公众有利益的，还是与少数人当奴隶。对于公众有益的，你就赶快去做。与少数人当奴隶，你就没必要做。因为你是一位顶有价值的一个人。你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男子。是要为公众谋利益的。

又如大总统下了一个命令，警察厅出了一张告示，我们看了这个命令、这张告示，就应该立刻想想：这是为我们公众谋利益的，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若是为我们公众谋利益的，这个命令、这张告示，就是顶好的，你立刻就照着去做。若是这个命令、这张告示，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与我们是不相干的，那就是不好的，你也就不必管他了。

又如你看见军人警察，你就立刻想想：这些军人警察，是保护我们公众的，还是保护他们少数人的？若是保护我们公众的，就是好的。譬如今天到这里来的警察都是好的，因为他是保护我们公众的。你常常看见许多胡同里大公馆门口，有几位替人守门的兵，或是替人守门的警察；你又看见汽车两旁站的军人，耀武扬威的样子，那都是不好的。因为他保护的是少数人，他是少数人的奴隶。

你们看见读书的人，你就应该立刻想想：这些读书人与我们公众的人有没有利益？若是他著的文章我们都懂得，他操的学问也是为我们公众的，那就是好的，我们应该赞成的。若是他著的文章，我们并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所巴结的人，都是些官；他所操的学问，是专为他自己快乐，是与我们不相干的，那就是不好的，我们应该不赞成的。

我说了许多话。你们心中一定怀疑道：这位讲演先生，叫我们没要替少数人做事，没要保护少数人，但是我们没有洋钱，没有势力，与少数人当奴隶，也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列位你若是想一想：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你们的身上想方设计弄出来的。他们的势力，还不是由你们摇旗呐喊做出来的。为什么他倒那样快活？你反倒这么倒霉呀？这不是你们的命运不好，这是你们的心眼不灵，受人家的骗了。

我们顶老实顶可爱的朋友们呀，你们以后做事，总该先想一想：究竟是当少数人的奴隶，还是为公众的利益。你们看见别人做事，也应该想想：他做的事，是为我们公众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快活？你们知道分别这个，你便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赞成的，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了。

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①]

顷在晨报的自由论坛栏内，读了梁乔山君与某君论社会主义的一段文章，我有许多不敢苟同的地方，特地写出来请求梁君指教指教。

就这篇文章看起来，梁君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可作下列三种：

（一）对于无政府主义，是狠怀疑的。

（二）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是狠赞成的。

（三）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用社会政策达到的。

如今且把我不敢赞成的地方写出来。

第一层，梁君说，无政府主义即是三无二有主义……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一字，含义甚广，不但是包括无政府（Anarchism）、无家庭（Anti-Familialism）、无宗教（Anti-Religionism）三个主义，而且是包括无资本（Anti-Capitalism）、无军备（Anti-Militarism）、无祖国（Anti-Patriotism）、无国会（Anti-Parliamentism）、无……诸主义。故仅以三无主义解释无政府主义，便把无政府主义的范围看得太狭了。梁君又以“二有”二字解释无政府主义，亦不确当（“二有”二字疑是“二各”之误，因为“各尽其力，各取所需”八字之中寻不出一个“有”字来）。因为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不过是共产主义一种原则。近人解释集产主义，亦尝用各售其能，各取其值八字。若以二各（或二有）二字解释无政府主义，语意实不明了。数年前江亢虎君曾以“三无二各”解释纯粹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并有三二学社之组织。即三无二各之意，大为刘师复君所驳斥。闻江氏留学美国，学问狠有进步，当不至再作此等滑稽的解释。克鲁泡特金曾为无政府主义下一简单的定义道：“无政府主义者，无强权也。”我以为仍偏于消极方面，不足以尽无政府主义的意义。故我常常私拟一个定义道：“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的组织，而主张互助自由的社会者也。”吾人对于一种主义，无论赞成反对，总要给他一个确切明了的解释，以免后来的学者增加疑难，以讹传讹，真象遂永无发现之日了。

第二层，梁君说，人是一种喜竞争好安逸的动物。假使毫无国家社会的制裁。而欲

① 原文于1919年4月29、30日分两期连载，今合为一篇。

免此二者之弊，尚待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派别甚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此种主义极重视社会的组织。在这个新社会里头，自然是要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是大家公认的。举其大纲，就是劳动互助四个大字。换一句话说，就是一般人都应该养成勤劳的习惯，发达利他的心理。在这个社会之下，若有不习勤劳，只图利己的人，必为社会所不齿，所屏斥。不齿屏斥，便是社会的制裁了。我以为社会的制裁，比国家制裁的力量更大。譬如这回各督军通电不干涉政治，他们眼中，果然有国家的法律、畏政府的制裁吗？不过是社会制裁的效力罢了！故梁君所说无政府时代便无社会的制裁，我实不敢附和。若谓人类喜争好逸的弊病，非有国家制裁便不能挽救，我更不敢附和。

第三层，梁君是极倾服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也承认国家社会主义或是由现在社会到无政府社会的一种桥梁。惟国家社会主义，亦自有其坏处。吾人今日已感资本私有制度之不良，若一旦将此资本集中于国家，这种强大的国家权力，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还请梁君指教。

第四层，梁君说国家社会主义目的，以中国情形而论，不必经社会革命，直以国家一种政策达之可也……。现在俄罗斯之布尔斯维克岂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吗？为什么各国政府都不欢迎呢？中国政府尤为害怕。这就是因为各国的政府与资本家是一不是二，分离不开的缘故。梁君文中亦有……军阀财阀互为梗阻，欲此主义之实现也更难……的话。可见梁君也知道，欲达国家社会主义目的，不是一样容易的事情，非经大改革不可。大改革便是革命，关于社会的大改革，便是社会革命了。

以上四层都是极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我特地写出请求指教。至于梁君文中所说的……，某于此敢下一断语，以为实现此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标准，即露积其财货而无人窃取，与美女同宿而不起淫心，能如是则此主义有实现之日矣。否则恐徒乱社会之秩序，率天下为禽兽而已矣……窃尝思之，欲达此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目的，由君主政治而达之，或由共和政治而达之，初无难易之区分……诸语，我皆不敢恭维。惟因其无关宏旨，所以不必再辩了。

总之，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崩到海的来了[①]。有无施行社会政策的期间，缓和社会革命的余地，实是一个疑问。我明知社会革命的惨酷，但是潮流到此，无可幸免。只有尽自己的力量，使一般劳动者自身觉悟，为一种有理性的、有秩序的动作。一方面使他们知道工作与人生的价值，一方面设法增长他们的利他心。所以我对于梁君所说的……吾人须以身作则自居，于劳动者之地位……极表同情。我从前所著的文章多系鼓吹工作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

① 崩到海：原文如此，疑应作“崩山倒海”。

劳动者的权力[①]

著者此文，系应劳动纪念日所作。昨为篇幅所限，未能即时登出，兹特补录之。

“劳动者的权利”这句话本来不能成立。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活，大家都是一个劳动者，自为生产、自为消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除了劳动者以外便没有其他的人物。劳动者的全体，就是人类的全体，劳动者的权利，就是人类的权利。所以单独提出这个“劳动者的权利”的问题，理论上狠说不过去。但是我今日居然将这个“劳动者的权利”问题提出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列位：你要知道，现在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都是一个极不完善的。在我们辛辛苦苦的劳动者以外，还有一种安安逸逸、分利而不生利的人。我们劳动者终日勤苦所得的生产物，都被他们掠夺去了。他们凭借掠夺的生产物，造成一种特别势力，我们劳动者终日呻吟悲苦于这个特别势力之下。要想减除这种呻吟悲惨的苦痛，才发生这个“劳动者的权利”问题。所以我今天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现代不良社会中的出产品，若是在将来完善的新社会里头，那就不成问题了。

今天是万国劳动同胞庆祝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劳动同胞知道行使自己权利的一个纪念日子。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一日，美国的劳动者，因为要求每日八点钟的工作，不愿用那议会政策迂远的手段，决意直接用同盟罢工的方法，后人所常称道的“芝加歌殉难者”（Chicago Martyr）。就是这一回替我们劳动同胞要求权利流血的英雄。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巴黎的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五月一日这天，作为“劳动纪念节”，放工一天。这个纪念日就叫做“五月一日”May Day。现在这个纪念已举行二十八次了，离我们芝加哥殉难工人流血的时候已经三十三年了。

权利是义务的对待名词。我们劳动者尽了相当的义务，就应该享受相当的权利。再进一步说，世界上一切的权利，只有劳动者方能享受。列位你想想：从早晨到晚上，从晚上到天明，你所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劳动者血汗做出来的？你所消遣的书籍、文艺、美术，哪一样不是劳动者的脑汁做出来的？换一句话说，这世界上的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5月2日。标题的“权力”疑为“权利”之刊误。

一切东西，不管他是物质界的、精神界的，都是古来的工人与现在的工人血汗脑汁所生产出来的。（以上都指人力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泛指一切自然界的事物。）劳动者既尽了许多义务，自然是能够享受权利的人，也只有我们劳动者了。但是事实上恰恰与之相反。我且举一个例出来！北京香厂有一座高大洋房，叫做“新世界”的，岂不是我们北京土工、木工、石工辛辛苦苦一层一层的建筑起来的么？为什么现在“新世界”里头快活的人，总寻不出几位土工木工石工来，却是一般素不作工的高等游民在那里取乐？我们土工、木工、石工也只能站在外头，看见许多少爷小姐老爷太太兴致勃勃的进去出来，如天上的神仙一样！我们劳动者也只好暗地喝采道：好一个热闹的场所呀！但是巡警又撵起来了！恐怕我们的臭气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熏着了！我们家里八十岁的老母、两三岁的小孩又快饿死了！就想在“新世界”的门口多站几分钟的工夫，也不能了！可见尽义务的人，未必享权利，享权利的人，未必尽义务。这种社会的组织，有人说道，建造“新世界”的土工木工石工，得了“新世界”主人的工钱，那就是他的权利了。这句话实在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得的工钱，仅仅能够维持生活。列位要知道，人生在世，作工是人生的天职，生活是人类本有的权利，在西洋名词上叫做生存权（Right of existence）。这种权利从他母亲肚里出来的时候就带起来了，断不是“新世界”的主人可以给他的。总之他作工是为他自己及公众作的，他工作的结果，他自己及公众都可以自由享受的，不能够将他工作的结果，尽被别人掠夺去了，而自己反仅仅能够维持生活，还算是权利吗？所以我说工钱不是他的权利。

什么是劳动者的权利？我如今且举两个最重要的出来：

（一）要求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应归公有。生产机关是关系我们人类全体生命的东西，今为少数人所私有，是无异将我们人类全体的生命，交与少数人去掌管。这种危险，何等可怕。况且那握着生产机关的少数人，并不是他们自己工作，还不是雇我们劳动者替他们作奴隶，作牛马。我们终日工作，仅得维持生活，或并生活也不能维持。那些田主资本家，终日快活，毫不作工，反得最丰富最愉快的生活。世界上不平等的事，还有比这个更不平的吗？所以现刻各国的劳动者，不管他是主张集产主义，或是共产主义，对于生产机关，没有不主张应归公有的。（注意所说的公有，是把土地机械归与公共机关管理，我们大家都可以利用，并不是将田主资本家的产业，拿来瓜分，作我们劳动家的私有财产。）我们亲爱的劳动同胞呀！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求的第一个权利了！

（二）要求教育平等。许多人讥笑我们劳动者没有学问，欺负我们劳动者没有智识，好像是我们是天生来的愚人，永远不能有学问有智慧的一样。其实我们劳动者一个个都是勤奋诚笃的，不遇是没有操学问的机会罢了！我们在小孩的时候，便因生活逼迫，不能进学堂读书，即或进了贫儿学校、半日学校读几天书，也无力再进高等专门学校、大

学校，虽有天才，也无从发展。我们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你们想想那些大学校的房子，哪一座不是你们建造的？那些教员先生们，那一位不是你们的血、你们的汗，把他们养大的？为什么他们只教育那些资本家的儿子，就不管你们的儿子！我们以后一方面要求国中一切学堂都要公开，不收学费，任我们劳动者自由前往听讲；一方面要求我们的雇主，减少工作时间，替我们办一个补习学校，每日读书两三点钟。这个读书的钟点，还是要加入工作时间内计算，仍是要给工钱的。（现刻外国工人亦有如此要求。）我们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这就是我们应要求的第二个权利了！

本来我们应该要求的权利狠多，不过是以这两种为最要紧。所以我不愿多举，以乱我们诚实可爱劳动同胞的脑筋。我们若是将这两种权利要求到手，我们的生活便不至于如此悲惨，我们的思想也不至于如此狭隘了。我们应该立刻抱定宗旨，挺起身来，要求这两种权利，不到手决不干休。

社会主义的派别[①]

我昨晚接了杨君师南来信，叫我将社会主义的派别说说。以我这样浅薄的人，实在不配做这篇文章。但是既承杨君不弃，殷勤函询，我又不敢辜负他的好意，只好将我所知道的老老实实的把它写出来，以作杨君问题的答案。如有错误的地方，尚希杨君及阅报诸君匡正。我如今且先把杨君的来信，抄在下面，然后再将他的问题，一一答复。

若愚先生：

我前日在晨报的自由论坛内，读了梁乔山君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正觉得有许多怀疑的地方。昨今两日又在该报上，看见先生对于梁君的书，已经有了辩难，实在是“先得我心”了。我以为现时稍懂世界大势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无可逃的潮流，然而明白社会主义的真意义，和明白社会主义派别的人，还是狠少。我就是一个不敢自居为十分明白的人，所以对于先生说的“总要给他一个确切明白解释，以免后来学者增加疑难”这几句话觉得极表同情。但是先生的话，不免还有许多未尽的地方。今试把我所知道，大家不明白的问题，一一写出，还望先生指教，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5月3日。

当不至以唐突见罪吗?

(一)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一是二?如其是二,其不同之点安在?其系统又如何?

(二) 先生既说“无政府主义派别甚多”,其派别名目和各派不同的地方何在?

(三) 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的内容如何?属于哪一个派别?

以上写的问题,我知道实在有许多人不能明白。仿佛狠希望有人能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浅说,给他读了,可以恍然大悟的光景。所以要请先生,最好用显明的法子,写登晨报的自由论坛内,使爱读该报的人,都能一一了解,那真算做“功德无量”呢!

此信如承答复,请寄登晨报做为先生大文的小引,岂不更妙?

杨师南上
四月三十日

我在回答杨君的第一个问题以前,且先列出一个表来,以醒眉目。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无政府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是主张有政府的,无政府社会主义是主张无政府的。这是两派对于政治主张不同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是主张集产,无政府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无政府社会主义亦有主张集产者。如蒲鲁东〔Prudhon〕的平民互助银行,即类似集产主义。又有主张独产者,如都克〔Jucker〕的独产主义。然此两派在近今无政府主义中,其学说势力已不若共产主义之盛)。这是两派对于经济主张不同的地方。从前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常常说道:“无政府主义即真正社会主义也。”又说:“无政府主义者,即废去政府之社会主义也。”中国无政府主义先觉师复君,亦尝说:“吾人之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乃主张共产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也。”足见国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皆系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为集产的社会主义,一为共产的社会主义。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万国劳动会(Inter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开会于伦敦,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之马格斯(Marx),主张无政府主义之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特金,皆到会。因为意见不同,大起争论。到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两派遂完全决裂。今日一般人的习惯,皆呼国家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无政府党人亦不欲与之相混,乃自称为无政府党,或无政府社会党,或是无政府共产党,决不单称社会党。故杨君的第一问,我可以简单的回答道: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近人所呼之社会党),皆为社会主义中的一派。现在俄匈德奥的过激派,皆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辈,即属于无政府共产主义。

以上系回答杨君的第一问。如今再回答第二问。

无政府主义的派别狠多，其中最重要的，除上述之无政府共产主义外，尚有无政府集产主义，如蒲鲁东之平民互助银行是也。蒲氏对于政治则主张无政府，对于经济则主张集产。（集产的解说详见第三答案，兹不赘）又有个人无政府主义，为司梯尔（Stirner）辈所主张。此派主张个人极端自由，不但无政府，并无经济组织。不但无宗教，并无人群道德。又有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为托尔斯泰（Tolstoy）所主张。托氏笃信基督教，编有福音简说十二章，把基督所说五戒反复说明。托氏晚年又欲建设一个宗教。现在的无政府党人，大都反对宗教。但是托氏无抵抗主义的学说，在欧洲的力量，仍是狠大。此外还有文学的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的内容，我不大清楚，不敢乱说，尚希杨君恕我。杨君的第二问题，我也算勉强的答复了。

如今且回答这第三个问题。共产主义是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集产主义是主张各售所能、各取所值。前者工作与取需都是狠自由的，后者工作与取需是略有限制的；前者为无政府党人所采用，后者为国家社会党所采用。我在每周评论第十八期中曾有一篇论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说得较为详细。兹特抄呈杨君一阅。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发生在欧洲，将近百年了。学说狠多，派别狠复杂，最重要的，当推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种。如今且拿这两种主义作为主脑，把他们的要点写出。其余各种主义，有说明的必要时，便附入这两种主义里头，解说解说。

因为叙述上的便利起见，我把这两派对于政治的意见，“即如何组织的问题”和对于经济的意见，分开解说。

（一）互助的无政府主义　此派为近世无政府共产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辈所主张。世人多以为凡无政府主义，都是一种无组织的、无秩序的、消极的、破坏的，这便错误了。无政府主义中，有一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为司梯尔（Stirner）辈所主张。此派主张个人极端的自由，不但无政府，并无经济的组织；不但无宗教，并无人群的道德，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正立于反对的地位。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把现在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极快乐的新社会出来。故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是反对强权，不管他是国家、宗教、社会、家庭的强权，都是要反对的。从积极的方面说起来，是要建设一种极公平、极快乐的互助社会，至于这种新社会，怎么样的组织？克鲁泡特金曾经说过：“脱离政府的藩篱，发展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因互助的原理，为自由的组织，由单纯以趋于复杂。故他日的自由团体，将如蛛网密布，以办理社会的事情，以求生产消费的适宜，及满足文明社会各种的需要与欲望。”换一句话说，就是脱离强权的少数人的

政府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治团体。只要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小团体，不要担个虚名的大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于组织的意见了。他们对于经济问题，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等）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生产的社会。世人多误疑共产便是劳动者瓜分资本和生产物，那就是均产，不是共产了。均产是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极力反对的，在这个新社会的时候的道德，就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要劳动才可以生活，要互助才可以进化，这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及道德的意见。

（二）国家社会主义　此派为马格斯（Marx）辈所主张。他所主张的阶级战争，是要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出来组织政府，将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交通机关和转运事业概归国有，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家银行，有总理一切营业的权。他们狠重视这个国家，所以亦狠重视政权，便与上文所说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组织的意见根本不同，就在这个地方。至于他们对于经济的意见，是主张集产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手段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售所能，各取所值，这就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地方。

两派以外，有蒲鲁东（Prudhon）所主张的平民互助银行，略似现在的集产主义。又有巴枯宁（Bakunin）的工团主义。又似今日的共产主义。惟其中有一段历史，不可不知道的，即马格斯曾手草过一篇共产主义的宣言。其实他所主张的是集产主义。其实巴氏所说的，实似现在的共产主义。

集产主义既是各取其值，自然免不了交易。关于交易的办法，从前圣西门（St. Simon）主张各人所得的报酬，当视其工作的多寡以为比例。后来蒲鲁东主张生产物以工券为交换，其工券即代表每人工作的时间。美国有位华伦（Wharran）在桑桑尼地（Cincinnati）开了一个小店，人人都称他为时间店（Time Store）。（Store）因为交换各种的生产品，以作工的时间短长为标准，至于工作交易的办法，鲁伯士斯（Rodbertus）有一个草案：（一）以工作的难易定每日工作时间的短长；（二）以工作时间多寡定物品价值的贵贱。譬如至难的工作，每天只要工作四小时，所工作的时间虽有四小时八小时之分，而其效力则完全相等。他们所用的货币，即是代表工作的时间，物品的价值，则视该物品所费工作时间之多寡以规定之。譬如一张桌子，费了三天的工夫才做出来的，就须要三天的工作券，才能够买去，这就是集产主义一部分的学者的关于交易方法的主张。

于此可见，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对于政治（即组织问题）的意见，是根本上完全不相同的。对于经济的意见，生产机关和可作生产手段的物品，应归公有，是两派完全相同的。所生产的享乐物品，则前者主张公有，后者主张私有，这是

两派不同的地方。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攻击国家社会主义道：有了国家，便有了强权，又采行集产制度，便免不了交易；有了交易，就免不了嫉妒竞争的心；有了嫉妒竞争的心，那社会上又要闹得不安宁了。并且人的能力，虽然是有差等，但是所需要的，同是一样。今若以所得报酬，以工作的多寡为比例，是强者智者所得常常有余，弱者愚者所得常常不足，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分别？故不如各取所需的方法完善了。

现今的俄国布尔扎维克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一派，非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我在一月以前曾著有一篇《俄罗斯之研究》，说布尔扎维克曾自标其主义为无政府主义，系根据劳人君所著的《欧战与劳动者》。如今细考布尔扎维克的所为，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布尔扎维克亦受有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他们所组织的劳农政府是一种特别形式，与现在各国政府的组织不同，故至今英美报纸、中国政府犹称他为无政府主义，我以为直呼他为布尔扎维克主义，比较的妥当。

以上三个答案，杨君如有不满意的地方，尽可随时指教。因为我也是不敢自居为十分明白社会主义的人。杨君如以为问题繁难，非笔墨所能尽，即请将尊寓处所见示，以便走访请教。如闻报诸君对于我的文章有所批评，尤为十分欢迎。

总解决与零碎解决[①]

这几天我听见了两种相反的言论：一个是时事新报记者所主张的总解决；一个是杜威博士讲演“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时所主张的零碎解决。

主张总解决的人，他说零碎解决是白费心了！我们应该预备实力，从根本改造。

主张零碎解决的人，他说世界上没有总解决的事实，都是因时因地因事一桩一桩的零碎解决，故解决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所以近来一般人的口头禅“改造改造，根本改造”，未免过于笼统，实无丝毫意义。

这两种言论，可算是针锋相对了。

我以为这两种主张，若是趋于极端，都有流弊。

主张总解决——根本改造——的人，每每忽视现在具体的问题，因为他的脑筋里，只希望实现他所理想的新社会，把眼前一切具体的问题，都置于不屑过问之列。若是时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9月30日。

事新报记者的言论，发之于五月四日以前，曹汝霖、章宗祥一定是不会毁屋被打；若发之于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前，欧战一定是不会勃发，协约国社会党一定是不会赞助战争（欧战时协约国社会党多赞助战事，因欲铲除德意志军国主义也）。即以现在而论，抵制日货，力争外交，都无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打倒曹、章，推翻德皇，抵制日货，力争外交，都不是总解决——根本改造。曹、章虽倒，尚有千百个曹、章；德皇虽倒，尚有千百个德皇——即抱持军国主义者。抵制日货，力争外交，都是一种暂时的事实，与总解决无关。照这样说起来，主张总解决的，应该对于上述各种问题，全不过问，方能主张一贯。然而事实上主张总解决的人，仍是不能忘情于上述各种问题。若不是自相矛盾，便是见解有未透澈之处，可见主张总解决的人，不能自圆其说了。

主张零碎解决的人——即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每每只看见一部分，忘却大部分。换一句说，就是见着小的，忘去大的。若是社会里的分子，这种人太多了，那社会一定是短足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他终日埋头在局部具体的事实里头，□不能高瞻远瞩为根本的计划。这种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办法，美其名曰研究问题。现在一切富于惰性的政客，终日奔忙，何尝不是要解决零碎的问题。譬如上次胡适之先生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里，叫我们研究南北怎么样议和，安福部怎么样解散，我请问：南北军人一时高兴和了，一时又发怒打起来了，胡先生有何方法，使他“必和”、“不打”？又如安福部解散了，他再可以组织福安部。如像北京伶人吉祥园不唱了，他可以到三庆园唱戏，横竖在北京城里鬼混，不过搬一个房子罢了，胡先生又有何方法使他再行解散？我仿佛听见杜威博士讲演时，系主张在各时各地各事上（Everyday、everywhen[①]、everything）力求改良（Reform）进步（Improvement），作一种零碎的解决。若照这种说法，不加以补正，其流弊必使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限于一种极狭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所以我说，这个主张的流弊，可以使社会短足进步。

以上两种主张，我都不敢附和。我平生有一个终身奉守的信条，便是：凡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目的，都应该有一个下手地方。若是把我这个主张，应用到“总解决与零碎解决”的问题上，便是：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总解决的理想目的，都应该寻着一个下手地方——即对于与总解决有关之问题逐件解决。

我举一个例：譬如我们要专筑一个花园——理想目的——因为要实现这种花园的理想，你去修花径，他去筑花台，我去锄野草，你他我所取的手段，虽有消极积极之不同，但是我们对于这种问题，逐件解决——零碎解决——都是要达我们花园的理想目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

的。若是我们没有这种共同理想目的，你去经商，他去教书，我去作工，虽说是正当职业，但是我们的理想花园，永远不会建筑了。

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

譬如我要到上海，取道津浦铁路，凡关于津浦路上的问题，与我行程有关的，我都要逐件解决。若是京汉路发生重大问题，但是与我行程无关，我却不管，仍然走我的津浦大路。

现在一般人讨论的“问题与主义”，若是把我的主张应用到这个问题上，便是：

主义便是我们的理想目的——总解决——关于这个主义的问题，我们应该逐件解决——零碎解决。

譬如讲社会主义的人，社会主义的组织，便是他们的理想目的，激烈者出于“暗杀”、“同盟罢工”的手段，反对资本家，铲除强权；温和者出于“新村”、“工场工人自治制”的手段，试验学理，讨论方法，便是他们的下手地方，即对于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各问题，皆要逐件解决。所以我对于现在一般“纸上的社会主义家”狠抱有一种不安的态度，因为他只有理想目的，而无下手方法。

我今天做这篇文章的用意，并不是批评他人的坏处，表扬自己的好处，却是因为我们同辈的青年，大多数还是一种迷惑状态，只就“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这个问题而论，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了。

我们还是从政治下手吗？还是从社会下手吗？现在又添上“问题与主义”这个问题，大家更疑惑起来。我们还是研究主义吗？还是讨论问题吗？

今天又加上“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我恐怕越发要迷惑起来了。

青年啊！我们现在陷于这个背水阵的地方，举世无一人可靠，专赖我们青年自觉自决。我们应该拿出纯洁的思想，真确的智识，建立一个根本计划，然后再以热烈的情感，坚强的意志，一步一步的做去。凡有与我们根本计划相抵触者，虽是极零碎的问题，我们亦要将他解决，虽以身殉，亦所不惜。若与吾辈根本计划无关者，尽可不问。

青年啊！速立根本计划、理想、目的——总解决，速寻下手地方——零碎解决！

改革旧家庭的方法[1]

组织女子周刊

组织女子互助社

昨天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开李超女士追悼会，演说的人除了两位女子而外，其余的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学生，没有一位外面的人上台演说。这个追悼会可以算是北京大学和女子师范包办，与社会上不生什么关系。因为社会上觉得这个追悼会，是小题大做。

我昨天本来有一点意思，要想说出来，继后我因为时间不早，而且我的声音素来狠小，我怕耽搁别人工夫，所以就没有演说了。我今天且把我要说的补写出来，供阅者诸君的参考。

我以为昨天不是开会追悼李超女士，是我们借个题目向旧家庭旧社会作一种示威运动。所以我们不必怎么样赞叹李超女士的奋斗，亦不必怎么样批评旧家族的制度，我们应该有一种家庭革命的实际运动，救出现在将死未死的女子。

与李超女士同样运命的人，不知有若干千万。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开追悼？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通信机关，互通信息。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言论机关，把黑暗情形表现出来。现在应该由有觉悟的女子出来，组织一种报纸，一方面可以引起社会同情，一方面可以使女子内部互相通声息。这种报纸篇幅不要太大，如从前每周评论样式，每千份不过九元左右；或办周刊，或办半月刊，均视经费多寡而定。关于这种女子周刊的提倡，我在少年中国第四期妇女号上，曾论到此事。在三星期以前我因事赴武昌、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各处，会着狠多的女同志，对于组织报纸，均非常赞成。广东有一位女士与我来信，他愿意汇款若干专购这种女子周刊，向各处散去。现在国内据我所知道的，在上海只有一个《女界联合会旬刊》，是女子自己办的，但是其中有思想的文章，还是狠少。此外湖南有一个《女界钟》，是一个女学校办的，内容尚好，但是他的销路，恐只限于长沙一隅。其余如商务书馆之妇女杂志，是男子办的，

---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12月2日。

而且不成东西。我们北京若创办一种女子周刊，纯粹由女子组织，我预料他的价值，必在上述几个报纸之上。若是销路不错，专以卖报收入，便可支持。至于文章呢，若材料缺乏的时候，陈独秀先生等尚可以投稿——这是陈先生向我说过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女同志，在最近时期内，应该发行一种报纸，因为女子问题是要由女子起来解决，男子是靠不住的。我上次编辑《少年中国》妇女号时，我把女子所做的文章都摆在前面，我的意思就是要女子自己出马，不要男子代庖。

以上是我希望女子自己出马的第一桩事。如今再说我的第二个希望。

这回李超女士之死，岂不是因为生活问题吗？现在旧家庭握着我们青年男女生命的，便是生活问题。我们青年男女既受家庭虐待，要想逃出家庭。但是逃出家庭以后，社会上的黑暗，更胜过家庭百倍。家庭虽恶，尚有几分爱情维系，而社会上的阴险欺诈，更在家庭之上。若是一个女子逃出家庭，来到社会，不是自杀，便是堕落。所以家庭虽黑暗，大家也只有忍受，不敢脱离了，因为脱离后第一感着困难的，便是生活问题。

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一个女子生活互助的团体。一方面可以维持生活，一方面可以免掉社会上的欺诈。这个团体的组织，分为两部：

（一）生计的。

（二）求学的。

关于生计的。我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手工，如织袜子手巾之类；第二种是贩卖，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每日工作五六小时必能维持生活，其余时间作为读书及娱乐之用。

关于求学的。将来北京大学开放，女子当然可以当旁听生，选择几种功课研究。即或大学不许旁听，我们便可用团体名义，请几位有学问的先生，每天教我们二三点钟，比较在学校里得益更多呢。现在有学问而又有觉悟的人日渐多了，只要我们有一种坚苦卓绝的精神，组织这种互助团体，我预料自愿作义务教员的一定不少。

有人主张在学校内由同学组织一种团体，专供给贫苦同学的学费，我觉得甚不妥当。第一，我们安有如许金钱接济许多贫苦同学？第二，就被接济的同学而言，倚赖他人生活，是一件最可耻之事。我们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奋斗。我又接有一位女士来信，她希望我们办一个女子半工半读学校。我回了一封信，内中说道：你希望别人办好学堂，你来安安逸逸读书，是靠不住的，要由你自己奋斗，方才可靠。

女子互助社若是办好了，便是自己奋斗、自己生活。我们可以发出一种宣言，凡是受黑暗家庭虐待的女子，或是因婚姻压迫的女子，或是生活困难的女子，你们都可以到

我们社中生活，而且我们可以共同向旧家庭旧社会开始总攻击，我他[①]团体便是与旧家庭抵抗的大本营。

劳动是我们人生的天职，诸位还是愿意在旧家庭中自杀呢？还是愿意来互助社中劳动呢？

前数月我与左舜生君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那个主张还是偏于寻乐方面。我今天这个女子互助社的主张，完全是免掉自杀的方法，更是紧要，更是迫切。

城市中的新生活[②]

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君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村间的新生活。今天我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

昨日我著一篇改造旧家庭的方法，主张组织一种“女子互助社”。今天我所提出的就是把“女子互助社”的范围扩张为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此是第一个理由。

现在青年男女大概皆倚赖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倚赖习惯，终身不能独立生活，为社会之蠹。若是有一个适当组织，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生活。这是第二个理由。

现在社会制度不良，平民生计日艰。虽有优秀青年，亦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若是有一个互助组织，便可自由读书。这是第三个理由。

我们大家的脑筋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这是第四个理由。

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

① 他：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疑应为“们”字之误。

② 本文发表于1919年12月4日。

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这是第五个理由。

有了以上五种理由，我们便应该计划一种实行的方法。

（一）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团员，必要具备两种资格：（1）作工；（2）读书。

（二）生计方法，暂时可以分出两种：（1）手工，如织袜、织手巾、装订书籍之类。（2）贩卖，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

关于置备机械、租赁房屋的资本，我们愿意担任筹募。

（三）团员不限于男女，均在一处共同作工，惟寝室分作两处。

（四）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

（五）共同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共有之财产。

（六）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

（七）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皆由团体供给。惟所购之书籍报纸，均系团体共有。

（八）团体中须置备陶情悦性之音乐数具，随时举行各种游戏，共同娱乐，或结队郊外旅行，强健身体。

（九）团员求学择校，完全听其自由，并可用团体名义请求各校特准旁听，减少学费。

（十）若因工作时间太多，不便在各校听讲，则由团体每日敦请有专门智识的学者教授二钟。

（十一）凡有团员一人之介绍，经本团体评议会认可，便得为团员。

（十二）凡自愿退出团体时，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会通过，得听其自由退出。

（十三）每日工作所得，皆须在册上注明。若有怠于工作情形，由评议会提出警告。若经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即令其退出团体。

（十四）本团评议会，由团员全体组织之。

（十五）本团执行部由评议会中选出若干人组织之。

（十六）执行部办理会计庶务等事。

（十七）本团团员须随时佩带本团徽章。

（十八）团员有不道德之行为时，互有规勉的义务。若事情重大，有妨团体名誉，即由评议会令其出团。

以上数条是我随手写出来的，混乱之弊，在所不免。将来正式组织时，再作成有统系之规定。

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限制的，不

能将各科皆办齐全，以应一般苦学生的需要。而且程度参差不齐，又不能开办若干班次。现在把生活与求学分成两事，较易办理。第十条特请教员教授，是一种辅助方法。

这种组织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供给苦学生的学费，在供给的方面，便是一种恩惠行为，在受供给的方面，便是倚赖他人生活。故不如这种团体，完全由自己奋斗。

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这种组织除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我狠愿意费些时间，专奔走此事。

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高一涵、李守常诸君等商量，我们立刻就要做去，现在请求阅者诸君两事：

（一）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务请详细见示。

（二）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期见示。

通信处：北京东华门宗人府东巷东口内蓬庐王光祈

《法兰克福日报》[①]

德国对华的文化政策[②]

德中之间的和平条约已经签署，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如果德国政府，不能及时认清中国社会近个时期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极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尽管近十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况愈下，但是，中国社会改革却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而是转向社会改革领域。

在如何进行社会改革方面，中国目前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主张发展中国经济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阵营的领袖是中国的商业巨头张謇[③]，阵营的成员主要由中国的工商业家们组成（张謇，中国大资本家，曾任农业与商业部长）。另一个阵营，主张发展中国经济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去重复欧洲曾经走过的错误老路，这一阵营的领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属于这一阵营（蔡元培，曾任教育部长，早年留学德国）。

---

① 创刊于1856年，是德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当时的刊名为Frankfurter Geschäftsberiche，1866年改名为Frankfurter Zeitung，1943年被希特勒关闭。这是一份内容极为丰富的综合性日报，对世界各类大事都有报道，是当时德国的主要大报。二战结束后恢复刊名，1949年定名为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直至今日。

② 本文登载于1921年7月14日《法兰克福报》，并加有编者按。

③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译者注。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为的是能够更好地推行他们的对华文化政策。例如，通过庚子赔款，支付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开销费用，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中美贸易关系日益亲近。其原因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累计已经超过 2000 人，而中国现在重要的工商业成功人士，大多都曾是留美学生。

法国政府在过去 2 年中，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蔡元培和法国一些对华有兴趣的人士，共同创办了中法教育协会，目的就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法国留学。现在，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超过了 2000 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部分年纪较轻，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他们到达法国后，从事多种社会活动，许多人在工厂实习，靠勤工俭学生活。法国政府只向每位学生收取价值 100 美元的旅费让他们来法留学，同时提供大量工作机会，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教学单位。

现在中德政府已经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有这么一个条款：德国政府保证向中国留学生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从这个事实中不难看出，德国政府也狠重视德中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但是，如果德国人希望通过和中国的政府间合作来推行这样的文化政策，这无疑是一个错误。德国应该和中国的社会改革派人士取得更多联系，但是，在社会改革派的两大阵营中，到底和谁去合作，这就要取决于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观点了。

大战结束时，德国的地位和法国有着狠大差距，中国留德学生也不可能获得留法学生那样的良好待遇。但是今天（有了上述的那个德中条款之后），许多障碍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也可以让中德的高层成立一个中德教育协会。中国的工商业家们，可以派大量的学生来德国的工厂企业培训。中国的工商业家们也愿意将此事担为己任，为此而提供资助。除此之外，如果德国的工厂，还能够向这些中国的培训人员发放一些报酬的话，那就更好了。德国的工业家们只需要承担这样的义务：指导留学生们如何工作，并监督他们完成工作。如果能够这样做，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自然会将德国的文化在中国加以传播。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效果：中国人会更多地购买德国的产品。现在已经有 40－50 个中国留学生因获得德国大企业家的私人资助而去欧洲和美国学习。对于德国而言，这种做法应该是可以获得企业家们广泛认同的。至于说到语言，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因为在中国只有狠少的人学习过德语，但是我们不用着急，因为在留学期间，可以通过补课来解决，而且我们相信，这用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中国的留法学生中，60－70％也是不懂法语的。

总而言之，德国在远东的政策，必须建立在文化领域及社会基础之上，如果只有政府间合作，两国人民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的。尽管今天中国的留德学生只有 200

人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肯定会逐步增加，一定会逐步赶上留美、留法的学生人数。我相信，经过 20 年之后，不管我们现在致力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留德学生数量都会增加。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力肯定会发生重大变化，我衷心希望，德国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考虑其二十年后在华的地位问题。

《每周评论》[①]

国际社会之改造[②]

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个名词我本来不愿意用的，因为我主张永远的和平，是要打破国界的。连国界都没有，还有甚么国际呢？不过现在无有适当名词，只好权且借用。

这回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总算是亘古未有的了，现在仗已打完了，和平会议亦快开了，甚么亚尔萨斯罗连复归法国咧，意大利国境的改正咧，比利时的恢复咧，德国殖民地的处分咧，都是这一回议和的问题。但是这一种打败仗的倒霉，打胜仗的占便宜的事情，无论在哪一世纪都有，若是战争的价值仅仅如此，我就要为那战死的人民、用去的金钱呼冤。

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样差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那俄德革命，社会党骤然跃起；第二就是那国际大同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又叫做和平大同盟（The

① 《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创办的一个和《新青年》相配合的紧密联系实际、针砭时弊的刊物，在“五四”时期有广泛的影响。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刊登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如：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从创刊号到第20号，其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同时也介绍俄国、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第21号到第25号，集中详细地报道和评论了五四爱国运动，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前列；第25号以后，由胡适接编。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政府查禁，共出版37期。

② 本文发表于1918年12月22日。

League for Peace）将要成立。这两件事总算在那进化的轨道上行走，亦就是这回大战的价值，我们是应该尊重宝贵的。但是这俄德境内的社会主义，何时才可以收功，这是要看我们人类觉悟的程度如何，此时尚无把握。这国际大同盟能否成立，也是大大的一个疑问。我今天要研究的，就是国际大同盟能否成立，与那成立后能否维持和平。

海洋自由问题，在十七世纪起首的时候，就有一位格罗格罗鸠氏提倡，这回威尔逊总统，亦把他列在和平议案里头，而且要亲自到欧洲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英国海军协会已有反对的决议，他说："海权是英国的长城，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弃的。将来如有战争，欲使母国与殖民地互相联络，谋海上的安全，这优越的海上权，无论如何是要保留的。"可见这回大战刚完，二次大战的预约券，他们已经订购了。还有这人种问题，日本亦要提出，据纽约威尔佐报评论此事，说："美国如其取消人种区别的偏见，国内必酿出纠纷。英国的困难情形，亦与美国一样，故和平会议英美二国必力避这个问题的解决。"如这个问题不解决，英国间的危机，早晚都可以暴发的。这样看起来，这国界人种的偏见，是永远与和平反对的，我所说的国际社会改造，是要破除国界人种偏见的。

日本浮田和民做了一篇新亚细亚主义登在太阳杂志上，他说这国际大同盟是一时不能成立的，所以在欧洲宜由英、法、德、奥、伊联合起来，在美洲以美国为中心，将南北美联合起来，在亚洲以中日协约为基础，将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各自成立一种平和的协同，将来由欧美亚三种协同，渐进而为世界大同盟。他的意思，是要日本来代表亚细亚，所以叫做新亚细亚主义。但是他的新亚细亚主义，第一个原则，便是维持现状。他也知道这个现状，有对之满足的，有对之不满足的，他的意思只要能维持和平，虽稍稍违反正义，也是可以的。我读了这一篇文章，算了一算亚洲全洲人口，约有八亿五千万，日本人口约五千万，不遇占亚洲人口十七分之一。日本对于亚洲现状，自然是满足的了，但是其余十六个五千万人，对于现状，如不满足，亦合该永世无抬头的日子了。要是这十六个五千万中，有几位要满足他的生存欲望，恐怕这和平二字，又算靠不住了。所以我主张的国际社会改造，是要打破现状的。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那野心政府的背后，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战场上的战争刚才打完，甚么经济战争，又要开始。我每次听见战后战（War after the War）三字，我的脑壳皮都痛了！无论战败战胜，享福的总是贵族，吃亏的总是平民。所以这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好恶，不是我们平民的好恶。但是现在政府的背后，即是那些与平民不相干的人，将来由这种政府代表的国家所组织的国际大同盟，一定是不可信赖的。我老实告诉你，你看见那贵族脸上带有几分笑容的时候，你还可以过几天奴隶的安静日子。要是那贵族面上有些怒容，你又该快抛弃你的父母妻子，替他们到战场上拼命去了！所以我主张的国际社会改造，是以平民的自治团体为根据的，若是由着各国

政府办这国际大同盟的事，恐怕是狗嘴里掏不出象牙来！

我的主张，即是要打破国界人种的现状，扫除那资本家、军阀、贵族的威权，实与现在所说的国际大同盟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我所说的国际社会，是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

譬如在直隶省的地方，组织一个直隶自治团体，这个自治团体系由我们工人自相联络组织起来的。所有经济上一切支配，皆由我们自行纲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毫不假手于诈欺取财的资本家与那万恶滔天的政府。我所说的工人，不管他是用脑力的，用体力的，或是直接有益于人的，或是间接有益于人的，只要他在这直隶境内工作，不问他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都算是直隶自治团体的一员。那种分利而不生利的人，不管他是父母妻子，我们都是要排斥的。（指着有能力的说）

如照我的主张，这国际间的猜疑野心，都可以消灭了。甚么国际法国籍法，都可以废止了；这社会上不平等的制度，都可以推翻了；甚么兵工厂法律馆，都可以闭门了。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三万万个饭桶要改职业了（如官吏议员军士僧道土匪等）。

有人说这自治团体组织的国际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一谈到国际间的事情，就不免含有许多纵横捭阖的性质，这句话可是大大的错误了。从前也有许多国际组织，实与我们人民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亦没有甚么纵横捭阖性质，如：（一）万国电信同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二）万国邮便同盟（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三）度衡同盟（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四）文学美术保护同盟（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国际土地测量同盟（其目的专从纯粹之学问上观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六）奴隶废止同盟（一千八百九十年）；（七）铁道赁钱交通同盟（一千八百九十年）；（八）工业保护同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九）货币同盟（一为罗甸货币同盟，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一为斯勘得拉维亚货币同盟，一千八百七十三年）都是这一类。

如今再说那万恶政府所组织的万国平和会议[①]（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第一次的万国平和会议是由全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提议，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开会于海牙的蒲耶皇宫，议决了多少国际纷争平和解决的条约。但是不到五年，这位发起平和会议的俄国大皇帝，已与那曾派员赴会（日本所派系驻俄公使男爵林董）的日本打起仗来了！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系由北美合众国总统的提议一千九百零七年六月十五日开会于海牙威廉第二宫，议决了十三种条约及一种宣言，其中倒有十二种是关于打仗的，这叫做和平会议！几乎把人笑死了！这种人类不长进的样子，你说可怜不可怜呢？现在又要在巴黎快开和平会议了，恐怕这回会议的内容大概又要研究杀人应从哪里开

① 本文中的“平和会议”疑为原刊登所误，应为“和平会议”。

刀、灭国应由哪里入手了！

这回美总统所主张的国际大同盟，还有多少国家，做起那狠不愿意的样子，要是听见我动这个主张，恐怕眼睛都要瞪破了！但是我不过仅仅是一个劳动家，又无权、又无力，亦不愿意将我这种主张，去强迫世界人民实行。只希望世界人类，将自己所处的境遇，仔细思量一番，若是心满意足，或是得过且过，也就罢了。如还要想谋世界永久的和平，人类切实的幸福，就应该动起手来，胆子不要太小了！须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可以自己改造的，并不是天生就的，亦不是贵族给我们的，千万莫要信那贵族所造的命运谣言。若是大家还是这种因循不长进的样子，这地球上真是住不得了！这二十世纪的文明永远不能产出了！这回大战死的人也就白死了！人类既不进化，也就应该从此灭绝了！

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①]

上海时事新报东荪君，反对北洋进步国民三派平分政权，主张精神开放。他的精神开放说，第一是希望这专吃政治饭的，不要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专有物，是一个有饭大家吃的意思。但是这种专吃政治饭的人，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种没有职业的人，就是与我们农工商学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以这种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管与我们有密切利害的政治，自然是没有不糟的。第二是希望这农工商学各界要晓得政治问题不是分外的事，尽可自由主张。但是东荪君是不主张庸众政治，是主张舆论监视的政治。掉一句话说，只希望这农工商学，只立于说话的地位，不必去做。关系我们利害的政治，仍让那些无职业的流氓去管。我恐怕这政治清明四字，永无办到的日子了。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1月12日。

国际的革命[1]

十九世纪，法兰西人民受不了君主的专制，遂起了国内的革命。二十世纪各弱国的人民，受不了强国的压迫，遂起了国际的革命。革命的对头，就是强权；革命的希望，就是自由。

如今各国的政治，虽未到完善的地步，但是他们人民的头上，只有一重强权。我们中国，更是可怜，在这国内的强权之外，还加上几重国际的强权、国内的强权，现在又分北方的强权，南方的强权。我以为我们老百姓的头上，是顶了三重强权。要想推倒强权，只有一个简单法子，就是革命。革北方的命，革南方的命，都叫做国内革命。这几年以来国内革命四个字，大家已经听惯了，如今且说这国际的革命。

协约国联合起来，攻打德国，是各人有各人心事，并不是革德国的命（参看俄国过激派去年所发表之协约国外交秘密文书），所以不能叫做国际的革命。因为这回大战的结果，强权既未推倒，自由亦未获得，可见协约国的目的，并不在此。（参看近日各报所传欧洲和会的情形。）甚么叫做真正的国际革命呢？我且老老实实的举一个例出来。

一九一五年九月，国际社会党在瑞士开万国社会主义大会。议决的要点：以此次欧洲大战为权力阶级的战争，决非平民阶级的战争，双方交战国的劳动者，皆为我们至亲爱的兄弟朋友，大家须要竭力设法制止战争，要以万国主义（Internationalism）来革国家主义的命。

一九一五年三月，妇人社会主义者，为国际的运动，在瑞士开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各国均派遣代表，他们的决议，为排斥军队主义，竭力继续运动。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八日，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在荷兰海牙开会，关于德国军队虐待比人的事情，有所商议。

今年二月三日，国际社会党大会，在瑞士开会，到会者二十一国计有代表八十人。英国劳动党的代表他说这回开会意思，是从政治的劳动组合，及商业组合团体的希望，关于世界平和问题，尽力发挥劳动阶级的势力。

今年一月二十五日，俄德两国的过激派在莫斯科组织国际革命党，反对资本主义，

---

[1] 本文发表于1919年2月23日。

禁止资产阶级的武装。

以上所说的国际社会党的活动，最大目的，就在求人类大多数的幸福。他们所最恨的，就是强权。只要是强权，不问国界、人种、宗教、语言、文字的分别，都要去革他的命。他们所最爱的，就是自由。只要是自由，不问他是强弱大小的民族，都要去帮忙的，有时甲国的社会主义者，帮助乙国的社会主义者，去推翻乙国国内的强权。有时甲乙丙丁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去推翻戊国的强权，都是可以的。

我们中国人的头上，既是比较各国多顶有一重国际的强权，自然是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意思。

今日之梅特涅[①]

一八一五年英俄普奥四国同盟军，将法国打败之后，在奥国维也纳开列国会议。当时奥国首相梅特涅，在这会议场中，狠出风头。虽然到会的代表中，也有几位元首，但都比不上他的谲诈权变。梅特涅把他十八世纪的眼光，来看十九世纪的新潮，便大声喊道："可了不得，这革命自由的狂潮将风靡全欧了!"当时那些君主，亦着实恐怖，就组织了一个"神圣同盟"。这"神圣同盟"的宗旨，表面上是主张博爱、平和，实际上是拿来抵抗这革命风潮。梅特涅遂假借这"神圣同盟"的名义，干涉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的内乱，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在欧洲大陆以外，有一个英国，不肯加入"神圣同盟"，因为他稍稍了解这个世界的新潮，不敢随声附和。一八四八年，意大利、匈牙利、奥大利诸国，同时有革命的变乱。一八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奥国内乱愈甚，梅特涅不得已辞职，退隐维也纳某村，民乱益甚，攻击益烈，不得已出奔荷兰，转入英吉利，后来回维也纳。一八五九年六月六日，一口气不来，就呜呼哀哉了!

日本有一位神藤博士，批评梅特涅长于外交，短于内政。换一句话说，就是只知道谲诈权变，操纵一切。对于世界的新潮、国民的希望，毫不注意。这就是他的失败原因!

如今事隔百年，又有一个列国会议，在巴黎开会。在这会场中，有一位老先生，狠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3月2日。

出风头。他把这十九世纪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的新潮，也大声喊道："可了不得！这社会革命的狂潮，将风靡全欧了！"于是主张以协约国的兵力，剿灭革命的风潮。在欧洲大陆以外，也有一个美国，不肯随声附和。这位老先生不知道现在世界的新潮，与人类的希望。列位想想这岂不是第二梅特涅么？列位要知道他的将来，就请看梅特涅的过去。

兑　现[①]

星期日我到教育部会场，听了胡适之先生所讲演的实验主义（Pragmatism），生出了许多感想。胡先生述说实验主义哲学派中，有一位学者名叫维廉介模士（William James）的方法论，其中关于"观念"的意义，讲得十分有趣。他说"观念"这种东西，像银行的支票一样，这"自然界"像大银行一样，我们将这种"支票"到"自然界大银行"去兑现，果然可以取得票面上的效果，这种支票便是真确的，如不能取得效果，便是虚伪的。

我当时一面听胡先生的讲演，一面想我向来的观念，是否系"可以兑现的支票"，一面又想现在一般人观念，是否皆系"可以兑现的支票"。想来想去，发现许多不兑现的支票，我遂觉得现在的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无往不是虚伪了！

譬如这回国际联盟草案，把列强希望和平的意思，说得十分冠冕堂皇。但是由这种政治家资本家所组织的政府，什么帝国主义咧，产业动员咧，在他们脑子里，都未根本打消，安能获得永久和平呢？所以这回欧洲和会，全是五强国的世界，什么叫做永久和平？不过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罢了！

又如每次大总统国务总理上任，都有一篇大政方针、一张安民告示，说得娓娓动听，但是他们的大政在什么地方？我们老百姓究竟安宁过一天没有？这也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又如大总统下禁烟命令，未尝不雷厉风行，其结果也只有那吃不起鸦片烟的穷民，把烟枪放下，其实政界要人，依然是一□烟霞。我对于这种命令，给他一个名字，就叫做"限制兑现。"

---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3月6日。

又如政党学会，也都有四言八句的党纲、忧国忧民的宣言。但是有几个政党能福国利民？有几个学会在研究学术呢？不过是挂上一个招牌罢了！这也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又如北京人家门首，多贴有“子孙贤，族乃大，兄弟睦，家之肥”的春联。但是你若是将他的门叫开，问一问他家中的情形，我恐怕那家庭不和的空气，几于无处没有，这也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又如穿狐皮、坐包车的社会主义家，毫不工作、只骗衣食的爱国志士，究竟办了多少劳动教育？诛了几位卖国奸人？他所发的言论，所著的文章，虽然是鬼哭神号的一样，我也说他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若是肯平心静气的思量一番，你平生有几桩事情是生了效果的，说了多少废话，都是些“不兑现的支票。”

要想整理这些假支票，唯一方法，就是一面兑现，一面从今以后，决计不再发假支票来骗人。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①]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发生在欧洲，将近百年了，学说狠多，派别狠复杂，最重要的，当推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两种。如今且拿这两种主义作为主脑，把他们的要点写出。其余各种主义，有说明的必要时，便附入这两种主义里头，解说解说。

因为叙述上的便利起见，我把这两派对于政治的意见（即如何组织的问题）和对于经济的意见，分开解说。

（一）互助的无政府主义　此派为近世无政府共产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辈所主张，世人多以为凡无政府主义，都是一种无组织的、无秩序的、消极的、破坏的，这便错误了。无政府主义中，有一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为司梯尔（Stirner）辈所主张。此派主张个人极端的自由，不但无政府，并无经济的组织，不但无宗教，并无人群的道德。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正立于反对的地位。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4月20日。

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是要把现在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极快乐的新社会出来。故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是反对强权，不管他是国家、宗教、社会、家庭的强权，都是要反对的。从积极的方面说起来，是要建设一种极公平极快乐的互助社会。至于这种新社会，怎么样的组织？克鲁泡特金曾经说过："脱离政府的藩篱，发展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因互助的原理，为自由的组织，由单纯以趋于复杂，故他日的自由团体，将如蛛网密布，以办理社会的事情，以求生产消费的适宜，及满足文明社会各种的需要与欲望。"换一句话说，就是脱离强权的少数人的政府统治，另自组织自由的多数人的自治团体，只要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小团体，不要担个虚名的大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于组织的意见了。他们对于经济问题，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等）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共产的社会。世人多误疑共产便是劳动者瓜分资本和生产物，那就是均产，不是共产了。均产是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极力对的。在这个新社会的时候的道德，就是"劳动与互助"五个大字，因为要劳动才可以生活，要互助才可以进化，这就是他们对于经济及道德的意见。

（二）国家社会主义　此派为马格斯（Marx）辈所主张，他所主张的阶级战争，是要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出来组织政府，将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交通机关和转运事业概归国有，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家银行，有总理一切营业的权，他们狠重视这个国家，所以亦狠重视政权，便与上文所说的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关于组织的意见根本不同，就在这个地方。至于他们对于经济的意见，是主张集产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手段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售所能，各取所值，这就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不同的地方。

两派以外，有蒲鲁东（Prudhon）所主张的平民互助银行，略似现在的集产主义。又有巴枯宁（Bakunin）的工团主义，又似今日的共产主义。惟其中有一段历史，不可不知道的，即马格斯曾手草过一篇共产主义的宣言，其实他所说的都是集产主义。巴枯宁因反对马格斯，又自称他所主张的是集产主义。其实巴氏所说的，实似现在的共产主义。

集产主义既是各取其值，自然免不了交易。关于交易的办法，从前圣西门（St. Simon）主张各人所得的报酬，当视其工作的多寡以为比例。后来蒲鲁东主张生产物以工券为交换，其工券即代表每人工作的时间，美国有一位华伦（Warren）在桑桑尼地（Cincinnati）开了一个小店，人人都称他为时间店（Time Store），因为交换各种的生产品，以作工的时间短长为标准。至于工作的时间与交易的办法，鲁伯士斯（Rodbertus）有一个草案：（一）以工作的难易定每日工作时间的短长。（二）以工作时间的多

寡定物品价值的贵贱。譬如至难的工作，每天只要工作四小时便够了。容易的工作，每天便要工作八小时，所工作的时间虽有四小时八小时之分，而其效力则完全相等。他们所用的货币，即是代表工作的时间，物品的价值，则视该物品所费工作时间之多寡以规定之。譬如一张椅子，费了三天的工夫才做出来的，就须要三天的工作券，才能够买去。这就是集产主义一部分的学者，关于交易方法的主张。

于此可见，互助的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对于政治（即组织问题）的意见，是根本上完全不相同的。对于经济的意见，生产机关和可作生产手段的物品，应归公有，是两派完全相同的。所生产的享乐物品，则前者主张公有，后者主张私有，这是两派不同的地方。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攻击国家社会主义道：有了国家，便有了强权，又采行集产制度，便免不了交易，有了交易，就免不了嫉妒竞争的心，有了嫉妒竞争的心，那社会上又要闹得不安宁了。并且人的能力，虽然是有差等，但是所需要的，同是一样。今若以所得报酬，以工作的多寡为比例，是强者智者所得常常有余，弱者愚者所得常常不足，与今日的地狱社会，有何分别？故不如各取其所需的方法完善了。

现今的俄国布尔扎维克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一派，非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我在一月以前曾著有一篇《俄罗斯之研究》，说布尔扎维克曾自标其主义为无政府主义，系根据劳人君所著的《欧战与劳动者》。如今细考布尔扎维克的所为，似近于国家社会主义。）

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①]

我有一位朋友叫我著一篇青岛问题的文章，与日本讲一讲理。我想世界上的人，都可以与之讲理，惟迷信强权的日本人不可与之讲理。因为他的脑筋里，只有强权，“讲理”二字他是不能了解的。故我这篇文章中所谓协约各国，是不包含日本在内。

这回青岛问题，日本在世界和会力争，应由德国将青岛直接交与日本，再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窥他的用意，不外下列两种：

（一）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威迫利诱的手段，与中国的卖国官僚柔懦政府秘密交易，永远占领青岛，以遂他吞并中国的计划。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5月11日。

（二）由中日直接交涉，不由欧会解决，便开中国外交由日本代表的先例。即或将青岛交还中国，亦必附以极严酷的条件，还要使中国感激他的深恩厚德，永世不忘。

日本这种野心，早为世界各国所窥破，不必详述。惟日本人开口法理，闭口事实，我如今且举几个法理与事实出来，以求教于主张公理正义的协约各国。

第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六日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系中德两国间的政治条约，因战争开始而消灭，已为战时国际法所公认。中德宣战后，此种条约，当然不能存在。况且中国对德宣战时，曾经宣言，所有中德条约完全废弃。胶澳租界条约之不能存在，更为明了。日人近谓胶澳租界条约系一种割让领土条约，不受战争影响，实属荒谬。胶澳租界条约中有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又租地界内华民，仍可随意居住（即不变更国籍）的话，试问割让领土条约的先例中，亦有如此规定吗？日本著名的国际法学者中村远藤两博士，亦谓租借非割让可比，不得谓取得领地主权。可见胶澳租界条约，实为中德间的政治条约，而非割让领土条约，当然因战争而消灭。

第二，胶澳租界条约第五款：德国向中国所租的地，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与别国。……请问今日德国有何权源，能将青岛直接交付日本？德国为战败之国，丧失领土，本无足怪，但是割让柏林与日本可也，割让普鲁士全境与日本亦可也，青岛则非德国权力所能擅让，何得转交日本？协约各国，又以何种权源，得令德国将青岛交与日本？

第三，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的柏林条约，俾士麦因欲买奥大利的欢心，将波士尼亚（Bosnia）赫士哥维拿（Herzegovina）二州委与奥大利统治，实为今次战祸的原因。今回青岛问题，协约各国又为同样的处置，一千九百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事，我山东青年子弟，亦□为之。吾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已伏于此。徒使后人视此次巴黎会议与柏林会议有同一的感叹！

第四，欧战开始前十年，德国在中国势力，蒸蒸日上，几欲与深根固蒂之英吉利争衡于长江南北。其所根据的地方，不过一个青岛罢了。今代以日人，则旅顺、大连、胶州、福建打成一片，军事上足以并吞中国，商务上足以推翻英美。

第五，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所有欧战以前一切不自然的处置，皆应本诸民族自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为公平的改正，谋永久的和平。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以外，任凭抱军国主义自命德意志第二之日本自由处置，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西方德意志虽败，东方德意志又起，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皆系协约各国姑息所致。

总之，无论法理事实，青岛问题皆非由德国直接交与中国不可。至于日人所根据的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要求高徐顺济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及近日风传的伦敦密约或为强迫所订，或为一纸草约，或为吾国并未预闻的密约，吾人皆誓不承认。欧战起时，

协约国同酷爱和平的社会党因欲铲除德意志军国主义，不得不暂弃和平主义，赞襄战争。吾中国人士亦以酷爱和平闻于世，然欲铲除东方德意志之军国主义，亦不得不暂弃和平主义。中国政府虽麻木不仁，中国青年则可以“背城借一”。

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①]

司法独立四个字，我们已经听惯了。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司法独立？又怎么样才能够使司法独立？却是狠重要的问题。

普通人解释司法独立四字，是指不受行政立法各机关干涉而言。但是这种解释，是就司法界外部而言，是就司法界对于司法界以外的机关相互的关系而言。若就司法界内部而言，亦有所谓司法独立，系指审判独立而言，即下级法庭的审判不受上级法庭的指挥，上级法庭对于下级法庭的判决，认为不当时则再审的结果或撤消全部或撤消一部均可。惟当下级法庭正在审判未曾判决的时候，上级法庭绝对不能妄加干涉，这就叫做审判独立。(检察厅系从属机关，下级检察厅须受上级检察厅的指挥，与审判厅的组织不同。)

司法独立既有两个意义：——外部的和内部的——我们对于司法界亦有两个要求：(一) 须不受司法界以外的各种机关与其他不正当势力的干涉；(二) 下级审判厅须不受上级审判厅的非法干涉。

司法官厅与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若是司法官只听了姓王姓朱的电话，或是看了姓徐姓胡的条子，便把无罪的人认为有罪，或是有罪的人认为无罪，司法独立的制度，遂从此破坏，人民权利的保障亦根本取消，人民对于司法官厅的信用，既逐渐减少，违法犯法的事亦必逐渐加多，是非不明、善恶不辨，不平的空气弥漫全国，必酿成绝大的乱事。你看司法不独立有多们大的危险呀!

我们中国的司法官，大多数还是前清刑名师爷的派头，不问是非，专听东家的指挥，巴结东家得好，便可以升官发财，今日做检察厅长，明日便可以做司法总长，后日便可以做国务总理。不会巴结的，便永远沉于下僚。因这个缘故，遂养成司法官巴结军阀政党的恶风气。外国的司法界，是最富资格的，必定要久在法界、经验最深、学理最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8月10日。

富的人，然后才可以居法界最高的机关。法官保障法、升迁法，亦狠完备。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握司法权的人，大半皆系时髦政客。所以“司法界黑暗”五个字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了。

以上系说司法有独立的必要，如今再说教育独立的必要。

教育独立四字最近始有人提倡。据普通的意义解释起来，不过以为教育须立在政潮以外，不受政治的恶影响罢了。这种解释系就教育界外部而言，是就教育界对于教育界以外的机关相互的关系而言。若就教育界内部而论，亦有所谓教育独立，系指教授独立而言，即教员讲授学术，有自由发挥的权利。只要他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决不受校内校外的干涉。校内校外若对于某教授有不满意时，尽可为学术上的辩论，不能妄引其他不正当的势力来干涉，亦不能擅用校长职权轻易更换教授，这是我们主张思想自由的人应该极力提倡的教授独立。

教育独立既有两个意义——外部的和内部的——我们对于今后的教育界，亦有两个希望：（一）希望教育界永远立于政潮以外；（二）希望各教授对于讲授学术，务必保留自由发挥的权利，没要为饭碗问题而变节。

讲授学术如不自由，学生思想亦因之锢蔽，这种学术思想定于一尊的办法，是阻碍世界的进化，使民族思想日趋于衰弱，充其量可以使世界人类堕落灭绝。

中国教育界是一般不得志于政界的先生们，聊存小隐的山林，故当教员是一种极不幸极无聊的事。自从蔡孑民先生到北京大学以后，学风为之一变，而前清举人安福鱼行等遂屡引不正当势力以干涉大学，因此一线光明的大学便堕入政海洪涛中。某党派某甲做教育总长、某党派某乙做大学校长，所有思想稍新的教授，均被外间指摘诬陷。我们对于教育独立的希望，至此遂付之东流了。司法独立是关系我们的生命财产，教育独立是关系我们的思想自由，现在司法教育均陷于不独立的状态，我们应该想个什么方法来补救呢？我有两个方法：（一）凡在司法界或教育界做事的人，须与政党断绝往来；（二）司法官与教授的地位，须要有法律的保障。

凡在政党活动的人，大概头脑都不清楚，他们脑筋中装满了东海西林北洋南宁诸多名词，还要加上诸多牌经妓谱，哪里知道人民的生命财产，哪里知道人民的思想自由。若是请他做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或是大学校长、审判官，当然是要糟糕的。如今我们既知道司法教育两界独立必要，我们人民应该宣言，凡与政党关系极密的先生们，都请他没到司法教育两界来鬼混。

法官保障法，本来已有规定，惟现在似已成为具文，务必切实施行，使法官断绝走捷路的侥幸心——即巴结军阀政党的心——以维持司法界严正的独立。

关于学校教授的地位，亦须有法律的保障，不受一切不正当势力的干涉。并对于校

长教授，与以极崇隆的待遇，以扫除从前认从事教育为英雄末路的观念。

以上所说系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的必要及其方法，究竟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

教育与司法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目的都是使社会上的个人，成为一个健全的分子，以促社会的进步。不过是教育系积极的培养，司法系消极的禁止；教育是为将来，司法是罚过去；教育是先养成他的好性格，然后才有好行为，司法是先有了坏行为，然后才感化他的恶性格；教育有时亦用消极手段略加惩罚，司法有时亦用积极手段，施以感化教育；教育是极力发展人的善性，司法是极力禁防人的恶性。可见司法与教育有密切重要的关系了。

司法与教育既有如此密切关系，司法当局必须了解教育的意义，教育当局必须有法律知识。要不如此，司法与教育常立于冲突的地位。教育界所提倡奖励的行为，司法界则认为犯法有罪的行为。譬如从前德国教育提倡尚武精神，柏林大学学生因之极喜决斗，以脸上带有伤痕为荣。若司法当局按照刑律条文，便犯了决斗罪或伤害罪，我恐怕柏林大学学生大半都有入狱的资格了。又如蔡孑民办学校，奖励学生自治，提倡高尚人格，学生因受此种教育，遂养成自治能力，凡事均不思倚赖政府，自行处置，又养成高尚人格，嫉恶如仇，每每有一种侠义行为。若司法当局按照刑律条文，便构成骚扰罪、伤人放火罪，又或构成私攘……罪，轻微……罪，那么，北京大学便是制造犯罪人的工厂，司法界便是专杀学生的屠场！可怜我们纯洁的青年，既受了如此的教育，又触了如彼的刑律，究竟怎么样才好？

可见司法当局如不了解教育的意义，教育前途实异常危险。又如教育当局没有法律知识，唆使学生犯贿赂罪、诈欺取财罪、诬陷罪、损害他人名誉罪，我们脑筋简单的青年，被他们笼络，一失足成千古恨，毕竟便宜了谁？可见教育当局没有法律知识，犯罪人数只有日增月加，司法前途亦异常危险。

故司法官定罪必先审查这种犯罪行为，是出于犯人的恶性，抑出于教育的陶镕。如出于恶性，则可以处罚，如出于教育的陶镕，则改良教育，不能按着死板板的条文，以科无辜青年的罪。

于此可见，司法界与教育界须有互相了解的精神，而且同时均有独立的必要。若司法独立而教育未能独立，则教育界常受政潮的鼓荡，鱼行买办可以当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其结果无非制造一批犯选举罪的人才——因为鱼行用金钱势力运动选举、构成新刑律第八章的选举罪——或是制造一批犯贿赂罪的人才，故仅是司法独立而教育不能独立，司法前途必无成绩可言。

若教育独立而司法未能独立，则司法界当受军阀政党的支配，无论什么新教育，都

不能收效，且极危险。因教育界所说的善，正是司法界所说的恶；教育界所主张排斥的军阀鱼行，正是司法界极端崇拜的东家掌柜。故教育虽已独立，同时亦要司法独立，彼此均不受军阀政党的支配，然后才有成绩可言。

教育司法两界同时均能独立，则其善如此，若一方不能独立，则其害如彼。我希望教育司法两界同时均能独立，不受军阀政党的支配。又希望两界人士要有互相了解的精神，没要使一个国家内有两种矛盾冲突的制度，为阱于国中，以戕害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这是我们人民希望两界人士自身觉悟，若是两界人士自身不愿独立，则我们青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两句话：出了试验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试验室。与这种黑暗势力奋斗，我们狂呼绝叫，务使试验室内试验室外、监狱内监狱外，都充满了不平的空气，那时候只须那吼一声，那黑暗势力便立刻烟消云散了。

《少年中国》[①]

“少年中国”之创造[②]

我著这篇文章，有两件事要预先声明：

（一）这篇文章是我个人的意思，是我个人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意见，把他写出来，请求会内会外同志的指教，读者幸勿误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全体的意见。

（二）我所说的“少年中国” （Young China），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如亚细亚、直隶一样，不是指国家（Nation）而言。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到世界大同的地位，非先把中国这个地方造成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不可。我的脑筋里没有国界的存在，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活动，原不必限于中国境内。不过是欧、美、日本各国已经有许多人士替他们的民族力谋幸福，只剩下亚洲东南角上一大块地方、一大团人类，还是乱七八糟的。我们既生长在这个地方，情形较为熟习，故改造中国的责任当然放在我们肩上。我理想中

① 《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机关刊物。1919年7月15日创刊，始由李大钊任编辑主任，康白情任副主任，但二人均未执行职务，前七期实际由王光祈编辑。1920年，因王光祈赴德留学，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等五人负责编辑工作，1921年迁上海编印后，由左舜生主持编务。《少年中国》月刊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其刊载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撰写和翻译的有关自然科学、文学、社会学及哲学的文章；第二部分是关于会务方面的一些内容。1924年5月《少年中国》停刊，先后延续了近六个年头，共出4卷。

② 本文发表于1919年7月26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我对于改造世界的下手处。近世流行的国家主义——侵略的或和平的——在我这篇文章里头当然无立足之地了。

列位对于我这个题目的意义既已明了，然后再说我对于一切主义的态度。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各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实施某种主义，便有某种主义的先决问题。譬如有一位不知养息病躯的病夫，住在一间有碍卫生的屋子，请了几位粗知医药的医生。这几位医生略诊脉息，便争论起来，甲说要吃凉药，乙说要吃热药，丙说要吃……药，闹个不休。对于病人的屋子既不消毒亦不迁移，对于病人养病防病的方法亦不讲究。这几位医生的药方纵是起死回生包医万症的仙丹，亦是没有用处，必得先把病人移在一个适于养病的所在，又细细告诉病人一切养病防病的方法，然后再由几位医（生）平心静气的斟酌一个药方，这位病人才有痊愈的希望。现在中国人好像病夫，国内的污浊空气—— 一切不良——好像一间有碍卫生的屋子，中国人之“自甘暴弃”好像不知养病防病的病夫，一切主义好像药方，一切提倡主义的人好像粗知医药的医生。我们要想改造中国这个地方，必先变换这种污浊的空气，铲除这种“自甘暴弃”的劣根性，然后才可以说到实施什么主义。我现在只想作一位打扫病房的小子、软语丁宁养病防病方法的看护妇，使这位病人自己愿意养病防病，自己愿意吃药，造成一个适于卫生的环境，然后才有病愈的希望。换一句话说，我就是要解决一切主义的先决问题。

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现代哲学思潮的趋势注重人生问题，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应该注重“人的生活问题”——精神的与物资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怎么样适应环境的问题。我以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要有下列的三种新生活：

（一）创造的生活

（二）社会的生活

（三）科学的生活

第一，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要有创造的生活。我们人类所以继续不断的进化，就是因为能够创造。生物学家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字的解释就是指创造而言。惟创造者才能适，才能生存。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的状况都不是一成而不变的，我们人类处于这种变幻无常的自然界及社会里头，当然要随时改进、随时创造，以适应环境，然后才能够生存，可见创造是适于生存的唯一条件了。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只知道占便宜，不知道惨淡经营的创造生活。国故党只知把古人已经发明发现的保守住，决不

想再辟天地，创造生活，完全出于占便宜的心理，这种人不用说了。就是号称维新党的，今日照抄美国宪法，明日模仿英国政治，今日欢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明日欢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什么康德咧杜威咧我们终日都在欢迎，决不想自己创造，这种维新党的行径，又何尝不是占便宜？我以为这是中华民国青年的绝大耻辱！

列位试闭眼想想，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于自然界中，若是我们的古人都害了我们一般的懒病，只占便宜，享现成，不创造，我们今日当作如何景象？我恐怕还是住在山洞里头，披着树叶，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能说不能写呢。又试想现代各先进国的哲人志士，若不创造学说，改革一切，我们现在岂不是尚在宣统爷的驾下大呼天子万岁吗？可见我们中国古人既有创造能力，现代各国志士亦能创造生活。只有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只知模仿，不知创造，好像天生我们是专来占便宜似的。

列位要知道专占便宜是不成功的。古人的生活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了，各国人的生活亦不必适于中国人的生活了。譬如我们穿的衣服，要他适合身体，一定是要照身材的大小，自己新缝一件方好。若是购买已经做成的衣服，或是借来的衣服，或是偷来的衣服，一定是不容易适合我们身体。袖长剪短、衣宽剪窄，一种勉强迁就的办法，决不是优美民族所乐为的。

况且我们专占便宜，不思创造，我们就成了世界上的冗人；阻碍世界的进化，我们就永远丧失我们的人格。照伦理学讲起来，我们还有在新世界立起的地方吗？又照生理学讲起来，我们这种不用脑力不用体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人类，还有身心发达的希望吗？

青年呵！我们现在唯一的道路就是创造，我们今后的生活就是创造的生活。我们的困苦环境是可以征服的，我们不良的环境是可以改进的。我们若是能够创造生活，无论什么主义我们都有办法。若是无创造能力，无论什么主义都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说“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有创造生活。

第二，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应该了解社会的生活。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囿于家庭范围以内，只知道亲子之间自相倚靠，专做慈孝两个字的文章；夫妇之间，只有肉欲，谨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训。若是提出社会的生活五个大字，一定是莫名其妙。社会的生活，简单说起来，就是共同生活、互助的生活。我们人类同居地球上面，凡愈进化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内容愈扩大、愈丰富、愈优美。这种丰富优美的生活，是要大家共同协力，才能够创造出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或一个家庭单独行动所能获得的。所以我们个人对于社会，就有了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关系、一定的责任。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只能在不妨害他人的范围内自由活动，不能侵害他人、侮辱他人，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察社会的需要，从事某种劳动，以尽个人对于社会的

天职。不是只图自己快活，不管社会上需要与否。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你欺我诈，全不知互助的道理。智识阶级的人，对于劳动阶级的人，更是漠不关心；其余官民男女、富贵贫贱，各是各的世界，全无沟通调剂的方法，阶级思想、部落思想极为发达。你防我欺、我防你诈，这样现象，还有进化的希望吗？无论什么主义进来，都是办不好的，凡是提倡民主主义（Democracy）的人，若不彻底使一般人了解社会的生活之意义，永远不能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所以我说“少年中国”的少年是应该了解社会的生活。

第三，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要合于科学的生活。说起科学二字，中国人实在惭愧得狠，分明是得了疾病，应该请医生诊病吃药，好好静养，偏偏要去求神问卦、降乩扶鸾；分明是经济组织不良，因之贫富悬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偏说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分明是古文旧说，已不适于现代生活，他偏说这是圣哲名言，不能任意批评，须无条件的服从。以上是说中国人的思想信仰不合于科学，纯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不合理的生活。至于我们现在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家庭组织，皆未经过一番思考。换一句说，皆未用过科学方法，为一种精密的研究。我们现在提倡科学的生活，就是主张有意识的生活、合理的生活。凡遇一件事，皆要经过一番严密考察的工夫。若是大家还是信神信鬼、盲从古说，对于现状永不改良、诿之命运，无论什么主义进来，都是不能实施，所以我说“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合于科学的生活。

以上所说的三种生活——创造的、社会的、科学的——就是我们少年中国学会同志所要极力提倡的，我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少年中国主义”。

读者对于“少年中国主义”的观念，既已明了，然后再说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以下的文章，专是叙述方法。

我们少年中国学会有两种事业要积极进行的：

（一）革新思想

（二）改造生活

革新思想，我们想了三种办法：

（A）教育事业　大家看了这四个字，一定以为老生常谈，必定笑道：现在中央已设有教育部，各省已设有教育厅，各县已设有县视学，从大学校至幼稚园，各处皆已渐次设立，哪里用得着你们几个的青年出来鼓吹！列位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教育是贵族的教育，现在中国的学校是纨绔子弟的俱乐部，我们辛辛苦苦劳农两界的子弟，能够进大学堂吗？出洋留学吗？越是经费充足、设备稍全的学堂，越是贵族子弟的专利品。我们劳农两界的子弟，生下地来就受了饥寒交迫的苦况——他并未作过恶事——哪里还有机会读书！列位！你要知道，教育不平等就是社会上的绝大危机！现在我们所要办的教育，与教育部所办的教育，是两件事。我们尽我们的力量，随时随地创办平民学校、半

工半读学校，是一个不要学费而且能顾全他的生活的学校。此外如平民教育讲演之类，都包括此项事业内。

（B）出版事业　现在中国的出版界，真是贫乏极了！一般不懂外国文字的人，就如聋子瞎子一样，世界潮流已闹得天翻地覆，我们还在这里大作其梦。一般书贾只知营利，专印几部堕落青年的诲淫诲盗的小说，不用说了。就是东西洋留学的先生们，归国以后，除了奔走于权贵门下，有几位曾对于出版界稍有贡献呢？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发了一个宏愿，要从事出版事业。将来除了将自己求学的心得随时编著外，凡外国有新书出版，亦将次第译出介绍于国内的社会。

（C）新闻事业　新闻事业亦为广义的教育，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概皆从事教育实业，兼营新闻事业的占全数十之五六。现在拟在各国筹办通信社，一方面将欧美各国政治社会状况输入国内，一方面将吾国青年活动状况译成外国文字，在海外发表以引起世界各国的同情，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

以上所说系革新思想、传播主义的方法。今再述改造生活的方法：

（D）改造个人生活　要改造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应先从改造个人自己的生活下手。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一种烦闷的生活。但是要怎么样才算是理想愉快的生活？因为各人的主观不同、环境不同，狠难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不过是我们竭力将个人自己的生活改善，引起一般人的兴趣，知道改革生活，要得美满的生活，不必取途于升官发财——一般人认为改善生活的不二法门——还有其他捷径可走。并且打破一般人命运之说，以为生活由天而定，不可改造。我们最反对两种个人生活：（1）不自然的个人生活；（2）无秩序的个人生活。第一种如像官吏的生活、军人的生活、和尚尼姑的生活、旧式家庭的生活，都是极不自然的生活、机械的生活。分明是世界上一个自由人，偏偏要缩小“人”的范围，束缚“人”的发展，在一种卑鄙龌龊、专制武断、官吏军人生活之下活动；分明是男女老幼之间，皆当以“爱”字为结合的基础，偏偏被和尚尼姑的禁欲主义与旧式家庭的形式主义束缚起来。还有什么旧式婚姻咧、旧式教育咧，都是摧残天机、束缚自由的利器。我们既生在二十世纪一切解放的时代，所有从前不自然的生活，我们立刻要自动的解放，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第二种我们应该反对的，就是无秩序的个人生活了。——中国人的生活极无秩序，不但是没有百年的计划、十年的计划，明日怎么样生活？后天怎么样生活？他也不知道。甚至于今天早晨起床，今天一日做事的秩序，他也没有支配。只知道饿了便吃饭，饱了便睡觉，有时还到嫖赌界中无聊消遣。外国人最善利用时间，犹恨光阴太速。中国人最不善利用时间，却恨光阴太长。无怪乎外国人纯是一团朝气生气，中国人纯是一团暮气死气。青年呵！我们今后的个人生活，一定要有秩序，今天做甚么？

明天做甚么？今年做甚么？明年做甚么？十年以后怎么样？百年以后怎么样？我们都要有一个秩序，有一个办法，先要立一个最高的理想目的，然后寻出一个下手的地方一步一步的做去。我们的理想目的虽不必及身而见，但是必可以一天一天的接近。有了这种觉悟，有了这种勇气，然后个人生活才有改善的希望。个人生活既是极其自然，又是极有秩序，由这种个人积成的社会，一定是长足进步了。

综合全篇所说的，把他摘要写出来，作我这篇文章的结论。

（一）“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有创造的、社会的、科学的生活。

（二）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简单说起来，要由我们一般青年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且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分析说起来，就是（A）教育事业，（B）出版事业，（C）新闻事业，（D）改造个人生活。

至于我们对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具体意见，因为我们学会不是政党，无发表的必要，而且我们尚在研究期间，亦未到发表的时候。总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今将我们学会的宗旨写在下面，这篇文章就算著完了。

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译成英文便是：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与左舜生书[①]

舜生！我日前接着你的信，本拟即刻回答，后来因为天气太热，不能握笔，只好高吟吴梅村的“惯迟作答爱书来”了。

舜生！我们现在住的不是“人间”，是“鬼间”；我们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是鬼的生活。究竟这种与鬼为邻的生活还有改良的希望么？若无改良的希望，我宁愿与世长辞了！我昨天读了你的文章——《小组织的提倡》，知道你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

① 本文写于 1919 年 7 月下旬，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我欢喜的连吃饭都忘了。

舜生！你问我今年春日曾提出“新生活”的主张，为什么有此动机？究竟有无详细办法？舜生！我只有一个唯一的动机，就是避苦寻乐。我们生在这个万恶社会之中，不但是要求学术上的进步，而且要求精神上的快活。要不如此，可要立刻得神经病，可要立刻上自杀的道上去了。舜生！你今年春日曾告诉我一句话，我至今还是牢牢的记着，你说我们要与恶社会宣战，非自己先行创造一个生活根据不可。若是一面与恶社会宣战，一面要又向恶社会周旋，其结果就是不彻底，就是多所顾忌。舜生！我们提倡新生活的动机，就是主张凡事彻底，毫无顾忌。埋着头儿、大着胆儿，一直往前，决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的牵制，岂不是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吗？

我对于新生活的组织已经有了办法，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是极端赞成的，而且是急欲见诸实行的。

我们先在乡下租个菜园，这个菜园距离城市不要太远，亦不要太近，大约四五里路为最宜。这个菜园不要太大，亦不要太小，只要够我们十余人种植罢了。菜园中间建筑十余间房子，用中国式的建筑法，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身砌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下一条小溪，溪边遍植柳树，柳树旁边就是竹篱，竹篱里头就是我们的菜园了。

兹将每日课程列表如下：

（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

我们园中要附设一个平民学校，附近农家子弟均可以到学校读书，不纳学费。我们还要常常到那些农家与他们诚诚恳恳的周旋。每逢星期，还要聚集他们开一个演说大会，散会之后，我们还要开演幻灯，或购置留音机器一架，使他们大家快活呀！

我们有家眷的可以同住，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归他们办理。厨中事情由我们自己担任，是不雇用仆役的。

为什么我主张种菜呢？因为凡是人类都应该工作，工作之中又以种菜为最佳，其理由有三：（一）种菜系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二）种菜易于学习；（三）种菜收效最快。

为什么每日要读书三钟呢？因为我们不但是要求物质上的适宜生活，而且是要寻精神上的快慰生活，我们若能终身每日读书三钟，真是受用不尽呀！

为什么每日要翻译书籍三钟呢？因为读书种菜都是偏于个人的，如今要想对于社会稍稍尽力，因有多译书籍，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我们会员大概都懂外国文

字，此事狠易办理。惟要办此事，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非有印刷局不可，筹办印刷局一事，我于一二年内必定办好，办起之后还要请你来当经理哪。所译书籍除去纸张印刷费用外，所赚的红利，以一半作为译者的津贴，以一半作为共同生活的费用。舜生！我们今后的事业，就是出版事业；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就是革新一般人的思想呀。

凡是我们的会员，不愿在都市上鬼混的，都可以加入此项团体。当这种团体开始筹办的时候，恐怕每人每月须帮助三四元，到后来园艺发达，出版事业基础已固，那就"绰绰然有余裕"了。我们会员现在散居各国，关于世界消息，我们是狠灵通的。各国若有新书出版，他们立刻就与我们寄来，我们立刻就把他翻译出来、印刷出来。舜生！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舜生！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烂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狠容易的。

舜生！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我们，我们没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我们奋斗的地盘不在都市，而在农村。舜生！好朋友！你的意思怎么样？

致黄蔼女士书[①]

日前在报上读了先生的文章，对于我与舜生君关于小组织问题的主张，狠狠的批评了一顿。我当时住在西山卧佛寺，本是一个狠凉快的地方，但是读完了先生的文章，已经汗流浃背了！先生最不满意的就是因为我那封信中有"我们家眷可以办理衣服鞋子"一句话，认为侵略女权，实在可恶。我那篇文章自从有了这一句"可恶"的话，立刻就变了色彩。本来是新生活，遂变成旧生活；本来是将来的生活，遂变成了过去的生活；本来是群己两利的生活，遂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生活，我以后说话真要注意了！

我如今且先把我那段所谓侵略女权的文章写出来，作为辩论的材料。

> 我们有家眷的可以同住，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归他们办理。厨中事情由我们自己担任，是不雇用仆役的。

---

① 本文写于 1919 年 7 月 31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我主张的新生活有两个主义：（一）自给主义；（二）不用仆役主义。我们新生活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需要与供给，除了我们的力量不能办到外（如米、麦、药物之类），所有其余一切物事均要自做自办，不假手于范围以外的人。既抱定了自给与不用仆役两个主义，则我们一切生活必需的物事，不能不分工办理。我从想像与经验中得来两种觉悟，以为缝纫是女子的专长，烧饭是男子应负的责任。曾经有两个经验：（一）我的故乡风俗是主张早婚的，我记得初婚的时候，每日出了学堂回到家中，常见内人——他的名字叫次玙——在廊上绣花，我心中立刻想道：他曾经受过新旧两式的教育，我也受过新旧两式的教育，为什么他能绣花，我独不能呢？我立刻拿了一个针，要做那刺绣工夫，那晓得不到五分钟的光阴，我已经刺得鲜血长流了！次玙忙叫我道："放着罢，不要太淘气了！"我自从经过这一番流血的教训，便有一个彻底的觉悟，知道缝纫是女子专长了。（二）但是烧饭一层，我却是内行。我记得民国元年从中学毕业，做了半年的报馆主笔，后来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的鬼混，就回到家中。我家里又经成都兵变，家产荡然，搬到乡间一个顶坏的房子居住，我的母亲又在病中——现在我的母亲已死了七年了，可叹！——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主义，我自己烧饭炒菜，做了好几个月。而且一面烧饭，一面读书，竟读完了陶、谢、王、孟、韦、柳各家的专集，还看了许多经史的书籍。我自从有了这番训练以后，我又觉得男子有烧饭的才能了。这种烧饭的工作，我到了北京后还实行过几月。

所以我主张我们家眷做衣服鞋子，我们男子担任厨中的事情，纯是一种按照各人能力的分工，决不发生贱视女子问题。并且我的那篇信中，明明指着我们的家眷，并不是泛指一切女子，我相信我们的家眷真有做衣做鞋的本事，若是现在的新女子，究竟会不会做衣服鞋子，还是一个疑问呢。

次玙女士与我分别有六年了，他在县中办女学堂，早已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在北京留学，亦是半工半读，我们夫妇都是承认劳动——体力的或脑力的——为一种神圣事业。所以我读了先生文中所说的"我想他无非是受足了家庭无知妇女的苦恼，所以恨极了"我实在要替次玙呼冤。

我是一位主张男女平等的，恐怕有时还矫枉过正呢。如今要免除先生的误会起见，我把那段文章的词句略加修改。

> 我们有家眷的可以同住，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归他们办理。厨中事情由我们自己担任，是不雇用仆役的。我们读书、译书及其他教育、讲演等等课程，我们家眷亦是同样的适用。

我仿佛听说先生对于女子教育运动极为出力。前几天看见报上说，南京有一个暑假

讲习会，是几位受过高等教育有觉悟的女子所组织的，恐怕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先生既是一位奋斗的有学识的新女子，对于女子问题一定是有研究的。我们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月刊，拟在第四期特出“妇女号”一册，先生可否赐稿一两篇为我们月刊生色？没要专作壁上观只看我们打败仗，我们便感谢不尽了。

七月三十一日
（黄女士原文见七月念二日《上海时事新报》）

致泗英书[①]

泗英我兄：两示均悉。从前我最爱读陶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又最爱读谢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你如今又说起稻香粱熟、许行陈相一番话头，我的归思又被你惹得大动而特动了。我现刻最厌恶都市生活，急欲到农村与“自然的美”接近。我的思想还是从前的山林思想，但是与一般隐居先生却大不相同，因为我是主张积极的、奋斗的、生产的。我将来即或身居田间，还是要积极的奋斗，努力的生产，不过是我自己狠希望将我的脑筋办到一个极冷静的地步罢了。足下所主张的储金储稿办法，如果办到，则我们的月刊便加上一重保险。不知其他会员对此主张的意见如何？弟王光祈七月三十一日。

致冰先生书[②]

我在报上读了先生的文章，把黄蔼女士对于我那封信的误会，解释得狠清楚、狠明白，几乎把我心中的理想都被先生和盘托出了。自从有了先生那篇文章，我减少了许多唇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19年7月3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② 本文写于1919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墨，实在感谢得狠！不过是黄女士对于我那篇文章的误会，已被先生解释清楚了，而先生对于黄女士的文章，亦有许多误会之处，解释这个误会的责任，当然放在我的肩上。

第一，先生文章里有“况且，就事实上说来，一个人所穿的衣服鞋子有限，管管他不见得就一天忙到晚”几句话。我以为这是先生的误会。黄女士是一位狠有人格的人，是一位狠耐劳苦的人（闻说在这夏日炎天之中，都在从事平民教育），他决不怕忙，亦不怕苦。不过是他的眼光是放在社会事业上面，偶然看见我那封信，好像说女子只能管理衣服鞋子，把我们家眷只当作一种做衣做鞋的器械，所以黄女士立刻替我们的家眷抱起不平来了。其实我当时那封信是随便回左舜生君的，或未想得十分周到，或未写得十分明了，招人误会亦是有的，这是我的错误，不怨别人。但是先生切勿误认黄女士为套上文明假面孔的新女子一流人物，实行他的懒惰主义，不屑管理家务。因为他是极耐劳苦的、极能奋斗的、极有学识见解的，而且他并不以做衣做鞋为下等事（他的原文如此），更说不上不屑管理家务了。只因为他看见二万万女同胞正沉沦苦海，漫漫长夜，何时始旦？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要我们“自谓新少年的先生们”——这个名字是黄女士取的——帮助他们女子解决这个女子问题。不幸又遇着我冒冒失失的发了几句“旁若无人的种种轻视女子的言论”——这句话是黄女士说的——所以黄女士便气急了，发了一篇“怒不可遏”的言论。我虽被黄女士骂了一顿，但是黄女士要求女子解放的热诚，见义勇为的态度——替我们家眷抱不平——我还是十分敬服他的人格。

第二，黄女士赞成舜生君的精神互助说，先生以为没有理由。其实舜生君所说的精神互助，大约系指互有人生观的了解。现在有许多夫妇，形式上尽管亲密，而彼此的人生观，尽管互不了解。舜生君的意思，凡加入我们的团体，不管他是男子或是女子或是一对夫妇，在团员间必要互有人生观的了解。为什么舜生君的回信中，又独对于女子希望他们的精神互助居多呢？因为我们偶然得一位男朋友，是互相了解的，我们的生活已经减少许多枯寂的滋味，但是仍不如女朋友了解的亲切。反之，女子方面也希望得互相了解的男朋友。这是关于两性调剂的问题，亦是我主张男女交际的根本理由——关于男女交际的问题，我的朋友徐彦（之）、康白情曾做过两篇文章，登在《北京晨报》，本来我与徐、康两君曾约定各做一篇，后来我因为事忙，我那篇文章便小产了——男子性质偏于宏壮一派，女子性质偏于优美一派；男子性质好像德国文化，女子性质好像法国文化，有互相调剂的必要。因为异性精神互助的结果，必发生一种奇异的快感，可以解脱人世一切的苦恼。我有一个实例：我有一位极穷的朋友，他想到欧洲留学，所有一切机会、一切计划均已失败，他几乎气得要出世了！我与他已有十余年的极好交情，但是我劝他许久，终不能使他强悲为欢。他有一位未婚妻，新交不到一年，每当他无聊时节，那位女士偶一安慰，他居然破涕为笑，我相信他将来奋斗生涯的成功，那位女士一定是

助他不少。这就是女子精神上的互助比男子精神互助有力的证据。

至于先生对于新女子所下的劝告，我可以冒昧替黄女士答道：

（一）希望他们真正觉悟读书为什么？

（答）为的是发展社会事业，谋人类幸福。

（二）希望他们真正知道现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

（答）现代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极悲惨的、极不平的。但是已经有了觉悟的女子应挺身而起，要求解放。

（三）希望他们先做出事来，后开开口来。

（答）现在黄女士已着手平民教育运动，办有暑假讲习会等事。

（四）希望他们不要自看高得了不得，希望他们明白自己的实在的能力和互助的意思。

（答）现在中国无论男女都说不上“能力”二字，只有大家向上做起去罢了。互助不限于做衣做鞋，精神上亦有许多互助之处。

本来先生是替我辩护的人，我应该谢谢；黄女士是骂我的人，我应该反对。但是这回误会，是因为我偶不留意写出两句文章惹出来的，因甲误会又引出乙误会、丙误会……所以我应该认错，使大家都不要误会。这就是我写信给先生的意思了。

八月一日

（冰先生原文见七月念五日《上海时事新报》）

致裴山先生[①]

现在我们主张新生活，常常联想到妇女问题，若是妇女问题不解决，我们新生活园里一定要充满不快的空气。故对于家庭中不了解人生问题的女子，要使他有机会了解，这是一个狠重要的问题。先生主张筹备一种“妇女讲演会”，自然是改造妇女思想的一个方法。我的意思，与其组织“妇女讲演会”，不如每日茶余饭后开一个“团员全体谈话会”——不分男女——研究人生问题等等。因为这个问题不但是女子应该研究，就是

① 本文写于1919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我们男子亦未到彻底的了解。并且我们现刻研究人生问题，不重玄想，专求真实，不必胸罗万卷，亦可彻底领悟。所以妇女也可以加人，恐怕有时他们还有十分精到的见地呢。我主张“全体谈话会”的理由：（一）不重形式，纯尚自然，若设讲演会便成形式了；（二）男女共同开一谈话会，可以打破男女间的障壁；（三）我们每日劳动与读书时间已不少了，还要宣力社会（如办平民学校之类），为时更多，哪里还有工夫开妇女讲演会，不如附在全体谈话会里头。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八月一日
（斐山先生的原文见七月十八日《上海时事新报》）

致夏汝诚先生书[①]

先生对于舜生君提出三个疑问，问得极好。我的意思亦与先生一样，主张若是女子虽没有受过教育，只要品性纯洁，而他的丈夫却合这小组织的资格，应得一同加入。因为现刻中国受过教育的女子尚少，而且人人都有向上的可能性，我们只要利用他的可能性，引导他们，一定可以成功的。现在中国旧式家庭，一家之中至少有大半或全体是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不但是尊夫人处在旧家庭环境里头，要叹气流泪，我恐怕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同胞，都要同声一哭！

先生对于我主张的每日课程有两个疑问：（一）生活不能支持；（二）因为自修时间太多，要想与农夫接近及改造中国，狠是疑问。

种菜虽是利息极大，但是每日只种两钟，当然不敷生活之用，诚如先生所说。我当时有两种补救方法：（一）从事翻译生涯；（二）初办时每月每人帮助三四元。要从事译书生涯，必先筹办一个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的计划，我已有了头绪，一二年内必定办好。因为印刷所是我们宣传文化的利器，印刷所若已办好，每日译书三钟，包管你能够生活，我敢保险。这是我第一个接济生计的方法。初办的时候，若是已有储蓄的人，每月帮补三四元，帮补一二年，本是狠容易的事。若是毫无财产的人，也不妨在外兼任一样轻松的工作（如学校、报馆的劳心工作，或送报、卖物的劳力工作），每日费去一二

---

① 本文写于1919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钟的工夫，每月赚上四五元，也是狠容易的事情。先生须知道我们现在无日不吃饭、穿衣、住房子，我们的新生活，不过是将单独生活作为共同生活，照经济学说起来便俭省多了。至于新生活的地址，我们若无钱购买，只好租借，照北京市价而论，城外的田地每亩每年不过三四元而已。我们只租上几亩地方，已经够种了。惟北京冬天不能种地，须拿他种工作代替。若无适宜的房子，尽可与菜园暂时分为两处（即菜园与房子不必在一处）。这是我对于生计第二个接济方法。我的朋友黄仲苏君，还想了几种生利方法，更可以补助我们生计（黄君原信见后）。

以上是回答先生生计不能支持的疑问，如今再回答第二疑问。我们开办平民学校、星期讲演会，对于农人已有接近的机会了。我们读译余暇，再做若干小册，专为开发农民智识，四出散布（有了印刷局便容易办了）。从前脱尔斯泰每年三季作工，一季到莫斯科经营出版事业，印成许多小册，拿到农间散布，现在俄国有今日的改革，这位脱先生的力量真不小呀！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改造“少年中国”，只有与农民打成一气。因为农民是劳动界的大多数，握着一般缙绅先生的生命，先生切没要认为滑稽的主张。

我说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不愿在都市上鬼混的都可以加入此项团体，系指我们会员中有一部分人在都市上奋斗的，我们的新生活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他随时可以回来，此层与先生末段文章的意思一样。不过是我们虽住在乡下，从事新生活，同时我们亦是战斗员之一。因为我们每日译书办学校为着何事？每星期演讲又为着何事？无非是制造战斗器械、培养战斗人材、须储战斗实力罢了！此层与先生所说的留稳健的在小组织里的意思，微有不同，因为住在小组织里的，并不是稳健的，反是激进的了。

又先生文中说我主张的新生活，须有数千元积蓄或有家庭的遗产，才可办到。我老实告诉先生，我是一个极穷的小子，也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我日前看见启新农场的章程，要有一千元的股本（即二百股，每股五元）才有住居工作的权利，我想这种贵族式的劳动家，我们当然屏诸大门之外了。我既有这种感想，还肯主张资本家的新生活吗？

八月一日

（夏君原文见七月念八日《上海时事新报》）

致李贵诚先生书[①]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共同生活观念，实在薄弱极了！无共同生活训练的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得好结果。先生等所组织的夏社就是共同生活的模范，我甚愿这个夏社开学以后仍要继续存在，又甚愿各处同志多设类似此种之团体。这是一种群己兼利的办法，不过是要坚持永久，所收效力方大，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八月一日

（李君原文见七月念四日《上海时事新报》）

答黄仲苏先生书[②]

仲苏先生：你信上写的支持生活两种方法，甚好。在现刻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我们应该注重生利方法，要不如此，我们立刻就要饿死了，还有新生活可说吗？去冬我在上海见着我们会员涂九衢君，他是一位主张新生活的人——他现在已到南洋当中学校校长去了——他说了一种制牛奶的方法，也是简易可行。将来我们审察社会上的需要，随时可以从事生利的工作，并不必限于种菜呀！总之我们有我们的理想目的——理想目的不必适合于现在一般人的程度——但是应该寻出一个下手处。我们改革个人生活，就是一个下手处了。现刻中国一般人，不准他人有理想目的，常拿“道高难行”的话头来讥诮理想家，那些理想家又只有理想目的而无下手方法。仲苏，我们理想与实行都要并重才好，你的意思怎么样？

八月一日

① 本文写于1919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② 本文写于1919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致时珍、白华书[1]

时珍、白华足下：手示敬悉。近来月刊销路极好，欢迎者颇多。但是我对于月刊内容，却不满意，与两位的见解正同。不过是这种不满意的内容，却不是我的微力所能解决的，只有希望会中同志多寄几篇较有价值的文字，为本月刊生色罢了。我的意思只希望他一期比一期进步，若是明年今日的月刊内容，还是与今年今日一样，那不如趁早停版，倒还痛快。因为我们会员现刻正在研究学问，一往直前，若是明年今日依然故我，月刊内容仍不进步，那便是好像自己登了一个广告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永远没有进步呀!"本月刊此后自当特别注重科学文字，只是希望你们常常寄稿。你们不满意现在国内各种杂志，这也难怪。但是你们要知道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刚才解放，譬如缠足的妇人，忽然放足，必要造出一种"似小足非小足，似天足非天足"的怪像，这是革新时代所不能免的。我有一次与胡适之先生谈到《新青年》的销路近来颇旺，胡先生说道：这不过是"饥不择食"罢了。我想这句话决不是胡先生的谦辞，是一句狠老实的话。现在一般人都张开口撑着手，向着"提倡新思想"的人要饮食吃，但是"新人物"把外国的饼干啤酒极力运输进来，一般人还是面有饥色。这是甚么缘故？我想一定是饼干啤酒不可充饥的缘故！

我一年以来，做了许多不通的文章，说了许多无益的废话，真是后悔得狠！我现在极希望寻一个读书机会，至少还要研究学问十年，或者可以少说几句外行话，北京这个地方，我是不愿住的了。你们有好方法超度我么？我于日前回京，一切无恙，请你们放心，惟空气干燥得狠！

王光祈　八月廿五日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19年8月25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

对大学开女禁问题的意见[①]

我们这回讨论妇女问题的结果，几乎每篇文章都归根结底于教育，都主张应该从教育下手。譬如我们要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使妇女先有职业先有技能；要有职业技能，便非受过教育不可。又如家庭改组问题，亦为女子解放、社会改良最切要的事，但是新家庭的女子，若未受过相当教育，家庭幸福仍是不能圆满，不过是由大旧家庭改组为小旧家庭罢了。又如女子贞操问题，在国故党以为是天经地义，应该表扬，在《新青年》以为是毫不合理，应该攻击，这两种极端相反的论调，若是女子未受过相当教育，毫无辨别能力，则所说的贞操问题，直是国故党员的贞操问题、《新青年》记者的贞操问题，而非女子的贞操问题。又如解决婚姻问题，必先使男女有社交的机会，若要有真正纯洁的社交，又非男女均受相当教育不可。其他如女子参政问题等等，都应该从教育下手。

若要解决女子教育问题，仍须女子自身起来解决，不是男子所能代庖的。一则因为男子脑筋中大多数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决无余力顾及女子教育；二则因为男子怕女子受了教育，自己便专制不成了。所以我主张应该由有觉悟的女子，组织一个女子教育协进会，这个会的目的有四：

（一）普及女子国民教育；

（二）筹备大学预备学校，以便升入大学；

（三）要求大学开女禁；

（四）改革家庭教育。

有了以上四个目的，再计划进行方法。

（一）发行女子教育周刊、旬刊或半月刊——照《每周评论》的样式，每千份不过九元左右——专鼓吹上述四个目的，一方面可以引起社会同情，一方面可以使女子内部容易团结。消息既极灵通，大家的主张渐趋一致，可以立一个共同的目的，以便进行。

（二）以课余的时间随地筹办女子义务夜校，实行普及女子教育。

（三）组织女子教育讲演团于星期日或在公共场所讲演，或赴各家劝导，总之切莫

① 标题是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19年9月25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害羞，须知女子解放运动，非有热烈情感、坚强意志，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在大街小巷常常看见许多救世军的妇女，打起大锣大鼓，口讲指画，未必你们受过教育的女子，还比不上他们吗？

（四）有了上述三个方法，进行既久，表同情于女子教育运动的渐多，然后要求大学开女禁，如其不开，便给他一个示威运动。去年有四位女士要到北京大学读书，闻蔡校长答道：现在社会不许，无可奈何。咳！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快要破产的社会，非给他一个示威运动，根本改造不可！所以我希望现在的新女子没作“女政客”应作“革命祖母”。

我们既是认定女子教育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问题，所以特地请胡适之先生讨论这个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因为胡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说的话比较我们说的切实可行。承胡先生不弃，与我们写了几条方法，我们认为此系一个要求大学开女禁的一个着手方法，所以把这篇文章登在本月刊第一篇，表示我们对于女子教育问题，极为注重的意思，引起社会上的同情，并不是请胡先生替我们月刊著一篇文章，加增一点名誉，请读者幸勿误会。又此后凡有关于女子教育的著作及消息，本月刊极愿代为发表。

答 M. R. 女士[①]

M. R. 先生：

你寄与我们的信，我早已拜读了。你的信是寄与我们全体会员的，在理应该用全体会员名义或是记者名义来答复你。但是我们会员对于你所提出的问题，意见是不一致的，所以我用个人的名义先行答复。

我在未答复之先，且把我对于结婚及家庭的意见，略述一下。

（一）结婚是两性既有恋爱后所发生或种合意的事实。两性既有恋爱后，必发生种种合意的事实，如相约旅行、相约读书，皆是。结婚即为诸种合意事实中的一种，以恋爱为根本要义，以彼此合意为前提。故结婚的事实发生与否，只问两性间的恋爱怎么样？对于结婚的事实是否彼此合意？决不许有第三人批评或参加。若是任意批评他人两性间的事实，便是侮辱他人的人格；若是未得本人同意，任意参加他人两性间的事实，

① 本文写于 1919 年 10 月 5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便是侵犯他人的自由。

（二）结婚有形式的结婚与实质的结婚两种：形式的结婚，如订婚书、行结婚礼、有媒人、有证婚人（外国用牧师证婚），皆是；实质的结婚，即两性间只有夫妻的事实（夫妻二字，我不愿用，因无相当名词，只好权且借用），而无一切形式的手续。我是主张实质的结婚，而极端反对形式的结婚，其理由如下：

（甲）两性间的结婚，既以恋爱及合意为前提，何必再订婚书？何必再行婚礼？订婚书行婚礼的意思，便是彼此不相信赖，故订一纸婚约，以为将来的束缚，或在公共场所行结婚礼，以便昭示于众，永远受此束缚。推其用意，无非是防制将来两性间的爱情变迁。世界上岂有如此互相疑忌而可以称为恋爱之理？咳！恋爱恋爱，可怜的恋爱，你早已破产了！

（乙）且形式的结婚，系防制将来爱情的变迁，而爱情之变迁与否，事实上决非一纸婚约所能转移。于是世界上竟有许多不恋爱的夫妻，勉强生活于“形式的夫妻”之下，互相怨恨，有如路人，与吾人所谓结婚以恋爱为前提者，适得其反。

（丙）吾上文所述两性间的恋爱，决不许有第三人随意参加。若结婚有证婚人媒人之类，便是表示两性间互相信赖的程度，尚不如信赖第三人之深，互相信赖的程度既如此浅薄，而乃轻言结婚，岂不可笑？

（三）我对于结婚的意见既如上述。我对于家庭观念亦极薄弱，因为我认为无论男女，都系社会的分子。换一句说，新社会之组成，以个人为单位，不以家庭为单位。两性间虽有结婚的事实，然此仅系两性间的一种事实，对于社会的义务权利，仍是各人管各人的。譬有甲乙二人，系极相知的朋友，然此种友谊，是甲乙间的一种事实，对于社会上的权利义务，仍是甲负甲的责任，乙负乙的责任，因为甲乙都系社会上的一分子。

我以为愈进化的人类，他们生活的内容愈扩大、愈丰富、愈优美。这种丰富优美的生活，决非以家庭为限所能获得的。故我们应该作一个为社会谋幸福的人，不应该缩小范围作家庭里的一个人。

我对于结婚及家庭的态度，与先生的意见微有不同，即与本月刊第二期各同志的主张，亦有相异的地方，我如今且把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答复：

（一）恋爱同结婚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呢？

（答）结婚是恋爱以后诸种“合意的事实”中之一种，有两性间极相恋爱而始终无结婚事实的，故结婚与恋爱是两件事。

（二）两性间一有了极端的恋爱，就必定免不了要结婚么？

（答）只视两性间合意与否。两性间既有了极端恋爱，即生死问题（如情死之类）亦可以彼此合意解决之，岂独结婚？故结婚一事，若两性间认为系一种龌龊事实，虽有

了极端的恋爱，亦不必结婚；若认为系一种神圣事实，既有恋爱后便可由彼此合意而发生结婚事实，决不许第三人之批评及干与。

（三）夫妇的相恋爱真能同亲友间的爱情一样的纯洁同高尚么？既是一样，又何必要结婚？

（答）纯洁高尚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我以为纯洁的恋爱，系指两性间的爱情中不含有“非恋爱”的事实而言。如视夫或妻为一种玩物，不尊重相手方的人格，便是“非恋爱”。高尚的恋爱，系指两性间的爱情中，不含有卑鄙的事实而言。如两性恋爱系出于虚荣心的冲动，所谓妻因夫荣、夫因妻贵，便是一种卑鄙的思想。结婚是一种生理上的要求，并未含有“非恋爱”与卑鄙的事实，故不能认为非纯洁非高尚。总之，我们青年男女有独身主义的洁癖者，只求自己的言行一致，万不可以个人的主观，遂批评世界上一切结婚，都是非纯洁非高尚。

（四）结婚这件事究竟是公益，还是私利？是不是能救现在妇女的急务呢？现在的妇女所受的苦痛专为没有合意婚的原故？还是受了别些魔力的诱惑同压迫，使他们彼此分出那有为的精神同意志来，完全消磨在那私团体里，竟弄到一个国害了这么“半身不遂”的病？

（答）我所主张实质的结婚与家庭系两件事。家庭系一种私利团体，对于公益常有妨碍。实质的结婚，系两性间合意的一种事实，对于公益毫无妨碍。若形式的结婚既将夫妇名分永远固定，便与家庭组织有联带关系，我既是反对家庭，故亦反对形式的结婚。

现在女子所受的痛苦极多。而婚姻不自由，亦为痛苦中极重要之一种，极应首先革命。

若要征服一切诱惑或压迫女子的魔力，自然是极应注重教育，使女子的智识日增，有彻底的觉悟，有极强的抵抗力。故本月刊“妇女号”极注意女子教育问题。至于筹设女子半工半读学堂，应该由女子出来提倡主持，只要是我们能力所及，没有不援助的。

总之，我与先生意思有完全相同的（如恋爱不是夫妇间的专利品，新家庭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皆是），有不敢苟同的（如认一切结婚事实为非纯洁）。我赞成实质的结婚，而反对形式的结婚。有极愿帮助先生竭力提倡的（如女子教育），有与先生同为太息的（如信中所举旧家庭的各种妇女的生活），尚望先生随时指教，努力前进！

又前次若愚致冰先生信中有“套上文明假面孔的新女子一流人物”一语，系引用冰先生原文，若愚并不敢骂人，合并声明。现代女子受黑暗势力的压迫已到极点了！凡有觉悟的女子切不可再藏名隐姓、含羞怕辱，不敢出来与黑暗势力奋斗！将来女子前途的光明，全赖先生们不易屈服的精神与意志！

王光祈　十月五日

答 A. Y. G. 女士[①]

A. R. G. 先生：

你的信我们已经奉读了，分别答复如下：

（一）生育问题。生育责任由女子单独担负，男子不能分劳，这是生理上的限制，无可奈何。但是生育这件事不是女子的绝对义务。因为义务是权利的对待名词，譬如我们受了社会上的劳力供给，我们便应该对于社会，尽相当劳力，以为报酬。现在社会上对于男女的供给，既是相等，则男女对于社会应尽的义务，亦是相等。女子并未享受何等特别权利，为什么要尽特别的生育义务？若以中国社会而论，男子有种种权利，如参政、教育、多妻、社交之类，而女子无之，故中国女子更不应该担负特别的生育义务。况且生育一事往往危及女子生命，世界上岂有以危及他人生命之事，而认为系他人的绝对义务之理？

因为女子怀胎之时，不能努力从事他种工作，男子遂利用这种弱点，压迫女子。女子因生计上的艰难，便从此屈服于男子，男子遂视女子为育儿机器！为娱乐玩具！出其偷盗所得的金钱，买了若干穷而无告的姬妾，男子诚善于取乐！可怜误以生育为义务的女子，遂堕入惨无人道的十八层地狱！若要解决男女平等问题，须先打破“生育为女子义务”的观念。

我的朋友某君主张，在近二三十年内应该有一般抱“独身主义”的青年男女。他以为现刻中国正在“非常时代”，有许多“非常事业”要待青年男女去做的，所以没要因家庭生育等等问题耽误许多光阴。而且现在正是过渡时代，如得不着合意的婚姻，便应该暂时或永远的抱“独身主义”。他又主张已婚男女若是自己觉着无教育子女的能力，便应该实行“减育主义”。

某君的主张，有一部分我狠赞成。因为他的主张确是可以补救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但是我与某君的意见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承认独身主义与生育问题、家庭问题有什么密切关系。我以为两性间因恋爱而有夫妻的事实，并不必发生组织家庭问题，彼此仍可以继续保持未婚以前各自在社会上原有的状态——即是没有家庭的状态。若生育

---

① 本文写于 1919 年 11 月 23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问题，亦可由女子自由解决，或实行“减育主义”，或实行“不育主义”，均可听女子自便。在现刻医术发达，减育与不育，均可以由人力办到。

所以我赞成某君的“减育主义”，而不赞成“独身主义”。因为两性相爱本出于天然，因相爱而有夫妻事实，亦是天然的趋势，我们对于家庭束缚、生育痛苦，均有法使之减少或消灭，又何必坚持“独身主义”，违背天然呢?

（二）恋爱问题。两性发生恋爱的原因，或由于彼此性情、丰采、学问、人格、志趣等等，互相了解，互相敬慕。但是恋爱成熟以后，彼此的恋爱便超出性情、丰采、学问、人格、志趣以上。换一句话说，两性当初发生恋爱的原因，至是虽已完全丧失，而恋爱之情如故。譬如两性初发生恋爱时，彼此均丰采动人，直到老态龙钟，犹是恋爱如故。所以我常说恋爱二字是一个极神秘的东西，我又确信世界上必有这种恋爱事实，不过是狠少遇见罢了。

来信中所说的色衰见弃，那还是就男女不平等的时候而言，若是男女平等以后，女子对于男子又何尝不可色衰见弃呢?

故现在青年男女，不要断定世界上没要真正恋爱事实，只是希望大家当男女交际的时候，不要轻易认为恋爱罢了。

（三）工读问题。现在有许多女子受不了黑暗家庭的压迫，设法逃出家庭，来到社会里头，但是社会里的黑暗阴险，更胜过家庭百倍。因此流于自杀或流于堕落的，不知有若干人。而且逃出家庭后，因为生活不能独立，所感的痛苦较之家庭痛苦更加十倍。故现在受家庭虐待的女子，宁肯忍气吞声或捐躯自杀，而不敢脱离家庭!

来信中主张设立女子工读学校，固然是一种解决女子脱离家庭以后的生活的方法。但是只希望别人把工读学校办好了，我们安安逸逸进去读书，这是靠不住的。凡是有觉悟的女子，对于自己的问题，应该自己解决，不要倚靠别人。我主张各位女同志组织一个女子互助社会，凡是受不了家庭压迫的，均可以到这个社里来服务。一方面可以顾全生计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万恶社会中自为风气，既不受家庭压迫亦不受社会欺诈。

社中服务的方法，最普通的有二种:

（一）作手工，如织袜、织手巾及其他小工艺等。

（二）贩卖物品及书报杂志。

社中服务的时间，大约每日六钟，便可支持生活，其余钟点作为读书或娱乐时间（娱乐如音乐、跳舞之类）。

读书的方法，或在学校作选科旁听生，或由社中公请一位教员教授各种技能及高深学术。现在智识界有觉悟的人渐渐多了，只要女同志有坚苦卓绝的精神，出来组织一切，我预料必有许多专门学者自愿作女同志的义务教师。

人生上寿，不过百年，与其忍气吞声于黑暗家庭之下，不如逃出黑暗势力范围，另谋独立生活。况劳动为人生天职，并非卑贱之事。假若女子互助社成立，还可以发行出版物，发挥我们的主张，岂不是一件狠好的事么？

我们人类生活，本是一个创造的生活，奋斗的生活，自己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好，立刻将他改造，又何必瞻前顾后！

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光祈

致太玄、幼椿、慕韩、调元[①]

太玄、幼椿、慕韩、调元诸兄足下：昨在赵世炎君处得读慕韩十月一日自马赛来书，知已安抵法境矣，慰甚。弟于十月二十五日偕陈宝锷君由京汉铁路南下，二十七日早七钟抵汉。即渡江到武昌中华大学，访会员恽代英君，接洽会务。并偕会员余家菊君往游黄鹤楼、抱冰堂诸胜。下午四钟又在该校讲演二钟，题为《动的训练》，讲演毕，即偕会员梁焕文君渡江复回汉口。是夜仍偕陈宝锷君买舟东下，次晨抵九江，偕陈君登岸游览甘棠湖，遥望庐山，令人神往。陈君将于次日由九江搭车归家，与弟作别。订他日欧洲相见之约，而去。盖陈君拟于下月偕楚僧兄赴欧留学，此行系绕道归家省亲也。陈君主张本会派员赴各省中校讲演，以传布本会之精神，沪宁各会员均赞成此议，惟主张稍缓举行。慕韩在京时亦曾有此意，不过预定在数年后始实行耳。弟与陈君别后，二十九日午间即抵南京，直赴四象桥与舜生、仲苏两兄相见，是夜即偕往高等师范与南京各会员晤面，讨论一切。关于《少年世界》[②] 编辑事务，南京会员承认担任。弟遂于次日由沪宁车赴沪，寓华盛顿里，与梦九、白华、时珍诸兄相见，更与七年不见之老朋友李劼人、胡少襄及新会员李哲生、何鲁之、沈君怡诸君相见，讨论会务，十分快活。次日即与亚东图书馆订立《少年世界》合同，所有条件与《少年中国》相同。亚东经理汪

---

① 本文写于1919年11月24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② 《少年世界》：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的会刊。1920年1月1日创刊，由分会会员轮流编辑，以作社会的实际调查，谋世界的根本改造为宗旨。《少年世界》月刊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为研究五四时期青年思想的重要资料，共出12期，后又出了一期增刊。《少年世界》刊物先后发表了李大钊、黄日葵、罗学瓒、王若飞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留欧学生勤工俭学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邹君人极和霭精明，对于本会精神，十分了解。据汪经理云，不但《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伊愿包办，即本会所出丛书，伊亦愿包办。关于丛书一层，日前田寿昌君过沪时，与宗白华君商定，拟出一种《社会问题研究》的小册子，即数人对于一个问题方面的研究，研究所得，合印成册，亦是丛书之一种。不知诸兄以为何如？在沪勾留四日，即回南京，又在高等师范聚会，讨论《少年世界》编辑事务分配的方法。弟二十九日过南京时，南京分会尚未成立，此次回宁，分会已经成立，又有一番新气象也。次早偕会员王德熙君往晤南京女界同志十余人，征求对于妇女问题之意见，又偕王君往游鸡鸣寺、胭脂井台、城北极阁诸名胜（暮愁湖[1]、清凉山今春曾游，故此次未往）。下午复偕舜生往游雨花台及秦淮河诸处，舜生指点古迹，何处是朱雀桥？何处是乌衣巷？旧院？市隐园（即钱谦益、柳如是共隐处）？十分详尽，颇引起许多感想。是夜月光如画，复偕舜生在秦淮河复成桥上赏月，遥望钟山，万籁俱宿，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六日搭津浦车北上，七日抵济南，与会员郑尚君、廉君相见。是日蒙山东教育界省议会新友数人招待，在大明湖中消磨了半日光阴，弟今春曾游大明湖一次，此回再游，倍增兴趣。八日由津浦车赴津，在津与会员章志、葛沣、陈道衡诸君相见。九日回京，与北京会员筹备月刊稿子及讲演会诸事。忙甚。稍暇再与诸兄作长时间之笔谈也。即颂著祺。

弟王光祈顿首
十一月二十四日自北京寄

团体生活[2]

我今天所讲演的题目是《团体生活》。

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便是团体生活。

若没有团体生活的训练，无论什么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都是不能应用。所以我极愿与诸君讨论这个“团体生活”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系一切主义的先决问题。

---

① 即莫愁潮，位于南京城西水西门外。

② 原标题下有一行文字：“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北京少年学会的演说。”本文发表于 1919 年 12 月 5 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什么叫做“团体生活”？便是：

本互助的精神，为相当的组织，以适应环境。

团体生活由历史上的观察，可以分作三个时代：

（一）人类与禽兽奋斗时代的团体生活。

（二）人与人相争时代的团体生活。

（三）人类与自然界奋斗时代的团体生活。

上古时候，我们人类与禽兽杂居。那时候人类繁殖不盛，器械也不精良，人的腕力又不如兽的腕力之大，所以在当时的地球上，完全是禽兽的势力范围，我们人类常常处于劣败地位。史书上所说的“洪水猛兽”，就是指着那个时代。

当时人类既受禽兽压迫，个人腕力既不足以自卫，乃用智力以应付当时的环境，本互助的精神，为相当的组织，便产生一种“部落”的团体。

部落是一种团体生活。不过是这种团体，是应付当时禽兽压迫的环境所产生的，他的组织非常简单。到后来人类的智识逐渐进步，器械逐渐精良，组织亦逐渐完密，那时候的禽兽，便被人征服逃于山泽。此时的地球完全在我们人类势力范围之下了。

人类的智识既增，欲望亦随之而加，那种部落的简单组织，不足以餍其欲望。而且他们共同的敌人——禽兽——已经被他们降伏，把当初所以结合的目的，已经丧失。各部落间因自私的缘故，遂不免常相争战，成为人与人相争的状态，逐渐发达形成一个国家的组织。

国家亦是一种团体生活，不过是与部落时代大大不同了。部落时代是人类与禽兽奋斗，国家时代便是人与人相争。拿进化的眼光来观察，由部落进而为国家，不必是进化。因为国家时代的人类已经没有互助的精神了。

到了国家时代，在国际间便有国与国的战争，在国内便有阶级的战争，有党派的战争。总而言之，是人与人相争。

这种人与人相争的团体生活——如国家的组织、各阶级的组织、党派的组织——我们既认为不是进步的现象，遂产出第三种团体生活，便是：

人类与自然界奋斗的团体生活。

这种团体生活的组织，完全是本互助的精神，谋人类的幸福，把从前人与人相争的战斗力，转向自然界奋斗。这种团体生活可以分作两类：

（一）科学的团体。

（二）生产的团体。

科学的团体，就是结合同志研究自然界现象。在积极方面，就是怎么样利用自然界的事物，增加我们人类的幸福？譬如电气，我们怎么样利用他，与我们打电报走电车？

在消极方面，就是怎么样可以使自然界中一切危险现象减灭，谋人类的安宁？譬如水患疫疾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总之，科学的团体，便是从科学上增进我们的幸福，减少我们的痛苦。现在国中有一个中国科学社便是这种组织，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进化的团体生活。

生产的团体，就是结合同志从事劳动，使自然界中生产额增加，供人类的利用。譬如现在各报上所提倡的“新村”组织，便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团体生活。现在中国人不习劳动不知生产，社会上只有共同娱乐的团体，如什么俱乐部之类，而没有共同劳动、共同生产的团体，所以社会生计日益艰难。因为一个人所占的消费额太大了，便影响到他人正当的生活，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为社会上生产额本来是有限的，你一个人太消费多了，当然别人是要受影响的。

照这样看来，现在我们青年的正当团体生活，只有两个：

（一）组织科学团体，用我们脑力，谋科学上之发明。

（二）组织生产团体，用我们体力，谋生产额之增加。

这两种团体，都是在自然界中讨生活的，亦是我主张的。我理想的第三个时代：

人类与自然界奋斗的团体生活。

以上不过是说明“什么叫做团体生活”，如今再说明“团体生活与各种主义之关系”及“团体生活与中学生之关系”。

国家是一种团体生活。国家主义便是主张缩小个人自由，从事国家生活，造成一个最强固的团体——国家。在欧、美、日本国家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人民往往自愿牺牲身命财产，谋国家的兴盛，所谓“爱国运动”。这种爱国观念有无错误，是另自一个问题。我们若专就这一种牺牲个人自由，图谋团体发达的心理而论，亦是一桩狠好的事，非真知道团体生活之价值的人，必不出此。试问我们中国历来的爱国运动，究竟有几人真正牺牲？每到紧要关头，便虑及个人的利害问题，有几人真正是彻底的爱国？不过是凑热闹罢了！

为什么中国人不爱国？我只有唯一的答案，便是中国人没有经过团体生活之训练，不知道团体之可贵。外国人自幼在学校内学校外便有种种的团体训练，所以他们才知道团体是应该爱的。这种爱团体的心理发达，便成为爱国运动。故我们若要提倡国家主义，还须先从团体训练入手。

社会主义亦是一种团体生活。社会主义的根本观念，便是反对私有财产，要把个人的私有财产，都要收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种主义，第一要打破个人垄断的观念，第二要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我请问这种观念和习惯，是自私自利的人所能办到吗？是不了解团体互助的人所能实行吗？故我们若要社会主义实行，还须先从团体

训练做起。

安那其主义亦是一种团体生活。安那其主义的根本观念，便是反对强权的组织，而主张自由的组织。基于强权的组织，便含有压制性质；基于自由的组织，便带有互助精神——近来有许多人说安那其主义是一种主张无组织的学说，这是完全错误。安那其主义是主张有组织的，不过组织的方法与现在的组织不同罢了——假如我们没有团体生活的训练，只知自私自利，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便成为“各取所需，不尽所能”，那还成一个世界吗？所以要实行安那其主义，更非先有极纯熟的团体训练不可。

照此看来，无论什么主义之下，若是没有团体生活的训练，都是不成功的。

现在的中学生与团体生活，尤关紧要。因为中学生大概皆倚赖家庭生活，依赖父兄的帮助。我们既是一个人，为什么不能独立生活？必得倚赖家庭作寄生虫？从前俄国青年以为继承父兄财产、倚赖家庭生活，是一桩狠可耻的事，所以他们都脱离家庭，到田野间与农夫工人为伍，尽他们为人的天职。

现在我们知道倚赖家庭是不对的了。但是我们脱离家庭首先感困难的，便是生活问题。

我们要解决生活问题，必先有团体的组织。这个团体，便是我们生活的保障。

譬如我们脱离家庭以后，便邀约几个同志，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团员，或从事手工工作，或从事贩卖商品及书报，每日所得之工资，即作为生活费用。一面读书，一面作工，独立生活，不受一切束缚，这是何等快活！何等有趣！

若是没有团体的组织，让我们个人独自生活，独自奋斗，是不容易支持的。所以现在中学生要养成独立自由的人格，非先有团体的组织不可。

总结我今日所讲演的团体生活，是：

人类与自然界奋斗的团体生活——如科学团体、生产团体——而且是一切主义的先决问题，对于欲谋独立生活的中学生，尤有密切关系。

至于组织团体的方法，诸君若有暇时，我们可以通信研究。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①]

我们学会成立以来，颇引起社会上注意，常常有许多青年同志，向我详询会中一切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12月1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情形，我皆诚恳答复。因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可与天下后世的人共见的，无所用其秘密。我这篇文章，可以算作一篇最诚实的“答客问”。

我在学会中算是一位学识最浅的人，不能将我们学会所有的精神、真正的精神，用笔达出万一，这是我对于会内会外同志极抱歉的事。我这篇文章虽是我个人对于学会的观察，但其中参杂了许多会员的意见，亦可以代表本会一部分的精神。

（甲）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

有狠多的朋友，对于少年中国学会发生三个疑问：

（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的态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极融洽，且其中彷佛有一种共同趋向，是大家努力前进的标准，这种标准，究竟是什么？

（二）少年中国学会的经费，宣言不在会外筹募，而会员中又无资本家可以担任一切用费，何以会务进行，仍极活泼？

（三）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既无会长理事名目，又不似各种团体有所谓首领党魁，指挥党员为种种的活动，何以会务进行，仍极有统系，极有条理？

以上三个疑问是我的朋友常常向我提出的，因为这三个疑问他们自己不能解答，所以他们便把我们学会视为一种狠神秘的团体。其实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狠简单的团体，只要详细观察一番，以上三个疑问便可迎刃而解。而且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即藏在这三个疑问里头，我今天解答这三个疑问，便是叙述我们学会的三种精神。

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

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国民的观察有两种见解：第一派的见解，太把中国人轻视了。他说：中国人不配讲什么主义，应该在“开明专制”、“贤人政治”之下活动，受一般贤人政府的指挥。若是随便模仿外国的民主主义、平民政治，必要闹得昏天黑地，毫无进步。这一派的思想势力极大，恐怕上自中央政府，下至乡曲腐儒，都脱不了这种思想的势力范围。他们的错误，是太把中国人轻视了，错认中国人的程度，永远无进步的希望，应该永远受一般官僚、军阀、政客的支配。第二派的见解又太把中国人高视了，彷

佛无论什么主义，中国人皆能运用自如。并且主义便是一种教育，只要我们把他介绍进来，一般人自然会运用起来。这派的错误，是太把中国人高视了，错认中国人的程度，已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

我们学会的观察，便与上述两派不同，一方面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无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一方面又承认将来的中国人必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现刻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用一种什么方法，怎么样去训练他，使他将来对于各种主义皆能运用自如。换一句话，就是怎么样去做这第一步预备工夫。

各种主义有各种主义的专门训练，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有财产的观念，安那其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但是各种主义亦有共同必需的训练，如团体生活、劳动习惯等等。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训练。

譬如国家的组织，是一种团体生活；社会主义的组织，是一种进化的团体生活；安那其主义的组织，是一种更进化的团体生活。照现在中国情形而论，不但是进化的或更进化的团体生活，中国人办不了；就是国家主义之下，所必需的团体训练，中国人又何尝经过呢？劳动习惯亦是如此。这种只消费不生产的中国人，恐超过中国人口全数之半，不但是社会主义家所谓人人劳动的理想，不能实现；就是国家主义之下，这种只吃不做的人多了，这种国家亦是要破产的。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以为资本家将劳动者生产的结果掠夺去了，其实中国劳动者生产的结果，除其中一部分为资本家掠夺外，而其余的大部分恐皆被非资本家的无业游民夺去了，这岂不是一个怪现象吗？所以提倡团体生活劳动习惯，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狠感必要的，在中国尤感必要。

我再痛快说一句，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皆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现在的中国人连作“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若是要他从事“人类”的组织，当然是不行的了。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要想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

有人说主义（或制度）便是一种教育，只要一般人先知道主义的内容，慢慢的遂养成习惯。换一句话，就是先有主义后有习惯。我的意思则与此恰恰相反，须先有一种习惯而且生活上有要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给他一个主义，始能运用自如。我们往往看见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譬如民主国家、代议政治，在近世政治组织中比较的稍有进步的了，而且欧美人行之，确曾收效。但是这种制度一到中国来，便不成功了，所谓代议政治，只成就安福鱼行一桩买卖。又如地方分权，较之中央集权是一种较善的制度，但是结果只造成许多督军割据的形势。现在我请

问，为什么代议政治只成就安福鱼行一桩买卖？为什么地方分权只成就许多督军割据的形势？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一般人民自始至终便不知道，代议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素来毫未经过选举制度的训练。地方分权所以造成割据形势的缘故，亦是因为人民素无地方自治的训练，凡事皆任少数人把持。可见专提倡一种主义（或制度），而不先行设法训练，使一般人养成习惯，自己感觉生活上有要求某种主义的必要，然后自动的起来要求，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我在此处，要郑重声明一句，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同时设法训练。譬如提倡代议政治，一方面从事理论上鼓吹，一方面须组织各种团体从事选举制度的训练。又如提倡地方分权，一方面鼓吹理论，一方面须将地方公益事务选出几种，由人民自己试行处理。又如提倡安那其主义，一方面鼓吹理论，一方面须组织新村先行训练。辛亥革命以前，运动革命的人，只知道提倡三民主义，而对于民主国家的国民所需要的各种习惯，皆未经训练。现在共和招牌已经挂了八年了，但是国民的思想习惯有几分几厘的“共和色彩”呢？我们现在提倡主义的人，不要专想把招牌挂出，务要名实相符，方不辜负一场“流血的革命”。

我前面所说的训练，可以分作破坏的与建设的两种：（一）破坏的训练，就是养成一般人“嫉恶如仇”的心理，对于腐败社会、黑暗家庭完全立于宣战地位，这种训练，现在一般革新家都是狠知道的。（二）建设的训练，就是不但是使一般人有破坏的心理，而且使一般人有建设的兴味。人人脑中皆有一个新社会极望实现，并且实现这个新社会所有的准备，日日都在训练中。将来新社会一旦实现了，因为一般人早已养成新社会习惯的缘故，当然对于新社会的设施，必能运用自如。

若是偏重破坏的训练，必使人只见黑暗方面，而不见光明方面。既与黑暗方面宣战而不胜利，最易使人走到自杀的路上去，因为他自始至终便不知道，还有光明方面。

以上所说的训练过于抽象，如今再举几个具体训练的实例出来。譬如中国人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我们学会便提倡组织种种团体。又如中国智识阶级大多数不习劳动生活，劳动阶级又无机会得受教育。故我们提倡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又如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天真烂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又如我们觉得中国旧生活不好，便提倡小组织新生活。又如我们觉得中国人静的生活毛病狠大，便提倡动的生活，主张奋斗。此外尚有种种训练，都是养成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并且是凡向光明方面走的人，必不可不如此的。

总之，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

坚决、非常彻底。

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

把这第一段路程走完了——即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假设我们要从北京到长沙、成都、南昌、上海各处，必由京汉铁路南下，我们要想达到的目的地，虽各自不同，但是京汉铁路这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同车而行的。并且京汉铁路是我们长途中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将来走到汉口以后，第一段路程走完了，或者我们有一个新环境，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新觉悟，那时候再商量这第二段路程，应该怎么样走?

但是我终觉得这第一段的京汉路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走完，这第一段路程真正长得狠呀！我们赶快努力走！

若不赶快努力走，不但是长沙、成都等处走不到，便是汉口亦恐无达到的日期。

读者将我前面的文章看完了，便知道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虽不一致，而其中却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努力前进。而这种共同的趋向，便是本学会的第一种精神。

以上系解答会外诸君对于本会的第一个疑问，如今再解答第二个疑问经费问题了。

本会初成立时即决定不用会外一钱，所有用费皆由会员自由捐助。故本会的经费既不似其他学会，收受会外捐款，亦不似其他团体，有所凭借。所有历来发行月刊及各种用款，皆系会员省衣节食凑集出来的，不愿与其他一切党系，生一丝一毫关系。我们会员都是纯洁的青年，对于各种党系，本无宿怨，而且只要他们诚心改革社会，我们未有不表热烈同情的。以中国之大，社会之黑暗，决非少数人或二三团体所能收改革之效的，这种道理我们未尝不知。无奈一切党系过去的历史，纷陈于吾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敢与他们携手，我们愿永远保持其纯洁的精神，为继续不断的奋斗。

因为我们经费是会员省衣节食得来的，所以我们会中办事人对于用款，非常审慎，一切杂务，从不假手于人。凡认识我们会员的，必知道我们有一种坚苦卓绝的精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经费虽少，而收效却大，这便是我们学会的第二种精神。

以上系解答会外同志对于本会的第二个疑问，如今再解答第三个疑问组织问题了。

讨论关系本学会的组织问题，亦是一件狠有兴味的事。因为他种团体皆注重首领，注重中心人物，我们学会则无所谓首领，无所谓中心人物，个个会员都是首领，个个会员都是中心人物。我们学会极注重会员自动，个个会员的精神总和起来，便是本学会的精神，本学会的组织，完全是 Democracy 的精神。会中只设了几个办事人，不愿多立会长、理事等等名目，装饰门面。其中以南京分会的组织更为有趣，他们的职员，都是

由各会员自己自由选择担任，不经选举，并未发现不胜任的弊病，亦未发现有躲懒的情形，所谓“各尽所能”的原则，竟在南京实现，亦是一桩狠可喜的事。

又本会最注重分会，北京总会不过是各分会一种联络机关，所有会务皆由各分会自由发展。北京总会对于各分会，不愿多加束缚。我觉得这种组织——最小团体的最大联合——不但是一个学会应该如此，就是国家世界的组织，亦应该如此，这便是本会的第三种精神。

会外诸君对于本会的第三个疑问，亦算解答明白了。

以上所说的三种精神，是本会的特殊精神，若不详加考察，是不知道的。此外如研究学问，互相规勉等等，皆是本会的普通精神，狠容易看出来的，不必再说。

（乙）少年中国学会进行计划

我们会员不仅是有理想目的，而且是要寻着下手方法，关于本会的进行，可以分作两部分：

（一）关于人的方面；

（二）关于事的方面。

大凡做一件事，关于人的问题极为重要，得人则万事皆可推行，不得人则一事不能办理，故本会先从人的方面下手。

现代学者把世界上人类分作三种阶级：（1）智识阶级；（2）劳动阶级；（3）资产阶级。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无阶级的，智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但是在现代社会制度之下，这三种阶级还是有的，我们学会的主张既不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当然要从现代社会下手改造。我们以为应该要从这三种阶级里寻出有觉悟的人，使他们三个阶级的人，互相接近，以实现我们的理想社会。

智识阶级中我们认为现在正受教育的青年学生，最有希望。我们以为现在青年应该加入劳动阶级运动——或是农村或是工厂——近来表同情于我们的青年渐渐多了，大家都有一个觉悟，就是我们青年学生既得有受教育的相当机会，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传授一点与我们未有机会得受相当教育的劳动同胞，这是我们绝对的义务。工厂农村皆须有我们青年的足迹，亦就是我们改革社会的起点。

劳动阶级中我们认为现在留法的华工，最有希望。一则因为他们受环境的影响，比较的稍有觉悟，若能将他们的力量用之于正，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活动，将来对于中国一定是贡献狠多；二则因为他们受了环境的影响，若不用之于正，将来回国亦要惹出许多

祸事。所以我们在巴黎的会员，对于此事非常注意，已设法与他们接近，尽我们的力量，启发他们的思想。

除了华工之外，“新农村”的运动亦是我们狠注意的。我们中国的劳动者当以农人为最多，亦以农人为最纯洁，天真烂漫的农夫是我们青年唯一的良友，所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有一部分人自愿到农村活动。我们加入劳动阶级，有一件事要声明的，我们加入劳动阶级，并不是利用劳动者，作我们的傀儡，如现在的政党政客加入劳动运动一样。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我们现在虽是学生，但是学生名词不能永久存在，我们将来出学校后，从事工作便是劳动者了。

资产阶级中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便是华侨。因为华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的创造力、开辟力都是令人极佩服的。而且他们的公德心，还在国内同胞之上。年来政治革命，华侨之力极多。但是现刻欧、美、日本在南洋的势力日渐膨胀，华侨为苛政所困，处处失败，购阅书报均不自由。国内的大人先生们除到南洋骗钱外，对于华侨境遇，毫不注意。我们学会既认定华侨为中华民族有创造力、有开辟力的优秀分子，不忍见他们失败，所以有一部分会员自愿加入华侨运动，但是我们的方法，便与从前政党对于南洋华侨的办法不同了。我们不愿华侨再把他们血汗所赚来的金钱从事爱国运动，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振兴教育、发展实业，为一种有组织的有思想的运动，与英、美、日本势力对抗，自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从前政党是鼓吹华侨爱国，我们是希望华侨自己爱自己。李石曾先生有世界华侨联合问题的计划，我们学会计划的范围，不如李先生之大，只先着手于华侨青年联合罢了。

将来学生、华工、华侨三派人的联合若能成功，改造中国的机会便到了。

以上所说是关于人的方面，如今再说关于事的方面。

我们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换一句话说，本学会是主张社会改革的团体，从教育实业下手。因为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智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只要教育实业办好，我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皆可达到极圆满的地位。所以我们会员平居则研究真实学术，若建树事业，则不外教育实业两途，这便是我们会员活动的方向。

前面所说本学会进行计划，不过是将我们进行的路线说出，至于怎么样做法，我们另有详细计划，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述尽的。究竟我们计划能够实现几分，此时不敢断定，不过是我们努力向这条路走去，不断的向前进行罢了。会员左学训君云：假设我们会员都已牺牲死尽，只剩下一人，亦是如此做去。会员周无君赴法时向我说道：我此去若失败，君等幸勿气馁而不前进。总之，我们会员奋斗，是有统系的，是继续不断的，只知往前进行，成败均所不问。

（丙）少年中国学会与中国青年思潮

少年中国学会虽是少数青年的结合，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却是中国大多数青年思潮的结晶，不过借我们会员的口把他说出来罢了。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中国青年的精神表现出来，没有中国青年的思潮，便没有少年中国学会。

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我们民族有我们民族博大的精神，如今堕落了，被人侵略，被人轻视，成为世界上一个弱小国家、劣等民族！

这种堕落的责任，当然应该由过去人物担负；恢复我们民族精神的责任，当然应该由我们青年担任。

无论世界如何进化，人类如何平等，我们自己若不向上，若不努力，这个地球上终是没有我们立足的地位。

青年青年！万事全靠自己，世界上没有便宜可占。

青年青年！我们是中国的青年，我们对于中国这个地方，负有改造的完全责任。

青年青年！我们应该恢复过去的民族精神，创造未来的少年世界。

中国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旧社会的改革者。有了中国青年的思潮，然后才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产生。

著者在本月刊第二期曾有一篇《少年中国之创造》，与此篇大意相同，可以参考。

著者此文纯系用个人眼光观察本会的精神，以为本会的态度确系如此一种趋势。究竟著者观察错误与否？还望会内同志指教。

或者会内同志以为本会趋势虽系如此，但是这种趋势是不对的，不应该如此的。亦请诸同志畅发伟论，务使本会态度于最短时期中，有一个更确切更明了的表示。

工读互助团[①]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现在北京方面已成立了，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狠可喜的现象。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自从这个团体发生以后，各处同志来函探询讨论的约有数百封，我因为事忙不能一一答复，今天我做这篇文章，便是一封敬答各同志的“复信”。

这篇文章分为四段：（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

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去年二月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君讨论一次。去年夏间又有一封长信论及“小组织”事，颇引起社会上研究“新生活”的兴趣。但是我们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只说不做”的习性，前回讨论“小组织”问题，亦犯了这个毛病。我对于“小组织”不能使他在最短时期中实现，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这回讨论工读互助团问题，我又怕犯这种“只说不

---

① 工读互助团：“五四”运动时期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社会团体之一。1919年底，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王光祈组织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进而实现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不久，上海、南京、天津、武昌、广州、扬州等地也开始成立性质相同的团体。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1920年前后轰动一时，但这个社团终因经济基础的薄弱和思想上的分歧，狠快宣告破产。1920年3月，存在仅三个多月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告解散，其他地方的“工读互助团”也很快陆续自动解散。

本文发表于1920年1月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

做”的毛病，所以我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以后，立即奔走筹划，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有了头绪；不到一个月，居然组织成功。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这是我狠感谢的！

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后来我草拟工读互助团的简章，大半根据于《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兹先将此文抄录于后：

城市中的新生活

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君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村间的新生活。今天我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

昨日我著一篇改造旧家庭的方法，主张组织一种“女子互助社”。今天我所提出的就是把“女子互助社”的范围扩张为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

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这是第一个理由。

现在青年男女大概皆倚赖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倚赖习惯，终身不能独立生活，为社会之蠹。若是有一个适当组织，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生活。这是第二个理由。

现在社会制度不良，平民生计日艰，虽有优秀青年，亦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若是有一个互助组织，便可自由读书。这是第三个理由。

我们大家的脑筋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这是第四个理由。

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这是第五个理由。

有了以上五种理由，我们便应该计划一种实行的方法。

（一）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团员，必要具备两种资格：

（一）作工；

（二）读书。

（二）生计方法暂时可以分出两种：

（一）手工，如织袜、织手巾、装订书籍类；

（二）贩卖，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

关于置备机械、租赁房屋的资本，我们愿意担任筹募。

（三）团员不限于男女，均在一处共同作工，惟寝室分作两处。

（四）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

（五）共同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共有之财产。

（六）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

（七）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皆由团体供给。惟所购之书籍报纸均系团体共有。

（八）团体中须置备陶情悦性之音乐数具，随时举行各种游戏，共同娱乐，或结队郊外旅行，强健身体。

（九）团员求学择校，完全听其自由，并可用团体名义请求各校特准旁听，减少学费。

（十）若因工作时间太多，不便在各校听讲，则由团体每日敦请有专门智识的学者教授二钟。

（十一）凡有团员一人之介绍，经本团体评议会认可，便得为团员。

（十二）凡自愿退出团体时，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会通过，得听其自由退出。

（十三）每日工作所得，皆须在册上注明，若有怠于工作情形，由评议会提出警告，若经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即令其退出团体。

（十四）本团评议会由团员全体组织之。

（十五）本团执行部由评议会中选出若干人组织之。

（十六）执行部办理会计庶务等事。

（十七）本团团员须随时佩带本团徽章。

（十八）团员有不道德之行为时，互有规勉之义务，若事情重大有妨团体名义，即由评议会令其出团。

以上数条是我随手写出来的，杂乱之弊在所不免。将来正式组织时，再作成有统系之规定。

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限制的，不能将各科皆办齐全，以应一般苦学生的需要。而且程度参差不齐，又不能开办若干班次。现在把生活与求学分成两事，较易办理。第十条特请教员教授，是一种补助方法。

这种组织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供给苦学生的学费，在供给的方

面，便是一种恩惠行为；在受供给的方面，便是倚赖他人生活。故不如这种团体，完全由自己奋斗。

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这种组织除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我狠愿意费些时间，专奔走此事。

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我们立刻就要做去。现在请求阅者诸君两事：

（一）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务请详示；

（二）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期见示。

通信处：北京东华门宗人府东巷东口内蓬庐王光祈

工读互助团的草案拟定以后，又到各处调查，编制预算，然后由发起人开了一个会议，将预定的开办费一千元，由各发起人签名自愿担任筹募若干，限本月月底缴齐。一面租房子，一面制家具，一面接洽团员，一面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诸事齐备，所募之款亦已逾额，又开了一次团员大会，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

（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

兹将该团简章、预算及募款启事抄录于后，便知道他的组织极其简便，容易举行。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

顾兆熊　李大钊　蔡元培　陈独秀　胡　适　周作人

陶履恭　程演生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陈溥贤　罗家伦　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

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

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　暂分九种。

（一）石印；

（二）素菜食堂；

（三）洗衣服；

（四）制浆糊；

（五）印信笺；

（六）贩买商品及书报；

（七）装订书报；

（八）制墨汁及蓝墨水；

（九）其他。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

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

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注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

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

本团因便利团员求学起见暂分为三组，共需费一千元。

第一组二十七人，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

第二组十九人，地点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浆糊、墨水等。

第三组若干人，地点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织）。

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

第一组开办费四百元（食堂与石印局系在两处）。

（一）开素菜食堂共需房费、设备费等一百元；

（二）石印机器及其附件一百五十元；

（三）石印局房费一百元；

（四）买家具五十元。

每月经常支出	每月经常收入
两处房金共五十元	食堂收入 一百元（除去资本）
伙食共七十元	
教育费共六十元	石印及装订收入一百二十元
衣服费共三十元	洗衣收入五十元
医药、书籍、邮票等共六十元	
共支出二百七十元	共收入二百七十元

工作分配方法：

（甲）食堂每日十人，其分配方法如下：

四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食堂招待、坐柜的工作；

二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上午七钟至十一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下午一钟至五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下午七钟以后之工作自由担任。

（乙）石印及装订每日十二人。

机器每日八人，每日十六小时分为四班工作，每班二人，每人四小时；

书写及装订四人。

（丙）洗衣每日五人。

收送衣服一人；

洗洒[①]衣服四人。

以上三项工作共占二十七人。

第二组开办费三百元。

（一）食堂设备及房费共二百元；

（二）购买制造小工艺的原料及工具一百元。

<table>
<tr><th>每月经常支出</th><th>每月经常收入</th></tr>
<tr><td>房金三十元</td><td rowspan="2">食堂收入一百元</td></tr>
<tr><td>伙食共六十元</td></tr>
<tr><td>教育费共四十元</td><td>洗衣收入五十元</td></tr>
<tr><td>衣服费共二十元</td><td>小工艺收入四十元</td></tr>
<tr><td>医药、书籍、邮票等共四十元</td><td rowspan="2">共收入一百九十元</td></tr>
<tr><td>共支出一百九十元</td></tr>
</table>

工作分配方法。

（甲）食堂每日十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乙）洗衣每日五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丙）制造小工艺四人。

第三组开办费三百元。

（一）房费一百元；

（二）购买工具及原料等二百元。

① 原文如此。

每月经常收支及工作分配方法，俟开办时再为精密计算及分配。

上列简章及预算中，须说明者，谨述如下：

（一）团员入团以后，须必工必读，二者不可缺一。至于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惟须考察其是否了解这种团体的精神。

（二）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至于工作有难易轻重之别，宜随时轮流交换工作，以均劳逸。

理由：譬如有甲乙二人，甲可以举重一百斤，乙可以举重五十斤，若甲故意只拿八十斤，其结果虽比乙多拿三十斤，但是我们心褒乙而贬甲，因为乙系尽其所能，而甲系不尽其所能。我们既主张互助，自应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即简章中所谓“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四小时”的规定，都应该取消，纯由团员本互助的精神，以尽其所能罢了。

工读互助团内的工作，关于精深技术的甚少，所以随时交换工作，尚不发生困难。

（三）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

（四）团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现在团体对于团员所供给的各种费用，尚略有限制。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五）现在工作种类，关于“生产的工作”尚少，将来应多添“生产的工作”。我最爱种菜，因为这种工作极有生机。

（六）事务员最好由团员轮流担任，任期不必太长。但是恐团员中有因性情关系，不善办理事务，反有害于团务进行，故一月选举一次。既可以比较的易得相当人员，又可以免把持的毛病。

（七）团员不分男女均在一处作工。惟按照现在情形而论，有许多女子不敢同男子一处作工，故特为女子专组织一组，其余各组仍是男女共同劳动。

（八）团中预算虽经几人调查始着手编制，但是其中仍必有多少错误。

（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

第一，不是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完全是“蹴尔而与之”的残羹冷炙。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虽是捐助得来，但是那些捐助的人，或是希望“理想社会”实现，故努力出资，

筹办一切；或是恐怕社会革命快来了，赶快把自己的钱贡献一点于工读互助团中，将来或者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因为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故就捐助的方面而言，决不是“蹴尔而与之”的慈善事业。而且团员中颇有自由捐款的，更可以证明决非慈善事业。若就提倡的人而言，专为接济几位苦学生，而不惜终日奔走以经营之，亦太值不得。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接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

第二，不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是在养成专门技术人材，为国效用。工读互助团是在养成一般劳动互助习惯，以便将来改革社会，他的目的不在养成专门技术。职业学校招生以学术为标准，工读互助团征求团员以思想道德为标准。

第三，不是《解放与改造》所介绍的、所提倡的合作。其不同之点有二：

（1）合作（Cooperation）承认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是每年有利息可分的。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是没有利息的，亦不是谁的股份。

（2）合作所得的余利，或按照股份给以利息，或依各个工人所得的工资的多少，或依各个买客所出的钱的多少，记在他们名下，当做他们入社的股本（参观《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八号《近代的合作运动》）。工读互助团营业所得的余利全归团体，团员各取其所需。我觉得工读互助团比合作彻底，但是工读互助团所需要的互助道德，更觉紧要。

第四，不是半工半读学校。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一定的，而且在本校求学。工读互助团的课程是没有一定的，无论入何种学校，都是可以的。

第五，不是成美学会。因为团员所用的，都是他们自己血汗得来的。

第六，不是其他各科工作的组合。因为工读互助团是工读并重的，他的宗旨不专在作工。

总之，工读互助团的理想便是：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现在武昌、南京、天津、湖南、平江、上海、浙江各处皆将组织，前途狠有希望。但是我希望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若有联络的必要时，还是实行我们“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我们团员随便到什么地方，皆有工可作，有书可读。

筹款方法，或由发起人担任筹募，或由团员自己集资，或开各种游戏会筹募亦可。

征求团员，务要慎重；选择工作，务求有益、有利、有趣。

陈独秀先生云，此种团体，经济方面、道德方面皆要极端注意。

顾梦渔先生云，照欧洲各种组合的成例，先有消费组合，然后再办生产组合，方不失败。

李守常先生云，照美国宗教的共产村的成绩而论，经济方面尚无可虑，精神方面尤为重要。

我以为工读互助团是初次试验，须俟切实做去，始能发现他的毛病，发见毛病立刻医治。若是此次试验成功，吾人理想社会便不难实现；若是失败，至少可以阻滞进化半世纪，我们都是大罪人！

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著者按：蔡孑民先生曾提议将"工读"二字改为"工学"。后来开会讨论，大家以为"工读"名称既已宣布，不必更改。而且"工学"二字与"农学"、"医学"相似，恐他人误认为研究工业学问的团体，所以决定仍用工读互助团名称。

我们为推广工读互助团起见，特在《少年世界》上专辟一栏登载此项消息。

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①]

兄弟于民国七年在京校毕业，自知学识浅陋，即拟出国留学。旋因同志数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冀与海内青年相周旋，蒙同人不弃，委兄弟以筹备处主任之职，计划一切，出国之议遂致中辍。去年一月沪上同人复电催兄弟到沪，商量会务进行办法。一月二十三日遂在吴淞开一会议，决定各会员行止。因其时本会人数极少，若集居一处，于发展会务殊不经济，于是决定某某出国，某某驻沪。对于兄弟行止，则同人一致主张再住北京一年，专办会务。自此次"吴淞会议"后，同人行动便为团体约束所限制。换言之，自此以后，吾辈个人奋斗即为团体奋斗，吾辈个人失败即为团体失败，盖同人已视本会为吾人之第二生命矣。当时本会发起刚才半年，尚未开成立大会，一切规模未具。

① 本文发表于1920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

兄弟既受同人之委托，义不容辞，即于送别李璜、周无、涂开舆诸兄上船放洋之后，赶回北京，进行一切。去年七月一日本会开成立大会，又蒙同人委以执行部主任之职，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以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现在屈指“吴淞会议”之期恰已一年，所有从前团体议决光祈驻京一年之约束，既已满期，故特将执行部职务，交由副主任陈淯君代理。又得评议部诸君同意，允许兄弟出国，除将一切会务交代清楚外，现已定于二月出京。此行先赴南洋，约住两月之久；次赴欧洲，约住一月；再次赴美洲留学。此行目的有三：

（一）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之优秀青年。

（二）筹办华盛顿通信社。

（三）个人求学问题。

我们“少年中国”的运动，系先从学生、华工、华侨三类人下手。关于各地的学生运动，我们会员大多数均已参加。本会发行各种出版物的宗旨，亦系与海内正受教育之青年同志砥砺学行。因为我们对于过去人物，完全失望，我们惟一的希望，便是生气勃勃之青年。现在本会对于“学生运动”的计划，虽未能完全实现，但是业已着手进行。至于“华工运动”巴黎会员亦正努力从事。惟“华侨运动”南洋方面只有涂开舆、朱镜宙两兄（一任星加坡[①]中学校长，一任《国民报》总编辑），人少事繁，又限于职务，不能遍游世界各地，联络各处华侨之优秀青年。近来南洋方面常有华侨来信殷殷探询本会进行状况，因之兄弟欲趁此游美机会，前往南洋、欧、美各处，宣传吾会精神，并介绍年来国内各处之“青年运动”，以慰我远居海外之华侨。诸君须知年来华侨处欧、美、日本势力之下，阅报均不自由，言之可为痛心。我不是抱“爱国主义”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国弱，并我们人格亦为外人所轻视，则无论如何必与之力争，非至争得平等地位，虽因此牺牲身命，亦在所不恤。惟我们与外人力争平等，不必取途于“爱国”，尚有其他方法可寻罢了。故兄弟此行第一个目的即在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之优秀青年，宣传吾会“青年运动”的精神。

此行第二个目的，便是筹办华盛顿通信社。兄弟常常接着欧美友人来信，都说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情形极为隔阂，他们误认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般卑鄙龌龊的大人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一般优秀分子尚且如是卑鄙龌龊，其余一般平民更不问可知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的观念稍稍有点变迁，但是还不彻底了解。华盛顿通信社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将中国一切有价值的运动及中华民族青年的精神，要表现出来，译成外国文字，在美国发表，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吾国人士对于世界大势向不

① 星加坡：即新加坡。

过问，关于西洋社会组织、一切文化运动尤不注意。华盛顿通信社的第二个任务，便是要把世界大势、西洋社会状况输入国内，以备参考。若是此行有机会时，尚拟为巴黎通信社、东京通信社、伦敦通信社（按：伦敦通信社现正筹备）、华盛顿通信社筹措一点拍电费。因为我们中国的消息，向来只靠几个外国人所办的路透电社、东方通信社传播，真是可怜。你想他们的口头能够说出一句好话来吗？

以上所说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优秀青年，及筹办通信社，皆是本会会务，亦即此行的重要目的。此外关于兄弟个人的，便是求学问题了。我国教育制度不良，兄弟自幼至壮便未受过一种相当适宜的教育，虽曾毕业两个学校，但是除得了两张文凭外，可谓毫无所得。此次出国即欲求得一种较有统系的学问，兄弟以为人类进化与经济组织有密切关系，所以狠想研究经济学。去年周太玄君与我相别时，他说吾人此次出国系最末一次之洪炉，若再毫无成就，今生休矣。周君本是立志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对于基础科学没有深厚研究是不行的，他现在在法国专学数学、物理学等等，以便将来研究哲学有所深造，我狠佩服他的勇气。我此次出国，亦是最末一次之洪炉，若是仍旧毫无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与鱼虾作伴侣，永远不要再与诸兄见面了。

兄弟出国后，希望同人于最短时期中组织一个编译社，筹办一个印刷局。编译事业的计划，在我们会中已有一年多了，因为经费关系，至今还未成立。但是这种事业异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文化运动，可以解决我们生活问题，所以有从速筹办之必要。这个编译社的社员不必限于会员，非会员亦可加入，所有经费用招股方法凑集。编译社中所办之事如下：

（一）编译专门智识之书籍。现在国中出版物虽多，但是关于专门智识之参考书却少。若向欧美购买，所费之时间甚多，价值亦太昂贵，且非有外国语智识者不能问津，此于文化运动、学术进步上极有关系。我们编译社若是组织成功，欧、美、日本各处各设采购调查书报事务员一人，凡有新书出版，请他们立刻寄回，我们立刻将他译印出来，用最廉的价钱售出。好在我们会员留学欧、美、日本各处的甚多，可以请他们担任采购调查，我们会员中懂得英、法、德、日外国语的亦不少，当然可以担任编译。

（二）编纂中小学校教科书。我们会员从事教育者对于现在各书局所发行的教科书，皆深恶痛绝，将来编译社成立了，可以实行我们的“教科书革命”。

（三）编辑革新平民思想、增进平民智识的小册子。每逢星期我们便可以到乡间手讲指画的传布，与基督教徒散布马可福音一样，为我们“新农村”的运动。

我们译书所得的收入，除资本外，以十分之二作为共同生活之费，其余十分之八作为译书者的酬资，我们生活问题亦从此解决了。我们会员有自愿劳动的，便可以作我们印刷局的工人，自己著书，自己印刷，这是何等有趣，何等快活。

我们印行的书籍，可以组织书报流通处自行发卖，并可以代人向欧、美、日本采购书籍。

关于征求编译社的社员，康白情君主张向各种学术团体中物色，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个学会的力量所能包办。

日前北京会员开会，张崧年君主张组织一个委员会进行此事，当时推定陈淯、康白情及兄弟三人。将来各处会员皆要举出一人筹商办理，以便积极进行。兄弟此次出国亦拟与欧、美、南洋各处会员面商此事。

以上是兄弟临去时的一种希望。至于以后本会征求会员，务望愈严格愈好，会员相互间愈不客气愈好。关于会务请与陈愚生君接洽，陈君办事极为热心，必能使会务蒸蒸日上。

总之，吾会会员精神宜团结，局面宜展开，努力奋斗与创造，以实现我们的理想。兄弟以最诚恳的态度敬祝：诸兄奋斗胜利，创造成功，永远活泼泼的快乐。

新加会员　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其人名、通信处如下：

姓名	行号	年龄	籍贯	通信处	在本会何科
张闻天	闻天	二十	江苏	上海西门黄家阙六十七号宗白华转	文科
芮学曾	道一	十九	山西	东京府下千驮谷四九一山西	文科
毛泽东	润之	二十六	湖南	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	文科

会计报告　兹将十二月一日至一月二十日之收支状况，报告如下：

收入　原存七十一元七角三分，黄日葵君等会费十二元，补收卖报余款五元九角三分，以上共收入八十九元六角六分正。

支出　邮费、杂费等共二十七元五角九分五厘正（另有详账）。

收支相抵　尚余六十二元零六分五厘正。

去国辞[①]

民国九年四月一日，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欧留学，又有会友涂开舆前往星加坡从事教育，共乘法船 Paullecat 由沪出发。四月五日，舟过香港，

① 本文写于 1920 年 4 月 7 日，同年 5 月 15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

遥望数点青山，罗列海岸，因念去国日远，特制短辞五章，为舟中同人陶情励志之用。辞中用语，多系本会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砺者，此辞更得湖南姜君为之制谱。每当夕阳西下，海波不兴，同人辄斜倚栏干，歌此一曲，以度海上寂寞之生涯。九年四月七日，王光祈。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发挥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
惟我少年，乃能奋发。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只问耕耘如何，不问收获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纯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上辞五章，润屿四月七日从海防寄上海。舜生）

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①]

本会同志诸兄均鉴：弟因在沪时检验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弟遂临时改道赴德。所有美国方面之会务由黄仲苏兄等前办理。南洋方面除涂九衢兄已在新嘉坡外，梁绍文兄亦将有南洋之行。美国、南洋既皆有人，故弟更变原定计划，决计直接赴欧，于四月一日乘法船 Panllecat 由沪出发，同行者为会员魏时珍、陈剑修、涂九衢三君。除涂君系赴新嘉坡外，弟与魏、陈二君，皆系直接赴欧。

弟等现已海行二十三日，再过三四日便抵非洲东岸之其布的[②]。弟此次经过安南之海防、西贡及英属之新嘉坡、哥仑布各处，受激刺极深。见彼白人之经营东亚不遗余力，而吾有色人种在彼等支配管理之下，苟延残喘，不知自拔，令人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回忆东方病夫之中国，暮气充塞，虽有“五四”、“六三”之运动，然寸效未睹，而从事运动之青年，亦复官气十足矣。可叹可叹！

亚洲各地之亡国民族，其思想固远不及白人，即以体力而论，亦不能与白人相抗，宜其被人征服。回顾中国青年，其身体之孱弱，初不亚于各地之亡国民族，何能与外人相抗？因身体弱而思想不深，故学术不能发达；因身体弱而精神不健，故办事未有成绩；因身体弱而气色不扬，故随处受人侮辱而不敢与之较。诸兄诸兄！试自思吾辈之身体如何？以此孱弱身体而欲精研学术，建树事业，贯彻主张，是犹缘木而求鱼也。故弟此次出国曾与时珍、剑修两兄相约，出国后当以振刷精神、强健身体为第一要事。若身体不强，则所有计划皆虚愿耳，安能见诸实行？甚望诸兄于身体一层务要极端注意。弟在国内时曾见某报外国通信，提倡三种生活：（一）劳动生活；（二）简易生活；（三）规律生活。弟以为此三种生活皆与吾辈身体有重要关系。盖吾人终日运思而身体不稍劳动，则血液循环不灵，易致疾病；生活奢侈而又无秩序，则起居无常，神智昏乱。故吾人欲望身体强壮，非同时注重此三种生活不可，不知诸兄以为如何？

吾会精神注重研究真实学术，从事社会事业，然此二事实未易言。吾辈究应从何处下手？此实为今日亟应讨论之问题也。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 1920 年 4 月 23 日赴欧途中，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

② 其布的：即今天的吉布提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

弟以为欲实现吾会精神，有二种团体不可不组织，兹详陈如下，以供诸兄之采择。

（一）国内旅行团；

（二）国外旅行团。

吾辈固日日倡言改造社会、改造家庭、改造个人生活、从事社会事业，然各地社会之组织如何？家庭之实况如何？个人生活宜从何处改起？社会事业宜从何种做起？若非有详明确切之调查，而乃轻言改造，岂非大语欺人乎？现今各种主义学说虽皆可以供吾人改革之参考，然欲实地改革则非熟习各地实在情形不可。若不知社会实际状况，何者为需要？何者为非需要？何者虽需要尚可置于缓图？而欲贸然实行其主张，安能望其有成？吾会组织国内旅行团，其任务有三：

（1）调查各地社会状况、家庭组织等等，以为改造社会、改造家庭之预备。调查所得，即开科会讨论，决定吾会对于某种问题之意见。

（2）采集标本，征求图籍，为学术上之贡献。

（3）到各地学校演说，宣传吾会之精神，并调查各分会进行状况。

每年旅行一次或二次，由本会会员组成数团，每团数人。如北京之会员便可旅行北五省，南京、上海、武昌、成都之会员便可旅行长江流域各省，广州等处之会员，便可旅行两广、云贵、福建各省。非会员亦可参加。旅费暂由会员自备，将来会款充裕即由会中津贴。此事于个人学问、社会事业，皆有极大益处。想吾会会员素以精研学术、改革社会为己任，必不惜此区区旅费及时间。否则坐而论道，闭户造车，所谓改造社会、精求学问，皆虚言耳。

国外旅行团之任务，亦为采集各地标本图籍，调查各国社会状况。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惟需费较巨，弟拟与欧美、日本、南洋各处会员商量，凡吾会会员赴国外旅行，所有食宿费，皆由侨居该地之各会员担任，並尽指导之责，其日期以十日至一月为限。现在世界上各名都大埠，多有本会会员之足迹，此举亦不甚难，故各会员欲旅行世界者仅筹路费千元，便足敷用（平常周游世界者需费五六千元）。此时暂由会员自备，将来会款充裕，可全由会中津贴。凡非会员欲周游世界者，若得本会之介绍函，各地会员亦可尽招待指导之责，惟不担任食宿经费。兹将旅费千元分配如下：

由上海经南洋、印度、非洲至欧洲三等舱约二百元。

由欧洲赴美洲头等舱约百元。

由美洲赴日本二等舱约二百元。

由日本经朝鲜回中国北京三等车约五十元。

以上五百五十元，余款四百五十元即作为往来欧洲各国即[①]美国内地之舟车费、护照费等等。

吾会会员有留心教育事业者，则赴各国学校参考教育状况；有研究自然科学者则赴各国采集标本。此外如研究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等，皆可赴各国调查一切，以证所学。此事若行，于世界学术上及吾国之改造事业上，必有极大惊人之贡献，可断言也（若一时不能周游世界，即先游一二国亦可）。

吾国内会员亦可在杭州或南京租房数楹，组织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植物园等等，以为学术上之切磋，并得随时聚居一地，朝夕砥砺。吾诵陶渊明之“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人心，乐与数晨夕”，不禁悠然神往矣。

日前往游香港、西贡、星加坡、哥仑布等处之植物园、博物馆，见其收集之富，颇有动于中。涂九衢、魏时珍、陈剑修诸兄皆主张从速组织。此时吾辈侨居外国者，即可从事收采标本，国内会员亦可随时采集，有志者事竟成。

吾辈留学外国者，亦拟速将各国通信社组成，其办法如下：

（一）将外国社会、政治、学术各种消息输入国内，并将中国有价值之活动，译成外国文字，在外国报上发表。

（二）每月将外国新出版之书报目录报告一次，并代国人采购书籍。

（三）凡国内私人或团体，欲调查教育实业各种情形者，亦可委托本社（如指定调查某种学校及某种商情之类）。

总之，吾会会员须时时不忘本会研究学术、改造社会之宗旨，并时时思下手方法，此则愿与诸兄共勉者也。

数日来行近热带，握管汗如雨下，不能多写，匆匆草此。即颂学祺。

弟王光祈自印度洋中上言

---

① 即：原文如此。疑应为“及”。

致幼椿、太玄、劼人、鲁之[①]

幼椿、太玄、劼人、鲁之诸兄：弟于二日曾上一函，已收到否？《少年中国》稿子已收齐否？如未收齐，务请太玄从速催促在法同人，赶于六月中旬付邮。至盼至盼！否则付邮误期，国内专候稿子不能出版，则大失信用矣！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住（因尚有人住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德烈士博士之家，一切均不方便，故未作文，所有弟前担任之“法兰西一月之旅行”恐不能缴卷。此系特别情形，务望诸兄恕我，并请诸兄勿以我为例，亦不交稿。

弟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屋，皆系近邻，时珍等皆在弟之房东处包饭。现在每月每人用费五百七十马克，其分配方法如下：

房金 130 马克，早茶 50 马克，午饭 180 马克，晚饭 150 马克，煤气灯、伏侍费、洗床铺费共 60 马克，总共 570 马克。

早晨吃面包、果子酱、牛奶；午饭以马铃薯为主，外有汤菜两样（无面包）；晚饭亦以马铃薯为主，亦有汤菜两样（仍无面包），马铃薯可尽量吃饱，并无饥饿情形，请诸兄勿虑（并且狠好吃）。

弟所居在下 Frankfurt 郊外，与巴黎之“哥伦布”相同，惟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窃叹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之中，今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弟已决定在此专心学德文，数月中决不履城市，每月只用马克六百余，合中币只二十元，合法郎亦只二百也。经济方面决无恐慌之虞，请诸兄勿念。

弟所居系德国工人之家，然室内陈设之华丽，较之周植生室内，当在一倍以上，可见外国人物质生活程度之高矣。

弟等行李已取得“朱古楼”，亦未上税。

请你们常常通信。

我们若有信来，请你们从速转寄德国为荷。

吴屏君问候幼椿。

弟光祈顿首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 1920 年 6 月 1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致慕韩、少襄、哲生[①]

慕韩、少襄、哲生诸兄：弟于一日抵德国之 Frankfurt，与时珍、寿麟等各居一处，皆系近邻。此地犹巴黎之哥伦布，开窗临野，遥望青山野色，山光无异在蜀田居之时，令人心旷神怡。现已着手补习德文，决计数月中不履城市，每日除读书之外，尚可与德烈士博士谈聚欧洲现势及学术界近况，受益不少。兄等近况如何？念甚。《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稿子均已交太玄否？德国生活与巴黎相同，弟等每月不过六七百马克而已，合法郎二百，中币二十元。德人颇不欢迎外国人入境，因粮食缺乏之故，惟弟等居此，饮食起居皆安适丰富，虽国内达官贵人之生活不是过也，于此可以想见外国人物质生活程度之高矣。吾辈在欧数年，必须常为学术上之商榷，对于两种月刊之稿子，尤希诸兄努力供给。

时珍问候。

弟光祈顿首　四日

旅欧杂感[②]

一

我到欧洲后第一感觉的，便是我从前的观念错误。年来国内新思潮狠盛，我的思想上也受了狠大的影响，但是思想上虽略有变迁，仍是一个不彻底的变迁，不过将从前的旧观念，再糊上一层新思想，表面上虽然好看，里面却仍是腐败不堪。有时新思想与旧观念相战，其结果虽是新思想战胜，但是旧观念仍握有指挥行为的最高命令权。这种旧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 1920 年 6 月 4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② 本文发表于 1920 年 11 月 15 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

观念不根本扫除，无论你从事社会改造或政治改造，相信世界主义或国家主义，都含有十分的危险性。

这种旧观念的养成，可分为两种：（一）先天的遗传；（二）后天的习染。这种遗传习染，已经根深蒂固，当然不易铲除。但是我们第一步须用反省功夫，确实知道他是旧观念，而且是不该有的观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有传染病的社会，我们康健的青年加入此种社会内，久而久之我们亦是要受传染，既受传染之后，我们又去传染别人。换言之，社会把我们制造成罪恶分子，我们又去制造罪恶社会。据此看来，从前及现在的社会实在对不住我们青年，我们青年恐怕又要对不住将来的社会。

一个人在旧社会里要不受传染，是一桩狠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从前甚提倡与旧社会隔离的方法，主张改造社会要先从个人改起，而且须立在旧社会以外，把旧社会当作一种客观的东西去研究他、改造他。

即或认为立在旧社会以外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亦须具有超出旧社会以外的思想及精神。

我从前的自信力狠强，以为我与旧社会假意周旋，或者不至传染。其实我冥冥之中已受传染，跌过了许多筋斗！

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改造旧社会，须立在旧社会中。这种说法自然也有他的片面理由。但是若自己的修养还不敢自信的时候，未具有入地狱、出地狱的本领，我谨防他要跌筋斗。跌了能爬起来尚算是好汉，恐怕跌了之后永远爬不起来，只好太息一声“又弱一个”。

我所想到的隔离的方法，第一便是结合同志，组织团体，互相保险。因为我是一个最易堕落的人，我每次堕落，都靠我的同志提醒我、扶助我，所以我狠知道团体保险的利益。有了团体以后，我们身体虽日与旧社会周旋，但是我们的思想与精神则超出旧社会以外，常常把旧社会当作一件客观的具体事实，供我们研究。有时我们向旧社会宣战，团体便是我们的大本营；有时我们也派团体中的一二健者加入旧社会与旧社会短兵相接，倘若败了退回大本营来，我们亦可安慰他，再图大举。我赞成新村就是根据这种理由。不但是我们的思想与精神须超出旧社会以外，我们的物质生活亦应在旧社会以外立一个基础。不然一面向旧社会宣战，一面又向旧社会讨生活，那才真正危险、真正可怜呢。

日前我的朋友李幼椿君与一位法国学者谈话，说到改造社会的方法，那位学者主张“结合团体，身体力行，自然会转移风气”。昔曾文正说过，一人可以转移风气，岂有一个团体反不能转移风气吗？不过是一个团体之中，自然不能够个个分子都是圣人，毫无

过失，只要“一面跌筋斗，一面扶起走”，但求团体中互相了解，不问团体外如何批评，故我以为组织团体是一个与旧社会隔离的最好方法。

第二个隔离方法，便是离开中国社会，到外国去留学或作工。我不是说外国社会都是好的——其实坏处亦正不少——亦不希望永久的离开中国社会，不过是我希望在短时期内，应该设法到外国去换一换空气。因为我们自身终日居住中国旧社会中，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若一到外国，看见他国社会的好处，便联想到中国社会的坏处；看见他国社会的堕落，便联想到中国社会的特长；看见他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共同弱点，便联想到人类的全体改造。总之，外国的学术生活，都可以作我们的参考，而我们离开中国旧社会，亦减少了继续作恶的机会。

譬如我从前的观念错误，何以直到外国来我才知道？别人出国的宗旨多系求学，我出国的宗旨则兼求学与修养两种。我住在德国佛郎克[①]（Frankfurt）的郊外，开窗临野，一望平芜，鸡声鸟语，时来耳畔。我觉得我从前满身都是罪恶，悄然自悲，若有所失，终日独向“自然的美”之前深深忏悔。

我初到巴黎时与我一般老友相聚，其中活泼泼的自然不少，亦有一二位思想变迁正在激烈之际，颇露出一种“丧其所守”的态度。我其时正从国内出来，“满身都是劲”，忽听周太玄说道：“我们朋友都受了英雄名士的重毒，有英雄思想则于人格上有重大危险，有名士思想则于寿命上有重大危险。”我听到此处不由的汗如雨下，满身的劲都已烟销云散了。

一年来的青年运动，多脱不了英雄名士的色彩。譬如爱国运动、社会改造运动，都把他看作“英雄事业”；文化运动、文字革命运动，都把他看作“名士生涯”。英雄名士的特色，便是虚荣心甚强，私德心颇弱，任情恣意，恃气逞才。换言之，便是没有深厚的修养，一切思想事业皆筑于不正当之观念上，我无以名之，名之曰观念错误。我便是一个真赃实犯的罪人（青年运动中自然亦有狠多观念狠正的人），我曾有四首忏悔的诗：

> 我生久伏危险性，纵马危崖却怨谁。空过九千七百日，做人今始筑根基。
>
> 真忏悔者惟自杀，每思此语血如焚。且将毁誉随流水，从此襟怀伴白云。
>
> 每接良朋责难书，始知身已堕泥涂。而今百事都如梦，独向苍茫觅故吾。
>
> 名士英雄毒已深，良朋一语刺吾心。从兹打破关头去，苦学勤工惜寸阴。

我们青年的朋友们啊！我们求学作事都要注意“观念”。若是观念不正，学问事业都是杀人的利器。

---

① 佛郎克：即法兰克福。

二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以为外国人不敬祖先，不念死者，骨肉之间缺乏情感。其实不然。我的寓所附近有一个“公葬地”，是 Frankfurt 的一个最大的公共坟地，大约面积有百亩左右，绕以短墙。其中古树阴森，鲜花灿烂，是一个绝美的园林。园中筑有马路，马路两旁即系坟墓，死者埋骨地下，即于地上竖立一碑，多系“人造石”制成，类似大理石，有黑色、紫色、白色之别，高五六尺、宽三尺、厚五寸，碑上刻死者姓名与他的生年死日，碑之下端往往刻有诗词，如：

绿草作你的席，鲜花作你的枕。请你黄泉稍候，便来与你接吻。

情词极为缠绵，又有雕刻裸体美人，泣伏碑旁，碑上书“我们的爱情是永不终歇的”。此外又有许多雕刻希腊神像及其他种种表示情感之石像，最普通的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像，西洋雕刻术之精美，表情示意，维妙维肖。碑前布置各不相同，即所竖之碑亦复形式不一（前段所说碑的形式，系指最普通的而言），每碑之前皆有数尺平方之地，杂植鲜花绿草，临风飘舞，我每走一条马路，无异身入花市。时有白发老人或青年妇女手携洋铁水壶，灌溉墓前花草，亦有独立碑前掩袖哭泣的，大约死者家属，每逢星期多到此地灌溉花草。该公葬地坟墓何止万数，而每墓之前皆有鲜花，显系随时皆有人前往换种。我们中国坟地，每年只有清明、年底前往祭扫两次，荆棘满地，还说是崇拜祖先，不忘死者，岂不可笑？

中国人最信风水，每择一茔地，动辄经年。其实外国人聚葬一处，无所谓风水，他们还是肥头大耳，子孙昌荣。

中国人的坟地，总是散居各处，有时祭扫一次须跑几天路，何如葬在近郊，每数日去看他一次。我以为若是对于死者真是感情浓厚，便应该把他烧成灰，装在最美的瓷坛中，置诸桌上，随时相伴，寸步不离。否则亦应将他埋在近处，以便随时祭扫，为什么要跑在数十里、数百里外买坟地？

周太玄与我同游“公葬地”，他说将来我们回去，亦可以组织一个“公葬地”，但是要找几位园艺学家、美术家出来办理，并且我们先从陶然亭畔雷眉生的坟墓做起——雷眉生是一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活到十九岁便在东京死了，我们将他葬在北京陶然亭畔——我想这也是我们应做的事。

我往年在江苏、浙江道上，看见许多棺材放在路旁，没有人管，一方可以看见中国

人无同情心，一方又可以看见中国人太不讲卫生了。

三

我昨天与魏时珍、宗白华推论外国平民的居室，何以陈设如此华丽？我以为他们第一是享受物质文明的幸福；第二他们家中都是生产者，没有寄生虫；第三社会组织完善，如有公立医院便可以减少医费；第四他们的金钱多消费在正当的衣食住上，不似中国的狂嫖、狂赌、狂饮；第五外国人的应酬少。

中国人多生、多病、多死、多婚嫁，一年四季皆在闹红白喜事。即以葬丧而论，从死者得病起一直到葬入墓中止，你算算要花多少钱，要费多少时间，闹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送丧幛的拿来缝不成衣裳，送烛纸的只可以付之一炬，其余如孝衣孝帽都是毫无益处的消费，只忙坏了道士、和尚、厨子、裁缝。

我上次看见外国人葬丧，觉得他比我们简单多了，而且狠有意义。死者的棺材并不甚大，两个人便能抬起，先由马车送到“公葬地”，再由“公葬地”的役夫用车将他装上运到墓穴，车前有牧师一人，并有役夫一人持十字架一，用黑纱笼着，向前引导，送丧者手执花圈随后跟着，既到墓穴便由役夫二人将棺抬入坑中，那位牧师便翻开《圣经》，高诵一段，并执锄盛土，掷入坑中，随后各亲友皆一一执锄掷土于坑中，并在坑前演说，演说毕，由死者的家属掩泪握手致谢。我觉得他们的葬仪，除牧师念经毫无意义外，其余皆不繁不简，墓前演说尤有趣味。

又路旁参观者，见丧车经过，皆须脱帽致敬，更觉有礼。

四

德国各处常常贴有广告，大书特书的写着“快救我们的小孩子呀”。其实德国小孩都长得肥头大耳，又有书可读，比较我们中国的小孩子，真是有天渊之别了。但是他们仍是这样注意，因为他们知道要救战后的德国，改造战后的德意志，不是那些大人先生们所能为力的，全靠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孩。我们中国青年、中年、老年的人，也只能作一个开路先锋，铲除荆棘，辟出一条大路，让我们的小孩子，作那“真正建设”的功夫。

各位想想我们童时所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是如何的不良，不但是

真正的科学基础，我们没有建筑，而且染了一身不良习惯，直到现在才知道求学，真是晚了晚了。

到德国来留学的，大半只能进大学，并不是他们的程度配进大学，实因为他们不配进中学。中学校分两种：一为偏于文科的，一为偏于实科的。功课异常认真，所有基础科学皆在中学校业已预备完好，外国人来此留学的，简直够不上进中学校与他们青年并驾齐驱，所以只好选择那“放任主义”的大学，自由听讲。换言之，到外国来留学的男女学生，大半只算是半路出家的和尚尼姑。

西洋留学的先生们，往往回国后，多要摆臭架子，其实你们发明了什么东西？建立了什么学说？算了罢！我劝你们老老实实作一点苦工，只算是为我们的小孩子开辟荒芜，至于真正建设，只能待我们那些生下地来就受良好教育的孩子、没有走过迂路的孩子。

战后德国的小孩子，政府恐怕他们家里受战事影响，没有丰富的食品养料，都叫他们将小孩子送到学校内养去，每月只要七个马克——我们每月要用四百马克的火食费——代他们将小孩子养得肥头大耳的。他们以为恢复德意志的伟人，就是这般肥头大耳的小孩。

周太玄亦说法国的小孩子，自生下地来直到十四岁，他们家里真是把他装扮得如花似玉。至于应该如何使他得着良好教育，养成良好习惯，这是他的父母所昼夜研究的日常功课。所以外国人不愿多生小孩，因为父母是不容易当的。

中国人的小孩怎么样，简直是一条猪、一只狗，任他自生自长。当父母的只知道在这条猪、这只狗的身上，打算他将来送老养老的办法。

我常与几位留欧的朋友说：我们将来回去，自儿童公育院、幼稚园以至小学、中学，我们都要设立，造就人才惟从婴儿着手。

五

我五月初七日抵马赛，正遇着法国大罢工，最初只是全国铁路工人罢工，第二天工党又下一个命令，全国电车、马车同时罢工，我们要找一个马车送行李都办不到。他们工党的命令，比一个陆军总长的动员令，还要神速，还要整齐，我才知道外国工人的魄力。

但是第三天的火车又开了，并不是工人已经上工，乃是一般资本家自己在开车。巴黎有一个中央专门学校，都是资本家的子弟亲戚，在校肄业，各样专门工艺都有。一旦罢工，他们便出来服务，开车的开车，卖票的卖票，穿得狠漂亮，举动狠温和，所以有

许多市民狠爱他们，反恨工人。我才知道外国资本家的利害[①]。

工党要求甚奢，巴黎政府恼了，到最高法院递了一张诉讼呈文，要与工党打官司。有时工党与内阁直接谈判，开口便问有无商量余地，往往只回答一字“无”。于是白手的工人便与拿枪的兵士血战，外国政府虽是一样的可恶，但是我觉得他狠痛快。

我常想若是外国的工人移到中国来，我们的政府与资本家只有不战而逃、望风而降。

若是我们的政府与资本家，学有外国政府与资本家的手段，我们中国工人只有死之一法。

天地生人都是先计算过的，既有中国式的政府及资本家，便应有中国式的工人，此之谓三绝。

旅欧杂感[②]

德国有一本书，名叫《桃花》（Plirsichbhïten）内中所载的都是中国的诗歌，有许多是从《诗经》上译下来的，装订非常精美。德国近来因为人工狠贵，装订工价比印刷工价还多，所以关于科学哲学一类新出版的书籍，装订都极粗率，只有文学书籍装订稍为讲究。而这本《桃花》在文学书籍装订中，又算是第一个美观的，所以极容易引起人注意。德国报纸中有一种名叫“Vorsische Zeitung”的，有一天把《桃花》中的诗，转载了几首，批评了一大段，我今且把他的批评介绍如下。

他转载的诗有一首是：

>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
>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他说：“我读了这首诗以后，我的精神仿佛到了另自一个世界，说不出来的快乐。试想数千年以前，我们德国是何种野蛮状态，而中国已有如此美丽的诗歌，若拿德国文艺与中国文艺比较，德国的只算是一个乞丐。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国民文学，无论一个贩夫走卒所著的诗，都是非常精美。在

---

① 利害：原文如此。

② 本文发表于1921年2月15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

德国只有歌德（Goethe）才做得出来，所以中国的诗是公共的，不是少数人的。

中国民族是富于精神修养的民族。无论在什么凄凉困苦的境遇，他们都是处之泰然，他们承认“现实”，什么都是好的。

中国诗的组织，与绸缎上的丝一样匀净；中国诗的动人，如饮了醉酒的一样热烈。

希腊哲学家说，天空中有一种自然和谐的音乐（即地球周行，天空鼓动空气的声音）。这种自然和谐的音乐，只有中国人听见，一一谱入他们的诗歌。

我们德国从前只知道中国有一个李太白，其实中国像李太白的诗家还多得狠呢。

以上都是报章中的批评，最后还引了一首李鸿章的诗，作为十九世纪中国诗歌的代表，亦恭维的十足。

近来中国报纸上每天都有几首新诗，而不知外国人亦同时在研究中国旧诗。只可惜中国青年多从事输入，而不注意输出，中国的汉字太不易认，中国的书籍又无统系，外国人欲研究中国学问比登天还难，所以外国人对于东方文明始终不甚了解。东方人能够介绍东方文明的，在印度只有一个太戈耳[1]，在中国尚无其人。

欧洲自大战后，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近来欧洲新出了许多书籍，如《欧洲之末运》等书，攻击西方文明，不遗余力，大受欧人欢迎，出版后风行一世。前几天朋友魏时珍接着一封介绍信，说是有一位大学教授要和他谈谈孔子之道。又有一位姓陈的朋友到乡下旅行，在一个中学校里，听见一位教师向学生讲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并盛夸中国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含义深奥。总之，此种现象，虽是战后一时的反动，但是我们亦可借此机会将中国古代学术尽量输入欧洲。

朋友张梦九说：“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社会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换言之，中国的文明自文明，社会自社会，他们俩早已没有关系。现在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把“文明”应用到社会上去，但是外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明，只看见中国现代的社会，遂以为现代堕落的社会，便是中国文明的结晶，因而对于中国民族存一种轻视之心。近来吾国文化运动虽十分热闹，但是在欧洲人眼光看来，亦不过是抄袭欧洲学说，小儿开始学步罢了，还不能减少他们轻视的程度。我以为要抬高现在中国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创造新文化，以贡献于世界。否则至少亦应将中国古代学术介绍一点到欧洲来，一则使东西两文明有携手机会，可以产出第三文明；二则亦可以减少欧洲人轻视中国民族的心理。

欧洲人急欲知道中国文明，但是要找一本介绍中国文明的著作终不可得，找来找去只找着一位辜鸿铭先生。于是欧洲报纸、杂志、书籍上常常都有辜鸿铭三字出现，称他

① 太戈耳：即泰戈尔。

是欧洲人的先知先觉，说他的著述是介绍东方文明的杰作。诸位想想，由复辟派辜鸿铭所介绍的中国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文明？我实为中国文明寒心，但是中国文明仅由辜鸿铭始传到欧洲，这又是我国一般文化运动家所当引为深耻的。我希望中国青年不要专从事输入，还须注意输出。

九年十月廿六日在德国佛兰克

致恽代英书[①]

代英兄：日昨接《少年中国》二卷七期，奉读你的大作，无任欣慰。你说现在学会是有力的个人，不是有力的团体；又说现在学会宜注重对内会务，而减少对外会务。这两句话十分中肯。我们学会当初发起的意思，即在先聚集有力的个人，然后再造成有力的团体。所以会员曾慕韩君常说："我们对于会员宜求量的增加（即有力分子），不求数的增加。"两年以来我们即本此方针以进行，虽不能说所有办法皆尽如人意，然亦可谓煞费苦心。现在我们勉强把第一步做得有些像了（即聚集有力的个人），而第二步有力的团体则至今未曾做到，但是此系时间问题，将来必可做到。

学会这两年来名不符实，这是我们第一桩可耻的事。这种情形巴黎同人在两年前即已看到，曾致函敝处，说"学会发达过速，实为不祥"云云。当时会务，弟实为主持奔走之一人，未能采择巴黎同人忠告，一味从夸张方面下手，故学会之名不符实，弟实应首负其咎。自出国后，思想一变，以为现在个人及学会均应暂时养晦，对外方面宜减少发展，对内方面宜为猛力之进行，正与尊论恰合。惟弟所谓对内的发展，其意义有二：

个人学与行之修养；

会员间之联络。

我近来益觉我们朋友的能力薄弱，魏时珍兄常说："我们朋友没有一样事是做好了的。"我前面所谓有力的个人，不过是指其禀赋而言，若说到学养二字则还须猛力的用功夫，此是不必讳言的。

何以才能做到学养二字功夫？一方面固然要由个人自己努力，一方面还是要借朋友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20年12月10日，发表于1921年3月12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

切磋的力量。所以又归到第二个问题“会员间之联络”了，可见我所谓对内发展，其意义虽有两个，而事实上仍与尊论相同。

我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想过几个方法：

第一，先调查会员之学问事业，造成一表。然后再由学问相同、事业相同之会员，组织一种“某种学问研究会”或“某种事业研究会”，这种研究会完全公开，可以参加“非会员”，如此才可以说到互助二字。现在执行部调查表业已发出，不知将来成绩如何？

第二，用通信传观办法，以谋彼此性格上之了解。此事欧美方面及舜生方面均早已实行，与我兄所主张之另刻《会务报告》之意，亦正相同。惟另刻《会义报告》，恐一时财力所不许，不如将应该传观之信（换言之即可以登载《会务报告》之信），由执行部装订成册，先寄天津，以次南京、上海、武昌、成都等处，然后寄回上海，再由上海寄往日本、美国、欧洲、南洋，再寄回上海保存。

若能由执行部用复写纸写成四份，分寄各处，则更较神速。弟以为若无重要会务（重要会务宜用专函分寄各地），专是朋友讲学及叙述身世之信，稍迟一两月看见，亦属无妨，故仍不必用复写纸抄写。

每次传观，书面上须规定传观路线并备白纸一页，已阅之人既在上面签名以免重寄。

第三，将北京方面会员工夫抽出来专办对内之会务，至于月刊则拟分为三种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文艺季刊——由各地会员各就其所学，分任编辑。每种季刊每期之后，皆列“创造少年中国问题”一栏，专载社会问题、讨论主义问题等项文字，最后仍附“学会消息”一栏。关于此种分地分类编辑办法，巴黎同人亦甚赞成，惟不主张分为三种季刊，而用特刊号办法，弟以为此种解决不是彻底改革，此义遂因而搁置，故未向国内同志提出。惟弟终以为我们今日讲学的特色，即在专门深造四字，若仍是空泛议论，则与从前之《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杂志》何异？现在新杂志之发达，不过因其所研究之方向不同，至于内容之空泛，仍与从前各杂志无异。若我们月刊不能办到专门杂志，简直可以停办。现在国内专门杂志虽亦不少，但是能令人满意者却亦不多，而且若照着某某杂志那样提倡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不但不能发达，而且要破产。若是专门杂志之议实行，我们朋友间的互助，更要进一步，因为我们又走进一个较小的范围里面去了。范围愈大，性质愈异，愈不容易互助；范围愈小，性质愈同，愈容易互助，你以此语为然否？

第四，便是国内旅行团的办法，这又与你所主张每年开年会一次之意见相同。我以为我们会员至少每年每人要旅行一次，与各处朋友谈谈。我是一个穷鬼，而且在北京时担任三四处的事，但是前年一年之中，亦曾南下数次，与各地会员接洽，真有无穷的快

乐与无穷的益处。这回苏甲荣兄南下与南京会员相晤，亦有狠好的印象。我们在这种触目伤心的时代，处这种干燥无聊的生活，若再没有几个素心的朋友，那简直是宣布我们的死刑了。我将来回国后，决定先在国内旅行二三年，再出来替社会服务，你以为何如？

以上四种便是我对于会务的意见。此外还有三个问题，我亦有一点意见。

（甲）宗旨及主义问题。现在有许多会员，说我们会的宗旨太宽泛了，而且又嫌主义不决定，举止无所适从。其实我们所标出的目的，是创造少年中国，创造少年中国是多方面的事，当然不能规定一个狠狭的范围。不过我们实行起来，我们只选择我们能够做的努力进行，将来成就或只是一部分事业、一部分学问，亦未可知。至于其他部分的学问与其他部分的事业，我们所未能尽力的，只好留待会外的朋友（或是我们后人）去做，以弥补我们缺陷罢了。但是何害于我们宗旨？我们总是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做去，而且我们宗旨表面上虽极宽泛，而其中亦有狠严格的，譬如主张社会运动，反对现代政治活动，这便是现在文化运动的先生们，究竟能否做到此层，已经是狠大的疑问了。

至于主义一层，我们会员中当初尚有少数信仰狭义的国家主义的，现多已改向新潮流的方面了，但是从前相信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现在又多入于怀疑了。这是我们相信真理，不固执成见的确证。在这种彼此共同怀疑的时代，狠可产生一种较好的主义，或较宜于中国的主义。因此之故，我甚反对现在学会标出一种主义之虚名，我主张对于中国将来之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的组织，均用极具体的描写。果然他的组织方法与他的组织理想都是狠好的，我们就把他作为我们对于某种事业的一种共同计划。我最恨现在的人，只冒社会主义之名，而不问究竟该怎么组织才算合理。朋友们！世界上的主义不够我们用呀！我们要创造呀！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呀！

我对于改造中国的方法，从前亦有一个主张，我在前两月想把他著成一篇文章，寄登月刊，我已著了二三千字，我后来又把他撕了，不愿意发表。我现在且将我那篇文章的大意，立出一个表来，另纸抄与你看。我以为不但革命后要建设，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设，一种改革运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好的，而且少数人做好的决不可以耐久。我不希望多出有名之英雄，只希望多生无名之英雄，将来新村的大联络更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观那个表你便知道我不是主张和平之人了，所以你上次说仁静想出会，其实我们亦不是过太平日子的人！

（乙）生活问题。上次我们提出一表，调查会员“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即是渐渐着手解决会员生活之意。知道大家想做什么事，然后再从那个事的本身着想，方才有办法，或作自动的生产组织，或介绍于相当的职业界，此亦正与尊论相同。从前我常向舜生说：学会要办到入会的人，对于学问、事业、生活三个问题，都要同时解决，然后才

有活气，才敢向社会宣战。这个问题，我希望今年大会，有一个具体解决的方法。

（丙）破裂问题。据弟观察，此层现在尚不成问题，即或不幸发生，亦无大害。因为我们不是为人而结学会，亦不是为学会而结学会，是为目的而结学会。只要我们目的存在，那怕会员死完或变完，我们的目的仍如日之在天，还有许多后人替我们做。即或学会不幸而至于破裂，或因破裂而竟至于消灭，而仍无碍于我们的目的，所最可怕者，便是我们没有目的。

我不能说我们学会没有目的，若真是没有目的，早已瓦解了，何能维持三年。但是学会虽有目的，而未曾把他解释得清清楚楚，更未曾把达到这个目的之方法详详细细宣布出来。我们每一个会员，大概都有一个方法，但是总无机会把他合起来，增减因损，成为一个共同的方法。

我从前的意思，是等待各国留学的朋友都回国后（现在会员大半在国外留学），由全体会员开一个大会来解决这个方法问题。照现在情形看来，恐怕不能久待了，我们只好随时在月刊上讨论这个问题罢！

我以为我们忠诚的会员，不要忧学会破裂，只忧学会具体的计划不立，每一个会员都负有把学会宗旨、方法说得明明白白的责任。

你说要多方面一致努力，我尤为赞成。我以为社会是一个狠复杂的东西，改造社会便是一个狠复杂的事业，决非少数人或一个方面的人所能单独改造的。即专门学问亦然，譬如化学是一个狠专门的学问，我们若要提倡化学，建筑一个化学试验室，便要需要下列各种的人：

（A）化学中之发明家。

（B）应用化学之科学家。

（C）建筑化学室之工人。

（D）制造化学用品之工人。

（E）筹集款项建筑化学室之奔走者。

以上五项人，我们都可以说他是“化学的功臣”，初不必限于研究化学的人。一事之举，需才甚多，要各方面知道分工、知道互助，然后才能有成。而且各人要有自知之明，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则社会集众人之长，当然可产生狠好的事业。现在有许多人偏要用其所短，譬如章太炎先生本可以讲学的，他偏要谈政治；又如许多青年本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事，他偏要著几句新诗，看几篇哲学，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言参加文化运动。其实所为文化运动者，不专是读书人的事，建筑化学室之木匠，亦是一个文化运动家呀！

若是大家爱用其短，那便是社会集众人之短，安能产生狠好的结果？我常有一句话：“做我最好的。”我若是善于扫除厕所，我便愿终身当一个扫除厕所的人，不愿作一

个文化运动的人。

我去年接傅孟真君一信，他说他决定学自然科学，并劝我亦研究自然科学。我当时回答一信说："我到外国来，第一个进步，便是认识了一个[①]王光祈，我要用我之所长，不然我便对不住社会。"我若是作一个筹款建筑化学室的奔走者，其成绩一定高于自己作一个化学发明家，所以我虽不学化学，但是我狠可以"化学功臣"自许呀！

据此看来，要做一件事，需才如许之多，而且要各种人才都要一致进行，才有成效。那么，我们学会不过数十人，要成就一二件事，已经是狠不容易，那里还够得上说破裂呀。我以为他对于中国若是真正忠诚，他对于学会若是真正忠诚，他对于他自己若是真正忠诚，那么，这种纯洁活泼的青年团体都不加爱惜，都要想破裂，我请问他破裂后往那里去？

有人说我们会员个性太发达，为破裂之兆，其实个性发达正是学会的活气，只要他的个性发展，是向着有利于社会方面的，那么，虽是妨害我的个性，也无妨碍。再痛快说一句，假若是我们的仇敌，他的个性发展是与社会有利，我们都要让他，何况是我们生死患难之青年同志呀！

综吾此篇通信，大意如下：

（一）组织某种学术或某种事业研究会，可以参加非会员。

（二）用通信传观办法，以谋会员性格上之了解。

（三）北京会员专办对内会务。

（四）月刊改为分地分类编辑（另有详细办法）。

（五）组织国内旅行团，并赞成你所主张的年会。

（六）不必空标主义之名，而宜具体的描写各种组织。

（七）各人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列表亦可）。

（八）生活问题俟各会员之调查表办齐后，即就其所愿从事之生活为细详的规划。

（九）破裂不成题，各个忠诚会员莫忧破裂，只忧根本计划不立。

以上九条便是我对于会务的意见。我这封信到中国恐怕在五月中旬了，不久要开年会了，请你将我这九条意见，代我提出，我不另自写信了。祝你健康，为少年中国努力。

弟王光祈上言三月十二日自德国寄

写完此信后，我还想起一事，我是一个反对国家主义的人，我以为国家只是一种政治组织，可以随时取消的，不过国家主义虽不必主张，而民族主义却不可不提倡。我所

① 了一个：原误作"一个了"，据文意乙。

说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拿我们民族去侵略他人的民族，只是主张我们这种又勤又俭的民族、素有文化的民族，要在世界上谋一个安全的地位。我们若对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类，都不设法拯救，那便是我们对不住世界，对不住人类。我决定要标出“民族主义”四字来运动，因为我在外国受激刺太多了，外国人无论新旧，早把“劣等民族”四字头衔送我们了，但是我又相信我们勤俭智慧的民族，狠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朋友们！我们提倡民族主义呀！今年开会时，亦请你代我提出。光祈又及。

致恽代英书[①]

代英兄：你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我已拜读了。你主张“我们应该把谋生活赚钱与做事分成两橛，做一种的事谋生活赚钱，而就这所赚的钱，去创办自己的事”，换言之，你以谋生活赚钱为一个手段，而以创办自己理想事业为一个目的。这个自然算是一种方法，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许多青年朋友向着这一条路走。

不过是我们又有一部分朋友，抱着三句格言：

“要作我们愿作的工，要读我们愿读的书，要做我们愿做的事。”他们把这三句话看得一样重要，而且狠反对把手段与目的分作两回事。换言之，他们不愿意：

作我们不愿作的工，以为读书或做事的手段。

他们最恨的是“委曲求全，勉强迁就”八个大字。代英兄！你主张加入旧职业界，你也觉得有勉强迁就之感么？

我们在欧洲的朋友，有许多人怕将来生活犯这勉强迁就的毛病。但是世界上又没有一个人能饿起肚子讲学做事的，所以他们对于将来的生活，都有一个不必寄人篱下的解决法。现在他们一面拟研究高深学问，一面又拟学补皮鞋、做面包、喂蚕子、种菜蔬，将来回国后也是永远求学，永远作工。换言之，他们终身只是：

要读自己愿读的书，要作自己愿作的工。

他们决不愿因为“要做自己愿做的事”，遂不惜“去作自己不愿作的工”，你觉得他们这种主张合理么？

一个人的生活，最可怕的便是寄人篱下，为他人作嫁衣裳。我过去的生活，亦常领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21年3月12日，发表于1921年12月10日《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

略寄人篱下的风味，我在七年前曾有一首寄内的诗，读之便可以知道我的精神痛苦了。

> 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敢夸秋思如明月，错把春愁诉夕晖。天上浮云终有变，客中残梦不须归。断蓬身世无消息，摇落江头雁又飞。

我因为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主张个人生活应该自己有一种解决方法，不必依傍一切旧职业界。即或有时偶与旧职业界为缘，亦以这种旧职业界的事务，与我理想目的相合，故我与旧职业为缘，是实行我的理想目的，而不专是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若是旧职业界中终无实行我们理想的机会，则只有长揖而去，不必再与周旋，还是从事我们补皮鞋、卖面包的生涯，不必丝毫委曲求全，不必丝毫勉强迁就。

至于欲办我们的理想事业，当然是非钱不行，但是若无适当机会，我们宁肯不办，与其"作我们不愿作的工，去赚钱办我们理想的事业"，不如"作我们愿作的工，以作一个理想的工人"。总之，我们把"要作我们愿作的工，要读我们愿读的书，要做我们愿做的事"三句话看得一样重要，决不愿因为要达其中一句的目的，遂不惜将其他二句或一句的中间，加上一个"不"字，成就了一个"不愿的"。

我对于你的文中所批评的工读运动，与脱离家庭二事，亦有一点意见。近来工读主义盛行，但是真能忠于工读主义的人，无论国内国外都不多见。北京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之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今年《星期评论》的劳动纪念号，存统君著了一篇《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的长文，说我太相信自己的理想，将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又说感情不洽，决不是失败的真因。但是那篇文章的末尾，被秀松君跋了一段，兹将跋语抄录如下：

"存统做好这篇文章，我拿来看一遍，大旨和我没有不同。不过他说感情不洽，不是失败的真因一句话，似乎对于我们工读互助团的真情有点不符，我们团员感情既然不洽，所以（一）工作不尽力；（二）不肯协力商量办法；（三）消费的不当。有这三个现象，对于团体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都受狠大的影响，所以团员不是自由结合，以致感情不洽，也是这次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秀松、存统两君都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团员，据秀松君的跋语，还是归结到我所说的"人的问题"上。

有许多人以为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在现代资本制度之下，是绝对不行的。这句话在欧美大资本制度之国家中或系如此，但是亦系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此系我数月来在欧洲所考察之结果，理由甚长，容缓再说），若在中国更说不上受大资本家的压迫，以致工读互助团竟无成立的可能。我敢说我只要有大洋十元，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生活，这不是理想，这是我曾经经过的事实。我民国二年从家里起身，只有钱二千

文（只合大洋一元半），到了泸州只剩二百文，后来展转到了北京只有旅费六元，到了青岛只有旅费四元半，到了上海只有旅费五角。我在北京曾经用过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其时我已能每月得薪三十元，不过我欲训炼（练）俭朴生活，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之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似系高粱所做），半个铜元的小米粥，半个铜元的小菜，每日吃得甚饱。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以上系就消费而言。若以生产而论，无论从事贩卖、从事手工，每日购得铜元数枚，亦系极寻常之事。故我觉得个人生活简直不成问题，从前寄人篱下之办法是根本错误，我现在更觉得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我们的舞台，只要有两只手、两只足，不是聋子、不是瞎子必不会发生生活问题。其所以发生生活问题，都是自己懒惰；其所以不敢到世界各处奔走，都是自己胆怯。我既有这种信仰，所以我觉得在北京组织工读互助团是一件可能的事，后来工读互助团得各方面的同情，居然组织成立。我因为赴欧留学匆匆出京，在上海的时候，屡接北京来信，知道第一组和第二组形势不佳。其原因甚为复杂，或由于感情不洽，或由于经济破产，而经济破产之原因，又多由于团员不肯努力或和衷共济之故，故我遂敢断定此次之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

最近在欧洲接阅《北京晨报》，知女子工读互助团（大约系当时的第三组）现尚存在，第四组所办之食劳轩，亦仍继续营业。虽他们现在的内容如何？办法如何？我远在国外，不能预揣，然较之第一、第二两组则已略胜一筹。当时工读互助团所筹之款，约有千余元，大概都用在第一、第二两组，而第一、第二两组反首先失败。第三组是女子高师几位同志出来组织的，第四组是高等法文专修馆几个同志自由出资组织的，较之第一、第二两组，办理得法，维持较久，我于此得着一个教训：

（一）用公共的钱办事往往不如用自己的钱办事较有成绩，如第一、二组与三、四组是。

（二）需要愈急切者则其成绩较佳。第一、二组之团员，大半以此种团体聊作试验工读主义之工具，成功固佳，失败亦无大害。换言之，对于工读互助团尚不极感需要。至于女子工读互助团，则因现在女子受黑暗势力的压迫较男子为烈，往往牺牲性命而不辞，故对于工读互助团之需要，较男子为急切。此所以女子工读互助团之成绩，较第一、二组为佳。

照这样看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二组之失败，完全是团员的问题，而且是属于团员的心理问题，所以不能借经济压迫、能力不足等等理由以自解。

近来文化运动，有许多青年受其感化，亟谋脱离家庭，然社会黑暗实较家庭为甚，故不能不组织互助团体，以图自卫。一面反对腐败之家庭，一面抵抗黑暗之社会，此亦

为组织工读互团动机之一。代英兄！你主张能力未充以前，须委曲求全于家庭，不可轻易脱离。这是我们两个见解不同的地方。我上面说过，我们最反对的便是委曲求全，因为委曲求全是消磨少年精神惟一的利器，是养成民族委靡一重要的原因，在能力未充以前脱离家庭，正好磨练其治事能力，助长其嫉恶心理。若在能力既充以后，即或脱离家庭，已无多大意义。

北京工读互助团对于脱离家庭之青年，予以相当后盾，虽为发起动机之一，然亦未尝积极的劝人脱离家庭。当第一组成立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议，应如何脱离家庭、废除姓氏，及团员所有私财应如何共产，种种彻底之主张。我当时曾劝他们不必如此，我们只要在团中，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必倚赖家庭之供给罢了，又何必定要做出形式上之脱离家庭、废除姓氏及团员所有私财均作共产等等花头。他们那时狠有笑我不彻底的样子，其实中国人的毛病，便是说得狠凶，其实做起来，又往往不能言行一致。

你的文章内，引团员孟雄君的一段话："我在这里忠告我们青年们，自己慎重点，社会的黑暗比家庭更黑暗呢，不要听文化运动功臣们的门面话，自己没有本领，只管蓄本领去，不要上当呢。"你以为孟雄君是身受其害的人，其实孟雄君早在北京闲居，闻工读互助团发起后，即顺便报名加人，并非受工读互助团之勾引，始脱离家庭前来北京的。至于后来他们自己会议，决定脱离家庭种种主张，更与发起人无干，更无所谓"上当"。

发起人对于工读互助团的尽力，只是筹措了一千余元，捐赠了一点书物，代租房子，代向北大办理免费交涉。对于该团的主张，只是希望他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半工半读、实行互助，此外所有一切进行，均由团员自决，即介绍团员，亦由该团自行开会审查。故团体之失败，须怪自己不努力，不宜怪发起人之引诱。存统君有一句话说得好："工读互助团是团员的工读互助团，不是发起人的工读互助团。"故工读互助团之失败，只能怪团员的自身。

本来有勇气脱离旧家庭的青年，有胆量征服恶社会的志士，便早应该自己出来组织团体，以与家庭社会宣战，不应该让一般自己不作团员之发起人出来发起，这是工读互助团的先天弱点，也是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近来上海亦有沪滨工读互助团之组织，我总希望他们不要受同样的失败，至于我呢，更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决不因此次失败而丧气。

日来德国天气大寒，连日下雪，武昌如何？念念。武昌之黄鹤楼、抱冰堂常常都印在我的脑中，何时有暇，再来一游，与兄把晤。专此即颂
康健。

弟王光祈自德国佛郎克寄 十二月十日

启天、景陶两兄同此。

对今年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①]

（一）按照会员终身学术、终身事业表，速组织某项学术、某项事业研究会，参加非会员。

（二）将月刊改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三种专门性质之杂志，仍用月刊名义，每年仍出十二期。惟每期皆出特刊号，三种各出四次，每次卷面上标明某某特刊号（如自然科学特刊号之类），三种编辑由各地会员分任。每次特刊号之后，附列“创造少年中国问题”——包含社会问题、修养问题等项文字——及“学会消息”两栏，由上海编辑。

（三）学会不标某种主义之笼统名称，而对于将来之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其进行步骤、运动方法，皆加以极具体之描写。如果此种具体描写之组织及方法已为同人所赞成，将来即以此种组织及方法作为本会对于某项事业进行之方针，换言之即本会主义。

（四）本会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今年大会时须加以极明确之规定，倘有违背此项精神者，即作为违背学会宗旨，请其出会。

（五）除讨论学问之通信在月刊发表外，所有关于讨论会务及个人生活之通信，由执行部收集编订成册，寄与各处会员传观。传观路线，先国内，后日本、美国、欧洲、南洋，仍寄回执行部保存。

（六）会员出国者日众，国内会员又复散居各地，故最近四年内之会务，只希望下列六种：

（甲）整顿少年中国月刊。

（乙）编辑丛书。

（丙）组织学术或事业研究会。

（丁）力谋会员间之相互了解，如传观通信之类（此事由执行部以全力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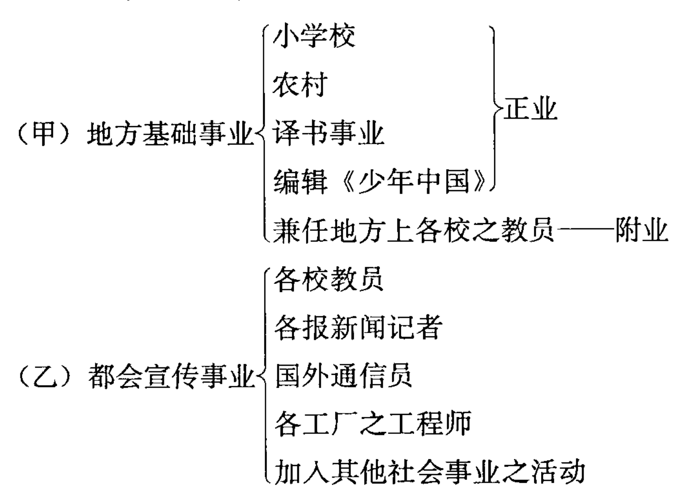
（戊）扩充国外通信事业之类（如通信社及私人特约通信之类，由国外同人以全力进行）。

---

① 本文写于 1921 年 4 月，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

（己）介绍会员（由评议部以全力注意此事）。

（七）四年之后，本会事业分二种：



（说明）甲项事业为少年中国之基础，其精神全在由于自办，其地点以湖南或安徽江北为善，因须具备三条件（1）民风淳朴而刚健，聪慧尚居其次；（2）交通便利然后始可影响他处；（3）地方须稍有风景可玩，否则过于干燥不耐久居。

先办一半工半读之小学校，并租田十余亩为自耕之计，收入不敷，即以译书或任他校教员为补助。

小学校三年之后，即扩充为中学校，又四年之后，即扩充为大学。同时筹办工厂，大学生仍是半工半读。

农事若有进步即扩充为新农村。

《少年中国》月刊即在此地编辑，此地即作为学会永久通信之地点，亦即本会之大本营，全会目光均应注意此处。

大本营既立，然后多多物色本地同志，进而为改造全省之计划，我们至少每年要拿一两个会员巡视各县。

只要把一省办好，便可以立国，其余各省但求其同情可也。一年之内，改造省城空气；三年之内，改造全省空气；十年之内基础已立，再进而改造中国。

我们会员中愿从事甲种事业的，大约至多不过十余人，但是若此十余人始终不懈，必可达到目的。

我愿当一位管理小学校庶务及农场经理，与各县巡视其他十之七八之会员，大概都是乙种事业人才。乙种事业之精神在会员投身于一切已成熟之社会事业，改造他们内部的空气，战而不胜，即退回大本营，徐图再举。

甲乙两项事业之会员，可以随时调换，否则每年亦须给甲项会员以旅行各地名胜之

假期，以资休息。

甲项事业是利在人才集中，乙项事业是利在分布得宽，两者均不可偏废。

今年大会须制定四年内及四年后之事业计划书，由会员分头任定，或为甲，或为乙，然后彼此又专从实行上计划。

若不注重地方基础事业，则我们的改造必与戊戌[①]、辛亥一样，或者还不及。

上海办日报之事，非俟地方基础事业稳固后，不可轻易实行，至多亦只能先发行一种周刊。

少年中国于四十年之内必可出现，诸兄不要嫌日子长，就是五十年亦值得值得。

我所知道的安斯坦[②]

以不懂相对论的人，为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作传，这是何等困难的事！但是相对论的原理我虽不狠了解，而安斯坦的生平我却知道一点。好在我的朋友魏时珍已经把相对论详详细细的在前面介绍了。我现在只谈谈安斯坦的生平，作成这篇《我所知道的安斯坦》。

阿尔伯（名）安斯坦（姓）（Albert Einstein）是一位犹太人。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生于南德意志的乌尔模（Ulm）地方（乌尔模属于德意志联邦中之 Württenberg 邦，为德意志要塞之一），所以世人把他算作德国人。后来他移居瑞士，成了瑞士市民，所以又有人把他算作瑞士人。在欧洲的犹太人因他们民族环境的关系，大概都是抱国际主义的。尤以我们这位安斯坦先生对于这种国籍问题，更丝毫不加注意。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跑到这个小小的地球以外去了。

安斯坦诞生后不久，他的父母便由乌尔模搬到门兴（München，属于德意志联邦中之巴燕）。我们这位学者的少年黄金时代，便在那儿度过了。到了十五岁，遂赴瑞士留学，进阿老（Aarau）地方（属瑞士）的中学校，与楚里徐（Zürich）地方（属瑞士）

① 戊戌：即戊戌变法，发生于1898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又称百日维新。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变法失败。

② 安斯坦：即爱因斯坦。本文写于1921年9月22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七期。

艺学校。他的数学、物理便在那儿学的。他对于相对论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便起首研究了，而且从那时起，便没有一刻工夫把这个问题放下。但是他的思想虽如此深锐，他的胆量虽如此宏大，然而他的表面上却是深藏不露。不但一般同学瞧不起他，便是一般教员亦不了解他。当时安斯坦有一位教员叫做明可夫斯几（Minkowski）的，后来成了相对论学者中的健将，但是他当时对于安斯坦之为人，亦忽略过去。当安斯坦名震世界的时候，明可夫斯几曾有一次用着诙谐口吻，向波尔（Bolrn）君说道："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安斯坦，我觉得他在楚里徐的时候，并不懂什么。"照此看来，安斯坦少年时，是一个何等诚实好学的学生！

一九〇二年，安斯坦由工艺学校毕业了。他便在摆耳 Bern（瑞士地名）专利局中，充当一位工程师，担任考察估量专利品的职务，每月所得薪水甚少。但是在这种冷淡生涯中，他对于"分子物理学的基础问题"之第一次大工作，便成功了。世人对于安斯坦差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位相对论的创造者，其实安斯坦于物理学上还有狠多贡献。譬如他第一次大工作里，关于"薄浪运动"（Brownsche Bewegung）的，便是现今物理化学界所盛行的"原子新论"之先河。

一九〇五年安斯坦在一个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相对论》，范围虽小而内容甚富。同时他又致力于"勃朗克分量论"（Plancksche Quantentheorie）与"光量"（Lichtquanten）之定律，为后来物理化学界所奉为圭臬的。安斯坦有一次曾经向乃木儿（Lämmel）说道，当他研究"特殊相对论"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屋子内跑来跑去，整整跑了一个月。并且常常自己问自己道："究竟在什么地方，藏着一点东西？"（Wo steck hier etwas?）"究竟是什么东西，藏在后头？"（Was steckt überhaupt dahinter?）我们这位跑来跑去的安斯坦先生，天天想，天天问，终被他想穿了，回答出来了。从前奈端发明地心摄力时，是卧在一根苹果树下，安斯坦发明"特殊相对论"时，却在屋内乱跑，他们两人这种卧法与跑法，真是有趣！

一九〇八年自然研究会（Naturforscherversammlung）在奥大利的萨尔池堡（Salzburg）开会，安斯坦的学说第一次成为物理界中的中心论点。一九〇九年安斯坦被聘为楚里徐大学的特别教授，一九一一年到奥大利之卜鲁改（Prag）充当总教授，但是一九一二年又依然回到楚里徐了。

安斯坦与德国物理学者泰斗勃朗克（Planck）不但是在科学界共同工作，而且是狠亲密的朋友。所有勃朗克与其他柏林物理学者，都想将安斯坦收为己有，以张其军。一九一四年安斯坦移居柏林，继 Van't Hoff 之后，担任普鲁士大学教授，同时并担任威廉皇帝物理学会之会长。

一九一五年安斯坦的"普遍相对论"发表了。当他研究"普遍相对论"的时候，谢

绝一切，专心一意，从事他那种不朽的工作。有一位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所买费儿提（Sommerfeld）写了一封信与他，直到数月之后，他将“普遍相对论”完成了，他才回信。那封回信上说道：“朋友！你不要多心，我今天才回你的信。在这最后一月之中，是我生平最受刺激，最为努力的时候，亦是我最成功的时代，所以我当时不能用思想与你写信。我知道我从前所用的地心摄力之‘区分方程式’（Feldgleichungen der Gravitation），是完全不可靠的，并且知道只有附着李莽之‘普通苦瓦里冷理论’（Allgemeine Kovariantentheorie Riemanns）始能得满意之解决，可惜这种谬误我已在大学著述中把他弄成大错了！”后来所买费儿提又去信反对安斯坦的“普遍相对论”，安斯坦又回信说道：“假如你已经研究过‘普遍相对论’，你一定相信是对的，所以我也用不着辩护。”但是“普遍相对论”虽发表了，而安斯坦却亦劳心过度大病而特病了。

因为战争的关系，民族间生了许多隔阂，致使安斯坦不能亲身参加“日蚀远征队”以试验他的理论。但是当时波尔君曾问安斯坦道：“假如实验不合，君将如何？”安斯坦用一种狠镇静的态度答道：“那就奇怪了！”（Da würde ich mich sehr wundern。）足见安斯坦自信之强，后来实验结果，安斯坦果然大奏凯歌。

安斯坦的相对论既奏凯歌，科学界遂另开一新纪元。于是一般崇拜安斯坦的学者，遂恭维安斯坦是哥白尼是奈端，因此又激起一种反感。本来安斯坦相对论在德国科学界中，可分三派。第一派研究数理的人，大半都赞成相对论。大凡研究数理的多注重理论，而研究物理的则偏重实验。相对论系用高深的数理来证明，在理论上非常圆，所以一般研究数理的学者大半赞成相对论。第二派研究物理的人有一部分颇反对相对论。研究物理的人既偏重实验，对于高深数理遂不甚注意。故一部分德国物理学者对于相对论之数理既不能领略，因而对于相对论遂大加攻击。第三派是折衷派。说相对论在数理上是狠圆满的，而在物理上则不必尽合。因为数理是“非矛盾律”，而物理则为“因果律”。相对论之理诚不反乎“非矛盾律”，而于“因果律”则不无忽略之处。德国学者对于相对论既分三派，故崇拜安斯坦的固多，而反对安斯坦的却亦不少。今见崇拜者过于恭维，遂引起反动。去年柏林方面曾开一个“救济德国纯粹科学大会”，专用来反对安斯坦的。先期遍发通知，请了许多大学教授和博士，安斯坦亦是其中被请的一位。当开会攻击的时候，安斯坦和他的女儿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笑容可掬的敬听他们大骂。是日开会来宾甚多。首由费伦（Wehland）君演说，痛诋相对论是安斯坦的空想，而德国人尚有崇拜他的，可为德国科学界前途一哭，费君并举自己所著反对相对论之书籍，请到会者购阅，以便共辟邪说云云。其次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格尔凯（Gehrcke）教授演说，则谓安斯坦之相对论出版后，曾自行修改数次，可见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而且相对论之说，在一九〇一年，已有匈牙利人发明，安斯坦实非首创者云云。再其次又有人拿

自己曾经实验的像片，以证明安斯坦学说之无稽。是日之会攻击的虽狠利害，但是安斯坦的态度仍是狠安闲的。只是后来座中有两位暴徒，大骂“我们非痛惩这位犹太人不可”。安斯坦始稍露不豫之色而去。

安斯坦本系柏林大学教授，因此颇抱不安，便有出国远游之志。瑞士大学闻之，即拍电相邀。后来有几位德国最著名的学者，在报上发表论文，痛诋当日开会情形，并极力安慰安斯坦幸勿介意。同时德国教育总长亦致函安斯坦劝其勿萌去志，并谓吾德科学界，全靠诸君维持云云。但是慰留者虽备极殷勤，而反对者却日趋激烈，安斯坦遂决计赴美一游，暂避其锋。

去年美国大学曾赠安斯坦以名誉大学教授的头衔，对于安斯坦之倾慕，可想而知。今年安斯坦到美讲演，备受欢迎。但是安斯坦由美到英，有一英人问他：“美国人懂得相对论的有多少?”安斯坦答道：“一个，也许两个。”（事见伦敦的 The Nation 周刊。）

安斯坦今年重返欧洲，经过伦敦，尤为英国人士所推重。英人海尔打里（Lord Haldane）在欢迎安斯坦之开会词中，曾谓吾人今日感谢德国之产生安斯坦，亦犹昔日德人感谢英国之产生奈端云云。安斯坦亦于是日参谒奈端之墓，一般人士传为佳话。

安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著作，多在杂志上发表，其成书的，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一本薄薄的通俗相对论。此外其他学者关于相对论之著作甚多，而且完善精美的亦颇不少。于此我们可见欧洲的大学者自己并不必多著文章，而在他方面又可见欧洲学者间之互助了。兹将安斯坦关于相对论之著作，抄录如下：

（一）Zur Elektrodynamik bewegter Körper（见一九〇五年《物理学杂志》卷十七）

（二）Ist die Trägheit eines Körpers von seinem Energieinhalt abhängig?（见一九〇五年《物理学杂志》卷十七）

（三）Über den Einfluss der Schwerkraft auf die Ausbreitung des Lichtes（见一九一一年《物理学杂志》卷三十五）

（四）Die Grundlage der allgemeinen Relativitätstheorie（见一九一六年《物理学杂志》卷四十九）

（五）Hamiltonsches Prinzip und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见一九一六年普鲁士大学科学会之会议报告）

（六）Kosmologische Betrachtungen zur allgemeinen Relativitätstheorie（见一九一七年普鲁士大学科学会之会议报告）

（七）Spielen Gravitationsfelder im Aufban der materiellen Elementarteilchen eine wesentliche Rolle?（见一九一九年普鲁士大学科学会之会议报告）

（八）Über die spezielle und die allgemeine Relativitätheorie（此为安斯坦所著关于

相对论之通俗单行本，已为夏元瑮君所译，题为《安斯坦相对论浅释》，见《改造》第三卷第八期）

安斯坦于学术之外，并极留心社会问题。第一，一九一四年九十三个德国学者为德国辩护的宣言他未曾签名。第二，他曾同 Prof. Nicolai 与 Prof. W. Forster 草一主张公道的宣言而未果发表。第三，他在战争时曾与国内外同志为和平之运动。第四，巴黎罢尔比斯（Barbusse）等所组织之“光明社”（Clarté），他亦已参加。第五，他今年赴美一部分是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设大学，筹备基金。

安斯坦人极温和谦抑，没有德国学者硬起腰杆，挺起胸口的样子。故一般人都说他不像是在威廉皇帝陛下所养成之学者。读者诸君不信，请看本刊所载安斯坦先生最近的像片，便知道了。

安斯坦现住柏林，其地址如下：

Herr Prof A.　Einstein

Haberland Str. 5

Berlin W.　30

Deutschland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自德国佛兰克寄

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①]

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学会之所以发生——学会之分子及事业——会员对于政治活动之态度——学会与政党之别——何谓与政党接近——学会主义问题——我对于学会之希望——总投票

今年七月一日，本会在南京开第二周年大会，光祈以远隔重洋，未能参与，望风遥祝，不禁神驰。近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得知此次开会情形，虽当时到会人数不及全会人数三分之一，而一种拥护自己主张之精神，则跃然纸上。中国人第一可怕者，即是无主张，凡事取旁观态度；第二可怕者，即是有主张而不肯公开，务使旁人猜

① 本文于 1921 年 10 月自德国寄回，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

度，一则可以博得“莫测高深”之名，二则又有随时暗中更改之妙；第三可怕者，即是主张虽已公开，而又不能始终贯彻。此次南京大会，将上述三种“可怕”，皆一扫而空之，此诚可喜之现象也。虽然此次南京大会各项议决，颇有令人难安之处，尤以扩充本会根本主张之“社会活动”，而解释为包含“政治活动”一项，为学会生死存亡问题，是不可以不辩。好在此次议决，不过系国内一部分会员之意见，无拘束全会之效力，所有本会大部分在国外留学之会员，当然尚有切实讨论之机会也。

（一）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

此次南京大会所提出之问题虽多，然可以用两言括之，即学会对于会员之行动，采一种干涉主义乎？抑采一种放任主义乎？或兼采两种主义，而规定某种行动应干涉，或某种行动应放任乎？若采第三说，则规定各种行动，孰应干涉，孰应放任之标准何在？

持干涉说者（按所谓持某某说者，不专指此次南京大会同人之主张，系兼指光祈平日所闻于国内外会员之言论）以为吾会含有学术、事业、修养三种性质，分子与分子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社会对于吾辈，亦以特别眼光相待，一人堕名，全体受害，故主张严格干涉。于是恋爱问题干涉，个人生活问题干涉，宗教信仰问题干涉。然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环境情形，尤难一致，甲是乙非，各执一理，当此种新旧道德交替之时，此种情形，尤为屡见。试问世界上安有一个团体，其所有分子之行动——皆合吾个人之意者？果如持干涉说者所云，则吾会八十个会员，势将成立八十个团体，然吾犹惧其不相容，因一人之思想行为，亦往往有前后不能一致之感也。故持干涉说者，其意固佳，而事实上实为不可能。

反之，持放任说者，以为团体不宜干涉分子过甚，否则将有破裂之虞，故主张将团体中前此所有共同之点，皆使其逐渐减少取消。于是有所谓最低限度说、放任政治活动说、“兼差”“多爱”说、专门研究学术说。然而世界上绝无一个团体，其所标宗旨大而无当，其分子关系泛而不深，而能大有为于社会者，故持放任说者，是解散学会之别名也。

由干涉之说，是无异使吾会终日纷扰，全会不安；由放任之说，又无异使吾会精神消失，渐就泉壤，要皆自杀之道也。吾以为吾辈之所以结合者在宗旨，宗旨丧失，则结合瓦解。故会员对于学会宗旨，须无条件的遵守；学会对于会员妨害宗旨之行动，须无条件的干涉。反之，会员不妨害宗旨之个人行动，则完全放任，因此可得下列两大原则：

（一）凡学会所标之宗旨信条，为学会根本精神之所寄者，绝对的采干涉主义；

（二）凡个人行为不妨害学会宗旨及信条者，采相对的放任主义。

何谓学会宗旨？即“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是也。本会发起时，宗旨原文为“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后开成立大会时，始改今文，词句虽异而意义则同。现在所谓“社会的活动”者，即从前所谓“发展社会事业”也，就此一语而论，在积极方面，则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在消极方面，则反对政治活动。当时北京同人曾有一次复上海同人函中，对于政治活动一层略含放任个人之意，旋得巴黎同人九月廿七日公函，严词责备，认为破坏学会根本精神，反复申论，词旨痛切。自此以后，会中舆论，翕然从之，所谓反对政治活动者，遂成为会中之不成文宪法。两年以来，吾会同人对外宣传，对内团结，皆以“反对政治活动”一语为其旗帜，试按两年来本会两种月刊上所发表之文字，对于此义，反复申明者已不止数次矣。

何谓学会信条？即“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是也。吾人以为欲实行本会宗旨，非具备此四种性格不可。换言之，学会宗旨者，吾人所用以改造中国之必要方法也；学会信条者，所用以实行学会宗旨之必需性格也。故会员对于此宗旨与信条，如有怀疑者，只有两种办法：（一）解散旧宗旨之学会而另组新宗旨之其他学会；（二）否则即该会员自行退出学会。盖学会之改变宗旨，犹个人之断绝生命，不存则亡，不死则生，断无半存半亡、半死半生之理。故学会苟一日尚未断绝生命之时，对于违背宗旨及信条之会员，只有采取严格的干涉主义，无所用其姑息也。

何谓不妨害学会宗旨及信条之个人行为？如恋爱问题、个人生活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等是也。民国七年光祈被推为草拟规约职员时，即主张专重宗旨及信条两种，而对于个人行为则主张放任，至多只能由私人加以友谊的劝告。当时发起人中颇有以此说为不然者，主张列举各种不道德之行为，一如“进德会”之所规定，光祈极端反对，曾为此事在岳云别墅会议时辩论三日，结果光祈之议通过。规定其文曰：凡会员行为有妨害学业及健康者，会员有互助劝告之义务云云。迨至民国八年开成立会时，重修规约，又将此文改为现行规约第十四条，有嫖赌或其他不道德之行为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书云云。夫嫖赌之有妨学业与健康，已尽人皆知，至于所谓不道德行为之解释，亦颇有伸缩之余地。总之，此种规定之精神，即全在学会对于个人行为，只取一种相对的放任主义也，若会员人格上有重大污点，如卖国欺友之类，则按照规约第十五条四项，可以由本会宣告除名。盖本会规约第十四条之所谓“嫖赌或其他不道德之行为”与第十五条之所谓“人格上有重大污点”其意义截然为二。换言之，私德与公义两者而已。

从前会中少数同志，往往存一“集一批好人，做一点好事”之心理，故每视“人的问题”重于“宗旨问题”，因而分子稍杂，遂不免流于失望。现在吾会须由“人的问题”

进而为“宗旨问题”，以此宗旨与全国青年相周旋，合则留不合则去。所谓宗旨者何？即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是也。

（二）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吾国近三十年来之改革运动，在历史上可称道者有三：一曰戊戌变政；二曰辛亥革命；三曰新文化运动。戊戌、辛亥两次之改革运动，其形式虽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则皆为政治改革。换言之，即如何将政权夺到手中，然后利用政治权力，以实行其大规模之改革是也。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两种根本观念：（一）欲改革社会非取途于政治不可；（二）官僚万能。由前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政治运动，由后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贤人政治。故当时党人所攻击者为满清政府，所欲得者为政治权力，所醉心者为日本维新，所从事者为军事政治，三十年来党人之思想及行为不过如是而已。然而今日则何如？夫得志后之进步、国民两党党人，其明争暗夺、贪赃枉法、眼光短小、举动乖张，原不足有为。然吾人此时对于彼辈之政治节操，姑且不论，今所欲讨论者即彼辈所主张之政治改革，在今日麻木之中国，与夫国际变幻之时局，能否达到目的是也，吾对于政治改革有五大疑问：（一）主张政治改革者以政权为改革中国之手段。试问以何方法得此政权？若政权一日不得，或旋得旋失，试问于此期中，是否有因手段（即政权）而坐失目的（即改革中国）之虞？且大半生光阴消磨于争夺政权之中是否有手抚髀肉之感？（二）即使获得政权矣，试问用何势力以拥护其政权？如进步党昔日利用北洋系势力乎？国民党昔日之利用陆荣廷势力乎？抑如安福部之利用日本势力乎？各种特殊势力既不可靠，势非有正当之阶级势力不可，然而今日中国所谓阶级者何在？（三）即便政权能拥护矣，以中国幅员之大，民俗之蔽，有何方法而厉行其改革之政策？近代日本、德国能收政治改革之效者，以其幅员小而易普及也。若俄国则不然，前有彼得大帝之厉行政治改革，今有列宁政府之实行社会主义，然而俄国农民生活，并不因之大有改善。今日之所已改善者，皆昔日脱尔斯泰与俄国大学生实行社会改革之赐也，故列宁近来颇叹预备工夫不足。此大国不易实行政治改革之证也。（四）即使政策能厉行矣，试问此种由上而下之改革，是否适于时代精神？换言之，所谓贤人政治者，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有无存在之价值是也。（五）即使适于时代精神矣，试问于此列强虎视眈眈之中国，是否容吾人有此强有力之政府？今日列强对于号令不出都门之北京政府，固有所不愿，然而真有一个统治全国厉行改革之政府，当亦非列强所愿也。盖中国者列强之鱼肉也，中国起而列强危矣，此所以今日之欧洲犹有人津津乐道“黄祸”二字也。主张政治改革者之效果，

吾国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无得见天日矣。忽而世界潮流陡转，国内舆论一变，有识之士莫不群相告曰：昔日各党所抱政治改革之理想，至今日可谓破产殆尽矣，吾人不能再以毕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阴，为争夺政权而谋改革中国之用，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吾数年前更常为极端之言曰：与其作教育总长不如作小学教师，与其作农商总长不如作种树园丁。盖作一小学教师，则吾所教育之数十儿童，吾真能将彼辈一一造为有用之人才；作一种树园丁，则吾所栽种之千百树木，吾真能使其开花结果。而今日之教育与农商总长则未有如此效果也。舆论既趋于社会改革，而一般有志青年，对于政治活动遂群起贱之，三年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即由政治改革而进为社会改革之一种表现也，果能循此以进，努力奋发，民族清明之气，不难计日而复。曾几何时，一般参与新文化运动之青年，乃将三十年来之教训，尽行忘去；所有新文化运动精髓之社会改革，一笔推翻；所有从前政党之迷路，皆一一照旧再走；所有中国一线生机，遂从兹断绝。呜呼！以胡适之先生之不否认现代政治组织，犹且宣言二十年内不作政治活动，而今日提供社会主义之青年，乃主张加入旧政界，此诚可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矣。或曰：吾之主张加入旧政界者，正所以求实现吾之主义也，但使有益于民，于义何伤？虽然，吾对于此种辩护，吾不愿驳，吾但举一例：昔日马克斯[①]穷居伦敦，反对德国政府，其时铁血宰相卑士麦[②]执政，厉行社会政策，以缓和阶级战争。夫社会政策，固系一种残羹冷炙之慈善行为，然对于当时之工人境遇，何常无益？使马克斯亦假加入政界实现主义改良工人境遇之说，则马克斯何妨回国加入政界，以改良工人待遇？想亦卑士麦所极端欢迎者也，然而马克斯不为也。观此则知凡抱有一定主义之人，于其主张范围之外，坏事固不能做，即好事亦不能做也。以上系就抱有一定主义而加入政界者而言。若无一定主义，无一定后援，徒抱一种空空洞洞之理想或计划，而遂贸然加入政界，则其失败，更不卜可知矣。总之，三十年来所得之教训，吾辈必珍之贵之。从前是政治改革之失败，今日是社会改革之代兴，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在此，新文化运动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亦在此，所以吾辈必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

---

① 马克斯：即马克思。

② 卑士麦：即卑斯麦。

（三）学会之所以发生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般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学会发起之次年，有五四之役，于是社会改革之说，更如日之在天，而学会亦于此时谬得社会之同情矣。故有人谓学会系建树在盲目热忱上而无一定目的者，非实语也。盖社会改革者即学会之目的也，学会根本之精神既在社会改革，因欲贯彻社会改革之宗旨，遂不能不反对政治活动。然吾会之反对政治活动，有时不免引起社会误会，其误点有二：第一，视吾会之反对政治活动，系标榜清流，此实大误。清流者不负责任之别名也，旁观者之态度也，吾辈血热心雄之青年，何能出此？吾尝谓中国恶人能团结、能奋斗，而善人则否，凡事以退为主，因之少数人横行，多数人屈服。吾辈正应一破旧例投身地狱，与彼辈恶魔相斗，何忍独标清流，立于旁观。至于吾辈之所以反对政治活动者，盖欲精神集中于社会事业，既非独标清流，亦非怕人地狱，而系死守社会活动之范围，范围以外之活动，无论其有利无利皆在所不问。第二，视吾会之反对政治活动，系否认现代政治制度，亦为错误。吾会同志中诚然有一部分人反对现代政治制度，然而在革命时机未至以前，理想制度未立之际，对于现代政治制度，亦拟不加反对。即各政党合理之现代政治活动，亦不否认，惟吾辈自身死守社会活动之范围而已。要之，少年中国学会者，系表现由政治改革进而为社会改革之精神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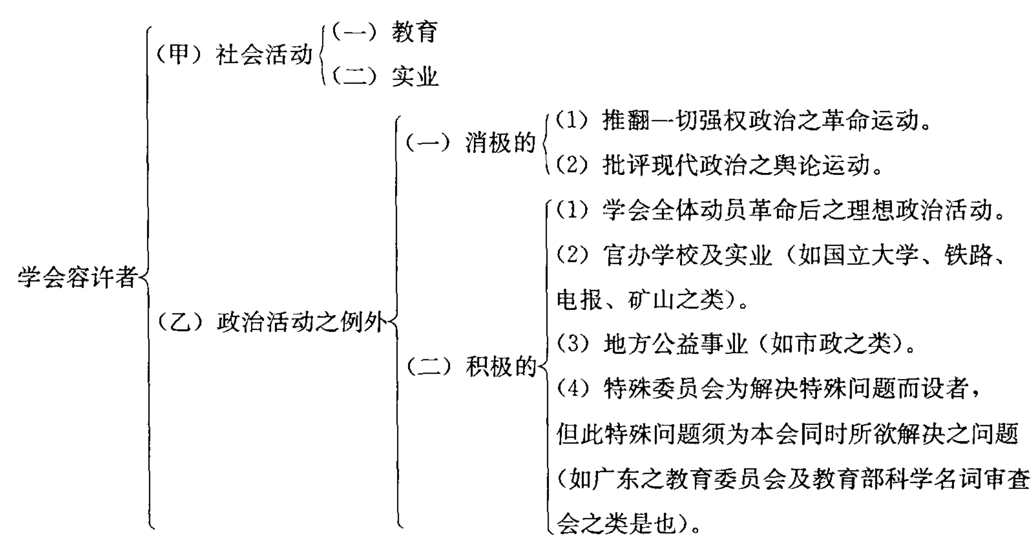
（四）学会之分子及事业

学会既以社会改革为号召，故其所从事者为社会事业，社会事业者何？教育与实业是也。教育所以谋国人精神上之解放，实业所以谋国人物质上之解放。一方面吾人现在所从事之教育实业，为将来大规模改革时之预备工夫，他方面吾人又欲于此时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建筑在一个基础之上，以实现吾人理想之“工读社会”。故学会之性质，同时包含学术与事业两种，既不能将学会完全退在一个“学”字范围内，亦不能将学会之“学”字取消而专为事业团体。学会既含有两种性质，所以集合之分子

亦有两种：（一）有志学术之青年；（二）有志事业之青年。学者如学会之头脑，事业家如学会之手足，吾会学者之所以异于三十年来主张政治改革之学者，在一个“专”字；吾会事业家之所以异于三十年来主张政治改革之事业家，在一个“做”字。吾人本于学术，见诸事实，同时又以事实证诸学理，此吾会分子与事业之关系也。然于此发生一问题，即学者之职志在“求真”，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因其范围，直接仅影响于学理方面，间接仅影响于少数智识阶级；事业家之职志在“求效”，故不能随时变更主张，妨害进行，因其范围，直接影响于事业方面，间接影响于多数群众。因学者与事业家所处之地位不同，故有时向学者谈及主义，颇觉多事，而对于事业家谈及主义，则实感必要。将来吾会决定主义时，学者方面既对于主义无十分兴味，尽可自由放任决定权（其有兴味者，当然亦可自由参与决定），而事业家则有速求共同主义之必要（关于主义问题，俟本文第八段详论），此学者与事业家两部分会员不必强同之点也。惟学者与事业家对于决定主义之需要，虽各有不同，而对于学会之宗旨及信条，则应共同遵守。宗旨者何？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是也。换言之，只能从事社会活动，不能加入政治活动。

（五）会员对于政治活动之态度

吾上文已言会员只能从事社会活动，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然而社会活动之范围至广，而政治活动又常常与吾人生活发生关系，究竟两者之界限如何？吾人之从事职业其标准如何？兹为明白起见，先列一表如下：



学会不容者——政治活动 {(一) 官吏(自大总统以至于县署之秘书科长)
(二) 议员(自国会议员以至于县会议员)}

(说明一)此表系就光祈平日所闻于各会员之意汇合见而成者。

(说明二)吾会就原则上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然而表中何以有政治活动之例外一条?此则因为该条内所包之六项活动,皆与本会精神相合,本会精神为何?(1)反对一切强权;(2)从事社会事业。

(说明三)何以容许推翻一切强权政治之革命运动?本会精神既在反对一切强权,则凡为民主主义以及其他一切进化主义所引起之革命运动,吾人皆可参加,因为去一分强权,则人道便得一分光明也。

(说明四)何以容许批评现代政治之舆论运动?吾人既不否认各政党合理之现代政治活动,而吾人自身又不从事政治,吾人意见无从宣扬,故不能不容许批评现代政治之舆论运动。

(说明五)何以容许学会全体动员革命后之理想政治活动?果使本会全体动员从事革命,既革命矣,则吾人对于革命后之建设,便不能不积极负责;既负责矣,则一切活动凡能力所能及者皆担任之。

(说明六)何以容许官办学校及实业?官办学校及实业皆为本会所主张之社会事业,吾人不能因其含有官办性质而放弃。且铁路、电报在近世国家中,大半皆由国家管理,吾人断不能候至自己能修铁路、电报时,始容许会员从事铁路、电报也。

(说明七)何以容许地方公益事业?地方公益事业中如市政之类,亦为吾会所谓社会事业,不能因其含有官委性质而不容许也。

(说明八)何以容许特殊委员会?其理由与(说明六)及(说明七)相同。惟委员会性质复杂,易滋淆惑,故须加以限制,即此特殊问题须同时为本会所欲解决者也。

(说明九)何以不容许作官吏?本会反对政治活动已如上所述,并认为此种三五零星加入政界为有损无益,故断然不作官吏。譬如同一教育部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则容许,司长参事则不容许,盖科学名词审查会之职务,为本会同时所欲解决之特殊问题,而参事司长之职责则完全属于行政事务。此本会专重所办事实之对象,而不为区区名义所束缚之微意也。

(说明十)何以不容许作议员?(一)阶级未造成,则发言无力;(二)用金钱运动,丧失人格。故本会在阶级未造成以前,决不列席议会。

(说明十一)凡从事之事业为上列表中所未包括而发生疑问时,由本会评议部解释。

（六）学会与政党之别

吾会性质既包含学术与事业两种，而事业又限于社会活动，然此种团体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因之社会对于吾会之性质不免误解，或以吾会为东林复社，或以吾会为文坛诗会，更或以吾会为未来之政党，此大误也。吾会之不愿以消极的清流自命，更不愿踏无聊的文人恶习，已于前文言之，兹所欲辩者，即学会与政党之别。从前国中政党不知有所谓社会事业，终日所经营者只是一种毫无基础之政治生涯，昔吾常持二义以忠告当时所谓党人者流：（一）非有社会事业作基础，不能为有力之政治活动；（二）各政客自身非有一种关于社会事业之职业，政治永无清明之日。然而当时热中之党人，孰能受此迂远之忠告？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社会改革之呼声遍于国中，于是昔日政党之专以政治为生涯者，至是亦知兴学校、办实业、出丛书及从事其他种种社会事业。最近上海发生之某社，更以教育、实业二事为号召，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故专就社会事业一点而论，吾会与各政党毫无区别，吾会之所以异于政党者，即政党以社会事业为手段，以政治活动为目的，而吾会则直以社会事业为目的。换言之，政党兼营政治、社会两种事业，而吾会则专营社会事业；质言之，政党主张政治活动，而吾会则反对政治活动。

（七）何谓与政党接近

吾会虽不否认各政党合理之现代政治活动，然而吾辈自身决不愿与政党接近，此所谓士各有志，毋相强也。故吾会规约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皆明文规定：吾会会员不得与政党接近或加入政党。夫加入政党从事政治活动，显然违背本会宗旨，除请其尊重自己人格及学会宗旨退出本会外，别无办法。今所欲讨论者，即何谓与政党接近。吾上文曾言虽以万恶政府所办之学校，吾辈皆可担任教习；虽以资本家所办之工厂，吾辈皆可担任工程师。其故有二：（一）因其事业属于吾会之所谓社会事业；（二）凡吾国青年及工人足迹所到之地，吾会会员皆须追踪而至，然则区区政党所办之教育、实业，吾辈又何必畏惧而不敢与之接近乎？故凡政党所办之学校、工厂、报章、丛书，吾辈皆可参与，惟有下列两种情形，则以与政党接近论：（一）有条件之参与，即参与政党之事业时，先与政党约束如何为政党鼓吹，如何为政党尽力是也；（二）无条件之资助，即受政党

之经济援助，而又不出劳力（如通信、译书等等劳力之类）以相偿，如资助留学之类是也。总之，若欲规定一种接近政党之详细条文，此实为不可能之事，吾所希望者，即凡我会员抱定本会宗旨，自重人格，精白乃心。当此举世廉耻道丧之时，收买盛行之日，非有一般清操亮节之士，安足以挽颓风而振末俗？此光祈之所欲陈于来日大难生死相结青年同志之前者也，且吾辈自身虽不参加政治活动，而对于从事政治活动者之人格并不否认，倘有会员以吾会所主张之社会活动为迂远不切事情，则请退出本会加入政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吾辈决不否认其人格。吾辈之所深恶痛绝者，即口是心非、无可无不可之态度。

（八）学会主义问题

吾上文曾言学会为有志学者与有志事业者之两部分人所结合，有志学者之会员对于主义问题尚不急感需要，而有志事业者之会员则不可不有一种共同主义。然而吾会究应采取何种主义，则非有长时间之讨论与预备不可，吾以为规定主义须具备下列五种条件：（一）须先研究现在世界上所有主义之理论历史及派别；（二）须先调查各国实施主义之种种组织及实况；（三）须先调查中国全国之生活状况及其组织；（四）须先研究中国人之国民性；（五）规定一种主义后，吾辈至少须有摩顶放踵、出死入生之精神，以实行及宣传其主义。若同志中有违叛主义者，须加以生命之制裁，夫然后所谓主义者始强而有力。现在吾辈之信仰主义自谓不敢后于他人，若欲铺张门面，何妨亦效其他团体，写上某某主义几个大字。然而国内标明主义之团体虽多，而吾至今未见热烈宣传之举，吾更未闻手枪炸弹之声也，如此于主义何益？于国民生活又何益？至于轻信主义而随时变更，则其害尤不可胜言。譬如二十年前刘师培、张继在东京鼓吹无政府主义，不旋踵而彼辈从事政治活动之共和革命矣，不施踵而刘师培大卖革命党矣，不旋踵而刘师培列名帝制主义之筹安会矣。又如近来由贤人政治而变为社会主义之某报记者，只往湖南一行又翩然而变更主张。又如政客某君初到欧洲，宣言中国已无办法，及读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数册，不禁大喜，又宣言中国已有办法。呜呼！此皆吾国二十年来言论界先锋、政治界领袖之言行，吾不知迷信政党、崇拜政客之青年，对此当作何感想也。吾前言学者与事业家不同，使上述诸人专以“求真”为职志，死守学者范围，则吾不但不责备而且赞成之。然而彼辈固不甘居学者范围，而自命事业家，欲以其说见诸实行者也，使吾国不识不知之群众追随诸大政客之后，今日往东，明日又改往西。呜呼！群众病矣，疲矣，奄奄无生人之气矣！是谁之咎欤？以中国之现状而论，无论民主主义以至于

无政府主义，或俄国劳农政治以至于日本军阀政治，果能行之有道，皆可以大有造于中国，皆比中国现状高百倍，此何待言。然而吾会之所以不主张轻易决定一种主义，随便介绍一国政治者，盖以现在世界潮流顷刻万变，国民根性又素未深究，即或介绍之主义与政治一一成功，试问成功后之中国，能与世界最新潮流不违背乎？能与国民根性不抵触乎？昔之主张模仿日本，今之主张效法美俄者，皆一邱之貉也。吾会既明斯义，所以主张从事预备工夫（参看拙作《少年中国之创造》及《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两文，前者见于本刊一卷二期，后者见本刊一卷六期），所谓预备工夫者，对于主义，则吾辈现正从事深思苦索之研究；对于事业，则吾辈现所从事者皆为将来一切理想组织之基本。吾辈不怕不走，只怕走错，今日吾会所取之态度或可免“走错”之讥欤。论者又曰：学会从事预备工夫，诚然无走错之虞，然会员主义之信仰既各有不同，则其所从事者岂非各备其所备乎？论者此语亦系不明本会真相之言。本会初发起时，尚有二三主张国家主义之人，经三年来之酝酿，亦皆慨然弃其主张，故今日会中虽不标明主义，而各人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所未能一致者，不过实现之方法及其组织耳。故今日共同从事预备工夫，仍有大部分共通之点，必无各备其所备之虞。要而言之，吾会中之事业家必须决定一个共同主义，而此共同主义必须加以切实之研究，待以时日而后可。至于今日则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便为本会之主义，把第一步做到，再说第二步。

（九）我对于学会之希望

呜呼！自吾出国以来，益感人生真义之不可不追求，国民生活之不可不改善，中国社会之不可不打破，世界革命之不可不速起，而吾少年中国学会之不可不努力也。吾以为无论物质或精神束缚，皆须无条件之解放；无论国内或国际强权，皆须无条件之抵抗。在国内则速促农民阶级之崛起，在国外则速谋弱小民族之联络，对于虚伪之人生、乡愿之社会尤应根本推翻，无稍顾忌，使个人之人生赤条条与天下人以共见。中国之伪君子多矣，何用吾辈之循规蹈矩迎合社会；民族之不平等久矣，何用吾辈之侈谈仁义，坐待大同。若吾人不自发奋，则今日中国人为外国资本家作工，将来中国人必为外国劳动家作工。总之，中国社会不大破裂，个人人生不能得幸福；世界局面不大破裂，中华民族不能得自由。少年中国学会者，即思想的、社会的、国际的革命团体也，故吾会对于会员之人生问题，须绝对听其自行解决，万不能以甲会员之人生逼着乙会员之人生亦须如此。反之，会员对于吾会之宗旨问题，须绝对共同遵守，万不能因少数会员碍于束

缚，一方面将学会严确宗旨据充为无穷大，以便万事可做；一方面又将会员共同精神缩至无穷小，以致痛痒无关。前者个人失其自由，非我所希望之人生；后者团体失其精神，非我所希望之学会。

（十）总投票

吾对于学会之意见已略如上述，吾以为万事皆可商量，惟政治活动问题不能通融，学会可以解散，而学会根本精神不能丧失，此事既成为学会之生死问题，即请执行部举行总投票。若多数赞成政治活动，则吾辈死守学会宗旨之少数会员，即自行退出学会另组团体；若多数反对政治活动，亦请主张政治活动者尊重学会公意退出学会。总之，吾辈对此问题势不两立，决无妥协调解之余地，此后凡宗旨不合者，虽生死患难之交，亦当断然割爱；凡宗旨相合者，虽素昧生平之人，亦当欢然携手。兹拟定票式如下，以备执行部诸兄参考。

少年中國學會總投票

反對（請於上面空白中填寫贊成或反對二字）

政治活動

王光祈

備考

（譬如附以條件之類）

注意

（一）此次投票为解决学会生死问题，务请接票后三日内填寄。

（二）放弃投票权者，即作为对于学会宗旨问题不表示意见，本会无从揣其意旨，以后另组团体，或改组学会，即不再行通知，认为彼已表示退会，不愿与闻会事。

（三）投票日期限至某日为止。

十年十月下旬自德国寄

“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①

为政党基础计、为政客生活计应当“社会的政治改革”——为社会需要计、为社会分工计应当“社会的社会改革”——国内之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者四人黄任之、胡适之、梁任公、汪精卫——国外之主张“社会的社会改革”者四例福泽谕吉、嘉纳治五郎、脱尔斯泰、俄国大学生。

余于三月前曾草“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以说明吾会之根本精神。最近吾友曾慕韩复以其所作关于同类问题之文字三篇见示，论例详明，发人深省。惟慕韩第二篇“彻底主义与妥协主义”一文，所举实例皆系“社会的政治改革”者或“政治的政治改革”者，而未及“社会的社会改革”者，兹篇更广其意，特举八例，于慕韩文中已举者则略之，已略者则举之，以佐慕韩之说。且于本篇之前，先揭四大理由，以为吾论之根据焉。

今之从事政治活动者，大抵皆主张“政治的政治改革”，换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政治，政治一旦改革，则其志愿毕矣。其较为思深虑远者，则主张“政治的社会改革”，换言之，即以政治手段改革社会，社会一旦改革，则其目的达矣。前者眼光短小，不足有为；后者方法错误，不足有成，皆为吾辈所不取。吾辈所承认者，则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换言之，即以社会势力促进政治。吾辈所从事者，则为“社会的社会改革”，换言之，即以社会自力促进社会。若为政党基础计、为政客生活计，则须从事前者；若为社会需要计、为社会分工计，则须从事后者。兹请述其理如下：

① 本文发表于1922年3月1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

第一，就政党基础论，则须从事“社会的政治改革”也。在现代代议政治制度之下，若欲从事政治活动，势非先有良好之政党不可，而良好政党之基础，又非建筑于社会之上不可。譬如德国有大政党七，其基础无一不建筑于社会之上：（一）国性民党，建筑于农业家之上；（二）国民党，建筑于工业家之上；（三）民主党，建筑于商业家之上；（四）中央党，建筑于旧教徒之上；（五）社会民主党、（六）独立社会民主党、（七）共产党，三党则皆建筑于劳动家之上。又如日本之两大政党：政友会则建筑于农民阶级之上，宪政会则建筑于工商阶级之上。要之，各政党在社会上必先树其不拔之基，然后在政治上始可收发言之效。而回顾中国则何如？如安福部之建筑于日本势力之上，政学会之建筑于滥新官僚之上，固无论矣。即历史上稍有根据之国民、进步两党，其所建筑之社会基础研究在何处？国民党中虽不乏坚苦卓绝之士，然大部分则建筑于流氓之上；进步党中虽亦不少聪明俊秀之才，然大部分则建筑于滥绅之上。所谓流氓也、滥绅也，皆系无正当职业者也，得志则朋比为奸，失意则日思作乱者也，要之，皆非建筑于良好社会之基础上可知矣。何以该党等不能建筑于良好社会基础之上？此其答案极为简单，即该党等只知有政治，而不知有社会；只知以政治力改造政治，而不知以社会力促进政治；只知有政治生涯，而不知有社会事业。换言之，只知政治活动，而不知社会活动者也。故国民、进步两党在历史上虽较有根据而终无实力，有时并旧交通系而亦不能敌也。旧交通系之在中国，吾人固未尝认为正当之政党，然该系在政治上居然有其相当活动之余地者，此无他，该系基础系建筑于交通事业与金融事业之上。交通事业与金融事业者，亦吾人之所谓广义的社会事业也，而国民、进步两党则并此而无之，亦未免太可怜矣。然旧交通系梁士诒等犹系承继盛宣怀之后，其盘据交通、金融尚有其政治上之根据，若蔡孑民之于北京大学，张季直之于南通事业，则其社会势力固由于一手造成。将来领袖智识阶级之蔡孑民与领袖工商阶级之张季直，必为政治上之两大中心。可以预言，孰谓社会事业必须有其政治上之根据，而不能白手创造哉。

第二，就政客生活论，则须从事“社会的政治改革”也。余尝谓若欲澄清中国政治，必从事政治活动者之自身，非先有一种社会职业不可。换言之，非先投身于社会事业不可。余于三年前在北京《每周评论》上曾作短评一篇，题为“无职业者不得干预政治”，曾惹起《时事新报》张东荪君之抗议，虽然此种思想余至今固未尝丝毫变更也。今之性喜从事政治活动之青年，对于已往政客之败绩往往忽视，反从而为之辞曰：“我们与他们不同。”呜呼！亦未免过于自信矣。夫前乎吾辈之一般从事政治活动者，其才气、其热诚未必在今日吾辈青年之下（参观本志吾友慕韩之文便知），其所以毫无成就者，非其才有未逮、诚有未至，而实由其未尝先于社会事业上筑其基础也。余亦相信“我们”确与“他们”有不同之处，惟所谓不同者非“我们”才气热诚与“他们”不同，

而是“我们”系有职业者，“他们”系无职业者；“我们”系各执一业以自效于社会，同时视政治活动为一种国民普通义务（吾辈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之同志，对于此种国民普通义务并不忽视，故吾辈对于舆论运动、革命运动亦愿直接参与。惟实际从事官吏、议员之政治生涯，则不能不让其他一般性喜从事政治活动之青年，此实分工之道也），“他们”则专以政治为生涯，而视官厅、议院为其啖饭之所；“我们”对于政治活动虽偶尔失败，尚有职业老巢可以退居，报效社会犹有其道，“他们”则一遭失败，便陷于吃饭危险，势非再将饭碗夺回不可。因此种种之不同，于是“我们”与“他们”之间，遂判然划出鸿沟矣。近日政客中颇有提倡“职业政治”者，余以为若果诚意提倡，必自该政客自身先寻一种职业始，否则余恐中国一般有职业者不肯从该政客之后，实现其所谓“职业政治”矣。或曰：政治系一种繁难深邃之学问，非尽人所能了解，势非委之于一般素以政治为专业者不可。既以政治为专业矣，又安有余暇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余以为论者此种怀疑实不明近代政治之趋势者也，世界愈趋进化，则参与政治者愈占多数，而政治之为物，亦愈觉其平凡无奇矣。古代惟僧侣、贵族始有了解政治机会，稍进则智识阶级、工商阶级亦渐有了解政治机会，至今日则一般平民亦皆有了解政治之机会矣。近代国家政治之取决，既由于一般民众，而此一般民众又当然即系一般各有社会职业之人，若彼辈对于政治不能了解，则国家政治已无从取决，所谓近代政治之精神遂不免根本破产矣，则吾辈一切讨论皆嫌其辞费矣。因此之故，余乃认定政治活动为国民普通义务，而不以之为之政客专业也。

第三，就社会需要论，则须从事“社会的社会改革”也。吾国民族今日之所以陷于如此悲运，其原因虽多，而其最重要者，则无过于社会腐败。内政外交不过其表面者耳，外交之危殆由于内政之腐败，内政之腐败由于社会之麻木。有纵容安福部之社会，然后始有媚日卖国之安福政府；有纵容张作霖、曹锟之社会，然后始有国际共管之说。现在一般迷信政治力之青年，其所拟之改革次序，首为外交，次为内政，再次为社会。而吾辈迷信社会力之同志，其所拟之改革次序，则首为社会，次为内政，再次为外交。此其不同之点也，此犹就改革内政外交而言，已非先行从事社会活动不可，若再就社会本身而论，尤非速行从事社会活动不可。盖今日之中国，即使内政外交皆已次第就绪，而国民生活不加以根本改善，则所谓幸福者亦徒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而已，安能真实得其丝毫受用哉。中国人自思想、行为、信仰以至于穿衣、吃饭、睡觉之事，几无一不应改善，此种感触，凡曾旅行欧美各国者尤为深入骨髓。当吾人在国中时，以为吾人之幸福为外国强权夺去者，实居大半；自来欧洲后，始知吾人之幸福为中国社会夺去者，实十分之九。当吾人初到欧洲时，其深印吾人眼帘者，当为欧洲人之物质生活（衣、食、住三事），较之中国人实在百倍以上；及其既久，其深入吾人心坎者，又为欧洲人

之精神生活（恋爱、音乐、美术等事），较之中国人实在千倍以上。呜呼！我神明黄帝之子孙，何其堕落一至于此耶？吾辈以孱弱身躯偶适欧土（中国人之身体衰弱，由于物质生活之原因者实居大半），无聊情思，时莅欢场（欧洲人几无一人不了解音乐、美术，其恋爱生活则更为一日不可缺乏之事，故其精神常快），但见欧人只知生之可乐，而回思中国则又焉知死之可悲。至此而犹不狂且病者，真太无心肝之人矣；至此而犹不愿从事社会改革者，真太无血性之人矣。故今日中国人，与其鼓吹其如何政治活动，毋宁指导其如何日常生活，吾亲爱之青年同志乎，其亦有意于斯乎？

第四，就社会分工论，则须从事“社会的社会改革”也。从政治改革社会是间接的，事倍而功半；从社会改革社会是直接的，事半而功倍。故“社会的社会改革”当先于“政治的社会改革”，至少“政治的社会改革者”与“社会的社会改革者”亦须同时并行、分道扬镳，而万不能将“社会的社会改革”以之置于缓图也。使全国青年皆欲作教育总长，而无一人愿作小学教师，则吾知其所谓教育事业必不能举也；使全国青年皆欲作农商总长，而无一人愿为实业奔走，则吾知其所谓实业前途必无所进也。故除少数“政治的社会改革者”之外，必同时赖多数“社会的社会改革者”为之辅助，始能收效，此实“社会的分工”之主义也。或曰：所谓“社会的社会改革”者其意良善，然必先以良政治为前提，若在恶政治之下，是否容吾人有社会活动之余地？余曰不然。社会事业之有待于国家扶助始能成功者（如官办铁路、国立学校之类），虽以良政治为前提，而其他社会事业无须国家扶助可以私人从事经营者尚有若干，吾人不能因其无良政治，遂并此而不从事，此何异于因噎而废食哉。向使国民党之领袖如孙逸仙辈，于民国元年下野以后，即从事实业，经营教育，以建筑社会基础。以当时国民党之信用，何资不可集？何事不可为？光阴易度，忽忽十年，则今日之社会成绩当如何？然而国民党不为也。又如进步党之领袖梁任公辈，归国以后即决定委身报界，从事教育，则今日言论界之进步与教育界之发达，其社会成绩又当如何？然而进步党不为也。又使任公附袁失败以后，而能履行“从事社会教育，不为政治活动”之宣言（见《大中华杂志》任公所作《政治之基础与议论家之指针》一文），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执笔于论坛，授课于教室，谁能将彼之笔、彼之课夺而去之，执而焚之？然而任公又不为也。总之，在恶政治之下，并非无社会上活动之可能，其所以不能，特不为耳。嗟乎！彼俄国大学生之社会活动，岂非行于俄皇专制淫威之国中者乎？彼蔡孑民、李石曾、严范孙、张季直之社会事业，又岂非成于军阀暴戾专横之时代者乎？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故有志改革社会者，请暂勿问今日中国政治现象是否良恶，但先问自己改革社会之心理是否诚伪，如其诚也，请从今日起即以小学教师自命，毋以教育总长自期，吾人但选其他人不愿做者吾人努力做之，以尽社会分工之责，则中国社会其将有光明之一日乎！

综观上列四大理由，则知吾辈所主张者有二：（一）就政治改革论，则为“社会的政治改革”而反对“政治的政治改革”；（二）就社会改革论，则为“社会的社会改革”而反对“政治的社会改革”。知第一义者，在今日之在野人物中共有四例：（一）黄任之，（二）胡适之，知之而不能守者亦有二人：（三）梁任公，（四）汪精卫。知第二义者，则吾求之于邻国之中，亦共有四例：一为创造帝国基础之（一）福泽谕吉，（二）嘉纳治五郎，一为树立劳农根基之（三）脱尔斯泰，（四）俄国大学生。

兹先述了解“社会的政治改革”者四人。

（一）黄任之。任之先生今日固犹是江苏省教育会之副会长也，将来是否加入政界，此时吾人固不敢妄断。惟此次梁士诒内阁之以教育总长一职奉托，虽任之先生辞不肯受，然吾人从此可以推知任之先生在今日政治中，系一极有关系之人也。任之先生十年以来提倡职业教育，奔走华侨事业，联络新兴之工商阶级，汲引归国之留美学生，造成其社会上之基础，故今日在野人物中能用社会势力促进政治者，任之先生当首屈一指也。惟任之先生今日之所以造成社会上之基础者，一方面固由其本人十年来奋斗奔走之力，而他方面则由于留美学生赞襄辅助之功。盖留美学生者，大半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者也（余尝投稿德报，论“留学生与中国政治”，将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社会之进化，以留学生思潮为中心而说明之。中国留学生可分为三大派别：〔一〕留日学生大抵主张“政治的政治改革”者也，其最大成功则为辛亥共和革命，其最大失败则为未植社会基础。〔二〕留美学生大抵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者也，其最大成功为国内产业勃兴，其最大失败则为违背时代潮流〔此就将来而言〕。〔三〕留欧学生大抵主张“社会的社会改革”，如留法之李石曾、留英之吴稚晖、留德之蔡孑民其代表也，其将来之最大成功，则必为文化勃兴、平民崛起；至其失败，则尚非余今日之智识所能预料）。留美学生知欲改革政治，必先于社会上植其基础，故归国后努力从事教育、实业，不遗余力，以为他日献身政治之后盾，此与十年前留日学生之只知投身军旅、群趋政界、毫无社会基础而谋政治改革者，固大异其趣矣。黄任之先生者，深能迎合此种趋势者也，于是乎梁士诒不得不暗送秋波矣。

（二）胡适之。适之先生者，今日不过一有名之大学教授而已，提倡新文学之泰斗而已，似与政治无关。顾吾人何以将彼列于“社会的政治改革”者之流，岂非近诬？虽然吾人固尝亲闻适之先生之言论矣，适之先生曾对人宣言（似系与《北京国民公报》记者蓝公武君谈话）二十年内不作政治活动，又于《争自由的宣言》文中，开首一句即系“我们固不喜谈政治”（原文是否如此已记不清），足见适之先生于某种时期内决心从事社会事业可知。然适之先生同时又提倡所谓“好政府主义”，又极留心当世政治（当余在北京时，一日适之先生寄余一函，内有报纸所载滇黔当局者与华侨订约筑办西南三省

铁路之合同一则，涉及吾川，适之先生认此合同有害，嘱余注意，并将合同中重要条件一一用笔圈出，促余注意。此不过边省一铁路草约合同而已，而竟为安徽新文学家胡适之先生所注意，足见先生对于当世政治无论大小，皆不肯轻轻放遇，即此一例已可概见。余甚佩先生之精力过人也)，吾人从此种种言行又可推定先生系一主张政治改革之人也。因之，吾人将先生前两次宣言，抽其意义则为“社会的”三字，又将后两种言行，抽其意义则为“政治改革”四字，合之则为“社会的政治改革”七字，足见先生固亦留美学生思潮中之产儿也。吾友张梦九尝谓梁任公、章行严、胡适之为中国近三十年来一脉相传之论坛三雄，余颇是其言。惟梁任公、章行严皆以社会基础未立，率尔从事政治，已先后身败名裂矣。余甚敬爱适之先生，但祝其勿踏梁、章之覆辙而已，因一民族之精华有限，不堪一丧再丧也。

（三）梁任公。任公先生者，今日举世认为主张政治改革者也。然任公先生固亦尝从事于社会事业矣，其在戊戌以前，则办《上海时务报》、湖南时务学堂、北京译书局等事；其在戊戌以后，则在日本办《清议报》、大同学校、《新民丛报》等事；其在辛亥以后，则办《庸言报》；其在甲寅以后，则办《大中华杂志》(该志中曾登《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极言政治基础在于社会)；其在今日则在清华、南开等校讲学，并办《改造杂志》。大抵任公先生生平，每失败一次，则从事社会事业一次，然识见虽卓而意志不足以赴之，故每执一义不能持久。而且每当任公先生兴高采烈之际，即其主张“政治的政治改革”之时，亦即其身败名裂之日也，如癸丑之附袁、丁巳之联段皆是。又每当其失意落魄之际，即其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之时，亦即其奋发猛进之日也，如历次办报、办学皆是。今日任公先生又知欲改革政治，非先从社会上植其基础不可矣，故吾人又将任公先生列为“社会的政治改革者”之类，但不知任公先生能否坚持也。惟任公先生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亦时有不敢令人苟同之处，譬如先生之《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竟否认舆论运动，此则与吾辈今日所取之态度大不同也。

（四）汪精卫。精卫先生固亦以政治改革闻于时者也，然先生于民国后与蔡孑民、李石曾诸先生发起进德会于津沪舟中，首标不作官吏、议员之旨，盖已从消极方面洞见政治活动之症结矣。其后与蔡、李诸先生在巴黎办“华法教育会”更从积极方面为培植社会人才之预备矣，因之余遂不得不将精卫先生列为“社会的政治改革”者之列。惟近来先生又复追随孙逸仙之后，从事“政治的政治改革”，且于年前在上海广肇公所演说，大骂“与政治无关系”一语，在一般主张“社会的”之同志，则太息先生之行为不能坚持素志，而一般主张“政治的”之青年，则又假先生之言论以为自己辩护。要之，先生之态度前后变迁，因而影响于国民思想，恰与任公相同，此则无可讳言者也。至于吾辈主张，亦与先生有共通之点，譬如先生所发起之“进德会”首标不作官吏、议员之旨，

恰与吾会之反对政治活动之意相同，所不同者吾会宗旨、信条兼从积极方面着想，而进德会则专从消极方面规定耳。又先生大骂“与政治无关系”一语，为一般自外于政治关系者作警告，又恰与吾会之主张从事舆论运动、革命运动，不愿自外于政治关系者相同。所不同者，吾辈只不愿追随孙逸仙之后从事“政治的政治改革”耳。

以上四人皆为主张“社会的政治改革”者，在今日之中国，具此眼光之人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然余之希望于我青年同志者犹不止此，更望再进一步而为“社会的社会改革”者也。兹再举四例如下：

（一）福泽谕吉。吾人今日但知日本之富强系由西乡隆盛、伊腾博文、大限重信等等之功，而不知曾有数十年如一日，专以社会事业为职志之福泽谕吉也。福泽谕吉手创庆应大学，培植经济人才，至今全国财界皆握于庆应生徒之手，此与旧交通系梁士诒等承继盛宣怀之势力而插足中国财界者不可同年而语矣。福泽谕吉鉴于日本之贫乏也，则提倡美国之“拜金主义”，因而日本产业进步，一日万里，今日不但依人为生之中国市场须仰日人鼻息，即远在欧洲之法国商店亦为日本工业品所侵入矣。福泽谕吉又鉴于日本之衰弱也，提倡“独立自尊主义”，因而今日日本国民皆有“振衣千衣岗、濯足万里流”[①] 之气概，与吾国希望国际共管之大政客，与夫请置外国租界之宜昌人，其相较又何如也？呜呼！我终身从事社会事业之福泽谕吉翁，大可以作吾中国一般社会改革之良师矣，虽其所提倡之主义不必尽合现代潮流，而其努力建筑社会基础之精神则千古如一也。

（二）嘉纳治五郎。吾国今日亦渐知普及教育为当今之第一要务矣，然普及教育必先有良好之师范人材，普法战争[②]之胜利，卑士麦亦常归功于小学教师矣。嗟乎！孰料近世纪中，冬烘先生之力有如此其大哉。日本嘉纳治五郎者，手办高师数十年者也，全国师范人才皆出其门下，今日日本国民智识之如此发达，国民身体之如此健全，吾虽不欲归功于嘉纳治五郎，安可得哉？故福泽谕吉以为日本者我手创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国经济人才皆出于庆应之故；大限重信又以为日本者我手创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国政治人才多出于早稻田之故；嘉纳治五郎又以为日本者我手创之日本也，因日本全国师范人才皆出于高师之故。吾则以为福泽谕吉、大限重信、嘉纳治五郎皆大和民族之灵魂也，有一于此，其族可兴，而况三乎！回顾中国则不能不令人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感矣。

---

① 这两句诗出自魏晋左思《咏史》诗中的第五首。“千衣岗”，应为“千仞岗”。

② 普法战争：普鲁士为完成德意志统一和争夺欧陆霸权与法国进行的一次战争。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在1864年及1866年先后击败了丹麦及奥地利，但法国却仍然在幕后操控着南德意志诸邦，企图阻碍德国统一。为此，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策动下，以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制造争端，令法皇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宣战。战争最终以法国失败而告终。普法战争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及法国的欧陆霸权。德意志实现了在普鲁士统治下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三）脱尔斯泰。如前所举福泽谕吉也、嘉纳治五郎也，皆系手创日本帝国之元勋，吾人对之虽表示充分景仰，然犹嫌主义相殊，若脱尔斯泰者，则吾只有歌之咏之以表其崇拜信仰热忱，奉为吾党社会活动惟一无二之良师也。脱尔斯泰以悲天悯人之怀，厕身平民之列，因自己所享物质生活之有赖于社会供给也，则手制皮靴，朝夕工作，以答报社会之恩。因平民所有精神生活之见束于一切强权也，则手著小说，远近宣传，以启发人生之秘。今日列宁之所以有此政治改革成绩者，皆脱尔斯泰昔日社会活动之力也。吾中国今日青年中以列宁自负者，吾屡闻其人矣，而以脱尔斯泰自命者，则吾未之闻也，吾党之责其在斯乎？

（四）俄国大学生。在专制淫威之下而能收社会活动之效者，俄国大学生其最著之例也。当时俄国有一句格言曰："向民间去。"昔日留学西欧之数百俄国青年，归国后皆奉此语为圭臬，群赴乡间，或事教育，或作医生，或为木工，或做鞋匠杂居农民之中，以宣传彼辈主义。直至一八七六年为政府所觉，尽置于狱，数年之间被捕者在二千名以上，然自此以后，俄国大学生之宣传运动愈趋激烈，而农民之革命思想亦愈益蓬勃，至今日而始有劳农政治之成立。有人谓自俄国农民叛乱以来，五年之间俄国学生被杀死者有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受伤者有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七人，可谓烈矣。呜呼！吾青年同志乎，今日吾国军阀之专横黑暗，其有异于俄皇乎？农民之愚懦痛苦，其有异于俄民乎？然而学生中至今未闻有大批杀戮之举者，非军阀之宽仁，实学生之不能也。呜呼！吾青年同志乎，吾辈不作农民之益友，便作刀上之孤魂。在大街上摇旗呐喊，大呼救国者，非我希望于"社会的社会改革"之青年也。呜呼！吾青年同志乎，起矣！起矣！其速起矣！

傅立叶的理想组织[①]

——读书笔记之一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是法国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生于一七七二年，死于一八三七年，为近世所称社会主义三大创造理想家之一。所谓三大创造理想家者即

① 本文发表于1922年4月1日《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九期。

圣西门（St. Simon）、涡文（Robert Owen）、傅立叶是也。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农村上面的，据他的理想组织法郎克（Phalange）之计划，若每个法郎克包含一百三十五组（Serie），则其中便有八十组是属于农事的（以五十组从事耕作，以三十组从事牧畜），其余的二十组属于工业，三十五组属于教育、游戏之类。因此之故，凡富于建设新村理想的人们，尤其是生长于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偶然读了傅立叶的学说，更觉得加倍有趣。

我这篇稿子是从白克尔（Bernhard Becker）所著的《傅立叶》那篇文中抄写下来的，既不是照原文逐句的翻译，亦不是我自出心裁的作品，只算是一种读书笔记罢了。而且他的原文本系一个整篇，未分段落，现在被我将他截成十小段，每小段给他一个小题目，篇中次序亦略为颠倒，以求醒目。

这篇文章对于傅立叶的理想及其组织都说了一点，但是不狠详细。我这里有几本关于研究傅立叶学说的专著，俟将来读完了，或可以再著一篇较详的介绍。

（一）傅立叶的十二欲（Passion）

傅立叶创造了一种新社会制度，这种新社会制度是以“寻常人”为本位的，他以为寻常人有十二种欲，支配人类一切行为，其类有三：

（一）官能欲（Sensitive Passion）。此种欲共有五种，是与人类五官相联的，使人类能与物质接近。此五种欲的目的，在内部则希望身心康泰，在外部则希望物质富丽。

（二）情感欲（Affective Passion）。此种欲共有四种，分为友谊、恋爱、家族、好名四种。此四种欲的目的，是使人类倾于团结，在各种欲中最占重要，其团结分为上下两项，如下：

（上）{友谊的团结——单性的爱
好名的团结——团体的爱}

（下）{恋爱的团结——两性的爱
家族的团结——血统的爱}

人类社会若无此四种团结，便不能联络，只算是一种披着人皮的野兽。就此两项而论，在（上）项则好名的团结最占重要，在（下）项则恋爱的团结最占重要。此四种团结对于人生年龄陆续发生影响，每一种团结在每一种年龄内最占上风。

（甲）童年时代（自一岁至十五岁），友谊最占上风（按此友谊二字似宜活看，略与吾国之孝弟二字相近）。

（乙）少年时代（自十六至三十五岁），恋爱最占上风。

（丙）壮年时代（自三十六至四十五岁），恋爱及好名最占上风。

（丁）成熟时代（自四十六至六十五岁），好名最占上风。

（戊）老年时代（自六十六至八十岁），家族最占上风。

从植物界中的次序看起来，便是萌芽、开花、结果、生子。这种团结或是彼此调和，或是互相反对。每一种团结，是由两种动机发生，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

团结	动机	团结	动机
友谊的团结	精神的——性格之关系	好名的团结	精神的——声誉之关系
	物质的——嗜好之关系		物质的——利得之关系
恋爱的团结	物质的——五官之激刺	家族的团结	物质的——血液之关系
	精神的——心灵之连络		精神的——传嗣之关系

各种动机或是彼此一致，或是互相反对。在友谊及好名的团结中，精神关系最占重要；在恋爱及家族的团结中，物质关系最占重要。在友谊及好名的团结中，男子最盛；在恋爱及家族的团结中，女子最盛。

（三）分配欲（Distributive Passion）。此欲共有三种，分为争胜、更换、组合三种，有指挥其他各欲的能力。傅立叶曾经说过："争胜欲是人类行为的智慧盐。"人们凭借着他以战胜他们的仇敌，"争胜欲"所最喜欢的是阴谋奸诈，但是同时又为各种组织之母。"更换欲"是完全受自然律的支配，我们常常感觉工作有随时更换的必要，否则即陷于疲倦。"组合欲"是由一种激刺而成，他的产生至少是由于一种官能愉快与一种情感愉快的共同作用。"组合欲"之产生"和谐"恰如"争胜欲"之产生"不和谐"一样，但是他们俩对于社会调和都是必要的。

"分配欲"在现代社会情形之下，没有得着适当的应用，因此遂成为一切紊乱秩序的源泉，被人把他当作一种不好的东西。

以上所说的十二种欲，经过彼此混合与联络，产生了狠多的"混合欲"。每一种或数种"欲"以制造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性格内容是依着欲之数量、类别、程度而定。要产生一个高尚性格，至少需要两种"欲"以作基础，傅立叶曾经计算过，人类性格的相异有八百一十种之多。

支配人的行为，不是"智"与"理"而是"欲"。无论人类如何超于禽兽，而感情、要求、希望等等（换言之即是欲的引力）终是一切的基础。人类的理智如像人类的身体一样，只算是"欲"的一种工具，实际上理智只能在欲的引力激刺之下活动，欲的引力为我们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行为之中心。

（二）欲与工作的关系

我们现的[①]看看“欲”对于工业之从事、工作之分配、工人之组织的关系如何。为满足第一种“官能欲”的要求（官能欲在内部则希望身心康泰，在外部则希望物质富丽），在工厂内则须注意卫生、清洁、美丽的适当设备，所有一切粗野冷淡情形都要根本铲除。工作是应该有偿的，工作须谋工人的幸福，须谋工人的丰富生活，工人须干预他所生产的利益。为谋工人干预利益之公平，那么，工人干预的利益必须与他所出的劳力为正比例。

照着第二种“情感欲”的作用，工人决不能甘于孤独，他们必须与其同情伙伴联络一气，而且因为奖励及地位的引诱更使他们努力团结。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又已经入了第三种欲了（分配欲），因为第三种欲是各种组织之母，在人类各种欲中其关系有如此密切，可以满足三种欲中之一种的，同时又可以满足三种欲中之其他二种。因此欲的引力之三种目的，只有互相为用始能达到。

为满足“情感欲”及“分配欲”的要求，于是我们有所谓“团”，有所谓“组”。“团”（Gruppe）的意义便是联合一定数目的人，从事一种事业。这种联合必须出于完全自由，必须出于一种同情，并且因为彼此皆是从事嗜好相同的一种工作，每一种事业须按照各个团员之嗜好及才能，因此每一个团员各有一种特别责任，同时每一个团员皆不必从事那种与自己性情不合的工作，这种与自己性情不合的工作，应该委与其他对于此种工作有兴味的团员。

“组”（Serie）是由于各种工作相同的“团”联合起来的，在各团互相之间发生一种竞争，以激起他们的努力（争胜欲）。凡两种邻近的“团”，若是他们的生产内容愈相同，比较优劣愈严格，则其作用愈伟大。因此发生一个原则，不但组中的各团应依次排立，成一种完全组织，即“组”的自身亦须有一定数目，依次排立，以便工人一旦倦了（更换欲），可以从此组到彼组去。“更换欲”可以恢复人的健康，因为假如一个人成年累月每日十二点钟都做一种同样的工作，对于身体精神之各部分不能同时陆续运用，那么，他的健康必定有损。此外为满足“组合欲”起见，更应选择各人愿做的工作以谋其官能及情感的愉快。

---

① 现的：原文如此。或即“现在”之误。

（三）傅立叶的理想组织

每一“团”至少须有七人，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中部的人数应该多于上下两部，以便维持上下两部的均势。这种七人团的人数分配如下：

七人团
- 上部二人
- 中部三人
- 下部二人

若将一个事业分为三类，则以上三部各从事其一类，但每团人数如能照下列一表，则更为妥善。

十二人团
- 上部四人
- 中部五人
- 下部三人

十六人团
- 第一部…二人
- 第二部…
  - 三人
  - 二人
- 第三部…三人
- 第四部…
  - 二人
  - 二人
- 第五部…二人

每一团有一个或数个领袖，有技师，有教习，假如我们要知道共同组合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至少须有四十五到五十个的“组”依次排立。工作中之重要者，如家政、农事、商务、工业之类，此种工作当然须首先加以改良。此外还有教育、科学之研究与应用、美术种种，工作中亦有关于行政部分的，但是不属于战争和破坏。大凡从事工业有两个方法：（一）家庭工作；（二）组合工作。组合工作有一定的章程，使每一个组员皆适合他的资本、工作、技能，得着公平的分配。无论何种情形之下，有组织之组合工作皆胜于散漫之家庭工作，组合工作系由于鼓励与引力，家庭工作则由于压迫与困难。组合工作对于每一种事业的范围，尽量使其扩张；对于相聚的时间，尽量使其缩短与更换；对于每一种至小的工作，都能运用实行；对于每一种事业各部分的工作，都有一种特别组织。家庭工作引起贫乏、奸诈、压迫、战争、放纵、疾病种种不良结果，而组合工作则恰恰反是。实行组合工作的试验当以农事为基础，此种试验当首先置一土地，其

面积约需一刻钟的大小，稍后再使其他各种工业附属于农事，而且永远为农事的附属品，农事为主要事业，一切制度皆以他为转移。

此种试验可以用一千八百人或一千二百人，或是仅仅用六百人。至于这些人的年龄，各种老少大小均要，这些人是从工农两种家庭选出来的。此外还要三百到四百个小孩子从事操作（从三岁到十三岁或十四岁）。此种土地是在一种股份公司之下所组织成的，为一种有信用的人所指导的，此种土地或是现在便买，或是现在仅仅租借将来再买，所有居民不是一次搬进去的，是依次移住的，以免紊乱秩序。

（四）理想组织之建筑

此种理想组织叫做法郎克（Phalange），此中房屋叫做法郎时台（Phalanstere）。

在此种法郎克的中心，除了私人住所以外（各人的私人住所是按照各人财产的大小而定），还有公开的大厅，以从事各种工业。在全体建筑中有一条大街通过，这条街上有天篷遮着，下则连结各地。所有各家房中光线，一面来自街上，一面来自田间。在法郎克之中，皆从事肃静无哗的职业，所有喧杂的工业当置在法郎克的旁边。法郎时台是一种极卫生、舒适、俭省的建筑，一个单独伟大的建筑（在最好的地点），可以代替我们村中二三百个老房子，四五个厨灶可以代替三百个厨灶，一打侍役（这些侍役是代各种有财产者送菜饭的）可以代替三百位女侍者。此种组织与共产主义十分不同，他随处皆许可不平等，而且利用不平等，只是把现在不平等之害除去罢了。在公共食堂中按照年龄的大小与其他种种关系，至少须预备三种菜目以便食者选择，但是每一个人皆有其自由，在他的房中，无论携眷同食或是单独进食，总之厨中俭省反正是一样的。食橱与地窖亦十分俭省，一个适用通风的食橱与地窖，可以代替三百个不好的食橱与地窖，而且只需从前十分之一的工作。若把法国六百万个散漫的家庭，减为一万八千个或两万个共同组合，那么，屋内工作的减少当为六与一之差。

（五）理想组织中之商业

在此种组织内，所有生产之交易都是大批的，那些剥削人民的小商皆一齐取消。照着赖猛乃的统计，法国农产物的价值总计四十五万万法郎，而居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中间

之商人，从此中吞去者实不下于十三万万五千万法郎。彼辈寄生虫的商人，买入时务求最便宜，卖出时务求最昂贵，一方面使劳动者的工资低减，一方面又使消费者受重价损失，当赚钱时便把盈余放入自己的荷包，当折本时又将损失转嫁于他种事业的肩上。傅立叶曾经说遇："在一种合理的组织内，商业公司必须负连带责任，共同组合宜加以保护，不使受破产、投机、垄断的危险。"若使农业不受商业的欺诈，只有一个自救方法，即是组织一个共同组合（Die Genossenschaft)，而其在现代土地散漫的时候，亦只有农业的共同组合，方能实行分工的计划。

（六）理想组织中之分配

法郎克的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转让的，所有土地、建筑、工厂皆属于公有。换言之，所有工具皆公共之物。每一种工业皆是一种公开的事业，社会收入重于私人收入，资本、劳力、技能三者为生产必需之具。生产所得，以十二分之四归资本，以十二分之五归劳力，以十二分之三归技能，劳力既得十二分之五，比资本所得较多，从此足见劳力重于资本了。每人皆给以股票，此种股票与我们今日之银行钞票一样流通。

（七）理想组织中之教育

儿童教育在傅立叶的制度内占狠大部分，我们现在只举列一二。他把五岁至九岁的儿童与九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分作两种，一种叫作"小联"，一种叫做"小队"。在"小联"中女孩占三分之二，男孩占三分之一，他们的工作是美之修养，如栽种花草、培养家畜、装饰会堂、发明新式装束、保持善良习惯与语言之类。总之，他们是从"美"到"善"。在"小队"中男孩占三分之二，女孩占三分之一，他们的工作是极龌龊的，譬如打扫毛厕之类，他们是狠粗野的，狠喜欢在龌龊东西内活动，这个"小队"是上帝的军队，常常骑着小马、挂着徽章，受人尊敬。总之，他们是由"善"到"美"。此种教育制度，无论贫富儿童都是一样的。

（八）理想组织中之政治

在此种共同组合内的一切官吏系由选举产出，每一个人在他时常往来的“团”与“组”中都有选举权，但是他对于不属于己的物件无决议权。女子选举权恰与男子一样。每团每组都选出一个公会，此公会保护团体中特别利益与编制出入预算及担任传达事宜。在全体法郎克之上设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指挥日常事件，注意普通职务，这个政府是由一种法院（Areopay）所委任，这种法院是由（一）各“组”的领袖、（二）三个最老家族的族人、（三）主要股东、（四）有爵位之人所组成的。这个法院没有什么章程，因为一切都是由于一种“引力”治理的，这个法院管理重要的事体，如五谷、果实、葡萄的收成与建筑事业等等，这个法院的意见诚然是一切工业的指南，但是亦不必拘束。至于法郎克政府的决议，须经过“组”的同意始能确定，但是对于一种特许之事实，如人口表之类，可以自由处理，这个政府在普通会议、交易会议、财政会议之中常作主席。

在此种政府之中，有四对少男少女（但是不必彼此成婚）代表统一的统治权，有十二对少男少女代表十二欲的统治权。

在每一个政府之中，有十六个王位（四个代表统一，十二个代表十二欲），每一个王位又是一男一女，所以一个政府之中，凡十六对，共三十二人。政府中的爵位表如下：

（一）Der hohe Feldbankundige und die hohe Feldbankundige der Geruchs Passion

（二）Der hohe Musikant und die hohe Musikant der Gehors Passion

（三）Die hohe Pedellin und der hohe Pedell der Gesichts Passion

（四）Die hohe Arbeiterin und der hohe Arbeiter der Gefuhls Passion

（五）Der hohe Magenweise und die Magenweise der Geschmacks Passion

（六）Die hohe Königin und der hohe König der Familien Passion

（七）Die hohe Fee und der hohe Fee der Liebe Passion

（八）Der hohe Pfalzgraf und die hohe Pfalzgräf in der Ehrgeiz Passion

（九）Das hohe Königlein und die hohe niedliche König in der Freunpschoft Passion

（十）Der hohe Künstler und die hohe Künstlerin der Schmetterling Passion

（十一）Der hohe Gelehrte und die Gelehrtin der Kabale Passion

（十二）Die hohe Vestalin und der hohe Priesterin Fakir der Zusammengesezten Passion

（十三）Der hohe Priester und die hohe Priesterin des industriellen Kultus

（十四）Der hohe Priester und die hohe Priestesin des religiosin Kultus

（十五）Die hohe Monarchin und der hohe Monarch des Gunstlingswesens

（十六）Der hohe Monarch und die hohe Monarch des Charakters

除了第六个家庭欲的爵位是世袭外，其余一切皆是一年或两年选举一次。但是第十六个最高爵位，是一次选出之后即终身在职。第十二个爵位是从十九岁的童子中选出来的，以代表将入婚娶的恋爱。假如傅立叶的制度随处遍立，则世袭的家族欲爵位应首先建设。

此种爵位之分配，不仅是许可现在的侯爵及官吏依然保持其位置，而且因战争革命失位的侯爵仍可再为任命。

（九）理想组织之世界

假如世界已被法郎克布满了，那么，每一个法郎克有一个“第一政府”或称男爵，三个或四个“第一政府”构成一个“第二政府”或称子爵，三个或四个“第二政府”构成一个“第三政府”或称伯爵，如此推算下去，以至于构成“第十二政府”或称王爵。此种“第十二政府”全世界只有三个，最后构成“世界政府”，故将来的世界组织如下：

政府数目	每一个政府居民之数目
三百万个“第一政府”	一六〇〇～一七〇〇
九十万个“第二政府”	五六〇〇
二十五万个“第三政府”	二〇〇〇〇
七万个“第四政府”	七一〇〇〇
二万一千个“第五政府”	二四〇〇〇〇
六千个“第六政府”	八三〇〇〇〇
一千七百个“第七政府”	二九〇〇〇〇〇
六百个“第八政府”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百四十个“第九政府”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四十个“第十政府”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二个“第十一政府”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个“第十二政府”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个“世界政府”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十）傅立叶之世界进化论

照着傅立叶的意见，将来经过社会调和后，地球自身是要变化的，君士坦丁将成世界的首都。地球与其他天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他亦有所谓年龄。地球上的现象可以变化二十六次，现在地球上我们所看见之变化，只算是二十六次之一。每一次变化的作用，是经过男性的北方液体与女性的南方液体的结合，一个行星是一个含有两种精神、两种性欲的物体，他的产生是由两种生殖的交媾，恰与动植物一样。一旦人们将地球开垦到北方六十度的时候，天气将日变为温和，那永远变化的北方光线便静止了，围绕着北极造成一种温暖光辉的圆圈，从此以后三分之一的北半球，发出温暖空气，有如 Andalusien 与 Sizilien 两地的气候一样。在那种北方圆圈中的甘露，使全球的空气皆变为愉快，海水将日益清洁，野兽亦忽然死尽，只存了一些愉快柔顺有益于人的动物。现在我们可以注意，我们的世界还是童年时代，但是这个童年恰与老年一样，传染了许多痛苦和不健全。太古时创造了十六种人，九种在旧大陆，七种在美洲，我们人类已经经过下列各种时代：（一）极乐，（二）洪荒，（三）酋长政治，（四）野蛮，（五）文明（这即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此后第六个时代可以称为“保证”（Garantisums）。从此以后产生简单的社会与初期的幸福，最后乃产生共同的组合与最高的幸福，从那时起，经过八千年，人类又漫漫退化，由少变老。每一个时代分作两个半期，每一个下半期又含有产生第二时代的种子，地球年龄共有八万年，自此以后，动植各物也就归于寂灭了。

我们的工作[①]

我们相信要创造“少年中国”，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能包办的，所以我们主张“社会分工”。换言之，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团体对于社会，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我们又相信要创造“少年世界”，亦不是一个民族所能包办的，所以我们又主张“国际分工”。

① 本文写于1922年8月1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一期。

换言之，每一个民族对于世界，都要有他的特殊工作。因此之故，我们便不能不常常自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团体对于社会、世界究竟分了一种什么特殊工作?"

我们所分的特殊工作，便是下列两种：

（一）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

（二）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

我们何以要从事这两种运动呢？第一，我们以为无论一种什么完美的"主义"，皆要有一种健全的"人"，才能应用。可惜我们中国的"士农工商"，把这个"人"字的工夫都还没有做到。现在可是好了，上海的资本阶级已经起来了，一部分之智识界外交家已与之努力联合了，我们预料在不久期间，中国的政权要转移到所谓"商教阶级"之手了。换言之，"士商两种人"都有享受"人的生活"之一日了，用不着我们担忧了。至于我们中国的工业，现在虽不发达，但是直接为中国资本家作奴隶、间接为外国资本家作牛马的工人，亦渐渐的不少了。现在可是好了，广州一部分工人已经有了团结了，一部分之青年已经组有共产党作其先驱了，我们预料所谓"人的生活"亦渐渐要轮到"工"人了，亦用不着我们担忧了。我们眼看着现在所被人忘却的，只有一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人了，他们对于"人的生活"大概是没有分了，但是他们却占了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这便不能不使我们担忧了。因此之故，我们不能不敬告一般资本家，你们努力发展工商，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工商的原料，是我们农人所生产出来的，不先有我们农人，便没有了你们工商家。我们掉过头来又敬告一般共产党，你们主张共产，我们并不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列宁的话："农民是共产主义的仇敌。"若有了我们农人，便没有了你们共产党，你们若要实现共产主义，便不可不先在我们农民身上用一番大工夫。我最爱的青年朋友们呀，我们不可不立在资本家与共产党的中间，从事这种改造农民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预备工夫，这便是我们所以要从事第一个特殊工作的原故了。第二，我们以为无论讲什么大同主义、世界主义，首先要每一个民族皆须撑得起腰来。现在有许多人高谈世界主义，对于英、美、德、法工人之不平待遇，常抱无限同情，而对于我们四周围的弱小民族，一个个快被人压迫死了，我们却毫不动心。法国《人道报》至今犹常常提及中国台湾人民，代为伸诉苦况，而中国报上早已不见台湾二字了。朝鲜革命，日本志士尚肯从中帮助，而中国青年则只是袖手旁观。我们真是没有同情心的人类呀！我们既号为亚洲的文化古族，我们以人口幅员而论，又负有纠合亚洲各弱小民族与世界列强对抗的天然资格。从今以后，我们再没要高谈怎么样帮助英、美、德、法工人了，只是研究我们怎么样扶助我们四围的弱小民族，乡邻有难，我们应该被发缨冠而往救之，若是亚洲的弱小民族撑得起腰杆来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国家，失了殖民地势力的凭借，亦自然会倒了。

这便是我们所以从事第二种特殊工作的原故了。

我们以上述两种特殊工作自责，社会上亦以此两种工作责我们。若能成功便是我们的“素志得偿”，若不成功则社会上亦可宣布我们罪状，说“责有攸归”了。

最近我们参与德国“国际青年团”时，曾在场中散布一种传单，说明少年中国学会的旨趣。我现在把他译录如下，以作本文的结论。

少年中国学会传单

我们的宗旨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我们的责任　我们以为，若要实现我们的理想，须经过国际的与社会的两种分工。

（一）国际的分工

(a) 我们以为若欲改造全世界，则每一个民族皆须努力先自振拔。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负有创造少年中国之责任。因此之故，“少年中国”的意义，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而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这是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第一种责任。

(b) 我们以为若欲使全人类皆得着幸福，则每一个民族皆负有扶助其他弱小民族脱离压迫的责任。我们居在亚洲，所以我们负有扶助我们邻居，如高丽、印度、安南、波斯、阿富汗、俄罗斯之类的责任，因为他们朝夕呻吟于我们左右的原故。这是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第二种责任。

（二）社会的分工

(a) 因为我们欲将全力应用在社会方面，所以我们不加入政府及议会。换言之，我们的运动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社会的。这是我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第一种责任。

(b) 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假如我们欲改造全中国，那么，我们第一应先改造农民。因此之故，我们一方面从事农民教育，他方面则拟组织一理想经济之模范村，使全国受其影响，此种模范村之集合，即是我们的少年中国。这是我们在社会分工中的第二种责任。

我们的会员　因为我们不愿立在任何宗教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会内没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因为我们不愿参加现在中国政治运动，所以我们会内无官吏议员，而且我们独立于一切政党之外。

因为我们欲求各民族之相互了解，所以我们会员百分之六十，在外国留学或作通信记者。因为我们欲改造农民思想，所以我们一部分会员从事农民教育。

因为我们反对一切国内国外强权，所以我们有一部分会员从事革命事业。

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作是创造“少年中国”之预备工夫，创造“少年中国”是创造“少年世界”之预备工夫。我们希望表同情于我们的人们，与我们共同工作。

少年中国学会驻德代表王光祈
柏林马利杜夫街十六号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

致左舜生书[①]

舜生兄：

日前曾上一函，计已收到。顷读我兄八月十一日致慕韩之信，对于弟之主张，颇有误会之处。其实吾辈主张，本是根本相同，所有误会，皆由文字意义含混所致，兹请再将弟等主张重述如下：

（一）我们所反对之政治活动，其意义专限于“做现在的官吏议员”，此外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皆极赞成。

（二）我们赞成革命运动，但是须分为两种进行，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文化的，而且非先有充分预备工夫不可。

这便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去年我兄在南京会议，曾谓“现在三五零星加入政界是不成功的”，足见与我们第一种主张完全相同。其实做现在的官吏议员，亦不是一种绝对的坏事，不过我们为社会分工起见，我们不干那种勾当罢了。我们因为要邀约一般同志专从社会方面用功夫，所以有结合团体之必要，至于做现在的官吏议员，尽管不是坏事，但是士各有志，殊不必与我们同在一块儿鬼混，以淆乱我们“社会的社会改革”的旗帜。

关于革命运动的主张，亦全与我兄相同，前年弟致代英兄一信，中有一表，言吾辈将来之进行，即主张武力革命与和平改造同时并行，我兄当能记忆（此信已登《少中》，惟表未列出）。现在弟之主张，仍未丝毫变化，不过现在更重视预备工夫。

总之，不先在一般平民身上用一番深厚工夫，无论你从事政治活动，或是从事武力革命，皆是没有基础的，即或成功，亦不能持久的。我们因为有这种迷信，所以我们要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22年10月2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二期。

找一般与我们迷信相合的同志在一块儿走，究竟看看我们这种迷信对不对。

假如我兄对于以上的话不加反对，那么我们便应该划出一个活动范围，只要不违理论，不背事实，我没有不赞成的。前次学会问题号我列的那个表，本来是供参考的，可以大加改正。（下略）

弟光祈　十月二日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①]

本会同志诸兄均鉴：顷接本会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敬悉去年杭州年会情形，无任欣慰。弟对于杭会两种决议：（一）本会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二）本会会员不得作一切官吏。但如遇与官吏类似之职务至发生疑义时，由本会评议机关临时解决之云云，完全同意。并请评议部诸兄即以此两种议决，举行全会总投票，使学会经年未决之问题，得以圆满解决，是为至盼。惟弟于此有附带声明者一事：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固为吾辈素志。惟欲实现此种目的，非先造成社会势力不可（换言之，以社会事业作基础之势力）。弟相信只有此种社会势力始能抵抗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巢穴。因此之故，凡国内主张用社会势力以抵抗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巢穴者，吾辈皆可引以为一时同志；反之，凡主张亲交甲国以抵制乙国（如亲美派之所为），或利用甲军阀以推倒乙军阀（如国民党之所为）者，吾辈皆在排斥之列。总之，反对帝国主义，须建在民族自觉之上；推翻军阀势力，须建在社会自觉之上。所有李鸿章式之“以夷治夷”政策，孙逸仙式之推倒军阀方法，皆宜严行屏弃。吾辈今日之所应从事者，即在如何唤起民族新觉悟，与夫如何建筑社会新势力。此外一切皆非根本办法。弟甚愿以此二事与吾同志诸兄共勉之。专此敬询诸兄起居安好。

弟王光祈自柏林上言　一月六日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 1923 年 1 月 6 日写于柏林，1923 年 1 月 9 日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二期。

我们应该怎样运动[①]

我在《我们的工作》文中（见本志四卷一期），曾提出两种运动：（一）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二）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以作我们对于社会、国际的分工。现在请再进一步，讨论怎么样运动。

我以为要着手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第一必须先握乡村教育权柄。若要从事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第一必须先谋民族交际机会。为达上述两种目的起见，我们亟应组织下列两种机关：

（一）乡村教育协进会；

（二）亚洲民族交谊会。

此种运动，当与全国青年合作。换言之，凡表同情于此种运动的青年，皆可得为该项组织之一员。

（一）乡村教育协进会。此会进行程序须分三种：第一步改造农民生产，第二步改造农民生活，第三步改造农民生计。兹请略述其理由如下：

我们最后目的，诚然在农民生活改造与农民生计革命。但是我们若将此种主张骤向农民宣传，农民未有不骇而却走的。所以我们第一步须先提倡改造农民生产，譬如种子、农器、耕植等等改良方法，把他印成传单，到乡村去散布、讲演、指导，好像基督教徒传播福音一般。每到一地，我们须与该地略具新知的青年（或成年）联络，并授以我们总机关通信地址，使其与我们常常接近，此后“他们”便慢慢的变成“我们”了。

农民生产既日有进步，他们对于我们当然发生信任之心，我们从此便再进一步，与各地乡村青年教育家，谈到生活问题，譬如起居、饮食、娱乐、小节，以至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我们皆须给他一种不奢不陋、不偏不激的主张（这种主张当然先由我们总机关讨论决定），并佐以关于欧、美、日本人生活的幻灯照片，以引起其兴趣（改良生产之事，亦可利用幻灯照片宣传），然后他们久而久之，便觉得从前所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了。

生产既进步了，生活既改良了，紧接着的便是生计问题。现在主张劳动运动的人，

① 本文1923年5月29日写于柏林，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五期。

两只眼睛只看见大厂主、大地主的可恶。其实大厂主、大地主虽然有时用尽心计、打尽算盘，但是他们有时却曾为促进经济进化的要素，我们一读欧美经济历史便知道了。换言之，他们还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的、有能力的人。这种人无论在什么世界里，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多是立得住脚的，不过社会组织的严松，与他们作恶程度的小大，有密切关系罢了。而我们中国则不然，全国之人一大半是作农的，全国农人一大半是为小地主作奴的。这种小地主，他并不管生产进步与否（此与欧美大地主相异之点），他只是坐受农人供给，养成一种消极的、懒惰的、无能力的人。这种人，上之既不能增进人类进化，下之亦不能与并世强族共存。我们为人类幸福计，为中华民族生存计，还不赶快设法将他们铲去吗？假使我们的运动成熟，农民的智识增进，这种坐吃懒做小地主的产业是应该收归村有的，这便是农民生计革命成功了。

我们的理想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士农工商四合国”。士的阶级，现在已有各处“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了（我不取滥绅厕列之教育会）；工的阶级，现在已有各处“铁路工会”、“工厂工会”代表了（我不取有名无实之工会）；商的阶级，现在已有“各帮商业联合会”代表了（我不取官味甚浓之商会）。只有农的阶级，还待我们去造。若是造成功了，将来的国会组织应如下表，无职业的人是不得干预的。

<table>
<tr><td rowspan="4">国会</td><td>士会代表若干人（专指精神工作者，如教育家、著作家、美术家、戏剧家之类）</td><td rowspan="4">上述四种代表，由士、农、工、商四个总会选出，其数彼此相等，凡代表有失职时，由该会自行撤回。</td></tr>
<tr><td>农会代表若干人（专指真正农人所组织的）</td></tr>
<tr><td>工会代表若干人（专指各路各厂工人所组织的）</td></tr>
<tr><td>商会代表若干人（专指各帮商业所组织者，银行亦包含在内）</td></tr>
</table>

至于中国经济组织，既不能完全变为工商国家（因中国农民甚多之故），亦不能专以农业立国（因外国资本家挟其工商势力侵入之故）。所以我主张将来中国对于国际贸易，农业则求其尽量发展，增加输出；工业则但求自给，藉塞漏卮。因此之故，大规模之工厂，我们是应当择尤设立的，但是须由下列三种团体合组（注意下面所谓农村，是经我们运动之后，已具经济单位雏形的）。

<table>
<tr><td>农村</td><td>担任原料</td><td rowspan="3">其所得之利，按照情形以最公平方法分配之，此种工厂全国各地皆可随处自由联络设立。</td></tr>
<tr><td>商会</td><td>担任资本</td></tr>
<tr><td>工会</td><td>担任劳力</td></tr>
</table>

照上面看来，我既不主张用资本主义或劳动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我亦不是主张农村立国而不管中国工业，而是要将农、商、工三种势力合于一途，以发展中国幼稚工业，力求自给，以御外国久经训练之资本主义侵略。

以上所言皆系关于国内问题，现在再谭谭我们的国际运动。

（二）亚洲民族交谊会。此会应该设在上海。其进行程序，第一步，须设法网罗侨居中国之亚洲各种民族有志人士为会员（日本人亦可参加，惟排斥其帝国主义之份子）；第二步，由各会员分组各部（如中国部、朝鲜部、印度部、俄国部之类），担任传达各该民族之消息（如该民族之政治愿望、经济情形等等，或译为华文送登各报发表，或译为各该国文字送登各该国内地报纸登载，或请彼邦人士在中国内地设临时公开讲演）；第三步，由会中派遣有志青年前往各该国旅行；第四步，凡该国有逃亡政治犯来华者，吾人应设法保护，倘实际上我们可以积极帮助时，我们更应披发缨冠而往救之；第五步，我们亚洲各民族应该研究一个合作自卫的方法。

自欧战以后，欧洲各国多变为“北美合众国”之债务者，事事须仰美人鼻息，于是欧洲论坛常有倡为“欧洲合众国”之说者（Die Schaff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以抵制“北美合众国”。我们现在亦可倡为“亚洲合众国”之论，以脱离外来强权压迫。欧洲民族复杂，利害冲突，“欧洲合众国”之说，今日尚非其时。若吾亚洲民族，则除日本少数军阀、财阀外，无不呻吟于外来经济政治侵略之下，其能合力共作，实较欧洲各国为易。

朋友们，我们若要排除国内游民（军阀、政客亦包含在内），便不可不提倡“中华四合国”；我们要抵抗国外强权，便不可不提倡“亚洲合众国”。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利器。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寄自柏林

社会活动的真义[①]

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社会活动”与其他各种运动，颇有相异之点。举其著者，约有三端：

第一，现在一般人所从事的“政治运动”或“爱国运动”都是一种“跳”的运动，不是一种“走”的运动。换一句说，只是把一般国民引起暴跳一阵，但是一步也未前

① 本文发表于1924年2月《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期。

进。诸君！我们知道“跳”的运动，是不能永远继续的，而且跳来跳去，终是未离原地，与我们“走”的运动大不相同。我们主张慢慢地走，就表面上看来，诚然是不及“跳”的运动来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持以毅力，一天走五十里，十天便可走五百里。常常都在前进，终有达到理想目的之日子。而且我们慢慢行走，可以自早至晚不息。若是专门暴跳，实难继续两钟以上，即或有人能够暴跳两钟以上，可惜仍是未离原来地点，只算他白费其力。现在一般主张“爱国运动”的人，总是讥骂国民只有五分钟热心；至于我呢，不但五分钟，即两分钟也不能支持。因为这种“跳”的运动，原是不能永远继续的。

我们既主张“走”的运动，那么，唯一的条件，就是努力促进各种社会事业，使国民精神上物质上都得着一种慰安与满足。若要促进社会上各种事业，则我们个人至少必须具有一项社会事业的“专门常识”。诸君或者要笑我把“专门”与“常识”两个名词连着并用，颇不逻辑。因为既曰“专门”，便非“常识”；既曰“常识”，又不“专门”了。但是诸君暂请勿笑，我还另有一番特别见解，我以为若有人对于某项社会事业，具有极高深的智识，那么，我们更应该称呼此人为某项社会事业的专门学者。不过“学者”这件事，一方面要有与生俱来的天才，他方面又需极为深厚的学力，此外还须处在一个易于求学的环境，不是人人做得到的。我现在希望一般具有热诚改革社会的青年，只须具有某项专门事业的普通常识，然后他对于该项事业始知道怎样着手改革的方法。积无数具有丰富常识的专门事业人才，然后各种社会事业，始能蒸蒸日上，国民思想及生活亦始能逐渐进步。因此之故，现在主张“政治运动”的先生，尽可以不必读书，尽可以不必从事专门事业的训练。而我们主张“社会活动”的青年，则万不可不具“专门常识”，否则我们改革理想终于无从着手（其实讲政治运动，又何尝不需专门智识。不过现在一般“政治青年”，以为政治只须天才与热诚便可成功，所以他们都是预备作总长一类的政务官，以便发表一篇大政方针，绝不屑作司长以下的事务官，必须身亲各种专门事件。换一句说，没有教育智识的人，尽可以去作教育总长，却不必能作专门司长。因此一般胸怀大器的青年，都不必再读书，只预备总长资格就够了）。

第二，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活动”，既不是一种专尚空谈的文化运动，亦不是一种只求实利的社会事业，而是一种“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现在国内一般谈天说地的新文化运动者，做了许多文章，大半只有高远思想，而无基础事业。反之，一般专谋实利的社会改革家，办了许多事业（如学校陈列所、图书馆之类），又可惜无一点高远思想。换一句说，前者只有精神而无躯壳，后者又只有躯壳而无精神。我们的“社会活动”便是把这个精神装在一个躯壳之中，简单说来，便是“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因此之故，我们非办学校、报馆、实验室、博物院等等不可，同时我们又非有极深厚的

理想为之前导不可，两个要素须打成一片。

第三，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活动”，又与一般所谓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他们的手段，第一步在引起民众的不安，第二步激起民众的反抗，第三步反抗若能胜利，然后实现他们理想的经济组织。我以为民众的不安，我们是应该引起的，但是引起之后，必须同时有一种东西足以慰安他们，不致流于悲观失望。譬如身在狂风暴雨之中，极为局促不安，忽有古庙一所现于目前，此种古庙诚然不是我们的理想所在，但是一般民众大可借此暂时休息，精神当然为之一慰。休息之后，我们再引起他们的第二次不安，又向前面再进，再进不已，终可达到我们的理想目的。现在一般社会主义家，于引起不安之后，直接继以反抗，以中国那种缺乏智识、毫无组织的民众，与强有力者相抗，好像驱逐一般小孩子向河里跑，自然只是一种牺牲。“不安”是痛苦，“牺牲”又是痛苦，而理想的乐园，此时又复渺不可及。那么，一般民众的悲观失望更将与日俱增了。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本已有彷徨失所、落落不欢的病象，若再加上一个悲观失望，其势非将全民族的生气断送干净不止。诸君！我们知道自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来，一般老辈专在引起民众不安方面做工夫，而不老老实实办几桩有益民众的事业，好像在一群饥火中烧的人们中间，大讲演其“饥饿痛苦”的论文，同时却不给人一碗干饭，以致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乎沟壑。我们现在万不可再蹈覆辙。至于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活动”，则系不安之后立即给以安慰。譬如我们大呼“你们的智识真正贫乏呀”，同时我们必须立即创办种种学校，以安慰他们。又如我们大呼“你们的精神生活真正无聊呀”，同时我们便须设备种种美术，以安慰他们。又如我们大呼“你们的物质生活真正简陋呀”，同时我们便须筹备各种实业，以安慰他们。使他们常常乐观，相信理想的乐园，并不是不可企及的。

总之，我们因为要使国民全体为有秩序的前进，便不能不力谋各种社会事业之精神与实体两方面同时发达。要使各种社会事业精神与实体两方面同时发达，我们个人至少必须具有一种社会事业的“专门常识”，这便是我们的社会活动与其他各种运动不同的地方。

致苏州会议诸同志[①]

本会参与苏州会议同志诸兄均鉴：近读《少年中国》四卷八期苏州大会宣言，敬悉兄等对于“少年中国运动”甚为努力，至以为慰。惟宣言中有“数年以来因同人能力的薄弱、学识的肤浅，亦常徘徊歧路，未敢自决其行动的方针，殊自愧有负一般厚爱本会者雅意”数句，似嫌略有语病。本会宗旨统言之，则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析言之，在理论方面，则为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由此以唤起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亦可称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实际方面，则为从事各项社会事业，增进精神物质幸福，由此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活（亦可称为民族生活改造运动）。本会持此宗旨与国人相周旋者业已数年，即弟等个人求学作事，亦以学会之宗旨为宗旨，何能言“徘徊歧路未敢自决其行动的方针”？即此次苏州大会所定“学会进行方针”以及“学会纲领九条”，又何尝出乎吾辈数年以来所鼓吹所运动之范围以外？请诸兄一查年来月刊论文以及吾辈个人行动，则知此次苏州大会所定者，固早已在实行之中矣。凡人一日未能自决其行动的方针，则一日不能生活下去，弟自信本会行动方针早已决定，所惜者行动太少，是为愧耳。今后更当努力行动，愿与诸兄共勉之。专此即颂
学祺。

弟王光祈上言　三月十九日自柏林寄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写于1924年3月19日，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①

姓名	籍贯	通信地址		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入会以后的简单经历		填表日期	备注
		最近	永久			学业	事业		
王光祈	四川省温江县		上海哈同路中华书局编辑所左舜生君转交	我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最近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相对赞成。民族主义系以争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汉、满、蒙、回、藏统称为中华民族），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至于将来中国政治经济组织应采何种形式，则须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后，再按照彼时世界现状及趋势，与夫国民程度及愿望而定。此时不宜胶执己见，多立党派，减少国民对内对外战斗能力。	倘会中国家、共产两派不能合作，则主张将学会分为：（甲）少年中国学会国家主义派；（乙）少年中国学会共产主义派；（丙）少年中国学会民族主义派。甲乙两派系各以政治信仰为结合，丙派则专以“学”与“事”为结合。如甲乙两派之会员自愿加入丙派，在“某学”或“某事”之下合作皆欢迎，否则亦不勉强。如甲派或乙派不愿同隶一会，或认为根本上无设立本派之必要，则会中便不设立甲派或乙派，该派会员应自行退会。如会中果分为三派进行，则以后会中应由丙派出三人，甲、乙两派各出一人，组织委员会，掌管全会介绍会员事宜，以免会中分子过于偏右或偏左。总之，学会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不能开除政治活动意见不同之会员。凡会员对于上述三派皆不愿加入者，是无意于会事可知，宜除其名。	民国九年以前在北京研究政治经济，九年四月赴德，研究政治经济，作报馆通信三百余篇。十一年冬改习音乐，从事音乐著述，到现在已脱稿者共十一种（计用中文著的共十种，用德文著的共一种）。	毫无。至于团体关系，亦只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在会中曾任筹备处主任一年（在发起后），执行部主任一年（在成立后），但皆无所建树。	1925年10月11日	改组委员会诸兄均鉴：此次只寄来正副各四张，但德国会员有七人，不敷分配，故每人只能填写一张。光祈白

① 该表是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选出的五人改组委员会编制并印发给会员们的。调查表有统一的格式，当时规定每人须填两份，“一备付印，一备保存”，有会员按规定填写了两张表格，但也有会员未填写。王光祈于1925年10月填写。

《少年中国运动》序言

一、本书刊行之由来

少年中国学会之发起已有六年，对于中国社会，虽未有若何显著的贡献，但是对于“少年中国运动”之努力，则未敢一日自懈。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希望，是在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此种工作，何等伟大，当然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见效的。

我个人在这五六年之中著了三百多篇文章（杂志论文和报馆通信），都百万余言，其中无一篇无一字不是本着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至于我个人求学作事的计划，亦无一时无一处不是本着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

在那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专谈少年中国学会之运动的，现在择其最要者若干篇都为一集，名曰《少年中国运动》。其中主张虽不必代表少年中国学会的全体，然至少可以代表我个人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意见，一与国内青年同志商榷。

二、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

“少年中国运动”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我记得民国七年本会发起时，曾慕韩君曾主张取名“复兴社”，但是我以为用“少年中国学会”之名含义较为明了，后来曾君以及其他会友都赞成我的主张，于是始有今名。从此我们可以见得所谓“少年中国运动”，其实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直到去年（民国十二年）十月，国内一部分会员在苏州会议，决定学会进行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亦只是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我们“少年中国运动”与国内其他各种运动不同的地方，便是我们眼中只看见了一个“中华民族”。再进一步说，我们只看见了一些“中国人民”，无论什么功罪，我们都归之于人民身上。譬如其他一切党系常说：我们国家太弱了，我们非赶快“造国”不可。我们学会则以为国家之弱系由于组织这个国家的民族不强，我们与其忙于“爱国”、

"救国"、"建国"，不如赶快"救族"、"教族"、"育族"。又如他们说：中国之弱系由于政治不良，我们非从事"政治运动"不可。我们则以为政治之不良系由于无良好社会，良好社会之所以不能养成，又由于无良好人民之故，所以我们应该先"造人"先"造社会"为一种"社会活动"。又如他们说：中国之弱系由于外则强权压迫，内则军阀暴虐，我们终日都在他人压力之下，所以国事毫无进步。我们则以为他人诚然不好，但是我们自己亦未必高明，我们的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庸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种种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总之，这不是他人残虐的问题，乃是自己无力的问题。因此之故，不宜多骂人，只宜责自己。要而言之，"少年中国运动"是把一切罪过都归之于社会的方面与人民的身上。现在我们所应该努力的，小之则为改造我们个人，大之则为改造全体民族，纯是一种自反的自修的国民改造运动。把这步自反的自修的功夫做到了，若是那般内外恶魔还是在那儿张牙舞爪的向着我们、压迫我们，那么，我们尽可持刀杀人，因为杀了之后，我们自信比他们高明，而且我们虽有杀人的凶行，但是我们心中却非常安泰。

近来国民党人颇觉得中国人民程度不够，非由该党夺得政权之后出来"训政"不可。其实现在所谓"一党专政"（或以党造国），与从前袁世凯所谓"开明专制"，进步党所谓"贤人政治"，在我的眼中看来都只是一邱之貉！因为要实行这种"训政"手段，有两个前提：第一个，便是须待到夺得政权之后；第二个，便是该党之内须尽是贤人（至少亦要有大部分）。我现在且问该党何时始能夺得政权？换言之，我们这种不识不知的人民，须忍受刀兵水火之苦，至于何时然后始得该党所谓"训政"之益？又该党党人是否已具"教训他人"之资格？若是这两个问题不得圆满确切的答案，则一切都是欺人之语，殊无讨论价值。

我们"少年中国运动"则与此不同：第一步我们只是自己教训自己，同时再以其修养所得者，分给一些与我接近的人民，使他们随时都在进步之中。因此之故，我们的运动第一无须夺得政权，第二我们亦不必备有贤人资格（因为我们分给于人者，只是一部分自己专门修养所得，并不是笼统的教训他人，作他人的师表）。这是一种何等轻而易举的事呀！人人皆可以作此运动。又是一种何等急切需要的事呀！人人皆必须作此运动。

三、怎样使中华民族复兴

上文曾说"中华民族复兴"是"少年中国运动"的目的。现在再进一步，又问：用何种方法使这个目的达到？我们的方法计有两种：（甲）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乙）民族

生活改造运动。

请先言“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大凡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能维持其相当的位置，与其他民族并立，必须备有一种“民族文化”，以表现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习惯等等特色，同时又以之促进本族的团结。反是者其族必亡，或终为人所奴隶。

我们中华民族立族已有四五千年，不能说是没有一种“民族文化”（至于此种民族文化适应时宜与否，又是另一问题），不过是现在早已衰微罢了。因此之故，现在有许多中国人欲借西洋的文化来救济中国。但是从前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西洋文化”始终不甚了解：最初误以为西洋文化便是兵车炮舰（如李鸿章、张之洞时代），其后又误以为是政治组织（如宪政党、同盟会时代），再其后又误以为是工商实业（如改革后长江流域新兴之工商阶级是）。直到现在才知道以前种种揣测都错了，我们要了解西洋文化，非从他的哲学、宗教、科学、美术日常生活上面下手，以寻求其“根本思想”之所在不可。这个“根本思想”乃是西洋的真正文化，其他所谓兵车炮舰、政治组织、工商实业，皆不过此种“根本思想”表现于外的一枝一节罢了。这真可算是中国人寻求西洋文化的绝大进步，但是同时又却是我们本族文化的极大危险。何以言之？因为从前只看见一些西洋文化的皮毛，而对于本族文化始终未尝怀疑，所以张之洞可以大言不惭的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可糟了，我们已经看出西洋文化的精髓了，真可谓优美完备，令人叹赏不置。回顾中国民族文化，则残缺简陋，难与他人比肩。从此我们不知不觉的遂自惭自馁起来。于是一般新学之子，日日想慕西洋文化，讴歌西洋文化，而对于本族文化则认为一钱不值，有妨进化。所有五千年我们立族的精神，就从此“呜呼哀哉”了。这是一个什么危险时代？这便是所谓“新文化运动时代”。

来了！来了！少年中国学会来了！我们学会出世正值这种“新文化”蓬蓬勃勃的时代，但是我们却别有一种见解。我们以为西洋的物质文明诚然可以尽量采用，毫无妨害，至于民族文化——即一民族精神之所由系，生活之所由出——则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色彩与根本思想。这种特殊色彩与根本思想是由遗传、历史、信仰、环境、习惯等等所养成的，万不能彼此随便通融假借。我们狠知道西洋人的根本思想——即他们的民族文化——颇有其独到特长之处，尤其是用以培植整理他们根本思想所采的科学方法。因为他们有那种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他们的哲学、科学、美术都弄得非常精深博备，由这种精深博备的哲学、科学、美术再产出他们的人生观，自然是卓绝一世、无可与敌了。至于我们中华民族呢？说到根本思想，不能说是没有；说到根本思想的本质，亦不能说是劣于西洋；所最缺乏者，便是用以培植整理这种根本思想的科学方法。因为我们没有一种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无论我们的哲学、科学、美术都不能充量发达。即偶有一二至纯至善的思想发生，亦因无科学方法整理之故，任其淹没不彰，或甚至于参加许

多不良的成分进去，以致思想本来面目为其所蔽。直到今日欧化侵人，而我们竟无一种完备的根本思想与他人相见，反觉自己真是一种劣等民族，我们真正惭愧！

但是诸君不要惭愧，我上文曾言根本思想我们是有的，只是缺少一种科学方法。根本思想好像是一种原料，科学方法好像是一种机器，我们本已具有充分原料，只是缺乏一点机器加以制造。我们现在何不直接了当采用西洋机器呢？换言之，我们的根本思想何尝不可利用西洋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呢？从前西洋人亦曾利用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如罗盘针之类，以造成他们今日的伟大事业，我们又何尝不可一度利用他们的科学方法呢？一往一来，有何惭愧之有。因此之故，我们学会同人皆主张采用西洋科学方法，以整理我们民族的根本思想，造成一种“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所以我们学会的宗旨，亦明明白白规定道：“本科学的精神……以创造少年中国。”

这种“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潜伏在我们会员的脑筋中已非一日了，其表现于外者亦不止一次。兹择其最著者数次如下：（一）当《少年中国》月刊初出之时，会员魏时珍君尝致我一函，对于当时所谓文化运动略有批评，曾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发表之后颇为一般人士注目，某日北京某某数种新文化杂志之主笔健将，大会于某某大学教授宅中，斥魏君为张之洞式的思想发生（按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并协谋抵制《少年中国》月刊之法。座中有某某大学教授随提笔作“随感录”数则，极谩骂之能事，将于某杂志发表。其时我正在北京主持会务，每日坐在印刷局中从事撰稿校勘诸事，某某数杂志之主笔，固多与余相熟，旋泄其事于余，并愿出而调停。谓《少年中国》以后起之秀，乃持此种论调，势将不利于新文化运动前途，其弊实较“国故党”为尤甚。倘《少年中国》以后少登此种文字，某杂志之随感录以及其他攻击论文亦不发表云云。我当时闻言大怒，且谢之曰：某某杂志若有攻击《少年中国》之文字，尽可发表，无须顾虑，惧人攻击者非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云云。其后所谓随感录者似尚未登出，惟该杂志某某对于魏君之文曾有数次笔墨官司而已。然范围尚未扩大，故社会上亦未尝加以注意也。（二）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种“哲学民族”，素来生长于孔孟学说之下，不知有所谓宗教，故中国循数千年来信仰自由之原则，亦未曾发生一次宗教战争。惟近年一般欢迎欧化之人，以欧化中含有宗教成分，于是亦主张“中国基督教化”，其中尤以留美学生为最甚。在中国某某新文化杂志之中，亦尝发现赞美基督教之文字。我们学会会员周太玄、李幼椿君等，看见我们以哲学精神为根本思想的中华民族，现在要被人弄成以宗教迷信为根本思想的中华民族了，怒焉忧之，赶快著了许多“非宗教”的文章，连在月刊之上发表，同时国内方面亦请名人讲演，此事在中国人思想进化史中当然有他的相当位置。（三）从前西洋政治家对于中国是用的“武力侵略政策”，但是武力服人只能服其身而不能服其心，后来他们又一变而为“文化侵略政策”，要把中国人弄

得心悦诚服的投降他们，要把中国人变成一个“某国人的中国人”。这种已经变成“某国人的中国人”，当然要与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宣告脱离关系了。于是我们中国领土之内，平地忽然添了许多“籍隶中华而心存外国的侨民”，西洋人的“文化侵略政策”亦遂从此告厥成功了。我们学会会员余景陶、李幼椿君等，因此之故，著了许多“民族主义教育”、“反对教会学校”的文章，在各杂志发表，亦渐渐引起国人注意了。近来本会南京会员欲组织学校，其所标之义，一则曰实现本会的宗旨，二则曰创造中国的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根本思想加以拥护的一种表现（著者按：余、李诸君之文，虽有时常用“国家主义”的名词，但按其实质，多系一种“中华民族主义”)。（四）上面所述魏时珍君之拥护“中国人生观”（请参看《少年中国》一卷三期通信栏内)，周太玄、李幼椿诸君之反对“民族宗教化”，余景陶、李幼椿诸君之提倡“民族性教育”，都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欲加以拥护；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欲加以阐扬。但是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而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又是从何种“民族文化”产生出来的？我尝因此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详考细察西洋人的习俗，最后乃恍然大悟。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西洋人最不懂得待人，只知待已)。乐也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性灵之具；大而言之，则为协和万方之用。我们中国人生息于孔子学说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其基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们古代礼乐实有至深密切之关系。我们的古礼古乐，诚然有许多不适于今的地方，而且简陋得狠，但是古人立礼制乐的本意则千古不磨。我们现在宜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来，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请参看拙著《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德国音乐与中国》、《音乐中之民族主义》诸文)。

以上四例，即为本会五六年来关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表现于外之最著者。此外国内国外会员中为“中华民族独立”之运动者尚不知若干，或见于文字，或征诸行动，要皆以拥护“民族文化”为其出发之点。

上文所述皆关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为本会欲使“中华民族复兴”之第一种方法。现在再述第二种方法，“民族生活改造运动”。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简陋枯寂得狠！持与欧人丰富愉快生活比较，未相形见绌。我们推究其原因，不外二种：一为无识，二为无业。因为无识的人太多之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知什么叫做“人生”；因为无业的人太多之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民生产，日趋退化。要医治这两种病症，只有普及教育与发展实业两法。不过现在中国办教育的人，多偏于“理智教育”（即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两面，而

对于“感情教育”（即兴趣教育）则尚不大注意。好像是我们人生的究竟，专是限于“埋头书本生涯”或“预备谋生技能”两事而已，其结果学校设立愈多，人生枯寂愈甚。我们会员从事教育的则一反其道，于讲求学术、谋生技能两事之外，尤注重青年感情的发展与兴趣的培养，以引导他们渐渐走入一个丰富愉快的人生，完成我们“民族生活改造”的使命。至于发展实业，诚为改良民族物质生活最要之图，但是发展不得其道，亦将贻害民族。现在中国主张发展产业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用资本主义，一种是用社会主义。主张用资本主义的，不惜勾结外国资本家，以吮吸中国劳动阶级的膏血；主张用社会主义的，又只偏重厂工路工，而对于占有全国多数人口的农民反不甚措意。因此之故，我们会员对于发展实业一事，尤侧重农业。因为中国是农业国，为世界分工计，为国富发达计，皆非大规模从事农业发展运动不可。我以为现在世界上虽是工商国家大出风头的时代，而最后胜利则仍属之于农业国家。所以我常常提倡“农村改造”完成一种“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无论在人类生计方面、道德方面、身体方面，皆有重要关系。其义甚长，非此处所能详尽，读者可以参观拙著《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一文，便可略知一二（此文曾登载坎拿大《劳动杂志》）。总之，发展农业，改造农村，诱导农人，是我们学会对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的一个下手之处。

因此之故，我们学会宗旨大大标明“为社会的活动”几字，其实所谓社会活动，不过从事教育与实业两者而已。其在教育之中，则又偏重“感情教育”（请参观《中华教育界》余家菊、李璜君等之文便知）；在实业之中，则又偏重农业。换言之，所谓“为社会的活动”者，即是从事教育实业，以达到我们“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的目的。

“民族文化”既已复兴了，“民族生活”既已改造了，然后无论什么外国武力政策侵略也罢，文化政策侵略也罢，都敌不住我们这种元气充满的中华民族一扫。至于国内幺魔小丑的军阀政蠹，更不值一提，自然会倒。若是“民族文化”不复兴，便是无异表明我们的精神没有一个中心，还拿什么来抵抗外力？若是“民族生活”未改造，便是无异表明一般国人尚未觉悟，还拿什么来治理国家（因为并个人自己的生活尚不知改造，尚有何暇何力来改造国家民族生活？我素来深信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改革程序，以为无论古今中外皆莫不如此）？所以我对于现在许多国人之终日空喊“抵抗外力推倒军阀”，只觉其“外强中干”，毫无益处。

当我在民国三年由四川到北京之时，亦常误以为国家之弱全是外力压迫所致，因而立志研究外交，俨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党中之加富尔自命，如是者数年，未尝一变。直到了民国六七年之交，乃恍然大悟，知外力之所以压迫系由于内政腐败，内政之所以腐败系由于社会麻木，故欲改造中国非先从社会下手不可，因与同志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社会改革”为号召。其时适值留东学生拒约归国，大标“只问外交不管内

政”之旨，一若非如此则不足以表现其纯洁爱国也者，北京学生复起而应之。吾常闻而笑曰：“安有内政不清而可以侈言外交耶?”民国九年，赴德留学，见彼邦政治经济几无一不建筑于社会之上，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勃兴，不过一二百年间之事罢了，而考其各种文化设备、社会组织，则其根基几无一不培植于三四百年以前。故欧洲虽屡遭战争，然其战败国几无一不是旋败旋起，未及数年元气又复（譬如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战，至此次大战之时不过四十余年，而战败之法国已一跃而起。自此次大战而后，至今亦不过数年，而战败之德国所有一切政治经济，又已逐渐就绪。自去冬金融改革以后，其国内生活状况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此其故无他，他们的政治经济虽因战争关系一时陷于紊乱，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仍是那样坚固，人民的能力仍是那样丰富，而且每人皆具有要求生活从速改善之决心，所以一点政治经济的紊乱，算不了什么，好象是倒塌了几座房子，克日兴工，把他重新再建起来罢了。因此之故，我对于“改造中国须由社会下手”之思想，更加了一种实例的证明。前年读国内寄来报纸，见有梁任公先生演说，题曰：“外交欤？内政欤?”乃笑谓友人曰：梁任公思想，可谓较之当时留东归国学生所谓“只问外交不管内政”者，已进一步，但何不再进一步曰“内政欤？社会欤”云云。后来本学会中亦不幸而发生“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之争，我甚痛之，曾为文数篇，再申斯义。其后复被主张政治活动之某某会友撰文驳斥，曾慕韩君曾劝我再为论文以反驳之，我乃谨谢不敏曰：所谓社会活动，本是“实行”问题，不是“言论”问题，多用笔舌，徒伤感情。使我们所主张者为非真理，则何必强人与同，若我们所主张者为真理，彼此自有握手工作之一日云云。

我对于政治运动，并不极端排斥，但只认政治运动为国民的一种普通义务，万不能以之为职业。故无论什么人，皆须于政治运动之外，有一种社会职业以自效于社会，然后社会才有进步，才无冗人。若是专借政治运动为名，终日不事生产工作（脑力的或手力的），反自命为“奔走国事”以分享我们一般朝夕劳苦的农工生产者，吾皆谓之为寄生虫，凡属寄生虫，无论何时皆须痛铲之。

朋友们！只有“少年中国运动”是我们青年唯一无二的应走道路！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便是：

“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由这两种运动，以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

中华民国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王光祈序于柏林之 Steglitz，Adolfstr. No. 12



《少年中国学会[1]会务报告》[2]

致子章[3]

子章兄鉴：

示悉。本会宗旨，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凡会员皆应该遵守做去。不过会员性情有偏重学术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能去研究学问；有偏重事业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能向事业方面发展。各尽所能，各去所短，这就是团体比个人效力较大的原因。我与足下都是喜欢做事的人，自然是偏重事业方面。不过本会同人主张，凡事皆须本于学理，见诸事实，故本会会员皆须认定专科，提出问题。认定专科的意思，以便此后发生关于该科的问题，本会就可以致函征求他的意见，限期答复。譬如足下是认定工科中之

①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1918 年 6 月 30 日由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等发起筹备，王光祈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并负责起草学会章程。经过一年的酝酿，1919 年 7 月 1 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王光祈出任大会主席，并被推选为学会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工作。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南京、成都和法国巴黎设分会。王光祈主持学会工作时，负责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还亲自介绍了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入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1925 年底，因会员在政治上的严重分歧和组织上的严重分化而停止活动。前后入会的会员共计 112 人。学会的活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②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前出版的刊物。1919 年 3 月 1 日出版第一期，此后每月一期，直到《少年中国》月刊创刊为止，共发行四期。

③ 本文发表于 1919 年 3 月 1 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

有线电门，此后有线电之学理上如发生问题，当然要致函征求足下的意见了。提出问题的意思，是全为会员研究学问便利起见，故所提出之问题，不必限于所认定之科目。譬如足下认定的是工科，而对于文学上或政治上之某种问题兴味极浓，亦可以提出关于某种问题之题目。提出之后，由会中知会同人，以便供给材料。又如足下研究某种问题，而无某种问题相关连之特种智识，亦可致函本会，由会中征求会员中有此特种智识者之意见。要之，此种办法纯为会员研究学问便利起见而已，足下如明白这个道理，则提出电政史固好，即电政以外之问题亦可。此复。即颂著祺。

弟王光祈白

1919年1月23日在吴淞同济学校的讲话[①]

光祈此次南下，专为筹商会务，兼送周、李两君远行。今日邀请诸君到此，第一为主义上之讨论，第二为印刷局之筹划。因周、李二君行将远别，关于各种主义实有讨论之必要也。本会为青年所组织，青年思想与世界潮流是共向一个方向进行的，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本会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安那其主义的（Anarchism），是不能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惟本会既形成一个团体，根本上是完全相同的。譬如本会宗旨，第一是振作少年精神。本会会员皆觉得现在国中一切党系及过去人物，全不足有为，故决意从青年下手，造成健全团体。本来我们青年正是求学时代，应该专心向学，不必多结团体。现在各国的青年，因有他们的前辈替他们奋斗，他们自己只须专心求学，也就算尽了青年的职分了。我们中国的青年则不然。国中一切前辈，大概皆去争他们的权利，无论学术上事业上，他们都是不过问的。因之我们中国青年就负了两重责任：一面须切实的讲求学术，一面又要分我们最宝贵的求学光阴作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我们的境遇比之各国青年，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了，我们因欲与世界各国青年相竞争，就不能不先求国内青年之互助。此则本会同人根本上完全相同者一也。本会宗旨第二是研究真实学术。研究学术，从小的方面说起来，是养成个人的专门技能；从大的方面说起来，是对于世界文化必求有所供献。现在过去人物，既都不愿意讲求学问，我们青年关于学术上的责任，比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发表于1919年3月1日，节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会务纪闻”。

较各国的青年，更是加倍重要了。故本会会员皆须认定专科，提出问题，切实的研究学术。此则本会同人根本上完全相同者二也。本会宗旨第三是发展社会事业。现在国中一切腐败皆待吾人改革，其所以独对于社会事业特别注意者，因同人等认为一切不良皆原因于社会不良，故注重改革社会。所谓社会事业者，不过教育与实业而已。教育者所以革新一般思想，灌输各种智识；实业者所以改良吾人生活，增进物质上的幸福。现在本会虽未设立学校、自办实业，然本会同人则大半从事教育事业。近来刊布丛书，对于思想界亦不无影响。将来编译事业逐渐发达，收效宏大，实可预言。此则本会同人根本上完全相同者三也。本会宗旨第四是转移末世风气。现在风气偷惰骄奢，所有先民敦厚勤俭之风，已被今日一般人物轻薄殆尽矣。本会信条所谓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养成风气，以改革今日之恶劣社会。此则本会同人根本上完全相同者四也。根本既完全相同，所谓主义者，不过末节而已。究竟有无决定之必要，请同人讨论。……现在同人研究学问，思想宜极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诸君以为如何？

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①]（节录）

本会在去年六月三十日发起，同人为郑重其事起见，筹备期间预定一年，应于今年七月一日开成立大会。现刻本会同人散居各地，不易聚集，兹特将开成立会时所应报告各事，提前通知，以便选举职员，督促会务进行。

本会同人在本会未发起以前，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规模。去年留东同人归国，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统系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曾琦君、张尚龄君亦先后由东京归国，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岳云别墅之会议。

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淯、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

① 本文发表于1919年5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

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岳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

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

盖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故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则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何则？彼所创造之意大利、德意志，固非适合于二十世纪之思潮也。同人等因个人观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更有以安那其式 Anarchism 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吾人既抱有如斯简切明了之目的，又将遵何道以达吾人之希望耶？欲答此问，请略述本会之宗旨：

（一）振作少年精神　本会既为青年活动团体，故出版书报，多系鼓吹青年之作。盖青年者，吾人所视为创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友也。

（二）研究真实学术　同人等主张凡事皆本于学术，见诸事实，故会中有科会、学术谈话会等之组织，皆所以达研究学术之目的者也。

（三）发展社会事业　本会同人大半皆从事教育实业，亦即同人等所视为建造“少年中国”之唯一良好手段也。

（四）转移末世风气　本会信条，在积极方面，则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之规定；在消极方面，则有第十四条概括规定之禁约，实欲由少数青年身体力行，以造成一种善良之风气。

以上所述系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发起时之情形。今再就筹备期间一年中之会务详述如下：

当时规约既已拟定，遂组织筹备处，设主任一人，会计文牍各一人。公推王光祈君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无君为文牍。又设临时编译部，公推李大钊君为主任。其余会员皆归入编译部办事，为临时编译员。筹备期中所有会务已见诸实行者：

（一）刊布图书　八年一月刊布《国体与青年》一书，为会员曾琦君著。其余在编

译中者尚有数种。

（二）发行杂志　从八年三月一日起，创刊《会务报告》，每月发行一次。近拟于七月一日开成立会时，创刊《少年中国》月刊，原来之《会务报告》，即并入此项月刊内。

（三）举行讲演　本会同人散居各地，不易聚集，故每期《会务报告》皆请名人撰述一篇，以代讲演。

（四）供给材料讨论问题　此事虽有少数会员业已履行，惟尚未如当时预期，此实由于科会进行未臻活泼之故。本会研究学术成绩之有无，全视科会进行活泼与否为断，故此后选举科会主任一事极宜注意。

（五）学术谈话会　此条在当时规约中并未规定，惟上海会员魏嗣銮、宗之櫆、张尚龄、曾琦、李璜、周无（李、周二君现已赴法）诸君，欲互相交换智识，乃有斯会之组织。所谈均有笔记，成绩极佳，此实为本会筹备期中一极好之现象也。

（六）印刷储金　此事由吴淞会议决定，现刻多数会员业已实行，以养成吾人之储蓄习惯。

（七）会员人数　本会对于会员资格限制极严，凡加入本会者，须有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现在筹备期间，评议部尚未成立，须俟七月一日开成立会后，评议部正式成立，再为请求追认，方能取得会员资格。兹就筹备处所收到之入会愿书，其人数如下：

文科十二人：周 无、魏嗣銮、宗之櫆、赵曾俦、易家钺、沈懋德、彭 举、李劼人、袁同礼、左学训、黄日葵、许德珩

工科四人：雷宝华、赵世炯、郑尚廉、葛 沣

经济科四人：陈 淯、李 璜、李大钊、王光祈

政治科四人：曾 琦、张尚龄、刘正江、雷宝菁（已故）

商科一人：涂开舆

（八）联络友会　本会同人曾经决定永远不与其他学会合并，然有宗旨相同之学会，亦可联成友会，互通声气。月前东京、北京、湖南方面皆有宗旨相同之学会愿与本会联成友会，惟未经正式接洽，暂不宣布。

以上所述皆系筹备期中会务进行之状况。将来本会正式成立，如办理得法，必能蒸蒸日上。盖今日全国之青年已渐臻觉悟之境，本会实为应运而生之团体也。（后略）

致君左[①]（节录）

君左同志足下：

（前略）弟本来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极留意世界大势；因留意世界大势，不知不觉的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但是要研究社会主义，非研究经济学不可，故近来极欲研究经济。觉得现在世界上一切组织多不合理、不满意，皆非根本改造不可。譬如国际联盟[②]一事，若在弟研究外交时代，必将他的草案逐字逐句的研究；在现刻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以后，便觉得现在的国际联盟一钱不值。所以我去年在《每周评论》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国际社会之改造》，就是反对现在的国际联盟。月前得读足下通信，知足下现刻极留心世界新潮，函中所论政治的民本主义与社会的民本主义亦极确当，实在钦佩得狠！惟足下以为照中国现在情形而论，只好降格求这政治的民本主义，与鄙见稍有不同的地方，把他写出来，请求高明指教，亦是来函所谓剀切问难的意思。第一，美国式政治的民本主义，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我现刻极鄙视政治，凡有朋友谈到"政治"二字，我就联想到"少数人的最大幸福"、"供野心家的利用"、"世界扰乱的原因"、"万恶之原"。美国人因拜金主义，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苦痛。故现在美国防止无政府主义、布尔斯维克主义输入，极为严密。若是国内毫无不平的现象，大家皆安居乐业，为什么如此害怕社会革命呢？有人说将来社会革命，美国必较他国为烈，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故我以为与一般人生活最有关系的就是经济组织，与其提倡政治的民本主义，不如提倡与经济有关之社会的民本主义。况且我们中国一般人向来对于政治极少兴味（官僚是例外），不必再走转路了。第二，俄国式社会的民本主义是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是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

① 本文写于1919年5月20日，发表于1919年6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

②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成立时会员国44个，后逐渐增加到60多个。其主要机构是会员国全体代表大会、行政院、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常设机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常会一次，行政院由英、法、意、日四个常任理事国和经大会选出的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组成。国联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维护其世界秩序、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已名存实亡。1946年4月国联宣告解散。

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况且中国人向来主张个人主义、放任主义，不愿受国家权力的干涉，所以国家主义、国家观念在中国人的脑筋里实视为一钱不值。我们若提倡俄国式社会的民本主义，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我现在拟做一篇《个人主义与中国》，极力提倡积极的个人主义，反对一切强权，不管他是中国人外国人，若是要拿强权来侵害我们个人的自由，我们非把他排斥不可。极力反对消极的个人主义。因为中国人向来受了老庄学说的影响，凡事主张无抵抗，见了军阀、财阀、外国强权立刻就不战而逃了。这是一种不彻底的个人主义、片面的个人主义，我是极端反对的）。我写了许多，这样也不赞成，那样也不赞成，究竟我主张的是什么，想足下必急于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告诉足下，我只告诉足下几个大纲：（一）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二）现在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非从根本铲除不可；（三）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四）我是一个极愿从事世界革命的人，因为现在世界是一种阻碍进化的世界，非把他改造不可；（五）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如有其他适当名词，亦不妨借用借用。足下是一位研究经济学的，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是容易寻出解决的方法，比我强的多。不过是有一种应该注意的，就是现在日本人正高唱国家社会主义、崇拜马格斯的时代，足下没要被他们瞒过，还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个切实解决的方法。（后略）

王光祈再拜　二十日

致幼椿、太玄[①]（节录）

幼椿、太玄两兄均鉴：

读两兄来信，欣慰无量。兹有欲要求者数事，开列于下：（一）幼椿兄所译之《社会主义》、太玄所著之《妇女问题》，脱稿后即请寄京，由本会出版。（二）（略）。（三）弟现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将其中最重要的分为两类：（1）国家社会主义马格斯派

① 本文写于1919年5月20日，发表于1919年6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

(Marx)，如今日之俄、德、匈过激派；（2）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Kropotkin)。前者以之代表集产社会主义学派（Collectivism)，后者以之代表共产社会主义学派(Collectivism)，这两派学说趋势，在欧洲方面孰占优势？请告我。这两种以外，还有其他较善之学说否？亦请见示。(后略)

王光祈再拜　五月二十日

《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

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1]

（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

[说明]（甲）凡征求会员，须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乙）凡思想龌龊、行为卑鄙之人，本会认为根本已坏，不能救药。换言之，即不适于本会所谓纯洁之标准。

（丙）奋斗有二义：（一）学术上之奋斗；（二）事业上之奋斗。本会认为，凡能奋斗之人，无论其为学术或事业，将来皆必有成就。故本会取人以奋斗为标准，而不以智识为标准。因青年均正在求学期间，不能以智识之充分与否遂断定其人之才与不才也。若夫消极之士，无论其如何纯洁，皆勿介绍入会。吾人对之只有攻击而已。盖吾国民族之所以堕落，外奸内贼之所以猖獗，皆此辈消极之士“不作为”之罪也。吾人既以奋斗为生涯，当然拒绝其入会。若已变消极为积极，则吾人亦当变攻击而为欢迎也。

（丁）既纯洁矣，既奋斗矣，然对于本会并不表示充分同情，若吾人强邀其入会，彼对于会事在若有若无之间，吾会何必多此一位不热心之会员？务望各会友介绍会员时，对于此层极宜加以注意也。

（戊）本会规约，凡会员入会时须有会员五人之介绍，并须经评议部认可。然事实

① 本文发表于1920年。

上常常发生困难问题。譬如某会员独居海外某国或国内某地，伊有一位极相信赖之友人，且俱备本会征求会员标准之条件，只以未有会员五人介绍之故，竟不能邀其入会，实为遗憾。若勉强填写五人，则其他四人对于所介绍之会员，既不相知，徒代人负责，亦属不妥。评议部接着此项入会愿书，亦无从调查，所谓审查者直等于具文。今为解决此种困难问题起见，特筹一变通之办法如下：

凡甲会员欲介绍某乙入会时，须先介绍某乙与会中丙、丁、戊、己四位会员通信。通信既久，察其言行果可以介绍入会，然后由甲、丙、丁、戊、己五位介绍入会。

（己）本会现在已有会员七十余人，此七十余人之中，不敢谓皆具备本会征求会员标准之条件。本会为整饬会务起见，一方面希望嗣后各会友介绍会员，务要极端慎重，宁牺牲个人之友谊，勿为学会造将来破坏之基础；一方面厉行本规约第十五条宣告除名之规定。盖吾人鉴于过去一切团体之失败，多由于滥拉会员之故，凡我同人，尚希千万注意。

《申报》[1]

欧游通信“自由谈”（一）（1920. 4. 4香港记）[2]

记者乘法船 Paul lecat 赴欧，于四月一日由沪出发。该船载重二万吨，舱分四等。四等舱原系装货之所，本非载人者，自欧战后法政府运送法兵回国，特开此舱，兼载赴法俭学学生。去岁李石曾先生在法与法国轮船公司订立合同，凡系华法教育会介绍往购船票者，四等舱每人华银百元，三等舱每人一百二十元，头二等舱照原价八五折，以示优待。每次法船西行，皆有乘坐四等舱之俭学学生四五十人搭舱赴欧。而俭学学生欲购头、二、三等舱位者，若以华法教育会函往，照例不能购得舱位。即或购得，亦须费一种特别手续，非熟习人情世故者不能办也。近来赴欧俭学之女生日益加多，而四等舱又因有安南[3]政府之命，不能男女杂坐，于是女生中有志赴欧俭学者，其道无由。近闻华法教育会有鉴于此，特与法国船公司约，从下月起，每次留三等舱十个，若女生购买，则出华银一百二十元；若男生购买，仍照普通价目。记者因急于赴欧，而头、二、三等

① 《申报》：中国近代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商业性报纸，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初由英商安纳斯·美査（Ernest Major）等人集资创办。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收买，1912年由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史量才、陈冷等5人合股接办，后张、赵等人退出，由史量才独资经营。1941年侵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一度在日伪控制下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中国国民党接收。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停刊。《申报》前后历时78年，记录了从清末到民国近八十年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② 本文刊载于1920年5月4日“自由谈”栏。以下几期《欧游通信》，均刊于“自由谈”栏。又：这6篇《欧游通信》的写作时间，均依据牛岛夏子编《王光祈文献总目录》。

③ 安南：即越南。

又非数月后不能购得舱位，于是由华法教育会之介绍，得购四等舱位，与俭学诸君同往。

此次赴法俭学学生，自沪出发者约有四十余人，以四川、湖北、湖南人为最多。舟抵香港，又有广东留法俭学生七十余人搭附此船赴法。四等舱中有舱位三层，颇似长江轮船之统舱。每日二餐，早晨尚有晨茶一次，每餐有饭、有茶、有面包，有白菜、萝卜煮牛肉、猪肉一大盆，尽量取用。晨茶则有咖啡一盅，面包一块。餐时皆在三等餐室，以示优待。盖四等舱客人，例由自己携具到厨房领取食物也，头二等甲板亦可自由前往散步。

欧洲通信“自由谈”（二）（1920. 4. 13记）[①]

当记者在沪未启行时，接巴黎友人李惁先君来信，谓四等舱太苦，而头等舱又太奢，以一人之消费，足抵四等舱数十人之所用。世界上既有坐头等舱者，便不能不有坐四等舱者，不知何时苦乐平均。若未至平均时，吾辈宜永远不坐头等舱，亦不坐四等舱。当记者上船后，友人康白情送别船头，谓记者曰：吾人宜坐四等舱，否则即坐头等舱，非至苦与至乐，不足以了解人生真义。两君所言，皆有至理。质诸读者，于意云何？

四月七日舟抵海防，又三日舟抵西贡，两地皆系安南要埠，商务繁盛，出口货以米为大宗。安南人身着黑色短衣，其长过膝，颇似吾国内地乡村妇女之装束。足着拖鞋，往来道上。口嚼槟榔，如血液从口角流出，随行随吐，气味逼人。安南地居热带，物产极丰，然其人奇穷异常，虽终岁劳苦所得，仍不足糊口。当记者舟离海防时，舟中获贼二十五人，类皆饥饿难堪，故匿舟中以窃食物，冀得一饱，后为舟人所见，关之室中。敬告国人，勿以吾国物产丰富为可恃也。

安南人所用之字，其形颇似汉字，惟其文吾人读之不甚了了。安南人亦间有能读汉文书籍者，惟其发音与吾人不同。安南人身体亦尚强壮，惟因地居热带，天气困人，不耐思索，故思想极不发达。此不独安南为然，凡系热带之人皆如是也。

两地华侨极多，商务亦大，闻西贡一隅，有华人四十万。惟吾国未设领事，无保护华商利益之机关，良可慨也。使欧美人而有四十万侨居他国者，其国政府对之，不知已设若干之保护机关矣，更将借侨民之力以经营斯土矣。往岁记者在北京时，闻政府将派

① 刊载于1920年5月5日。

许世英为宣慰南洋华侨专使，若政府果有意于宣慰者，何不于设置领事一事努力进行。鄙意以为，派遣一官僚出去作领事，不如就该地华侨中择一公正廉明者任以领事之职，较有用也。安南华侨以粤闽人为最多，分广、肇、琼、雷等帮。各帮皆公举帮长、副帮长各一人，并设有公所。记者曾至客帮公所及琼、雷、广、肇各帮参观，与各帮华侨谈及国内近况，伊等未尝不感慨欷歔也。华商交易只用安南银币（即东方汇理银行之票，其价值与上海通用银币相等），不用法郎，因法郎之价值低也。

欧游通信“自由谈”（三）（1920. 4. 15 记）[①]

记者于四月十三日由西贡动身，十五日舟抵新嘉坡。新嘉坡一名星洲，马来人呼兽王为新嘉，呼岛为坡。新嘉坡三字，即狮子岛之意，状其形也。新嘉坡居马来半岛之南端，孤立海中，长二十六英咪[②]，阔十四英咪，周围六十六英咪，为椭圆形。四面岛屿林立，风景绝佳。

当一千八百十九年，英人察知新嘉坡为欧亚交通要道，且为南洋咽喉重地，遂要求柔佛、苏丹订约租借，纳六十万弗之租金及二万四千弗之年金。英人既得新嘉坡，锐意经营，遂成今日之著名商埠。而英人海峡殖民地之基础，亦因之益固。

新嘉坡既为欧亚交通要道，为往来船舶必寄泊之地。在欧战前，计一年之中，约系留新嘉坡码头之船舶有二千数百余艘之多，出口货以锡米、树胶、椰干、咖啡、皮料、藤料、胡椒、蔗糖、玳瑁、罐头为大宗，入口货以布匹、金银、铁器、煤、米、面粉、烟草、石油、火柴为大宗。华人某君谓记者曰：星洲如星，光芒四射。以喻其航线之多，如星之发光。交通既便，商务日盛，此所以为英人东方之宝库也。

当英人初得新嘉坡时，不过一荒岛耳，英人招致华工，尽力开辟。吾国富于创造精神之华侨，得此机会，前往南洋者极多。又兼华人勤敏刻苦，善于营业，以现在英领海峡殖民地人口而论，中国人实占全领人口七成有奇，较之土人为多。市面商务亦为华侨所左右，在新嘉坡设有总商业会议所，各埠设分议所，势力甚大。记者乘车参观全市大小商业，无不有华人之足迹。及出郊外，又见高楼大厦杂立道旁，友人涂君谓记者曰：此皆华侨之宅第也。

---

① 刊载于1920年5月19日。

② 咪：原文如此，疑应为“里”。

欧洲通信“自由谈”（四）（1920. 4. 15 记）[①]

马来人虽为此地之主人翁，然其人思想薄弱，无自立之精神，加之英人治理土人极为得法，土人遂安之若素，坐享天然之福。市中之大商店，既少马来人所经营，而野外之大园林，亦无马来人所开辟。记者调查其生活，以驾自动车、马车、牛车者为最多。近来世界潮流，风起云涌，劳动者渐得势。于是马来人见全市金融皆在华商掌握之中，而华侨富者又多居高楼、拥姬妾，因此顿生忌嫉心。故马来人近日对于华侨，常有抵制反抗之事。

欧美人在新嘉坡营业者多系组织公司，资本既多，长袖善舞，且公司基础稳固，即小有挫折，无伤元气。日本人在二十年以前，于南洋方面尚无势力，自邮船公司开通欧洲航路后，来者渐众。近十年来，其进步乃一日千里。有三井家藤田组南亚公司之组织，复力营东洋两大汽船公司，以握南洋航权，于是日本人在南洋之势力甚大，华侨基础亦渐为之动摇。此无他故，实因欧、美、日本人之前往南洋经营者，多系以团体之力，如公司之类，且有本国政府为其后援。而华侨之营业南洋者，无坚实宏大之组织，又无政府为其后援，且地域之见甚深，如闽帮粤帮之类，不能和衷共济，为一规模宏大之组织以对抗，徒恃地理历史之关系，在南洋稍占势力，而不能发挥光大，良可叹也。

新嘉坡旧设有“猪仔馆”，即中国人被无赖拐卖到南洋作工人者，初到新嘉坡时即居之猪仔馆中。近闻此馆已于数年前裁撤。惟记者出北京时，在侨工事务局见有荷属爪哇领事欧阳祺君报告荷属万里洞、网甲两处华工十余万人受人虐待之情形。阅者诸君，须知吾书中所谓万里洞、网甲两处华工，即所谓猪仔者是也。现在香港尚有人经营此项惨无人道之猪仔营业，不知国内亦有人念及此事否。

欧游通信“自由谈”（五）（1920. 4. 2 记）[②]

记者由新嘉坡舟行四日五夜，即抵锡兰岛之哥仑布。锡兰岛居印度半岛之南端，为

① 刊载于 1920 年 5 月 20 日。

② 刊载于 1920 年 6 月 17 日。4 月 2 日，疑为 4 月 20 日之误。

英国之殖民地，哥仑布其首府也。哥仑布居锡兰岛之西岸，凡往来欧亚船舶，若取道苏伊士运河者，必经过此地。印度为英国之宝库，物产丰富，大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慨。自欧战后民族自决主义盛传一时，英人恩威并施，一面削平其内乱，一面予以一部分之自治权。半岛上之警备，亦因此益增严重矣。

此处查验护照，较之新嘉坡为严。非曾经英领事签字之护照，不准登岸。记者之护照曾由上海英领事签字，故得登岸参观一切。街道修洁，依山临水，风景绝佳。市中公园甚多，任人游览。惟西人之布置花园与中国式之花园有根本不同之处，即中国人布置花园，多注重建筑物，曲径通幽，亭台隐约，白石苍松，大有山林隐逸之意。而西人布置花园，则注重采集奇花异草，珍禽猛兽，以供学者之参考。故采集收罗，惟恐不丰不精，至于建筑物，则寥寥无几。此亦可以窥见东西人士嗜好之不同矣。

印度本为佛教发源之地，故其人民多奉佛教。吾人一登彼岸，但见偏袒右肩者往来道上，顿觉身入佛国。耶稣教势力亦渐侵入，市中有天主教堂、基督教青年会等等。而印度佛教徒亦特组织佛教青年会以对抗之。印度人与人言语，辄顿仰其首，如默祷我佛如来之状，亦可见土人迷信佛教之深矣。

欧游通信“自由谈”（六）（1920. 5. 2记）[①]

印度人能解英语，惟其中亦有只能说土话而不解英语者，大约儿童解英语者较成人为多。

由哥伦布六日七夜舟抵斐洲东岸之其布的，其布的为法国殖民地，气候极热，草木不生。惟其地扼红海之口，在军事上极有价值。且法国往来欧亚之船只，无不停泊此地，添置煤、水。故法国人亦极力经营，与英人所经营之亚丁无异。盖其布的、亚丁二埠皆系扼红海南口之要地也。

其布的物产既不丰富，故商务极不发达，全市只有商店数家，常用之物亦不具备。

由其布的四日五夜至非洲北岸之波赛，此地系英国属地，为埃及之一都市，五方杂处，语言复杂，商务亦极发达。货币用法国银法郎（即现金），不用纸币，大约纸法郎二个换银法郎一个。惟英金镑无论现金纸币皆可通用。此处商店并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兑换，凡来中国者亦可在此地换买上海银行钞票，足见此地交通之发达矣。华侨在此地者极少，故土人见记者行经街上，皆呼记者为日本人。

---

① 刊载于1920年6月18日。

埃及妇人之面部用黑纱蒙蔽，深恐为他人所窥见，此与中国内地妇女避人之习气大概相同。埃及与中国皆为开化最早之国，故其习俗颇有古风，然在今日则颇足令人感慨也。

《文化》(月刊)[①]

论海外中华学子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②]

在东亚，有这样一块土地，它的大小和欧洲相仿，在那上面生活着一个民族，它的人口差不多和欧洲的总人口数量相仿，但它与欧美不同的是，中华民族在它 4000 年的历史上，不仅奠定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不被外来的强权所侵蚀。最近几十年来，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毫无疑问真正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一少部分有着新思想的人群，那些在海外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学生，他们将在陌生国度里所接受的新思想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并且希望家乡通过自己不同以往的行为而有所改变，因此这些人在近阶段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先锋的作用。

这些曾经的留学生或正在就读的留学生，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他们和中国的军事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种是在美国学习的，他们和中国的工商业圈子有关；第三种类型是在欧洲学习的，他们主要在文化方面起作用。

到日本去留学的中国学生潮主要是在中日战争（1894 年）后开始的。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失利告终，这使得中国人认识到，他们的军队和国家必须要革新，于是在他们与

① 《文化》(月刊) 是一本发行于德国南部的小型刊物。1921 年创刊，1922 年停刊，共出 22 期。

② 此文登载于 1922 年 4 月。

日本签订的一个协议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承诺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中国学生去他们的高校中学习（例如东京工程大学），这些学生是由中国官方资助的，主要是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科学。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数量狠多，官费生与自费生相加约有两万人，当这些学生回国以后，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来进行变革，于是在各个省份开展了推翻清政府的运动，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统治，使中国进入了共和体制。

在王朝被推翻之后，这些在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的留学生，要不在政府中担任高官，要不就在军队中担任了将军。这些官员们狠快就分成了两个群体，北方和南方的军阀，他们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内战。

中国的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有 10 年了，但是这个曾经那么渴望共和制到来的民族，却依然没有找到出路，那些在日本受到教育的官员们的行为，和中国民众的政治思想，完全格格不入。中国民众希望和平而不是武力，他们会反抗一切强权的制约，反抗一切束缚。

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官员们越来越不被看好，有另外一个在国外受过教育的群体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就是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留学生群体。早在清朝，曾国藩就资助过 100 名学生去美国学习，但是清政府觉得这些学生在大洋彼岸那个与中国没有丝毫类似的国度里学习，会把对于政府有害的思想带回来，于是清王朝狠快就召回了这些留美学生。一九〇八年，当中国和美国政府因为义和团运动而签订赔款条款时规定，这笔钱要用在中国学生留学学习上，令人吃惊的是，至此之后，就形成了一股中国学生留美的热潮。事实上，在过去的 10 年中，每年都有几百位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里学习。但是和留日学生不同的是，这些学生主要学习的是技术、经济和教育学。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在毕业回国后，会参与到中国的国家事务中来，绝大部分进入了中国的工商业界，还有一部分进入到了大学的教育领域。这些人直到今天还在工商业和学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在国民思想领域中所占的地位，使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有了狠大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们中有许多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新兴资本家，他们沿着长江流域分布，成为了目前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他们隐身于南北军阀之后，操纵着中国的时局。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在美国的学业，促进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并且非常巧妙地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还有另一个完全往不同方向发展的群体，便是留欧学子。在第一批去欧洲留学的学生中，就有现在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他曾经在德国和

法国学习哲学和语言，其他的还有李煜瀛[1]，他是巴黎大学的荣誉教授，还有吴敬恒[2]，是里昂中文大学的校长。这三位虽然很大程度上参与甚至领导了中国的革命，但他们不愿意为政府继续效劳，他们觉得民众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生活的目标，尤其是蔡教授，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执掌北京大学，在过去的几年中，他通过所谓的“文化运动”在中国年轻人中掀起了一场热潮，人们可以将它称为一场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蔡先生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也不是为了提升一种民族外在的文明形式，更不是为了将欧洲、日本的国家制度和军事体制引入中国，对他们而言，真正的价值体现是要成为中国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努力提升个人和民族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古老文明被毫不在意地推翻，而是希望要在深厚的中国历史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极具自信心的世界观，当然也还需要加上一点来源于欧洲文明的敢于变革的精神，这样才能够给本民族带来福祉，给全人类带来兄弟般的友爱。他们认识到，美国思想迟早会给中国带来和日本军阀思想带来的相似的战争和痛苦，即使战争不发生在敌对的士兵之间，也会发生在社会竞争中。因此在社会领域中，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沟通就尤显重要。是的，他们在寻求和建立学生与工人间的联系。在巴黎，李教授成立了一个协会，给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寻找工作机会，甚至在有必要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 2000 位学生去法国留学，他们有的时候在工厂中实习，有的时候在高校里学习。在里昂，还专门为中国学生建立了自己的大学，校长就是吴教授。

当然，到欧洲来学习的中国人不仅限于法国。德国虽然在战前对中国的文化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究竟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08 年，德国在青岛建立了德中学院，在中国赢得了很大声誉，在这所学校关闭之后，他们大部分的学生都转入了 1909 年由德国医生在上海创办的医疗及工程学院。在德国目前大约有 200 位中国学生，其中大部分在中国都曾就读这 2 所学院。

我希望，所有目前正在欧洲学习的中国学生，毕业后，都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幸福美满，将新的思想和旧的体制很好地融合，传播文化传播知识，我也祝愿中国可以更强大，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

① 李煜瀛（1881—1973），又名李石曾，著名教育家。晚清重臣、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② 吴敬恒（1865—1953），又名吴稚晖，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胡适称其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196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荐其为“世纪伟人”。

《新青年》[①]

工作与人生[②]

自从俄国的布尔扎维克（Bolsheviki）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以来，这布尔扎维克主义（Bolshevism）也就成了中国新闻记者、政治家、教育家所注意的一个问题。不爱读书如我这样的人，也觉得都市中、乡村里所见所闻的都含有许多危机，仿佛有布尔扎维克紧跟着似的。我常常自己问我自己道：你莫非中了魔术么？为什么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都仿佛有一种不满意的样子！又像立刻就有大祸临头的恐惧！

列位须知，这布尔扎维克虽是一个极新鲜的东西，却喜欢光顾这最腐败的地方，我们中国自然是布尔扎维克必游之地。不过是他光临的时候，一定要带许多恐怖的礼物，我们欲减少这种恐怖的程度，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看作劳动界以外的一个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大家工作起来。

于是有两个问题随之而起：

（一）什么是工作？

---

① 1915年9月由陈独秀创办于上海，初版时定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创刊伊始就揭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从1915年创办到1926年停刊，历经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宣传新思想的主要阵地。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曾轮流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开始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主。

② 本文发表于1919年4月25日，载《新青年》6卷4期。

（二）为什么要工作?

工作的定义就是：

以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于人的事业。

劳力二字，是包含用体力的或是用脑力的。用体力的，如像农夫、木匠等等，用脑力的，如像教育家、著作家等等。

要用自己的劳力，如利用他人的劳力，那不算工作，如资本家是。

有益的事业，包含必需普遍诸意义，凡可以使人类物质上、精神上得满足的快慰者，都叫做有益的事业，如农夫劳动结果所得的米面，著作家劳动结果所得的出版物是。其余非人类必需的，或是不能普遍的，便不得叫做“有益”。

有益于人的“人”字包含他人及自己，自己为人群里头一份子，人群既得了利益，自己也包含在内。不过是现在的劳动家，大半不是为自己而劳动，因为他们劳动的结果尽被资本家掳夺去了。

关于工作的意义，有两句极不合理的解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们不管他的工作是劳心或是劳力，只先问他这种工作对于人有无利益。

“治人”二字是本于权力、思想，“治于人”三字是本于奴隶性根。

“治人”是承认“人”以上还有一种较高的权力来管辖人类，从前叫做神（God），后来变成皇帝，现代又变成大总统，都是“人”以上的一种东西。什么《圣经》（Bible）、纲常法律，都是他们使用权力的护符，所以世界上就有了“强权”这个名词了！

“治于人”是承认有一部分人类是“人”以下的一种动物，生杀予夺之权都在他人手中，所以世界上就有“服从”这个名词了！

最新学说是，承认世界所有人类都在一水平线上，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有“自治”、“平等”、“自由”诸名词。此后的人类不应在“人治人”上用功夫，是应该共同努力，向自然界中开辟一新世界。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治”字只应放在“事物”上，不应放在“人”字上。我们努力向自然界增加人类的幸福，减少人类的苦恼。人与人不是对抗的，是共向一个方向前进的，所以有“互助”、“进化”、“神圣劳动”诸名词。

照这样看来，“劳心者治人”这句话简直不能成立。换一句话说，就是因治人而劳心的都不叫做工作，所以官吏、军警都是一种分利而不生利的废物。

大家既知道什么是工作，什么不是工作，我们就可以讨论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工作”了。

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道的，有三种学说：

（一）报恩主义　我们人类所以必要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所消费的都是别人所给与的。既是别人有恩于我，我们自然是应该报答。从前奴隶对于主人，与现在无识

的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皆是此种感想。

（二）偿债主义 我们所以必要从事工作的缘故，因为我们所消费的都是与别人交易得来的，非如报恩主义专凭良心上、道义上应该报答的问题，乃是实际上有无相通、公平交易的问题。安那其主义（Anarchism）的集产派（Collectivism）主张各取其所值，即本于此种观念，“集产派主张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物）归公有，需要物（如衣、食、房屋等）归私有，各人所得之报酬，当视其工作之多寡，以为比例。此派学说，谬误甚多，为共产派（Communism）所攻击。”

以上两种主义，其立论根据虽然不同，而根本上的错误则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承认世界上有“施恩者”、“债权者”之存在，所以才生出这“报”“偿”的关系。这种“施恩者”、“债权者”观念发生的原因，是错把一种“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当作“可以做可以不做的”的事情。譬如父母对于儿女是应该扶养教育的，在报恩主义，则以为这种扶养教育的行为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如父母尽了他的分内该做的责任，便视为一种大恩；如父母不尽他的分内该做的责任，亦觉得无大过错。又如生产机关、生产物本应属之公有，而不应随意独占，在偿债主义则以所有权为前提而谓借贷关系是一种任意行为，“可以贷可以不贷的”。总之，以上两个主义都错把别人分内应该做的事情视为恩、视为债。我以为父子之间各做所当做，爱其所爱，无所谓报恩；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所谓偿债。将来大同世界，老病残废皆由社会扶养，若责以报恩偿债，我恐怕这些人永无“报”、“偿”的日子了！

以上两个主义既不能解决“为什么要工作”这个问题，遂产生第三个主义。

（三）共同生活主义 吾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一衣一食、一坐一卧，所有一生的需要皆取自社会。社会之所以能存在、能进步，又全赖人类继续不断的劳动，古语说的“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故吾人最大之职分，即是：为共同生活而工作，以创造未来之世界。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①]

是人的问题

① 本文发表于1920年4月1日，载《新青年》7卷5期。

不是经济的问题

近来北京工读互助团进行上颇发生困难，这种困难所以发生的原因，我以为全是人的问题。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团员常对我说：团中有许多团员是狠了解工读互助主义的，但是不肯实行工作；亦有许多团员是狠能实行工作的，但是对于工读互助主义却不十分了解。

前一派的流弊便是发生经济恐慌的原因。因为他们谈到工读互助主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十分彻底。但是实行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言行一致了。工读互助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作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现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作工，经济上当然要生危险了。

后一派的流弊便是丧却工读互助主义的精神。因为他们只知道终日作工，如机械一般，不晓得工读互助团之组织是有深厚远大的意思，他们以为是一种慈善事业。

团中既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此种组织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觉得此种生活干燥无味。

故工读互助团若要进行顺利，关于团员方面，必要有八个字的资格，就是“既能了解，又能实行”。

工读互助团发起的时候，报名的有数百人之多。发起人对于团员虽曾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但是团员中果能具备这八个字的资格，实不多见。这是我对于工读互助团极抱歉的一桩事！因为我既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接洽团员之事大半由我担任，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日前接该团来信，言内部感情不洽，比经济恐慌更要危险。更可证明此种组织所以发生困难的原因，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经济的问题。兹将该团来信节录如下：

“感情不融洽的原因，素不相识是其一。又每因一个问题大家的主张不一样，争论下来，不特不能互相容纳，反不能互相了解而互相怀疑。这种精神的涣散，实在比经济还要危险。”

当初规定每月每人消费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

（一）房金一元五角

（二）伙食三元

（三）学费二元

（四）衣服费一元

（五）书籍费一元

（六）医药费及零用一元五角

后来北京大学特准本团团员旁听，免收学费，大学内图书馆亦可自由阅书。于是预算内之学费书籍均可减除，每人每月不过消费七元而已。兹将第一组工作收入情形照录如下（系该团第一组最近来信）：

（一）电影股四人，办了一月，工作时间八小时，收入三十元。

（二）印刷股一人，工作时间约五小时，办了一月，得利数元。

（三）英算专修馆二人，时间六小时，前后两月，共收入七十余元，平均每月三十余元。

（四）食堂八人，工作时间五时，每日亏本二元。

据上述（一）（二）（三）三项，每月约共收入七十元，以七人平均之，每人可得十元，较之预算每人七元，已绰绰然有余裕了。

至于食堂一项所以亏折的原因，系由于事少人多，入不敷出之故。若减少作工人数，而其他团员在食堂吃饭的，亦照例付钱，则食堂自身亦可维持。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折，实出意外。

总之工作不良，尽可随时设法更换，并非一成不变。

至于工作时间如（二）（三）两项，每日工作五六时，本不算多。（一）项工作八小时，我恐系来信抄写之误，因为我在北京时知道电影股工作不过每日三四小时，为各种工作中之最轻松者。

食堂工作时间亦不算多，若减少人数，亦不至于十分忙碌。

有人说在此种私有财产资本制度之下，这种组织是不能存在的。其实工读互助团的内部，虽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换言之，不过是三五良朋合伙营业而已。

合伙营业之事，在中国社会上随处皆是，岂有别人的皆能存在，而我们的独不能存在吗?

并且他人合伙营业时，资本是有利息的，我们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伙营业是希望发大财，我们的营业只希望糊口而已。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的问题。

又有人说实行工读不必挂起新生活、新组织的招牌，其实实行工读互助已经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为一种工读互助的组织，已经是新组织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第二编　著作选编

德国人之婚姻问题[①]

序

此书原稿，本系今年正月余为《申报》通信而作，故全体皆用文言（此外所有拙著音乐书籍，则均是白话）。后以此稿内容不合《申报》之格，为其所弃，至今年十月始由挚友左舜生君向报馆将原稿索回。本拟转售其他杂志略助留学之资，不意此稿颇为舜生所赏，以转售其他杂志为可惜，拟将刊作少年中国学会小本丛书，与李劼人兄之《同情》同时出版。盖一是描写法国社会情形，一则叙述德国家庭生活也。

当余作此稿时，寓于柏林南郊某宅，主人为一对七十余岁之老年夫妇，侍余甚为殷勤。稿中所描写之德国家庭生活，其得之于此一对老人者颇属不少。孰料今年二月七日，余之男主人以一病魔肆虐，生活日艰，竟于是日夜半潜到厨中，引吸煤气自尽。及其妻发觉，大声呼救，余从睡梦中惊起，左右邻居亦至，急招医生挽救，然煤毒深入，已无及矣。其妻料理丧事既毕，亦欲依样葫芦，引吸煤气自杀，幸为邻居察觉医救，得庆更生。旋即送入医院，卧床不起者数月。余自此以后，亦复迁徙流离，未遑宁处，追悼旧事，不禁怆然。

曩者余读劼人所作《同情》，辄欲前往巴黎卧病，余不知读余书者又将作何感想。呜呼，世间之足以慰己动人者，只此感情二字耳。人生本有涯，又安能长与冷酷社会相处耶。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七日王光祈序于柏林之 Steglitz，Adolfstr. No. 2。

① 此书为《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之一种，上海中华书局 1924 年 1 月出版。

目　次

（一）男女交际之预备

婚姻问题为一生幸福痛苦之最大关键，尤为青年作恶向善之主要动机。昔著者曾将欧人生活分为四种时期：（一）自一岁至十五岁，为游戏欲发达之时；（二）自十五岁至三十岁，为恋爱欲发达之时；（三）自三十岁至六十岁，为名利欲发达之时；（四）自六十岁至八十岁，为子孙欲发达之时。换言之，每一个时期之内，皆为一种“欲”所支配，而且纵之放之，不稍抑制。因此之故，所有欧人学术事功，几无一不建筑于此种“欲的基础”之上。此与吾国之所谓寡欲论，印度之所谓禁欲论，根本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欧人既主张纵欲，故凡求学作事，皆以欲为出发之点（此就一般寻常人而论，至

于少数非常之人，当然亦有例外）。尤以青年时代为甚，欧洲青年几无一人不有恋爱，一日无恋爱即一日不能生活。惟恋爱之发生，始于男女交际，而在欧洲男女自由交际之场，又有如今日商业制度中之自由交易，良者易售，劣者见屏，自由竞争，毫无假借。故欧洲青年男女，除先天弱点无法改良外，所有后天修养，几无不竭其全力以赴之。据著者所见，德国青年男女，其在未交际以前，于父母指导之下所积极从事预备者，约有三事：（一）美术之陶养；（二）仪容之修饬；（三）技能之预备。兹请分别述之：

（一）美术之陶养 在德国上中流社会交际之场，绝少以政治时事为谈话资料；盖德国人各有党，成见甚深，一语不合，易生冲突。故每有宴会，多以音乐、绘画、雕刻为纵谈张本。此与吾国昔人所谓“今宵只可谈风月”者，其义正相同也。德国音乐为世界第一，音乐大师中如 Bach、Beethoven 、Mozart 、Wagner 等，皆为世界空前之人物。因此之故，德国人民对于音乐一道涵养甚深，而且极为普遍，几无人不懂音乐。故世人曾呼德人为“听的民族”，盖谓其两耳特较他种民族为灵敏也。德国男子多习提琴（Violine，闻相对论始祖安斯坦亦颇擅此技），女子则多习钢琴（Klavier）。虽值此战后生活困难之时，而为父母者对于此种学习音乐之费从不吝惜。每有男女之会，辄复合奏一曲，引吭高歌，声韵悠然，令人心醉。著者曾见政治党见不同之青年男女二人（德国各大政党皆有一种青年组织，故德国青年多各有其政治党见）共奏音乐，奏罢，男子辄喟然叹曰：“吾辈人类之相互了解，音乐实远胜于政治。”女子亦欢然应曰：“吾但愿与子终老于音乐之宫矣。”吾人由此足见音乐之魔力有时直等于月老之红线，此与吾国男女交际之所谓“到新世界白相白相”、“在大马路兜一个圈子”者，实有雅俗悬殊之别矣。著者尝见此间留德同学，参与德人宴会，在座德国女郎往往请其奏乐一曲以助兴趣，而在中国同学中则十人之内便有九人不懂。女郎坚请不已，则只好高唱一段“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以应之，令人闻之冷汗直流。盖德国人初不必到上海舞台去领教“济公活佛”，但从吾辈留学生毫无美术陶养方面观之，已大可想见其中国文化之程度矣。德国青年男女除音乐之外，对于绘画雕刻亦复修养有素。著者尝与德人家庭共游“美术展览会”，其子女往往年仅十四五，对于陈列之美术品便能指点评价，津津有味，俨如成人。虽其评论不必尽确，而其态度则饶有大家风范，别具慧心。总之，德国青年男女之于美术皆有陶养，若丝毫不懂，则将为人所贱，屏之于上等社会男女交际之门外矣。

（二）仪容之修饬 德国男女均以壮健为美，惟男子于壮健之外，须不失其温雅；女子于壮健之外，须不失其风流。若吾中国所击节叹赏之“病态的美”，则在极端排斥之列。著者曾在柏林“民族博物馆”中，见有吾国北京市上售卖之泥塑贾宝玉、林黛玉偶像两尊，贾宝玉面如傅粉，但其腰部下弯，已成九十度之直角形，林黛玉则弱不胜衣，察其形态，至少已入第三期肺病。夫贾宝玉、林黛玉者，吾国所艳称之美男子、美

女人也，然一陈于欧洲社会，则其丑态如此。使贾宝玉、林黛玉而生在德国，一则须送入残废疾院，一则须抬入传染病院，更何有男女交际之可言？而且德国人对于美之观念，并不专在耳目口鼻位置妥当，而在全身肌肉发展匀均。吾人每过路旁园内，辄见裸体雕刻遍地罗列，而以其肌肉饱满精神凝结之象骄人，回念国人身体，则又往往令人发生黄帝子孙日就衰微之感！德国青年男女除注意身体姿势外，尤极考究衣履。现在德国经济虽极困难，然吾人一到大街之上，所见往来行人，盖无不衣履整洁，气象堂皇，毫无“战败国”“穷措大”之象，至于囚首垢面之人，更可谓绝迹市上，渺不可得。此外对于起居坐卧亦极注意，稍失仪容，辄引为耻。吾友某君常谓欧人“吞痰忍屁”之本事甲于天下。盖欧人此种琐事，自少即加训练，习惯已成自然，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他如点头、鞠躬、脱帽、吻手，皆有一定仪式（此事在跳舞学校内学习）。吾国古时应对进退之事，本在小子学习之列，而今则大雅不作，古教沦亡，中国人在欧洲交际社会场中，伸手缩足，遂皆不免不中绳墨之讥矣。

（三）技能之预备 德国女子教育，最重 Hausfrau 教育，换言之，即主妇教育也。德国女子年满十五六岁之时，为父母者必令其于学校功课之外，兼习缝纫刺绣洗浆烹调之事。吾人每于电车之上，园林之中，常见妙龄女郎手持绘物，工作不辍，所以表示其幽闲贞静勤谨聪慧之美德也。若此种技能未备，则一旦与男子交际，问及缝纫，缝纫不懂，问及烹调，烹调不懂，则男子必以为此种女子缺乏家庭教育，只可与之共同游戏，不可与之共同生活，不复作永久伴侣之想矣。反之，德国无无职业之人，若男子与女子交际，女子必设法叩其现在或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以衡量其职业地位，然后与之论交。因德国女子一与未婚男子交际，辄有夫之之心，此盖由于德国女子数目远过男子数目之故也。惟德国结婚极不容易，因男子非有能在社会上立足之技能，不足以言谋生，生既不能谋，更安有婚之可结，故职业者，结婚之前提也。若男子对于女子之询问仅答之曰“闲耍”，或答之曰“尚未一定”，一如吾国普通人之答案，则女子必以为此种男子系无生活能力之人，更安能与之结白首盟乎？于是掉头不顾。所谓男女交际者，遂亦从兹恩断义绝焉。

要之，德国青年男女若欲订结婚约，必先发生恋爱；若欲发生恋爱，必先男女交际；若欲男女交际，必先从事预备。此实为一定之程序，不能逾越。与吾国之订结婚约而不必先发生恋爱，男女交际而不必先从事预备者，可谓大异其趣矣。

（二）男女交际之机会

上文备述德国男女交际之预备：（一）美术之陶养；（二）仪容之修饬；（三）技能之预备。若上述三种预备工夫有一未备，不足以言男女交际；若三种工夫均已步步做到，然后始能插足于上中等社会男女交际之场。今且进而述德国男女交际之机会：

（一）跳舞宴会 德国跳舞宴会约分两种：（甲）公开跳舞，（乙）私家跳舞。前者举行于酒楼饭店，无论何人皆可参与；后者则举行于特定会场，参与之人略有限制。因此之故，公开跳舞，其人甚杂，大家闺秀，多不欲往。此篇请略而不论。兹所述者则专限于私家跳舞。德国青年男女，年满十五六岁之时，必赴跳舞学校。惟其办法约分两种：第一种由学习者自行邀约相识之男女若干人，结为一团，特与跳舞教习约定教授时间，届期前往学习。第二种则由跳舞教习刊登广告，言明某月某日开设跳舞新班，招附近青年男女前往报名学习。德国教授跳舞之期，多在每年冬春两季，盖是时昼短夜长，寒侵帘幕，课余之暇，藉此消遣，亦古人秉烛夜游之良意也。在战前学习跳舞，每次约缴学费二十五马克（每年跳舞新班共开两次，第一次自十月至十二月，第二次自正月至三月），现在已随马克价递涨，年龄超过十八岁以上者，更须缴纳娱乐税百分之五十。跳舞之第一夜，由教习一一呼名介绍，无论男女，每闻教习呼到己名之时，必须缓步挺身，前行数步，向一班同学举行一鞠躬之礼（惟男子只向女同学行礼，女子只向男同学行礼，男子或女子互相之间不行礼）。惟此鞠躬仪式，非同小可，先期须由教习加以训练：男子举步鞠躬，女子移步低腰，皆须合乎音乐节奏。教习在旁大呼"一、二、三、四"，一如吾国之体操教习然。除此以外，更讲示男子对于女子之礼，譬如席间相见须如何让坐，路上相见须如何脱帽，手须如何吻，眼须如何视。总之，一行一动，皆有一定仪式。女子对于男子亦然。吾常谓欧洲青年有三种训练，为其一生受用之基础：（1）科学训练，所以明人与自然或社会之关系者也。（2）宗教训练，所以明人与神之关系者也。（3）跳舞训练，所以明男与女之关系者也。有此种之训练，因而智识得以丰富，意志得以磨练，感情得以安慰，所谓"人的生活"，于是乎成。故欧洲人自少至老，兴趣深浓，只知生之可乐；而吾中国人则一反其道，生气垂尽，无可为欢。盖其种因于少年时代者远矣。德国青年男女学习跳舞，既多在十五六岁之时，两情正在萌芽，同心遂自此结。且每当跳舞之夕，女子多伴其母而来，偕舞男子又往往于翌日登堂拜母，往来关

系从此开始。此后跳舞教习，更时时举行特别跳舞宴会，旧日生徒，一夜群集，同心之人，无不相约而往，酒阑灯炧，如醉如痴，送花送果，多含深意。舞罢，复由偕舞男子送归其家，月下途中，尤多私语，厚意浓情，刻诸肺腑。故跳舞宴会者，德国男女交际之第一机会也。

（二）**假期旅行** 德国人之日常生活，无论男女老幼，皆可以一个“忙”字尽之。而男女言情之事，又决非忙人所能为力，于是乎假期旅行遂为男女交际之第二机会矣。德国无论官吏、店伙、工人、学生，每年皆有一定假期以资旅行休养。若系官吏店伙，更由国家或公司给以旅费若干以为补助。惟德国中等人家，每借旅行期间，特偕其子女前往他城，拜访亲友，留寓亲友之家，动辄一月半月，起居饮食工作，一如家人。他日亲友假期，亦复携眷前来回拜，如法泡制，不偿费用，一来一往，各不折本，既已旅行，又得话旧，所费者不过有限之火车费而已。当此旅行之时，青年男女各携其书卷针线，以度此一年不可多得之闲暇光阴。更与亲友家中之表兄表妹或表兄表妹之朋友朝夕相聚为乐。或围坐灯前，细谈心曲，或闲步田野，指点风光。总之，一草一木，皆含春意，一语一动，各有匠心。更加以短期相聚，男女之性情才能，皆可从此窥见一斑，以增加其了解程度，凡种有爱根者，至是遂不复解脱矣。

（三）**青年组织** 德国各大政党皆有一种青年组织。每月之中常开演说大会或各种游戏，男女青年借此机会常相聚集。在左党者对于资本家之压迫，则誓不两立；在右党者对于劳动者之行动，则忿火如焚。本来男女相互之间已富吸引之性，而况志同道合，尤为撮合之资。从此一言一动，皆觉先得我心，相订白首之约，自是意中之事。此外不属于政治运动之青年组织，如“游鸟团”之类，则更男女相结成群，互携乐器，彻夜不归，共宿森林，其易于发生恋爱，更不问可知。故青年组织者亦为德国青年男女交际之门径也。

德国青年男女交际之机会甚多，本不限于上述三种，然此三种情形则最为普遍，此外如男女同学、游戏团体（如击球划船之类），处处皆有男女交际机会，甚至于大街之上，更有男子无端而向女子鞠躬，并询之曰：“小姐，你许可我送你归家否?”如女子答之曰“请”(Bitte)，则表示欢迎之意，如答曰“谢谢”(Danke)，则表示拒绝之意。更有在电车火车上误触女子之足，遂将帽子一扬，谢曰：“请你饶恕我。”从此便借故指东说西，居然发生交际机会者，亦所在皆有。然此皆非交际正宗，谓之为支流旁道可也。

（三）初恋与将婚

德国青年男女发生关系以后，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自开始交际以至于订结婚约，可以谓之为互相为媚时代；第二，自订结婚约以至于举行婚礼，可以谓之为互相为欢时代；第三，自举行婚礼以至于同衾到老，可以谓之为互相为生时代。此三时代之生活，各有其特色，断然不同。吾此节所谓初恋者，即指第一时代而言。世间最快乐之事，盖无过于初恋，人生最难得之境，亦无过于初恋。何以言之？德国男女初恋时代，大约自十五岁以至二十岁，当此之时，恋爱情窦初开，审美观念尤重，好色之心，浓于嗜利，所有一切恋爱，盖无不出自真诚，发于天性，既无面包气味参杂其中，亦无严刻理性支配其间，所谓“本能的爱”是也。著者自到欧以来，常有一问题悬于胸中曰，究竟欧洲男女对于爱情（Lieben）与生活（Leben）两事孰为重视？经数年来观察之结果，乃得一答案曰：“欧洲男女甚了解爱情，但尤了解生活；为生活而牺牲爱情者十之八九，为爱情而牺牲生活者只十之一二而已。”此无他，欧洲物质文明过于发达，生活之念重于爱情，实势使然也。惟此例不可以概青年男女之初恋时代。吾上文曾言，德国青年男女初恋时代，系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其时人世不深，天机尚厚，钱之一字，犹未萦怀。著者尝在德人席上每见初恋男女，促坐谈心，万种温存，十分体贴，相慕之情，超于物外，偶闻其家长者谈及战后生活困难情形，辄复厌而退席，偕其所欢，共步园林，或细数落花，或低歌一曲，要皆烂漫天真，不杂俗见，实为恋爱生涯中之至纯至洁者也。且德国习俗，男女交际之道虽多，而男女交际之分则严，良家闺秀决不轻易与人谈及爱字，彼此相见，均尊称之曰“君”（Sie），及其情意既通，始呼彼此为“你”（Du），即此自“君”到“你”之间，便不知需用若干试探手段，其他更可想而知。惟在此试探期中，男子既深惧有失女子之欢，女子亦深恐不当男子之意，彼此各竭其媚，惟恐或后。故记者称男女初恋期间曰“互相为媚时代”，并叹为世间最快最乐之事也。反之，人生若不尝初恋滋味，又实为世间最悲最惨之事。吾国昔称鳏寡孤独四者为穷而无告之民，其实此四种人，若在欧洲社会政策善良之国家，则养老有金，育婴有院，决无流离失所之虞；惟初恋一事，则以相手方[①]爱情为条件，既非国家政策所能为力，更非金钱

① 相手方：原文如此，疑为双方。

势力所能奏功，处此男女交际自由之场，若无才貌德性动人之处，真可以终身而不能一得初恋机会。著者常见此间跳舞学校有一女郎，自新班开始以至于学习告终，为时约有三月之久，竟无一次为男子所选（德俗每次跳舞多是男子挑选女子，至于女子挑选男子之时则极为稀少，有之，亦必由教习特别声明），冷坐室旁，凄然欲泪，其惨酷有如此者。因此之故，每次跳舞，皆由教习强邀在座男子与之共舞，循例动作，索然无味。夫与人跳舞且不可得，更何有于初恋之可言。故在欧洲社会中，鳏寡孤独皆不足惜，其真正穷而无告者，乃不得初恋机会之人耳。

德国青年男女之初恋时代既过，随即继之以“将婚时代”。所谓“将婚时代”者，即著者上文所述之自订婚约以至于举行婚礼之第二时代也。大约其时男女年龄多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为男女生活之一种过渡时代。（一）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则将由依赖家庭进而为独立谋生之过渡时代。德国家庭对于其子女之责任，儿子则使其受相当教育，以为独立谋生之预备；女子则分为两种：（甲）能嫁人者，则代备其妆奁；（乙）不能嫁人者，则代谋其职业。总之，父母对于子女二十五岁以前之生活及其日后谋生之预备负完全责任。自二十五岁以后（此就一般而言，当然有例外），则无论男女皆当各自为生，不能依赖家庭。为子女者对于父母之财产，则非至父母死后立为遗嘱赐予，实不能妄想分一杯羹也。德国男女将婚时代既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正值经济生活情形递嬗之时，因之男子则尽力求学作事，以谋社会地位之取得，女子则终日制置妆奁，以谋家庭生活之美满。彼辈为圆成双飞好梦起见，虽历尽千辛万苦亦在所不惜。每日辛苦之余，只须五分钟时间与其所欢一见，已足偿其一日之劳。其奋发猛进情形，决非吾国青年之苟且因循者所可企及；而其甜蜜恋爱滋味，亦远非吾国青年之落落寡欢者所能一尝。盖德国青年之于进取精神及恋爱生活，皆建筑在一个基础之上，为恋爱而始进取，因进取以固恋爱，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二）就恋爱生活方面观之，则将婚时代又为灵的恋爱进而为肉的恋爱之过渡时代。德国青年男女在初恋时代，虽远较吾国为自由，然其一举一动，皆尚在父母监督之下，偶有钻心私语，亦无不于暗地背人之时。一旦婚约既订，从此恋爱公开。德俗称订婚之夫曰新郎（Bräutigam），称许字之女曰新妇（Braut）。若初恋男女一朝得此头衔，则随时可以在父母亲友之前大接其吻紧偎其肩矣，旁人视之，只有羡慕，决无非难。每逢星期休暇，更双双互携乐器，偕往幽静森林，以畅其一日之兴，此中人语又往往不足为外人道也。盖此时男女生涯，彼此皆在尝试期中，既不如从前初恋时代之终隔蓬山，亦不似他日已婚时代之家常便饭。此时此景恰到好处，故著者称之曰“互相为欢时代”也。

由此观之，初恋与将婚（自十五岁至二十五岁），实为恋爱生涯中之神髓。过此以往，则生活（Leben）多而恋爱（Lieben）少，味同嚼蜡矣。奈何吾国青年人生，竟不

幸而丧失此可珍可贵之一段！以言初恋之乐，则顽固社会认为败俗伤风，四处非难群集；以言将婚之乐，则未婚男女每为陋习所拘，不能自由相聚。因之，吾国结婚男女在未入花轿以前，本为路人，无所谓恋爱，在既离花轿以后，又只有生活，亦无所谓恋爱；故中国一般人之于恋爱风味，可谓始终未得一尝，人生幸福，殆已剥夺过半矣。

（四）求婚之方式

德国求婚方式，约分“自荐”与“登报”两种，兹请叙述如下：

（一）**自荐** 德国男女于订结婚约之前，大都经过男女交际一种阶段（此就大多数而言，至于少数之登报求婚，则为例外）。在男女交际期中，对于彼此之性情身世已先有深厚之了解，然后乘机求婚，毛遂自荐，决非如吾国婚姻大权之往往操于媒人手中也。惟自荐情形，又分两种：（甲）自荐而遂：吾前文曾言德国男女在初恋期中，彼此须费若干试探手段，无论指花说木或弄月吟风，皆含有侦探作用。侦探既竣，灵犀遂通。德俗，求婚之事，皆系男子先向女子开口，两情既早已默许，此时自不必谦虚，有求必应，灵验如神，此专就男女方面而言也。其在父母方面，则男女两方早已大施运动，吾国之赞扬男才女貌者，大抵为作合者之冰人每每空中楼阁，不尽不实，德国之善于歌功颂德者，则多系欲婚者之自身，又往往指事为证，故甚其词，终日包围父母，絮絮不休。父母既非蠢物，此情安得不知。及其白首私约已订，然后始向父母提出正式要求，若此时父母欢然承认，克期召集亲友举行订婚仪式，则从此一对鸳鸯遂成永远佳偶，人生之乐，无过于此；若此时父母断然拒绝，或嫌身分相差，或嫌信仰不同，则从此一场悲剧即日开始排演，人生之苦，亦无过于此。惟德人意志坚强久已著闻于世，无论百折千回，终须达到目的。情所不钟者，则虽有父母之命，亦不肯降志相从；意之所属者，则虽蒙社会之讥，亦不愿避嫌而弃。出生入死，惟爱是从，地老天荒，此情不渝。故在德国社会中，未尝无嫌贫爱富、趋炎附势、视子女为摇钱树之父母，惟其技极不易售，终必为其子女之热情毅志所征服，此则与吾中国不同者也。因此，德国青年男女之间，若果爱根深种，则自荐之举，未有不遂；其有不遂者，非父母之阻，乃自身之咎也。（乙）自荐不遂：欧人个性发达，凡事不肯舍己从人，对于婚姻一事尤不愿勉强将就。大概每一青年男女皆各有其结婚条件，若条件相合者，则虽赴汤蹈火亦在所必求；若条件不合者，则宁终身鳏寡亦在所不惜。著者每参与德国青年男女之会，座中如

有人谈及婚姻问题，著者辄喜叩在座男女之结婚条件，以研究德国青年男女之心理，汇而较之，大约男子嗜利者十之八九（德国男子非娶有钱女子，大半不能成家，尤以战后为甚，其理由下文再详。故著者每有所询，在座男子辄多以愿娶富女为对，此亦欧人坦白直率之处），好色者十之七八，重德者十之六七，爱才者十之五六；女子则爱才者十之八九（此处才字含几分虚荣意味），好色者十之七八，嗜利者十之六七，重德者十之五六。惟有一次曾遇一女子，自述其结婚惟一条件为“相互了解”四字，此则相赏于牡牝骊黄之外，不复滞于物相矣。德国青年男女既各有其结婚条件，一旦男女交际，若男子对于女子认为条件满意，冒昧向之求婚，而在女子方面则又认为条件不合，婉辞谢绝，从此男女之间，遂由友谊一变而为仇敌。大概此种失意男子，或速娶其他美女以骄其旧欢，或由此终身不娶以寄其深情。惟殉情自杀之人，在德国男子中尚不多见耳。反之，若女子对于男子认为条件满意，而男子则又认为条件不合，德俗女子既不能向男子正式求婚，只好旁敲侧击，微示其意，苟表示意思以至于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均不见其回音，则女子遂不得不从此病矣，然其不能与所欢男子结婚仍如故也。盖德人之不肯牺牲已成天性，自国家权利以至于男女恋爱，盖无不如此也。

（二）**登报**　德国求婚方式除当面自荐外，更有登报求婚之一种。其出名登报之人，或系亲友，或系本人。说明财产多寡，地位高低，身材长短，年龄大小，及其结婚条件等等。凡有认为满意者，即可投函报名，呈递像片，自述身世，以冀获选。此种办法颇有类于投标生意。兹选译求婚广告数则，以供诸君一笑：其一，代妹征求夫婿。其人须出自良家，曾受高等教育，吾妹系中等身材，美丽面孔，有财产一百五十万马克。其二，代弟征求佳妇。吾弟年三十四岁，身材高大，某大公司之股东，欲寻一年少美丽，出自高等家庭之小姐，并据有多数财产；但此是一种希望，不必作为条件。其三，极有智慧之犹太女郎，系出自良家，其人虽已中年，但风度犹极美，据有多数财产及高额收入，愿寻一社会地位甚高之犹太夫婿。其四，极为能干之高等商人，中等年纪，天主教徒，据有极高收入，并有财产三千万马克，寻一出自良家、曾受教育、通晓家事之太太云云。著者从前曾有一女房东，其人新寡，年约三十左右，有子一人，有房一座，意欲再嫁，遂在某报登一广告，征求夫婿。著者初以为此种中年寡妇，值此战后女多男少之时，恐不易寻对手；乃事出意外，广告登出之后，连接四五十封回信，大约此种男子多系照顾房产而来也。

吾国青年男女之婚姻大权，握于媒人，主于父母，固极不合情理；而德国之登报求婚，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足为训。其可以为吾辈之法者，其惟“自荐”方式乎。此种“自荐”方式，在吾国顽固之人或竟将谥以“私奔”徽号；其实“私奔”者男女天赋之权利也，即在吾国古礼，亦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而况德国青年男女

之自荐求婚，其情形尚未及于奔之程度乎？

（五）结婚之条件

结婚者，德国青年男女脱离旧家庭而另组织新家庭，由神圣恋爱而转入实际生活之时期也。吾国系大家庭制，娶一媳妇入门，只算对于旧家庭之中添丁进口，而男女经济情形不必因而变更，所有“大锅饭”之生涯，其在结婚以前与结婚以后盖无以异也。德国系小家庭制度，男女一旦成婚，即须脱离父母独立生活，经济情形立刻大变。在结婚以前为旧家庭之附属品，对于衣食住均不必负责，在结婚以后则为新家庭之主人翁，对于衣食住须绝对负责，此其不同之点也。明乎此则，知德国何以无早婚之患，而中国何以独患早婚；德国人何以富于独立精神，而中国人何以安于依赖生活，是皆经济情形为其主要原因也。

经济既为结婚之重要条件，故德国青年男女一旦发生恋爱后，无不亟亟于经济之是谋；盖父母阻碍不足忧，社会非难不足惧，所最可怕者即孔方兄之作祟是也。就德国结婚男女之经济负担观之，则可分为开办费与经常费两种：开办费多由女子负担，经常费则由男子负担，其分配情形如左：

（一）**开办费**　吾上文曾言结婚为德国青年男女脱离旧家庭而另组新家庭之时期，既欲另组新家庭，则需用一笔大宗开办费可知，而且德国物质文明素称发达，中等人家生活直等于吾国之达官贵人。兹请一述柏林普通中等人家之设备如下（此处所谓中等人家，如小学教员、普通商人、成衣工匠之类）：柏林中等人家，其在城中居住者，多赁楼一层，其中计有会客室一间，大餐室一间，寝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其中多附厕所）。楼前则有平台（Balkon），为夏日乘凉之所；楼上则有顶室（Boden），为晒衣储物之处；楼下则有地窖（Keller），为储柴藏炭之用。至于房中陈列，在会客室内则照例有穿衣镜一架，睡椅（Sofa）一张，圆桌一个，大椅一对，钢琴一具，橱柜一架；墙壁之上则高悬画屏，桌柜之上则满陈雕刻，下有五彩夺目之地毯，上有装璜精致之灯罩。此为客至会谈之所，等于吾国之所谓“花厅”也。会客室之旁即为大餐室，与会客室一门相通，其中陈列，则有餐桌一张，座椅四对。大睡椅一张，穿衣镜一架，碗柜花橱，面墙而立，古磁银器，四壁高悬，此即客至茶话酒会之所也。餐室之侧多紧接厨房，往往于两室壁间，辟一小穴，饰以窗户，为传递食品之用。厨房之中，则有碗柜

一架，菜橱一具，饭桌一张，座椅一对，煤气灶及煤炭灶各一，水池水桶，一切应有尽有。钢刀木瓢，其类往往数十，煮蛋有表（厨中有蛋表一个，系用玻璃制成，两端如蒜，中有一线相通，形成葫芦，盛红沙少许，煮蛋之时，辄将一端倒置，其沙由上而下，沙尽蛋熟，其火候不至于过老，亦不至于过嫩），切肉有器（德国有二种切肉机器，一能使肉如纸薄，一能使肉如酱泥），各种香料瓷缸，无不秩序井然，此即夫妻日常饮食之所也。此外则有寝室一间，床铺两架并列室中，夫妻各据其一，储衣木柜一架，梳洗妆桌一张，必需之物，设备齐全，此即夫妻日寻好梦之所也。其他如浴室、厕所、平台、过道（入门之处，陈列衣架镜屏一具，为客至卸衣之用），皆各有其相当设备。总之，专就各室木器地毯陈设各项而论，其价已在三千马克左右（此系战前价值，约合华币一千五百元），再加上金银瓷器衣服首饰（德国战前妇女换洗衣服，每人皆在数打以上，金表珠圈，更是普通首饰），其价盖非五六千马克不能办也（约合华币三千元）。战前德国官吏、教员，非有七千马克妆奁之女子不娶，盖非此不足以维持其体面生活也。此种开办费，皆由女子一肩承担，富者则由女家父母出钱制备，贫者则由女子自身挣钱购置，有妆奁者则极易寻夫，无妆奁者则终身处子，此与吾国嫁女之只备衣服首饰寝室器具者，其难易真不可同年而语矣。故不到欧洲来，不知嫁女之苦，不知立家之难。当此战后生活陡涨之时，一室家具，动值钜万，更非现在德人能力所能胜任，而因陋就简一如吾国之蓬窗茅室生活，又为德人宁死所不愿为，此所以德国近来怨夫旷女之与日俱增也。

（二）**经常费**　据上面所述，德国女子之担负可谓重矣，而男子则如何？德国男子当脱离旧家庭之时，两手空空，全靠其妻布置一切，就表面观之，可谓逍遥已极。其实男子负担之重，亦并不下于女子，有时或且过之。盖女子所负者为有限责任，而男子所负者则为无限责任；女子所负者为一时的开办费，而男子所负者则为永久的经常费也。故德国男子一言结婚，必须先有职业，而且职业之收入，至少每月须有三百马克左右（指战前而言，约合华币一百五十元）。欧人系肉食民族，一日三餐非肉不饱，女子又极趋时尚，旧裙破帽更不屑穿，且德国女子了解美术赏鉴风景之程度，远过于吾国女子，每月之中至少须看戏一次或听乐一次。吾国女子只看看新舞台之“济公活佛”便可满意，而德国女子则非领略易卜生之“海上夫人”不能过瘾；吾国女子只听听范少山之“苏滩”便可心旷神怡，德国女子则非往听摆提火粉[①]之音乐不能志满意足。每年之中至少须旅行一次，吾国女子只到龙华道上、半淞园里，便可敷衍过去；德国女子则非到瑞士湖边、北方海畔不能满其欲望。请问诸君，这一笔生活费娱乐费需要多少！因而男

① 摆提火粉：即贝多芬，下同。

女智识程度愈高者则其结婚也愈难，至于勉抑奢欲，对泣牛衣，非惟女子所不情愿，抑亦男子所不忍为，盖既已爱之，又何忍坐视其抑郁穷愁也。故德国男子若无相当收入则宁可终鳏，女子若无适当妆奁则宁肯不嫁，换言之，非具备结婚条件者决不勉强成婚，此与吾国男女之轻于嫁娶者可谓根本不同矣。

（六）结婚后之生活问题

著者上文述德国男女结婚条件时，曾谓德国女子了解美术赏鉴风景之程度，实远过于吾国女子，因而所需娱乐费用甚多，皆恃夫婿为之开销云云。读者诸君或将误以为德国女子生涯，不知如何好吃懒做，贪玩喜要，一如吾国之所谓“太太”者然。其实德国女子之美术兴味固百倍于中国之新式小姐，而其工作能力，则亦千倍于中国之旧式太太。昔著者旅居 Frankfurt a. M. 时，曾寄寓于一中等官吏之家，其女公子年仅十七，毕业于商业学校，授职于工商银行，通习英法语言，了解音乐美术，每日自银行公毕回家，即偕其父母作工田间，掘地推粪，割草担瓜，无所不为。吾国近年海上时髦女子，说几句洋泾滨英语，奏一曲清平调风琴者，固属与日俱增，然求其能掘地推粪、割草担瓜者，则渺不可得。至于割猪草推牛粪之妇人，在吾中国乡间更是车载斗量，然求其能了解音乐、赏鉴美术者，则又自古无闻。风流俊慧与耐劳吃苦，二者不能得兼。德国女子之好处，即妙在同时具备两种资格，此其所以可贵也。吾并不希望吾国新式小姐人人能作苦工，一如德国女子，惟其掘地推粪之精神则万不可缺，盖耐劳刻苦，非独大与生活有关，抑亦强健身体之道，世有慧心女子，当不以吾言为谬也。兹请一述德国结婚后之男女分工情形：

（一）经济之分工 德国男子专负在外生产之责，女子专司在家消费之事，质言之，男子只管挣钱，女子只管用钱，各有专职，互不相越。譬如男子每月应得薪水及津贴若干（德俗，无论官吏、教习、店伙、工人，除每月自己之薪水外，其有妻室者则加给津贴若干，其有子女者则又加津贴若干，务使其无家庭后顾之忧，以安心其工作。良法美制，甚可效也）全数交与其妻支持生活，购置物件，一听其妻安排。德国家庭各有家政簿记一册，为主妇所执掌，其分类详密，一如吾国之公司商店，每月收入多少，支出若干，无不分类登记。量入为出，其预算之精确，又远胜于吾国之中央政府。惟近来马克大跌，生活日涨，预算之案，频告破裂，操持家务之主妇，遂往往因而自杀。盖德国社

会组织极为紧严，一举一动有如机械，一旦秩序紊乱，便皇皇无主，不知所为，转不如吾国家庭之东扯西拉、随便过去、家无宿粮满不在怀者之逍遥自在也。

（二）家事之分工　德国家政既为主妇操持，故一切家庭工作亦以女子为主要角色，男子不过一配角而已。此间吾国同学友朋，能切菜烹调者颇不乏其人，而德国男子则对于此种工作大概不懂，每见吾辈烹调，辄传为奇闻希见。即此一端，已可见德国家庭男女分工之如何严密矣。德人无论何事皆极注重分工，自极渊深之科学以至于极浅易之家事，盖无不如此也。女子既为家事主角，故在未嫁之前即已在家政学校特别练习（此外如普通女子商业学校，亦无不附设烹调浆洗之科，在校学生皆须学习），每家厨房之中，更有装潢精致之烹调专书一部以备参考。德俗每日用餐四次：第一次为晨点，约在七钟之时，所食者为牛油（现在则系准牛油）、面包加非（现在则系准加非）；第二次为午餐，约在十二钟之时，所食者多为马铃薯、菜蔬肉品清汤等类热食；第三次为午点，约在午后三钟，所食者为牛油面包加非，一如晨餐；第四次为晚餐，约在午后七钟，所食者为面包香肠等类之冷食，外滕以加非或可可一杯。以上所述系就普通情形而言，若其夫工作或其子功课须在午后始能完毕者（德国官厅公司工作，常在午后三四钟左右完毕，学校课程则多在午后一钟完毕），则午餐一顿遂移在午后三钟（间或父子工毕回家，随到随食，不必彼此相候），而午点一次则根本取销。惟自早晨至午后，为时太长，故父子各携香肠面包数块以为厂中校内充饥之用。此种日常食品，皆为主妇采购烹调，男子只费张口吞嚼之力，其他皆不问也。德国女子除烹调外，更娴熟针线，织袜补衣，终日忙碌，一面坐在灶边烹调以觇火候，一面又手持织物工作不休，一若半分钟时间亦不肯浪费也者。除此之外，每日必须擦洗地板一次，揩拭灰尘一回，虽至窗子缝边，画屏角上，亦必摩挲数下，于心始安。厨中碗盏，陈列井然，倘有一个杯子未曾洗刷，则往往终夜不能安眠，盖德人之好清洁爱秩序，已成天性，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此外每一两礼拜则洗衣一次（德国每家之中皆有洗熨机器，虽男子之硬领亦往往能自洗熨），每礼拜六则制饼一次（或为星期日客至茶会之用，或为夫妻郊外闲游之备）。总之，家中各事多为妇女承担。至于男子所分之工，则如采办大宗粮食（如马铃薯之类）、煤炭，对外交涉代表一切。此外家中如有机器偶坏，则拆开自行修理（德国每一家之中，关于修理机器之各种器械无不齐备，故著者曾谓德国为举国工程师化）。夜间若有窃盗入室，则持枪前往追寻，是又为男子方面特殊之工作也。

（三）夫妻之合作　德人勤而不俭，无处不应用其“大生产大消费”之原则，与吾中国个人生活（中国国家亦然）之宁愿因陋就简、不肯努力生产者根本不同也。吾前在Frankfurt. A. M. 时，所有左右邻居，类皆官吏教员，其人无不于附近地方租地一段栽种菜蔬。每日午后公余归家，辄偕其妻室子女共往田间工作，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荷锄相对，其乐陶陶。盖天下最快意事，未有逾为“所欢”而作工，或对“所欢”而作工也。读者诸君试思，茫茫人海，吾辈究竟为“谁”作工，对“谁”作工，其国内军阀乎抑国外资本家乎？盖生产者为一种人，而消费者又另为一种人也。吾上文所述之德国夫妻，往往自田间工毕归家后始用晚饭，饭后，有子女者则共查其课程是否已预备妥贴，无子女者则共奏其音乐，快乐有甚于画眉。如此人生，虽过百年终觉其短，若吾国之家庭生活，则虽只一日亦常令人嫌长也。

（七）结婚后之性交问题

上文屡述德国青年男女相恋相爱情形，在一般自命理学先生之士，或且误认德国为一狂童狡女世界。其实倘有人劈头向著者相问，究竟德国人与中国人孰淫，记者只能答之曰，中国人好淫，且其好淫之程度实远过于德人。何以言之？第一，德国中等社会之结婚年龄，多在二十五岁左右，而中国则在二十岁以前已有床第之乐。第二，德国人非具备结婚条件真能生活者，则宁肯不娶不嫁，而中国人则虽穷如乞丐无以为生，亦莫不有其室家。第三，德国中等家庭，大概只有子女一二，而中国中等人家动辄产育半打以上。第四，德国中年人之感情生活多寄于音乐美术，中国中年人之娱乐方法则多为优娼婢妾。第五，德国报纸上之广告，大都为纺织粮食、机器材料，中国报纸上之广告，则大半为五淋白浊、遗精梅毒。由此观之，中国人安得不谓之好淫乎？性交问题关系民族生存强弱前途者甚大，兹请与诸君一谈德国男女结婚后之性交问题。

当著者初到德国之时，每与德国中等人家交际，辄有一事令吾注意，即每一家庭大概只有子女各一，不多不少，而且其子女产生之年龄，又多在父母结婚后之次年。吾再察其父母身体，又皆强壮无病，元气充满，亦并非不喜性交不能生育之人，而何以只生子女二人，又何以独于结婚之次年产育，此其中必有人工加以限制，盖无疑矣。德国中等人家，皆受相当教育，知产子不难而教之成人则难。与其为社会添一冗人，不如不产；与其为自己留一孽根，不如无后。而且德国父母爱子之情极深，若系男孩，则必供给其大宗教育费用，以便将来得一较高职业之地位。若系女孩，则必代备其大批妆奁物品，以便将来得一出人头地之夫婿。除此之外，更令其研究音乐，练习游戏，以免其将来生活枯燥。其为子女计者，可谓至周且备。吾辈每在街头巷口，常见德国儿童衣履华洁、气象活泼，辄叹为神童仙女，起人慕爱。故在德国家庭之中，其子女所需费用往往

逾于成人。中等人家之收人，至多只能供给两个儿童，因此之故不敢多育，此中等人家之所以只有一子一女也。反之，下等社会不知教子之难，往往纵情产育，不加限制，儿女年龄稍长，即令其作工谋生，亦无供给子女之忧，故在德国下等人家中，所生子女亦往往半打以上，其与吾国情形盖完全相同也。兹将柏林城中，分为最富、次富、次贫、最贫四区，而比较其产育数目如下。

柏　　林	在每一千产育年纪之妇女中其每年平均产额
最富之区	四七人
次富之区	六三人
次贫之区	一二九人
最贫之区	一五七人

兹再就汉堡一城而论，大约其收入愈多者则其产育愈少，其收入愈少者则其产育愈多，其数如下：

汉堡各区	每人平均收入（以马克为单位）	平均每千人中所产之数
Harvestehube	二八五五	二二·五
Rotherbaum	二一九六	一九·五
Hohenfelde	一二二〇	二五·七
Barmbek	一二二一	三九·五
Horn	一二〇一	三七·六
Billw. Ausschlay	二七八	四六·六

以上二表，一见之于 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一见之于 Mombert 报告，大概德国下等社会产育所以独多之故，不但由于忽视子女教养所致，而其娱乐方法集中于“酒色”两种，亦为其重要原因。盖德国下等社会之于酒色，亦犹吾国上流士夫之于嫖赌，为毕生唯一寻乐之所也。至于德国上中流社会之人，则在美术音乐方面可以消遣之道尽多，对于男女色欲遂不免因而淡泊。吾人从此可知欲求淫鬼减少，与其提倡“寡欲”，不如提倡“分欲”也。

德人平均计算，其聪慧者实较吾国为多。除后天教育普及为其原因之一外，其基于先天者约有二种：（一）德国男女结婚，多是先有恋爱，而且生育子女之时，又多为新婚未久爱情结晶之日，则其所产宁馨，自必聪俊过人。吾国俗称私生子聪明，此无他，因私生子之父母，至少彼此皆有几分爱情也。（二）德国男女种子之时，绝少昏夜，尤

喜在山明水秀之区，园内林中，男女枕藉，过路之人，不以为怪。故其所产子女秉赋平旦之气独多，山水之灵甚富，与吾国之深夜昏昏，不省人事，斗室湫陋，光线缺乏，所产者异也。

至于德人身体，强壮百倍吾人，此更无庸讳言，除后天体育运动为其原因之一外，其基于先天者亦有二种：（一）德国男女结婚多在二十五岁左右，其时男女身体发育已达成熟，所结之果，当然坚实。吾国则少年早婚，父母之发育尚未健全，子女之身体安能强壮？（二）近年吾国患遗精症者甚多，报章杂志满载此种药名，肾部虚弱已成普遍现象。吾常以遗精（samennerlust）症名遍询老幼德人，均不知其所谓，则其肾部结实可想而知。若吾国则不然，既有肾部症弱之父，再加上病如西子之母，其所遗传，无非病髓。昔斯巴达为强种起见，每将残病儿童致于死地，若此政行之中国，则可死者吾不知其有若干也。呜呼，此种重大社会病象，独为缙绅先生所不屑道，则吾恐黄帝子孙之末日，行将见其不远矣。

（八）婚姻之变态

何谓婚姻之变态？即有恋爱之实而无夫妻之名者是也。此种情形，在物质发达思想进步之文明国中，实不少其例。究其原因，大约有三：

（一）基于经济原因者 吾国子女婚姻大权，往往主于父母，常为世所诟病，谓其不合“婚姻自由”原则。其实欧人婚姻，又何尝一日自由，盖操纵其间者非父母，乃金钱也。故欧洲社会党常谓，在现代经济制度之下，绝无婚姻自由之可言；欲求婚姻自由，非先经济革命不可云云，其言实非无因也。吾前文备述战前德国中等人家结婚条件时，曾谓女子至少须有五六千马克之妆奁（约合华币三千元），男子至少有二三百马克之月薪（约合华币一百五十元），然后始可言及结婚。惟此种妆奁，此种月薪，不必尽人皆有，换言之，结婚条件不必人人具备，其不具备者，则只好终于不嫁不娶之一途而已。然金钱魔力，虽可以限制婚姻，却不能限制恋爱。苟人类一日有男女，即恋爱一日不绝灭，于是乎只恋爱而不结婚之情形，遂亦由此发生矣。而且此类情形，尤以地位高尚之人为最多，因地位高尚之人，对于起居饮食、娱乐消遣所需金钱尤较中等人家为多，决非五六千马克之妆奁所能开办，亦非二三百马克之月薪所能支持（前面所言之妆奁月薪，是指极普通之中等人家而言，若上等人家则往往雇有仆婢以司烹调，所需经费

尤为不少)，故地位愈高者其结婚也愈难（此专指地位高而收入少者言，如大学教授、新闻记者、著述家之类）。以上系就战前情形而言也，战后马克大跌，生活飞涨，支持自己日常生活之不暇，更何能购制器具，组织家庭。且近年德国房屋缺乏，不易租赁，尤为结婚之阻（著者隔室有女子一人，为某公司之书记，其未婚夫是一烟酒商人，业已订婚多年，徒以觅屋未得不能成婚。每夜其未婚夫必来，来必至十二点钟以后始去)。因而战后只恋爱不结婚之情形，更日益增多。以上所述是皆基于经济原因，欲婚而未能者也。

（二）基于个人志行者 上面所述之原因，系由于经济情形不许，此处所述者，则由于个人自己不愿。夫家庭之为物，在一方观之，固可谓为“男女互助”，而在他方观之，则亦可谓为“男女互累”。若有青年男女，高志卓行，或以外患侵陵，祖邦衰弱，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或因豺狼当道，志存荆聂[1]，萧萧易水，来往无形；或欲精研学术，有所发明，深恐画眉，以分思想；或忧劳资两级，贫富不均，奔走呼号，颇嫌家累。倘上述情形，有一于兹，即立志终身，不复婚娶。惟恋爱之来，每如急电，乘人不觉，刺人心脾，而况多血之人，情感特丰，偶遇知心，何能不动？从此相亲相爱，不室不家，举案之盟，期诸来世。此种实质夫妻，形式朋友，既无油盐柴米之忧，复有温存体贴之乐，一旦白杨衰草，赍志以终，更有人嘤嘤啜泣，低徊墓畔；或代搜遗文，或亲撰行状，半生心血，赖以留传。较之其他普通结婚夫妇，墓草未生而桃花已嫁者，相去不知凡几矣。去年著者在《申报》介绍“国际青年团”时，谓其一部分团员立志独身，服务团体，即其例也。

（三）基于主义信仰者 上文所述不婚之原因，其目的仅在免除家累，成就学行。此处所述不婚之原因，则是根于最新学说，主张自由恋爱。欧人常谓“结婚者恋爱之坟墓也”，德语亦有“结婚者爱之死也”（Die Ehe ist der Liebe Tod）之说，其意盖谓在结婚以前，系恋爱（Lieben）多于生活（Leben)，在结婚以后则生活多于恋爱也。恋爱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事实。情感之为物，常变迁无定，倘一旦情感既变，犹以一种生活事实勉强范围之，实人生至为苦痛之事也。德国常有一种笑谈，谓男女方其初恋之时，男子往往向女子曰，“我恨不能把你吞下肚子去”。及其结婚以后发生烦恼，又往往向女子曰，“我悔不当初真正把你吞下肚子去，免得今日累我”云云。其描写情感变迁之情形，可谓惟妙惟肖矣。因此之故，德国方面颇有人主张恋爱须极端听其自由，不能加以丝毫法律或教会之束缚，此盖专就情感方面立论也。现在世界产业组织既日趋社会化，因而男女皆当为社会作工，不应私有其家，且近世分工之制日益精严，若人各有

---

① 荆聂：荆轲和聂政的并称，战国时著名刺客，后亦以谓仗义行侠者。

家，自备衣食，势将减少生产时间，有背分工原则，此又就经济方面立言也。故近来德国青年中主张自由恋爱不婚不嫁者，颇不乏人。如“游鸟团”中之一部分团员，即其类也（游鸟团为德国青年组织）。

因上述三种原因之故，德国一部分男女遂有不婚不嫁之志。至于此种男女之生活情形，则彼此皆有职业，两不相累，各居一处，自为门户，每日就食店中，无家庭之累，随时相约晤面，有恋爱之欢，一旦产生宁馨，则付之育婴院中代为抚养，女子则为“超贤妻良母”，男子则为“超良父贤夫”。此种风气，尤以工商业繁华之区为最盛，盖资本主义过于发达，则卖力者（无论脑力手力）之所入，不足以养其全家，势必至于破坏家庭组织，男女各自谋生，此实为无可逃避不能幸免者也。近年吾国学子颇有主张改“大家庭制”为“小家庭制”者，而在欧洲，则又有由“小家庭制”而趋于“无家庭制”之势矣。

（九）婚姻与战争

战争，暴行也；婚姻，喜事也；两名相列，似乎不类。然此两事有时相反而却相成。德国终身佳偶，因战争而结下情缘者，固比比是也。吾前文所言德国男女之三种交际机会，（一）跳舞宴会，（二）假期旅行，（三）青年组织，皆为平时普通常例。而在战时则更有例外数种，请述如左。

（一）战地飞鸿 德国当战争之时，青年将卒，出征于外，故乡之念，常到心头。其有父母者，尚时投食品，以慰归思；其无家庭者，则每闻芦管，空劳梦想。因此之故，国内各校女生，常由其教习分给若干素不相识之战地将卒姓名住址，嘱其驰书相慰，以减寂寞。于是青年女生各竭其香艳缠绵之笔，以达其殷勤相慰之情，鱼书之外，更媵以邮包，或为自织之袜巾，或系亲烹之果菜，或投书报诗词，或寄画张乐器，要皆无不出自私财，曾经玉手。征人得此，大可慰怀，亦复回书申谢，永世不忘，絜果兰因，相逢有日。从此去雁来鸿，不绝于道，灵犀一点，遂得相通，因而发生婚姻关系者，极为不少。著者有女友数人，曾以其当时与战地将卒往来之信札相示，高可盈尺，大约此种将卒回信，无不情词并茂，娓娓动人。盖德国战前系征兵制度，将官兵卒之中不少文人学者，即其下等伙夫亦曾受相当教育，与吾国丘八先生之目不识丁者根本不同也。

（二）私家看护 德国战时受伤将卒甚多，医院为之充满，常有私人家庭自向本地官厅呈请，愿领伤卒一人抬归其家看护，供给一切费用，不取分文酬资。其家若有少

女，往往问汤侍药，备极殷勤，软语温存，令人忘痛。大凡人在疾病穷愁之中，每每易感恩知，铭诸肺腑，而况绣榻横陈，玉人相对，丁宁嘱咐，刺激尤深，因此而种下情根者，更属司空见惯。著者前在 Frankfurt A. M. 时，寓于某官吏之家，所赁之室即当时调养伤兵之处也，其家女公子即当时之看护妇也。惟此少年伤兵，闻其痊后复赴战场阵亡，现在该兵之父犹与吾居停主人馈赠往来，酬应不绝。著者曾一度与之共席，盖一温厚诚默之老年农夫，每道及其子，尚思念不置也。

（三）**军中服役** 战前德国军国主义印入一般国民心髓，无微不至。著者曾遇德国女子数人，询其童时曾作何种理想，多答以欲在战场作一看护妇，以尽忠祖国云云。夫以窈窕温柔之姝，乃喜此杀人放火之事，此真德国社会之特殊现象也。故战争之时，有无数妇女自请前往战地军中担任救护伤亡之职，政府怜其忠诚，加以许可，惟限于某种年龄以上始准前往。战地生活，颇嫌乾燥，军中偶来佳丽，莫不眉飞色舞，伤时则有人裹创相慰，死时则有人抚尸痛哭。吾尝谓欧人生于安乐，死于安乐，虽在血肉横飞之时，亦无不然也。当兹生死一发之际，对此回肠百转之人，其易于发生恋爱，自不待言。此亦为战中男女交际之特别机会也。

以上系就战争对于婚姻所发生之良影响而言，其因战争发生之恶影响亦有三种：

（一）**因战致废** 德国战后，疮痍未复，断足折手之徒，触目皆是。德俗，凡为祖国出力致疾者，皆为社会所钦敬，本无非笑之可言。惟女子爱好，出诸天然，缺足短手，终嫌不妥。于是向日爱情，不免因而大灭，其已订婚者，则希图解婚，其已结婚者，则别谋所欢。此虽为薄幸女子不德之举，然亦是万恶战争所种之因。凡以色聚者则以色衰而散，凡以战强者亦以战败而弱，此固为势之所必至，亦为理之所必然者也。

（二）**为妇不忠** 战争之时，男女既出征疆场，少妇多空闺独守，往往白狼河北，音书久断，而丹凤城南，秋夜又长，一时兴之所至，情不能禁，荡检逾闲，在所不免。及其戍客归来，人情已变，吝唇悭手，万事皆非。更加以战后妇女多有职业（战时男子出征于外，国内一切职业多女子代执其役），经济生活既告独立，夫妻关系更易拆开，因此离婚之事，日有所闻，此固为人情难堪，然亦系人情所常有者也。

（三）**出嫁外国** 战后德国生活艰难，男子非有钱之妇不娶，女子亦非有钱之夫不嫁；适值马克大跌，外币价高，凡籍隶外国之人皆为千金之子，肥马轻裘，一掷百万，大厦高楼，动人心目。而况德国佳人，本无幽居空谷之思，又闻美洲豪富，夙有黄金世界之号，故凡急欲嫁人者，偶闻“美国人”一字，辄双眼放光，全身是劲。最近闻此间妇女为美国人所娶，载而西去者约有数百之多，德国对于此次战争，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矣。此亦战争对于婚姻之间接影响也。

（十）恋爱之余波

恋爱其有尽乎？曰，否。然则何以“余波”名也？曰，余波者吾辈旁观人视线之所能及者也。其在余波自身，为动之终极乎，抑动之起点乎，则非吾辈情海以外之人所能妄为推测者也。兹仅就吾辈视力所能得者，聊为分述如左：

德人身体素强，兼之培养得宜，故中年夭折之人极不多见（战争阵亡则为例外）。德俗结婚年龄往往女子小于男子，平均计算，其相差之数，约在五岁左右。一旦男子先故，其未亡人所恃以为生之道，约有三种：（一）德国从事公务人员，上自官吏教员，下至电差邮卒，无不有其养老恤金，身故之后，其妻即恃此度活。（二）若系自由工人（如成衣匠之类），则在年壮之时即已日事储蓄，为老来生活及身后遗孤之用，一朝不幸物故，此项财产即作为其妻养生送死之资。（三）既无养老恤金又无储蓄财产，则其寡妻便不能不从事工作自谋其生，以度余年，此与吾国之专恃子女为生者又根本不同也。惟自欧战以还，阵亡甚众，可怜无定河边之骨，多为春闺梦里之人，此种青年寡妇，独守空帏，忽失所依，无以为活，其情缘未尽者则桃花再嫁，其爱根深种者则孤柏长青。更往往有膝下遗孤，嗷嗷待哺，只恃国家恤典，无法支持，于是不得不另谋职业以增收入，为养老抚孤之用。既所以报死者，亦所以爱生者，寡母孤儿遂亦从此相依为命矣。吾国贞女节妇不乏其人，大半为国家所旌扬，由社会所奖诱，若德国则不然，国家无半字之褒，社会无再醮之诮，其所以甘于寂寞不复嫁人者，非他，爱为之也。

德国坟地多在近郊，为公共会葬之所，与吾国之家自为茔者异。大抵面积宽广，布置井然，树木阴森，短垣带绕，其中筑有草坪，间以花径，花径两旁，即为坟墓。死者埋骨地下，不砌坟堆，但于地上竖立一碑，环以低栏。碑形与中国墓碑相似，惟高大过之，且用“人造大理石”制成，光彩夺目。碑上刻有死者姓名及其生年死日。碑旁往往立有雕刻裸体美人一尊，泣伏碑侧，作掩泪写字之状，下有文句一行曰：“我们的爱情是永远不终歇的。”此外或题诗一首，如“绿草作你的席，鲜花作你的枕，请你黄泉稍候，便来与你接吻”之类，无不情词悱恻，哀艳动人。碑前有数尺平方之地，杂植红花碧草，临风飘舞，无日不春，吾人行经墓旁有如身入花市。时有青衣少妇，手携洋铁水壶，灌溉墓前花草，往往出神落泪。盖昔时星期休暇，辄偕夫婿听乐观剧，散步闲游，而今则索居寡伴，无可为欢，故每逢星期，特来灌溉，一则可以消遣无聊光阴，二则可

以使泉下人不致寂寞也。灌罢，兀坐碑前（德国墓前往往自置短椅一把，为吊时所坐），冥思已往，当初与其所欢如何相见，如何跳舞，如何求婚，如何偕游，如何结婚，如何生活，无不齐来脑际，都到心头。要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他生未卜，此生已休。盖德国夫妻自结褵以来，绝少分手，无论行商坐贾，作吏为官（从军当然例外），莫不携带家眷，起卧与俱，直至死时，始知离别，其为哀痛，自逾常情。而况德国男女恋爱，其乐百倍吾人，一旦鸳鸯翼折，连理枝摧，颇似白头宫女，追怀先朝旧事，其苦亦百倍吾人。以上系就以情结合之结婚夫妇而言也。至于以志结合之独身男女，则所欢虽死，其志未终，或搜辑其遗文佚稿，或继续其社会事业。要其恋爱之情，相结之志，皆不以生死而易者也。

吾此篇所述“恋爱余波”，大半皆指女子而言，对于男子方面，则尚未一言道及。此其故无他，盖男子者不能言情之动物也，而德国男子为尤甚。德国男子之意志理智皆极发达，而感情一部，则常有相形见绌之感，换言之，只有为意志理智而牺牲之感情，未有为感情而牺牲之意志理智。譬如女子先故而男子不再娶者，则十人之中恐尚不得二三，即此一端，殆已无“恋爱余波”之可言。故以感情而论，德国女子在世界女子情场中可得九十分，列入最优等；而德国男子在世界男子情场中，则至多只能得五十九分，列入不及格。不及格之感情，著者所不愿言也。

此文所述，多系实质方面，至于形式方面，如订婚结婚仪式之类，以其但属糟粕，无庸介绍。又离婚问题，本极重要，然因著者于去年八月九日曾有《德国之离婚问题》一信登诸《申报》，可以参观，故此次亦不必再述。夫婚姻问题者人生最大之问题也，男女自十五岁以至于老死，即无日不为此问题所颠倒左右；其在十五岁以前，则又为父母婚姻问题之余阴也。换言之，婚姻问题占满吾辈人生全部领域，此事若不先行解决，则人生问题亦无从解决。吾中华民族之前途，其将终于暮气沉沉乎？抑将从此生机勃勃乎？吾皆以婚姻问题能否解决卜之也。

附录　德国之离婚问题

德国战后离婚案件，较之战前特别增加。在一千九百十三年之中，其提起离婚诉讼者，每十万人中平均仅有二十六人之谱；在一千九百十九年则已增至三十六人，至一千九百二十年则更增至五十九人矣。较之战前——一九一三年——业已增加一倍有余，其

中尤以繁华都市为最。譬如汉堡每十万人中则有二百二十三人提起离婚；柏林每十万人中则有二百十九人提起离婚，此外各大邦之离婚人数列表如下：

萨克森（Sachsen）	六八·六（即每十万人中其平均之数为六十八人又零六，下仿此。）
普鲁士	五八·八
巴敦（Baden）	五〇·九
巴燕	五〇
乌香摆儿（Wurrember）	三四·四
昂赫儿提（Anhalt）	二八·五

记者尝推究其离婚事件所以增加之原因，共有三种，兹分述如下：

第一，据德国人口统计，女子之数向来超过男子，在一千九百十年调查时，女子之数共有三二八八五八二七人；而男子之数仅有三二〇四〇一六八人。计女子超过男子之数为八四五六五九人[①]。故在战前已有许多女子不能获得配偶，因而德国女子求婚之心，特较他国为急。在战争中少年男子多赴疆场，阵亡消息日有所闻。一般尚未得婚之女子，睹此情形更为着急，于是凡有机会接近之男子，便不肯轻易放过，草率订婚。两人之结合既如此仓卒，则彼此之性情身世，绝少相互了解，可想而知。因此之故，其结也易，其离也亦易。迨至战争既息，其不能彼此相安者，遂纷纷彼此提出离婚矣。又当战争中，男子出征疆场，少妇空闺独守，值此“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之时，往往有逾闲荡检之行。爱情既别有所钟，旧侣遂从兹撒手，此亦为战后离婚增加之又一原因也。此离婚事件之由于战争原因者也。

第二，德国女子教育全系贤妻良母教育，与美国女子教育有所谓“超贤妻良母”者根本不同。故德国女子最喜作 Hausfrau，译为中文，即“屋内妇人”也。德国女子既以“屋内妇人”自命，遂与男子之从事屋外工作者实行分工，男子专负在外生产之责，女子专司在家消费之事，换言之，男子只管挣钱，女子只管用钱，各有专司，互不相越。因此之故，德国女子之经济关系就完全依赖男子，于此可看德国女子之必须求“夫”，与其谓为精神的，毋宁谓为物质的也。然以上系就战前情形言之，若在战后则略有变迁。当战期中，男子多出征于外，国内一切职业，多以女子代执其役，上自官厅属员，下至商家伙友，无不有女子之足迹，于是向者女子之专以“屋内人”自命者，今则多已为“屋外人”矣。女子既有一定职业，经济遂告独立，从此不再依夫为生，腰腿陡然变硬，夫妻之间，稍有不合，即行提出离婚，此为战后离婚增加之最大原因也。此外尚有一特别原因，即战后生活困难，一般德人多不敢多生子女，以重生活之累。子女既

① 原稿为八四五六六一人，依前述女子之数与男子之数改。

少，离婚更易。盖一有子女，彼此之间尚有一点维系之力，若无子女，则朝请离婚而夕为路人矣。此亦为促进离婚之一原因也。以上为离婚事件之基于经济原因者也。

第三，德国战前男女间之恋爱道德，在欧洲各国中较称纯厚；自大战后风俗渐薄，又加之以淫词邪曲日益引诱，恋爱道德渐趋败坏。记者日前在友人处见一留声机器片子，其曲之大意，略谓“奉劝世上女子，幸勿忠心于一个男子，因为现在世上的男子，都是靠不住的；假若忠心于一个男子，便是一个至蠢的女子”云云。此种曲子有妨青年男女恋爱道德，不问可知。而且繁华都市物质发达，各处商店陈列引人入胜，倘夫婿金钱一旦不能满其欲望，更使女子易生另行择人而事之心，故繁华都市中之离婚事件特较他处为多，如上举之汉堡、柏林两城即其例也。此离婚事件之基于道德原因者也。

惟离婚事件之本身，在一方面观之，男女双方爱情不能善始善终，固可认为人世间极可悲痛之事；然在他方面观之，若男女恋爱既早已破产，徒以法律上束缚之故尚保留夫妻形式，又为发生家室不安现象之重要原因。离婚者，所以减少此种家室不安现象之唯一方法也。故有维持风俗者，不在主张离婚事件之打消，而在预防室家现象不安之发生，盖事有本末，宜知所先后也。德国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有鉴于此，日来正在国会提案，主张使离婚法律手续趋于简易，一方既可减少社会不安现象，一方又可使两情恋爱益趋于自由，不加以法律之束缚。从此恋爱之为物，既系自动的，自由的，从心坎上发出来的，不是由法律、由教会从外面维系的，将益感其神圣可贵矣。

（录《申报》）

战后德国之经济[①]

目　次

第一章　概　说

我们研究战后德国经济，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时代：

（一）恐慌时代（自一九一九年六月凡尔塞和约成立之时起，至一九二三年冬间德国

① 此书为《国民外交小丛书》之一种，上海中华书局 1927 年出版。

马克价值固定之时止)。德国自凡尔塞和约签字以后，实行割让土地，实行缴纳物品（如煤炭、机器、动物之类)，固已穷于应付，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协约国更以最后通牒逼迫德国承认伦敦赔款条约。此后德国每年必须交出三十万万金马克左右（约合华币十五万万元)。其结果德国政府滥发纸币，以致马克价值一落千丈，全国经济陷于恐慌。

（二）复兴时代（自一九二三年冬间至于今日)。到了一九二三年冬间，马克价值已跌到美金一元折合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于是德国政府乃发行一种“有利马克”(Rentenmark)，以全国农业为担保，凡持有该项马克者，虽不能直接兑取现金，但可以兑换一张每年行息若干之债券。其结果，马克价值居然稳住一时。次年“道斯计划”成立，更将德国赔款总额减轻，并规定自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起，每年实行支付赔款二十五万万金马克，而以全国工业、铁路及五项税收（关税、酒税、烟税、啤酒税、糖税五项）为赔款来源。其在最初四年之中（自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只支少数赔款，称为“休养期间”。此外复将德国“国家银行”改组，以为“有利马克”之后盾。自此以后，德国金融完全稳固，工业逐渐发展，财政井然有序，人民生活安定。换一句话说，即系德国经济现象从此日趋复兴之途。最近德国更欲以其余力救济法比两国财政，提出种种交换条件。德人能力之雄，于此可见一斑。

本书所述，即系德国战后八年以来之经济变迁情形。读者诸君阅此，必将发生一种感想，即是：“凡有能力的人，无论别人如何压迫，他终久总是要翻身的。”

第二章　凡尔塞和约及伦敦赔款条约

凡尔塞和约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成立，把一个数十年来称雄于世的德国加以各种限制（如军备问题之类)、负担（如赔款问题之类）及宰割（如割让土地之类)，致使德国前途陡呈暗淡之色。现在我们专就该约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一方面去观察。

（甲）割让土地

割让土地可以分为两种：(1）割让本国领土，(2）割让海外殖民地。前者的结果是

丧失了许多工作人民与生产区域，后者的结果是丧失了许多海外销场与掠夺机会。总而言之，都与德国经济有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先就其割让本国领土一端而言。

（1）德国此次丧失本国领土约有七万零二百平方公里，其中计有人口六百五十万（此外尚有数处区域系由人民投票取决，不在上述数目之内）。其分配情形如下：

让与国	土地数目（以平方公里计算）	人口数目
波兰	四五八〇〇	三九三〇〇〇〇
法国	一四五〇〇	一八七〇〇〇〇
丹麦	四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
买麦高（Memelgau）	二七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唐车（Danzig）	一九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
比利时	一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捷克斯拉夫	三〇〇	五〇〇〇〇
（共计割让）	七〇二〇〇	六五五〇〇〇〇

因为这一割让的结果，德国丧失了煤矿五分之二，铁矿四分之三，生铁产物三分之一，生钢产物五分之一。其余如锌、铅、加里、纺织、农产等等皆有相当的损失。其对于德国经济方面必发生极大影响，当然不问可知。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德国所失之殖民地。

（2）德国此次割让之殖民地计有幅员二百九十四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其分配情形如左。

让与国	土地数目（以平方公里计算）	人口数目
英国	二四〇〇〇〇〇	七一二〇〇〇〇
法国	四九五〇〇〇	二〇四〇〇〇〇
比利时	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三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共计割让）	二九四八〇〇〇	一二四三〇〇〇〇

（按割与日本土地之中，有德国从前强夺吾国之胶州一地，幅员五五〇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万，现已退还吾国了。）

德国之有海外殖民地系自一八八四年始，先后夺得非、澳、亚三洲土地若干，以资发展海外商业。因此之故，德国对外输出亦逐年增加。到了一九一三年，竟较前此未有殖民地之时增至三倍之多，其盛况可想而知。现在德国所有殖民地既皆一一奉送他人，则其海外商务方面亦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

（乙）实行赔偿

在凡尔塞和约之中，曾认定此次欧洲大战全由德国引起，德国实为唯一的祸首，因此德国必须担负一切损害赔偿，其数目应由协约国所组织之“重修委员会”规定。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在伦敦议决，德国赔款总数应为一千三百二十万万金马克，此种赔款总数分为三种债券由德国政府交与协约国。“第一种有利债券”系一百二十万万金马克，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起，每年行息百分之五，偿本百分之一。总计每年共应交付七万万二千万金马克。“第二种有利债券”系三百八十万万金马克，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每年行息百分之五，偿本百分之一，总计每年共应交付二十二万万八千万金马克。“第三种无利债券”系八百二十万万金马克，定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交付。惟既不行息亦不偿本，与第一第二两种债券相异。但是将来协约国一旦相信德国支付能力丰富，立刻可以要求德国政府将此种无利之债券改为有利之债券。

照上面讲来，“第一第二两种有利债券”合计起来共有五百万万金马克，每年行息偿本合付三十万万金马克（约合华币十五万万元），其支付方法分为两项：（Ⅰ）由德国政府每年支付二十万万金马克，分为四期缴纳，每期五万万金马克。（Ⅱ）由德国出口货中抽取百分之二十六，每年合计约抽十万万金马克左右（按此数系当时伦敦会议暂时估计，其实若照战前一九一三年之出口货价计算，则每年抽取百分之二十六，其数当在二十五万万金马克左右），亦分为四期缴纳，每期约付二万万五千万金马克。以上（Ⅰ）（Ⅱ）两项，合计起来共有三十万万金马克，是为德国每年应缴的赔款总额。

当时德国政府曾派外交总长西蒙参与伦敦会议，后见协约国方面提出此项骇人听闻的要求，力争不获，乃决定退出会议启程回国。于是法国方面立即派兵占领“鲁尔区城”（Ruhrgebiet）实施惩戒。如此一来实无异宣告德国工业的死刑，因为德国战前共有三个重要煤区，一为“萨尔区城”（Saargebiet），约占全国产额百分之六；一为“阿摆邪乃省”（Oberschlesien），约占全国产额百分之二十三；一为“鲁尔区城”，约占全国产额百分之六十。三处合计起来约占全国产额百分之九十左右。德国战前工业之所以繁盛，皆由于此三大煤区丰富的原故。战后“萨尔区城”之煤，既已属诸法国，而“阿摆邪乃省”一地，究竟属于波兰抑属于德国，当时（一九二一年夏间）犹未决定（按“阿摆邪乃省”问题，已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由国际联盟之建议，决定由波德两国分割。其结果该地煤产，约有四分之三落于波兰之手）。故德国彼时所有之煤区，只有“鲁尔区城”一处，所有德国工业前途之一线希望，亦全系于此一处。今因伦敦会议决

裂之故又为法国所占领，从此德国全国遂无重要煤区。以当时德国经济情形而论，安有能力向外国购煤。故“鲁尔区城”之占领，实无异宣告德国工业死刑。

同时（一九二一年五月）协约国提出最后通牒，勒令德国承认伦敦会议之条件，其时德国政府内惧工业之破产，外受列强之压迫，不得已乃将此事付诸国会解决。投票结果，国性民党全体一致主张拒绝。国民党则主张拒绝者五十九票，主张承认者四票。其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四党则主张承认。遂大多数通过，决定收受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既已承认，便不能不实地履行。一九二二年正二两月德国共应支付到期赔款七万万五千万金马克。但其时马克纸币价值日跌，德国财政十分困难，实无能力支付此种重大数目。不得已乃要求协约国准其延期缴纳，并谓至多亦只能筹出一万万五千万至二万万金马克之谱，至于该年全年赔款总额，则希望“金钱交付”至多只能交出五万万金马克，“物品交付”至多只能交出四万万五千万金马克，两项合计起来共有九万万五千万金马克，较之伦敦条约规定（即最后通牒勒令承认者）约减少三分之二。其后（一九二二年正月六日至十三日）协约国乃在开恩斯会议讨论德国赔款延期问题。结果各国代表决定，德国对于一九二二年之赔款总额，“金钱交付”至少须缴出七万万二千万金马克，“物品交付”至少须缴出十四万万五千万金马克，两项合计起来共有二十一万万七千万金马克，较之伦敦条约规定约减少三分之一。并附以下列条件：（子）关税改征金币，（丑）铁路、邮政、煤炭须增价，（寅）整理财政使收支相合，（卯）重税资本私运出口，（辰）限制发行纸币，（巳）改良国家银行。以上即为开恩斯会议对于该年德国赔款问题的新决定。那晓得正在会议之中，法国内阁总理白里安因受法国总统及国会之攻击，谓其对德态度过于软弱，不得已匆匆赶回巴黎，内阁旋即瓦解。而开恩斯会议亦因之停顿。法国后继内阁为普恩赉，普氏素以对德强硬著名。登台之后，果以种种压迫手段对付德国，而德国于无可奈何之中亦施以各种消极的抵抗，其结果竟使德国金融一落千丈，财政濒于破产。

第三章 金融之紊乱与整理

德国在大战之中，以一国而与全世界为敌，东撑西挡，血战四年，其需用军费之浩繁自不待言。其时政府所恃以支持财政之法有二，一为长期有利之“公债票”，一为短

期无利之“国库券”，其法先由政府制定支出预算案，然后按照支出所需之数发行短期无利“国库券”。在这种短期国库券之外，又发行一种长期有利“公债票”，叫做“战时公债”。此种“战时公债”之收入，即作为到期“国库券”之偿金。换一句说，即是以短期“国库券”为临时救急的方法，而又以长期“公债票”为短期“国库券”的后盾。以当时人民之爱国狂热，不但有偿之“公债票”及“国库券”易于销售，即人民所有之金银首饰亦皆无偿的自由捐赠政府，由政府给与铁质首饰，上镌“为我祖国”等字以奖之，可见当时德国人民对于国家的忠诚，战时财政亦因此而渡过难关。自大战后，共和政府成立，此种长期“公债票”不能如战时之畅销，而国家之支出则有增无减（如履行赔偿及抚恤伤亡之类），于是不能不专以短期“国库券”为唯一救急之具。然既名为“短期”，则势非于短近期间内偿还不可。以当时那样穷迫的政府，何处得此巨款为之偿还。不得已再发“新国库券”以新付到期的“旧国库券”，此种“国库券”日增月累，计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其数已达一千零五十四万万马克。而此种“国库券”既是“有偿证券”，当然可以抵押借款。于是人民纷纷向“国家银行”抵押款项，“国家银行”亦当然无法拒绝。计至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此种“国库券”在“国家银行”手中者，已达七百九十六万万马克之多。“国家银行”又安能得此巨款以为应付，于是不得不大发纸币。兹将德国战前、战中、战后（截至承认伦敦条约时止）所发纸币数目，列表如下。

（战前）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共发行二十四万万马克。

（战中）一九一九年正月一日以前，共发行三百二十九万万马克。

（战后）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共发行八百四十万万马克。

照上表看来，在大战之中计加发纸币约有三百万万马克左右，大战之后（迄至伦敦条约时止）又加发五百万万马克左右，到了伦敦条约签字以后，陆续支付大宗赔款，因而发行纸币之多乃至不可思议。迄至一九二三年七月止，共发行十三万零九百一十七万万马克。若以数目符号记之，则为一三〇九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而此时银行所存之准备金则只有七万万六千万金马克（按战前共有准备金十三万万一千万金马克），因而纸币价值遂一落而不可收拾。

自从一九二三年的七月以后，德国政府更日夜赶印纸币。有“一千万马克”一张者，有“一万万马克”一张者。但往往该项纸币尚未发行，而马克已于一二日内跌落数倍。于是德国政府乃在该项业已印就之纸币上临时盖上一个“五千万马克”或“五万万马克”之圆章。等到数日之后，此项纸币又复一钱不值。往往仅购一个信封，而所需之纸币却有一大捆。于是政府又复另印“一百万万马克”或“一千万万马克”一张之纸币。到了一九二三年冬季，纸马克之价值，计跌到每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纸马

克，约合一个金马克。

在此山穷水尽之时，忽有一位德国右党财政大家海尔非里徐（Helfferich），陡然异想天开，拟请政府发行一种“麦币”，换一句说，便是发行一种纸币，而以德国每年麦子收入为担保。凡持有该币者，可向银行换取每年行息若干之债券。其后德国政府果采用斯议，向银行换取每年行息若干之债券。其后德国政府发行一种“有利马克”（Rentenmark），以德国农业为担保。凡持有该币者，可以直向银行换取每年行息之债券。盖此时德国现金缺乏无从兑换，竟于万分无法之中想出一个法子，海氏之功可谓不小。原来德国财政界中共有三雄，一为右派中之海尔非里徐，二为左派中之爱尔池摆改（Erzberger，按爱氏虽挂名中派之中央党，然其人之思想极偏于左派，凡左派中之一切财政计划多出爱氏之手），三为中派之那提老（Rathenau）。海氏在战时大出风头，所有德国战时财政动员令之计划（按即将国民财产集中以与协约国一战之意）、粮食管理之办法等等，多出自海氏一人包办。爱氏那氏则在战后极出风头，如战后财政改革多为爱氏主张，战后经济重兴多是那氏划策。可惜此三人皆不得善终，爱氏于一九二一年被刺，那氏于一九二二年被刺，行刺者皆为右党之人。海氏则于去年因火车出轨丧命。

德国政府于发行“有利马克”设立“有利马克银行”以后，即规定每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个纸马克，折合一个“有利马克”，每一个美国金元，折合四（马）二〇（分）之“有利马克”，于是一场纸币悲剧遂从此告终。但赔款问题若不根本解决，则此种“有利马克”事实上亦不能维持下去，终久仍要暴露原形。恰好此时有一个美国人名叫道斯（Dawes）的，看见德国赔款问题若不解决，则世界经济现象终不安定，乃提出种种建议，后来此种建议为协约国及德国所采取，德国赔款问题及金融问题乃得根本解决，是即现在世人所称之“道斯计划”。

第四章　道斯计划

在“道斯计划”之中，最重要者约有两事。一为“整理德国赔款问题”，二为“固定德国金融问题”。现在请先述“整理德国赔款问题”。

照着“道斯计划”，德国赔款的来源应由下列三种分担：

（甲）全国工业家。

（乙）全国铁路。

（丙）全国关税、酒税、烟税、啤酒税、糖税五项收入。如认为必要时，尚可再行增选他项“间接税”之收入作为赔款抵押。

其实行方法，亦可分为三种，叙述如下：

（甲）全国工业家的负担

德国工业家总共负担赔款五十万万金马克（约合华币二十五万万元）。其中分配方法，是以煤铁工业担负百分之二十，机器电气工业担负百分之一十七，化学工业担负百分之八，纺织工业担负百分之七，其余各种工业共担百分之四十八。

此项赔款的征收机关，名叫“德意志工业债券银行”。该行共设董事十五人，其中计有七个德国人（三个代表政府，四个代表工业家），七个外国人，均须经过德国政府任命手续。董事长一名应为德人，由董事会选举。

此项赔款的征收手续，系先由德国工业家交给该银行“工业债券”五十万万金马克，并规定每年行息百分之五，偿本百分之一。总计每年约付三万万金马克之谱（约合华币一万万五千万元）。

此项“工业债券”应存于协约国“特派委员”之手（按现在该委员为一意大利人），得以随时发卖，但德国工业家有自行购回之权。此外该委员并须随时稽查此项“工业债券”之基本担保品，是否常常存在或确实相符，如查出该项基本担保品名不符实或工业家懈怠履行义务之时，该委员得直接要求该银行采用必要手段以处理之。

（乙）全国铁路的负担

德国铁路总共担负赔款一百一十万万金马克（约合华币五十五万万元）。其办法系将全国铁路隶属在一个“国家铁路公司”之下。该公司之董事共设十八人，其中计有十四个德国人四个外国人，公司总理应为德人，由董事会任命之，德国总统证明之。公司资本共为一百五十万万金马克，其中计有一百三十万万金马克作为“基本股票”，存于德国中央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之手，其余二十万万金马克作为“优先股票”，以其四分之一属诸德国中央政府，四分之三属诸“国家铁路公司”。

至于赔款的交付手续，系先由公司交给协约国“特派委员”（按现在该委员为一比

利时人）一种“赔修债券”，其数为一百一十万万金马克，并规定每年行息百分之五，偿本百分之一。统计每年约付六万万六千万金马克之谱。又此项债券得由协约国在市场之上发卖。

此外该公司每年必须在“运输税”收入项下拨付二万万九千万金马克，连上述债券息金一齐算来，该公司每年总共支付九万万五千万金马克（约合华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元）。

除上述之协约国“特派委员”外，还有一位“铁路委员”由前述之外国董事选举之，但其人必须具有铁路专门智识方可（按现在该委员为一法国人），该“铁路委员”若对于公司总理的铁路行政以及运输价目认为有害“赔修债券”之前途利益时，得要求更改，如要求不遂，得请求董事会撤换该总理。又如公司懈怠履行支付义务时，该“铁路委员”得要求该公司停止各种“不急之支出”，或直接请求董事会撤换公司总理。如要求不遂，该“铁路委员”得商同该“特派委员”，将铁路管理之权取到手中自行经营，并得将公司所存各种“不急需之材料”自由拍卖。

（丙）全国关税、酒税、烟税、啤酒税、糖税五项收入的负担

在德国关税、酒税、烟税、啤酒税、糖税五项收入之下，每年应拨出一十二万万五千万金马克（约合华币六万万二千五百万元）作为赔款之用。

其实行办法，系由协约国委任“高级委员”一人（按现在该委员为一英国人）总管五项收入，其下分置“下级委员”五人，各管一项收入。凡关于上述五项之收入，均须于下月由各官厅（如海关、酒专卖局等等）直接拨交“高级委员”，德国政府不得染指。倘除去上述赔款数目外尚有余剩，则由该“高级委员”拨还德国政府。但是从第三年起（按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为第三年度），“高级委员”必须额外陆续保留若干以作“基金”，其数目限度为一万万金马克。

倘前述之工业债券与铁路债券其收入的数目不如预期之时，那么“高级委员”得由此项“基金”之中为相当的拨付。此后五项税收所得，除拨给赔款外，必须等待“基金”缺额依然补满之后，方能再将剩余拨还德国政府。

倘五项税收所入不足赔款之数，“高级委员”得要求德国政府再行增选他项“间接税”之收入作为赔款担保，或竟将五项税收之机关取入手中自行管理，但此事必须经过海牙仲裁准许方可。

此外“高级委员”得有随时前往德国财政机关考察之权，凡关于上述五项税收之减税问题，必须商得“高级委员”之同意而后可。

以上所述（甲）（乙）（丙）三种，即系德国对于赔款之负担。合计起来，每年约有二十五万万金马克之多（约合华币一十二万万五千万元），殊非现在德国一时所能履行。因此之故，在“道斯计划”中特别划出一个“休养期间”出来，以便德国经济稍稍舒展。其办法系将德国赔款数目在最初四年中（按即自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略为减少，从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起始照规定数目实行。兹将德国前五年中之赔款数目列表如下。

（子）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

（1）铁路“赔修债券”息金二万万金马克。

（2）由德国政府特向外国借款八万万金马克，专作赔款之用。

总共支付赔款十万万金马克。

（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

（1）“工业债券”息金一万万二千五百万金马克。

（2）铁路“赔修债券”息金五万万九千五百万金马克。

（3）铁路“运输税”二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4）德国中央政府卖出所藏之铁路“优先股票”一部分，其数为二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总共支付赔款十二万万二千万金马克。

（寅）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

（1）“工业债券”息金二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2）铁路“赔修债券”息金五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3）铁路“运输税”二万万九千万金马克。

（4）由五项税收中支出一万万一千万金马克。

总共支付赔款十二万万金马克。

（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

（1）“工业债券”行息偿本三万万金马克。

（2）铁路“赔修债券”行息偿本六万万六千万金马克。

（3）铁路“运输税”二万万九千万金马克。

（4）由五项税收中支出五万万金马克。

总共支付赔款十七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辰）从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起，全部实行。其每年赔款数目如下：

（1）“工业债券”行息偿本三万万金马克。



（2）铁路“赔修债券”行息偿本六万万六千万金马克。

（3）铁路“运输税”二万万九千万金马克。

（4）由五项税收中支出十二万万金马克。

总共支付赔款二十五万万五千万金马克。

上面所列赔款数目，如遇将来德国财政经济现象佳良或衰落之时，尚可略将每年赔款数目加增，或将短缴之款设法展期弥补。

又此项赔款之接收保存，另设有一种机关，名叫“赔款经理”。现在此项经理系一美国人担任。

以上所述各种，皆为“道斯计划”中关于“整理德国赔款问题”之建议。现在我们再来研究该计划中对于“固定德国金融问题”之办法。

德国政府应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将原有之“德国国家银行”改组，从此独立营业，与德国政府脱离关系。

该行资本应为三万万以至于四万万金马克。除容许旧日国家银行之资本一万万金马克外，其余资本则另发“国家银行股票”若干以筹集之，又该行获有发行纸币之权五十年。

该行董事共设十四人，其中计有七个德国人七个外国人（计英国、法国、意国、比国、荷兰、美国、瑞士各一人），德国董事由该行德国股东选举之，外国董事在开办之初应由“银行组织委员会”任命，以后则由外国董事自行选举之。行长一人，应为德人，由董事会选举，须得九票之多数者始能当选，而且在此九票之中，须有六票为德国董事所投。选出之后，德国总统如认为不满意时，有提出抗议之权两次。

该行设有“纸币管核委员”一人，由董事会选举，得九票之多数者始能当选，而且在此九票之中，须有六票为外国董事所投（按现在该委员为一荷兰人）。

该行如贷款政府，其数目不得超过一万万金马克，其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如贷款与邮政或铁路，其数目不得超过二万万金马克。

该行准备金应常有已发纸币数目的百分之四十，凡持有纸币者皆可以到行兑换。

德国政府得有铸发金币银币铜币之权。但银币铜币之数应依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头上平均不得超过二十马克。

该行既设之后，即着手清理“有利马克银行”，并于十年之内逐渐收回“有利马克纸币”，同时更将“有利马克银行”之资本减至二十万万“有利马克”，以农业为担保，每年行息百分之五。凡此种种清理“有利马克”所需之款项，应由德国政府及“有利马克银行”每年缴与该行（指新组之“国家银行”而言），其数约在一万万金马克以外。

以上所述各种，即为“道斯计划”中关于“固定德国金融问题”之办法。总而言之，德国滥发纸币之悲剧，系在一九二三年冬间设立“有利马克银行”之时始行告终。

其间经过一年（自一九二三年冬间至一九二四年冬间）又以新设之“国家银行”为清理“有利马克银行”之后盾。倘使当时“道期计划”未能成立，究竟“有利马克”是否能够无灾无难，永远维持下去，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第五章　实行道斯计划以后之德国财政

德国自实行“道斯计划”以后，对外赔款在最初四年之中（自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特别减少，可以藉此稍稍休养。对内则因金融之故，人民生活日益安定，国内经济日益发展。所以在一九二四年之国家财政，居然收入超过支出约有五万万金马克左右。其在一九二五年之中，则入不敷出约有一万万零九百万金马克左右。兹将是年（一九二五年）收入及支出之详细数目，录之如下。

收入类别	收入数目（以金马克为单位）
财产税与营业税	四九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关税与消费税	一八五九〇〇〇〇〇〇
各种机关之收入	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
铸发货币之赢赚	二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由一九二四年会计年度拨交之余款	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由铁路“优先股票”所易来之款项	二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总计收入）	七六八四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类别	支出数目
拨交各联邦	二四九六〇〇〇〇〇〇
内国战事偿补	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赔款	二九一〇〇〇〇〇〇
铸造货币之费用	八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各种支出	四五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总计支出）	七七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入不敷出之数	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

（按一九二四年会计年度之余款，约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系以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马克拨诸一九二五年，以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马克拨诸一九二六年，其余之款则留作他用。）

至于一九二六年之财政预算，与上述一九二五年之收支情形微有出入。兹将一九二六年预算案中经常收支之详细数目，录之如下。

收入类别	收入数目
财产税与营业税	四八七四〇〇〇〇〇〇
关税与消费税	二〇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各种机关之收入	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铸发货币之赢赚	六七〇〇〇〇〇〇
由一九二四年会计年度拨交之余款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总计收入）	七四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支出类别	支出数目
拨交各联邦	二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内国战事偿补	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赔款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赔款补缴	一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铸造货币之费用	六七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各种支出	三九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总计支出）	七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照上表看来，收支相抵尚余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但收入项下，尚有非常收入六八〇〇〇〇〇金马克。支出项下，尚有非常支出三〇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马克未曾列入上表之内。假如把他列入，则收入与支出两项彼此大约相抵。

但是实际上，今年收入项下因为德国经济发展之故，异常膨胀增加，据说已超过一百万万金克以外。不过同时因失业工人数增多，须用大批款项接济之故，恐亦添加支出不少。

一九二六年之财政预算比之战前一九一三年，约多十五万万二千万金马克。诚然，德国战后因军备限制之故，比较战前每年减少海陆军费支出约在十三万万二千五百万金马克左右，但是同时却亦增加许多特别支出，即如抚恤伤兵及遗孤一项，每年便需十五万万金马克左右。此外如赔款支出等等每年皆需大宗款项，实为战前所无者。故现在财政预算较之战前增加，实为意中之事。

第六章　实行道斯计划以后之德国工业

德国战后工业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为“纵式托辣斯”发达时期，约自战后滥发纸币之时起直至德国金融固定之时止。二为“横式托辣斯”昌盛时期，系从金融固定之时起，逐渐发展，现正方兴未艾。兹请分述如左。

（甲）纵式托辣斯。什么叫做“纵式托辣斯”？即是联合许多内容相异之工业于一个组织管理之下，但各工业之自身仍保存其独立性质。德国此种“纵式托辣斯”之组织，在大战之后曾盛极一时，其中如德国工业大王时体乃斯（Stinnes）所组织之托辣斯，竟俨然具有左右德国财界之势。我们细察此种“纵式托辣斯”所以发达之原因，系由于当时德国政府滥发纸币致马克价值日益跌落，其结果工商各界手中藏有“流动资本”者（指手中藏有马克者而言）无不朝不保夕，于是大家都想速将手中所藏“流动资本”尽量换为“实物资本”，换一句说，即是拼命采办原料添置机器，但将手中马克送出，即为天大福分。那晓得这样一来，又往往陷于缺乏“流动资本”之苦，大有关门歇业危险。因此之故，各个工业乃自相联络起来，组成一个托辣斯，凡自原料起以至于熟货止，无不包含其中。从此以后，在一方面各工业间之银钱往来皆可以直用“期票”，不必限于现金，在他方面各工业间之货物交易又可以借此免却“交易税”，所以当时此种“纵式托辣斯”之组织遂成为一时风尚，不可遏止。

（乙）横式托辣斯。什么叫做“横式托辣斯”？即是联合许多内容相同之工业于一个组织管理之下，实行严格分工。譬如“车业托辣斯”之中，某厂善制货车，则以后专制货车，不复兼制客车；某厂善制客车，则以后专制客车，不复兼制货车。这样一来，第一，管理集中，可以减少各个工业自身之管理费用。第二，可以用其所长，以便将来出品特别价廉物美。第三，规模宏大，指挥统一，易与外国商业竞争。凡此种种，皆为“横式托辣斯”所具之特长。至于此种“横式托辣斯”所以发达之原因，系由于当时德国金融固定以后，市上流通资本一时极感缺乏，各工业为维持生存起见，不得已乃向银行借款。但银行方面亦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者，于是各项工业皆不能不缩小范围，限制营业。其结果，往往许多工厂之中虽备有极新之机器，而事实上却不能尽量利用。加以接受“道斯计划”之后，更非努力生产，发展国外商业，难望实行各种条件。因此之故，现在德国工业家又纷纷宣布脱离“纵式托辣斯”之关系而另组织“横式托辣斯”。

例如从前 Lauchhammer 钢厂曾与 Linke－Hofmann 车厂共同组织“纵式托辣斯”以收彼此互助之益，自德国金融固定以后，彼此营业皆感十分困难，于是宣告分离。现在 Lauchhammer 钢厂则一变而为“中德意志钢业托辣斯”之中心，Linke－Hofmann 车厂则一变而为“车业托辣斯”之主角。此外如颜料工业、钟表工业、汽车工业、火车头工业等等，皆有类似此种之组织。

德国工业家因为善于适应时势之故，所以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兹再略举数例如下，可以由此看出德人苦心孤诣，努力奋斗之一斑。

（1）战后德国割让土地，丧失煤矿虽属不少，但现在德国工业往往改用“水力”替代，依然不感缺乏，如南德意志等处是也。

（2）战后德国殖民地全体丧失，原料缺乏，于是德国科学家努力发明了许多“原料替代品”。

（3）因为战后殖民地丧失之故，以致海外销场颇受影响，同时欧美各国又用关税政策暗中排斥德货。于是德国掉过头来，特别注意亚洲各处之商业，虽久处英人治下之印度，亦被德国商业侵入不少。

（4）因协约国限制德国军备之故，所有全国军用工厂数十处，皆于最短期内改成普通工厂，专制有利生产，以恢复德国经济。

总之，有能力的人，无论别人如何压迫，他都能挺起腰杆，向上挣去。反之，没有能力的人，虽不必加以十分重大负担，他的两只腿杆，亦是软弱无力，站立不住。

朋友们！世界上惟具有能力者得以生存，没有充实能力，则一切主张皆是无用的空话。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光祈草于柏林

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①]

海尔法里耶 著 王光祈 译

译者序言

此书系译自德国战时财政大臣及内务大臣海尔法里耶（Helfferich）所著《世界大战》（Der Weltkrieg）第二册中之第三部分。海氏原为著名财政学者及银行专家，自欧战启后，旋任为德皇威廉第二之财政大臣以及内务大臣，主持“全国经济动员”之事。彼之“军费政策”乃以“军费”为“特别支出”，不用“抽税”之法，只是“举行公债”以为填补。虽屡为其他德国经济学者所攻击，但彼在大战之中撑持德国财政危局，并与世界列强作“经济战争”，其功要不可没。其后德皇主张“无限制潜艇战争”，彼曾极力劝阻，惜未蒙采纳。一九一八年七月，彼出任驻俄大使，并预备“全国解除经济动员”之事。战后彼为德国右党领袖，并发明“有利马克”计划，以救济当时德国金融之恐慌，并树立今日德国币制之基础。一九二四年四月，海氏因火车出轨遇险丧命，享年五

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远在德国求学并处病中的王光祈痛感强敌压境，困难当头，拟编译一套《国防丛书》，以备国人抵御侵略之参考。“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王光祈《空防要览序言》）从1932年4月到1935年8月，王光祈先后译成《空防要览》、《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国防与潜艇》、《德英法战时税政》和《未来将才之陶养》五种，由上海中华书局编为“国防丛书”五种，于1933年2月至1936年先后出版发行，《未来将才之陶养》本《文集》未收录。《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为“国防丛书”之第一种，1933年2月出版。

十有二。无论友党敌党，莫不著文称其理财天才，实为欧洲大战中怪杰之一。

所谓“经济战争”者，就是欧战之中协约各国，尤其是英国，利用各种“经济封锁”之策以困德，同时德国方面又用各种抵制之法以为抗御。我们知道，战前德国陆海两军之预备均极充实。血战四年，除大战初开之际俄国八十万军队曾乘机一度侵入东普鲁士，旋为兴登堡元帅悉数歼灭外，敌国陆军实未尝侵入德境一步。至于海军实力，则自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斯喀该那（Skagerrak，在那威丹麦两国之间）海上一战之后，英国海军从此不敢正视德国海岸。故单就军事而言，德国对于“国防”二字可谓准备充足，毫无遗憾。然而终不免于一败者，则“经济战争”使之然也。盖当时德国海军实力，保护本国沿海口岸则有余，直捣英国海军根据之地则不足。其结果，德国海军遂被包围于东海北海之内。但当时与德接壤之中立各国，如丹麦、荷兰、瑞典、那威、瑞士、罗马尼亚（指罗马尼亚尚未加入协约国方面之前）等等，尚能源源接济德国各种粮食用品以及海外原料。英国知其然也，乃宣布北海亦为战争区域，所有德国邻近中立各邦，从此亦被划入封锁范围之内。凡中立各国船只由海外运回原料之时，必须先向英国海军当局呈报，否则即受没收处分。英国并在各中立国内勾结该地商家，共同组织“海运公司”独办该国海运之事。凡该国船只运入原料之时，皆须经过该公司之手，该公司并须亲向英国当局担保：此项原料确系专供该中立国自己之用，决不丝毫转输德国云云。同时，英国更将所有人生日常用品一一列入“禁运物品名单”之内。当时欧洲中立各国，既未具有相当武力，对于英国此种违背国际公法之行动只能忍气吞声、听其安排而已。其间只有美国一国（指美国尚未参战以前而言）具有与英力争之资格。但其后英国又利用美国需要英属各殖民地原料之机会，特与美国方面订立条约：此后不得再将羊毛橡皮等物转入德国，于是美国亦复入其圈套。

至于德国方面，海外来源既已断绝，国内粮食尤为恐慌。于是一方面，则由国内学者尽力发明，以为补救之计。譬如当时“淡素”一物极为缺乏，曾使德国火药及肥料之制造，一时陷于危境。迨其后德国学者发明由空气中取出大批“淡素”之法，其危始解。又如当时纺织丝线缺乏，则又发明木料制丝之法以为补救。总之，欧战短期之中，德人发明之多，实使世界各国为之惊骇不已。其在他方面，则德国又利用中立各国需要德国煤炭、药材以及化学用品之弱点，暗与中立各国订立交换货物之条约。其结果，战时欧洲中立各国粮食输入德国之数，竟较战前为增加。反之，是时欧洲中立各国粮食输入英国之数，却较战前为减少。故专就“经济战争”一项而言，德国亦有相当成功。惟大战之时，德国壮丁悉数开赴前线作战，同时又因赶造大批枪弹之故，以致国内其他生产事业不免为之停顿，虽其间曾经试用各种“战争经济”之法以为补救之计，但其后终以力竭而蹶，不能免于一败。

所谓"战争经济"者，即一国与他国相战之时，一方面国内最能工作之壮丁必须开赴前线作战，他方面因敌国之封锁，以致国内原料粮食来源无不大受打击。其结果，国内经济生活顿成一种特殊状态，必须采用各种特殊经济方法以处置之方可。学者因称之为"战争经济"。譬如德国在欧战期间所采用之"经济效率原则"（即停办一切小工厂，专用大工厂生产，以免多用人工煤炭）、"救国服役条例"（限制工人进退自由以及女工代替男工）、"限制国民粮食消费"、"重要原料收归国有"等等，皆属于"战争经济"范围之内者也。

德国从前官制，所有全国经济事宜系由内务大臣掌管。此书作者海氏曾以内务大臣之资格主持一切"经济动员"。其所用之方法，多为前史所未有，皆系从辛苦中一点一点的经历出来的。故是书取材，并非如普通"教科书"性质，呆录各种组织条文，乃系事后追述当时创作之艰难与得失，以为后人参考而已。吾国经济组织颇与德国相异，因此书中所述各种，不必尽能应用于吾国。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吾人固可从此得益不少，以作他日国防事业之准备也。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七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中

目　次

上编　经济战争

第一篇　内务部（略）

第二篇　德国之围困

第四章　德国海军之实力

协约国方面，除了对待中立各国采用残忍手段，蔑视国际公法，毫无一点顾忌外，更在英国领导之下完成其经济封锁德国之谋。

德国商船旗帜，自开战数日之后即已不复现形于世界海洋之上。当时我们舰队之力，虽足以威吓英国海军不敢驶近德国海岸或驶入德国东海，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斯喀该那（Skagerrak，在那威[①]丹麦之间）之战，尤使英国深觉与吾国海军相战甚为危险，或者由此竟使英国生存命脉发生问题。其结果遵照国际公法规定，封锁德国各处海港一事遂无从实行。但在他方面，德国海军之实力却终嫌不足，不克直接开往英国海军根据之地与彼一决雌雄。于是我们海军只得停泊北海东海之内，永被敌人封锁。反之英国方面，自将德国是时停泊海外之若干巡洋舰加以铲除之后（当时该巡洋舰等曾奋力抵抗，如智利海岸可鲁纳〔Coronel〕地方之英德海战等等，但我们舰队终以众寡不敌而败），完全据有海上自由。其间虽有德国巡洋助舰如白鸥号（Möwe）、狼犬号（Wolf）之可惊奋斗，但对于根本事实亦复无所裨益。从此德国商船必须停在德国或各中立国海港之内，不能航行一步。而协约国商船则直至潜艇战争之时可以横行海上，未受何等重大骚扰。

---

① 那威：即挪威，下同。

第五章　禁运物品名单之扩充

协约各国既无能力封锁我们海岸，于是我们对外贸易，可以利用各中立国商船仍然照旧进行，但求勿与国际公法规定抵触而已。

英国方面自开战之始，即极力设法夺去我们此种贸易机会。该国海军既无封锁我们海港能力，乃想出一种“航路商业检查”之法以代之。此项方法虽与国际公法十分抵触，但就断绝我们海外交通而论，却极十分有效，远较实行严厉封锁我们海岸为有力。

关于《万国海航公法》一事，英国政府曾于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会议之后邀请各国开会讨论，并将旧日通行之各种国际海航条例及习惯加以整理，订为一种“成文法”，即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所发出之《伦敦宣言》是也。当时与会各国代表（英法两国代表当然亦在内）曾于该项宣言之“导语”内特别声明，谓该项宣言所定大体上实与国际间久已承认之航海原则相合云云。但其后英国政府对于此项宣言却延至欧战开始之时尚未加以批准。因此开战后之数日，美国方面乃向参战各国政府叩询，是否愿将上项《伦敦宣言》作为海战公法？并言如能作为海战公法，则将来参战国与中立国间当不致发生何等重要误会云云。当时德国政府及其联盟国奥匈政府立即回答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该项宣言为海战公法。反之英国政府方面则谓该项宣言必须加以若干变更及增补始能承认云云。英国此种“变更与增补”，旋见之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所制条例之内。其中大部分即已全与《伦敦宣言》所定之“国际通行海战原则”相背。而英国政府更于“禁运物品名单”中任意加入许多“非禁运物品”在内。按此项“非禁运物品”，固早经《伦敦宣言》承认其未具军用性质或只能间接用之于军事目的，依照通行海战条例不应视作“禁运物品”者也。此外，英国政府并将《伦敦宣言》中所谓“相对的禁运物品”（换言之，即此项物品，如果确系专备敌国官厅或军队之用者，则作为“禁运物品”而论），亦复设法加以取消。其结果，中立国为参战国代运“相对的禁运物品”，尤其是代运粮食及工业原料之事，从此亦复断绝。英国此举不但有违《伦敦宣言》，而且全与英国自己在《伦敦宣言》以前所宣布之《海战条例》相背。当时美国政府于其抗议无效之许多通牒中，曾有一次特将英国爵士沙里斯堡（Lord Salisbury）于南非战争之时所发出关于《海战条例》之宣言抄给伦敦政府请教。按该爵士之宣言，有云：“粮食一物虽系备敌之用，亦不得作为‘禁运物品’而论。惟该项物品如果确系作为敌人军队之用，则始以‘禁运物品’论。此外，仅有备作敌人军队应用之嫌，亦不得遽指为‘禁运物品’。必须具有真凭实据，证明该项物品当其没收之际确系备作敌军之用，始能认为‘禁运物品’。”

上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英国所制之《海战条例》，后来日益加厉。其目的不但欲使德国军用材料，甚至于德国居民生活必需之品从此亦不能再由中立各国船只供给。到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英国方面更发布一种条例，对于“相对的禁运物品”及“绝对的禁运物品”之分别根本加以取消。到了一九一六年七月七日，英法两国政府简直毫不客气，径将其间业已变成千孔百洞之《伦敦宣言》完全加以否认。

第六章　英国宣言北海为战争区域

但是仅仅扩充“禁运物品”名单，仅仅严厉检查“禁运物品”，犹不能完全达到英国政府的目的。盖在海洋之上，扣留检查船只一事甚为麻烦并颇危险，而且效力仍嫌太小。

因此，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间，英国政府方面即已决定通知各中立国政府，宣布北海全部为战争区域，并谓苏格兰与那威间之北海人口要道，已有施放炸药之必要云云。同时又向来往荷兰、丹麦、那威以及东海沿岸各国之船只紧急劝告：以后宜沿英法海峡及多费（Dover）航线驶行，然后再由该处英国当局示以安全航路，以便彼等往其目的之地。

英国此项通知之成效，不但德国海岸为其封锁，即北海、东海沿岸各中立国之海岸亦复为其封锁。此种违背国际公法之举，更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由英法政府再发一种宣言将其加厉。按该项宣言曾云：英法政府从今日起，对于一切船只，具有为敌采运物品，或代运敌人财产，或装运敌国货物之嫌者，皆须将其扣留，押入协约国港内云云。

当时各中立国对此曾提抗议，尤其是北美合众国。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美国曾致协约国方面一种通牒，指摘协约国政府“未具封锁必要条件，却用封锁各种权利，对于一切嫌疑船只不在海洋检查，而将其押入自己海港，以及断绝各国对德通商，尤其是断绝德国对于各中立国的输出之种种不当行为”，可谓义正词严。但美国向英抗议一事，直至一九一五年年底止，其间曾交换无数通牒反复辩论，而结果终成纸上空文。其后英国方面对于检查船只之举愈益加厉，大凡船只之开往德国邻近诸中立国海港者，或由德国邻近诸中立国海港开出者，必须自行前往协约国海港报到，请求检查，否则将受没收之处分。

所有英国方面采用各种威吓手段，以使各中立国船只不敢再行开往德国海港，或代德运输何种物品之事，余在此殆难一一枚举。兹仅举英国利用卖给船煤一事威迫中立船只情形如下：自一九一五年十月以后，各中立国船只如向英国买煤自用，必须先行申明该船此后全受英国海军当局之监督检查方可。其中有若干中立船只不堪此种压迫，乃相率不买英国之煤而购德国之煤，于是英国政府乃向彼等宣言曰：德国煤炭属于敌货之

列，照例应该没收云云。

英国政府既毫无顾忌的利用其海上霸权以压迫中立各国，而该中立国等复只能空提抗议听其肆虐，其中尤以与德邻近之中立各国最受损失。但该国等既无政治的军事的势力，又无经济的威权足以抵抗英国及其盟邦，而且该中立国等之民食来源、工业组织，大部分均与海外运输事宜具有密切关系，不能独立自主。因此之故，协约方面有时竟在该中立国等疆域之中采用抗德行动，该中立国等亦复安然隐忍，甚至于起而相助。在各中立国内只有美国一国，为公法人道起见（按国际公法为顾全人道计，曾规定一切敌视行动，仅仅限于参战国家）曾经发过几次有力言论。当时仿佛美国方面大有断然起而拥护海上自由之势，但是到了最后仍是成为纸上抗议。

第七章　监督中立国商业

其间英国方面又复将其“禁止与敌通商”之条例，强迫中立各国实行。盖战争初开之时，英国随即从其旧俗，通告本国人民勿与敌人通商。未几，其他协约各国亦复援例为之。现在英国更欲中立各国亦皆俯首遵从。

英国此种强迫行动，甚至于在美国方面亦复收得若干效果。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之际，英国对于阻止美国羊毛入德一事即已运动成功。是时，英国政府曾通谕所属各殖民地，此后批发羊毛与美之举，只能由美国纺织公司一家包办。同时该项美国纺织公司又向英国立约担保，此后该公司出卖羊毛之时，必须先与顾客严定条件，免有输入德国之虞。同样，英国并将美国橡皮物品输出置于自己监督之下。盖美国所需橡皮原料，约有百分之七十来自英国殖民地，百分之三十取自巴西，而巴西此项橡皮工业又有一大部分为英国资本所办。于是英国利用此项势力特与美国橡皮公司订约，此后美国输出橡皮及橡皮制品到欧之时，只能取道英国，而且必须先行取得英国允许方可。不但此也，甚至于美国本地产品有时亦复置诸英国监督之下。当英国于一九一五年八月既将棉花一物视作“禁运物品”之后，关于美国运输棉花入欧一事，只能由里费坡棉花交易所（Liverpooler Baumwollbörse）所员包办。而包办之人并须自具甘结，决不直接或间接将此项棉花输入德国。此外，英国对于美国金属工业尤其是铜业亦复获得监督机会。除上述各种英美商业合同外，英国更与美国重要轮船公司订立若干合同以补不足，即该项轮船运货之时，须向装货之人要求提出担保：实无抵触英国各种海运条例情事云云。同时英国政府对于该项轮船之检查亦复特开例外，比较放松。

上述英国政府与美国商人订立各种合同之举，总算是由于彼此善意谅解，至多只能称为一点轻微压迫。反之，英国对于其他各中立小国则毫不客气，直令彼等无不深感英

国铁拳压迫之苦。

所有与德为邻之中立各国，每年运输物品之数量均由协约国方面加以限制，其总额由英、法、意、俄四国代表所组织之委员会在巴黎议定。各中立国船只既受此种重大限制，对于海外运输事宜当然不能不力求节缩，但求本国勉强足用而已，实无再将各货转输德国之余力。但英国政府意犹不足，直向各中立国政府要求禁止对德输入。其禁止输德之物，不仅是指海外采购之货，甚至于该中立国等本国土产亦包含在内。此外，英国政府更组织一种监督机关，严查与德为邻之中立各国每年运入之海外货物系如何分配处置，以免漏网入德。

此项监督机关之最初设立者，实为荷兰海运公司（Die Nederlandsche Overzee Trust Maatschappij），简称为 N. O. T.，成立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其创办人为荷兰各大轮船公司以及荷兰各大银行及商号。该项荷兰海运公司曾与英国政府订立条约：所有该公司代人装运之货，英国政府可以听其自由驶行，不加留难。但该公司须向英国具结担保，所运之货以及由该货所制成之物品，纯系供给荷兰本国之用云云。同时，英国政府并将事后重行审查之权特别声明保留。此外，该公司必须随时向其委托运输之商号——未几，所有荷兰各商号输入事宜全由该公司一手经办，不能再委其他公司运输——要求担保，该项货物纯系供给荷兰本国之用，该项商号如欲将货转让他人，必须先得该公司之同意方可。而且转让之时，受让者对于该公司必须特别声明，愿将出让者对公司所担负之义务一一照实履行云云。

该公司为实行上述各种条约义务起见，特与各种轮船公司、运输商号、储藏仓库等等订立合同，以便随时检查。更加以荷兰政府自己对于国界稽查之事特别加严，对于私运货物之事特别重罚，实使上述荷兰海运公司之检查制度愈益严密，漏网之事，愈属无望。

一九一五年秋季，瑞士方面既与英、法、意三国迭经交涉之后，亦复成立一种类似上述荷兰海运公司之监督机关，名为 Société Suisse de Survei llance Economique，简称为 S. S. S.。其在丹麦方面，则由 Die Grosserer Societät 及 Der Industrierat 两方担任监督之责。其在瑞典方面，则由 Transito 掌管检查之权。其在挪威方面，则由挪威政府及英国领事通力合作，以资监督。

至于最后完成商业封锁制度之手段，则当推“邮政检查”及“黑名单”两事。协约国方面，对于检查邮政之举至为严厉。甚至于中立国船只，从中立国海港到另一中立国海港，亦必经过严格检查。协约国方面既经此种邮政检查之后，对于各中立国相互间之商业关系更了如指掌，从此又可得着许多监督机会。此外更有“黑名单”一种，将中立国方面擅与德国通商或具有通商嫌疑之商人姓名一一列入“黑名单”之上，作为敌人看待，从此与之断绝商业关系。

所有上述种种方法，其目的无非欲使当时困战中之德国民族生机完全断绝而已。此种残酷暴虐手段及商人狡猾伎俩所组成之伟大封锁制度，世界各国历史之中可谓并无其例。从前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之范围、方法及成效，若与此次英国所用“商业饥饿封锁”之手段相较，则只算是一种“小孩游戏”而已。英国此种封锁政策，直使身居欧陆中心之一大国家，俨然有如“被敌久困之炮台”一样。

第八章　占领地之原料及粮食

我们前方军事屡次胜利之结果，诚使我们国内许多困难情形因而减去不少，但我们根本问题却未尝因此改善。

自我军迅速占领比利时及法国北部以后，就“经济战争”一点而论，实使我们地位大为稳固，尤其是我们原料来源因此大为扩充。占领地内之各种生产机会以及大批原料熟货半熟货之储藏，实使我们本国土产及存货得一大大补充。余现在但举数事为例如下：Longwy 及 Briey 两处之铁沙，比利时之矿产，Antwerpen 地方之制船材料，Verviers 及 Roubaix 、Tourcoing 两地之羊毛及毛织物，Gent 及 Lille 两地之棉花、棉线、棉织物。其后占领波兰之时，更得着该处纺织工业之原料及半熟货不少。

反之，无论西部东部占领区域之内，对于我们国内粮食困难问题却均无何等补助。比利时及法国北方，人烟异常稠密，必须输入大宗粮食始能维持居民生活。同样，波兰农产即在平时业已不敷本地人口如 Warschau、Lodz、Sornowice 各处工业区域等等之用。立陶宛及孤尔兰（Kurland）等地，则以其农业衰微人烟过少，大战期间尤为荒寂之故，亦无多大裨益。当时我们驻扎该地之军事机关，虽曾极力设法促进该地生产，略收成效，但对于我国粮食问题仍不能多所救济。关于比利时及法国、北方居民粮食维持问题，后由美利坚及西班牙两国所组织之委员会（Relief－Commission）代为筹办，以使我们脱卸仔肩。不过当时我们必须宣言担保，不但该委员会所输入之美国粮食不得夺为德国之用，即比利时本地农产亦应留作比国居民之需。因此之故，顿使我们当时最难解决之问题（占领地人口既如此繁密，其所需之粮食应由我们自己有限粮食之中拨出若干以养之乎？抑听任彼等数百万居民在我军后方活活饿死乎？）从此得一解决。但是对于我们自身所受“饥饿封锁”之残酷压迫，却未尝因有占领地之故而略为减轻。

第九章　与德同盟各国之粮食恐慌

至于与德联盟之各国，对于德国粮食困难问题，亦不能有所补助。

奥匈帝国，在大战将开之前数年，本国粮食需要日增，其所出之农产数量，仅能供给本国居民之用，已无何等剩余。但无论如何，多恼河[1]帝国（译者按，指奥匈帝国）本地出产能敷本国居民之用，终较德国情形为佳。孰知开战未久，吾人乃发现奥匈帝国因为粮食输入被敌封锁之故，不能一如德国之顽强抵抗。同时奥匈本国出产日益退步，而又不能严厉督促。对于本国居民消费方面，其检查与限制之法均远不如德之严。关于努力、组织、纪律等等，奥匈帝国又均不及德。其结果，我们自己粮食虽极感困难，而对于奥人亦必随时起而相助。

迨塞尔维亚征服之后，我们对于盟邦勃加利，亦复得着上述之同一经验。勃加利原系农业国家，平时出产常有剩余。但自开战以后，农产大受影响，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并自国民食亦不能维持。其后勃加利军队之瓦解，粮食问题实为重大原因。

同样，土耳其方面因其自国农业不振之故，在大战之前每年即已必须从俄输入粮食若干，现在当然更是无力助德。

反之，勃加利尤其是土耳其却能供给我们许多重要物品，如香油、肥脂、烟草、羊毛、棉花、丝绸、金属物料之类。不过供给之数量仍极有限，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该国等此类生产原属不多，而当时交通不便，亦复根本不能多量运输。战前该国等出口入口几乎全取海道，现在土耳其之出口货则只能由君士坦丁利用单轨铁路取道勃加利京城琐非（Sofia）运来，而况此项铁路复早为军事机关占用殆尽。此外，多恼河航路原为联络勃加利及罗马尼亚之要道，但该河航路不善，所运亦复无多。因之，此次大战之际，吾人对于该河航路必须时常加以疏理方可。

第十章　德国战时粮食情形

于是，我们国内民食问题，遂不能不专靠本国农产以及中立各国之输入。盖是时英国方面虽极力实行“饥饿封锁”，而我们犹可设法从中立各国输入一二故也。

我们本国农产因战事之故不免大受影响。第一，国内最能工作之人均已调赴战线。第二，马之数量因移作军用之故已大减。第三，因为制造炸药需用“淡素”甚多之故，以致制造肥料之原素大为减少。更因天气不好之故，肥料难关益形扩大。其结果，一九一七年之黑麦、小麦收成只有九百二十万吨，与一九一三年（按是年麦子收成极好）之黑麦、小麦收成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相较，其相差为何如。同时，大麦收成亦由三百六十万吨降为二百万吨。燕麦收成更由九百五十万吨降为三百六十万吨。在一九一六年之

① 多恼河：即多瑙河，下同。

时，马铃薯之收成尤为一落千丈。盖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五年之马铃薯收成均为五千四百万吨，而在一九一六年则降为二千五百万吨。至于一九一七年之马铃薯收成，共有三千四百四十万吨。一九一八年之马铃薯收成则为二千九百五十万吨。

关于牲畜方面，牛之头数，直至一九一七年犹与战前数量相差不远。但因其间饲料缺乏，尤其是肥壮饲料缺乏之故，各牛重量不免为之大减，尤其是牛奶之量不免为之大缩。至于猪之头数，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一日为二千五百七十万头，到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则减为一千二百八十万头。除头数总额减少之外，所有各头重量以及猪油产额亦复大为减缩。

就上举几种数目而论，已能充分表示德国当时被敌围困之艰苦危险情形，由此并可想见德国当时之如何渴望打破协约国方面之“商业饥饿封锁”，以及如何急盼从中立各国方面设法输入粮食与原料等物。

第三篇　德国对付中立各国之手段

第十一章　德国抵制之方法

德国所能用以抵制英国压迫中立各国之方法，可谓微少已极。战前世界商场之上，卖货者所处之地位远较买货者为难，出货者之互相竞争营业远较入货者为烈。但自战争开后，此种情形为之一变。国际商场之充满了争购竞买之现象，其在中立各国方面亦复如此。现在之问题，业已不似从前之“我能卖点货物与君否”，而是“君能售我若干货物否”。

所谓“国际商业”，其实只是一种“海洋商业”，我们敌国既握有海上霸权，不但能将本国所制之货物或彼等海外殖民地所制之货物随意卖给中立各国，或随意将货扣留不卖，而且能将所有海外一切出产全部禁止输入欧洲中立各国之内，以实行其严厉封锁之政策。因此，当时该敌国等遂决意不顾一切公法，断然利用此种特别机会。

反之我们方面，则只有靠着自己生产力量以为应付。而此种生产力量又因战事之故，或大受损失，或消费太多，为数极属有限。其中重要生产如煤炭、钢铁、柏油、药料、加里以及其他类似之物，虽然可以输往中立各国，但此项生产，我们既不能尽量输出，同时煤铁两种复深受英、美两国营业竞争之影响。此外，我们最受压迫者，仍推协约国方面禁输民食畜粮入德之“饥荒封锁”一事。因此之故，我们当时只能尽力利用各国有限出产，以与中立各国周旋，谋获相当利益。

第十二章　输出输入之监督与集中

若欲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尽将我国输出之货全部握诸国家手中。其实我们因谋本国军事上、经济上各种需要之安全起见，对于某类输出物品早已禁其输出。迨其后我们决定利用自己输出以为对付中立各邦之计，于是所有全国输出事宜，绝对不能再任私家工商各业随意主持其间。

同样，关于输入之事亦有特别加以整理之必要。

第一，我们采购中立各国货物之事本已十分困难，若再加上德国私家商人在中立国市场之上互相竞争购买，则各货价值势将特别增高，而中立各国商号之售卖条件亦将特别因而酷刻。

第二，我们采办外货之购买力至为有限，必须随时通盘筹划，而且我们所能获得之少数外国期票，其势当然只能限于采购极为需要之货物。

第三，在事实上，我们采购重要外货之时，其数量常受一定限制，而且我们必须在输出方面特别让步，始能接洽成功。其结果，我们对于输入一事，尤不能不加以通盘计划。

因为上述种种理由之故，于是我们输出输入之监督集中制度遂应时势需要而产生，但其后此种制度，却大为世人所非难。

此种集中制度之必要，以及“经济战争”之重要，在开战之初均未尝完全看出。不过国内经济界一部分重要人士，在开战后数星期之内即已具有一种感觉：关于前往中立各国市场采购货物之事似有统一进行之必要。因此一部分工商人士遂有种种团体之组织，其后此项组织逐渐扩充，并与其他一切依照彼等办法组成之类似团体联合起来，以供给“战时商业政策”之用。但其间关于前往中立各国买卖货物之事，仍是十分缺乏统一指挥之作用。其结果，只有利用“国会”授与“联邦会议”之特权，实行强迫手段，即或因此有违参与此事之工商各界意志，亦在所不辞。

当余前在财政大臣任内，对于此项问题即尝加以研究。

第十三章　乱买之结果

当时中立各国市场上所存肉品、猪油、牛油、干酪等物，为数尚属不少。迨我们前往采购以作军用之时，其价忽然特别增高，而且继续增涨不已。其原因无他，即我们军事机关前往采购之际，不但须与外国商人竞争，甚至须与吾国工商各界、市区公司等等

以及奥国采办货物之人大相竞争，彼此重价争购，其结果，出卖之人愈为投机，故将货物扣留不卖以待善价，尤以采购丹麦牛油一事为甚。余于一九一五年秋季组织“采购总局”，并邀奥匈帝国参加，未几其效立见。牛油价值（每五十基罗格兰姆）由二百七十五丹币降为一百五十二丹币，而且德奥两国购人之数量较前特别增多。因此之故每月可为国家节省经费甚多，同时居民与军队之牛油供给亦复大为改善。

关于前往罗马尼亚采购麦类一事，其情形尤为恶劣。

当协约国方面既将我们民食畜粮入口封锁，以及中立各国此项入口亦复缩至最小限度之后，于是吾国及奥匈盟友只能前往是时尚守中立之罗马尼亚一处采购大宗粮食。一九一四年及一九一五年，罗马尼亚之收成极好。同时，更因达达尼尔海峡（Dardanllen，译者按，在欧亚两洲交界的地方）封锁之故，罗马尼亚之麦类销场亦复只有中欧德奥等国。而且当时罗马尼亚所处地位，可以避免英国方面所用经济战争之压迫。因此之故，仅就经济情形而言，我们前往罗马尼亚采购民食畜粮，尤其是采购玉蜀黍，可谓甚为顺利。诚然，若就政治情形而言，罗马尼亚对德之态度自始即甚可疑。所有罗马尼亚政界以及该国农商人士，对于中欧德奥等国之困难境遇无不极欲尽量利用。我们当时漫无计划之采购，亦复正使该国之计易售。所有吾国军事机关以及商业工业农业各界前往罗马尼亚争购粮食之举，尤较前述争购丹麦牛油一事为甚。其结果，罗马尼亚方面所要求之卖价与日俱增——似乎玉蜀黍每吨之价涨至一千马克左右——并须现款交易。买卖既成之后，该国故将当时运输阻塞情形特别再行难上加难，以至于交款之后而货不能到手。最后罗马尼亚方面竟堆积吾德以及联盟友邦所购之麦类至七十万吨之多，购价约值二万万马克，款虽已交而货不能运。此外，罗马尼亚方面可以出卖之麦类为数尚多。但其间罗马尼亚已组织一种麦类专卖公司，要求之售价极高，交款之条件亦极酷。

我们对于此事，亦只有组织“采购总局”一法可以解决其难，同时并通盘筹划运输此项购品之道。

第十四章　采购总局之组织

经余特别努力及接洽以后，采购集中之举遂以完成，并将采购事宜委托“采购总局”（Zentraleinkaufsgesellschaft，简称为 Z. E. G.）办理。但此项总局其后竟为世人所误解，屡屡加以攻击。当时“采购总局”方面并与奥大利军用麦类转运公司及匈牙利军用出产公司联成一气，共同进行。

一九一五年九月，换言之，尚在出征塞尔维亚之前，运输麦类之事即已能够着手进行。

我们攻打塞尔维亚之举，既极迅速而顺利。于是罗马尼亚国中偏袒协约国方面之趋势，不免顿遭一大打击。而且自此以后，从多恼河运输罗马尼亚麦类之事亦复完全无碍。

“采购总局”遂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及一九一六年三月与罗马尼亚政府先后订立各种条约。中欧德奥两国由此可得粮食二百七十万吨，价值与交款条件均尚公允。是时协约国方面，尤其是英国政府，曾用各种方法破坏此种条约。盖英国当时拟用高价购买罗马尼亚麦类，购好之后暂时存储罗马尼亚国内，以绝德国采购之途。但英国此举稍嫌太晚，仅有一小部分成功，对于上述“采购总局”所订之条约未克及时阻止其成立。

关于运输困难情形，旋由“采购总局”会同“德国军用铁路督办”及“奥匈运输总局”设法将其改善。对于多恼河中之铁门亦复着手修理以利航行，并将匈牙利铁路轨道延长，以便续运大宗粮食。此外，则“采购总局”更于短期之内组成一种规模宏大之多恼河航业公司，并添置各种装运设备。

其结果，我们得于正式向罗马尼亚开战之前，尽将所购粮食运到德国。在一九一六年春夏两季难关之际，尝从罗马尼亚方面每月获得粮食至数十万吨之多。

关于输入集中之事，由少数团体依照“商业原则”及采用“统一方法”以行之，虽为制胜中立各国市场之先决条件，但仅有此种组织仍不能绝对收效。换言之，“采购总局”必须与我们输出机关密切联络、共同计划，方可奏功。迨我们既已察觉当时输入价值总额远超输出价值总额之后，而此项输入又属必需之品不能减少，于是又发生一种问题，即如何设法筹得一笔大宗外币，以付“入超”所需之款是也。

第十五章　与中立各国交易之方法

我们输出各类物品之中，有一部分颇为中立各国所欢迎，而且必需。因此，我们极欲利用此种输出机会，以换取我们所急需之原料粮食等等输入。但此种交易之法，不能依照一定格式去做。盖中立各国对于我国输出之物品，其办法向不相同。彼等需要我国物品程度之高低以及彼等所受协约各国束缚之大小，亦复各自相异，而且此种情形，在大战期中又复时常变更，殊无一定。

于是，我们乃用大刀阔斧之法分段进行。在战事初期之内，与中立各邻国通商，多取“以物交易”之法（Kompensationsgeschäfte）。换言之，我们允许输出某类重要物品与该中立国，而以该国输入某类物品与我为交换条件。此外，我们有时又另与中立各国银行直接交涉，以解决我们“入超”应付之款项问题。但此法行之未久，即已发现此种“以物交易”之举不尽有益，不尽可行。尤其是只能换得一小部分输入，不能满足我们

的急需。因此我们遂渐渐觉得，非与中立各国会订一种规模较大之“通商条约”不可。此项条约宜互顾双方利益，对于“输出允许”及“输出禁止”两事彼此特别通融。在我们方面，则将输出事宜大为让步，以使中立各国对于协约国方面之压迫有力抵抗，尤其是设法阻止中立各国勿从协约国之劝，禁止输物入德。至于各该中立国等业已颁令禁止输出之物，吾人则商请其根本取消该令，或在某种期内暂勿实行。此项“通商条约”就精确而言，虽远不及上述“以物交易”时特别规定交换各物之名目数目，然既有此约之后，吾人便可力促各该中立政府随时依照条约意旨实行。假如某中立国后来不愿实行此约，则我们亦尽可将从前订约时之各种让步取消，立将我们输出的限制用以压迫该国。譬如一九一六年季夏之际，瑞士政府因受法英两国之压迫，遂将协约国所指为“禁运物品”之各种货物停止输德，我们当时虽向瑞士政府屡提抗议，均因协约国从中作阻而无效。于是，我们乃毅然竟将吾国煤铁出产以及其他瑞士必需之物不复再行输入瑞士。其结果，瑞士政府不得不自行就范，与我妥协。

因此种经验之故，遂使我们与中立各邻邦之经济关系从此日有进展。但“以物交易”之法，详细规定双方物名数目，既只能部分应用，而且不能满足我们的急需，已如上文所述。而会订“通商条约”对于输出一事采用互惠原则之举，又嫌过于广泛，不能确使双方供求在一定期间内完全可靠，更不能尽将临时阻碍加以铲除。因此之故，我们遂决定兼用“以物交易”及“通商条约”两法之长，并对于我们购货款项日趋困难之情形设法加以解除。为达上述目的起见，余乃建议，宜依下列三点与我们中立各邻邦分订条约：第一，该项条约必须确立一定有效期间照实履行。第二，在此期间之内，彼此互输之物名数目必须详细规定。第三，我们“入超”须付之款应如何立券付偿，亦复同时加以规定。其后吾国方面果然依照上列三点，与瑞士、荷兰、丹麦、瑞典各国相商，并分订各种条约。

其后，吾国输出输入事宜之监督与集中日益加紧。同时对于国内外国货币及外国期票之流通，亦复不能不加限制。其结果，关于个人利益以及一般重要职业阶级之利益，均不免因而受损。此外，执行此类条例之时往往过于苛刻或过于烦琐，以及本可避免之错误而不设法避免。凡此种种缺点随时暴露，余固不能不加以承认，无所用其迟疑者也。尤其是商业界中人士，因为此种贸易集中制度之故，大多丧失其从来用武之地，受害最为深刻。我们对于国外贸易之必须加以统一与通筹，实由于战事所迫毫无先例可援，因此，所有一切组织均须自行发明。此项办事人员——采购总局一九一六年度之办事人员超过四千以外——必须从各地调来，加以编制及训练。所经手之贸易，其价值旋即达到数万万马克以至于数十万万马克之多，必须一一办理妥贴。总而言之，此项贸易事业之大，实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当时所处环境与所用手续，均为先例所无，必须自出

心裁加以处置。而且当此绞脑苦思之际，战神却在吾人头上用鞭驱策，不稍停息。万事群迫而来，往往决策立法之举迫于燃眉，不能稍缓须臾。因此，有时直照历来兵法原则行事，换言之，即“决策虽错，犹胜于不决”是也。

第十六章 德国战时输入之顺利

因实行上述对外贸易集中制度所发生之许多缺点与困难，以及横被各界批评攻击之事，吾人皆须毅然承受，以免妨害大体。有时甚至于被人批评攻击之际，既不敢起而辩护，又不敢将此种制度所收之效果向众宣布，更不敢当众讨论此项问题，至多只能邀约少数要人作一种秘密谈话而已。盖吾人若将所得效果当众讲述，则敌人方面便可探悉我们工作情形，势将用计妨害。于是我们业已侥倖获得之输入机会又将从此丧失。

现在战事既终，吾人对于当时实情尽可坦然追述，不致有妨德国利益。余现刻且举几种事实，以证明当时我们与协约各国苦战之际，对于中立各邻邦市场，不但能够维持德国旧有地位，而且远较战前改善，并将英国采购来源夺去一部分。

第一，吾人可以确切明言者，即战争之际，吾国虽经协约国方面加以商业饥饿封锁，而吾国之输入事宜却能保持某种限度，迥非当时一般局外人士所能揣测。

德国战前输入，就一九一三年而论，其价值为一百零八万万马克。迨一九一五年协约国对德既已完全实行商业饥饿封锁之后，而吾德之输入价值犹能保持七十一万万马克之数。到了一九一六年，复升为八十四万万马克，一九一七年又降为七十一万万马克。诚然，输入退步情形实际上原不止此，盖自一九一五年以来，各货价值大涨，若专以输入价值比较，殊不能表示当时输入实况。但是无论如何，当时输入价值数量之大，纵将各货所涨之价扣去不算，仍复洋洋可观。从此可见当时协约国方面虽极力断我海外来源以及禁阻中立各国对我输入，而吾德每年之输入总额却仍然不在少数。倘若吾人再将输入各货重量一一加以比较，便可证明此言不虚。

此外，尚有一事余必须同时声明者，即我们输出之退步实远胜于输入。在一九一三年之际，我们输出之价值为一百零一万万马克，较之同年输入价值仅少七万万马克左右。到了一九一五年，输出价值遂一降而为三十一万万马克，较之同年输入价值竟少至四十万万马克之多。其后到了一九一六年之时，我们在万分困难环境之中，以及本国军队居民需用日增之余，虽能设法渐将输出价值总额增至三十八万万马克，但同年输入价值亦复大为增高，其结果“入超”之数更增至四十五万万马克。至于一九一七年之对外贸易，输入价值为七十一万万马克，而输出价值则仅有三十四万万马克，其“入超”为三十七万万马克。更加以大战期中筹集外币异常困难之故，于是中立各国货币价值日

增，而德国马克价值则日益低落。其结果，德国每年对外贸易决算，其负数常至数十万万马克之多。

至于我们输入之所以比较能够维持不坠者，其原因由于我们中立各邻国（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月底以前，罗马尼亚亦系我们中立邻国之一）直将从前协约各国对德之输入以及其他中立各国（指只能由海道运德者而言）对德之输入取而代之。反之，与德联盟之各国，则各因本国战事需用日增之故，实无余力特别帮助德国。在一九一五年之际，德国输入总额尝降至七十一万万马克（按一九一三年输入总额为一百零八万万马克），已如上文所述。但一九一五年中立各邻国（罗马尼亚亦包含在内）输入德国之数，却增至三十五万万马克（按一九一三年该中立邻国等输入德国之数仅有十一万万马克）。到了一九一六年上半年，此项中立各邻国输入德国之数，竟占德国输入总额百分之七十左右，较之一九一三年该国等输入德国之数仅占德国输入总额百分之十左右者，殆不可同日而语矣。

有许多重要物产，从前本由协约各国或中立各国（指只能由海道运德之中立各国而言）输入德国者，至是乃由中立各邻邦全部取而代之。有时此项物产输入德国之数甚至于远较战前为多，其中尤以畜类一种为最。盖牧畜一事，在中立各邻邦中，尤其是在荷兰、丹麦两国，素来最称发达故也。譬如猪肉一项（火腿亦包含在内），在一九一三年输入德国之数为二万一千六百吨，到了一九一五年竟增至九万八千二百吨。此外战前牛油输入总额之中，由俄国西伯利亚输来者常超过一半之数。现在俄国来源虽断，而输入总额却由五万四千二百吨（一九一三年）增加至六万八千五百吨（一九一五年）。惟牛奶乳皮两物之输入颇较战前为少耳。同时干牛酪之输入，亦由二万六千三百吨增至六万七千三百吨，换言之比较战前增加两倍半以外。至于盐青鱼一物，亦由一百二十九万八千桶增至二百八十八万三千桶。换言之，较之战前增加一倍以外。

上述各邻邦之输入，对于当时德国战事之进行当然极有利益，但同时该邻邦等之生产能力，却不能一朝骤增，径将输入之数添至如许之多。因此，该邻邦等必须对于本国自己消费或其他各国来购之数，大大加以限制，然后始有余力助德。

当时该邻邦等确曾如此办理，对于其他各国来购之举确曾加以限制，尤其是对于英国来购之时特别加以限制。

兹举数例以证明之。

当战争之际，德英两国常在荷兰方面互相竞购物品。兹将荷兰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输入德英两国之数列表比较如下：

		（输　德）	（输　英）
荷兰牛油	一九一三年	一九〇〇〇吨	七九〇〇吨
	一九一五年	三六七〇〇吨	二五〇〇吨
	一九一六年	三一五〇〇吨	二二〇〇吨
荷兰干牛酪	一九一三年	一六一〇〇吨	一九一〇〇吨
	一九一五年	六三三〇〇吨	八四〇〇吨
	一九一六年	七六二〇〇吨	六八〇〇吨
荷兰猪肉	一九一三年	一一〇〇〇吨	三四〇〇〇吨
	一九一五年	五五一〇〇吨	七六〇〇吨
	一九一六年	二五一〇〇吨	一〇三〇〇吨
荷兰鸡蛋	一九一三年	一五三〇〇吨	五八〇〇吨
	一九一五年	二五二〇〇吨	七八〇〇吨
	一九一六年	三六四〇〇吨	八〇〇吨

观上列一表，可知德国当大战之际，本国居民军队所需之各种重要粮食来自荷兰者，远较战前增加。反之荷兰输入英国之数则较战前大为减少。

同时，德英两国在丹麦市场之竞争，其情形亦复如此。譬如丹麦牛油输入英国的数量，由八万五千三百吨（一九一三年）降为六万六千三百吨（一九一五年）。反之丹麦牛油输入德国之数，却由二千二百吨升为二万五千二百吨。同样，丹麦猪肉输入英国之数，由九千四百吨（一九一三年）降为一千九百吨（一九一五年）。反之丹麦猪肉输入德国之数，却由三千八百吨升为一万七千九百吨。又如丹麦鸡蛋输入英国之数，由三万吨降为一万八千八百吨。而丹麦鸡蛋输入德国之数，则由一千二百吨升为一万三千吨。

其在瑞士、瑞典方面，甚至于在挪威方面（但限于某种时期之内。按该国最与英国相善，而且不靠德国输出物品为生），德国之采购顺利情形，不但能够保持原状，而且日有改善。例如牧业渔业出品以及对于军用制造最关重要之原料若干种是也。瑞典铁沙含磷甚少，实为德国各种钢铁制品所不可缺，我们均可继续由瑞典输入。又如“铁矽”（Ferrosilizium）与“铁混合物”（Ferrolegierung），我们亦可照旧前往瑞典采购。此外，瑞典铜产亦复照常输入德国。至木料一物，因为德国所产甚少，不敷制造“硝纤维质”（Nitrozellulose）、“纺丝”（Textilose）、“纸张”等等用途之故，亦不能不向瑞典多量采购。其在挪威方面，则为德国及其盟邦唯一采办镍产之地。按镍产为军用制造必需之物，当时从挪威输入德国及其盟邦者为数虽不甚多，然大战之际能供给我们以镍产者，固只有挪威一国也。此外，挪威方面关于熟铜、生铜、硫黄砂砾、硝石（Norgesalpeter）等等，亦能继续输入德国。其在瑞士方面则以输入铝产一事最能帮助我们。

总而言之，我们当时力量诚不足以打破英国所施之海洋封锁，所有全部大战期间对

于一切隔海市场（译者按，指只能由海道转运德国之各市场而言）亦复无法问津。但在他方面，英国利用各种压迫，欲将我们中立各邻国亦复划入封锁界限之内，以使封锁效力直达我国陆地边界，却未能尽如其愿，换言之，我们对于与德接壤之各中立地带，在此经济战争之苦斗中，始终能够将其保持不坠。

不过其后此种中立地带自身亦复渐渐牵入漩涡，大受其害。英国及其盟邦不惜利用一切违背国际公法之压迫，以使我们中立各邻国自己之生产能力及生活情形亦复大受其累。例如严厉限制饲料入口，以使我们中立各邻邦之牧畜事业大为退步是也。其结果，我们如欲向着中立各邻邦讨求粮食以救饿死之危，必须自己遇事特别让步以为交换条件。

因此之故，自一九一六年年底以后，我们既知中立各邻国之供给源泉现在渐趋涸竭，于是不能不将此种危险随时放在眼中，以便预筹对付之法。

下编　战争经济

第四篇　战争经济中之科学效用

第十七章　增高生产能力

我们因为军事胜利之故，曾占得敌国广大土地，以使我们经济基础为之扩大。同时又因我们能在中立各国市场占得优势之故，可以随意采购。但在事实上上述两种所得，均不足以解决我们因为战事关系以及海外交通断绝所产生之民食、畜粮、原料、熟货、半熟货等等缺乏问题。盖此种物品，素为吾德一切生产消费经济组织之根本基础故也。其结果，我们不得不力谋解决之道。第一，对于国内现有生产消费组织，宜一律改用新法经营，并极力发明替代品以补断绝之原料。第二，对于现有人工，须设法将其工作效用增高。第三，对于我们工厂出品数目以及国民生活情形，必须设法使其能与我们现在忽然缩小之生存活动范围完全相应。第四，对于军事所需物品，必须能够源源供给。

吾德自西门时代以来（译者按，西门〔W. Siemens〕系德国大电学家，生于一八一六年，死于一八九二年），所有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企业雄心，无不长足进步，殊

途同归，并能互相补助促进，以使吾德国民经济最近数十年间猛进不已，因而引起世界各国之惊诧与妒念。现在大战期间所负责任之繁难，既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吾人亟宜尽将上述各种学术能力充分利用。而且从前吾国七千万人之生活情形与经济组织，原以全世界物产为其制作基础，现在则不能不专靠本国有限来源，在此战事压迫之下以维持其生存。

其结果，此项祖国危难情形，竟使吾德各种天才一时大为发展。所有国内杰出之士，无不苦思力想，如何能将吾国生存活动范围之已为敌人剥削殆尽者，利用发明天才，以为补救之道。在此短时期内，发明种类之众多以及人工物料之善用，在世界历史之中殆无其例。嗣后虽以寡不敌众之故终于战败，而德国此种奋斗精神仍将流芳百世，并为德国前途放出一线光明。

余于此处殆难尽将吾国当时增高生产能力之法一一详述，甚至于提要叙录，亦苦不能尽其什一。故现在只好略举几种重要发明，聊以为例如下：

关于组织大规模之工厂，从空气中取出“淡素”之举，余已另著专篇叙述。因有此种“淡素”来源之故，我们军队需用日繁之子弹原料始有着落，同时我们农业所需之“淡素肥料”亦始有来路。此外，又从德国普通粘土之中发明取铝之法，自“炭化钙”（Kalziumkarbid）实验成功以后，于是除用以制造“石灰淡素”外，并可代替其他缺乏或稀少之物。譬如代替洋油酒精以作灯光燃料之用，代替外国金属物质以作钢铁制品之用，甚至于可以用为“人造橡皮”及“酒精”之原料。至于铝质，则除了用以代替日益缺乏之铜料外，对于子弹制造及电气工业尤有极大帮助。自橡皮输入来源大部分断绝以后，吾德幸有“人造橡皮”及“改造旧橡皮”两种发明以补其缺。此种“人造橡皮”虽只能代替“硬橡皮”之用，但是我们对于“天然橡皮”需要之数目却因此大为减少，以使战争期间我们此项需要能够勉强支持。

纺织工业以及国内居民衣料，均因其间无数发明之故得以不致破产。如从木料中取制纺线（Textilose，Papiergarne，Typhafaser，Zellulosegarn）等等，即其例也。因有此种发明之故，一切农业、工业所需包裹材料以及“壕沟战争”需用极多之沙袋原料，从此乃无缺乏之虞。此外更因“硝纤维质”（Nitrieren von Zellulose）之发明，遂使我们制造“无烟火药”之时不复再以棉花为其必需原料。

至于农业方面，除上述之“淡素肥料”制造外，当时最为努力经营者实推饲料问题。盖自外国此项输入断绝以后，国内饲料最为缺乏故也。最初，我们设法将“马铃薯”水分排去，以作长期饲料之用（按从前曾有大批马铃薯饲料因受潮湿而腐烂），其后此项排除水分之法日益进步，乃扩及其他向来视作无用之物品，如萝卜之叶、马铃薯之叶等等，莫不化无用为有用，收效甚为宏大。未几，复创制种种“畜类补料”，尤其

是矿渣补料（Mineralhefe）及麦梗补料（Strohkraftfutter，系利用溶解之法），最后，更从动物尸骨以及其他废物之中取制种种“畜类补料”。此外我们国内所需油类既异常缺乏，乃不得不一方面俭省利用一般含有油质之种子及核仁，他方面又由动物矿物（石片）之中设法制取油类，其结果，我们油类来源遂亦日有进步。

所有上述一切发明，大半均由国家，尤其是余所掌管之机关，加以种种提倡、联络、促进及组织。当余主持财政内务之时，殆无一种部务能使余心满意足有如此类发明事业者。可惜余之参加此项事业范围甚属有限耳，其最与此种发明事业之成绩相反者，殆无过于国会讨论，往往既耗时间又无结果。因此之故，余在国会之中有时虽然难免轻易发怒或有过于固执之处，但余此种表示，大多由于憎恶国会方面讨论一事每每耗时费力而无结果，并将重要问题搁置引起无限损失。余心久积之忿未能再行隐忍，不禁一时倾泄暴露耳。

第十八章　各种企业与人工之改组

除上述各种科学发明以增高生产能力外，复因战事关系国内经济情形大变，所有生产机关一时均有改组之必要。在开战之初，尤以制造大批军用物品与保全本年田间收获两事最为急切。其在他方面，则一切专做海外输出生意或专靠海外原料为生之工商事业，又不能不大加限制。其结果，国内一般企业家以及职员工人等等，对于此项新问题、新工作，皆有努力设法解决之必要。

关于各种企业之改组，大多出于各企业家之自动，而且能以自己力量应付裕如。其善于适应环境以及坚忍不拔精神，皆可使人为之惊讶。譬如从前只造平时生活用品之工厂，至是因受制造军用品可获大利之引诱，大都改制军用物品。不仅是一般金属工业如此，即许多纺织工业以及其他类似工厂，亦多临时改造子弹及火线等物。此外，新设之军用工厂更属遍地皆是。

至于人工改组问题，则远较上述企业改组之事为难。

此次战事之第一影响，实为令人可怕之失业问题。其实因为战争之故，国内数百万最能作工之人皆已开赴前线，国民经济方面方感人工被夺之苦。所有留存国中之人，正宜尽量利用以增生产之力，然而当时情形却不如此，往往数十万人必须立时离开工厂，而且前途茫茫，无工可寻。此种现象之发生，其中固有一部分为必不可免之举，但亦有一部分却由于工厂方面之过分限制或无故停工所致。更加以各种企业改组之时，其势必需相当期间，所有开除之工人，当然不能立时寻得新工。因此国内失业情形一时顿呈十分严重之象，可于下列统计见之。

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之时，男工方面，每一百缺额出来，计有一百五十八人候补。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际，每一百缺额出来，竟有二百四十八人候补。至于女工方面，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之时，每一百缺额出来，计有九十九人候补。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际，每一百缺额出来，竟有二百零二人候补。

因此之故，开战未久，政府对于此事立即出头加以干涉，盖此事极与工人自身利益以及国家生产效率有关故也。其后因有“职业介绍所”之设以为解决失业问题之道，并使其能与当日军事时代之需要情形适合。

德国“职业介绍所”之设置，战前虽已有之，但极不集中。除了一般小介绍所外，原有“公立职业介绍所”、“招工介绍所”、“求工介绍所”及“供求职业介绍所”四种，但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办理，互不闻问。迨战争既开，内务部方面乃有“全国职业介绍总局”之设。所有上述各种职业介绍所，必须随时将其招工求工情形报告总局，以便由总局方面设法为之调剂。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总局开始办公。其责任不仅在联络上述各种职业介绍所，如遇紧急情形之际，更往往自行调集工人直接从事各种工作。譬如大战方开之时，尝由政府方面征调工人从事田间收获工作，从事炮台建筑工作，从事国立陆军海军制造局及其附属工厂之工作。如遇国内工业农业方面缺乏人工之时，则又由总局方面指拨俘虏若干前往工作。

此外更设许多辅助之法以补职业介绍之不足。譬如新创工作机会以安插一般赋闲工人，限制各厂每日工作时间，禁止加工及夜工之举（但限于某种工厂），分别委托各厂制造军事用品以减工人失业之弊，对于一般失业工人则更随时给以相当接济。

当人工问题方告解决之后，其间国内情形却已大为变更，而当局职责当然亦复随之变更。因数百万人民改充兵役以及军事用品需要日增之故，于是国内男工忽然大感不足。当一九一四年八月之际，每一百男工缺额出来尝有二百四十八人候补，已如前文所述。到了一九一五年四月之时，每一百男工缺额出来，遂只有一百人候补，供求恰恰相应。其后数月之间，需要男工之事日益增加。其结果，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之时，每一百男工缺额出来，竟只有八十五人候补。到了一九一六年十月，则每一百男工缺额出来，更只有六十四人候补。

反之，女工失业之情形，其改善也却甚为迟渐。其原因：第一，由于女子不须充当兵役；第二，由于国内各厂限制营业之时，正以女工素多之工厂为最甚（譬如纺织工业之类）。因此之故，一九一五年七月，换言之，即开战后之一年，每一百女工缺额出来，计有一百六十五人候补。其后因为纺业工业限制营业之故，于是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每一百女工缺额出来，遂增至一百八十二人候补。但到了一九一六年四月，每一百女工缺额出来，又减为一百六十二人候补，到了是年十月，则更减为一百三十五人候补。

男工缺乏之数既日益增长，而女工过剩之数却照旧保持，因此不能不亟谋办法以为调剂。于是决定：国内各业凡可以用女工代替男工者，皆用女工为之。兹据工厂疾病保险公司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之统计，则可以察见全国工人总额中，女工增加之数为何如。

炼矿工业、金属工业、机器工业：女工由百分之九增至百分之十九。

化学工业：女工由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二十三。

电气工业：女工由百分之二十四增至百分之五十五。

专就一九一五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一年间之疾病保险公司统计而论，女工人数之增加，即有七十五万人左右。

至于童工方面，亦与女工一样，必须特别尽量利用。

为尽量应用女工童工以利战事进行起见，遂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颁布一种法律，准许国务总理对于前此一切保护女工童工条例可以临时停用，暂作例外处置。因战事紧急之故，对于此项保护条例中之许多规定，当然不能绝对严格实行。盖我们作战行动，不仅限于战场之上，所有国内各种业务亦必须全体动员。无论对于国外战场与国内业务，皆不得不将全体国民力量同为孤注之一掷，以谋全国生存之道，以消敌人灭我之心。

此种抵抗意志，当以其后所颁《救国服役条例》中之“工作动员”一事最能表现出来。关于此事，余将于下面另立专篇详述。

第十九章　消费条例与国民粮食

我们利用科学方法与优良组织以及善用所有人工，促进本国生产，虽然大收其效，足使我们困难境遇为之和缓，以便向敌尽力抵抗。但此种成效，却不能使我们粮食原料缺乏之问题遂因此解决。对于限制消费一事，亦不能因此遂可幸免。

关于消费之事，至此再不能任其自然变化。倘若限制消费之举仅用抬高物价方法，以使购者逐渐无力多购，则其结果，富者仍可多多置购，而贫者则无不陷于饥寒。此实为社会政策所不许，必须设法加以阻止。我们因为战事之故饱受物质缺乏之苦，只有全体国民一齐同赴国难，各自限制消费，始能将此难关度过。

但只规定各货“最高价格”这种办法，亦复无济于事。盖法定物价之举，实将经济上“供求趋势支配物价”之原则根本打破，而同时又无其他“支配原则”以代之。假如法定物价甚低，并不准其自由增涨，则一般造货及营商之人势将裹足不前。而我们对于一般消费之人仍不能因此迫其自行限制。规定货物“最高价格”之制度，原欲保护居民

生活勿受过分腾贵影响。但在他方面，如果吾人不愿坐视货物来源断绝之危，则必须另颁各种特别条例，以为补救此项制度之计。譬如限制居民消费，没收国内货物，以至于国家方面直将各项日常生活用品完全接手自办是也。

大凡生活用品之愈属必需，存货数量之愈属稀少者，则有待于国家之干涉，亦复愈为紧急。

因此，关于粮食管理一事，遂不能不先从麦面一种下手。其后此项麦面管理之法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对于当时全部“战争经济”之进化，实具有密切关系。

关于麦面管理问题，除由国家规定“最高价值”外，并于一九一四年十月颁布“限制消费”之令，对于滥用麦子以作饲料之举亦复严令禁止。此外，又规定碾麦之时必须参入若干附料。譬如“小麦面包”之内，必须参加若干黑麦，其在“黑麦面包”之内，又必须参加若干马铃薯（或马铃薯粉）。其后此项规定日趋严厉，并加以若干补充。

一九一五年正月，更进一步为断然之处置。先将每人每日所需面包及麦面数量之最高限度确切规定。并发出一种“面包券”及“麦面券”，以便居民逐日按券采购。同时又将此项经营全国现存麦面之事，委托“战时麦面总局”包办。至于此项总局之组织，系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由私人方面所发起之“战时麦面公司”加以扩充改组而成者也。所有全国现存麦子均加以没收，交与总局接管。然后再由总局加以储藏碾磨，并交由全国各地新设之“麦面领取机关”分配。所有关于面包铺子领面以及本地居民领券之一切手续，则由该地“市区公会”承办。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更用命令，再将“战时麦面总局”为最后一次之改组。从此以后，关于麦面问题之事改由“全国麦面总局”办理。局内分设行政、商业两部。“行政部”具有官厅的各种特权，“商业部”则依照商业性质办理。此项新组织与前此旧组织不同之处，即现在（一九一五年）麦子收成并不直由“全国麦面总局”没收，而由各地“市区公会”没收。盖“市区公会”关于执行没收手续以及检查本地情形，最属适当便利故也。其在“市区公会”方面，则又负责径将没收之麦交与“全国麦面总局”及其指定之机关。

由此观之，我们对于管理麦面事宜，显然有两种特点：一方面则将“规定最高价值”与“限制居民消费”两事同时并行，他方面又将“没收国内存麦”与“经营麦面生产”两层兼途并进。

此项管理麦面事宜之组织，在大体上所收效果可谓十分圆满。我们不但对于军队及居民方面能为充分的不断的供给，而且能使麦面价格下降，远较其他各国（包含交战各国、中立各国以及美洲各国）为低。德国在欧战之前因实行农业保护关税之故，国内麦价之高，素居世界第一。迨开战之后，外国输入既绝，同时又因田间工作不力、肥料来

源不继之故，本国麦子收成远较战前为少。然而当时我们竟能在此情形之下，渐将国内麦价减到如彼低微。

不过麦面一事，本极利于官营，盖全国所需麦面以及所存麦子之数，比较易于计算，检查之举亦甚简单，黑麦及小麦之保存及运输亦甚便当，麦子优劣之分相差并不甚远。上述种种便利情形，均使国家筹划支配之举易于进行。至于其他各种粮食之性质，则多缺乏此类优点，即或有之，亦不如麦子所具之多。

因此之故，在大战初期之时，当局方面尚未欲将此项麦面管理制度移用于其他各种粮食之上。专就马铃薯一物而论，即已不便实行此种统一管理制度。关于马铃薯存货数量一事，因其埋储地下之故极不便于调查。更加以保存之难，种类之多，益使统一管理之事异常棘手。至于其他最易腐朽之粮食，如蔬菜、果品、肉类、牛奶、牛油、鸡蛋、鱼类等等，尤为难于集中管理。

其后当局方面鉴于上述各种物品渐有缺乏之处，乃思利用其他种种方法，以使此项物品能于公平价格之下平均分配于众。其所用之方法，或为商业监督制度，或为公司专卖条例，或由市区公会出头与商人方面或产主方面订立各种交货条约，或令产主将其货物缴与省府或市会，或将各物价格随时加以规定。此外，更设“审查物价公所”以及“检举重利衙门”等等。惟上述各种方法，往往收效不如所期。因此之故，虽明知前途难关重重，亦不能不逐渐采用断然手段以谋最后解决，一如从前麦面管理之能得如许效果者然。从此以后，对于各种粮食问题，莫不由“部分干涉”进而为“集中管理”，并以上述麦面管理制度为其模范，分设各种总局办理。每局之内各分行政商业两部，以行使官厅职权及商业职务。于是所谓“全国马铃薯总局”、“全国瓜品总局”、“全国菜果总局”、“全国白糖总局”、“全国肉品总局”、“全国食油总局”、“全国鸡蛋分配总局”、“全国鱼类食品供给总局”等等，无不一一成立。而且此项总局大多设有其他附属机关，如“战时酸菜公司”、“战时池鱼鳗鱼公司”之类。

余对于此项“强迫经济”办法施诸一般不适于国营之事业，尝屡次加以反对，即在今日，余犹以为有许多事业因受“强迫经济”之累，以致弊多于利。盖“强迫经济”每使生产者方面发生混乱与误会，并酿成生产停顿之患。此外更有大批最易腐朽之粮食，如由商人直接卖与雇主，本极便当安全者，而现在则因“强迫经济”之故，以致陷于腐坏而无用。其结果，生产者与消费者两方无不受其损失。而且过分滥用“强迫经济”之结果，每使私商密售之举与日俱增，其害尤为不可思议。一方面政府检查之机会既如彼之少，他方面又因“强迫经济”过于严厉之故，乘机侥幸避免者日益众多。如此则防不胜防，无法禁止。至于施用重罚以为防范之举，亦复不能收效，而且有时适得相反之结果，以致私商之数愈增，密售之价愈高。因此之故，余尝以为，当时处罚如果稍宽，则

私商之事或者反可因而减少。但余所提一切抗议，可惜均无效果。盖“战时粮食督办署”及其附属之各种总局，实有一种遇事扩充自己权力之雄心（或者彼辈并不自知其如此），更加以当时署中附设之“国民粮食委员会”（系由国会议员所组织）赞成各种粮食事宜统由国家经营者为数极众，于是该署人员包办一切之雄心愈成不可抑制之势。

第二十章　重要原料之收归国有

关于工业原料问题，在战事初起之时即由陆军部方面设立“军用原料”一司以管其事。

该司对于国内所存军用各种原料之不能自行增制者，立即加以没收。尤以德国国内不能生产或产额甚少之矿物原料（即所谓俭省金属物质〔Sparmetalle〕是也）及纺织原料为最。

收归国有的方法，系先从“没收”（Beschlagnahme）下手（按“没收”之意义，与“充公”〔Enteignung〕之意义不同）。没收之后，原有物主对于该物遂不得自由任意转卖或制作。“军用原料司”对于国内所存各种原料，大概只用检查监督之法而不直接充公。但亦有许多原料必须立即加以充公者，譬如净铜、混铜以及镍、锡之类，不但工厂商家所存是项原料均须一律归公，甚至于各家各店所用之此项物质造成的器皿，亦须一律缴与政府，以备军用。

至于是项原料之分配方法与用途监督，系以当时所定“接收存货及用途报告”之《经济条例》为准。该项条例之中曾言：当事者务宜斟酌情形，相机办理。对于各处请求原料一事，必须察其缓急，分别处置。此外，更应随时设法寻求此项原料之代替物品。总而言之，分配此项原料之原则，当以不妨军用制造为要。

管理原料之事，正与管理粮食情形相同；一半属于官厅性质，一半属于商业性质。譬如对于存货之征集、没收与充公，规定各物价格之高低，经济条例之制定，分配原则之确立，皆只能以官厅权力行之。惟对于与此有关之工商各界意见，必须同时加以顾及而已。反之，关于没收各物之接管以及给价（无论在德国国内，在德军占领地之内，在德国同盟各邦之内，在可以来往之中立国内，无不如此），以及运输、存储、分类等手续，则完全属于大规模的商业之性质。为处置此项商业事件起见，乃邀集经济界人士，共同组织一种机关，即所谓“战时原料公司”是也。

为供应军队需要起见，实行没收各种重要军用原料，其结果，所有国内居民日常用品，无不因此大受影响。尤以没收纺丝皮革两物为甚。其后，军事当局乃将所没收之皮革，发出一部分以供居民之用。并于一九一六年春季特组一种机关，以司此项分给居民

之事。此外更因纺织原料缺乏之故，军事当局为急备军用起见，径将各厂业已织成之衣料，亦复加以没收，尤使居民衣物供给一事大受其殃。迨一九一六年二月一日，既颁没收一切衣料衬料以及换洗布料之命令以后，于是筹划居民衣物之举，遂不可须臾再缓。所谓“全国衣服总局”者，亦复由此成立。其责任在依照“粮食券”办法以处理居民衣服之事（但此种券制，用于衣服，却远较用于粮食为难），同时，并设法利用旧衣旧料以为支持之计。

是时，余方接任内务大臣之职，除筹划“国民粮食”以外，更须解决此项“国民衣物”之重大问题。

其后，原料与人工日益缺乏，仅用部分的限制衣物消费之法，实已不足维持，于是我们此项职责，因而愈益繁重。

当“军用原料司”方面分给各厂此种有限原料之时，对于一般工厂营业，尝发生重大影响。按分配之法计有两种：（一）所有国内工厂一律同享分给之权。至于分给数量之多寡，则以该厂制造能力大小为比例。其结果，各厂之中，均只能一部分开工。（二）分给原料之时，只以制造能力最大之工厂为限，以便该厂能够全部开工。至于其他制造能力薄弱之工厂，则一律任其停闭。就经济论点观之，第二种办法实较为完善。盖因此可以减少人工煤炭等等之消耗故也。但就民生政策而言，则第一种办法亦有其特长。盖各家工厂既无独自向隅之叹，而且一部分工厂停止营业开除工人之举，亦可利用各厂同样减少工作时间之法以代之。

在国内人工与煤炭尚未感着缺乏之时，第一种办法实为当局所乐用。而且在事实上，当“战争经济”初期之际，亦复大多采用第一种办法，尤其是对于原料来源极为缺乏之纺织工业与皮鞋工业，都采取“各厂分给”之制。因此所发生之各厂减少工作时间问题，则由社会方面筹集巨款，以津贴各厂因此减薪之工人。

迨其后，因为军用物品需要日繁之故，人工亦复随之大需。同时工厂所用之煤炭及其他材料，亦有大为俭省之必要，于是不能不逐渐采用第二种办法，以便制造能力最大之工厂得以全部开工，而其余制造能力较弱之各厂，只好听其停闭，无法再行顾及民生诸种考虑。此尤以“兴登堡计划”与“救国服役条例”以及一九一六年与一九一七年之交煤炭大为缺乏诸事，实为改用第二种办法之最大关键。

其实，在上述期间之前，余即已深觉，如欲尽量利用人工原料，勿使人力、资本、材料滥用，以利军事进行，则直接干涉一部分工厂之举，实属势不可免。

一九一六年六月八日，政府因鉴于人工缺乏之故，乃下令禁止增掘加里矿坑之举。其后（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对于各处洋灰工厂之新建及扩充亦复加以禁止。盖是时正值专卖条约满期之后不复再续，因此深恐一般洋灰工业此后滥用人力财力从事新

建或扩充，特下此令以为预防故也。此外，余并努力运动联邦各政府及军事机关，设法禁止一切无关军事之建筑，以便节省人工与材料。最后，余更将前述“经济效率原则”应用于肥皂工业。盖战前德国此项工业不下二千余家，类多规模狭小。现在则只挑出几个最大肥皂工厂，由政府继续供给彼等油料，使其继续工作。其余各家小厂，则令其暂行停工。但该小厂等，得向上述各大工厂订购货物，并打若干折扣，购得之后再由该小厂等，各用自己商号封皮包好，发售于市（见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命令）。同样，对于皮鞋工业亦复加以类似此项办法之解决。

惟余对于新闻事业，则因其有关公众福利之故，却不能不特别顾全各种小报营业，恰与上面所谓“经济效率原则”相反。

当时造纸原料之日益缺乏，其后又继以煤炭不敷之患，于是干涉新闻营业一举殆已不能避免。吾人对于造纸原料之置办与加工，虽已十分努力，但仍无伟大成绩可言。盖是时德国国内，甚为缺乏人工以砍伐各地造纸木料故也。同时军队方面因修筑战壕之故，需要木材日多。而外国造纸木料、细胞素（Zellstoff）、印刷纸之来源，又因对德封锁之故，日益减少。更加以是时，一方面纸线之需要日益加增，尤其是制造战壕沙袋，需用此物最多。他方面，又因利用“纸张硝化”之法以造“无烟火药”一事，需要纸张日繁。于是特别新设许多工厂，以应上述两种需要。其结果，此项新设工厂，遂与国内新闻事业互相争购纸张，益使纸张缺乏之患一时为之大增。

在此情形之下，造纸原料之价格以及印刷纸之价格，当然大大抬高。而是时各家报馆经济方面，更因广告收入减少之故，早已岌岌不可终日，再加以此种纸价飞涨之打击，益觉无法支持。余为维持各报继续出版，尤其是中小报馆继续营业起见，特于一九一六年春季以财政大臣资格，提出国库款项若干，以平“印刷纸价”之用。

自此以后，报馆经济难关虽已设法度过，而印刷纸张之缺乏问题却依然如旧。当时吾人虽然用尽各种方法以谋救济，而纸张缺乏之患却仍继长增高。到了最后，市上所存有限纸张大有尽为各家大报争购而去之势，其余一部分小报则将有向隅之叹。惟国家当时既已支出大宗款项平定纸价，以维持全体报界，则不宜再行继续听任各家大报自由争购纸张，独得其利。换言之，国家方面对于印刷纸张，实有速谋“限制消费”之必要。

一九一六年四月，特组一种机关，名为“德报战时经济处”（Kriegs wirtschaftsstelle für das deutsche Zeitungsgewerbe)，以整理德报用纸事宜。先由调查实际供求情形入手。迨余既任内务大臣之后，更于上述“德报战时经济处”之中特设一种委员会，系由报馆纸厂代表所组成，以便彼等随时参与其议。关于限制各大报馆纸张消费之举，并藉该委员会之助，得以一一实行。惟对于国内各报用纸一律加以限制若干成分之事，则甚碍难进行。盖一般中小报馆所出之篇幅原极有限，若再令其限制，实无异宣布彼等死刑。反

之，一般规模宏大之日报，每日出版张数甚多，却可以大大限制一下。至于各城各镇出版之地方小报，则因特种理由，必须继续将其维持下去。此项“分级限制”之法（换言之，即限制纸张消费之成分，大报多于小报），当时曾得委员会方面大多数委员之赞成。

其后，因为煤炭缺乏之故，限制益形加严，于是一部分大报对余大施攻击，甚至于一部分柏林报馆，对余采用一种类似罢工之手段。换言之，将余一九一七年三月在国会中关于“内务部预算案”以及我们所采“战时经济政策”之演说，彼此相约不登。现在时过境迁，当时攻余甚烈之人，或者已有一部分渐生原谅之念，亦未可知。盖自余离开内务部之后，尚未闻有人能寻出一种较良方法，以解决此项印刷纸张之缺乏问题故也。

报馆事业，实与其他企业之性质特别不同。盖新闻事业之重要，战时尤甚于平时。如欲全国报纸作用充分发展，必须各地小报亦复同时存在方可。因此之故，前面所谓“经济效率原则”专助生产能力最大之工厂，以便尽量利用人工与材料，以造成生产集中之制者，实与报馆事业性质不甚相宜。反之，其他一切企业之未具有此类报馆特别性质者，则因战事需要日繁之故，对于人工与材料，均不能不设法求其“最大效率”。此项进化趋势日益逼迫，遂于一九一六年年底所颁之“救国服役条例”中，直将上述“经济效率原则”被以法律形式。

第五篇　救国服役条例与兴登堡计划（略）

德英法战时税政[①]

客老斯　著　王光祈　译

译者导言

欧战时，德国战费共用一千六百五十万万马克。其中约有百分之五十四点六出于“战时公债”，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出于“国家活期债务”（Schwebende Schuld），百分之六出于税收。其在英国方面，共用战费八十八万零三百万镑。其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出于举债，百分之二十出于抽税。至于法国方面，则用去战费一千六百万万法郎。其中约有百分之四十三出于内债，百分之二十一出于外债，百分之三十六出于“国家活期债务”（按以上数目，是录自他书统计，与本书所述者，或有不尽相同之处）。

德国当时为安定国内人心起见，关于筹措战费一事采用一种“取巧办法”，不加税而举债，并以战费为特别支出，不列入经常预算之中。是时德人爱国狂热高至百度，踊跃购买公债，争先恐后。是以每次举债结果无不成绩灿然。但事后遗毒甚深，常为德国财政学者所抨击。

反之，英国方面则奉其“战时财政传统政策”，曾大行加税以弥补其战费之一部，

① 此书为《国防丛书》之第二种，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 9 月出版。该书内容，主要是介绍一战时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税收政策，特别是上述各国为应对战争而采取的特殊的财政与税收措施，具体且专业，虽具史料价值，但因篇幅所限，本《文集》只收录了其中部分章节。

深知非痛加新税，不能使战事严重之情形印入国民心中，并将战费支出列入预算之中，收支实况一目了然。此实为战时财政之“模范办法”。

至于法国方面，则关于战费一事几乎全部出于举债，而且不能制成正式预算，只用一种“临时预算”（Douzièmes Provisoires）之法以为敷衍，故吾人直可称呼法国战时财政是一种“敷衍办法”。

德国战前税政，除“遗产继承税”一项外，并无何种“直接税”。所有国库收入，大半出于关税、内国消费税等等之“间接税”。因此德国战前税收总额，“间接税”约占百分之八十一，而“直接税”仅占百分之三。但到了欧战之时，一方因为被敌封锁，关税等等“间接税”之收入锐减，他方因为“战时获利税”之采用，“直接税”不免大增。其结果，一九一八年之税收总额，“直接税”占百分之四十三，“间接税”占百分之四十七，渐能调剂得中。

英国战前财政素有“模范”之誉，“直接税”约占税收总额百分之四十七，“间接税”约占百分之四十六，欧战时更痛加“收入税”等等。其结果“直接税”竟占税收总额百分之七十七，而“间接税”仅占百分之二十一。吾人若就抽税原理而论，“间接税”之弊究多于“直接税”，故英国当局之重加“直接税”实有其正当见地。

法国当大战开始之时，正值其着手改革财政之际。其战前“间接税”约占税收总额百分之五十三，而“直接税”仅占百分之二十七。欧战时，两种税收情形稍有转移，“间接税”约占百分之四十三，“直接税”约占百分之三十九。但持与英国税政相较，仍不能称为健全。不过法国财长喀鲁（Caillaux）之“收入税”改革计划（系一九〇七年提出）经过十年之后，竟能于大战之中议决实行，此则法国财政史上不能不加以大书特书者也。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王光祈序于德国莱因河畔之波恩大学

按本书是译自德人客老斯（Robert Knaus）所著之《德英法战时税政》（Die Deutsche，Englishche und Französische Kriegsfinanzierung）一书中之第五《战费》、第六《税政》两篇。该书现在虽已出版十年（一九二三年刊行），但其内容详实，至今犹为研究欧战时德英法财政问题最善之书。吾国财政情形虽与上述三国相异，但书中可以供吾国之参考者亦复不少，因译之以饷国内之留心国防问题者。王光祈又识。

目　次

(7) 一九一八年第五次税收预算

(丁) 结论

第一篇　战　费

从“国民经济”立场而言，则所有国内人工、生产材料、消费物品之损失，皆须归入“战费”一项之下。如果吾人应用李斯特（List，德国经济学家，1789～1846）之“全国力量”观念，则所有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损失，亦应列入“战费”一项之内。因此之故，除了生命财产之显然损失外，其余如机器铁路等等之消耗，以及人民身体上精神上因敌人封锁与战争作用所引起之各种影响，亦无不应该列入“战费”一项之下，为一国“国民经济”因战事而发生之重大负担。惟此种“战费”定义未免范畴过广，对于吾人所欲研究之财政问题，不能应用。而且一切“间接战费”以及国家与人民所受之种种负担痛苦损失，其势万难一一加以详细统计。此外，各种下级公共机关因战事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所增加之各种支出，其势亦难列入吾人讨论范围之内。盖此项材料甚为缺乏，即或有之，对于各国战时财产比较之研究，亦复毫无益处。因此，吾人讨论“战费问题”只能以国家财政机关所支出者为限。

财政学者关于国家财政用途，向来分为“经常支出”与“临时支出”两种，系以该项用途之“时间性”为分别标准。所谓“经常支出”者，系指国家将流通资本若干经常的规入国家预算之中而言。换言之，在一定会计年度之内，得将若干国民经济财产提供国家应用是也。所谓“临时支出”者，系指一般临时的大宗支出，其影响往往超越当时会计年度之外而言。至于“战费”一项，依照上述定义，当然应在“临时支出”之列。

“战费”一项，复可依其用途分为“狭义的战费”与“广义的战费”两种。“狭义的战费”包含一切“武装动员”、“对敌作战”等等之军事用费，但平时海陆两军之经常费用却不在内。又“狭义的战费”之主要支出为“事物费用”（譬如武装、子弹、给养、运输、军医之类）与“薪水费用”（如薪水、工资之类）。

“广义之战费”系指其他一切因应战事需要而设立之非军事的各种机关支出而言。其最重要者，为战时公债之付息还本事宜，以及战时救济、战争经济等等之各种支出。

（下略）

第二篇　抽税政策①

（丁）结论

吾人在研究德英法三国公债政策之前，对于三个战时税政，必须先从上述各种繁杂条例之中将其大纲寻出，牢记勿忘。至于填补支出一事，宜用抽税之法？抑用举债之法？则著者将于本书之末提出“战时财政政策问题”以讨论之。现在所欲研究者，只是欧战时德英法三国用以增加其“经常收入”之各种税源。

税之意义，乃系国家一种片面的规定，勒令各个“经济组织”缴纳以为报酬公家工作之用。至于税收之主要来源，实为“国民收入”。换言之，系指国民用品供给一年间之消费者而言，同时“国民财产”却不因为缴税之故为之减缩。

其在战时，国家之主要税源亦为“国民收入”。按“国民收入”一语，虽自有其独立概念，但在二十世纪经济交通如此发达之时，“国民收入”实可分析为无数“单独收入”。国家向其征税之时，可以分为三个段落：（Ⅰ）生产，（Ⅱ）占有，（Ⅲ）消费。对于“生产收入”课税之法则，用“直接收入税”及“交通税”两种形式以出之。

兹将欧战时德英法三国“直接税 ”之进化情形，列表比较如下：（表略——编者注）

德国在欧战之前，除“遗产继承税”一项外，并未有任何“直接税”之施行。因此之故，战时岁入之增高殆只有出于“军事特捐”及“战时获利税”两途。而“战时获利税”一项，又须到一九一七年以后始能大收效果。反之，英国战时财政则以“收入税”一项为其主要来源，在一九一四年秋季之时即已将其“收入税”之税率提高一倍，其后逐年增高（惟一九一七年为例外），约较战前税率（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增至六倍之多。又“战时获利税”一项，英国方面亦较德法两国早行一年，成为英国战时财政之另一台柱。最后此项税收之富，几与该国“收入税”并驾齐驱。至于法国方面，在大战开始之时正值该国着手改良“直接税”之际，该国原有“进款税”一种，在开战后三

① 因篇幅所限，该篇只收录“（丁）结论”，其余部分省略。可参看《德英法战时税政》（德客老斯〔Robert Knaus〕著，王光祈译，中华书局1934年第1版）第25页至第127页。

年之中尚继续沿用未改，但其内容腐旧，不堪作为改造之基。直到战事最末一年之岁首，始行征收一种法国式的普通“收入税”。其内容与战前喀鲁氏所计划者相同（但当时颇为一般人士所反对而未实行)。现在“收入税”虽已施行，在较原来所定之低微税率仅仅略为增高，仍不能大收效果。又法国“战时获利税”一项，就其结果而言，更可称为完全失败。

“遗产继承税”对于此次战时财政并无何等巨大补助。一九一八年此项岁入略有增加，但亦仅仅超过战前少许而已。德国“遗产继承税”系一九〇六年所规定，内容极属不备，欧战之时仍旧沿用，未曾加以修改。英国“遗产继承税”系一八九四年及一九一〇年所颁行，其内容颇称严密，因此欧战之时未再加以修改，尚有其相当理由。但英国此项税收在欧战之时亦复未有进步，若与其他战时税收相较，更是由百分之十三点八退至百分之三点四。其在法国方面，则于一九一七年年底之时曾新添“遗嘱税”一种，对于“遗产继承税”一项亦有相当效益。

德英法三国在欧战之时，尝施行一种特别形式之“直接税”，即“战时获利税”是也，此项税则在税史中实为一种新发明。不但“交战国”方面各自采用，即“中立国”方面亦间有采用之者。余于前文讨论三国税政之时已尝声明，“战时获利税”之动机，不在财政理由，而在道德观念。当大战初开之际，国内经济界虽一时陷于停滞现象，但不久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时新局渐能适应，而经济状况亦复陡呈活象。在开战后半年之中，其活动范围尚只限于“军事工业”一项，但其后逐渐扩至其他工业商业及农业。到了战事末年，殆无一种稍稍重要之工业未尝直接的或间接的为战事工作者。其结果，工商各界营业一旦突进，得利至为宏厚。诚然，吾人所不应加以忽视者，即全国生产事业一旦改为军事性质，实与一般主持业务者之努力、计划、意志，换言之，即当事者之办事能力有绝大关系。因此，多获一点利益亦不为过。而且承办政府大宗用品所获之宏利，并非资本家一方独得其惠，所有介绍人、职员、工人殆无不利益均沾。但吾人若就另一方面观察，尤其是从纯粹介绍事宜方面观察，彼辈从中获利之巨，实远过于其所出劳力。因此，一般居民对于此种不劳而获大利之人异常忿恨。其实就今日资本经济时代而言，投机之事既不能免，则彼辈纵获大利，旁人亦未尝不可忍受。惟此次大战既只有少数人士独得大利，而大部分国民却陷于万分困苦状况。因此，感情方面，极不愿在此异常残酷之战争中，在此千万困苦家庭以及千万悲惨孤寡之下，独见他人乘机获得大利。是以国家对于彼辈因战获利之人，不能不采用一种征税手段，至少将彼辈利得之一部分依然还诸社会。盖彼辈所得利益，原系出自国家所征诸人民之税款及公债，而且若无千百万同胞在前线为国家争生存，则彼辈势将无所依托，不能安然得此巨利故也。

当时一般反对征收“战时获利税”者所持之主要理由，系以为国家征税政策之中，

不宜含有感情作用在内云云，但吾人如果承认此种理由，则近代征税理论所根据之公平原则，亦将为之动摇。盖一国政治，无论其为拿破仑之世界帝国、俾斯马克之统一政策以及鲁德斯（Cecil Rhodes）之非洲帝国，均有一种道德目标。至于其他一切精细打算，只可称为手段而非目的。对于国家财政政策，固应如此，对于“战时获利税”问题，亦复应当如此。如果吾人对于此项主张认为不错，则关于如何实行之方法，自不能不加以讨论。

实行此税之第一难题，实为“因战获利”之定义极不易下。盖当时国内全部经济生活，无不直接的或间接的与战事有关。因此之故，欲核定该项利得是否由于战事一层，实万难办到。其结果对于“因战获利”一语，亦不能不改用“战时获利”一语以代之。同样，对于获利之经过，或为“不劳而获”，或为“因劳而获”，亦复不再加以区别。因当时各种军用物品之交易，获利至巨，一一加以审查，至为不易。上述各种难题，既已搁置不理。于是该税之唯一对象，只是一般“战时获利颇丰”之人而已。

关于征税方法，共有二种：一为对于“过分收入”，一为对于“财产增加”。两者之中，实以征收“过分收入”之税为最善。盖“收入”乃系原始基础，而“财政”则仅系一部分未被消费之“收入”余款所聚集。因此之故，战时“收入增加”，必须立刻将其征课。英国方面对于“过分收入”之税，系以该国素有之“收入税”为基础，手续既极简单，税率亦极严厉。其结果，国家此项岁入，成绩极属可观。反之，德国方面因受一九一三年“财产税则”之引诱，遂于一九一六年初次制定法律征课“个人利得”之时，特取途于“财产增加”。其结果，一部分未曾集成财产之百万金钱，任其中途散失，国家毫无所得。而且当时规定一切奢侈珍品皆应列入“财产增加”之类云云，在事实上只算一种纸上空谈，愈使一般战时获利之人更为浪费无度。此外，德国“财产增加税”之征课期间，系分为数年，尤使一般蓄意漏税之人得有充分时间准备。当时德国政府采用“财产增加税”之理由，系以为德国国内各联邦政府原有之“收入税”情形极为复杂，难将各人战前平均收入之数目查出。而且德国政府深虑如果实行征收“过分收入”之税，将使公债事宜大受影响云云。按上述两种难关并非绝对不能打过，吾人可于一九一八年所颁布之“战时获利税”法律见之。盖该法律对于征税方法最后仍是根据各联邦本地法律，采用一种“过分收入”之税故也。德国所收“战时获利税”共有七十三万万马克，为数实属可观，但较之英国“战时获利税”（共收一百三十万万马克左右）却仅有一半以上。至于法国方面，从前原无“普通收入税”之施行可以作为“战时获利税”之基础。因此之故，法国“战时获利税”系建筑于“营业税”之上。对于“过分红利”征缴其百分之五十。但该项法律规定极为宽松，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之时，只收得原来估计数目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而已（七万一千四百万法郎）。

"战时获利税"之性质，既以战时为限。因此，征税标准亦以战前战时收入之比较为断。为避免过于严酷起见，对于战前收入数目宜仔细审定。在德英法三国之中，计算"标准红利"之法，大都以开战前三年所得之平均红利为准。此外，对于公司资本应得之六厘至八厘利息，亦复准其扣除不算。

为达"战时获利税"之目的计，对于"免税最低额"之规定宜愈低愈好。只要征收之数，虽当此税务人员缺乏之际，亦不嫌所得过少徒费手续而已。盖对于一般乘机获利之小资本家亦不使其漏网，实属甚为正当故也。至于免税之最低额，在德国为三千马克（一九一八年），在法国为五千法郎，在英国为二百镑。

规定税率之时系以"过分收入"为前提。换言之，对于此项收入虽用近于"没收"之税率亦无大伤故也。英法两国之税率，其最高度约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而德国之税率，则到了一百万马克之时始课以百分之四十。就"战时获利税"之特别性质而论，是否应采分级征税之制，一如德国（全系一种理论的办法）以及法国一九一七年（比较简单一点）所实行者，实属一个疑问。德国方面因为税率规定太低之故，特用他法以为弥补。不但对于战时所得"过分红利"课税，甚至于从社会情形立论，所有战时财产理应较之战前减少，因此特行一种"预防财产增加税"，对于一切财产之未较战前减少十分之一者，亦须一律课税。此项方法，实超出英法两国所采办法之外。如果德国立法完备，此项方法自有其相当价值，无奈德国"战时获利税"之条例规定太不完备，以致此项方法徒具一种形式而已。

如果能将当时纳税人之范围再行加以扩大，当更有益。其范围宜包含一切职业，不宜仅仅限于公司及工商方面。当时德英法三国对于农业界所得之巨大红利完全置之不问，实属一种错误。此外，对于自由职业工人、官吏所得之红利，亦有一律课税之必要。惟在前线作战所得之红利，理应加以除外耳（在后方及兵站所得之红利，仍不得除外）。

在德国"战时获利税"中关于减免之规定，有一条值得注意者，即因遗产继承而增加之财产得以免税是也。惟以财产微少，且在战场阵亡者为限。反之，疏远亲戚，因一人阵亡而侥幸获得之财产，则不在此例。此种因战获利之事，在德国继承法如彼不备之中，实有特别加以重税之必要。

"交通税"在战前德英法三国内已甚为进步，或为补助"普通收入税"之用（按此项"收入税"对于"财产交通"一层征课甚为不严），或为代替"进款税"之用（按此项"进款税"对于"财产交通"一事完全不课）。"交通税"之性质系属于"营业税"一类。因为国家方面假定当事人双方之中有一方系因此而得进款。究竟实际是否如此，初不详加研究，只是条约既成，即须依法缴纳而已。又"交通税"对于战时财政并无何等

重大补助。德国方面一九一八年曾制定内容广大之印花税一种，其后并将其逐渐增高。英法两国则将旧有“交通税”条例略为修改，以便增高其收入。

时　期	德国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英国以百万金镑为单位	法国以百万法郎为单位
一九一三年	二五六·七	九·九	七五五·〇
一九一四年	一八二·三	七·六	五六七·八
一九一五年	一六六·三	六·七	三六七·二
一九一六年	三四〇·八	七·八	四二〇·六
一九一七年	六七八·二	八·三	五三三·四
一九一八年	一〇三八·六	一二·二	七二五·一

除征课“营业”或“占有”之税以外，对于“消费”及“应用”亦可将其课税。欧战时，各国关于“间接税”一项均大有修改。战前旧有税率大都加以增高，并有一部分大加修改。此外更添置新税若干。当时对于生活必需之品，虽格外加以宽免，但其余一切物品，殆无不设法供作战事之用。更加以因商业中断或停滞而引起之关税减收，愈不能不设法救济。德国受敌封锁，关税减收最巨（一九一三年收入为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万马克，一九一八年则减为一万三千三百万马克）。现在减少，尤感痛苦。英法两国增高关税，以谋国家岁入之增加，曾大收效果。而在德国方面，则以国民经济关系之故，不能见诸实行。

兹将德英法三国战时关税进化情形，列表比较如下：

时　期	德国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英国以百万金镑为单位	法国以百万法郎为单位
一九一三年	六七九·三	三五·四	七七七·九
一九一四年	五六〇·八	三八·七	五四八·三
一九一五年	三五五·九	五九·六	七三七·九
一九一六年	三四八·三	七〇·五	一三六六·四
一九一七年	二三二·七	七一·二	一四八二·八
一九一八年	一三三·〇	一〇二·八	一一五七·三

在“消费税”中，以销行最广之刺激物酒、烟两种为最重。兹将德英法三国此项税收进化，列表比较如下：

（Ⅰ）德国（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税　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啤酒税	一三〇·〇	一三〇·七	七八·五	五五·二	二〇·二	三三·九
白兰地酒税	一九三·八	二二八·〇	九五·六	七三·二	一九·六	二九·二
葡萄酒税	九·五	一〇·〇	三·〇	一〇·六	一四·三	一八九·九
烟草税	五四·〇	六八·三	七九·七	二〇二·九	四一九·五	六九九·四

（Ⅱ）英国（以百万金镑为单位）

税　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啤酒税	一三・六	一五・八	三三・七	三一・五	一九・一	二五・四
白兰地酒税	二九・四	三〇・五	三〇・二	二一・三	一二・九	二五・二
葡萄酒税	一・一	一・〇	一・〇	〇・八	〇・八	一・四
烟草税	一八・二	一九・三	二五・七	二七・三	三三・二	四六・二

（Ⅲ）法国（以百万法郎为单位）

税　名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啤酒税	一六・〇	一一・三	七・二	九・六	一七・五	一八・六
白兰地酒税	三九九・三	三三五・五	二五七・七	二八九・四	三二〇・〇	三三九・八
葡萄酒税等	六五・九	五八・八	七七・〇	五九・六	一一四・〇	一九三・三
烟草税	五四一・九	五一七・〇	五〇二・三	五六〇・五	六四六・三	六三六・三

英国方面在开战之后，对于酒烟两税旋即将其增高。因此开战后三年间，酒烟两税之岁收均有增加。惟白兰地酒税，在战前业已加至最高程度不能再行增收，是为例外。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间，因为限制消费之故（潜艇战争），酒税收入为之大减。惟烟税尚能保持其增收趋势。在战争最末一年，酒税收入复趋旺盛。其在德国方面，酒税收入特别减少。关于啤酒税收之减缩，并非由于消费减少，而系由于征税方法。盖征税标准系以酿酒所用麦面多寡为转移，而德国自开战以后限制麦曲产额，因而酿酒用额亦大为减低故也。直到一九一八年之时始行议改啤酒及白兰地酒征税之法，并新添葡萄酒税一项。至于烟税之大行增收，则完全由于纸烟一项系采“出厂税”，甚能适合当时广大销场故也。其在法国方面，“刺激品”之税收在开战后两年之间甚为减少，但其后增高税率，到了战争最末一年，渐恢复战前收入原状。

第二种“消费税”，可用“殖民地产品税”一名以括之。例如咖啡、茶叶、可可、雪果拉德、南方果品、香料之类。此项物品，虽非如酒烟两种之完全属于刺激品，但较之日常必需品如面包、肉类、盐、糖之类，终居次要地位。此种“殖民地产品税”，在战争之际，英法两国均迭有增加。而在被敌封锁之德国，却无从问津。

从社会政策立论，糖税、炭税、灯税三种，均非良税。因此三物在近日生活中，已成为必不可少之品故也。重加糖税一事只限于英法两国。至于炭税一项，则系德国一九一七年特产之物（一九一八年之收入为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万马克），其性质为一种“普通营业税”，若就广义言，乃系一种“消费者之人头税”。吾人于讨论德国战时税政之时曾非难之。灯税一项，德法两国在战前即已有之，英国则于战争之时始行新置。

德国一九一六年之“交易印花税”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易税”，法国之“金银流通

税”，对于交易全体加以重大担负，实无异恢复从前之“普通课物税”（General akzise)。其结果成为一种“普通消费税”，而不以主观能力及品质特色为标准。因此，从经济及社会立论，皆不得称为良税。其采行之唯一理由，只是能够满足财政上之大宗需要而已。关于“普通交易税”之良否，瓦格泥氏（Adolph Wagner）于其评论“消费税”之时曾有言曰，此项税则不能称谓真正良好，只可视作相对的不甚恶劣而已云云。至于此项税收，其在德国方面远不如其所期，到了一九一八年之时，其收入仅有一万五千零五十万马克左右。

对于货物及旅客之交通，则将现行运输及铁路章程加以增改以征课之。譬如英国一九一六年之客票加价，法国一九一八年之运输加价，以及德英法三国之邮电加价是也。德国一九一六年之客票税，旋于一九一七年制定“客车货车交通税”一种以代之。

欧战时，在“消费税”中尝添新税一种，是为“奢侈税”。而且德法两国系将此税附在“普通交易税”之中。英国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即尝议行“奢侈税”，但直至战事终结犹未见诸实施。营业及占有之“直接税”愈为轻微，则此项“奢侈税”之征收亦愈为必要。盖“消费税”一项，既以下层阶级之担负为最重，“奢侈税”一项正所以补其不足也。过分消费，每使战时财政受其损失。从国民经济上观之，实为一种不良行为。而且引起国中贫穷之人群相恨妒。但征收“奢侈税”时，于分类上甚感困难。盖奢侈定义殊欠明了，必须逐件解释。关于“绝对的”奢侈品一项，德英法三国所规定者完全相同。至于用品之超过一定品质始视为奢侈者，必须先行规定一种法定价值以为标准。当此金钱价格动摇不定之时，每令人发生武断定价之感。此外，买主往往因为能够识货之故，喜买质地佳良之物，而彼反受奢侈重税之罚。而且每每有关文化之奢侈物常受重税，而摩登之奢侈品反逍遥税外。又奢侈税之征收手续既极困难（按此项税则之采用，多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关系，少由于财政的理由)，因此德法两国此项收入，均极不多。

又“娱乐税”亦为“消费税”之一，英法两国系于一九一六年采用。对于一切娱乐之入场券皆课以一种娱乐税。在此一般生活困难之时，此举实属正当。惟收入不多，对于财政无大补益耳。

吾人于讨论德英法三国战时税政终结之前，必须从社会方面立论，对于各种税则及于民生之影响加以评断。就国民经济而言，对于各税负担虽然可以胜任，但其分配方法，却因采用税项种类不同之故，亦复各不相同。在此“交通经济”之中，当然纳税之人均思将其所缴之税转而嫁与他人，或者改良生产方法，换言之，减少其他生产费用，以便调剂其所纳之税。此种嫁税情形异常复杂，而价格之确定亦复不易审查。往往嫁税之举，因供求原则之故，仍循环一周落于初次纳税者之头上。而且嫁税结果，每每本来不甚公平之税，可以变成公平分配之税。经济自由主义派主张自由竞争，以便纳税担负

自然调剂。但该派此种主张，正与其所抱其他社会问题之见解一样，不能实行，只是利于大资本家，而有损“经济弱者”。因此彼辈所抱嫁税结果自然调剂之乐观态度，亦为事实所不许。甚至于因为嫁税之故，不公平之程度更往往为之增高。如果一国当局不甘于作一“更夫国家”（Nachtwächter Staat），则其抽税政策除顾及国库收入外，并须兼顾社会方面之公平担负。近代赋税学说对于此点，无不加以承认。欧洲各国税政进化，亦无不循此途径。惟嫁税情形之复杂已如上述，因此吾人对于嫁税之可能程度，只能用一种揣测方法，依照嫁税可能程度之大小，将其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种。吾人在本文之内，既不能对于各税之嫁税性质一一再行加以研究。因此下面讨论仍以通常分类之法为准。即“直接税”之内容，系包含一切主观的客观的“收入税”，尤其是“战时获利税”、“财产税”、“遗产继承税”等等。“间接税”之内容，则包含各种“消费税”。在“直接税”中，嫁税之机会甚少；而立法者之意，亦不愿其随便嫁与他人。反之若“间接税”，则立法者之意准其嫁与他人，而在事实上亦复如此。由上述各点观之，“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定义，可谓广泛不定，只能算作一种相对的而已。又“直接税”一项，并非如一般理论家所称为最良之税。盖“直接税”所具之“不能嫁税性质”，现在愈为人所怀疑故也。反之，一般社会主义者用以煽惑民众之标语，所谓“间接税”为无产阶级所负担，“直接税”为有产阶级所负担云云，亦系同样错误。盖“间接税”一项，并非完全嫁与消费者方面。一般劳动阶级，尤其是具有组织之工人团体，可以要求增添工资以调剂其因消费税而负担之高昂物价。究竟嫁税之范围如何，实无从加以确定。

又一般赞成“消费税”者之意见，以为消费者自己对于消费之数量可以自由限制或加增以资调剂云云，亦复极与税理不合。即或消费之物并非必需之品可以自由放弃，而国家坐视贫者限制享受，富者恣意享乐，亦非公平之举。其结果“抽税公平原则”将因“间接税”之故而陷于动摇，盖收入少者比较收入多者受损特巨故也。日常必需品之消费税，其影响常为收入愈少者而担负亦愈多。而且货物品质，既未另以特别考虑，因此富者间接受其利益。此外“间接税”对于人口政策亦复影响不良。因一人养活多人，其消费数量既大，而大家庭之担负亦比较沉重故也。“间接税”之重担既压在一般居民身上，于是彼辈生活情形、生产能力皆不免因而受损。更加以经济交通常常受其妨碍，而征税开销亦较之征收“直接税”时为大。

“间接税”虽有如彼许多缺点，但在战前却甚发达。即在战时亦复尽量采用，其理由全在国库收入一点。盖国家支出，在战前既已浩大，在战时尤为猛涨。对于“消费税”一项势难加以放弃。而且单独采用“直接税”一种，亦有许多缺点，以至于人民无力担负。如果“直接税”过重，势将使“漏税”及“资本外逃”之事益为滋长，以作暗抗国库之手段。此种手段，实使“国家课税依照能力大小”之理想不能实现。惟吾人对

于“直接税”与“间接税”之绝对价值虽加以怀疑，但在现行税制之下，对于该两税相互间之关系，却不能不加以研究。吾人应须注意者，勿使两税流于独占优势之弊，务使两者作用常能彼此调剂。从经济的社会的立场看来，“间接税”之缺点，终比“直接税”之缺点为多。因此偏重“直接税”似较偏重“间接税”为善。少数资产阶级因战争而财产大加，亦实有严行将其征缴之必要。下面所列开战前一年与战争最末一年“直接”“间接”两税对照表中所表出之两税进化情形，吾人亦须用此眼光加以观察。至于“交通税”一项，就嫁税关系而论，极不一定。因此特为另立一门。又各国统计数目极不易于比较，下列一表，须加以若干保留条件。

德英法三国“直接税”“间接税”“交通税”三者之关系表（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八年）：

（Ⅰ）德国

种　类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百分之几	以百万马克为单位	百分之几
经常收入	一六九二·六	一〇〇	五九五〇·五	一〇〇
直接税	六二·四	三·五	二五七七·四	四三·四
间接税	一三七六·一	八一·三	二八四五·七	四七·九
交通税	二五四·一	一五·二	五二七·四	八·七

（Ⅱ）英国

种　类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以百万金镑为单位	百分之几	以百万金镑为单位	百分之几
经常收入	一六二·九	一〇〇	七八四·一	一〇〇
直接税	七八·一	四七·五	六〇九·七	七七·二
间接税	七四·九	四六·〇	一六二·二	二一·二
交通税	九·九	六·五	一二·二	一·六

（Ⅲ）法国

种　类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八年	
	以百万法郎为单位	百分之几	以百万法郎为单位	百分之几
经常收入	四〇九五·六	一〇〇	四二一四·八	一〇〇
直接税	一一四四·三	二七·八	一六六〇·一	三九·一
间接税	二一九六·三	五三·五	一八〇三·一	四三·一
交通税	七五五·〇	一八·七	七五一·六	一七·八

前面曾经叙述，德国战前财政系片面的建筑于“关税”及“内地消费税”之上。欧

战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关系始渐渐改善，尤其是“战时获利税”之收入极为丰富。不过“间接税”之内容亦复同时腐化（譬如新置“炭税”及“交易税”两种，“进口税”之退步，刺激物品之税率过低之类）。其在英国方面，战前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一项为其中心，“直接税”与“间接税”之关系极能调剂得法。在大战停止之时，大约国家岁入四分之三出于“直接税”，四分之一出于“间接税”。至于法国方面，在欧战停止之时犹未恢复战前岁入数目，惟“直接税”较之战前增加，“间接税”则大为退步（按法国战前消费税不免过分发展之弊）。

吾人对于经常收入，尚有一事未加讨论，即官营事业之收入是也。就战前财政而论，英法德（德国各联邦政府不算）三国之官地收入并不重要。同样，德法两国之“国有铁路”收入亦复无关宏旨。至于英国则根本上未有“国有铁路”。此外德英法三国之战前邮电收入，盈余本来甚少（因顾及民众利益，取费甚廉故也），到了欧战之时，国有交通机关之开销更是入不敷出，年复一年。其原因为铁路邮局均须服役于战事，而且所需人工及材料，亦因币价跌落物价腾贵之故，支出大为增加。同时，所定运价寄费又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其后各国对于运价寄费虽逐渐增加，但所加太少，而且加得太晚，不能打出难关。关于各国对于邮政电报电话以及货车客车加价情形，余已于讨论三国税政时分别述及。由此观之，官营事业对于战时财政，实无何等关系。

国防与潜艇[①]

保尔 著 王光祈 译

译者弁言

本书系译自德国海军大将保尔（Bauer）所著之《潜艇》（Das Unterseeboot）一书。原书系一九三一年出版，共分六篇。第一篇，潜艇在舰队中之位置。第二篇，潜艇种类及其性质。第三篇，潜艇会同舰队作战。第四篇，潜艇破坏敌国商业之战争。第五篇，潜艇在封锁区域内之活动。第六篇，潜艇之未来希望。本拟全译，适因学校功课太忙以及病后身体甚倦之故，译成两篇之后，竟未能将其继续译完；现将已译成者整理寄回，题曰《国防与潜艇》，编入"国防丛书"，意在促起国人对于海防事业之注意也。海防为国家百年大计。吾国海部年耗巨款，并尝派要人出洋考察；对于此类书籍，似宜令人选译以资参考，不应直将此事完全听任一般计字卖文的书生为之也。

保尔大将在欧战前原系德国第一潜艇大队之队长。迨欧战开后，德国潜艇大显神通，忽占特别重要位置。保尔大将亦以丰功擢任德国潜艇总司令，直至一九一七年夏季为止。故书中所言，皆系著者亲身经历所得，迥非空言可比。

飞机潜艇之在近世战争中已成为十分重要之利器，殆毫无疑义，但二者亦各自有其短处。仅仅扩充飞潜两种，固不能遽谓已尽国防之能事也。余既译德人所著《空防要

① 本书为《国防丛书》之第三种，上海中华书局 1935 年 1 月出版。

览》一书，对于飞机战争之优劣各点，已略有介绍。兹再拨冗译就此篇，以明潜艇构造之得失。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七日王光祈序于德国来因河畔波恩大学

著者导言

“海上霸权”之意义有三：一为控制海上航路，二为统辖海底电线，三为垄断海中产物。

三者之中尤以“控制海上航路”一事最关重要。所有从前一切重大海战皆为争此而起。其次，“统辖海底电线”一事亦复十分重要，吾人可于上次“世界大战”之中见之。盖当时英国方面可以利用海底电线与美自由通电，反之，德国对美通达消息之法即极费周折且不可靠，其结果德美两国邦交不免大受影响。其后虽将“无线电报”加以扩充，但对于根本问题仍无丝毫裨益。因两国文件之往还如欲安全可靠，并不受人窃阅，固只有海底通电一种办法故也。至于“垄断海中产物”一事，现在尚只限于海中鱼产。在已往之各世纪中，纽芬兰（New Foundland，美洲东北岛名）及斯克兰（Skane，瑞典南部）两处因为捕鱼争执之故曾引起激烈海战。究竟将来海中产物之价值能达至何种程度，此实为未来之问题，此时殊不必加以讨论者也。

统而言之，所谓“海上霸权”者，无他，即垄断海上一切权利，不许敌人稍稍染指是也。

惟“统制海洋”一事，非如“陆地战争”之节节胜利，渐将敌土“逐段的克服”（按海洋之上，既无所谓占有权，亦无所谓克服），乃是既将敌舰全部歼灭或围困港中之后，对于海洋为“整个的统制”。但在他方面，“统制海洋”一事又不如“占领敌人土地”之具有绝对性。换言之，“统制海洋”一事，往往难免“一时的”或“某处的”限制，常常具有突被敌人侵入或攻击之危。

“统制海洋”之效用，系在控制海上重要航路，压迫敌人海上交通，保护自己海上运输诸事。此外，“海上霸权”及其利用之法，实具有一种重大的、关系全局的军事价值，有时此种军事价值直与全局成败有关。因此之故，凡系海军形势失利之国家，或系海上实力向来不足之国家，对于敌人此种海军优势及其效用，自不能不设法抵抗，凡有

可以应用之武器，无不悉行应用焉。

其在具有“巡洋舰”“巡洋助舰”“战斗舰”之国家，如果一旦与敌发生战事，只要自己舰队能在敌人海上势力范围之内支持一日，当然可以向其抵抗一日。

至于武器中之真足以袭击敌人“海上霸权”者，则只有两种：一为“潜艇”，可以潜行侵入敌人势力范围之内。一为“空中武器”，可以飞到敌人舰队之上。“空中武器”之用途现在虽尚有限，但将来技术日新，此项武器在海上之势力亦将随之日增。不过此项空中武力之特质，业已超出真正海军性质之外，此处姑不置论。现在所述者，只限于海战中之“潜艇应用”一事。

其所根据，系以普通战争尤其是海上战争之主要战术为准。而且此项战术之基础，并不因有潜艇一物而为之动摇。

惟“潜艇应用”各节，实为前史所未有，只能根据上次世界大战事实作为讨论材料，尤以中欧各国中之德国与此极有密切关系。

因此，著者恰以德人资格之故，依据上次世界大战之繁重材料，对于“潜艇应用”一事之普通原则加以详细解析。惟上次世界大战，竟使潜艇一物忽占如彼重要位置之特殊情形，此后未必重见。是以余只用“依据”二字支撑，请读者注意。

当欧战之初，英德两国海洋舰队彼此均极谨慎，故无海战发生。是时潜艇制造虽然尚未完善，但德国方面却认为可以用之于战事，而且实有必要。于是潜艇一物日有进展，未几，竟成为一种普遍的武器。其后，所有德国海战之中（至少迄至一九一六年止之海战以及一九一七年以后之海战）几乎无一次不有潜艇参加。此外，更因此项新式武器常使敌人难于对付之故，愈促德国潜艇政策加倍发展。

倘若吾人今日对于“潜艇应用”一事加以研究，切不可单独根据当时欧战之特殊情形立为基本原则。盖如此，势将对于潜艇一物之价值难免地过于高视之虞故也。

至于一般亲见当时潜艇功效因而提倡潜艇政策之人，闻余此言或者不免失望。但吾人必须知道，大凡一种新式武器，最初每每受人欢迎，大得效果，继而却渐渐被人故意反对，到了最后，此项武器与时俱进，却又渐渐为世公认，将其列入正式武器之内。

潜艇之命运，殆亦如此。欧战之时此项武器曾有机会大显神通，但其后因受政治的、国际公法的阻碍之故，致使德国潜艇未能完其使命。

虽然如此，今后倘遇战事发生（或者全部分皆为海战，或者只有一部分为海战），而且具有应用潜艇之各种先决条件，则此项武器仍将占十分重要位置。

目　录

第一篇　潜艇在舰队中之位置

（一）海战原则与潜艇

在近代短时间内，世人对于海战一事曾屡次发生疑问：即近世科学发明日多，是否将使历来海战原则从此根本推翻？例如汽船之出现、“铁甲舰”之创制以及“鱼雷”与“鱼雷艇”之发明等等是也。迨其后详加探求讨论之余，大家仍然归到旧日海战原则，一如英国数百年来直至此次欧战时节所沿用者。北美海军大将麦寒[①]（Mahan，生于一八〇四年[②]，死于一九一四年）曾将此项原则明白解释如下：“所谓海战原则者，即应用战斗舰队以争夺海上霸权（至于该项舰队如何组织一事，可以置之不问）。既已夺得之后，须尽量将其利用，直至敌人方面深觉自己已受或将受之损失远较战胜国方面所提出之投降条件为严酷而后止。”惟在事实上，各种海战实际经过情形并未尝尽如上述原则，而战胜国方面亦往往未能立将控制全球海洋之权全部握在手中，甚至于有若干海区永远不能侵入，敌人方面仍能于某时期内或某区域内保持其海上自由。不过此种现象终为偶然的局部的，对于上述海战原则仍不能将其根本推翻。

至于此种海战原则之开始动摇，实以潜艇出现之时为起点。

当潜艇之初成海军利器，尤其是欧战方开时之迭奏大功时，曾使许多著名海军专家竟自相信，潜艇一物之发明，将使所有水上舰队从此全部废除，另开一种海战之新纪元云云。格鲁斯（Groos）氏于其所著之《欧战中之海战原则》书中，曾引当时挪威著名海军大将某氏之言曰：“英国封锁北海东海之策略从此毫无用处，盖德国潜艇可以暗中穿过英国舰队阵线，远至德国海军根据二百海里以外，直到英国数世纪来所占有之英法海峡以内故也。昨日英国巡洋舰队忽被德国潜艇暗中将其舰底击穿之事，明日未尝不可见之于英国全部海洋舰队，北海东海方面势将不久完全脱离英国铁甲妖魔之封锁。一种新纪元，一种新战术，行将从此开始。对于一切小国，尤为十分重要，因彼等对于此种价值既不甚贵、攻击又颇凶猛之海中武器，可以有力多造也。”

---

① 麦寒：今译作马汉，即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论的创立者。

② 原文如此，有误，应为生于1840年。

（二）潜艇并不能控制海洋

或谓潜艇之责虽不在争夺“海上霸权”，但自开战之始，即行具有一种“控制海洋”之权威。其势力虽不能达于辽远海洋，但在敌人势力雄大之主要海战区域以内，却具有横行一世之概。盖潜艇一物，既可以妨碍敌舰行动自由，又可以损害敌人贸易事业。如果敌国方面十分依赖海外交通为生，同时潜艇向其舰队商船攻击又极激烈，则其结果，可使敌人方面陷于万分危难之境。

虽然，吾人对于此项潜艇效用仍不能遽呼之为“控制海洋”。盖潜艇一物，虽可以尽力损害敌方，但对于本国“海外交通”之自由，却未能因此获得。换言之，潜艇之功用，不能谓为“控制海洋”，至多只能谓为“潜艇可将敌人海上霸权随时随地加以戳穿”而已。如果吾人对于近来一般论坛上所提出“潜艇一物是否能将历来水上舰队势力根本加以取消”之问题欲有所表示，则关于“潜艇不能控制海洋”一事，势非先行有所了解不可。

假如吾人观察已往数世纪之海战历史，尤其是第十八世纪之海战情形（按现在之不列颠世界帝国，实由该世纪之海战所造成），则自海战成为全局胜负关键以来，所有设法阻止敌人海外交通之举，殆无不与“武装商船战争”、“殖民地战争”尤其是“保护本国之海外交通”诸事同时并行。最明显之例，殆莫如拿破仑封锁大陆以害英国经济生活之举。当时英国方面之海外交通受阻，虽然竭力利用素有之“海上霸权”亦复不能脱离危机。至于今日，则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与海外输入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如欲断绝敌人之海外交通，则对于自己之海外交通尤须先行设法保全方可。所谓“潜艇控制海洋”者，纵能损害敌人商业，获得最大效果，然而对于战事全局终不能尽量应付，上次欧战可以为例。

（三）潜艇功用只能使敌人海上霸权发生困难情形而已

凡欲享有“海上霸权”资格之国家，必须其力能使自己所辖海洋之内一切敌国海军武器不能丝毫存在方可。敌国水上舰队，可以用目窥得，比较易于对付。至于水雷与潜艇两物，虽然比较难于应付，但亦并非毫无对付之法。惟探寻敌人此项武器所在之处以

及将其解决之道，颇与从前海战所用方法不甚相同而已。

因此，上文所谓“潜艇可以戳穿敌人海上霸权”一语，在实际上仍嫌不切。盖“戳穿”二字，“具有受伤”之意故也。至于潜艇之真正功用，只在能使敌人海上霸权发生若干困难。其实就历来海军武器进化而论，盖无一不使“海上霸者”地位时常发生困难（至少在某种期间之内）。譬如“铁甲舰”之发明，直使从前各种“非铁甲舰”一旦失其价值。“鱼雷”（Torpedo）与“水雷”（Mine）用作防具及武器之后，颇使“海军弱国”受益不少。

自潜艇出现之后，尤使“海上霸者”发生极大难关。但在他方面，世界各国需要海外输入之程度既然日高，同时“控制海洋”之利益当然亦复随之日增。大凡握有“海上霸权”之人，对于战事全局胜负以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组织，无不独占优势。其结果，一般欲握“海上霸权”之国家，当然不顾一切难关向前进取，以免落居人后。

由此观之，将来世界海军作战计划，大体上当仍与从前所用者无大区别。惟实行之时，其中有一部分将因潜艇影响之故不免稍为变动，此则吾人亟宜从事加以研究者也。

（四）舰队职务之分类

假如吾人对于海战全部范围加以仔细分析，则可寻出许多职务能由潜艇担任，或者甚至于必须改由潜艇担任。此外，尚有其他某类职务，如得潜艇合作，亦复极有益处。但海战之中亦有若干职务，实为潜艇一物所绝对不能担任者。

吾人研究此项问题，当然只能以欧战时德国所用潜艇种类，以及现在世界海军列强尚在采用之潜艇模型为限。至于最近的将来，能否新建一种体积较大之潜艇可以担任其他特别职务，余将于本书之末特立专篇讨论[①]。但此种未来潜艇问题现刻尚在幼稚时代，殊不必加以讨论，以免增重吾人此际研究工作。因此本处所讨论者，只以现存潜艇种类为限。

吾人于讨论“潜艇在舰队中所处地位”一事之前，应先将舰队各种职务略为分类，以便醒目。

按舰队职务可分四种：（1）争夺海上霸权，（2）利用海上霸权，（3）攻击敌人已得之海上霸权，（4）特别职务，如运输本国军队、攻击敌人海岸以及海外作战之类。除上

① 王光祈的译文中没有此篇。

述四种之外，吾人对于“本国舰队组织大小、与他国缔结联盟问题”之关系，亦不能不加以讨论。

（五）争夺海上霸权

关于争夺海上霸权之事，无论现在与从前均由水上舰队担任。而且此项水上舰队之组织，或纯由战斗舰所组成，或纯由巡洋舰所组成，或由战斗舰与巡洋舰两种合组而成，均无不可。照自然进化而言，当以战斗舰为最适宜，盖此项战斗舰之战斗力与体积无不日形扩大，直至达到最高限度而后止。或者其间被迫不得不向下减缩，亦非必无之事。惟据经验所得，则各国互相之间可用缔结条约之法，以使此项进化不必呆循自然途径而进，对于各国之特殊情形与特别需要可以互相考虑与容忍。不过无论将来水上舰队之组织如何，而此项水上舰队之必须存在不能废除，殆毫无疑义。而且此项舰队组织之内容，当以其力确能争夺海上霸权为准。而潜艇一物在此争夺海上霸权之战事中，则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武器”而已。

至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间，德国潜艇在北海北部尽将英国该处舰队一律驱出北海之效果，乃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今后当不致再有同样情形发生。无论如何，必不致再有规模如彼宏大之同样情形发生。盖水上舰队现在业已学得防御“潜艇攻击危险”之法。惟潜艇方面如具有下列（甲）（乙）两种特别情形，则向水上舰队举行攻击之事可有若干希望。（甲）假如得着意外机会或者设有良好侦探，以致潜艇举行攻击之时确占军事优越形势；（乙）假如敌人“铁甲战斗舰”（Linienschiff）因为所负攻略使命十分重要之故，虽蹈对方潜艇暗袭之险而不辞。譬如一九一五年英法舰队攻打达旦纳尔海峡（Dardanellen，译者按：在地中海方面）一事（译者按：此役英法共失“铁甲战斗舰”四只），以及“胜利”（Triumph）“威严”（Majesty）两只“铁甲战斗舰”为“第二十一号潜艇”击沉之举是也。至于潜艇自身独力直向水上舰队开战之事，希望甚为不多。即或敌人方面亦以潜艇一物为争夺海上霸权之具，亦复不能因此促进潜艇效力。盖双方潜舰结队作战一举，实为万无之事。因此之故，海军强国如欲建造潜艇之时，不能以对方潜艇数目多少为其标准，而应以自己海军作战计划所需潜艇数目多少为其根据。

由此观之，争夺海上霸权之举，宜以水上舰队为之，潜艇一物只能从旁协助而已。因此之故，大凡一个海军国家如不甘愿只用潜艇一物暗入敌人势力范围实行破坏之举，如不甘愿只用潜艇一物密据海中军事要道以为抵抗敌人来攻之计，则水上舰队之需要情形，今日仍与昔日相同也。惟潜艇一物对于争夺海上霸权一事，当然亦自有其重要职

责，譬如结成独立队伍，密探敌舰情形是也。

（六）利用海上霸权

倘若战争国之一方既将海上某区霸权争得之后，于是遂用水上舰队将其防守，以收利用之效。关于此项职务之行使，水上舰队实远胜于水下潜艇。其法系将所辖一切航路以备自己安全享用而排斥敌人应用，其重要职责则在防备敌人潜艇前来攻袭，不过此项职责大体上仍以水上舰队负之。至于潜艇一物则只能在旁协助，或者单独前往某处要道，暗伺敌舰前来之时乘机加以突击而已。

（七）攻击敌人已得之海上霸权

潜艇主要职责，实为潜入敌人所辖海洋之内而向其攻击一事。盖此项海洋已在敌人势力范围之下，除偶然派遣“水上舰队”向其突击，或暗中派遣“巡洋助舰”出没其间外，早已无法侵入故也。在此情形之下，潜艇一物除了直向敌舰攻击之“军事职责”外，尚可从事“商业战争”（译者按：如击沉敌人商船以断绝敌人之经济后援等等是也）。此外，潜艇尚可担负其他种种特殊责任，此事容后再行讨论。

惟打穿敌人海上势力以谋自己运输安全之事，则非潜艇一物所能为功。假如敌人方面利用舰队封锁某部海洋以断对方交通，则对方固可利用潜艇将此“封锁战线”设法加以破坏或阻碍。如果潜艇数目充足，并可掩护自己之“破封舰”（Blockadebrecher）使其安全渡过，或容易渡过敌人火线。惟关于大洋之上自己运输安全一事，终非潜艇之力所能收效。

如果潜艇侵入敌人辖海之后所占形势极佳，则其功用之种类甚多，而效力亦极宏大。若专就此点而论，殆无其他武器可以起而代之。不过吾人对于此项潜艇功效仍不宜绝对加以信赖。至于潜艇从事“商业战争”之时，其作用正与其他各种经济压迫手段相同，必须经过某种长久期间始能见效。但在此长久期间之内，或者其他某部战局业已发生重大变化，可使潜艇方面所实行之商业战争，其效因而受阻，或从此大减。而况利用经济方法压迫敌人之举，根本上不能预有何等把握。上次欧洲大战，即系一种好例。

（八）潜艇之特别职务

关于装运大批军队之事，潜艇因其容量太小之故当然不能胜任，即掩护“装运军队”之举，潜艇亦复不甚相宜。反之，潜艇对于敌人装运军队之事却可暗中侦察，设法破坏。

同样，关于攻击敌人海岸一事，其情形亦复如此（译者按：其意系指潜艇攻击敌人海岸之举不甚相宜。反之，敌人来攻我国海岸之时，我方潜艇却可设法从中破坏）。

潜艇在某种范围内虽可以远涉重洋从事活动，但因其本身易于损伤毁坏而又不能自行大加修理，以及材料火药粮食饮水诸事时时均需外面接济之故，不免大受限制。因此之故，潜艇如欲远征，必须自具下列三种条件方可，即（1）开往前方、（2）对敌作战、（3）退回军备粮食接济之地是也。欧战中德国初派潜艇远涉重洋之时，即尝依上列三种条件办理。譬如一九一五年春季派遣“第二十一号潜艇”前往达旦纳尔海峡，以及一九一六年秋季派遣“第五十三号潜艇”前往北美是也。惟此种从事远征之潜艇，其建筑方法当与普通潜艇相异，而且附带种种难题。总而言之，此项潜艇必须体积甚大，内部设备以及武器安置均须特别考虑方可。

（九）与人联盟之资格

“联盟资格”（Bündnisfähigkeit）实为“海军强国”一种重大势力，用以对付其他一切海国（即一切对于未来世界政治具有重大关系之民族），惟此项资格之获得，仍以自己具有伟大“水上舰队”为前提。而且该项舰队必须具有相当海港及根据之地，以便作战之时能占优良形势。反之，倘若本国只有“潜艇大队”而无“水上舰队”，则甚难寻得盟友，即或寻得，亦只限于特殊情形之下。盖潜艇活动范围过于特别狭小，对于全局决胜之道不能具有把握故也。

且举一事为例。在欧战之前曾有德日两国联盟之机会，以使日本能在东亚方面自由对付英国，其先决条件，实为德国水上舰队之力足以牵制英国舰队，使其不敢离开欧洲一步；或设法阻其分队远征，以免危及日本。当时德国水上舰队亦实具有此项能力。反之，假使当时德国只有多数“潜艇”而无“铁甲战斗舰”，则对于日本盟国势将无法相助。

诚然在一国海军之中，所谓水上舰队与水下潜艇实际上并不如此显然划分。换言之即水上舰队与水下潜艇共同构成一国海军实力是也。余于此处所以特别将其分别讨论者，以便吾人对于下列问题“在最近期间之内，潜艇是否能将水上舰队之势力夺去并起而代之”容易加一判断而已。

无论如何，当时德国如与日本联盟，终以德国水上舰队为其基础。如果该盟缔成，则上次欧洲大战或可因而幸免，亦未可知。吾人于此可以察见，因建立海上舰队所取得之“联盟资格”其关系如何重要！若是仅有潜艇组织，万难得此效果。

诚然，一国潜艇如果具有优良战斗能力以及优良海港形势，有时亦可对于彼之盟邦极有帮助。上次欧洲大战潜艇大显身手，即是唯一的、极有海战历史价值的好例。不过当时德国潜艇仍因所占形势太劣之故，不能尽量发展耳。吾人于此却又可以证明：潜艇战争之毫无何等把握。

如果一国政府决心预备某种战争特与他国缔结盟约，必须先向其盟邦明白要求将来应以何种舰队相助。盖盟邦海上舰队所能相助之程度，吾人可以预先料定计算，而盟邦潜艇相助之情形，则吾人却不能获得如此把握。

假如今后英法两国发生海战，则潜艇一物势将特占重要位置。此项英法未来战争为时虽尚辽远，但是仅仅具有此项战争可能之性，即已足使年来高唱之“裁减海军会议”大受影响。盖英国对于潜艇一物主张完全废除，而法国则又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建筑，彼此论点相距极远故也。

法国据有一种大规模之潜艇组织，占有许多优良之港湾根据。其“假想敌”为一“岛国”，而且该“岛国”全靠“海外输入”为生，一旦输入断绝之后，该“岛国”势将无法生存，遑论作战。虽然如此，吾人仍将十分疑惑：如果法国仅有潜艇组织，是否能够邀得“第三国”之信赖，以便共同抵抗英国？盖潜艇实行“商业战争”之功效，根本不能预先计算，已如前文所述。而况英国既据有“海上霸权”，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抗法国潜艇攻击。譬如英国舰队可以尽将法国舰队驱出世界大洋之外，可以切断法国与其殖民地之联络，可以夺去法国方面所必需之海外输入，可以断绝法国假道中立邻邦输入之机会，一如英国在欧战时所实行之对德封锁制度。此外，英国更可以将其船只改由北方“不良气候海道”（Schlechtwettergebiete）航行，或者多用舰队掩护，以使各船绕道侠兰岛（Shetland Inseln）而入北海。英国对于此种临时改道所必需之各种手续，必能应付裕如，上次欧洲大战即为最好证例。因此之故，吾人初不必再行详细研究已可下一断语，即法国海军如果只以潜艇为中心，则断难邀得“第三国”之信赖，将此作为同盟基础以与英国对抗。

（十）潜艇断难代替海上舰队

只就上面简短论断，已可证明潜艇断难独力担任一切海战责任。至于潜艇之真正责任，只限于全体海战中之一小小部分。此外，潜艇尚可担任一部分“辅助工作”。上次欧战中，德国潜艇关于破坏敌人商业一事虽曾大收功效，但吾人切不可因此对于潜艇用途之天然限制故作不知。

由此观之，潜艇一物断难代替现在“海上舰队”以负海战全部责任。而且潜艇本身正式向着敌人海上舰队开战之事，所处地位至为不利，吾人更无暂时停用海上舰队之理由。至于潜艇之未来命运，则又似乎凶多于吉。盖现在海上舰队建筑之进化，亦不亚于海下潜艇建筑之进步。就大体而言，潜艇之战斗力远不能与海上舰队一较雌雄。近来“防御潜艇”之术日有进步，愈使潜艇作用大受影响。现在潜艇对于敌人向彼追击一事，并不敢直接与之相战，但求设法逃出险境而已。

（十一）专以潜艇为主之海军

若专就理论而言，现在世界之上容或有一国家相信，本国海军实力宜以潜艇为主，至于水上舰队之数目，则只以辅助潜艇所必需者为限。换言之，水上舰队对于潜艇之港湾根据必须尽力加以保护，并使潜艇可以随时自由进口。此外每当潜艇出入港湾之时更须从旁护送。如果战事延长，需要潜艇水兵甚多，则可先在舰队之上实行练习，以便随时补充。至于潜艇数目之多寡，则宜以当时战局大小者为转移，惟其数不宜过少。凡此种种，皆为实行“潜艇战争”一事之先决条件。

如果一国政府对于自己海军组织系采上述原则，则该国对于争夺海洋霸权一事必须根本加以放弃。即或争夺，亦只能限于局部海面，更不能利用自己舰队以牵制全部的或局部的敌舰，对于本国海外商业及利益亦须加以牺牲。此外，对于本国陆海两军联络作战，以及装运军队、攻击敌岸诸事，均须一一放弃。至于联盟资格，当然亦在丧失之列。即或自己潜艇能够扰害敌方，亦因自己未具相当水上舰队之故，不能利用此项机会以收功效。

大凡专以潜艇为主之海军组织，其作用只能限于扰害敌人商业一事。但此项作用之

效果最为迟缓，而且极不可靠。

如此狭隘范围、甚难达到目的之海军政策，在世界各国政府中，直至今日尚未有人用以作为一国海军组织原则者。

第二篇　潜艇种类及其性质

（十二）法国发明潜艇之动机

潜艇之发明乃系法国勇进精神之表现。盖法国以为：用此武器可使英国自突法喀一役以来所获得之海上霸权以及该国之雄大舰队大受打击（译者按：突法喀〔Trafalgar〕系西班牙地名。一八〇五年英国舰队在纳尔逊指导之下战败法兰西西班牙联合舰队于此）。自一八八五年左右以来，法国学者即竭力从事潜艇构造之研究。惟是时关于此项武器之主要机器，尤其是摩托（Motor）一物尚未被人发明（译者按：法国首先发明潜艇之学者，名为舍德〔Zédé〕，时在一八八八年）。因此当时法国初次创造之潜艇，名为吉罗堤（Gymnote）者，只用一种“电动机”（Elektromotor），并设“蓄电池”（Akkumuhitorenbatterie）一架以供给其电力。至于“望远筒镜”一物，则尚未如法安置，换言之，该艇一旦潜入水下之后立即失其视力。惟自此次基本试验成功以后，旋有大批学者起而继续研究，于是造成许多潜艇样式，大小不一。其“排水量”（Deplacement）约在七十吨至四百吨左右。并用“汽机”“爆发机”“燃烧机”（Dampfmaschinen，Explosions und Verbreunungsmotoren）等，以便能在水上航行，并装载电池等物，以使潜艇不必再行依赖“陆上装载”之举。其后二十年间，法国所建各种潜艇样式极为繁多，虽尚未具何等重大军事价值，但在建筑技术上却已大为进步。

此项武器之效用既已日益显明，因而其他各国遂亦不能永远袖手旁观，于是群起追随法国之后建造潜艇。不过既不如法国之有一定“假想敌国”，亦不如法国之全力从事建筑而已。自一九〇〇年以来，美国方面先由私人企业（Lake und Holand）发起建筑潜艇之举，其样式共有两种。到了一九〇二年，英国当局乃向美国方面订制“荷兰式潜艇”若干试用，以为代替水雷保护港口之具，盖港口水势甚猛，水雷设置往往不便故也。其后数年，其他各国亦复起而争造潜艇。其中尤以德国方面竭力从事“大洋潜艇”

之构造，改用爆发的“重大石油机”（Schwerölmotor），并欲于短期之内设法改用“狄色机”（Dieselmotor）以代之。

企图扑灭敌人海上霸权一事，实为促成潜艇进化之主要原因。至于法人方面，则更以英国为其敌国之故，屡欲乘机侵入英国。吾人可于英法两国历来海战之中，法国如何竭力准备派兵侵入英国一事见之。惟法国此种企图屡次均遭失败。盖法国每次装运兵队之时，尝受英国舰队袭击故也。因此之故，法国以为，如果潜艇建筑成功，当可悉将英国雄大舰队驱出法国领海之外，使其退归英国港口不敢再出，至少使其不能再至法国运兵之处从事骚扰，以便法国军队可以渡登英境向其侵略。倘若吾人一观数百年来法人如何处心积虑以使本国军队得有登上英岸机会之举，则知法国此种侵英企图，亦与该国潜艇进化具有密切关系。

因此种政治关系之故，遂使“海洋潜艇”得以进步成立，否则潜艇一物，或将仅仅成为一种有趣的试验品，至多亦只能成为一种“海岸防御”之补充武器而已。

由此观之，法国之所以决意尽力于潜艇事业者，不仅由于法人所抱勇进精神，实亦该国政治特殊情形有以促成之也。

至于其他各国所处情形，既与法国相异，因而对于潜艇问题亦复十分冷淡。而况潜艇自身所含困难与危险之成分甚多，一时尚难解决。更加以旧日传统学说所谓，“如欲控制海洋，必须先行夺得海上霸权；既已夺得之后，纵有潜艇来攻亦复无关宏旨”云云，愈使潜艇事业大受阻挠。因此之故，法国新派军事家主张，“对于英国业已夺得之海上霸权，不必与之相争，但用微小舰队与大批潜艇向其袭击，便可坐收功效”云云，颇惹起一般法国人士以及其他各国识者大为评议非难，而且具有相当理由。在事实上，潜艇效用却亦始终限于“破坏敌人商业”一途。当其实行破坏之时，既不必先得海上霸权，亦不必需要舰队相助，便可大收成效。不过破坏敌人商业之程度，一如上次欧战之重且大者，则在当日各国海军领袖之中，固无一人敢于作此梦想也。

关于潜艇建筑一事，种类至为不一，各自分头进化。如“单壁潜艇”（Einhüllenboote），其“潜水机”（Tauchtank）及“燃料机”（Brennstoffank），系装在“压力机舱”（Druckkörper）之内，故其体量甚小。此类潜艇具有两种特长，即易于潜入水中以及水下航行速度甚快是也。同时亦复具有两种缺点，即航程甚为短小以及水上航行不利是也。反之，“双壁潜艇”（Zweihüllenboote），则其“潜水机”等系装在“压力机舱”之外，故其体量甚大，可以航行较远之航程，具有抵抗宏涛大浪之坚质。不过关于水下活动各种特长，却远不如上述之“单壁潜艇”耳。因此，又有人折衷其间，兼采上述两种建筑之长另造一种潜艇，如意大利所造之“飞阿堤潜艇”（Fiatboot）是也。此项潜艇之“压力机舱”不用圆形而用船形，其容量因而为之扩大。又普通机身因系圆

形之故，本具有一种抵抗“水压”之长，现在则易以坚峭之形，使其依然具有抵抗“水压”之能力。

当时潜艇所用之武器，只有“鱼雷”（Torpedo）一种，其炮筒之形式与安置地位至为不一。至于“水雷潜艇”（Mineunterseeboot）之制则尚未加以采用，又艇中安置大炮之举，亦尚未脱试用时期。

当欧战初起之时，世界各国均未具有实力充足可以一战之潜艇组织，关于潜艇战争之经验当然丝毫未有，讨论潜艇战争之文字，亦复未见于论坛。

（十三）德国水下艇舰之分类

德国在欧战期间之内曾据有性质极异之水下艇舰两种。一为“潜艇”（Unterseeboot），其“水上排水量”（Überwasserdeplacement）约自一百三十吨至八百吨之间。一为“水下巡洋舰”（Unterseekreuzer），其排水度（Wasserverdrängung）约有二千吨左右。此种分类之法以及大小限度（或稍为增大），直至今日，一般竭力从事水下艇舰建筑之国家犹复依旧保持。至于水下艇舰吨数增至两千之举，并非完全由于各国海军争霸，互相竞扩各舰吨数，以便与敌对打得占优胜形势之故，盖“水下艇舰”一物，原非用来与敌对打，固无须竭力扩大其吨数也。

世界各国之所以照旧保持此种分类之法，以及照旧保持水下艇舰之吨数不大加以变更者，实自有其特种理由。换言之，即两种艇舰之用途，彼此根本不同是也，盖“水下巡洋舰”一物（吾人为简便明了起见，权且沿用此项名称），其中比较可以装置一种较大之炮，如遇危险区域则立即潜入水下，暗行渡过，此实为其特置潜水设备之主要原因。此外该舰比较潜艇能行较远之航程，能抗大洋之波涛，故其活动区域多在辽远地方，且以该地敌人并无何等防御设备为限。倘若敌人方面已有防御设备，则该舰虽有大炮，势将无所用之，只好潜入水下而去。诚然，该舰之内亦有“鱼雷”设备，可以用于水下攻击，但在他方面却又因该舰体积过大之故，甚为难收水下作战之效。通常“水下巡洋舰”长度为九十五公尺至一百二十公尺左右，而潜艇长度则只有六十公尺至七十公尺左右，其水下作战之灵便，当然远非“水下巡洋舰”所能比。而且“水下巡洋舰”因为身体太长之故，稍一不慎，略为动摇，舰头或舰尾即露出水面，为敌人所察觉，自陷于被攻之险境。同时该舰又不能深入水下以避攻击，盖该舰潜水之时，不能将其“望远镜筒”没顶故也。此项“望远镜筒”系耸立船面之上，其长度无超过七公尺者。因此之故，水下舰艇，无论大小，其“攻击深度”（Angriffstiefe）皆一律相同。

由此观之，海军当局建筑“水下巡洋舰”之意，乃系欲于敌人防守不备之地或远隔重洋之外，利用此类“水下巡洋舰”以实行其“巡洋舰”之职责。其在他方面，海军当局不愿增大“潜艇”体积以至于超过必要程度，使其水下活动之力大为减少，殆亦为当然之结论。

其结果，“水下巡洋舰”与“潜艇”之大小，遂不能不彼此悬殊。

关于“水下巡洋舰”之各种用途，容后再为详述。

（十四）潜艇只能在水下活动

对于我们研究极有重要关系者，实为“潜艇”一物。

“潜艇”之意义、目的及其存在理由，实为下列两事，即（1）乘敌不备之际忽从水下利用“鱼雷”向其攻击、（2）安放“水雷”于其他普通水上军舰所不能安置之处是也。至于其他一切活动，皆为副责，非关宏旨。倘若仅有此种副责，实无特别建筑潜艇之必要。譬如潜艇可以侦探敌情，以助本军舰队司令决策；潜艇可以协助水上舰队攻击，以收毁灭敌人商业之效；此外，潜艇尚有许多特别职务，其关系之重要，吾人诚然不可加以轻视，但此种功效，却均非潜艇所以能够发达之主要原因。盖潜艇之唯一特色，系在其不露形迹，因此可以乘敌不备将其攻击。换言之，潜艇之性质，系在能够巧避危险，直达战区，以实行其工作。而且此项工作，须与彼之本分相合，不至于空耗一笔潜艇建筑之费，辜负一番对敌作战之举。

无论何种海军武器，皆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始能显其功效。所有该项武器之构造及用途，亦皆以此种特殊条件为其标准。只有设法限制用途一层，始能使该项武器之真正特色充分发展。譬如普通战舰，只能航行水面与敌作战，除此以外别无所能。又如海军飞机，其用武之地系在空中，倘若必须降落水上，则其功效从此根本取消。同样，水雷一物，只能在水下大显神通，一旦浮于水面，则其危险之性顿失。

此种普通公例，潜艇何能独逃。当欧战之时，尝有若干海军领袖误认潜艇具有“水上活动”与“水下活动”两种功用，其结果往往酿成意见纷歧之争以及发出许多错误命令之举。

如果有人误信上述水上水下两重功用，则其人对于下列一点显然未曾明了，即潜艇在构造上虽具有水上水下两种性质，但不能遽谓在军事上亦复具有水上水下两种用途是也。关于军事用途一层，潜艇正与其他各种武器相同，有一定特殊范围。换言之，只能潜在水下活动而已。至于潜艇之所以常常必须利用其水上能力者，无他：第一，因为现

在潜艇机器尚无潜水远航之能力；第二，因为顾虑艇上人员之生存条件；第三，因为必须常在水面侦察一切。有此三因，所以潜艇开往前方之时，大概均用水上航行之法，而不用一律潜行之举。其结果，关于简单战斗、侦探敌情等事，凡潜艇可以在水上了结之者，均任其在水上了结。

潜艇真正用武之地，系在水下，而非水上。所有潜艇构造原则，亦皆以“水下作战能力”一点为其标准。其余如“水上航行速度”、“水上战斗能力”、“水上防守职务”诸事，皆不能不因此而有所牺牲。

简而言之，潜艇开赴前线系由水上，而对敌作战则在水下。盖潜艇因其“潜入水中能力”及“水下作战能力”之故，既已不能不对于其他诸事有所牺牲，现在万无力量再在水上径与敌人军舰从事一种繁难战争。

潜艇一物，在各种海军武器中实具有一种极端性质，盖潜艇身材如此渺小，竟具有如彼伟大之攻击能力。艇中可以装置“鱼雷炮筒”往往达到十个之多，每筒之内可以装入“鱼雷”一颗。如果情势顺利，可以击沉敌人“铁甲战斗舰”一只。而且此项“鱼雷”可以陆续不断的向着各方射出，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均无不可。如果能出敌人不意，骤然向其攻击，则敌人不及防备，而“鱼雷”之命中与威力更将特别容易与增高。潜艇攻击能力伟大之例，吾人可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德国“第九号潜艇”击沉英国“铁甲巡洋舰”三只一事见之。当时德国方面只用一只微小潜艇，其吨数不过四百，其艇员不过二十八，竟能于一点多钟之内，击沉英国铁甲巡洋舰料四万吨左右，舰员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得遇救生还者尚不及三分之一。

又潜艇之上置有“水盖”（Wasserdecke）一方，不但可以避却敌人视线，并可防御敌人射击。而且潜艇可以随时向下深潜，以使此项“水盖”之防御效用益形增大。

反之，潜艇如果浮于水面，则此种攻击及防御之能力从此一笔勾消。潜艇一旦为敌所察之后，势难再收“鱼雷”攻击之效。如果敌人方面稍具几分战斗能力，而潜艇自身更将陷于危境，不能自救。

由此观之，如果吾人强令潜艇担任水上战争，其违背事理，当为何如！“潜艇”与“鱼雷艇”（Torpedoboot）之性质颇有相似之点，譬如艇中所用武器均为“鱼雷”一物是也。惟对敌作战之际，彼此各自有其特长。譬如潜艇之最大特色在于能够潜入水中，而鱼雷艇之最大特色则在航行甚速与夜间袭击是也。如果吾人强令潜艇弃其潜水特长前往水面作战，则其结果，将有如强令鱼雷艇弃其“航行最大速度”及“利用夜间袭击”两种特长，而用慢慢航行及白昼攻击之法，将有何效果可言？同时并使自身陷于十分危险之境。

下列一例即可证明，如果对于潜艇特质不甚明了，势将酿成何等误会。一九一四年

八月初间，德国政府曾命令防守德国港湾之潜艇长官，略谓该潜艇等之职责，除随时侦察敌舰外，并须设法保护德国港湾安全，惟向敌人战舰施以攻击之举，则只以该敌舰等确有敌视行动为限云云。此种命令，在水上舰队方面或者可以执行，至于潜艇方面，如遇此种情形，则仍以停留港中为妥。盖潜艇如果发现敌舰前来，正宜及时潜入水中，以免为敌所察，被敌攻击，但同时潜艇本身亦不宜向敌攻击。反之，潜艇如见敌舰逐渐接近，而自己仍逗留水面不去，直至敌舰将彼发现加以攻击，则该潜艇之命运，遂亦从此告终。或者上列命令所谓“确有敌视行动”系指敌人舰队向着德国战舰采取敌视行动，是时适有一只德国潜艇正在附近水下，而且一切攻击手续早已准备齐全，现在既见敌舰采取敌视行动，于是乘机上前，向着敌舰加以猛烈攻击云云。不过此种情形，实属至为罕见之事。

至于“水上巡洋舰”与仅仅见诸理论之“水下战斗舰”，其情形当然与潜艇不同。不过该舰等亦并非“两栖动物”，可以随意在水上或水下工作。盖该舰等主要用武之地系在水上而非水下。但因该舰等强将“水上作战能力”与“潜入水中能力”两种最难兼备之性质混在一身之故，其结果，两种能力均不能各自尽其所长。关于此种水下战舰不能与水上同样战舰价值相比之处，余将于本书最后一篇之中，加以详论①。

（下略）

① 王光祈的译文中没有此篇。

空防要览[①]

塞德尔（Seydel） 著 王光祈 译

译者序言

本书是一德国退职军官所著，其论述虽极精密，但同时亦极通俗。盖空防一事，必须军队与人民合作方能大收其效，此与从前陆战海战之仅由军人担负防守重责者根本不同。

空中战争，为未来大战之决胜枢纽，殆已无疑。近来日内瓦裁军会议对于空中攻击他国以及毒气病菌战争，虽有提议禁止，但将来战事到了紧要关头、孤注一掷之际，此种空中法宝仍将一一大显神通。从前炮火战争只是战区人民饱受其害，至于将来空中战争，如施放毒气、散播病菌之类，倘被攻者方面无相当防备，而国内人口稠密，易受敌机攻击，则其结果，直可以亡国灭族而有余！

德国近年所出版之空防书籍为数甚多，并有《空防杂志》之刊行，专门讨论此事。本书是近数月出版，其中所举毒气虽有数十种之多，但现在各国化学室中正在秘密研究之军用毒气及病菌，尚不知凡几。此种未来人造瘟疫之遗祸如何，此时尚不能预测也。

不过空中攻击之法虽花样百出、凶猛异常，但若防之得法，亦未始不可减其毒焰。

① 本书为《国防丛书》之第四种，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3月出版。该书内容，为介绍当时条件下防御飞机和毒气袭击的方法与手段，虽具史料价值，但于今已无多大实用及参考价值，且因篇幅所限，本书只选录了部分章节。

吾国在一二十年之内，断无余力出师攻击他人，故所谓空中战争者，亦只能限于空防一面，如驱逐飞机，高射炮、防毒设备之类必须多多置办。至于放毒之事则暂时尽可不必练习。盖在本国领土之内与敌人作战，断无自放毒气以害本国人民之理故也。德国自凡尔塞和约以来，所有空中战备均在禁止之列。故本书所言，特偏重空防一面，此种情形正与吾国相同。惟欲吾人防法之有效，必先知道敌人攻法之如何。因此书中对于空中攻击一事亦有极简明之叙述。

本书系为德国人民而作，故其空防设备不能尽与吾国情形相合。譬如西洋房子均有地窖，而中国房子则无之。但在他方面，中国居所除上海等处因为病态的发展人烟异常稠密外，其在内地各处，大多平屋稀居，颇能减少敌人炸弹之威力，此又为外国洋房之多人群居者所不及。近时吾国工商进化，甚至于教育文化机关，均集中于几个大都市，实属最易受敌攻击。换言之，敌机可于数钟之内尽将吾国经济文化中心全部毁灭，其危险情形为何如！今后亟宜设法使国内各地工商文化事业平均发展，千万不要集中一二都市，以免为敌军一网打尽。

多购军用飞机，多置空防建筑，多备防毒面具，皆为吾国今日之财力所不许。但购置飞机之时，如能兼顾军用民用两途，换言之，即平时作为交通之用，战时则作为战斗之用（此事是否可行，当然应由专家讨论与发明）；建筑新市新舍之时，则处处顾及空防设备；对于防毒之法子与防毒之材料，务使其普遍流传（至少各处中小学校必须设科讲习，此种办法，对于平时防疫之举亦极有益处）。如此，则将来若遇空中战事发生，吾国当不致毫无准备，吾民亦不致束手待毙。

余本以研究乐学为终身职业者，但鉴于此次沪变[①]之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人参考。盖有国而无防，实际等于亡国！若自己不能防，而冀他国为之代防，更是无耻之尤！因自御外侮一事，乃是一个民族要求生存权利时应尽之最低义务故也。犹忆从前在蜀肄业中学之时，尝遍购吾国古代各种兵书读之，慨然有荷戈卫国之志。当时同学中如曾慕韩、周太玄、郭沫若诸君多知其事。其后虽改学政治，改学音乐，而旧时书生谈兵积习，仍未尽忘。故余今日编译此种军事书籍，亦并非毫无兴味者。

余向来译书之法，系先用直译，直译看不懂，再加以意译。如遇译文不合中国文气

① 此次沪变：指一·二八事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军事冲突。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致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南京国民政府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之处，辄添上一二补句以贯通之，并于补句上下加一括弧以分别之。但本书原文往往过于简短，非多加补句不能联贯，因则所添补句特别众多，如果照例加括弧，甚碍读者之眼，于是决计将其悉数删去。好在此书是一种通俗著作，非如名家作品之务必存其庐山真面目者可比也。又书中各种毒气化学名称，余因客中无中国化学词典之故，不知中国译名如何，兹仅就余所知者附记于旁，其不知者则只以外国名词为据。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中

作者自序

空防一语，在数年前尚未通行。到了今日则已遍传人口。但对于此事之组织、研究、工作各方面真正具有一种明了观念者，却不多见。

关于空防定义，各人所下不同。或以为专指预防毒气攻击；或以为只限于空防建筑问题；或以为人造烟雾；或以为死光四射，以及其他秘密发明；或者联想及于从前紧闭窗户、黑暗街衢、夜间逃入地窖以及其他种种窘状。要之对于此项问题，能具一种概括的明了的观念者，为数极少。本书之作，即在补此缺陷，作一概括叙述。

本书并非教科书性质，不过仅将一切关于空中战争及空防设备之问题，以及一般军界以外人士对于此事所必具之常识，作一有统系的说明而已。

本书之作，在使一般普通人民，尤其是对于空防设备一事自愿尽力相助者，得一参考料，以便随时检阅。

此外并将空中战争之作用及其限度加以解说，以使一般普通人士对于此事之真与伪、可能与不可能有一明确判断。

德国自凡尔塞和约以后，所有一切作战飞机皆被禁止，关于陆上高射炮亦仅准设备数架。

因此，本书对于空中武器之应用与效果，只以有关空防设备之必要常识者始行采入，至于陆上空防所用之各种武器，亦于书中一一加以简切说明。盖据吾人历来经验，一般人士对于此事最不明了故也。

一九三一年八月塞德尔（Seydel）序于明星（München）

目　录

第三节　探空灯
第四节　听空器
第五节　气球封锁
第七章　空防情报
第一节　空防情报之职责
第二节　空防情报总部之组织
第八章　警告
第九章　空防建筑
第一节　普通建筑计划
第二节　公共逃避所之建筑
第十章　掩藏
第一节　配合地形
第二节　假饰要地
第三节　灭绝灯火
第四节　发放烟雾
第十一章　毒气
第一节　重要军用化学材料
（甲）刺激眼睛者
（乙）毒害肺脏者
（丙）氢氰酸
（丁）刺激鼻喉者
（戊）毒烂皮肤者
（己）一氧化碳
（庚）硝毒
第二节　空中毒气攻击
第三节　动物与毒气作用
（甲）马
（乙）犬
第十二章　防毒设备
第一节　单独防备
（甲）滤毒机
（Ⅰ）保护呼吸具

第一章　导　言

一国空中之安全是否可保？当以下列两项为转移：（1）邻国空中军备之大小，（2）本国空中被侵之难易。

邻国空军压迫程度之大小，可从该国（邻国）所备掷弹飞机数目与普通飞机数目孰多孰寡之中以见之。

本国空中是否易被侵略，可从下列三点以断之：（a）地理关系，（b）经济组织，（c）人民居所之方式及密度。兹举数国为例如下：（例表略）

至于空防之法，则有下列三种：（1）用“战斗飞机”以防之，（2）陆上积极防御，

（3）陆上消极防御。

组织统一，指挥集中，实为空防有效之先决条件。

本国之内，应分为若干空防区域，每一空防区域宜置司令一人以统辖之，所有该区之军队空防与居民空防，一概由其指挥。

居民（消极）空防，所以补军队空防之不足。凡未置有空防武器之处，此种居民空防实为减少敌人攻击之唯一工具。

居民空防之职务，共分下列八种：

（甲）报告敌情及发出警告。

（乙）消防。

（丙）救济。

（丁）防御毒气。

（戊）关于技术方面之补助（Technischer Hilfsdienst）。

（己）空防建筑。

（庚）掩藏（Tarnung）。

（辛）守护与保安。

上述各种居民空防职务共同组织起来，则为空防救助队（Luftschutzhilfsdienst）。

如果空防救助队设备完全，训练有素，而且每当危险之时，从事一切救助工作无不持以镇静态度，抱有一定方针，实使该地居民精神方面，得一重大安慰。

凡遇地方情形特别危急之时，可请其他情势较缓各处之空防救助队前来协助。

上述（甲）（乙）（丙）（丁）等等八种职务之中，其每种内部设备必须一一与其职务相适（譬如防毒设备、救火机器、去毒药水、斧、锄、铲，以及临时撑持倾塌房屋之用具等等）。指挥空防救助队实行工作之举，不宜集中一点。换言之，每一小排排长，对于一切工作所需要之机械设备及队员配合，均须各自彻底了解及完全胜任。

非有一种完善灵通之情报组织，则空防救助队决不能达到及时准备与有效应用之境。

第二章　空防十诀

（1）只有真正知道危险情形者，始能设法自行防卫。因此之故，对于空中战争之实情与现象，宜特别加以研究。

（2）研究空中战争问题不宜参考坊间一切故作惊奇之著述，而应翻阅各种负责专家之书籍。

（3）在实验室中偶然发明一点毒气，尚不能遂称之为战争利器。从蒸溜罐（Retorte）到毒气弹，从实验室到战争场所，相隔尚极辽远。

（4）现在尚无一种空防方法足使敌人炸弹攻击根本无效，但同时亦无飞机攻击之举能使所掷各种炸弹每击必中。空防一事，不能发生神奇效验。同样，飞机一物亦无何等神奇作用。

（5）损失与毁坏两事，在战争之中势所难免。吾人只能将其损毁范围稍稍加以限制，至于根本避免，则为决无之事。

（6）对于防御空中攻击一事，应于平时练习。迨战争开始之后方行练习，实嫌太晚。

（7）保持谨严秩序。秩序愈谨严则损失愈减少，一人临时轻躁失措，可使大众同得不祥结局。

（8）损失之原因，大多由于忽视空防规程。争看热闹之人，往往获得丧命恶果。

（9）凡可以使敌人飞机注意或可以诱敌人飞机攻击者，均宜设法避免。又多人群聚一处，实为异常危险之事。

（10）不必每一小事皆候官厅指示，宜随时设法预防自己与其家人之生命以及住所工厂之产业。

（第三章以下略）

王光祈旅德存稿①

自　序

本书内容，系余旅德十五年来（自民国九年至二十四年）关于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游记等之文字，散见于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平《晨报》以及其他杂志报章者，删存二分之一，共六十四篇，约二十万言，以作国人留心时事者之参考。

关于旅德时代所作之音乐论文，已另编《王光祈音乐论文第一集》公诸同好。至于本书取材标准，系以该文内容今日尚有参考或回忆之价值者为限，其余如《欧洲各国经济现状》数十篇以及关于各种国际会议之通信，多已成为陈迹，不复采录。

余在出国以前之文字，多散见于《少年中国》月刊、北京《努力》周刊等等，除关于少年中国学会之文字已另刊单行本《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印行，现已绝版）行世外，其余各稿无一存者。惟民国八年十月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动的训练》一篇，尚侥幸藏于行箧之内，因检出附录本书之后，以见少年时代思想之一斑焉。

余之从事报馆生涯，实以民国元年供职于同学曾慕韩君所主办之重庆《民国日报》开始。其后肄业北京之时，则于中国大学研究法律、清史馆中担任书记、青年会内学习

---

① 该书是王光祈生前自选文集，王光祈不幸突然病逝后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3月出版。书中所选，正如作者自序所言，多为“关于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游记等等之文字，散见于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平《晨报》以及其他杂志报章者”，因篇幅所限，有部分篇目本《文集》未予收录。另外，部分篇目内文字有删节，在删节处予以说明。

英文之外，更兼任成都《群报》驻京通信之事。在短时期内并与同学周太玄博士为北京《京华日报》之编辑员焉。其后办理少年中国学会之时，刊行《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月刊，对于编辑事务之训练更属得益不少。

民国九年四月赴德留学，受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之约，担任驻德特约通信员之职。是时，余尚未习德文，故最初一二年之通信，深得同学魏时珍博士供给材料之助。先是，周太玄、李幼椿、李劼人、何鲁之诸友已在巴黎组织通信社，为供给国内各报海外消息之机关。此外尚有同志多人在英、美、日本等处分任国内各报之特约通信员。故当时各报之海外通信员，多系吾少年中国学会之会员。

自民国十二年以后，遂决意放弃研究经济之愿，而改习音乐历史。对于报馆通信之事渐渐荒疏，专心从事音乐著述，并兼译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余在北京习法律时，以研究外交为主）。自日本占领满洲后，更翻译"国防丛书"数种（余在成都肄业中学之时，颇有书生谈兵之习，曾觅得中国古代兵书数十种，遍读之），先后成书三十余种，深得中华书局当局陆费伯鸿先生以及友人左舜生、舒新城两君之助，一一公元[①]于世，谨此志谢。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王光祈序于德国波恩大学

王君此书，去年九月寄到，十月发排，今年二月排校完毕，正待付印，王君一月十二日在德国逝世之噩耗已传至上海，而此书已成遗著矣！

王君之死，实为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无论识与不识，咸深悲恸。除与友人为之整理遗稿外，兹将报纸所载之消息录后，权当王君小传。

舒新城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

王光祈先生之哀耗

德国波恩大学（Bonn Universität）讲师王光祈，为吾国唯一之音乐史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极精练，不幸骤于上月在德国逝世，享年仅四十五岁。噩耗传来，国内

① 元：应为"之"字之误。

学术界咸为震惊，无论知与不知，同深悼惜。按王光祈先生系四川人，在国内研习政治经济，曾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自民国九年赴德留学，迄今十有六年。最初数年，除攻政治经济外，并习小提琴。曾任上海《申报》、《新闻报》特约通信记者多年，以其观察周到，叙事简明，甚为国内注意国际消息者所重视。最近十年专攻音乐，曾陆续编译音乐丛书近二十种（大多数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于去年得有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国人之以音乐史考得是项学位者，王君实为第一人。其所提论文《昆曲研究》，深为德国学术界所赞赏。自一九三二年起，被聘为波恩大学讲师，并著有关于中国音乐之论文多种在德国各有名杂志发表。王君兴趣系多方面的，除其专攻之音乐著作外，又译有关于中国近代史之资料七种，如《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李鸿章游俄纪事》等，均甚有名。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王君感于国难严重，民族复兴之不可缓图，又从事编译“国防丛书”，现由中华书局出版者已有四种，尚有多种在印刷中，内容均甚精粹。蒋院长久耳王君盛名，曾于去年九月电致柏林中国大使馆参事谭伯羽先生，转询王君有无归国之意。其原电有“闻王君光祈，力学苦行，甚为钦佩；如愿归国，当图借重”云云。惜其时王君因本年度已应波恩大学之续聘，不便中途解约，致愆归国之期。王君在外十六年，未受公家与私人一文之津贴，其平时生活纯恃著作，致用力太勤，伤脑过度，曾一度因参考拉丁旧籍，骤患脑充血晕倒于德国国家图书馆。本年一月十二日晚，王君正在其波恩住宅从事著作，旧病忽发，不及医治，致使一代英才竟客死异域，曷胜痛惜！现王君国内友人魏嗣銮、宗白华、周太玄、方东美、李幼椿、沈怡、蒋复聪、郭有守、黄仲苏、余家菊、舒新城、左舜生等，拟定期举行追悼，现正从事搜集王君历年之著作编一系年目录，并叙述王君生平之志行，刊行纪念册，分赠全国学术界，藉识哀思，而垂久远云。

（见二十五年二月廿八日《时事新报》）

目　次

二十二　德国在华外交官制之更改及使领人员之派遣

二十三　关于东铁问题之欧洲舆论

二十四　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

二十五　战机尚未成熟

二十六　御侮之武力

二十七　国防问题

己　教育事业

二十八　教育家对于中国现状应有之三大觉悟

二十九　德意志教育之近况

三十　德意志全国皆工的新教育制度

三十一　德意志的工人大学

三十二　德国大学的危机

三十三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

三十四　苟廷根大学之特色

三十五　德国成人教育

三十六　德国对于失学国民之救济

庚　留学问题

三十七　留德学界之近况

三十八　留学界的两大潮流

三十九　来德留学者注意

四十　留德学生问题

四十一　留学与博士

辛　科学美术

四十二　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

四十三　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

四十四　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

四十五　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

四十六　德国学者与世界哲学大会

四十七　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四十八　中国美术展览会

四十九　德人对于中国绘画之批评

壬　青年运动

五十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

(1) 青年运动之派别 (2) 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 (3) 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 (4) 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三篇）(5) 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 (6) 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三篇）

五十一　国际青年团

癸　杂著书札

五十二　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

五十三　中国人之生活颠倒

五十四　分工与互助

五十五　德人对各国侨民的情感

五十六　德国工人思想之变迁

五十七　柏林人之道德问题

五十八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

五十九　柏林病院四旬记

(1) 德国医院与民众健康 (2) 世界最流行之病 (3) 第一内科病院生活

六十　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

六十一　一位德国奇士

六十二　致柏林中国留德学会书

六十三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

六十四　与邵循正君书（附邵君答函）

附录

王光祈旅德西文著作十八篇存目

动的训练（民国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原文载该校周刊）

王光祈著译各种书籍一览表

甲　国际问题

一　日诺瓦会议[①]

（一）日诺瓦会议开幕前之所闻

举世瞩目之日诺瓦（Genua）会议行将开幕矣。无论其会议结果是良是恶，要皆于欧洲政局前途将发生重大影响，可以断言，此实为太平洋会议[②]以后之第一重要会议也。当英相乔治发起此会时，原欲将年来欧洲纠纷最甚之对德对俄问题加以根本解决，而对德问题之中尤以减轻德国赔偿责任为其着眼之点，惟此事不合于法国之主张，因法国当局之意，极不愿将已定之赔偿问题重新提起，更不愿将此问题在参有德俄奥匈及其他中立各国之国际会议席上提出共同讨论，故对于英相乔治之计划加以根本反对。日诺瓦会议之举竟因而停顿。嗣由英法当局彼此协商，将日诺瓦会议之议事范围加以限制，关于赔偿问题拟置诸“既成事实不在讨论”之列。观最近英相乔治在下院演说，一则曰《凡尔塞和约》不能加以更改，再则曰赔偿问题不由日诺瓦会议解决。又参与此会之捷克斯拉夫国务总理柏乃邪（Dr. Benesch）临行时在议院外交委员会中演说，亦谓更改《凡尔塞和约》徒惹起欧洲纠纷，至于赔偿问题仍由英法德自身解决云云。果尔，则赔偿问题似已屏诸此次日诺瓦会议之外矣。然赔偿问题之于德国，犹山东问题之于中国：山东问题不解决，则太平洋会议中所谓解决远东问题者为无意义；赔偿问题不解决，则日诺瓦会议中所谓解决对德问题者亦为无意义。究竟号称聪明过人之列强将作此种无意义之事乎？抑尚有其他解决之道乎？吾国之山东问题，虽未在太平洋会议中加以讨论，

① 日诺瓦会议：即热那亚会议，又称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参加者有苏、英、法、意、比、日、德等29国，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结束后未达成任何协议，最后决定会议在海牙继续进行。在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单独签定了《拉巴洛条约》。

② 太平洋会议：亦称华盛顿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由美国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有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参加。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1919）的继续，其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和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

而同时却在会外直接交涉；此次德国之赔偿问题，将来即或不提出日诺瓦会议，又安知不同时在会外加以讨论？据英相乔治在下院演说曾谓：吾人若欲解决赔偿问题，不可不注意两点：（一）若赔款超过德国能力，则其危害将不仅限于德国；（二）德国赔偿能力之最后决定，不能依照暂时德国疲敝现象为标准。又谓欧洲经济问题之解决与赔偿问题极有关系云云。吾人于此足见英相乔治并未尝忘情于赔偿问题，而德国费尔提总理此次不惜亲赴日诺瓦，仆仆道中，又可见德国方面更未尝忘情于赔偿问题。故将来赔偿问题，或在会外由英法德直接加以讨论亦未可知，惟不知其讨论之结果是否与中国之山东问题同出一辙也。

会议中原拟解决之赔偿问题，现在既已置诸若有若无之间，则此次会议之精神已减少一半。目下会议中所拟讨论者，约有三事，请述如左：

第一，重建俄国问题。其内容则为清算俄国战前债务问题、外人投资俄国问题、侨俄外人保护问题、规定重建俄国之实际方法问题等。要之对俄问题所讨论者，多偏重经济方面，以便彼此易于妥协。至关于政治方面，如承认劳农政府问题则较为复杂，恐将置为后图。

第二，恢复欧洲经济问题。其内容如国际公债问题、欧洲各国债务问题、汇兑问题、国际商业问题等等。自大战以还，欧洲经济一时陷于疲敝，畴昔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伦敦，竟不能不退居纽约之下。此次英相之决意先行整理欧洲内部经济，即为其重整旗鼓再霸世界之计。

第三，全欧各国重修旧好问题。其内容如欧洲国际和平问题等等。自欧战后，欧洲各国分为三部：（一）协约国，（二）同盟国，（三）中立国。凡欧洲问题多由英法二三协约国主持，德国只有惟命是从，俄国则早已久居化外；至于中立各国，更超然于协约、同盟之外而自成一派。此次会议聚协约、同盟、中立三种国家于一堂共同讨论欧洲问题，实为战后第一次之盛举，藉以消除各国误会，共谋公同利益，使欧洲各国邦交恢复战前状态。

以上三种即为此次会议中之重要问题。至于实际方面如何，则只好俟开会以后再为陆续报告。惟此次会议撇开最重要之赔偿问题而不谈，虽系英国当局之最大让步，然在法国方面则仍有四种推测：（一）英国立刻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二）限制波兰战斗力，（三）裁减法国陆军，（四）组织一种常设最高会议，德国有参议之权等等。吾人若就英相乔治本月三日在下院之演说而论，英国似尚无立刻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之意。又法国陆军暂不裁减，最近英法之间亦似已经谅解。故法国方面之第一第三两种推测，一时似尚不成问题。惟（二）（四）两种，则尚在不可预料之中也。据法总理语人云：在未得国会同意以前，法代表在日诺瓦会议中决不擅自有所决定。观此则法国将来如受英国之压

迫时，或藉口于国会之反对，竟至撤回代表以为对抗英国之计，亦未可知。惟英国方面最近亦有一种论调，谓整理欧洲经济问题非得美国出而相助不可，尤非英国特别努力不可，将来英国建议若不见采于赴会各国，则英国即与美国携手共同重建欧洲云云。似英国方面亦复坚持主张，大有不顾一切之概。则将来日诺瓦会议之难关，恐又不下于太平洋会议之情形也。

（二）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俄德单独订约（两篇）[①]

（三）日诺瓦会议之讨论形式及其会外文章

（四）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七篇）

（五）日诺瓦会议中之海牙会议问题

（六）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二篇）

一

号称改造全欧经济之日诺瓦会议已于昨日正式闭幕矣。究竟此次闭幕为事已毕乎，抑中道而止乎？此实为最难解答之问题也。以言乎事毕，则此次会议中最重要之俄国问题并未尝解决。自俄国代表团发出五月十一日之复牒后，英国代表曾语人云："若再往后会议，实已毫无目的。"法国代表亦谓："俄国复牒违背开恩斯原则，此次会议宜速宣告中止，以便各人自理归装。"俄国代表之复牒中亦云双方意见未能接近，只好留待将来另组之专门家委员会加以讨论。然则此次闭幕，与其谓为事毕，毋宁谓为中道而止矣。虽然，此次会议对于最重要之俄国问题虽未尝加以解决，而对于会中其他之财政问题、经济问题、交通问题，则其讨论成绩又无不连篇累牍，灿然可观。日诺瓦会议既以改造全欧经济为名，则此种连篇累牍关于经济问题之成绩，亦大可视为画饼以充饥。故此次闭幕谓为中道而止固可，谓为事毕亦未尝不可也。此次会议所讨论之问题有四：（一）俄国问题，（二）财政问题，（三）经济问题，（四）交通问题。此四种问题由会中组成四种委员会以讨论之。第一种，讨论俄国问题之委员会，网罗所有各国赴会之第一流名角；第二三四各种委员会则由各种专门家组织之。乃现在讨论结果，第一流名角所组织之第一种委员会毫无结果，而各专门家所组织之第二三四种委员会，则反有连篇累牍之成绩，其故安在？此无他，盖所谓第一流名角者，皆当代大政治家也，所讨论者为

① 以下（二）至（五）四篇，因本书篇幅所限，未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王光祈著，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第4页至第43页。

一针见血、短兵相接之实际问题；至于各种专门家则多为书呆子，所讨论者又多为与人无争、与世无忤之理论问题。第一种委员会虽劳各大政治家钩心斗角，而终无丝毫成就，仍不能不委其责于将来召集之海牙专门家委员会；反之，第二三四种委员会，则以各专门家勤于笔墨口舌之故，居然能产出一大堆连篇累牍之成绩，亦不可谓非幸事也。惟彼辈之所谓成绩，其价值亦不过“连篇累牍”四字而已，按之实际，仍一无所有也。

此次日诺瓦会议共开大会三次。一为四月十日之开幕大会，是日俄国代表齐吉林与法国代表巴尔董为裁兵问题大起争论，幸英相乔治调治得法乃能平稳过去。二为五月三日之第二次大会，此次大会为各专门家报告财政委员会与交通委员会所讨论之成绩，畅谈财政交通之原理，娓娓动人，一般赴会者如到大学听讲，乐而忘疲，此诚为日诺瓦会议第一次之快意事也。三为五月十九日之闭幕大会，是日开会程序为：（一）审定第二次大会之会议纪录；（二）报告第三委员会之成绩（即经济问题）；（三）报告第一委员会之成绩（即俄国问题）；（四）提出“审查全权资格委员会”之报告；（五）报告华沙卫生会议之议决；（六）报告平时红十字会活动之草案；（七）闭会演说七种。此即轰轰烈烈空负盛名之日诺瓦会议之末日也。

此次日诺瓦会议除三次大会外，尚有四大委员会随时开会讨论，即所谓第一（俄国问题）、第二（财政问题）、第三（经济问题）、第四（交通问题）委员会是也。第一委员会又名政治委员会，其所讨论者为开恩斯原则之（一）（二）（三）三条，其中心问题当然为俄国问题。第二委员会所讨论者则为（一）银行纸币、（二）发行纸币银行、（三）公共财政对于重修问题之关系、（四）期票行市、（五）公私“信用”（Kredit）之组织等项问题。第三委员会所讨论者则为（一）筹谋出口入口商业之便利及其保证、（二）恢复商业关系之法律保证、（三）保护工业家及著作者之所有权、（四）领事事务之规定、（五）许可外国人经营其事业、（六）对于工业恢复之帮助、（七）关税等项问题。第四委员会所讨论者则为（一）陆地交通、（二）水上交通两项问题。除上述四种委员会之外，尚有三种委员会：一为法律委员会，审查法律问题；二为起草委员会，职司起草之责；三为审查全权资格委员会，掌管审查全权委任状之事。此即日诺瓦会议内部活动之情形，亦即日诺瓦会议之事业也。

在日诺瓦会议中共发生两种意外之事：（一）为俄德之单独结约，会场空气大为震动，自此以后，德国代表遂见屏于俄国问题会议之外，不独在日诺瓦会议中如此，即在将来召集之海牙专门家委员会中亦然，此无异乎刑法上所谓“剥夺公权全部”。（二）为法比两国之拒签五月二日致俄通牒，此事虽因比国为一点“所有权”之争而起，然而法比两国取一致步调，几使日诺瓦会议中途停顿。上述两种危险，为日诺瓦会议经过之两

重难关，其不危者亦几希矣。

然日诺瓦会议将终时，亦有两种意外之果：一是召集海牙专门家委员会以讨论未决之俄国问题，可谓继起有人。吾人若以血统为喻，则开恩斯会议为父，日诺瓦会议为子，海牙专门家委员会为孙，吾侪善颂善祷之新闻记者，但祝其历世家运蕃昌也。二为七个月之临时和平条约，此实为日诺瓦会议最后之遗嘱，若并此而不能守，则真令人生无穷之感矣。

二

日诺瓦会议已成为过去事实矣，其尚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者究为何物耶？以记者所得印象，分为三项，述录如左，或亦为留心欧局者所乐闻也。

一、日诺瓦会议之概观　此次会议之趋势可以两言括之，曰“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当去年英相乔治发起斯会时，以为若欲改造全欧经济极须注意下列三事：（一）欧洲和平问题。拟将华盛顿会议裁兵问题未竟之功于此会中竟之。（二）德国赔偿问题，再提出此会重新解决。（三）俄国重修问题，加以详细讨论。因此三事皆直接或间接与欧洲经济之恢复有重要关系也。不意法国方面对于（一）（二）两项不愿在会中讨论。因之英法当局迭次协商，乃将裁兵赔偿两项问题屏除于此次会议之外。是为日诺瓦会议议事范围之“由大化小”。从此以后，俄国问题遂成为会中惟一无二之重要目标，然而此次会议结果，竟未尝丝毫解决，不得已乃委之将来另组之海牙专门家委员会。是为日诺瓦会议议事范围之“由小化无”。又当初召集该会时，原拟邀请美国加入，不幸为美国所拒。后来俄德条约发生，德国代表又屏出于俄国问题会议之外，俄国代表在政治委员会中亦有时未得列席。比国因退还外国所有权问题，拒绝签字于五月二日之致俄通牒。法国表同情于比国，亦取一致步骤。捷克斯拉夫代表因会前曾与英法两方相约，倘英法有争论时愿守中立态度，故亦多日未曾列席。是为日诺瓦会议代表人数之“由大化小”。法国代表以此次会议毫无结果，屡催从速闭会，英国代表亦以久留此间实无目的，故亦主张散会。震惊一世之日诺瓦会议遂从此收束。此为日诺瓦会议代表人数之“由小化无”。至于由十五年之不攻击条约其结果一变而为七个月之临时和平条约，改造全欧经济问题其结果仅解决几件国际通车问题（交通委员会所议），其为“由大化小”更不言可喻。将来若不实行，则更将成“由小化无”，亦系意中之事也。

二、被处分者之活动　俄国在此次会议中纯处于被处分者之地位，虽以久为人所痛创之德国亦复思尝一脔，其他更可想而知矣。俄国代表处此四面楚歌之中，其应付方法可得而述者有四：一曰单独缔约。俄国代表既知环伺其侧者皆有所觊觎，与其静候彼等计成谋熟、共同进行，不如先行利用彼等内部利害冲突之弱点，一一与之单独直接交涉，以孤其势。故在日诺瓦会议以前，则有俄法两方秘密接洽之传闻，虽其后此事未能

实现，然当时确有一度之接洽，日诺瓦会议以后则有俄德条约之发生。现在德国既因单独订约之故见屏于俄国问题会议以外，则德国至少亦不能再助人谋己矣，不但不能助人谋己，而且急思自效以见好于俄国。此俄国代表之所以反而要求协约国准德参与海牙会议，以便为俄之助也。近来俄意条约、俄瑞条约之说更盛传一时，足见俄国此种单独订约运动进行甚猛。日诺瓦会议闭幕时，各国相约在海牙会议期间不得单独与俄订约，即所以防止俄国此种运动也。然俄国方面已因此提出极严重之抗议矣。二曰认清题目。俄国此次赴会之唯一目的，即在要求各国接济俄国财政，亦犹我国之参与华盛顿会议其目的专在退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故俄国每次谈判、每回公文皆认此事为先决条件，若此事不先行解决，则其他皆可不必再谈，其态度之坚决可想而知。同时又以取消私有权为共产主义之精髓，无论如何皆不肯牺牲，故对于退还外国所有权一事坚持甚力。凡此皆足见俄国代表实能认清题目，不易为人愚弄动摇也，与吾国华盛顿代表所取之态度迥乎不同矣。三曰刚柔并用。俄国代表团中分激烈缓和两派，缓和派常表示在相当程度内可以让步，如俄国代表齐吉林四月二十日致英相之函是也。而激烈派则始终坚持，如同时俄国代表团所提出之公文是也。俄国此种刚柔并用政策，使协约国方面颇有穷于应付之感，因之不得不略就俄国之范围。四曰对抗武器。凡一国与他国交涉，若无武器为其后盾，则必无效力。可以断言，协约国之武器为封锁，俄国之武器为宣传。各国惧宣传如洪水猛兽，故俄国得恃此以为对抗武器，其收效亦复不少。俄国方面既有上述四种对付方法，故虽处于被处分者之地位，而终未为人所处分。凡当弱国交涉之冲者，大可引以为师矣！

三、处分者之活动　处分者方面可分为两派：（一）英意派主张和缓，（二）法比派主张强硬。此次英国对于日诺瓦会议本抱有一种希望，深恐会议中途绝裂，故每次冲突，皆由英相乔治调处于其间。意大利对于恢复俄意经济关系亦极为热心，故常追随英国之后以尽奔走调解之劳。报载此次日诺瓦会议所产生之最大成绩，即为“英意联合”一事。英意两首相在意大利报界饯别席上，亦谓此后英意两国无论政治经济关系皆将密切联络云云。同时意大利外相更谓英意之间不久将缔结关于殖民地问题、石油问题、原料问题之条约，以促进两国邦交云云。由此可见“英意联合”已藉此次日诺瓦会议之机会而完全产出矣。至于法比两国对于俄国问题，其目的只在清算已往，与英意之经营将来迥然不同，故对于此次日诺瓦会议亦不如英意两国之热心。此次比国代表因退还外国所有权问题与英意意见不合，即断然拒签五月二日各国致俄之通牒，同时法国代表亦因援助比国之故拒绝签字，以致俄国问题各方坚持终无结果。于是乎为世属目、震惊一世之日诺瓦会议，遂不得不宣告散会矣。除英意、法比两派之外，其余各国或接近英意，或赞成法比，或保持中立，或朝彼夕此，要皆非主动之人，其对于日诺瓦会议之成败，

不能负功罪之责也。

（上海《申报》）

二　世界第二次大战之预测

自俄国红旗军[①]在波兰胜利后，连日西进不已，欧洲现状为之动摇，协约各国大恐。日前英国政府致最后通牒于俄国苏维埃政府，质问俄国对于波兰究竟有无媾和之诚意，限期答复。如无满意之答复，英俄邦交即从兹中断，全欧亦将因此陷入战争漩涡，一九一四年之局恐将再演一次。波兰其今日之塞尔维来乎？

自俄国接英国通牒后，吾人预料俄国必有极强硬之答复。盖协约国所恃以恐吓俄国者，一则曰封锁俄国，再则曰诉诸战争。夫俄国之被封锁，不自今日始也；昔日之艰难困苦皆已支持过去，更何惧今日协约各国之重行封锁？至于诉诸战争一层，更是引起各国内乱之极好机会。因各国工党对于俄国皆极表同情，一旦宣战，各国之险象立呈。此协约各国之所以踌躇而不敢断然决定，而俄国之所以悍然不顾、有恃无恐也。果尔不出吾人所料，俄国答复英国之通牒极为强硬。其言曰："吾俄愿与波兰言和，然吾军志在必得瓦萨（波兰要地），政府若下令停止进兵，必遭军士之反对。……"此种强硬滑稽之答复，无异对协约国宣战。于是素称圆滑之英相乔治亦忍无可忍，下令封锁俄境。法国政府亦语德国商务代表曰："吾法将假道德国与俄开战。"近来德国各地亦连日开国民大会表示拒绝法军过境。欧洲战云已重重密布，如处剧场中已闻锣鼓喧天，只须绣帘一揭，此一出全武行之喜剧，便将涌现于吾人之眼帘矣。

回忆一九一四年奥塞开衅，为时不过六年，令人不胜今昔之感。夫一九一四年之大战，系清算旧时代之账目（即十九世纪以来之糊涂账）；一九二〇年之大战，则为二十世纪之开场锣鼓。吾人虽旅居欧洲，不日战事临头，然亦不能不大放鞭炮以庆此开张之喜也。

战事既不可幸免，吾人便不能不进而考察各国国内之状况，以推测战局之将来。此次战争之当其冲者为俄德英法四国。除俄国立于战争主动地位，举国一致对付协约外，其余德英法三国之态度如何，实与战局有重大影响。今请先言德国。

德国国内现在最占势力者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即俄国苏维埃主义派）、德意志国性民党（即军阀派）、社会民主党（即温和社会主义派）三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俄国早

① 俄国红旗军：即苏联红军，下同。

有暗约，其表同情于俄国固不待论；即德意志国性民党，其宗旨虽与俄国苏维埃主义及独立社会民主党党纲大相悬殊，然其恨俄国及独立党也不如恨协约各国之深，故该党亦有与俄国及独立党携手以敌英法之势。两党若真联合，则社会民主党便孤掌难鸣，虽欲见好英法亦无能为力矣。今考察德国工人态度，大半表同情于俄国，小半则主张中立。然法国攻俄必经德境，故德之中立终不能保，德法之间必生轇轕。其结果也，少数主张中立之工人仍必趋于俄党之一途。盖德法之世仇已深，一触即发，而一般国民又多视党俄为恢复德国抗拒协约之最好机会，故战机一启，俄德必有联合之势，而欧洲局面、世界和平遂从兹破裂矣。德国亦自知兵力万不能抵抗英法，然虽不能积极的与英法作战，而消极的罢工亦足防碍法国之进行，况与俄国联成一气，勾引各国工人同时并起，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非复一九一四年之协约各国，尚有正义人道种种名词可以假借，而引起世界一部分之同情也。

以上系就德国现在形势而论，实有联俄之趋势。今再就俄国方面而论，亦复势逼处此，不能不与德国联合。

自欧战后，无论战败或革命之国家，无不感受生活之困难，如粮食、衣料、住居、燃料之缺乏，已成为当今最难解决之问题。由历史上观察，此种生活困难问题往往引起政治上之极大变迁。如昔日日耳曼民族之迁移，由东海以至于多脑河、从 Farmut 而至于罗马帝国，彼等固非因其游兴甚高或希望高等文明而南下，而迁移之主要原因，即感生活困难不能不另觅土地以求生活之安全。大凡一民族于其所居之土地不能得相当之生活资料，国民经济既已破产，则其迁移之冲动愈盛，故迁移战争遂成为历史上不可幸免之事实。

俄国地居欧亚北方，气候甚寒，不宜生产，在昔俄帝即抱有西出欧洲之雄图。当一九一四年百万俄兵出战，俄皇誓师之时即有“东普鲁士土地肥美，汝等得之可以安居”之语。欧战后俄国百业停闭，生活益感困难，俄人欲另辟天地以求生活，亦与昔日之日耳曼民族迁移之情形相同。故此次俄波战争，与其谓为政治问题，不如谓为生活问题。

俄人既蓄有南迁之志，则无论其为传播主义或解决生活问题，皆有不能不侵入中欧各国之势。据德人所推测，其入德境也有二种办法：（一）用强力侵入德境，如昔日日耳曼民族之迁移，（二）与德人联合组织德国苏维埃政府。若俄人取第一办法强力侵入，则德人现在无抵抗能力，只有听其自然。惟德国西南诸邦久有分立趋势，其时为自卫计，必各倚协约国以自固，于是德国之联邦政治将从兹瓦解。若俄人取第二办法，则德国必成为苏维埃之政治，与协约国立于反对地位。内既无维持秩序之军队，外又无抵抗协约之兵力，其结果德国遂变为俄国与协约各国之战场，所有生产、工农各业、国家经济信用皆将大受损失，于是德国前途不堪问矣。

现在俄国当局者皆系有眼光之政治家，必取第二种办法无疑。故吾人敢预言曰将来俄德必联合。惟联合之后，德国必为协约国所蹂躏，此实不可避免之事实也。

至于英法工党亦有正式宣言，不赞成其国政府帮助波兰。倘将来协约各国与俄国开战，各国国内必引起重大骚乱，又可断言。

一九一四年之战争系解决国际问题，一九二〇年之战争则为解决各国国内政治问题之导火线。百年以前法帝拿破仑欲解决欧洲问题，不惜深入俄国，雄师远征，今日俄国苏维埃政府欲解决欧洲问题，亦不惜深入中欧，与法国对垒。其传播新思想也相同，其雄师远征也亦同。吾人于此有一感想，即昔日之俄国思想最旧，而今日在世界上则为最新；昔日之法国思想最新，而今日则反居俄国之下。吾人从此可以窥见进化之道矣。记者写此信毕，提出两问题，请求读者诸君答复：

一、假若此次红旗军大胜，各国皆从新改造，世界将作如何景象？

二、假若此次红旗军大败，协约各军深入俄境，世界又将作何景象？

（上海《时事新报》）

三　世界人口问题[①]

四　伦敦海军会议之成绩[②]

五　国际三大经济新战线

战后欧洲各国，在军事上虽有战胜国战败国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无不居于战败地位，无不俯首听命于美国黄金大王威权之下。其中惟英国一国以其经济势力根深蒂固之故，远较德法等国易于恢复，但若持与战前英国经济势力独霸世界、莫敢与京之情形相较，亦复令人不胜今昔之感。现在英法等国虽以战胜国资格可向德国要求巨大赔款，但彼等要求到手之后，大部分仍须转付美国。换言之，英法等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当大战之时，法国方面为争最后胜利计，不惜为孤注一掷之举，凡可以有益于战事者，虽蹈饮鸩止渴之讥亦在所不辞。迨大战既终，狂热渐退，于是美国先生乃整其衣

① 该部分共二篇：（1）战前战后之比较，（2）人口密度与移民趋势。因篇幅所限本书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56页至第65页。

② 该部分共一篇，因篇幅所限本书未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66页至第77页。



冠，恭恭敬敬的将账单呈于法人之前，法人见之大惊。但在初时，法人尚以为法国既已大打胜仗，此项债务可令德国代偿，孰知后来协约各国察知德国赔偿能力终有一定限度，一切恫吓皆归无用，因此法人不免大恐。八十高年之和会主席克里孟梭先生乃欲以老学究资格（按克氏少时曾在美国当过语言教习）游说美国减轻债务，孰料美人心硬如铁，不为所动。而欧洲大陆成为美国经济殖民地之局面，亦似从此确定不可更改矣。

但以欧人素不甘居人下之禀性而论，安肯永为美国经济殖民地而不知所以自拔？于是遂有所谓“大欧罗巴”（Pan-Europa）运动者应运而生，以为抵抗美国经济侵略之计。甚至于有人主张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与“北美合众国”遥遥对峙。吾人若就欧洲历史观察，则由政治方面以谋各国统一，在最近百年之内，恐无实现之望。盖以欧洲人种语言之复杂，欧人个性之发达，均不易于彼此同化。此所以喀尔大帝、喀尔第五、拿破仑第一、威廉第二皆尝具有统一全欧之志而终无所成者也。惟“全欧政治同盟”一时虽属无望，而“全欧经济同盟”却非完全等于幻想，并且有一部分业已实现，譬如 Kali 工业同盟、铜铁工业同盟、化学工业同盟以及最近（十月十五日）议结之欧洲事业同盟是也。

“大欧罗巴”运动，自一九二六年十月初间在维也纳开会以来，久已引起一般世人之注意。但真正成为报章杂志之中心问题，却在今年九月初间日内瓦国际联盟席上法德捷三位外交总长热烈演说以后。盖前此“全欧经济同盟”一事，仅系欧洲经济界一部分人士之努力，至是更加上三国外交当局之提倡，于是此种运动遂有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矣。

法国外交总长白里安之言曰，“余以为各国土地互相接壤如欧洲各民族者，实有成立一种同盟之必要。……当然此种同盟，应以经济问题为第一要务，盖此问题现在最关紧要故也。余相信此项经济同盟必能得着效果。此外余并信此项同盟——既不碍及各国主权——从政治上及社会上两方着眼，亦与参加同盟各国极有利益”云云。

德国外交总长史特孟则谓，“《凡尔塞和约》曾使欧洲建立无数新国。……因近代发明之故，由南德意志到日本东京只须二十日工夫，而在欧洲方面则火车必须时时停止以待国境税关检查，……此岂非甚为可笑之事乎？各国为保全国家体面起见尝新办许多工业，必须设法加以保护，必须设法寻觅销场，其实此项工业在本国之内往往并无何等利益可图”云云。

捷克外交总长柏纳斯（Benes）则以为，“赔偿问题之最后解决，以及海牙会议之相互讨论，实为全欧新建一种经济进化基础无疑。自欧战议和后，为期忽然十载，其间欧洲各国尝采行一种‘经济的国家主义’，已为今晨史特孟博士所论及矣。因为美国势力膨胀问题、英国各种经济问题、欧陆诸国关税问题之故，遂使战后经济难关日甚一日，

以致此次海牙会议，大家目光不知不觉群集于全欧经济改组问题”云云。

按法德两国在欧陆各国中素执牛耳，而白里安及史特孟两氏，又为主持法德外交之中心人物，至于捷克外长柏纳斯则素为欧洲各小国政府所推崇，具有代表欧陆各小国发言之资格，因此上述三人演说，均值得特别注意，非似一班学者纸上空谈可比也。此外，意大利代表 Tcialoja 对于此种全欧结合问题亦复表示若干同情。惟英国外交总长亨德颂（Henderson）当时虽列席会议，而对此“全欧经济同盟”一事态度极为冷静。盖英国因坎拿大问题之故，不愿加入“全欧经济同盟”以给美国一种口实，促成美国合并坎拿大之举。因此之故，英国外交政策一面设法脱离欧战以来之英法协约密切关系，一面又与美国亟谋关于海军问题之彼此谅解。于是英国不愿加入“全欧经济同盟”之意，至是完全表露。不过英美两国海军问题虽然暂告解决，而彼此在经济方面仍是一支劲敌。因此英国外交方针一方既不加入“全欧经济同盟”，他方亦不愿与美共结联合战线。换言之，英国系于欧美两大陆之外另组一道战线自为门户也。

现在吾人所欲研究者，即德法两国世为仇敌，何以此次双方外交人物均力持“全欧经济同盟”之议，其动机安在？究竟两国是否果有合作之可能？就欧陆各国工业发达程度而论，实以德国为首，德国如欲实行赔偿责任，则德国输出非大大超过输入不可，如欲输出发达，则又非先行觅得巨大销场不可。战后德国海外殖民地尽为他人所夺，上次巴黎专家会议，德国代表虽有“退还海外殖民地为履行赔款义务的交换条件”之要求，但未为协约各国所接受。至于东亚方面，尤其是中国方面，虽系门户大开，任人来往，但又以美人长袖善舞、日人捷足先登之故，德国希望终嫌太小。于是德国不得已转向欧陆方面另图发展。但欧陆之上小国林立，所谓“关税保护政策”者处处壁垒森严，而且国力愈弱者，其所筑之“关税壁垒”亦愈高，换言之，所采关税保护政策亦愈为严格。……（此处有删节——编者注）

据下图观之（图略），欧洲各国入口税率以英国、荷兰两国为最低，俄罗斯、西班牙两国为最高。在此情势之下，德国货物当然不能畅销欧陆各国。是以德国人士主张打破欧陆各处“关税壁垒”一事，自在情理意料之中。盖打破关税之后，首受其利者，实为欧陆工业最称发达之德国故也。

其次则为法国。该国工业发达情形，在欧陆各国中稍次德国一等。将来欧陆各国“关税壁垒”打破之后，法国当然亦在获利之列，不过不及德国获利之大而已。吾人于此遂不能不发生一种疑问：即法国获利既不及德国之大，何以此次“全欧经济同盟”运动法国却最出风头？该国现任外交总长白里安既在国际联盟首先发言提议此事，该国前任国务总理 Herriot 更到德奥等国游行演说，鼓吹此举。此外，法国左右两派报纸几乎无不一致赞助此种运动，其原因安在？此无他，现在法国财政问题与德国赔偿问题具有

密切关系故也。协约各国瓜分德人赔偿，实以法国所得为独多，倘德国输出不增，则所谓“杨计划”[1] 者仍不能实行。德国政府近年之所以能履行“道斯计划”者，多赖外资之力，已如记者前函所述，至于国内各项税收，已加至无可再加。据日前《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所载：德国各工厂所入约有百分之七十为税捐所夺去云云。是以前次巴黎专家会议既将“杨计划”议结之后，德国代表曾声言：此种解决只算“政治的解决”而非“经济的解决”，换言之，此项计划并非从德国经济实际状况着眼，将来是否能够一一履行殊属疑问云云。果尔，则德国赔款问题现在仍不能算根本解决，其结果法国财政计划亦将随之动摇。所以法国方面不能不助德国一谋生财之道。德国民间常有一种滑稽寓言，略谓：“有某甲者负债累累，时值严冬方届，寒侵肌骨，某甲乃往告彼所欠账最多之债主某乙曰：‘请将子之皮衣一袭见借为幸。’某乙闻之不禁大惊，乃反诘曰：‘子欠吾债最多，今更向我再借皮衣，天下安有是理?’某甲于是从容答曰：‘窃思余欠子债最多，因此余之生死存亡亦惟有足下最为关心，倘余一旦因寒而死，则吾债主中损者亦以子为最大，此所以不向其他债主而独向足下开口借衣也。’”此虽一段笑言，但现在法国明知“欧陆经济同盟”德实最享大利，而仍不生醋意者，其情况固绝类此寓言也。犹忆吾国辛丑和议之时，联军各国对于吾国赔款来源亦复代为精密筹划，不厌求详，此正西洋帝国主义者贤于吾国军阀之处。盖西洋帝国主义者虽亦抱榨油主义，但极肯代被榨者筹思生油之法；而吾国军阀则只知榨油，并生油之道亦不耐为之一想也。

由此观之，德法两国在政治上虽为世仇，而在经济上现刻却有相依为命之势，故彼此对于“全欧经济同盟”一事皆不惜以全力赴之。现在吾人所应研究者，即欧陆各小国对于此种运动作何态度是也。

前文曾言捷克斯拉夫外交总长柏纳斯素为欧陆诸小国政府所推重，彼既以极热烈之演说赞成“欧陆经济同盟”，吾人已可从此窥见欧陆诸小国态度之一斑。此外，丹麦国务总理 Stauning 亦尝接见各报记者，表示对于此种同盟在原则上甚愿接受之意。其余各国舆论亦多倾向赞成一途。盖欧陆诸小国之工业虽不如德法两国之进步，但农产却极发达，各国为保护自国农业计，极力排斥他国农产品输入。倘一旦“欧陆经济同盟”告成，则诸小国一方面可将自国农产畅销他国，一方面又可将前此“为国家体面”而设之新工业加以撤废。换言之，欧陆各国从此成为一种“分工”组织，各展其长，尽量发

---

① 杨计划：1929～1930 年由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 O. D. 杨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新的赔款计划。于 1930 年 1 月经海牙赔款会议最后通过。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1）规定了德国的赔款总额和支付年限。把赔款总额由 1320 亿马克（1921 年 4 月伦敦会议确定）削减为 1139 亿马克，分 59 年偿付，赔款来源为德国铁路和政府预算收入。（2）协约国对德国提供所谓杨格计划贷款，净额为 12 亿马克。（3）废除协约国在德国的一切监督机关，取消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经济的直接控制。成立国际清算银行，以调节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关系。（4）协约国从德国莱茵区撤走占领军。

挥，以抗美国之经济侵略。德国在一八三四年以前经济亦极不统一，阻碍全国生产进步，自德国经济同盟告成以后，全国实行分工，于是德国经济进步一日千里。现在德国各联邦在政治上虽时有隔阂，而在经济上则有如一家，即其例也。德国方面因有此种好例在前，所以此项“全欧经济同盟”运动，亦以经济界人士最为努力，促成全欧车业同盟等等。至于打破欧陆各国“关税壁垒”一事，则系采订结商约手段，以期渐渐达到完全打破之目的。此外，更有热心此项运动之人士组织团体、发行杂志，并制成“大欧罗巴洲”旗（蓝天黄日红十字）以资号召，风起云涌，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矣。

（北平《晨报》）

乙　政治问题[①]

六　德意志各党之内容

七　普鲁士邦会选举时之情形

八　德国之恐怖时代

九　德国右派之虚无党手段

十　爱尔池摆改被刺后左派之反动

十一　十年来目击之德政潮

① 该部分共六篇，因篇幅所限本书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87 页至第 144 页。

丙 经济问题[①]

十二 世界经济重心之移转

此次欧洲大战，其影响及于全世界。若以人类全体而论，当然为空前未有之损失，若以参战各国而论，其一方面因受战事影响而大遭损失者固属不少，其他一方面因受战争之赐而大获其利者亦所在多有。即就经济一项而言，大约可分三类：

（甲）经济上之失败者，战胜国中如法意等国，战败国中如德奥等国是也。

（乙）经济上之胜利者，如美日两国是也。

（丙）经济上之得失各半者，如英国是也。

此次战争结果其最足令人注意者，即为世界经济重心之移转，昔日中欧各国工业大兴，资本雄厚，为欧洲大陆之重镇。资本势力渐集中于西欧之英伦，更由英伦而西，以集中于美国日本。昔日欧洲文化系由亚洲经地中海而至欧洲大陆，再由欧洲大陆而至英伦，而美国，而日本，而中国，其经过路线皆系由东而西。今日经济重心之转移，亦遵循由东而西之路线。吾中国其为世界经济重心最后移转之一地乎？抑为各国经济势力最后集中之一地乎？

中欧各国资本势力既已逐渐西移，于是中欧各国经济情形遂有反客为主之势，换言之，昔日中欧各国之以资本势力向世界各地发展者，今已变为世界各地之资本势力向中欧各国发展。不但中欧如此，即东欧独树一帜之俄国亦难逃此例。此种经济重心之移转，影响于欧洲各国政治者甚大，即欧洲工人好谈之阶级战争亦因此而发生急剧变化，不似前此之单纯矣。此种外国资本压迫之情形，以中欧各国为最甚，记者当于下次通信详述之。兹所述者，为经济重心移转之大势。

德国在欧洲大陆为新兴之国，半世纪以来，工商发展，政治修明，在欧洲经济界上为重镇，渐与久为世界经济中心之英国分庭抗礼。法国工商业虽不若德国之猛进，然亦颇能维持欧洲强国之地位。故在欧战前言欧洲经济者，必以英德法三国并举，余子碌

① 该部分共五篇，本书收录了其中两篇。

碌，不足道也。自大战后，德国为战败之国，经济濒于破产固不足怪，即所谓战胜国之法国，其经济上之失败亦正与德国相同。吾人试一观察法国战前战后之存金数目，便可知其损失之巨初不让于德国矣。当一九一四年，法国有存金二万万八千五百万镑，现在只有存金一万万四千四百万镑。前后相差一万万四千一百万镑，此即法国战中之损失也。德国在战争中之损失，据德报记载，其数为一万万二千六百万镑，与法国之损失相差无几。故德法两国专就金融一项而论，几不能维持欧洲经济界重镇之资格矣。而况战后工商停滞，又远不如英美日本诸国乎？

欧洲所谓三大强国之德法，既不能维持欧洲经济界重镇之资格，则欧洲经济之重心当然集中于英伦固不待言。英国存金在欧战时虽略有损失，然为数无多，据报纸所载，其数如下：

战前存金　　　一万万六千一百万镑

现在存金　　　一万万四千六百万镑

不及战前之数　一千五百万镑

据上表观之，足见英国魄力之雄厚，恢复之迅速矣。英国损失之存金，既远不如德法两国之巨，他方面又取得德国海外市场而代之，故贸易因而加增。所谓失之于存金者，今又得之于贸易。据德人最近调查，战前英国贸易总额与欧洲大陆贸易总额相较，其不及之数为六千八百三十万镑。战后英国贸易总额与欧洲大陆贸易总额相较，其超过之数为二万万七千九百七十万镑。

由此观之，英国在欧洲之经济地位较之战前尤为巩固。然英国在欧洲方面虽仍为经济界之重心，若以世界经济重心而论，则英国又须逊让美国一筹矣。

美国在一九一四年存金为三万万七千一百万镑，现在存金为四万万四千五百万镑，超过战前之数为七千四百万镑。若以商船而论，在战前为二〇二七〇〇〇吨，现在则为一二四〇六〇〇〇吨，其增加之速度，实可谓骇人听闻。

吾人若再检查美国战前、战中、战后之出口超过入口表，更可以发现美国年来经济发达之次序：

年　份	出口超过入口之数
一九一四年	四万万三千六百万元
一九一五年	十万万九千五百万元
一九一六年	二十二万万六千五百万元
一九一七年	三十五万万二千一百万元
一九一八年	二十九万万七千二百万元
一九一九年	四十万万一千八百万元

观上列一表，便知美国现在出口超过入口之数，较之战前约在十倍以上。美国加入战争时虽略为减少，然自停战以后又大为增加。此种气魄又超出英国之上。故记者谓世界经济重心，现已由英伦而西渡大西洋以集中于新大陆也。

虽然，吾人谈世界经济重心，美国虽可首屈一指，然吾人万不能不一观东邻之最近情况。日本年来经济之突飞猛进，亦颇有令人惊骇之处。譬如：

（甲）原料品之输入 战前为百分之十
战后为百分之四十五

（乙）熟货之输入 战前为百分之七十五
战后为百分之四十一

（丙）原料品之输出 战前为百分之五十八
战后为百分之四十三

（丁）熟货之输出 战前为百分之十三
战后为百分之五十四

观此则知日本原料品之输入战后实多于战前，熟货之输出战后又多于战前。其工业之发达，可想而知。即以玻璃一业而论，战前为德国重要出口货之一，战后已由日本起而代之。日本国内玻璃工厂已由四百六十三个增至八百二十二个。今日日本之于欧洲已不是消费者，而是供给者。欧洲人之于日本已早为注意，而况太平洋两岸之风云又正如潮高起引人注意耶？故现在谈欧洲经济重心者，不能不及英国，谈世界经济重心者，不能不及美国日本。吾更望谈将来世界经济重心者，又不能不及此可怜之中国。

（上海《申报》）

十三　外国资本压迫之中欧

记者上次通信，曾将世界经济重心之移转介绍于读者诸君之前，并谓下次通信再将外国资本压迫中欧各国之情形详为叙述。此篇通信，即践吾上次通信之约言也。

欧战后，所有欧洲参与战事各国，无论其为战胜国或战败国，几无一不负外国巨债。据德报纪载，战后全欧所负美国之债务约三百万万金马克。若再加上欧美私人间商业契约所发生之债务，则欧人所负美人之总债务，当在六七百万万金马克之间。由此观之，全欧各国固早已成为美国之债务国矣，吾何独注意于中欧而为之特别纪述？

盖以国家负债本极寻常之事，战前战后，何国无之？现在全欧各国所负美国之债务，其数虽巨，然以欧人生产能力之伟大，整理经济之迅速，不数年间必可清偿债务，

措置裕如。故国家负债不足为欧人之病，所可惧者，外国资本之侵入，将国内各种重要实业之权皆握于外国资本家之手，潜移默化，转客为主，此则大可令人注意者。记者此篇通信所述之中欧，不幸即蹈此种覆辙，故特别为之纪述，以告我亲爱之国人，一则可以了解中欧实业界之近情，再则可以用为自警之殷鉴也。

此篇通信所谓中欧，系指德意志、奥大利、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所谓外国资本之侵入，分为直接的侵入与间接的影响两种。所谓直接的侵入者，即外国资本侵入各公司之股份，换言之，即外国人直接为该公司之股东，将公司大权置于外人势力范围之下也。所谓间接的影响者，即各工厂资本缺乏，无力自行造货，于是承揽外国资本家之生产，换言之，即外国资本家给该公司以原料，使之制造某种货物，造成之后，将货物交与外国资本家，由外国资本家给与相当工资，中欧各工厂遂一变而为外国资本家之工人，为他人作嫁衣裳，此即外资侵入之间接影响也。今请先述外国资本直接的侵入。

外资直接侵入之原因有二：（一）战后中欧各国汇价甚低，即以德国而论，在战前每一中币只能购两马克者，在战后汇价最低之时，中币一元竟可购买八、九十枚马克。其相差之数，约有四十倍左右。荷兰距德国最近，而荷币之汇价最高，于是乘机购买德国各公司之股票甚多，其便宜较之战前在十倍或数十倍以上。英美等国踵而行之。故去年马克价值曾飞涨一时，其原因虽多，而美国大资本家争购德国各公司之股票，实为马克市面活动重要原因之一也。公司股票既多属于外国资本家之手，则公司大权当然有反客为主之势。此种情形记者不必多述，请读者诸君闭目一思中国各种华洋合办公司之内容，便可了然一切矣。德国在中欧各国中犹为最有力之国，其实业界之情形已如此，若夫奥大利等国，其汇价之低落更远过于德国，外国资本之容易侵入更不待言。（二）中欧各国原料缺乏，须向外国采购，亦为外资侵入之原因。中欧各国自大战后，原料缺乏，各工厂因而停闭。各工厂欲恢复原状，其势不能不向外国采购原料。然采购原料又苦于现金缺乏，其势不能不利用“信用券”之办法预约期限付款。此种信用券一落外国资本家之手，取得债权者之地位，逐渐侵入公司资本之范围，无形中又取而代之矣。譬如柏林某电气公司，其资本为一万万马克，其中为美国人所占据者便有二千五百万马克。又闻另有某电气公司现在亦在意大利人势力范围之内。且外国资本不但侵入德国各个公司，而且涉及各项实业之全部分。譬如电气工业全部分、树胶工业全部分、保险会社全部分、轮船会社全部分，几乎均出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此种外资侵入情形，实可惊也。

至于奥国实业界，更可悲观，所有银行资本外人占据极多，其他会社，如

Alpine Montan 会社属于意大利势力范围之内；

Ternizer 钢铁工业属于意大利势力范围之内；

Beitscher Magnesit 工业属于美国、瑞士势力范围之内；

Boslaner Kammgar 工厂属于瑞士势力范围之内；

Donau 轮船会社属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

此外类此者尚多。一言以蔽之，中欧各工厂多生活于外国资本势力之下也。以上系述外国资本直接之侵入，以下再言外国资本间接之影响。

中欧各国既乏原料又缺资本，于是不得不招揽外国生意，为外国资本家而生产，以劳力换取工资。譬如汉堡某纸烟公司，由法国资本家给与原料及食料，为该资本家制造纸烟，给以工资，即其例也。若统观中欧全局，则德国为荷兰人作工，奥国为意大利人作工，波兰为英国人作工，其余若法国之于南斯拉夫，英国之于匈牙利，美国之于波兰，皆有划归势力范围之意也。

吾人于此足见中欧情形颇有与中国相同之点：第一、各国对于中欧，已有各树势力范围之趋势，恰如中国扬子江流域为某国势力范围、满洲为某国、云贵为某国势力范围，此与中国情形相同者一也。第二、外国资本之后，有外国军阀主义、国家主义以临之，势穷力竭，不得不从，此与中国情形相同者二也。中欧工人多为外国资本家作工，此与中国情形相同者三也。

现在中欧工人运动，其目标已不专注国内资本家，而兼注外国资本家，故现在中欧工人多主张从国际运动下手，不似前此之偏重国内运动矣。此记者上次通信所以谓外国资本压迫中欧，因而影响于欧洲政治者甚大也。

（上海《申报》）

十四　欧洲农业革命潮流[①]

十五　德国金融事业之今昔观

十六　德国银行业集中运动

① 以下十四、十五、十六 3 篇，因篇幅所限本书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154 页至第 180 页。

丁 社会事业[1]

十七 德国之新闻事业（四篇）

一

记者自前年六月以通信与读者诸君相见者，两年于兹矣。日来偶检行箧，遍查旧稿，乃发现年来通信两大弱点：第一，所有通信，关于政治方面者占十之七八，关于社会方面者只十之二三；第二，关于消极方面者（如叙述各国外交、德国赔款之类）占十之八九，关于积极方面者（如叙述德国政治上社会上之新建设等等）只十之一二。以记者在国内极不喜作政谈之人，而一到欧洲从事通信生涯，遂无日不与外国政治为缘，且所谈者又多系一时政象，过眼即成陈迹，于读者诸君何益？于自己学问何益？于垂死待救之中国何益？夫报告"当时此地"之政治现象，虽为吾侪通信记者之最大任务，然若于吾国实际上无大补益，则不妨暂时从权，付诸阙如。今日吾国自政治社会诸大端以至于起居饮食各小节，几无一不待吾人起而改良。欧人之政治社会虽不必尽如人意，然其可以为吾人之模范者则所在皆有。不欲改造中国而已，如欲改造中国，则必须先从社会改起，盖社会者，一切政治之源也，未有社会不良而政治能良者也。故今后记者通信当偏重社会方面，即或叙述政治现象亦当偏重积极方面（如政治上新建设等等）。此外关于欧洲政治之消极方面及中德关系之重要消息，其为吾人必须知之者，仍当择尤报告，以符通信记者之职责。此篇通信，即为记者改变通信方针后之第一次通信也。

吾侪既从事通信生涯，则此篇关于社会方面之通信，亦即请以德国新闻事业为始。

德国因教育普及之故，几乎无一人不能看报，无一人能不看报。不但各大城中报馆林立，无虑数十处，即较大之乡镇亦间或设有报馆一二，其发达之程度可想而知。专以柏林一处而论，便有日报六十余家，此外尚有政治周刊、月报三十余家。至于专门杂志，则为数当在六百种左右。德国有大政党七，每党在各城中皆各办有机关报一种或数种，报上多大书特书"某党之机关报"字样，决不似中国政党机关报鬼鬼祟祟遮遮掩掩

[1] 该部分共四篇，本书收录了其中两篇。

之情形。德国人民大概皆有党籍，既有党籍之后，则在甲党之人决不看乙党之报（政治家、新闻记者遍阅各党之报自系例外），故其思想纯系本党色彩，决非他党所能煽动。记者每遇德人，多劝记者曰："王先生请你购阅我们的报，消息灵确，主张公正。"彼所谓"我们的报"，初闻之或以为彼系报馆中人，其实彼与报馆毫不相干，不过该报为彼之党中所办而已。从此吾人可以想见报馆与读者之间关系如何亲密，报馆支配人民思想之魄力，又如何伟大！

德国大报多系每日早晚发行两次，日中则随时发行号外，遍贴街衢。每周发行教育增刊或工业增刊一次，随报附送，以提倡教育、实业，其性质略与本报汽车增刊相似。此外更将本周国内外新闻作成有统系之纪载，另刊周报一册，以便旅外德侨及国内事忙之人，用最短时间对于国内外大事得一明了之观念，其性质颇似本报之星期增刊。惟本报之星期增刊仅提要纪载，彼则长篇叙述；本报仅刊印一张随报附送，彼则装订成册，格外售卖，此其不同之点耳。

英法各报多附印各种像片，德国报上则绝少此类像片，惟每周另刊行画报一册，专印各种时事像片，格外售卖。日前奉直战争时，《佛兰克星期画报》即刊有张胡帅像，并详述奉直战争之因果。此种画报尤极力提倡体育游戏，以引起国民之尚武精神。

德国各报之编辑大概分为：（一）政治、（二）文艺、（三）商业三栏。（一）政治栏刊在第一张上面，其内容与本报之专电、国外要闻、国内要闻三栏相同。惟德报之紧要新闻，无论国内国外，多用电报或电话传递（亦间有用邮递者，惟大多数皆用电报电话传达），一篇电报几等于记者半篇通信之长。故要闻即专电，专电即要闻，不似中国各报，要闻之外另有所谓专电一栏。（二）文艺栏包括小说、戏剧、音乐、美术各种，多刊在第二张之下半节（上半节系政治消息）。（三）商业栏刊在政治栏之后，如汇价行情之类，与中国各报之行情表略相近似。惟德国各报于行情表之上另有长篇论文一首，畅论工业商业金融之因果及其趋势，不似上海各报之"近来金价看涨或看跌"数字所能了事。德国各报有以商业一栏编制得法、论断详确，因而销路增加、广告发达者，如《佛兰克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也。《佛兰克日报》虽在佛兰克出版，而销路则遍于全国，其原因即由于该报商业一栏编辑完善，凡从事商业者无不购阅。该报在柏林方面置特派员九人，其中即有三人系专司商业消息者，其对于商业栏之注意可想而知矣。

德国各报晨刊间有短评数首，颇似上海各报之时评。晚刊则多载有长篇论文一首，或系积极方面之建议以指导舆论，或系消极方面之批评以攻击政府，词严义正，此则为上海各报所不多见者矣。此种社论往往不刊著者姓名，盖即表示代表全体报馆之意，不但代表全体报馆，而且往往代表一党主张。总之德国报馆不是一座房子，几位主笔，而是一部分特定的、宗旨相同的、有组织的群众之言论机关，故其发言极为有力。中国报

纸号称代表大多数民意，或竟不客气倡言代表全体民意，而按之实际，仍是代表一座房子，代表几位主笔，故立言虽不无可采，而收效却等于零。今后吾国各报若欲求其发言有效，必先寻得一部分特定的、宗旨相同的、有组织的群众为其后盾而后可。以上系概论德国各报之外观，此后再述报馆内部之组织及其工作之情形，以为吾国各报之参考焉。

二

记者于昨日通信中，曾将德国报纸之外观略为介绍，今请再进而叙述报馆内部之组织。

德国各报内部组织各有其不同之点，然大体上则相差无几，今请举《佛兰克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 一例以概其余。记者所以必举《佛兰克日报》为例者，其理由有二：第一、佛兰克位于德意志之中部，为德国交通最便之商埠，北有柏林（中央政府所在地），南有巴燕（反对党所在地）。前者颇似吾国之北京，后者颇似吾国之广州，佛兰克位于其中，则颇似吾国之上海与汉口，而《佛兰克日报》复与商业有甚深之关系，又颇似上海之本报。今举该报为例，或足以供吾人之参考。第二、记者到德国后，以旅居佛兰克之时为最久，与该报外交记者 Von Dewall 君往来最密。Von Dewall 君战前曾住中国十余年，对于中国情形尚称熟习，彼现任该报外交记者，专管中国、日本、英国、美洲之外交事件。彼常有关于中国之论文在该报发表，其有益于中德邦交之处正复不少。记者既与之游，因得闻该报内部之组织甚详，故今特举该报为例，纪述或较为详确。《佛兰克日报》内部组织分为四部：（一）董事部，（二）编辑部，（三）营业部，（四）印刷部。

一、董事部。《佛兰克日报》为 Sonnemann 君私人资本所创办，已成立六十六年，现由彼之两孙所经营。董事部系计画全体报馆进行事宜之机关，为下列五人所组织：（甲）Sonnemann 之孙两人，（乙）营业部经理一人，（丙）编辑部主笔两人（一为政治栏主笔，一为商业栏主笔）。凡聘请主笔须由董事部与编辑部合意而定，董事部无单独决定之权。关于编辑事宜，如报馆对于某种政治应取何种态度之类，概由编辑部自行决定，董事部无指挥干涉之权。吾人若以现代政治制度例之，董事部颇似代表各方之国会，而编辑部则颇似一种责任内阁也。

二、编辑部分为政治、文艺、商业三栏，每栏之中复分数组，其内容如下：政治栏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外交组，共有正主笔三人，副主笔二人。（甲）主笔一人，专管（1）英国、（2）美洲、（3）东亚、（4）德国对外政策。（乙）主笔一人，专管（1）法国、（2）意大利、（3）及其他中立各国等。（丙）主笔一人，专管（1）东欧各国（如俄国、波兰、巴尔干各国之类）。（上述甲项所谓德国对外政策，系包含德对于世界各国之

外交而言，譬如俄德缔结条约则属于〔甲〕项主笔而不属于〔丙〕项主笔。反之俄国饥荒消息则由〔丙〕项主笔管理，而不属于〔甲〕项主笔。吾友 Von Dewall 君即系〔甲〕项主笔，为该报中最有关系之部分。）第二组为内政组，共有正主笔六人，副主笔二人。（甲）主笔一人，专管各党政策。（乙）主笔一人，专管文化政策、社会政策。（丙）主笔一人，专管法律政治。（丁）主笔一人，专管财政税务。（戊）主笔一人，专管北德意志新闻。（己）主笔一人，专管南德意志新闻。文艺栏共有主笔五人。（甲）总主笔一人，主笔二人，管理全栏事宜。（乙）主笔一人，专管戏剧批评。（丙）主笔一人，专管音乐批评。（丁）主笔一人，专管美术批评。商业栏共有总主笔一人，正主笔四人，副主笔二人，管理全栏事宜，其工作分配方法未详；惟闻该栏主笔似系共同管理该栏事宜，不似政治、文艺两栏主笔之各有专司（此处应注意者，文艺、商业两栏皆有总主笔，而政治栏则无之，其理由甚长，容后详）。

除上述三栏主笔之外，尚有看大样之主笔三人，专管某项新闻应排列于某版某处之类。有时普通电报无关重要者，亦径由该主笔直接付印，不必再经上述三栏主笔之审阅。《佛兰克日报》晨刊系两张，晚刊系一张，此项看大样之主笔既有三人，故每人各管一张。除大样主笔之外，尚有校勘三人，每两人共管一张。

三、营业部专管发行报纸、刊登广告事宜，与编辑部完全划开。

四、印刷部专管印刷事宜，共有大机器五部，工人数百。

以上即为该馆内部之组织，此外尚有关于各地通信员之任务，与夫编辑部办事情形等等，甚饶兴趣，俟下次通信再为详谈。

三

记者日前连上两函，曾备述德国报纸之外观及其内部，今请再述报馆办事之情形。

《佛兰克日报》属于民主党一派，彼之内部组织亦完全基于民主主义之精神。记者前函曾言报馆之董事部（即报馆中之资本家与其他营业编辑两部代表所合组者）无指挥干涉编辑部之权，不似其他各报之有所谓“太上主笔”；同时编辑部中之政治一栏，又不设总主笔一席，复不似其他各报所采之“首领制度”。所有该报言论态度皆取决于一种“主笔会议”。此项会议系由政治栏全体主笔与文艺、商业两栏之代表所组织，每日早晨开会一次，政治栏主笔必须全体与会，文艺、商业两栏则各派代表一二人参与，然至少必须派遣一人。开会之时即由各位主笔自行陈述彼对于某项政治或某项事变所欲取之态度，若会中其他主笔对于彼之主张毫无异议时，此项主张即作为报中之公同意见，此后著文叙事皆以此种主张为立言之标准；倘会中其他主笔对于彼之主张如有异议时，则彼此互相辩论，其结果或参酌反对方面之意见，或对于自己之主张根本放弃，有时或竟因坚持自己主张之故，从此退出报馆亦在所不惜。故此种“主笔会议”颇似责任内阁

中之国务会议，会议席上之外交、内政、文艺、商业各项主笔，则有如国务会议中之各部总长也。其实此项“主笔会议”直呼之为“国务会议”亦无不可。盖此项主笔，类皆各有其专门之知识，可以胜任报馆中之外交主笔者，即同时可以胜任内阁中之外交总长。故一家报馆恰似一个“小政府”，其量虽有大小，其质毫无殊异。记者近来观察欧洲社会，几乎无处不是“小政府”，无处不是“小国会”，大之如工商学术团体，小之如青年游戏组织，无不如此。由此可见欧人之习于团体生活、适于合议制度，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吾国古者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言，若以今语易之，则当谓为“求国家柱石于善良团体之中”矣。

《佛兰克日报》此种“主笔会议”，于每晨行之，讨论本日报中各项重要事件，已如上述，吾人可命其名曰“例会”。此外如有紧要事件临时发生，则召集“临时会议”，其召集之法，以击钟为号。犹忆记者有一次正与该报记者 Von Dewall 君会谈日诺瓦会议新闻时，忽闻钟声大鸣，Von Dewall 君即语记者曰：“现有紧要事件发生，当开临时会议，恕不能奉陪。”语毕即出，其时约在午前十一点半钟也。

报馆中以政治栏部分最为重要，故采合议制。至于文艺、商业两栏则事较简单，故各置有总主笔一人以综管全栏事宜。在“主笔会议”之中，文艺、商业两栏既不占重要位置，故不必全体参与，只派遣一二人到会即足。此处吾人极宜注意者，即董事部与营业部对于“主笔会议”完全不能与闻。有一次 Von Dewall 君曾笑谓记者曰：倘董事部或营业部向“主笔会议”提出警告云：“诸位主笔先生，你们如此主张，恐怕读者不甚欢喜，要影响到我们的销路，我们要大折其本。”主笔会议只能答曰：“董事部或营业部诸位先生，我们主笔会议提出此种主张，是我们全体主笔的公意，我们应有的权限。我们对于报馆折本十分惋惜，但是可惜我们不能帮忙。”其表示一种言论自由之精神，可谓惟妙惟肖矣。现在吾国报馆往往向政府要求言论自由，其实在报馆自身之中言论便不自由；不自由之言论，而欲其具有转移一世舆论之魄力，实戛戛乎其难矣！

《佛兰克日报》中最令人注意者，即为其办公时间实与吾国报馆大异。中国人自朝聘大典以至于一切琐事，皆喜于深夜行之，故为人作事，多带几分昏浊之气。欧洲人则一反其道，作事皆喜于白昼行之，故思想行为总含有几分清明之气。中国主笔生活，以黑夜执行职务为原则，白昼从事编辑为例外。犹记数年前记者在北京某报担任编辑，每日半夜三四点钟犹须发稿，实为人生至苦之事。《佛兰克日报》记者办公时间系每日上午八钟起至下午一钟止，所有全体记者皆到馆办事，自下午一钟起至三钟止，只留一半记者在馆办事，自下午五钟起至七钟止，则另换其他一半记者在馆办事。计每人每日共工作七钟之久。每位记者皆各有私室一间，若正在作文时，室前往往悬有一牌，上书“幸勿入内，禁止敲门”字样，盖恐其扰乱文思也。至于看大样之主笔共有三人，已如

前函所述，此项主笔有时必须在夜间工作者，即由该主笔三人彼此轮流替换，以免一人独为其难。《佛兰克日报》晨刊第一张在前一日午后五钟即已出版，晨刊第二张则在夜中出版，晚刊则在本日上午十二钟出版，与吾国上海报纸情形略异。若上海报纸不能办到白日工作，至少亦须采取轮流替换之法，否则难免精神不继之感也。

四

德国报纸有一事最为吾国报纸所不能及者，即其新闻传达方法极为灵通迅速是也。吾国新闻材料之到报馆，大半由“大门”进来，德国新闻消息之到报馆，则大半由“房顶”飞入；吾国报馆记者采取新闻大半用“眼”，而德国报馆记者采取新闻则大半用“耳”。此其不同之点也。

今仍请以《佛兰克日报》为例。该报建筑系洋楼四层，第一层为营业部，第二层为文艺、商业两栏编辑部，第三层为政治栏编辑部（主笔会议厅亦在此层），第四层为电话电报室，即该报新闻材料之发源地也。电机之旁有速记生数人（德国速记生之职多女子司之），凡有电话电报到此立即速记缮出。电室之旁有传达机一架，该速记生将电话电报稿子置人其中，但将机枢一转，转瞬之间该稿已直达政治、商业各栏之编辑部矣。德国交通便利，举国皆可通达电话。不但国内如此，即国外如法国、瑞士、奥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等首都，亦可以电话传达。如不能用电话时，始代以电报，故其消息极为灵通迅速。该报除上述电话电报室外，其余每位主笔桌上皆各有电话机一架，可以随时自由向国内外访员探询一切，毫无隔阂之虞。故德国报馆初不必邮卒电差往来频仍，而新闻材料实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吾国有一句笑话“闭户造新闻”，若德报者，可以谓为“闭户得新闻”矣。

大凡一个报馆之中其最要部分，当然首推编辑一部，其与编辑部关系最为密切者，则又当推访员一职。编辑员犹庖丁，烹调得法，则食者适口；而访员则有如跑街，采购原料须审择合宜。若该跑街专行采购臭肉腐米，则虽有巧妇，亦难乎其为烹调矣。故报馆对于访员之要求，第一须具有审择材料之卓识，第二须与报馆发生密切之关系。因此之故，德报访员大半均由本馆编辑员外放。譬之政界，编辑员犹“京官”，而访员则犹“京选”之外官也。《佛兰克日报》之国内特派访员其人数如下：

（一）柏林总访员一人，政治访员五人，商业访员三人；（二）门兴一人；（三）汉堡一人；（四）Koln 一人；（五）Karlsruhe 一人；（六）Stuttgart 一人。

国外特派访员如下：

（一）伦敦一人，（二）巴黎一人，（三）罗马一人，（四）瑞士一人，（五）维也纳一人，（六）匈牙利一人，（七）塞尔维亚一人，（八）捷克斯拉夫一人，（九）华沙一人，（十）里加一人，（十一）瑞典一人，（十二）纽约一人。

除上述特派访员之外，尚有无数代办访员散布全国内地及其他国外各处。该报在东亚方面此时尚未置有专员（战前该报曾派有专员。参观去年一月二十六日记者《德国对华新闻事业》之通信），所有关于中国之消息多采英法各报。

吾国京沪各报对于他处报纸之重要新闻，往往剪下转载，而内地各报之国内要闻则又多转录京沪各报。吾人常戏呼此类主笔为“剪刀主笔”。其实此类“剪刀主笔”在德国报馆中亦复不少。不过彼辈所剪者为外国报纸，而中国“剪刀主笔”所剪者则多为本国报纸耳。吾前函曾言《佛兰克日报》政治栏之外交、内政两组各置有副主笔二人，商业栏则置有副主笔三人，此项副主笔之责任，即在遍读各国报纸，将各项重要新闻分类剪下，或译登本报，或留备参考。《佛兰克日报》除商业一栏极为著名外，外交新闻亦颇擅长。其得力于此类“剪刀主笔”之处当亦不少也。

报馆于普通新闻外，如遇特别问题发生须具有专门知识之人始能了解者，则报馆立即延请专家加以讨论，决不说一句敷浅外行话。总之，德国报馆常备有两种要素：(一）顾问资格。报馆对于国家社会各种重要问题，皆有积极具体之建议，政府与人民之行动亦多以报馆舆论为从违。故德国报馆在实际上实无异于政府与人民之“常设顾问”。（二）革命精神。德国报馆攻击政府，多用堂堂正正之旗，绝少旁敲侧击之笔。倘政府肆行无忌，对于舆论毫不加以顾虑，则今日报馆中之新闻记者，皆他日革命时之行军参谋。中国报馆所采之“讽谏手段”与“旁观口吻”，在德国报纸中绝不多见。此无他，即德国报馆系代表一部分宗旨相同的、有组织的群众与政府直接开战，而吾国报纸则在政府人民之外，常居于第三者之资格，故立言之间不知不觉露出一种旁观口吻。今后吾国报纸若欲求其长足进步，形式上须加以改良之处固属不少，而根本要素，尤在具备顾问资格与革命精神两种条件，否则实不足以立于世界新闻事业之林矣。

（上海《申报》）

十八　德国劳工各种保险组织[①]

① 因篇幅所限，该篇本书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194 页至第 199 页。

十九 柏林国立各博物馆之组织

第一章 博物馆与民众教育之关系

欧洲自第十九世纪以来，最高文化机关有三：一曰大学（Universität），二曰国家学会（Akademie），三曰博物馆（Museum）。

“大学”之发源，系在欧洲中古时代（西历纪元后第十二世纪）。其中组织，包含一切学科，所以称之为 Universitas（此系拉丁文，德名 Universität，法名 Universte，英名 University），换言之即“包罗万有”之意。此种“包罗万有主义”（Universalismus）正与当时教皇及君主之“大一统思想”相合，故吾人可以称之为“帝制思想的产品”。

“国家学会”系成立于欧洲贵族制度发达时代（西历纪元后第十五世纪），故其组织系在网罗科学、美术杰出人材组成国家最高讲学机关（按德文 Akademie、法文 Academie、英文 Academy，皆系由希腊文 Academos 一字变化而出。所谓 Academos 者，即希腊大哲柏拉图讲学之地也），因此，吾人可以称此“少数天才讲学之国家学会”为“贵族思想的产品”。

“博物馆”一字，德文英文皆称为 Museum，法文则称为 Musee，系由希腊文 Musa 一字引申而出。所谓 Musa 者，系希腊“科学、美术之女神”，因此，凡陈列科学、美术作品之处皆称为 Museum，所以娱此女神也。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昔日欧洲王侯私藏之物，至是公诸民众，任人瞻览，虽不名一钱之穷措大、未尝学问之劳动家，皆有一饱眼福之机会（按德国博物馆每星期之中，必有三四日不取门费任人瞻览），换言之，毫无阶级观念，深解“与人同乐”之理，故吾人可以称之为“民主主义的产品”。

欧洲各大博物馆之基础，当以“文化复兴时代”各国王侯私家收藏为起点。到了十七、十八两世纪之时，此种“收藏室”遂与演戏台、音乐院、体育室、动物园、植物园各种，同为构成各处王侯府第主要部分之一。彼等当时既为政治、文化两种势力之中心，故世界名物皆纷纷集于彼等手中。自法兰西大革命以后，王侯势力既为民众势力所打倒，于是彼等昔日规模宏大之府第一一解体，所有其中各部分如收藏室、动物园之类皆各自独立，成为一种特别机关，公诸民众，此正与现在北京各王府“大行拍卖”之情形相同。不过北京各王府之收藏在事实上远不及欧洲王侯收藏之富，并且北京王府拍卖，所有贵重物品多落外人之手，而欧洲王侯府第收藏则几乎全部皆入地方公共机关，因而民众得有赏识机会。此则彼此相异之点，至为可叹者也。

欧洲各国王侯府第收藏既入地方公共机关之手，于是依照新法，参酌旧制，一律改建成为伟大陈列之所，以适于民众参观之用。其中惟英国一国因其政治变革不及欧陆各国骤烈之故，其王室收藏得以保存旧观，一直至于今日。

在欧陆各国之中，因其文化中心“集”“散”不同之故，博物馆之发展情形亦复彼此互异。譬如法国，文化中心点向为首都巴黎，故法国博物馆亦以巴黎为最盛；反之，德意两国文化势力素不集中，故博物馆之发达情形亦是各省并驾齐驱，谁不让谁。

前文曾言，“博物馆”之性质既以“民主主义”为根据，迥与“大学”及“国家学会”不同，因而博物馆之组织及陈列亦以如何能使民众了解为首务。兹略举德国各博物馆中关于此项之设备数种如下：

一、说明书 每个博物馆中，皆印有“说明书”数种，其精详者更于说明之外附以若干图画，并略取印刷之费；其简单者即仅将馆中最重要之陈列品加以说明（此项说明书多不取费），同时并于该项陈列品之旁加以特别记号（譬如柏林“原始人类陈列室”中，常将此项重要陈列之玻璃箱上贴一四方红纸为记）。盖每个博物馆中其陈列品往往盈千累万，若不特别提出，则观者大有望洋兴叹应接不暇之势。因此“说明书”中于说明各项陈列之外，往往更向阅者提出建议，略谓，“假如阁下有暇常来参观，则请于第一次参观某室，第二次再参观某室，第三次第四次再参观某室某室。假如阁下无暇，则请先观某某室中之某某陈列”云云。

二、指导员 （甲）每个博物馆中大都设有专门指导员引领参观并解说一切，此项“指导酬金”，或者已包含于“门票费”之中，或者另须购买“指导票”一张始能参加。大约每次参加此项指导之人以二十人左右为限。因为许多陈列室地方甚小，不能容纳多人，而且听众太多亦不便于讲演瞻观故也。（乙）每逢博物馆“免购门票”之日（大约每星期中有三四日免购门票），常有各中小学校学生结队前往参观（每队亦只有一二十人左右，当然不能全校学生均来，以免妨害他人参观），即由本校教师加以指导讲演。（丙）各地私立“民众大学”（按德国民众大学多系私立性质）常设有“博物馆参观团”，亦是结队往观，由该大学派员指导讲解，而且为有秩序的指导，譬如第一星期研究某派作品，第二星期又研究其他一派作品之类。因此，业已脱离中小学校之成年人亦常有指导讲解机会。（丁）专门以上之学校亦多与博物馆有联络，利用该馆为师徒讲学之地。此项“大学教授指导”，当然比较其他一切“普通指导”为高深精细。著者于上学期之时，曾在柏林大学美术史教授指导之下参观意大利绘画，其结果，整个学期（每星期一点钟）所讲解者，仅限于意大利绘画之一派而已。（戊）各个博物馆中除常设指导员外，并随时敦请著名学者指导（当然每次亦只限于一派），先期悬牌公布日期、时间、题目。凡参加此项指导者亦须另自缴费。（己）除上述各种指导外，尚有若干落魄之专门家，

每日徘徊博物馆之旁，见有外地参观之人来此，往往上前脱帽致敬，叩问“先生需人指导否”？如愿受其指导者，当然必须破费一二，以惠此穷而无告之寒酸。上述（甲）（乙）（丙）（丁）（戊）（己）六种指导之中，除（甲）种外星期日往往禁止指导。盖德国各博物馆星期日系免购门票，游人极众，所以禁止指导以免妨害他人参观故也。

三、讲演室 上述临时指导，当然可使参观之人得到相当了解，但有许多美术或科学作品，非具有相当知识，只靠临时指导仍不能尽量了解。专门以上之学校与“民众大学”，虽设有相当班次讲演以作参观之预备，而不在此项学校之人，终觉获得此种知识之机会太少。因此之故，各博物馆中皆附设讲演室，并先期悬牌布告讲演时期及题目，务使一般民众兴趣集中“求知”之欲，以减少其他不正当娱乐。尤其重要者，从此可使一般中小学校教师得着研究机会，以便该教师等将来带领学生参观时，亦有相当指导能力。

德国各博物馆中，既有上述说明书、指导员、讲演室三种设备，于是博物馆遂成为民众教育之重要机关，与“大学”及“国家学会”之仅仅属于少数人士者大相悬殊矣。

第二章 柏林各博物馆之设施

上文曾言德国文化中心系散居各城，非如法国文化中心之集中首都巴黎，故研究德国博物馆之设施，非遍往各城调查不可。但著者到德十年，便有八年在柏林，因而对于柏林各博物馆情形较为熟悉，故现在请将柏林各博物馆组织分述如下，以作研究各地博物馆组织之一例。

（一）美术博物馆九种

（1）古物博物馆 柏林古物陈列所共有两处，一曰旧博物馆（Altes Museum），二曰新博物馆（Neues Museum）。但彼此相隔只有一街，而且临街之上筑有“横楼”以通两馆。故游览者或从旧博物馆之门进去，或从新博物馆之门进去，均可只买一次门票（价值半马克，约合华币三角）便可参观新旧两馆。每日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为参观时间。每星期共有三日（星期日、星期二、星期五）不收门费任人游览（星期一闭门以备馆员休息）。参观之人如带有手杖、雨伞、皮包等件，必须先行交与门房保管，给一铜牌号码为记，并不纳费。

（甲）旧博物馆 吾人每游欧洲都市，其中建筑最能引起吾人注意者，约有五种，即：(a) 教堂 (b) 博物馆 (c) 戏园 (d) 市政厅 (e) 图书馆是也。而且“建筑美术”在五种美术之中（西洋人普通所谓美术，系指Ⅰ建筑、Ⅱ雕刻、Ⅲ绘画、Ⅳ音乐、Ⅴ诗

歌五种而言。其中Ⅰ、Ⅱ、Ⅲ三种为“空间”的美术、“视”的美术；Ⅳ、Ⅴ两种为“时间”的美术、“听”的美术）最为“民众化”。换言之，吾人若欲领略雕刻、绘画、音乐、诗歌之美，非先具有几分“美术陶养”不可。而建筑则不然，虽平素毫无美术修养之人，亦无不为其庄严之美或秀丽之态所动。因此之故，建筑美术之影响一国人民之精神至深且大。柏林旧博物馆系由德国大建筑家 Schinkel 所建，系一八二四年兴工，至一八二八年落成。该馆之开放期则在一八三一年。除南德意志门兴博物馆建筑外，该馆实为德国最早之博物馆建筑。我们知道，西洋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所谓“新古典派”者曾盛行一时。“新古典派”者，系对“文艺复兴时代之古典派”而言。盖文艺复兴时代，各种建筑亦系以“复古”为志，但所“复”者，多系罗马时代之古，而非希腊时代之古。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一般“新古典派”则直以恢复希腊之古为其职志，因自称为“新古典派”，以别于“文艺复兴时代之旧古典派”。换言之，“新古典派”所复者，实比“旧古典派”所复者为古，此正如吾国清代汉学家“今文派”所讲者反比“古文派”所讲者为古是也。读者幸勿为新旧今古等字所误为要。

德国大建筑家 Schinkel 即为“新古典派”代表之一，故其所建筑之旧博物馆，亦系以希腊建筑为主要模范（其中亦有若干部分系采罗马式建筑法）。该博物馆大门外石阶上面，排列十八根“依翁式”（Ionisch）石柱，庄严贞静，令人一扫凡俗之念，顿忘身处繁华都市之中（按希腊建筑共有三式：一曰都尔式〔Dorisch〕，二曰依翁式〔Ionisch〕，三曰可林提式〔Korinthisch〕，其最重要之区别，即在其柱尖构造形式彼此全不相同）。

该馆内部建筑计分两层，其中陈列皆系希腊罗马时代之美术作品，吾人既登石梯（请参阅下页“楼下陈列”一图）[①]，穿过石柱之后，便到该馆大门（Haupt Einganng）。入门之后，先到一个圆形大厅（Rotunde），该厅覆以玻璃圆顶，周围遍列希腊罗马雕刻。直穿大厅而去，则达馆内第五室，其中所陈均系希腊纪元前第四世纪之雕刻。从此向左而行则到第四室，所陈列者为希腊纪元前第五世纪之雕刻。再从此室转入第三室，是为爱脱尔利亚民族之美术作品。所谓爱脱尔利亚人（Etrusker）者，系意大利土著人民，纪元前二八三年为罗马所征服者也。再由此室转入第二室，是为希腊纪元前第六世纪雕刻陈列之处。复从此室转入第一室，是为碑文藏储之所，更由此室依然回到第五室内，此室吾人既于初来之时即已看过，现在可向右而行，直达第六室内，其中所陈为罗马时代之雕刻。院中有天井二处以通光线，故陈列各品虽在楼下，亦无光丝不足之虞。

① 图略。

现在楼下既已看完，便可上楼参观（请参阅下页“楼上陈列”一图）[①]。登梯之后先到第一室，列有铜像数尊，从此向左而行，则先到第九室，是为希腊陶器陈列之所。若由第一室向右而行，则先到第二室，是为罗马时代盔胄陈列之处。由此转入第三室，则为古铜铸像陈列之地。再从此转入第四室，是为希腊罗马金银美术作品展览之所。若欲到第五室，则仍须先行回到第三室，然后再由该室转到第五室，是为收藏家 Gaus 所藏古代金银、玻璃、陶器等等美术作品。该氏于一九一二年将所藏赠于该馆，现在特由该馆另立一室以纪念之。再由此室转入第六室，是为希腊罗马古铜器具陈列之地。再进则为第七室，所列多系希腊罗马玻璃美术作品。其余第八室第十室等等，现在尚未开放。[②]

（乙）新博物馆　系由建筑家 Stüler 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五五年之间筑成，计分三层。下层所藏皆系埃及古物，其中共分十余室，并盖有埃及庙殿一座。入其中者，顿觉身为羲皇以上之人。不但关于五六千年前埃及之日常用物馆中收藏甚多，甚至于五六千年前之一花一叶（从木乃伊身旁掘得）亦复保存不少。吾人平居自命为世界最古文明民族，而在实际上，则中国所谓“黄帝”也者，即依据一般古代典籍所揣拟，亦只有四千六百年之久，尚幼于埃及者一二千年！而况中国黄帝时代之物，吾人至今犹一无所见，足以证明黄帝时代史实乎？故吾人一入埃及博物馆之后，常自觉中华民族实为“后生小子”，不复再以“老大”骄人矣。

中层所藏，则为古代希腊墨迹（约在西历纪元前第五世纪左右，换言之，约在吾国孔子时代）、埃及碑文以及希腊古瓶等物。上层所藏，则为铜印、石印、木印之画张，多至三十万种以上，皆系古代美术家之作品。并辟有精室数间，专供研究此种画张之人利用。凡欲研究某种画张者，可将号数告知馆员，然后该员再从柜中取出以授阅者，极为便利。

此外尚有所谓 Pergamon 陈列室者，系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间由德国政府出资，在小亚细亚 Pergamon 地方所掘得之各种希腊雕刻。按希腊自亚历山大帝国以后，美术中心已不在本国境内，而在希腊殖民地 Pergamon 方面。因此德国此种发现，颇为希世之珍云。

（2）非力德里徐皇帝博物馆　德文原名为 Das Kaiser Friedrich Museum。系用以纪念德皇非力德里徐者。盖此项建筑系由该皇动议，但实行建筑却在德皇威廉第二执政之际。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三年之间由建筑家 Jhne 仿照意大利“巴鲁克式”所筑成。所谓“巴鲁克式”（Barockstic）者，系欧洲十七、十八两世纪之建筑风尚（按法国方面

① 图略。

② 此处有删节。

称为路易十四），以富丽宏壮为志，尤其是注重“动”之美（譬如建筑形式多取曲线而避免直线之类），正与希腊建筑之注重庄严贞洁，以“静”为美者相反。

馆中所陈各种雕刻绘画作品，系自基督教流行之初起至一八〇〇年左右止（惟泉币陈列则兼及古代希腊罗马）。因此之故，我们看了上述古物博物馆之后，随即继之以非力德里徐皇帝博物馆，则年代相接有条不紊。该馆参观时间亦系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每星期亦有三日（星期日、星期三、星期六）不收门费任人游览。其余各日亦收门票费半马克。星期二则闭门以便馆员休息。柏林各大博物馆关于“卖票日”、“免票日”、“闭门日”以及“票费价值”，常汇印成表悬诸各馆门首，各学校之内亦常有此表悬于壁间。因此吾人只将此表一看，便知今日那处博物馆可免票，那处博物馆须买票，那处博物馆系闭门。而且各馆免票、买票、闭门日期，皆分配得十分均匀。譬如上述古物博物馆，系星期二星期五两日免费，而非力德里徐皇帝博物馆则系星期三星期六两日免票（按星期日各博物馆多免费，故此处置而不论）。此外，前者系星期一闭门，后者则系星期二闭门，分配何等均匀！推及其他各博物馆，亦无不如是。因此之故，吾人每日皆有数处免费机会以资游览。而且柏林各大博物馆除一二例外，大都聚集于一区之内，吾人更可以出了此馆又进彼馆，看个“不亦乐乎”。不过在事实上此种办法却是不易实行，因为每个博物馆之中陈列数目盈千累万，上楼下梯跑个不休，每看完一个博物馆之后，无异在上海兜了十几个圈子，那有精神再逛第二个博物馆？只好回家睡觉，吃面包，大休其息。

非力德里徐皇帝博物馆因地势之关系，其建筑形式适成三角形。下图中圆式建筑即为其大门正面。柏林城内运河，即由大门之前分为两支，向其左右两边分流而去。故该馆大门恰在“半岛”尖头，为划分运河之点。因此柏林人士常呼该地为“博物馆岛”（Museumsinseln）。该馆系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所列多系雕刻、泉币、建筑，楼上所陈则多为绘画。

……①

此外尚有亚细亚西部古迹若干陈于地室之中，现在尚未每日开放。就上述七十三室而论，每室之中常悬挂或陈设名作数十种，类皆希世之宝，往往一幅名画，价值至数百万马克以上。因此，几乎每室之中皆有馆员看守（大约每个馆员看守二三室，随时往来稽查，以免被人偷窃或损坏。此种看守之法，各处博物馆大体相同）。

（3）国画博物馆　上面所述非力德里徐皇帝博物馆之陈列，皆系古代美术作品，尤以意大利、荷兰、德意志三国为最多。盖西洋古代绘画，以意大利、荷兰两派为最有

① 图及各馆室分布略。

名，而德国各种名画，则又因其属于本国国粹之故，收集亦复甚多。至于国画博物馆（Nationalgalerie）之中所陈列者，则皆为德国十九世纪以来之名画。但外国作品（如法国名画之类）亦复附悬若干于其中，不过为数甚少，殊无“喧宾夺主”之危耳。

国画博物馆之建筑，系依照希腊“可林提式”庙子筑成。最初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本欲建此以为举行国家郑重大典之用，由大建筑家 Stüler 制成图案进呈，但此事未曾实行。迨其后一八六一年，政府方面复有建筑国画博物馆之议，于是乃由大建筑家 Strack 依据上述图案并加以修改，以便适于陈列之用。计自一八六七年兴工，至一八七六年落成，前后经过十年之久。吾人一入欧境，每见伟大建筑，无不惊其雄壮美丽，而不知此项建筑历史，殆无不经过数年以至于数十年之惨淡经营始有此种成绩。其实不但建筑如此，即欧洲各种学问、各种艺术亦无不如此。吾人每见彼邦大师宿儒之学术精博，令人惊异不已，但一察彼辈“困而学”之情形，却极骇人听闻，为吾中国一般“浅尝辄止”之人所万想不到者！

该馆前面有一乘马铜像，即为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之像，所以纪念该建筑之来源也。该像之下即为该馆大门。馆之四周围以石柱走廊，廊内为花园，并设有游人座位以及喷水池塘，全与外面尘嚣隔绝。在柏林各建筑中，余最喜此项建筑，以其具有清美闲静不涉繁华之态。盖希腊建筑之美，即在其全部组织，有如人身诸种机能，各有其用，缺一不可，非若其他建筑之满身装饰、争妍斗丽者可比也。余每晨到国立图书馆之时，往往因馆门未开为时尚早之故（按图书馆系九点钟开门），辄先在国画博物馆之前闲坐十分钟，静观该项建筑，仿佛如闻荷马之高歌、柏拉图之讲学，令人尘心为之一洗。[①]

就该馆陈列（分配）而论，有以“主义”（如写实主义、理想主义之类）为分类标准者，有以地方画派（如柏林画派、德兰斯登画派之类）为分类标准者，有以时代先后（如十九世纪初叶、十九世纪中叶之类）分类标准者，要皆极有秩序，各得其宜。其最令人注意者，即各派绘画所需之光线各自不同，有需明光者，有需暗光者，因而分配陈列之时，亦复煞费苦心。盖同一建筑中，各室光线往往彼此悬殊故也（譬如光线从屋顶玻璃而入者与从窗间玻璃而入者，其效果迥然不同）。

（4）新国画博物馆　上文所述国画博物馆所陈列者，为第十九世纪之德国名画。至于新国画博物馆（Neue Abteilung der Nationalgalerie），则其所藏者皆系近代名画，从“印象派”（Impressionisten）到“表现派”（Expressionisten）。所谓“印象派”者，即将事物初到吾人眼帘时之印象照实绘出；所谓“表现派”者，则仅将个人自己心情表现出来，不问事物真相如何，是以两派宗旨极端相反。

① 图及各馆室分布略。

新国画博物馆之建筑系德国太子故宫，筑于一六八七年。但其后屡经修改乃有今形。该馆建筑系分三层："下层"所陈列者，多系十九世纪末叶柏林美术家之作品。"中层"所陈列者，为德法两国"印象派"之作品。"上层"所陈列者，为"表现派"及"新印象派"之作品。①

（5）肖像博物馆　德文名为 Bild Sammlung Nationalgalerie。"绘像"为绘画中最重要之一部分，欧洲学者中更有人竟谓"绘像"为绘画中之最高艺术。即德国第十六世纪大画家 Dürer 亦尝谓画师之最大责任，除"宗教画"外，实为"肖像画"，盖"肖像画"之价值，能使其人百世不朽，千载如生云云。因此，"肖像画"在欧洲绘事中极占重要位置。柏林肖像博物馆系建筑大学（Bandkademie）之旧址，筑于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五年之间，系出自大建筑家 Schinkel 之手，为希腊式及中古式混合之作品。至于馆中所藏，类皆德国伟大人物肖像，或系绘画，或系雕刻，或系铜铸，或系石印。盖馆之设，不仅在奖励美术，并所以纪念先哲也，故其陈列亦以肖像本人身分（如大将、名臣、诗人、画师之类）为分类标准。②

（6）古代雕刻之膏像博物馆　德文名为 Sammlung von Gipsabgüssen antiker Bildwerke。乃系石膏造像，其模型皆仿自古代雕刻。盖希腊罗马有名之雕刻物均散存于世界各国博物馆，非有大批仿造不足以资考鉴。柏林此项膏像陈列系在柏林大学西楼之上，每星期开放三日，任人观览不取门票，其余四日则闭门。馆中所藏膏像极为丰富，计有十二大厅之多，并系依照希腊罗马美术进化次序陈列。膏像制造之精，实与原物无异，为研究古代雕刻者最好之参考资料。

（7）美术手工博物馆　德文名为 Kunstgewerbemuseum。其中所陈为各种手工艺术，如金工、银工、木器、瓷器等等手工之类。自一九二〇年起，该馆所陈各物改列于王宫博物馆（Schlossmuseum）之中。至于该馆旧址，除一部分拨与种族风俗博物馆外，其余则为美术图书馆所占用，其中并有大规模之"衣服样本储藏室"（Kostümbiblisthek）一所，共有样张三万种。此外更有书法样本等等十三万五千种（Graphische Sammlung）。

（8）纺织美术博物馆　德文名为 Text Sammlung。为世界上最大之纺织美术博物馆，所有欧洲中古纺织物件为世所罕见者，该馆无不应有尽有。

（9）各种美术家纪念博物馆　譬如德国大建筑家 Schinkel、大雕刻家 Rauch 等等，往往各自有其特殊之博物馆陈列生平作品，正如巴黎方面罗丹博物馆之类。惟此种博物馆为数颇多，兹因本文篇幅有限，不再一一详述。

---

①② 图及各馆室分布略。

（二）学术博物馆十九种

（10）自然科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Museum für Naturkunde。其中共分地质、古生物、矿物、动物各部。同时，德国“地质古生物学会”（Das Geologisch-paläontologische Institut）、“矿物化石学会”（Das Mineralogisch—petrographische Institut）、“动物学会”（Das Zoologische Institut）三个机关亦即附设于其中。该馆左右两边之方形建筑一为农业大学（Landwirtschaftliche Hochschule），一为邦立地质学校（Geologische Landesanstalt）。

既入该馆大门之后，向右行则为“地质陈列所”（Geolog Sammlung），向左行则为“矿物陈列所”（Gesteine Mineralien）。由“地质陈列所”再向前进，则为“化石动物陈列所”（Fossile Tiere）。倘若吾人初入该馆大门之时不向左右两边而去，一直向前进行，则到该馆“大厅”（Lichthof），其中所陈皆系古代伟大动物之遗骨，其最大者约有七八丈之长。由“大厅”向前再进，则为哺乳动物（Säugetiere）陈列之处。向右行，为爬虫类及鱼类（Reptilien and Fische）陈列之所，再向前进，则为昆虫类蟹类展览之地。倘若吾人看罢哺乳动物陈列之后不向右行而向左进，则为德国本国鸟类及哺乳动物类（Deutsche Vögel and Säugetiere）展览之处。倘若吾人看罢哺乳动物陈列之后不向左右而行，直向前进，则为下等动物（Niedere Tiere）及鸟类（Systemat Vögelsaol）展览之所，系分置左右两个厢房之内。该馆因欲引起游人兴趣起见，于各项动物标本之外，并在各室布设山林、海洋、田野各种风景。譬如虎豹之类，则令其踞立山巅，大有跃跃欲下之势；水兽之类，则令其游泳海洋，大有悠然自得之意。更加以各种电光烘色，情景逼真，吾人身入其中者，仿佛处于高山大海之间，日与鸟兽为伍矣。

（11）德国本国地质博物馆　德文名为 Geologisches Landes Museum，设于邦立地质学校之内，其中所列皆为德国各地地质。收藏之富，竟占去该校前楼、左楼、右楼三面。德国版图大小仅及吾国四川一省左右，而收藏本国地质竟有如许之多。倘若吾国将来开设“本国地质博物馆”，则其势至少非一百间楼房不办也。不知吾国地质人材究有此项精力否？

（12）农业博物馆　德文名为 Landwirtschaftliches Museum，系设于农业大学之内，其中所陈有如下表（图略——编者注）：

“大厅”之中所陈列者，为各种农器（Maschinen），而且随时更换。

“前楼”之下所陈列者，为家畜标本（Zoologische Sammlung）。

“西楼”之下所陈列者，亦为家畜标本。

“东楼”之下所陈列者，为植物工艺学、生理学、病态学之标本。

“后楼”之上所陈列者，为牧畜养鱼艺术之进化情形（Viehzucht，Fischerei）。

“前楼”之上所陈列者，为菜蔬、工艺、种田、造林各种标本（Vegetablische

Abteilung)。

“西楼”上之所陈列者，为土质标本（Mineralogische Sammlung）。

“东楼”之上所陈列者，亦为植物工艺学、生理学、病态学之标本。

（13）乐器博物馆　德文名为 Sammlung alter Musikinstrumente，系设于音乐大学（Hochschule für Musik）之中。按柏林共有国立高等音乐教育机关三种：（甲）柏林大学之音乐系。其所研究者为音乐历史、音乐原理等等（德国共有大学校二十三个，每校之中皆设有音乐系，甚至于工业大学之中亦有设置音乐系者）。（乙）“音乐大学”。其所研究者为“应用音乐”方面，如制谱、吹弹、歌唱之类，其组织类似工业大学、农业大学等等（德国除上述二十三个普通大学外尚有许多专门大学，如工业大学、音乐大学、商业大学之类）。（丙）“教堂学校音乐大学”。其所研究者亦系“应用音乐”方面，而且以教堂学校音乐为主。柏林除上述三个国立高等音乐教育机关之外，尚有“私立音乐学院”一二百，每院学生人数多者往往超过一千以上，少者亦有一二百人。此外尚有“私家音乐教授”数千人，专以教授音乐为生。

上述音乐博物馆即附设于音乐大学楼上，所藏古今各国乐器约有三千种左右，即中国乐器亦有两柜陈列其间。关于乐器之历史及构造，皆有图式模型加以解释。馆长 Sachs 氏系德国著名之乐器学专家，曾著有《乐器辞典》一大厚册，并在柏林大学音乐系担任功课。著者曾从之学习三学期，并在乐器博物馆中练习一年半，是以知其内容甚详。惟关于西洋各种乐器名词，吾国人士既不熟习，因此对于该馆陈列内容，略而不论。

（14）交通建筑博物馆　德文名为 Verkehrs und Bau Museum。其中所陈列者为铁路进化之情形，或系原物，或用模型。此外关于治河筑室诸事，皆有专楼陈列。

（15）海洋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Museum für Meereskunde。为柏林大学海洋学会（Institut für Meereskunde）附设之机关。其中陈列如下：

楼下为德国海军陈列所。从纪元后第四世纪日耳曼船只起以至于近代新式战舰，均有原物或模型陈列于其间。譬如潜艇内部组织、战舰各种机器，无不一一说明，以增进一般人民知识。此外德国在欧战时之舰队纪念品为数亦甚多。当欧战休止时，德国舰队因不欲为协约国所虏俘，于是自行击沉，计大战舰一只，大巡洋舰七只，小巡洋舰十七只，潜水艇一百九十八只，鱼雷艇一百一十只，齐在敌人眼前同时自沉，实为世界海军历史上一种悲壮激昂之举。现在室中尚将此项自沉舰艇之名称书之于壁以留纪念。此外，室中并有为炮击破之兵舰烟囱一根，系庚子塘沽之战为我军击破者。其旁更有德国兵队奉英国海军提督之命向我击攻之图。当著者某次参观此图之时，适旁有德国男女二人亦在阅览该图，彼等乃互相对语曰：“当日德人真蠢，竟受英人愚弄，代人受过。”云

云。盖欲使余闻知，以表示彼等对华好感，亦算是一种“国民外交”。

第一层楼上所陈列者，为制船工业、海底情形、海滨生活、欧洲以外之各国船只样式等等。

第二层楼上所陈列者，为船只遇险之救济事业等等。

该馆之中并建有轮船机器房、各种舱房等等。凡开船、行船、泊船、使用机器之法，无不一一为之说明，并设有模型，令观者自行试验。故凡未作海游之人，一入该馆无异飘摇大洋之上。即曾作海游之人，从此得知各项机器用法，亦复兴趣倍增。而况所设置之海滨风景状况、海底生活情形，一一逼真，更令人顿忘身处红尘十丈之都市中，大有悠然遨游岛海之意乎！

（16）军器博物馆　德文名为 Zeughaus。该建筑系从一六九四年起由荷兰建筑家 Nering 着手，至一七〇六年为法国建筑家 Bodt 所完成。其建筑风格系“巴鲁克式”（Barock），为柏林颇负盛名之老建筑。地址为四方形，每边约有二十八丈之长，中有四方形之天井一个，每边亦有十二丈之长。天井周围饰以阵亡战士之雕刻首级若干，出于德国大雕刻家 Schlüter 之手，亦复有名于世。该馆从前本系储藏德国军事用品之所，其后于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一年之间，德国政府乃将其改建作为军器博物馆之用，并筑“光荣堂”（Ruhmeshalle）一所，以纪念从前德国各次战胜之功绩。

该馆建筑系分楼上、楼下两层。其陈列如下：

“前楼”下层所陈列者为各种飞艇飞机之模型，以及欧战中德国立功甚多终死于敌之残机数架。

“东楼”下层所陈列者为炮队用品。关于大炮之进行情形以及大炮之制造手续，无不详加解释。此外历史上有名之各种古炮，亦无不妥为保存。

“西楼”下层所陈列者为各次大战战场形势之模型，譬如如何攻击、如何防守之类，皆有详细图形陈列，阅者有如自身亲临战场一样。

“前楼”上层所陈列者为十八世纪普鲁士军器军装进化之情形，甚至于十八世纪时非力德里徐大帝所乘之战马，至今犹能保存其躯壳。

“东楼”上层所陈列者为亚洲各国之军器以及欧洲中古甲胄等物。

“西楼”上层所陈列者为德国自由战争时（即十九世纪初叶抵抗拿破仑之战争）之军器军装各物。

“后楼”上层即为“光荣堂”。正中为德国皇室各种铜像，左右两边为德国战将各种铜像。壁上遍绘德国历代战争之荣誉。德皇威廉第一在巴黎凡尔塞王宫受德国各邦推戴为德国皇帝之情形亦赫然绘于壁焉。

“天井”之中，从前曾遍列普法战时普军所掳法国各种大炮，此次欧战之后，《凡尔

塞和约》规定，此项大炮须送还法国，于是该馆乃将此项应行送还之法国大炮摄成像片悬于旧日陈列之处，并于其上注明，“此处所陈列者，原系普法战时普军所掳获之法国某种大炮，后因《凡尔塞和约》之规定，不得不送还法国”云云，以志不忘。此外天井周围遍悬庚子时所获之中国军旗数十方。数年前，柏林方面中国同学曾向德国外部[①]要求撤去，但终未办到，且引出一场纠葛。著者当时正任上海《申报》驻德访员之职，尝与德国外部部员有来往。某部员（此人现在似任济南方面德国总领事）当日曾向著者言曰，“中国学生以为德国现系战败之国，中国方面可以直接派兵前来征服德国”云云。其愤恨之情可以想见。著者当时曾答之曰，“中国学生之在国外作种种宣传运动，固不仅仅专对德国如此。在实际上，此种陈列实无异常将两国相仇历史，永远留在两国国民脑中，固非德国政府聪明之举也”云云。该部员闻之，亦复无以相难。其实，欧洲人万事聪明，惟对于此种“表功”之举却极糊涂。欧洲方面平均每五十年必有一次大战，战而胜者，常将敌人军器掳来陈诸国中以夸于众。但是到了五十年之后，向之战败者又照例一变而为战胜者（此则与中国有不同之处，中国对外作战，向来是有败无胜），又将其从前被人夺去之军器一一取回。因此之故，两国战时捕获品彼此时常送来送去，徒化运费，殊觉不值。吾国在昔每与他族相战之后，务必设法以泯彼此仇敌之念，较之欧人以功自耀者，实有一日之长也。

（17）种族风俗博物馆　德文名为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其中所陈列者为世界各民族之生活情形与美术作品。从前该馆陈列仅以物品为限，近两年以来，该馆以为如此陈设仍不能得到各民族之生活真相，于是乃将该馆大加扩充，盖了许多庙宇。而吾国之财神殿、祖宗堂亦得混迹于其中焉。此外尚有“原始人类陈列室”（Vorgeschichtliche Sammlung）十余间，所有冰期时代、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人类之遗骸遗物，无不广为搜罗。因此之故，凡欲游览该馆者，非十余次之参观不能得其梗概。否则只是时而上楼，时而下楼，跑得汗如雨下；时而非洲，时而亚洲，看得头昏眼花；其结果不是寻乐，乃是讨苦。

（18）德意志民族风俗博物馆　德文名为 Die Sammlung für deutsche Volksunde。该馆系于一八八九年由私人出资开办，自一九〇四年起即由国家接收开办，其中所陈列者皆系德国各省民情风俗情形，并有小室十余间，系仿照各地人民家中之陈设，极为有趣。倘若吾国将来能办一种“中华民族风俗博物馆”，则南北习惯之大相悬殊，其可观之处，当远过德意志民族风俗博物馆也。

（19）马尔克博物馆　德文名为 Mäkisches Museum。马尔克者系德国省份名称，

---

① 外部：应为外交部，下同。

柏林即属于该省之内，类于吾国从前所谓京兆区。该馆陈列皆系该省古迹、美术、风俗、物品。分为博物部（Naturgeschichtliche Abteilung）、人文部（Kulturgeschichtliche Abteilung）、远古遗迹部（Vorgeschichtliche Abteilung）三部。举凡与柏林历史地理有关之物，无不网罗于其中。该馆建筑系分三层，规模极为宏大。当去年著者往游该馆时，正值该馆楼下举行“柏林著名工商界家庭历史展览会”，换言之，即聚集柏林一般具有一二百年历史之老商号，将其店中一二百年来之陈设、账簿等物，以及从彼等“曾祖的曾祖”起一直到今之家庭用物，无不取来陈列于其中。每家商号各自占一小室，大可以考见柏林一二百年来之风俗人情，甚为有趣。

（20）邮政博物馆　德文名为 Reichs Post Museum。该馆系分三层：计楼下所陈列者为邮政进化历史、古今各国邮票以及德国第十九世纪之邮政情形。第一层楼上所陈列者为近世纪德国与外国通邮之情形以及电报各种设备。第二层楼上所陈列者为海底电线以及各种电话设备。此外每日十二钟及二钟之时，并由馆员演试关于通电、筒邮等法，以娱参观之人（按所谓“筒邮”〔Rohrpost〕者，即柏林各大邮局之间皆置有一种特别筒子互相联络，假如居民有紧急事件之时，可到邮局利用“筒邮快寄”。换言之，即是将信写好交与局员，缴纳特别邮费，约较常信贵五六倍左右，然后即由馆员将信装入筒中，用机器一拍，该信即到某局，再由某局专差送给收信人，极为迅速）。

（21）劳工福利博物馆　德文名为 Arbeiterwohlfahrts Ausstellung。其中所陈列者系关于劳工保险以及预防灾害等等设备，并有馆员演试，以使观众了解。

（22）医具博物馆　设于兽医职业学校名为 Kaiserin Friedrich Haus 者之中。每星期由礼拜一至礼拜五，每日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可以自由参观。

（23）昆虫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Das Futomologische Museum，该馆之参观人员系以具有此项专门知识者为限。

（24）盲人博物馆　德文名为 Blinden Museum，附设于国立盲人院之内，可以自由参观。

（25）建筑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Architektur Museum，附设于柏林工业大学之内，亦系任人游览不取门资。其中所陈列者，除古代建筑精图外，并有各种著名建筑模型若干遍陈馆内，以资参考。此外德国国会建筑图案、柏林大教堂（Dom）建筑图案亦各有若干种保存馆中，盖当时该项建筑系设计投标，应者纷起，因而图案样本亦极繁多故也。

（26）天文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Astronomische Sammlung，附设于天文台之内，可以参观，并有人指导，但须纳费若干。

（27）植物学博物馆　德文名为 Das Botanische Museum，附设于植物园之内，陈设各种植物标本。每星期开放两日，任人观览，不收门票。

(28) 名人博物馆　柏林名人博物馆甚多，如纳辛博物馆（纳辛为德国诗人，该馆德文名为 Lessing Museum。该馆之中并附设戏台博物馆〔Theater Museum〕一所）之类，为数甚多，兹不一一缕述。

(三) 故宫博物馆二种

(29) 王宫博物馆　德文名为 Schloss Museum。已于上述 (7) 美术手工博物馆中一度提及。柏林城内外共有故宫二十余座，皆可购票参观，并由故宫管理处发售“通券”，价值六马克，可以参观一切宫殿，较之每宫各自单独购票者约便宜一半以上。在各故宫之中往往设有博物馆陈列各种珍物，类似吾国北京西华门内之古物陈列所。兹篇所述，即限于各故宫之特别设有此项博物馆者。

王宫博物馆，系在柏林最古之王宫（该宫自一四四三年起即已开始建筑），占去该宫楼房上中下三层，规模极为宏大。其中所藏，除历代美术手工作品（如家具、瓷器之类）外，德国王室历史遗迹亦复不少。按柏林城之历史，约自西历纪元后第十三世纪时起（一二四四年始见之于典籍），在一四四二年以前只有一个诸侯驻跸之所，而无真正王宫。自一四四三年起，乃由侯爵非力德里徐第二建此王宫。自此以后代有增修，常为德国王室住所，故其历史遗迹甚为丰富。每星期之中，馆内各楼系间日轮流开闭，故参观者必须前往两次，始能遍观各室。

(30) 荷赫处勒博物馆　德文名为 Hohenzollern Museum。所谓荷赫处勒者，即普鲁士王朝之名称。该馆系设于“吾宝宫”内（按原文为 Monbijou，系法文，即我的珠宝之意。德国王宫常喜用法文名称，譬如柏林郊外最负盛名之“无愁宫”〔Saussouci〕即其例也。法文 Saus 系“无”字之意，Souci 系“愁”字之意），其中所陈皆为普鲁士历代帝王之纪念物品。①

第三章　余话

前面所述柏林各种博物馆，为数共有三十，可谓盛矣！但其中所举者，只限于国立的、常设的博物馆。此外尚有私立的，譬如“电气工业陈列所”（系普通电气工业公司所办，规模甚为宏大）之类，尚有临时设立的，如去年举办之“中国美术展览所”（其中曾将世界各国公家、私人所藏之中国美术作品征集起来，陈列于美术学院〔Akademie der Kunst〕之中者数月）之类。

又柏林“动物园”，就严格论起来，当然不应列入博物馆之内，但该园所集动物种

① 此处有删节。

类超过一千四百种以上，其中若干种类尚为其他动物园所未具有，单就鸟类一项而论，便有四百栏笼以上，殊足以补助上述（10）自然科学博物馆之不足。

“植物园”亦然，其中收罗之富不在伦敦植物园之下，每日游人如云，吾人亦可称之为“活博物馆”。

著者于第一章曾言，德国文化中心系散居各省，非如法国文化中心之集中巴黎。因此德国外省博物馆之特长，往往有为首都柏林博物馆所不及者。譬如德国书业总汇，系在乃蒲扯邪（Leipzig）省，因而该省遂设有规模极为宏大之文字博物馆，为他处所罕有。又如德兰斯登地方有瓷器博物馆一所，收藏之精富远过德国其他各处之“瓷器博物馆”（该馆关于中国瓷器之陈列，即占去大楼两面之多）。故上述柏林各博物馆之陈列，并不足以尽德国全境博物馆之长，著者之只述柏林一处者，意欲举此以例其余耳。

德国政府对于科学、美术、国民教育三事，认为同样重要，故其教育总长之官衔亦为“管理科学、美术、国民教育之总长”（Minister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Volksbildung）。初看去似嫌冗长，但在实际上该总长却能因此常将彼之三种神圣责任——即发展科学、美术、国民教育之三种责任——时常放在胸中。德国政府每年除支出大宗国民教育之费用外，关于提倡科学美术所用之款亦复甚巨。专就柏林数个国立戏院而论，政府每年津贴之数即在数百万马克以上。前年因国立歌剧院之建筑不适于音乐原理之故，乃将其内部加以改筑，便由国库项下支出一千万马克，约合华币七百万元。吾人须知，德国幅员人口只及四川一省之大小，此外每年尚须支付赔款二十万万马克左右，约合华币十四万万元，而该国尚有余力顾及科学、美术、国民教育等事。其魄力之雄，眼光之远，确是令人可佩。至于吾国则何如？教育当局所从事者至多只是国民教育一种而已，其余科学、美术两种皆在无足重轻之列。向使庚子之时不幸而无拳乱之痛史，更不幸而无好善乐施之美人，则北平几个大学势将根本不能存在，更何论于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之出资奖励科学界人材与夫筹办图书馆事业！此外，全国只有几个艺术音乐教育机关，近且竭力为降格贬尊之运动！至于博物馆等等设备，更是无暇过问矣！国人能力破产，固已毫无疑义。所有全国人士，尤其是执政诸公，每日均须痛哭四点钟，努力工作八点钟，以自忏，以自励，将一切嚣张之气免除净尽，方可以称为有良心之人！

博物馆之作用，既上可以促进科学、美术，又下可以补助国民教育，故德国当局对于此项设施尤属不遗余力。其实此种情形不独德国如此，世界各文明国盖无不如此。当著者十年前初抵巴黎之时，费两星期之力尚未将巴黎各博物馆游尽，其丰富可以想见。吾国不欲进为现代世界文明强国则已，如其欲之，则对于设置博物馆一事万不可缓。盖博物馆之利益，不仅是上述“促进科学、美术，补助国民教育”而已，尤其是可以藉此减除一般市民之下等娱乐，并可以由此培养国民好学风气。现在吾国一般人士，自文气

冲天之大教授以至于目不识丁之小百姓，皆只有“好财风气”，没有“好学风气”。倘使中国尚在闭关时代，则长此成为“愚人桃源”亦未尝不可；而现在则不然，彼碧眼黄须者流方且倾全国人士之脑力心血以求学术发达，大张其物竞天择之焰，而吾人却仅以笑嘻嘻的愚蠢脸皮，或泪汪汪的乞怜眼睛与人相见，何济于事！并且丧尽了我们黄帝祖宗与夫历代先哲之德。吾人今日但见吾国军队对内百战百胜，对外百战百败，似乎觉得我们军事一学在世界上已经落伍，似乎觉得我们那种“解放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宣言有点大言不惭。而在实际上，则中国军队虽不能战胜外国，但有时尚可将外国军舰烟囱击穿一个孔孔（请参看上述15海洋博物馆一段）。至于外国学术之侵来，吾中国知识阶级恐一个孔孔的成绩亦办不到！算了罢，我们劝人看博物馆，其实自己已经是博物馆中的一种古董！而且只够得上陈列在“哺乳动物类”！

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十七日王光祈草于柏林国立图书馆

（上海《教育与民众》）

二十　德国民众图书馆[①]

戊　外交国防[②]

二十一　德国对华之外交

（一）　关于派遣使节之意见

记者未以通信与读者相见者已一月有余矣。此一月中，记者专从事采集德国各方面对于中德关系之材料。凡关于德国以后在中国之政治、商业、教育、报纸种种预定计划，无不广为收罗，综合研究。从此次通信起，将一一作为有统系之纪载，陆续在本报发表，或亦读者诸君所乐闻乎？

德国自大战后，国内经济恐慌已达极点，其日夜所梦想者，即如何恢复战前经济势

① 因篇幅所限，该篇本《文集》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245页至253页。

② 该部分共有七篇，本《文集》收录了其中四篇。

力。然欲恢复战前之经济势力，决非今日物力凋敝之内国所能奏功，势非求之国外不可。惟自大战以后，德国海外殖民地尽已丧失，而英、法、美、意各国之市场亦无德商插足之余地。环顾世界，可以为他日活动之舞台者，只有东亚一隅。该国所最注意者为中国、日本、暹罗三国。暹罗土地褊小，且在英法势力范围之下，不能为大规模之活动；至于日本，亦复壁垒森严，非他国经济势力所能侵入。故东亚方面较有希望者，只中国一国而已。然中国年来之政治经济大权，几无一不与日人有关系，故欲在中国活动，势非先与日本交欢不可。日前驻日德使宣言，自谓此行专注意日德经济关系。其实伊之所谓经济关系者，实指中国而非指日本。交欢日本不过是取得在中国活动之一种手段，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现在德人急欲与中国交换使节，以便从事经济上之活动。据德政府之意，以后派遣驻华公使，当选择长于经济之人才，而不注重优于政治之人物，吾人于此便可察见德国对华之外交方针矣。惟吾所谓德人将在华从事经济活动者，决非指今日而言，以现在德国之金融紊乱、物力凋敝，尚无力以言海外发展，至速亦当在二三年之后。此时德国在华之活动，不过仅仅从事将来远东经济活动之预备工夫而已。此层吾人亦须知之，否则必受神经过敏之讥也。

现在中德正议交换使节之际，实为战后中德关系发轫之始，吾人不可不与以相当注意，盖此后中德之关系皆将自此发生矣。故吾关于中德关系之通信，亦以交换使节为始。

欲知德人派遣使节之意见，不可不先知战前德国驻华外交官之制度。因德人此次对于派遣使节之主张，即在矫正战前驻华外交官制度之弊病。故德国此次派遣之使节，其权限与战前大异，吾人万不可以从前之眼光观察现在之德使也。

第一，战前德国在中国之外交官，事权极不统一。战前德国经营东亚，以青岛为根据地，在青岛设有海军衙门。此海军衙门对于东亚政治有特别权力。在当时德国军阀势力正盛之时，此种军阀包办外交之政治原不足怪。惟因此海军衙门常与柏林外交部有意见冲突之事，致使德国在东亚之外交政治常有不能一致之感。又胶州总督与济南领事同在山东境内而又不相隶属，致使对于山东种种设施，彼此之间常相冲突，时有争权之事实发生。又上海总领事专司远东经济发展事宜，而又不隶属于北京公使，故上海北京之间又常有意见参差之事。总之，战前德国在华之外交官，事权极不统一，常有政出多门之感。现在青岛既为日人夺去，所谓胶州总督、海军衙门者，已不成问题。故以后该国派遣公使，一面应秉承柏林外交部之意旨，一面则统属所有驻华之一切外交官，务使事权统一。此为该国派遣使节之第一种意见。

第二，战前德国驻华公使更换太快，因而对华外交政策时时改变，不能始终贯彻。

计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前后二十四年之中，更换公使至八次之多。[①] 因此之故，德国公使对于中国情形，类多不甚了解，徒以薪俸之故，前往东亚一行，视官舍如传舍。所以当中日战争与夫列强争辟租界之时，德人自以为得利无多，皆由于公使更换频繁、坐失机宜之故。又如欧战开时，德国驻华公使马尔厂（Von Maltzen）知青岛孤悬海外，必不能守，不如乘机直接交还中国，既足以买中国欢心，又足以杜协约觊觎。其外交眼光，甚有独到之处。不幸柏林政府更换公使之命忽至，致使此种主张未能贯彻而去。现在德国主张派遣驻华公使，必须选择自愿前往中国，以发展中国事业为终身职志之人，并宜假以年月，勿蹈前此更换频仍之弊。此为该国派遣使节之第二种意见。

第三，战前德国派遣之驻华公使多系贵族，驻华领事则必须曾任德国陪审官之职者始可充任。此两种人对于商业皆无兴味，关于德国之远东经济当然不能多所贡献。从前德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故派遣领事须有法律知识，今后则无须此矣。现在德国系共和政治，当然无所谓贵族。此后该国派遣公使，拟择长于经济之人才，而不注重优于政治法律之人物。此该国对于派遣使节之第三种意见。

第四，战前德国驻华外交官多不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因而中德人士之间极为隔阂。德人以为中国人系富于感情之民族，最易受人感动，若能与之自由交往，自由谈话，必易得中国人之了解。公使朱尔典颇善华语，故其外交常获胜利，即其例也。从前领事署所用之翻译官，多系德国东方语言学校两年毕业之学生，该翻译官之地位极为重要，其位置等于副领事，徒以未有陪审官之资格，竟不能充任领事，并副领事之虚名亦吝而不与。在翻译官之自身，因不能升任领事，常有永居下僚之感，在中国人方面，又以翻译官之地位不隆，不肯重视。因此，在华之领事官虽有权力，而苦于不善华语，领事署之翻译官虽善华语，而又苦于无权力。今后该国派遣公使领事，第一拟择精通华语之人，第二拟将领事署之翻译官改为副领事，似此则驻华外交官便与中国人士无隔阂之弊矣。此为该国派遣使节之第四种意见。

以上四种，皆德国对于派遣使节之重要主张，亦即吾上文所谓德国发展远东经济之预备工夫，留心中德关系前途者不可不注意也。战前威廉第二执政，好大喜功，德国外交素称拙笨。德国印行铁血宰相俾斯麦之日记，即痛诋威廉第二不谙外交，贻误国事。吾人若证以此次德国大战失败之由来，则知铁血宰相之言不虚矣。然自共和政府成立后，已极力注意外交，所谓联英、联法、联美、联俄之说，时人吾人耳鼓。盖德国新败之余，若欲恢复国力，只有取途于外交，非复从前武力万能之迷梦矣。昔人谓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所恃者，正只有外交二字，此外复何所望乎？

---

① 此处有删节。

（二）德国在华之学校政策

吾国自海通以来，列强势力乘机侵入国内，其始也，或藉武力之助，或赖传教之力，以发展其海外势力；其继也，各国皆知欲开发中国实业与培植本国势力，势非先取得中国人之同情与了解不可，欲得中国人之同情与了解，非先从教育入手不可。于是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一变而为学校政策。换言之，向者欲以欧、美、日本人统治中国之理想，至是一变而为欧、美、日本式的中国人统治中国之理想矣。现在欧、美、日本学校已遍设中国各地。向者各国之势力，仅及于中国之官僚政客及商工两界，今且进而及于一般青年；向者仅及于中国之物质界，今且进而及于中国之思想界矣。夫外国人若以传播该国文化为使命而至中国设立学校，吾人当欢迎不暇；若以学校为培植该国政治势力之工具，则非吾人所敢赞同矣。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清华学校，颇能得中国人之同情，是其学校政策成功之证。近来他国亦有退还赔款以兴教育之说，记者非不赞成此举，惟记者有不能已于言者，即希望一般受此教育之青年，须具一种判别力，不以小恩小惠而忘却吾人之重大使命。所谓大国民之风度者，即在此公私爱憎之间一毫不苟而已。若明斯旨，然后请谈德国将来在华之学校政策。

欲明德国将来在华之学校政策，不可不追述德国战前在华学校政策之计划；欲明德国战前在华学校政策计划之由来，又不可不略述德国语言在中国之形势。

英国与中国通商最早，故英语在中国商界上已成为普通用语，世界上适用最广之语言，当推英、法、德三种。法、德两种，在欧洲大陆已成为普通官话，有如吾国之北京官话适用于中国全国。英国语言则在海洋上极占势力。吾国自海通后，首先输入者自以英语为最便，又因留美学生日有增加，于是英语在商、学两界遂占极大势力。德语在中国之势力远不如英语。即就医界一界而言，在一九一五年据德人所调查，中国有医院三百三十三所，其中便有三百八十四人属于英美式的医生，而德医仅占极少数目。中国有医学专门学校二十六所，其中便有十三所属于英美式，其余数校仅有少数德人参加。夫医学为德国最擅长之学问，记者旅居上海时，常见德医某某之金字招牌映入吾人眼帘，其见重于世也可想而知，然其势力较之英国尚瞠乎其后，此外更无论矣。

德人常推究德语不能盛行中国之故：第一，中国人最重实际利益，其习外国语也将以谋生，而非藉外国语为门径以研究高深学术。英语流行既广，则其谋事也较易，故群趋于英语一途。战前青岛大学曾毕业学生数十人，当未毕业时，即有数人私请学校代为谋事，其结果，学校代为竭力设法，始安插数人，其大部分尚赋闲居，于此可见德语应

用不广之一斑。故后来青岛大学遂有不能不增加英语一科之势。第二，德国洋行之在中国者，以不用精通德语又有知识之华人为原则，盖恐华人窥探其机器秘密，一旦了解，自行设立工厂，该洋行便不能长此专利，故宁肯雇用不懂德语或毫无知识之华人。因而曾习德语而又有知识之华人益感谋生不易，于是相率弃德语而改习英语，此德语不能盛行中国之第二原因也。以上两种观察皆出德人，其言或有过当之处，然德语之不能与英语为敌，亦可略见一斑矣。

在欧战前，德国在华之势力逐渐增加，远东方面遂形成争霸之局面。然德人亦自知不能与英竞，即以语言一项而论，已非德国所能争胜。而欲使华人与德表示同情，又非从语言下手不可，因之在华德人遂纷纷回国鼓吹在华设立学校之种种理由，颇得该国政府及各大工厂之赞许，于是青岛大学及同济学校等等，遂相继在华开办矣。

据战前德人计划，以为英国势力在长江流域，如欲取而代之，宜先在上海办一学校以扼长江下游，在汉口办一学校以据长江腹部，此外成都、长沙等处亦分别设立学校，则长江流域便可入其掌握之中。除上海方面已有同济学校为实现该计划之一部分外，汉口方面则地基业已筑好，筹备亦已妥当，旋因欧战中止进行。又德人以中国广东人民极为优秀，将来欲大有为于中国，不可不先结纳广东人，故拟在广州设一规模较大之学校，以训练德国式之中国人才。总之，学校政策已为德人战前经营中国之主要工具。其所计划之学校虽多，然其重要学校，则为青岛、上海、汉口、广州四处，其余天津、济南、长沙、成都、香港各处，非其注重之地也。

自大战后，青岛为日人所据，同济归中国办理，汉口则空筑地基，广州则徒劳梦想。所有从前种种计划，至今思之，不过衰草斜阳，颓墙破壁，令人凭吊而已！

以现在德国经济状况而论，实无力恢复旧日计划。其原因有二：（一）马克汇价大跌。曩日在中国只须用一个马克者，今日非用二十马克不为功，换言之，今日教育费用须二十倍于从前教育费用。此种浩大款项，实非今日德国所能胜任。（二）德国国内学校因经费缺乏之故多濒于破产，佛兰克大学去年因缺乏经费几至不能开学，即一例也。故德国即或有如此巨款，与其用之于中国教育，不如用之于本国学校。所谓德国在华之学校政策者，实非战后德国旦夕所能办到之事。

虽然，德国人决不因此而灰心也，全部之学校政策虽不能实现，而一部分之学校政策则事属可行。现在德人之计划，第一，拟鼓吹中国当局于医工各专门学校加设德国语言一科。医工各科为德国擅长科学，以此鼓吹中国，中国必乐为采纳。将来习德国语者渐多，则德国思想必能深入中国青年之脑中矣。第二，派遣德国教习到华担任教务。当大战后，德人生活艰难，多拟赴国外谋生。日本于此时乘机聘请廉价之德国军官多人前往日本练兵。中国非军国主义之国家，无德国军官用武之地，于是德人欲乘中国人士号

称讲学之时多派教授来华，即或中国学校不肯多出薪金，亦可由德政府略为津贴。盖此种计划亦实现学校政策之一部分也。第三，欢迎中国学生留德。美国欢迎中国学生留美已收极大效果，近来留法学生增加，英国方面亦有欢迎中国留学生之建议，德人因之注意于是。惟以近来德国粮食房屋均形缺乏，故此时入德留学办理护照等事，德国驻外领事往往加以留难，一俟粮食房屋稍形充裕，便可欢迎大批中国学生留德也。第四，凡往中国担任教授之德国人，皆须兼习中国语言。盖德国教习若不了解中国语言，其所接触者只有学生，而不能与中国群众接谈。战前法国在土耳其设立学校甚多，然而欧战开后，土耳其仍与德国连络。此无他，法国人未能与土耳其群众接触之故耳。故德国教习兼习华语以与中国群众连络，亦为广义之学校政策。

以上四端，皆德国在华学校政策之预定计划。记者尝谓中国将来必有两种教育竞争：一种是各国厉行学校政策，无论在华筹办学校或招致中国青年留学，各树党援，各亲其国，其目的专以发展该国政治为主。一种是各国学者争播各国文化，无论公开讲演或散布著作，各立门户，各守师说，其结果中国青年思想界为各国文化竞争之场。前者则中国将为各国政治之殖民地，后者则中国将为各国文化之殖民地。吾可爱之青年乎！君等曾一思君等之重大使命乎？须知君等系改造世界之人，而非被世界改造之人也。

（三）德国对华之新闻事业

当记者初到欧洲时，欲考察欧洲人之思想言论以作记者研究欧洲大势之资料，然欧洲人上自总统下至平民莫不有党派之关系，故其持论常有成见，吾人欲鉴别其言之是非，须先了解其人之党系。友人李君幼椿授记者以一种鉴别方法，即每与欧人谈话之际，可先询其所阅何种报章。报名既得，则其人之思想来源与其所隶属之党系，皆可了然如指掌矣。又有一次记者晤一曾住中国之德人某君，伊云："中国人尚未十分了解报纸力量之大，故一般人对于报纸皆甚淡然。中国报纸多偏于消极的批评而缺少积极的建议，故其影响于政治社会者亦偏于消极方面。至于欧洲报纸则不然，不但消极批评，且有积极建议。一家报馆之中，例有专门学者之顾问数十人，每一问题出，必由专门顾问加以精密讨论，然后著为论文，以作社会之指导，故其效力常影响于政治社会之积极方面。即就消极的攻击而言，亦较中国报纸有力，因报纸之攻击，实为国民表示态度之第一步骤，若攻击而不得胜，则第二步骤之革命手段即紧随其后。故欧洲人视报纸之攻击为革命之动机。"于此可想见报纸在欧洲势力之大矣。报纸力量既有如许之大，故欧洲人以办报为征服或感化人类思想之一大利器，决不似中国人之以新闻事业为儿戏。明乎此，则记者此篇关于德国在华新闻事业之通信，或亦可引起吾亲爱读者诸君之注意乎？

记者上次通信，曾以德国对华之学校政策报告于读者诸君之前矣。新闻事业者，亦广义之学校政策也。何以言之？学校政策者，欲制造德国式之中国青年，新闻事业者，欲制造德国式之中国人民，不过前者范围较小而后者范围较大而已。欲明今后德国之对华新闻事业，不可不追述战前德国在华之新闻事业。

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德国在华创立《德文新报》周刊一种，在华德侨之消息赖以灵通。然该报之缺点有二：第一，该报系用德国文字出版，华人能通德文者极少，仅有少数高等政治机关选择一二以备参考，在中国社会方面可谓毫不发生效力。至于其他各国在华组织报馆甚多，而其所用之文字又较德文为流行，故其主张易得中国人士之了解。《德文新报》用以流通德侨消息则有余，以之对抗各国新闻政策则不足，此其缺点一。第二，该报既系周刊，每有重要事实发生，不能即刻登出，故其效力远逊其他各国之日报，此其缺点二。当时已有德侨察知此弊，拟用英文办一日报，以鼓吹德国政治，然又有多数德侨以为，宣传德国思想而用他国文字，实属可耻，故采用英文创办日刊之议终不果行。直至欧战已开，中德感情日益隔阂，于是在华德侨始大觉悟，非断然从权采用他国文字发行日报不可，所谓《战争》及《中德日报》两种报纸，遂应时势之要求而产生矣。《战争》系用英文，《中德日报》系用德文，大鼓吹其德国主义。此外在天津方面则有《北华日报》，在青岛方面则有《青岛新闻》。然皆规模狭小，催眠群众之力量不大。除上述各报外，为德国之宣传机关者尚有二种：一为德华电，一为发行华文书籍。

德华电在中国颇有势力，惟此项事业需费甚多，战后经济恐慌之德国是否有力恢复，实属最大疑问。在战前德国曾印有一种叙述青岛内政之华文书籍，初印一百五十本，分送中国各政治机关，未几，各机关皆来函称赞该书并要求再版。于是德人知宣传德国主义之华文书籍颇为中国人士所注意，遂拟编著一部“特为华人之德国书籍”(Deuschland Buch für Chinesen)，印刷三万部，以便广为散布。后值战事发生，此事因而搁置。统观战前及战期中，德国在华之宣传机关共有三类：一曰报纸，二曰电报，三曰华文书籍。现在德国金融恐慌，若欲一一恢复，实为势所不能；惟其国人以新闻事业重要，拟于相当范围内设法恢复一二。除德华电需费浩繁恐一时不能恢复战前原状外，目下所拟从事者，一为日报，一为华文小册。

日报拟办德文、英文、华文三种，其立论专以迎合中国人心理为主。据德人观察，现在华人无论任何党系，对于下列五条意见皆归一致。即（一）取消领事裁判权，（二）财政独立权，（三）关税独立权，（四）取消外国在华之邮政，（五）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日报对于上述五条宜时时加以鼓吹，使中国人皆以德国为至良之友，则日报之功用见矣。德英两种文字之报，当然由德人自办，不假手于他人，即华文日报，亦应由德国领事署之翻译官办理，受领事之支配，以宣传德国主义。战前德人散布华文小册既收效

果，今后更当努力编著华文书籍。其内容即鼓吹战后德国之如何重兴、工业之如何恢复、教育之如何进步、对华之如何亲善。要之，其宗旨在博得中国人之同情而已。此种宣传，亦可谓为广义之新闻政策。

以上系就德国在华之新闻事业而言，吾今再叙述德国内地报纸对于中国之关系。在战前德国内地日报登载中国消息者只有下列各种：《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 Anzeiger）、《口耳李喜日报》（Kolnische Zeitung）、《佛兰克佛台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杂志中登载中国消息者有下列二种：《德国政治》（Deusche Politik）、《中德联合会之中国记录》（China Archiv des Deusch－Chinesesche Verbandes）。以上报章杂志所记载者，大半皆系德人游历中国所报告之消息，无非描写中国人如何穿衣吃饭之事，以供该国人士茶余酒后之谈资。间有一二作政谈者，亦无非与中国官僚曾经谈话几次而已。至于中国之政治趋势如何，学术思想如何，固未尝有深切之论评也。其尤可痛者，在华德国教士更喜描写中国之一二野蛮状态以告其国人。故一般德人皆视中国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之可言。记者每遇德人，辄将中国文化广为宣传，伊等闻记者之言，始恍然昔日之受欺于教士也。大抵教士之喜谈中国野蛮状态，亦犹唐僧取经之描写西域奇险状况，盖非此不足以显其信道之笃与夫冒险之能也。

专赖游客教士之报告，当然不足以获得中国之真正消息，势非派遣富有知识之新闻记者前往中国实际调查不可。然德国内地报纸之有驻华访员者，只有《佛兰克佛台日报》一家，且为时亦至暂（据闻该报曾派 Alfans Paquet 及 Fritz Wertheimer 两君至华，未久即归）。现在该国报纸所载关于中国之消息，多系采自英法各报。近来各报有鉴于前此中国情形之隔阂，拟特派访员来华，若一家报馆之财力不能担任，则由数家报馆合派。拟在北京设置一人以报告北方消息，上海设置一人以报告长江流域消息，广州设置一人以报告南方消息。派遣此项访员，以曾在中国作官吏或任教习者为合选。以上所述，则系德国内地报纸关于对华之新闻事业也。

记者亦系热心国际通信事业之一人，对于德国对华之新闻事业当然无所用其非难，惟吾希望德国在华办报之新闻记者，与其宣传德国政治，不如宣传德国学术，吾更望德国内地各报，与其记载中国政治之无聊消息，不如考察中国社会之思想变迁。盖吾人欲从政治上以谋人类之相互了解，是犹缘木而求鱼也。不知思深虑远之德国新闻记者，其亦以记者之言为然乎？

（四）德国对华之商业（三篇）[①]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该篇，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269 页至 288 页。

二十二　德国在华外交官制之更改及使领人员之派遣[①]

二十三　关于东铁问题之欧洲舆论[②]

二十四　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

当九月十九日日军强占沈阳之时，是日《柏林午报》即已有长篇纪述。到了各家晚报发刊之际，所载尤为详尽。余是时方卧病柏林大学医院，每日皆有一位卖报女郎，按时入院售报。同室各位德国病人，看了此项消息之后，多围立余之床前询问，并互相讨论，一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终不可免也者。

余卧病异邦，闻此噩耗，百感交集，殆难言喻。但中心之引以为深忧者，却不在此次日军之武力占领，而在数十年来日人之对满积极经营。因为武力侵略之举，无论在国外在国内，皆最易引起世人注意；而经济侵略之法，则无人能斥其非，尤其是我们一般醉生梦死之中国人，但知忙于内争，对于东北问题之危机，殆一无觉察，或不愿觉察，或觉察而视若无睹。

以吾国今日之军事、政治、经济、学术情形而言，无论世界上任何强国，皆有独力亡我之可能。其所以直至今日尚能苟延残喘，觍然自称为“独立国家”者，全恃“均势”二字之力。日本之在东亚，本来雄视一方，无可与敌。但一挫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再挫于华盛顿会议之逼还青岛，现在距华盛顿会议之期，虽已时隔十年，而国际对华形势，却仍依然未变。此次国际联盟中日本之陷于孤立，即是列强干涉日本之“开宗明义第一章”。但其效力，亦只限于“开宗明义第一章”而已。将来对于日本加以实力干涉者，却为美俄两国，而非国际联盟。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一役，虽云“三国”，但实际上只是俄罗斯一国为其主角。（请参看拙译《三国干涉还辽秘闻》一书，中华书局出版。）俄国之所以出头干涉者，非有爱于中国，不过不欲日本占领满洲为其近邻而已。自日俄战争而后，美国对于满洲一隅，渐渐发生密切关系。一九〇五年之日俄和约，美国从中极力斡旋，而以保全中国领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该篇，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289 页至 292 页。
② 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该篇，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293 页至 297 页。

土，开放中国门户为原则。一九〇九年，美国提出“满铁中立”一案，亦在欲将满洲一块肥肉，从日俄两国口中拖出。（请参看拙译《美国与满洲问题》，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日本乘欧战机会，提出二十一条件，强迫中国承认。而美国即于是月 13 日，向中日两国政府，提出同样牒文。略谓：“中日两国间，如缔结有伤美国在华权利，有妨中国土地完全，有碍门户开放政策之约，则美国均将誓不承认”云云。一九一九年，日本方面欲将满蒙铁路投资建筑权，作为日本所独有，不愿属于当时新组之“国际银行团”，其事亦为美国银行代表 Lamont 氏所严拒，其后日本终于屈服，将满蒙铁路投资建筑权，归诸“国际银行团”，但将已成之铁路（如南满铁路之类）除外而已。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结果，日本不得不自行宣言：该国对于满蒙方面，并无独占优先权利之意，将来南满方面建筑铁路，亦不必完全限于日资。此外，对于前由二十一条件所得之权利，亦愿自行放弃云云。近数年来，日本国内，因经济恐慌之故，借入美款不少，其中实有一部分用于日人南满事业。凡此种种，皆为美国在满关系日深一日之明证。

倘日本果然长期占领满洲，不但有违列强所谓“开放中国门户政策”；而且在事实上，日本占领满洲之后，无异将其国土国力国富扩大一倍。太平洋上之均势，从此打破。此岂美俄两国所能忍受者？诚然，现在美国因为世界经济难关之故，未必即用武力解决。俄国因为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之故，亦未必立刻出来一争雌雄。但过数年之后，各方准备完全，则今日中国之满洲，实为他日国际之战场！日本虽强，以一身而兼敌美俄两国，恐终非日本武力所能胜任。同时，中国兵力虽弱，但扰乱其后方接济，则亦有余（假定陆战地点在满洲一带）。因此，将来如果战事一开，日本所处地位，至为不利。欧战前，德国自恃武力、经济、学术皆已准备充足，以为“举世无敌”，因而轻视外交，其结果，协约方面利用德国此项弱点，遂使该国陷于“举世皆敌”之地位，以至于一败涂地。现在日本态度，殆极类似当年德国。现在美俄两国之极持镇静态度，只让国际联盟出来干涉者，无非先欲获得世界同情，以陷日本于孤立，然后师出有名耳，此正是白种人之狡猾处。

近来吾国当局，对于东北纠纷，一意倚赖国际联盟，固然错误；但一般喜唱高调之人，直斥当局之求助国际联盟为多事，亦非正当。盖呼助于国际联盟，正所以暴露日人罪恶于世界。此次国际联盟会议之一致非难日本行动，实与吾国以精神上之助力不少。现在国际联盟中之有力份子，当然要推英法两国。当国联议决邀请美国列席之时，日本代表芳泽曾提出抗议，于是，英国代表乃向其多方解释，而芳泽则只是摇头不已。但投票结果，日本终归失败。至于法国方面，据云：该国外部人员，颇带袒日色彩。但该国外交总长白里安氏个人，则以素抱维持世界和平宗旨之故，却甚希望国联此次弭争之

举，能得最后胜利。当时国联议邀美国列席之际，似已预计，日本如不尊重国联议决之时，当由美国出来，加以经济压迫，譬如收回短期对日借款之类，以使日本就范。此正与德国近事相同。盖德国自与奥国密订关税联盟以后，法国闻之大愤，乃勾结美国银行家（按美国银行家中，颇有一部分极与法国接近），同时向德收回短期借款，而德国各大银行乃不得不大闭其门，于是德国外长亦不得不在日内瓦自行宣布，取销“德奥关税联盟”之约。

总之，日军此次在满暴行，最足以耸动世界耳目。如果日本当局一旦觉悟，则撤兵之事，在不久期间之中，终可办到。如不觉悟，则未来日俄美大战，转瞬即到目前，满洲一地，终非日本囊中之物。

二十年十一月五日自柏林寄

（上海《生活周刊》）

二十五　战机尚未成熟

记者于《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一文中，曾言及日本强占满洲，打破太平洋上均势，行将惹起日俄美战争云云。但现在战机却尚未成熟，故俄美两国犹抱谨慎态度，而日本军阀亦因此得以逞其横行之欲。不过将来战机成熟之后，满洲一地终将为国际战场，此则吾人不可不预先加以准备者。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未就现职以前曾任菲律宾总督，对于远东情形素称熟悉。美国总统胡佛亦尝久住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尤有深切研究。此次美国对于日本侵满一事，本可援引《九国公约》出头加以干涉最为直捷便当，然而美国方面却不愿出此，反让不关痛痒之国际联盟以当其冲者，亦正有其故：第一，如美国援引《九国公约》而日本仍不服从，则最后解决之法只有出于武力一途，但以现在国际经济情形如此凋敝之时，所有欧美政治家无不终日忙于德国赔款问题、协约战债问题、国内失业问题、国际金融问题，安有余力再向远东作战？第二，今年春间将开国际裁军会议。美国对于裁减各国陆军问题虽极力主张，而对于扩充自己海军一事却不遗余力。假如日本不愿撤兵满洲，正与美国以扩充海军之口实，而日本财力又不足以与美竞争，其结果，美国或将以“不扩充美国海军”为“日本撤兵满洲”之交换条件亦未可知。第三，假如现在美国即用武力对日，就海军而论，美国虽可与日一战，而对于满洲之日军，则美国却无法动其毫末，其势不能不有待俄国之相助。但日去而俄来，又殊非美人所心愿。因此之故，美国如未获得“国际助力”之前，决不愿独向日本开衅。所谓“国际助力”者，在海军方面则由

英美两国联合以压日，满洲方面则由签订《九国公约》之列强出来实力干涉。其结果，满洲一地或将由“日本独占形势”成为“国际公有局面”，换言之，政治名义仍将属于中国，而经济大权则操诸列强之手。其实不但满洲一地如此，所有吾国不能自守以及不能自行开发之区域，皆将落得此种下场。现在世界列强对华形势，除日俄两国外，无不抱此“国际共同发展中国”之政策，换言之即“经济的国际共管”。日本之利，利在武力独占中国，俄国之利，利在主义普及中国，而皆不以“国际共管中国”为利。因此之故，当国际联盟讨论满洲问题之时，一方面排斥日本独占中国之野心，他方面又只邀美国参加讨论，而独将俄国屏外。此非俄国在满利害关系不及美国之大，实俄国所抱政策不与欧美列强相同故也。日俄皆为中国近邻，皆有吞并中国土地之野心。当一九〇九年美国提出“满铁中立”条陈之时（即所有满洲境内日俄两国铁路，均由中国自行赎回。此项赎路之款，则由国际共同借与中国，并派外国顾问共同监管各路），曾密征列强意见。是时，英国因与日本有同盟之谊，法国因与俄国有协约之结，故均不敢冒昧赞成，只有德国一国极表同意，美国提议因而搁浅。但日俄两国却由此捏着一把冷汗，乃于次年订结日俄协约，为共同瓜分满洲之备。[①] 同时，英国因顾虑美国同族之谊，早将英日同盟解除，以便将来美日开衅之时，英国纵不助美，至少亦可以宣布中立。此外，法国对于俄国亦复早已恩情两断，无所顾忌。其结果，日俄两国之于对华问题，虽彼此同处孤立地位，却又不能合作，如一九一〇年之日俄协约故事，不但不能合作，而且时有冲突危险。其在他方面，则英美法德以及其他西洋各国对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一事，彼此利害既同，自然容易结成一条战线，迥非一九〇九年美国孤掌难鸣之情形。此次国际联盟能够演成“一致投票反对日本”之活剧，亦自有其背景，并非完全出于公道之心。日本满心欲吞中国，以其武力而论，亦复具有此项资格，但为国际形势所扼，始终不能大举，只得做出许多“小孩撒娇”样子，蹂躏许多无辜人民。但结果究何所得？重兵驻扎他国境内，终日提心吊胆，自然说不上什么中日提携、经济发展，而在此国际形势之下，长期占领满洲一事，虽在日本当局亦不敢安然自信。故余对于日本武力占据满洲一事，始终认为可以利用“国际形势”加以解决。其令余终日寝食难安者，即吾国因“均势”二字得以苟延残喘，将来亦随“均势”二字呜呼哀哉！日本武力吞并中国，是急性症的亡国，列强经济共管中国，是慢性症的亡国。倘国人尚不从各方面为“有计划的”急起直追，则吾人即或偶然打死一两个日兵，争回一二里华地，皆与中国最后之命运无大关系！

俄国自实行“五年计划”以来，国内一切事业虽皆有长足进步，但其进步之程度却

---

① 此处有删节。

远不如俄国当局之预期，尤其是交通问题毫无何等发展。据欧人熟习俄事者言：俄国至少还须一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始能成为相当强国。俄国主要兵力皆在欧洲俄境方面以防波兰、捷克等国。俄国因欲集中力量以整理内政之故，最近且与波兰、芬兰等国缔结“互不相攻”之约。数日前，俄京方面，捷克驻俄代表之书记官某，因勾结俄人谋刺驻俄日使以便引起日俄战争之故，已为俄国官厅驱逐出境。捷克政府至今尚未正式承认俄国政府，故只有代表暂驻俄京，而无正式公使。此次谋刺日使之举，更可以想见俄国之欧洲邻邦其希望俄国与人开战为何如者。当英国保守党此次选举胜利之时，竟有一部分英人主张利用此次满洲纠葛，怂恿日本驱逐北满俄人势力，然后再进而组织“十字军”以征暴俄云云。但欧战之际，日本曾因援助捷克在俄俘虏之故，派兵甚多，用款不少，初以为从此可以永远占据西比利亚东部一带扩充日本势力，孰知日本政府其后竟为美国所压迫，不得不将日军撤回，所耗军费一无所偿，日人至今犹抱恨不已。现在英国虽欲利用日本作傀儡，而日人似已学乖，不复再上其当。因此，日人占领齐齐哈尔之时，力向俄人担保，并无妨害俄人在满势力之意。其在俄国方面则鉴于日俄战争一役之败因系在交通不便、粮食困难，现在俄国交通之不便，尤甚于昔，西比利亚农人之不愿供给俄军粮食，恐亦较昔尤甚。此外更加上许多白俄从中作祟，列强在旁伺隙，俄国实无能力与日一决雌雄。因此不能不暂时隐忍，以待战机成熟。昨日德国某报曾有东亚通讯一篇，谓满洲三个大城——哈尔滨、大连、沈阳——最足以表现俄日中三种民族鼎立争雄之势。哈尔滨共有居民四十余万，其中约有俄人七万，所有建筑皆系俄式，通行语言亦为俄语。大连共有居民三十余万，其中约有日人十万，凡入境者，实无异身到日本。沈阳亦有居民三十余万，其建筑样式及生活习惯，均足以表现华人精神云云。中日俄三国在满争雄之局面早已形成，而谓俄国将来竟能坐视日本独拥满洲，在理实为必无之事。

满洲问题迟早终须出于一战，殆无疑义。但现在战机尚未成熟，故日人犹有撒娇发疯之余地。至于吾国将来能否保有满洲，则以国人对于未来战争是否能够积极准备为转移。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自柏林寄

（上海《生活周刊》）

二十六　御侮之武力

近来爱国之士愤暴日之侵略，纷纷主张对日宣战。但宣战必须武力，故国人对于御侮之武力，不可不有相当之研究与准备。

开战第一要件，必须器械子弹充足。据熟习中国兵工厂情形之某君言，中国虽连年内战，遍地皆兵，但至今国内尚无一所“制造”军器之兵工厂，只有几处“配置”军器之兵工厂。换言之，所有军械重要部分如枪筒子弹之类皆由外国先行制就，然后运到中国，再由中国兵工厂将其配置起来。譬如枪筒一物，口径略欠均匀，则射击便不准确。中国至今尚无能力自造枪筒，故必须向外国购买，而各国奸商又往往将欧战时所遗枪筒略加修理卖与中国，于是中国各师所用军械口径大小至为不一，甚至于一师之中所用军械有时亦复彼此不同。口径大小既异，所需之子弹大小亦当然随之而异，但中国所用子弹既从各国运来，往往张冠李戴，射击至为不准。我们知道，欧战时三大战术，一曰散队击，二曰侧翼击，三曰纵队击（即兵队列成纵线形式，不作横线排立)。假如射击不准，则站在后面的兵士往往把站在前面的自家人打死。至于子弹所用弹壳火药等项亦皆购自外国，中国尚不能自制。而现在战事胜负关键即以双方子弹多少为转移。中国军队购置军器，均由外国洋行包办，平常一枝毛瑟枪，在欧洲只值华币十二圆左右者，一到香港便增至七八十。每当南北混战之际，而外国洋行辄辟客厅数间，东厅迎接北方军阀，西厅招待南方军阀，双方重价购械，打得民不聊生！而洋行老板则因此腰缠万贯，好不开心！凡外国军队已不应用之军器，皆设法卖与中国南北军阀。凡南北军阀已不乐用之军器，则又设法卖与四川军阀。好在此项军器，不是用来抵抗敌人的，而是用来枪毙百姓的。百姓手无寸铁，被军阀绑得紧紧的，相距只有几个米突远，一声开枪，此种无辜百姓当然应声而倒，枪之射击准否，在此尚无重大关系。反之，若与外人开战，则射击准否实为决胜第一条件。又此次日军在满攻我，处处利用飞机，而吾国射击飞机之炮只有寥寥数尊。据军事专家云，一尊“射击飞机自动炮”，每一分钟内所击出之炮弹约需华币两千圆，换言之，每一点钟之内约需十二万圆，实非中国今日财政情形所能胜任。日本军队到紧急时节，可出兵四十万左右；而中国军队虽号称二百万，但据有真正战斗力的（指训练精良子弹充实而言）至多只有五万。以一敌八，安能取得最后胜利？数年前东省军队为俄所败，当时张学良曾有通电，谓“以东省一隅之众，抗强俄倾国之师”。以“一隅”对“倾国”，文笔何等工稳！但当时俄国何尝“倾国”出征？实际上不过数师军队而已。此

次日军侵占我东北，亦复只有数师，竟能在东省之内任意横行，如入无人之境。以中国如此腐败之军队而欲与日开战，断无侥幸之理。话虽如此，余并非完全反对向日开战者。但开战程度只得偏重抗御；换言之，日人来攻之城，吾必死守抗御，必至力尽而后退，凡有守土之责者皆应如此。至若大规模作战，直将暴日军队逐出东省，则尚须有更充分之准备。

请以德国为例：德国现有陆军十万（此外尚有武装警察十五万），与法国陆军人数（七十万）相较，为一与七之比。但现在德国士兵训练，已不用战前“被动式的训练”，而改用“自动式的训练”。换言之，每个兵丁皆有自动的应敌能力，皆有充当军官的资格。至于德国人民中之曾身经百战者，至少尚有一千万以上，一有战争，皆可立时召集。德国战前共有兵工厂二十余所，战后受《凡尔塞和约》之限制，几乎全体改为普通工厂。当记者一九二二年游览德国商品展览会之时，曾见克虏伯炮厂所制农具多种，成绩斐然。德国以最短时期之中悉将军用工厂改为生产工厂，当时曾使各国人士大惊，但是到将来一遇战争，德国再将各种生产工厂迅速改为军用工厂，亦同样的将使世界各国为之骇然（按从前南京政府德国顾问 Bauer 曾建议南京当局，用二千五百万圆建筑五个基本工厂，平时作为生产机关，战时则改为军用工厂，其法即系仿照德国办法）。此外，德国不能在国内公然建设军用工厂，因而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各中立国内）秘密经营军用工厂不少，一旦开战，即可悉数移植国内。一年前德国在俄秘密组织德国航空军队，后因其飞机队长某跌死之故，其事始暴露于外，法国方面曾起而干涉（当时该队长之少妇闻其夫跌死后，旋亦自驾飞机从空跳下，以便与其夫为同样之死亡）。又德国科学家对于战争利器亦复不断的拼命发明，现任柏林大学主任化学教习即系战时前线指挥毒气攻敌之重要人物。现任德国总统兴登堡为德国战时元帅，与世界列强血战四年，不使敌军入境一步。当欧战初起之时，俄国乘德国全力集中西部之际，忽派八十万大军侵入东普鲁士，而兴登堡乃回师攻击，以少数精兵将俄国八十万大兵全数歼灭。其用兵之神速较之吾国军事当局为何如？现在德国军事准备之周到，又较之吾国今日军事准备为如何？此无他，欲御外侮，非有充分之武力准备不可。

吾国近年不务实际上之努力，徒有空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声高入云霄，久为帝国主义者所厌闻。自日本改计宣布“进兵理由系在保护条约权利”之后，于是列强对于日本进兵满洲一事居然与以相当原谅。当日内瓦国联会议之时，吾国外交形势至为顺利，但到巴黎国联会议之时，则形势大变，各国舆论均带袒日色彩，尤以巴黎报纸，慨然以“拥护列强条约权利”为己任！结果乃有国联派遣委员到满调查之举。其调查目的，即在考查中国方面是否有违背条约之事，彼等实有一鼻孔出气之关系，我

国欲求得如何公平之结果，恐终属梦想。实际上欲求根本解决，仍非有御侮之武力不可！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寄自柏林

（上海《生活周刊》）

二十七　国防问题

——团练国防军

近代西洋国防原则有二：（一）常备军之数目须极小，以免多耗军费；后备军之数目须极多，以便倾国出战。（二）兵工厂须极少，"准兵工厂"须极多。所谓"准兵工厂"者，在平时则努力生产工作，以作经济竞争；在战时则将其内容一律改为军用工厂，以作铁血竞争。关于第（二）问题，他日当另为详文论述，兹仅言第（一）问题。

征兵制之善于募兵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可以强健全国国民身体，可以打破私人军队制度——论者已多，无待赘言。但征兵制度却有两个前提：第一，该国人口数目并不甚大。第二，该国户口调查极为严密。吾国人口既如彼之多，如果实行征兵制度，则每年应征之义务兵役壮丁为数极众，世界各国殆无其匹。以吾国生产如此落后之国家，忽将无数有为青年置诸毫不生产之途，毋亦太不经济？而且户口调查不详，每年征兵之时必将引起无限纷扰。故在今日吾国情形之下，征兵制度殆难一时实现。

团练制度为吾国所旧有，就近代战术之精深复杂而言，团练诚不足以为御外之用。但在他方面，团练组织却可以作为征兵制度之基础，换言之，中央"国防总监"每年可由各地团练之中——包括商团、农团、工团、民团等等——征调壮士若干（以各该处团练数目之多寡为比例）前来中央，加以训练（专重基本训练）。一年之后，复派赴各处"国防区域"充当兵役二年，并作实地练习（按各国防区守卫性质互不相同，故其练习亦复彼此相异）。兵役满后复遣回原籍，或在团练之中担任教练，或改就其他普通职业，均可听其自便。惟其住址必须详细登记，以便对外开战之时可以立时调集。倘在防区兵役期满之后仍愿继续留彼服务者，亦可准其再行服役五年或十年。在此"自由兵役"期间，所得饷银虽远较供职其他普通职业所得为少，但"自由兵役"年限满期之后，可在官营事业之中如铁路、邮政之类，得一良好位置（按德国从前征兵制度以及现在募兵制度均有此种奖励"自由兵役"之办法）。因此之故，曾充兵役之人，尤其是曾充"自由兵役"之人，可以一生不愁衣食，安有流而为匪之虞？而况此项国防军士，皆曾一度前

赴中央受其训练，各省人士齐集一堂，可以打破省界观念，可以增高中央威严。则吾国今日之割据形势、私军制度，均可一扫而空。同时各地团练经“役满回籍军士”之参加与教导，战斗能力益增，可使各地匪患灭迹。一遇外患之时，并可作为后备军队之用，至少亦可作为后方工作之备。较之今日国家养兵二百余万（除极少数例外），既不能捍御外侮又不能削平匪患者为何如！

客有新自吾蜀来德者，谓四川有兵三十万、匪三十万、团练三十万。而团练之势力实大于军队，每遇各县团练齐集会操之时，该地军队无不捏着一把冷汗。四川号称多匪，但现在已无拦路抢劫等事，居民可以安枕而卧。上面所谓匪三十万，乃系大股之匪，多系散兵集合而成，每与军队勾通，时常统率大队攻劫城池，与团练正式开战。而各处团练一闻匪警，辄将长衫脱去，手持枪械，伏在要隘，待匪到来。同时各处团练并以发枪为号，于顷刻之间邻地团练无不立刻动员，与匪接战，颇寓古代烽火报警之意。其结果，匪军往往不支，大败而逃。并闻四川团练竟能自造子弹，其成绩如何虽不可知，但吾民在军阀专横、政治黑暗之下毅然起而自卫，大下牺牲决心，固可从此察见一斑矣。最近我国东北义勇军之与日血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使日本暴军疲于奔命，不能安枕，实现币原所预料之吞下一枚炸弹。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亦可以表现民团所具之牺牲精神。如果吾国各地皆有善良之团练组织，则更内乱不足病，外患不足畏矣。

二十一年五月四日寄自柏林

（上海《生活周刊》）

己　教育事业

二十八　教育家对于中国现状应有三大觉悟

（一）中国之病根在于无能力

我在欧洲住了六七年，莫有看见西洋人比中国人特别天生优秀之处。只有一事，中国人还不如西洋人，即是西洋人有能力，中国人无能力。现在我们先以生产能力而言：西洋工厂因利用机器之故，一个工人生产的能力，至少要抵当中国一千个工人的生产能

力。西洋人的生产能力既富，所以纳税能力亦大。专就今年（一九二六年）德国财政收入而论，便超过一百万万金马克以外（约合华币五十万万元左右），而德国领土与人口的数目，事实上却只等于我们四川一省的疆域与居民。假如我们把数年前段祺瑞临时政府时代所提出的全国财政收入（按其数为华币四万万元）与德国财政收入一为比较，则中国国民的纳税能力尚不及德国国民的十分之一。一句说，中国四万万人所纳之税，德国只须六百万人缴纳便足了事（按德国现有人口七千万左右）。六百万人口，事实上只等于三个上海的居民。故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事实上只等于西洋六百万人。而现在西洋列强的人口，无论任何一国，其数又皆无不在几千万人以上。众寡悬殊，我们中国安得不败？

诚然，德国全年收入超如过华币五十万万元以上，系涓滴归公，名实相符。中国全年收入，名义上虽只有四万万元，而实际上人民因受军队、官僚、劣绅之勒索、中饱、敲诈，恐其所缴纳之金钱，至少当超过正额税项十倍以上。是其结果亦将与德国全国收入数目相差无几。但是，此处我们又当计及德国只有七千万人吃饭，中国则有四万万人吃饭。纵然我们税收数目恰与德国全国七千万人税收数目相同，而我们消费方面却比德国多了三万三千万人。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物质方面的生产能力不如西洋民族，实已无可讳言。但是其罪却不在中国工人，因为假使中国工厂之内亦设有各种新式机器，中国工人亦是同样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恰与西洋工人相等。此证之中国在欧美各国作工之华工可以断言。而且中国工人读书、识字、参预国事的能力，虽有时不及西洋工人，但中国工人同时却有一个长处，即是比较西洋工人特别勤俭，即此一点长处，已足弥补他们不能读书识字之短。

在中国各种人中，其能力缺乏而且罪无可赦者，厥为智识阶级。以现在中国人口之多，除了一二考古学者而外，无论在任何学术方面，均无一个真正学者。若与西洋各国学者数量相较，其结果当为一与万之比。至于回国充当各处大学教授居然睥睨一世之西洋留学生，若使之移在西洋各国，事实上至多只能当个中学教员，但是中国智识阶级若自知其不学无术，缺乏能力，特别发愤努力，潜心研究，以自进于“不蠢”，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大多数却不如此，分明是“惰气上充牛斗，其蠢不辨菽麦”，但他们却自信其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有余。此种“愚而好自用”之智识阶级布满了全国各界要津，于是乎中国之腐败，遂致不可救药！

有人说，中国智识阶级之不能读书、不能治国系由于环境不好之故，不能完全归罪于“惰气”与“自用”。此语初听之似极有理，但是细究起来却不尽然。现在且举数例为证：第一，德国之富强，系自第十九世纪时起（一八三四年经济统一，一八七一年政治统一），其在此时期以前，外则强邻压迫，内则各邦相仇，其环境之坏，初不亚于中

国。然而德国大哲学家如康德之类，大文学家如歌德、喜来之类，大音乐家如巴赫、白堤火粉之类，却皆在此乱离之世产出，由此以造成一种“德国国粹”（Deutschtum）。其后德国即赖此以筑统一之基（按哲学、文学、音乐等等，为一种“民族生活”之反射，若能抽其共通特点，使之铸成一种“模形”，为该民族特有之精神表现，以别于其他异族，即是谓之“国粹”。至于自然科学，则带有国际的性质，非一个民族所得而私也）。反之，德国自统一以后，教育更为普及则有之，科学更为发达则有之，然而陶铸国民思想之伟大人物，如康德、哥德、喜来、巴赫、白堤火粉之类，则反而绝迹于世，不再降生。由此看来，环境好坏，只可以影响“常人”，不应该影响到平居自命“以天下为己任”的智识阶级！所以自己不能平心静气读书，而归咎于环境不好，是我个人终身所不能了解的。第二，中国智识阶级之无治国能力，亦不能归咎于环境不好——如谓人民智识不够之类——无法治理之故。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虽大，而事实上却找不出几位善于理财而又清操自守之人。智识阶级一旦得了财权，便拼命的向自己荷包内装，这难道也可委咎他人吗？此外，我们中国自打平洪、杨起，差不多一切内政外交都离不了所谓“洋员”者运筹帷幄之中，而且“洋员”愈得力，则其成功之可能性亦愈大。为什么对于一个同样“智识不够”之人民，一到“洋员”之手则治理有方，一至中国智识阶级之手则束手无策？这还不算是中国智识阶级自己宣告破产的明证吗？我再老老实实说一句最可痛心而又系实情的真话：假如把中国全部交与西洋任何一个强国政府之手，不到几时，则中国现在智识阶级认为绝对无法治理者，皆可办个头绪出来。西洋人，尤其是条顿民族，往往能将一片草茅未辟之荒土（如美国），不到一二百年间，造成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或将一个绝对不能团结，日日自相残杀之民族（如印度）置诸管辖之下，从此无不贴耳相安。唉！朋友们，我们尽可以提倡东方文化，反对西洋文化，但是西洋人的长处我们应该承认，东方人的弱点我们也应该知道。

现在有许多青年，以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混乱，是由于人民不知爱国或反对革命之故。我也承认这是各种原因中之一种，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其真正病根，却在没有能力。现在世界上所谓“国际竞争”，老实说，即是“民族能力之比较”。[①] 故我们假如不在增加能力上着眼，徒是日日骂人“不爱国”或“反革命”，则其结果诚有如吾友周太玄君所云：“那一时的对抗虽也自不可少，但争人格争面子则有之，而事实上本领既终不如人，终似急来抱佛脚，每每没多大用处。”——原文见本志第十六卷第三期，题为《学术与救国》——其实岂仅“每每没多大用处”而已，有时甚至于一场沉痛壮烈的举动，而结果仅赢得“失望滑稽”四字！

① 此处有删节。

据我生平所接触的吾国智识阶级中人而言，其聪明程度大抵不亚于西洋人，也不亚于日本人，亦西洋大学教授对于中国学生之批评，亦无不以“资质甚佳”许之。但是中国智识阶级有一个普通短处，即是“疏懒成性，不自振作”。岂但不如西洋人之坚忍奋斗，并日本人之振作有为亦复望尘莫及。我们中国人只看见西洋人之学术灿然，事业伟大，却未尝看见西洋学者或事业家之日夜沉思，用尽心血。假如一个中国大学教授到欧洲来，看见一个西洋大学教授用功之猛烈与艰困，若不吓死，亦应羞死！大凡一个人疏懒过一二十年，这个人一生的学术或事业，便算从此完事！一个民族疏懒过一二百年，这个民族的文化或富强便算从此断送！不幸我们中国智识阶级正犯了这一毛病。总结一句话，中国之贫弱混乱在于“无能力”，“无能力”之原因，又在于“疏懒不知振作”。倘若我这推论不错，则现在中国教育家最大责任，第一即在如何设法使国人能力增加（无论任何方面），第二，欲使国人能力增加，则宜先驱国人疏懒之病，使其精力内练，遇事沉毅奋斗，不专以一点“示威运功”或“摇笔弄舌”为救国不二法门。

（二）宜下全体动员令

我们饱受外人之侵陵侮辱，我们应该起来与他对抗，或用排货手段，或用武力反抗，以至于开会演说、著文章、打电报……都是极应该的，至少可以点缀风光，使外国人知道中国睡狮已醒，若是受了别人的侵陵侮辱，他是要叫唤几声的。但是这种自由独立运动的形式，只能说是下了“部分动员令”，而决不是“全体动员令”。我们知道，西洋人之侵略我们不是专用“军备势力”一种，专用“经济势力”一种或专用“学术势力”一种，乃是合起各种“势力”一齐向着中国排山倒海而来。现在我们若要抵抗他们，势非各种“势力”同时并起以相抵抗不可。而且每一种“势力”之侵来，只能以相同之“势力”抗去，而非他项相异之“势力”所能代庖。譬如他人以“经济势力”侵来，我们亦只能以“经济势力”抗去，始能收效，决非他项“军备势力”或“学术势力”所能代庖。反之，“军备势力”或“学术势力”侵来，我们亦只能用“军备势力”或“学术势力”抗去，决非“经济势力”所能代庖。现在我且引举数例为证。

法国为现在世界上陆军最强之国，然而经济方面却不能不饱受英美两国之侵略，岂独对于英美两国如此，甚或至于被法打败、解除武装之德国，因为他的（指德国的）工业势力还较法国为优之故，法国亦不能不低首下心求其救助。最近两年以来，法国对德强硬态度之所以逐渐软化，皆是由于外人经济压力从中作祟的原故。此为“军备势力”不能抵抗“经济势力”侵略之证。复次，现在日本、俄国、土耳其的军备势力虽尚不能称雄于世，而抵御外侮总可胜任，但是学术方面，仍不能不受欧美先进各国之侵略，无

论书籍人才均须借助欧美。此又为"军备势力"不能抵抗"学术势力"之证。再其次，又如古代希腊学术虽优，却不能不屈服于罗马武力之下；中国文化虽高，却不能不忍受元清两族的蹂躏。此又为"学术势力"不能抵抗"军备势力"之证。此外，如犹太民族富甲天下，因自己无"军备势力"特别保护之故，终不能不受他种民族之排斥。此又为"经济势力"不能抵抗"军备势力"之证。

凡此种种，皆足以证明每一种"势力"之侵来，只能以相同之"势力"抗去，而非他项相异之"势力"所能代庖。现在我国一部分青年之心理，以为外人来侵纯系我们毫无"军备势力"之故。假使我们能以武力与外国人打一仗，或是采用暴力把外国人撵起走，然后我们始可以获得自由。不错！外国人拿枪打我们，我们应该也拿枪打回去，倘若我们手中无枪，至少亦要捡个石头击他一下。凡是被人武力蹂躏而不思抵抗甘于屈服，则其人至少是"无耻"。但是假如我们一旦果然武力战胜外人，我们遂从此不再为人奴隶了吗？奉劝诸君，不要乱想！那两项"经济奴隶"及"学术奴隶"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还是紧紧的。只须他人将"紧箍咒"一念，我们四万万个孙悟空，便要立刻遍地打滚，喊叫师傅救命！

或者有人说，国力既强，便可以办到关税自主，实行保护政策，从此内国工业可以逐渐发达，脱离"经济奴隶"之境。不错！现在我们关税不能自主，不但是我们国家体面问题，而且是与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及国民经济前途皆有重要关系，我们应该争回，我们十二万分的应该争回！但是争回之后，我们便会脱了"经济奴隶"的境遇吗！大大不然！我们知道，欧洲方面大大小小有数十个国家，几乎无一个不是关税自主实行保护政策，但是除了英国而外，那一个不受英美"经济势力"的侵略？其实所谓"经济奴隶"者，亦无他，不过是我们每日作工十二点钟以至于十八点钟，仍是饥寒交迫，而他人每日只作工一点钟，甚至于毫不作工，反能锦衣美食而已。说到此处，或者有人又要提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之辩驳。他说，"假如我们国力既强，便可以依照孙中山先生的利用外资、开发富源、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则由此可以保护国内劳工免受他人掠夺"云云。我关于此事在一两年前曾经与德国几个左党人物发生过一场讨论。我记得有一次柏林左党某部开会研究中国问题，也把我邀去参与，当时那位主席曾开口向我问道："王先生，中国工农企业既如此幼稚，失工人数又非常之多，同时中国又无多量资本以供发展之用，即或左党革命成功，将以何法宝实行社会主义以自脱于贫弱?"我当时曾略举孙中山先生借外资、开富源、同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说以答。他听完之后又接着说道："孙中山先生所著之书我曾经读过。但是王先生，你相信英美帝国主义者自愿投资赞助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毫不掠夺其剩余价值吗?"我当时乃强勉应道："一部分剩余价值之被人掠夺，恐终无可避免，但是无论如何，总比现在毫无限制的掠夺好一

点!”他听了之后，叹一口气，转身向其同辈说道：“这个资本缺乏问题，中国实与俄国一样，彼此均没有法子解决!”

朋友们!“经济奴隶”这顶帽子，不是那样容易脱去的!假如真想脱去，还是要在增加“生产能力”上特别注意。“生产能力”加增一分，则“经济奴隶”之境遇亦即减少一分，但是要增加“生产能力”，便与“学术能力”种种发生密切关系。德国以工业后起之邦而能称雄于世者，正以其“学术能力”高人一等之故。所以我们现在不欲尽将各种奴隶帽子完全脱去则已，如其欲之，则须立下“全体动员令”。举凡军备、经济、学术各部分，皆须同时猛力前进方能有效。我之所以有此一段议论的原因，是因为近来看见吾国教育界中流行了几种不甚健全之言论。譬如甲派说只知“求学”，便是“书呆子”，便是“个人主义者”，不能救国。故其结论，遂成了一个“求学不能救国”。殊不知既名为“学”，则直接间接均与国民生活有关，安能谓其无益?德国当其方与世界各国血战之时，所有国中老幼妇女凡能参与战事者，莫不全体动员，独对于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等等，保护惟恐其不周，从无人希望他们将那些高深玄妙、非关应用之“纯粹科学”或“精美艺术”放下不管，而从事捍卫疆域以至于开会奔走专打快邮代电者!故果然是一种学问，我们不要怕其只知“求”，而实怕其根本“不求”耳!又如乙派说只有求学才是救国，亦复不甚妥当。因为别人拿机关枪打来，你却令全体青年埋头读书，不管外事，这又似乎未免过于迂呆了!丙派说“求学不忘救国”，较为适当。但是似乎又把“求学”与“救国”看成两种不相关连的工作。其实“求学”即是“救国”之手段，而且是必不可少之手段，不过不是唯一的手段，只是各种手段中之一种而已。明乎此，则吾国现在教育家对于学生资质亟宜因材而施。孰应作深沉潜默的研究，孰适于呼号奔走的运动，皆须使其各尽所长，一扫从前误认“部分动员令”（如参加各种对外对内之政治运动之类）为救国唯一不二法门之弊。教职员对于学生之指导，应当如此，学生间彼此相待，亦应当如此。

（三）党同伐异是西洋人的弱点，不宜学

“群”与“党”都是结合的意思，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向来把这两个字的界限分得十分清楚。所谓“群”者，便是互相和合，共谋公益，凡事皆以理智为判断，不杂丝毫成见于其间。所谓“党”者，便是纠合同派，排除异己，凡事皆以党利为前提，常被成见意气所支配。

本来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几乎处处都以“情”字为出发之点（如所谓良知良能等），但是独对于宗教与政治两事，却常用严格理智为准绳，不以感情用事。反之西洋的人生

哲学，几乎处处都以“智”字为出发之点，但是独对于宗教与政治两事，却常受感情意气所支配，缺乏理智指导。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宗教相仇之事实可谓“绝无”，主义相争之事（指政治的），亦只是“仅有”（如宋朝王安石与苏东坡等两党之争）。其在西洋历史上，则为宗教而流血、因主义而混杀之事，实是家常便饭，史不绝书。大凡一个西洋人对于一个与他异教或异党之人，都有一种“不共戴天之仇”，虽是极相近之邻居，亦是终身不相往来。偶在途中相遇，彼此皆以怒目相视，恨不能立刻将他抓在手中一刀砍成两半节！现在西洋治安之所以尚能勉强维持者，只因政府手中握有多量兵警随时严重干涉而已。号称“解除武装”之德国政府，手中却有十万精兵及十五万武装警察，维持一个疆域人口仅与吾国四川一省大小多寡相等之地。加以消息之灵通，交通之便利（按德国全国约有铁路十二万华里），可以闻警即至，训练之良好，器械之精利，无不一以当百。故在德国政府手中，虽只有二十五万兵警之数，而论其效用，在实际上至少要抵当吾国兵警百万之众。诸君试想，以一百万兵警维持一个四川秩序，岂有不够之理？此犹就“解除武装”之德国而言，若是法国政府，则随时手中皆有七十万精兵（警察及海军不在内），论其效用，在实际上至少要抵当吾国军队三百万人，以之维持一个本国疆域仅与吾国黑龙江一省大小之地，安得不够？西洋人民日在此种政府严重管辖之下，始得彼此相安无事。虽是每日街上各党青年彼此互打互杀之事未尝一日间断，但究系极小之事，无关宏旨。我们现在假定西洋政府有一天完全失其重心，而同时又无其他强大势力立刻接管政府，则西洋人必至邻居杀邻居，杀得一个鸡犬不宁！

现在我们再举数例为证：西洋人信了基督教，甚至于基督教之中某一派（如天主教与耶稣新教之类），便不准他人再信其他宗教，以至于基督教中之其他异派若有违其意旨者，便应该“杀无赦”。此正与我们中国人对于宗教之态度完全相反。我们中国之有识人士是向来不信宗教，此固人人尽知不必再说，即是无识人民，对于和尚道士亦是向来一律看待，不分彼此。无论释迦牟尼或太上老君，只要他能降福除灾，都可以同时供奉，决不党同伐异。倘若西洋基督教徒到了我们中国亦采同样自由态度，我们中国人民不难将耶稣基督与释迦牟尼或太上老君同时供在一个殿上，因为耶稣基督之教义在爱人，在实际上是无可非难的。但是西洋基督教徒之传教吾国者决不如此，他说：“汝信了基督教，便当绝对排斥其他宗教！”这样一来，正与吾国人民向来对于宗教之态度是不杂丝毫成见意气者大相冲突！此所以基督教到了中国处处皆碰钉子，只靠几个臭钱在那里撑持门面。又如政治一事，现代共和国体虽非绝对的理想政治，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君主国体高明一点。所以我们中国虽行了四千年的君主政治，一旦革命改用共和，而国中人民，至少大部分智识阶级，立刻便可以了解。此正是吾国人士对于政治态度是向来不杂成见意气而以纯粹理智为断之故。反之，西洋人对于政治态度，则全为成见意气所

支配。譬如德国共和革命亦已有八年，而数月前德国大学教授倭铿等数十人尚发表宣言，谓“一九一八年之德国共和革命，是对于德国皇室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此外，还有一位著名德国大学教授讲演，他说：“平等者，文化之仇敌也！”凡此种种，皆系西洋人对于政治之成见极深不可以理喻之证。所以日前有一位法国学者在柏林法国使馆讲演，他说：“我们近代人类对于科学艺术等等，都有极大进步，真可以自骄自慰，独对于政治一事，却丝毫未有进步！”他并把现在各种主义都大大的批评了一顿。总之，西洋人对于政治只抱成见，不可理喻，实为一切古今流血争端之所由起。

诚然，我们中国现在已成了世界上一个极贫极弱的国家，正所谓“人穷说不起话，坏的固是坏的，好的亦是坏的”！但是我们算账，尤其是算历史的账，应该通盘计算，不应该因为一个期间折了本，便把其他许多赚钱期间都不顾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所存的古代文明民族，已只有中华民族一个！什么巴比伦等等，固早已成为历史上一个过去名词。即现在之埃及、印度，亦已成为亚拉伯种种民族之势力范围，古代文化系统实已中断。至于希腊、罗马，则因在欧洲中古时代之民族迁移，亦已完全变换本来面目。其他古代文明民族尚生存于世，而其文化系统犹保持其直线的统一的传留者，只有一个犹太民族略可持与中国相比。但犹太民族只有人民而无领土，且其人数亦只有一千余万，持与吾国之地大人众相较，亦复悬隔甚远，无足轻重。故现在世界上所存在之古代文明民族，其文化系统尚为直线的统一的传留，居处生活尚是团结的相爱的互助（的），对于现在或将来世界尚占有极重大之意义者，实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固西洋“历史学者”及“文化批评学者”所同声承认，非我个人的私言。假如我们证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例，则中华民族之能保存至今而且发展不止者，实较其他古代民族特有一日之长。他事不必论，即此一点，对于宗教政治不杂成见，实行“见善则从，有过则改”之训，便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无限生机！便能使中华民族永远住在一处而无一切宗教、主义的隔阂，以至于非杀个“非你死即我亡”不可！

我国自革命以来，虽然内乱不曾停止，但这只算是“群狗争骨打架问题”！除了几个军阀个人之间或者有点仇恨而外（其实我这话或者说错了，因为张作霖可与吴佩孚携手，究竟他们有何仇恨可言），其余全国人民，无论东西南北，实无丝毫仇恨隔阂，仍是一团和气；只因缺乏能力，坐视群狗打架无法制止而已！但是自从有了主义之争以后，国内青年显然竟分两派，日日寻仇觅恨。无识之人，更误认此种现象为国人思想进步之征！其实假如我们从模仿西洋文化一方面着眼，则诚然愈学愈像，确为进步。反之，若从中国文化一方面着眼，则是十二万分的退步！西洋人诚然有许多好处，我们应该去学，但是这一点党同伐异的劣根性，却千万不要模仿。

国内教育家应该常常指导青年，对于宗教及政治须常以纯粹理智为准绳，力戒意气

用事。诚然，我们的理智程度有限，自己认为“是”者，未必即是“是”，实际上我们只能看到那里，做到那里。不过同时我们却须极为虚心研究，不掩异己者之善，勿护同派者之恶，专以理智为依归，不杂丝毫之意气。是即所谓“君子群而不党”。

（四）结论

归结我这篇文章的意义，第一便是中国之贫弱在于无能力，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如爱国与不爱国之类）。第二便是能力之增进须是多方面的，须下全体动员令。第三便是对于宗教与政治，须用纯粹理智批评，勿杂丝毫成见意气。

我在八年前曾与许多同志组织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当时便一眼认定上述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为中国问题之中心，所以我们规定宗旨为“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以增进国人多方面之能力。而当时加入学会之人，各派主义均有，亦颇能实行“群而不党”之义。后来虽有一部分同志特别专从政治运动着手，分头而去，而其余一部分却仍留大本营中，专在“学”与“事”方面奋斗。我希望我们这种“全体动员令”的办法，能得国内教育家加以充分的同情与合作！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草于柏林

（上海《中华教育界》）

二十九　德意志教育之近况

欧战前之德意志，其科学推为世界第一，对于世界文化贡献不少，吾人固当归功于该国之教育。然自他一方面观之，该国国民既受一种极端国家主义之教育，因而酿成世界战祸，亦未始非教育之害。故德意志之教育，实与世界文化及世界治乱有极大关系。德意志教育向分三种阶级：（一）国民学校，（二）中等学校，（三）大学校。国民学校为一般国民应受之义务教育，其期限为八年。在战前，一般富家子弟嫌其期限太长，且不愿与平民子弟为伍，故宁肯多出学费，直入中等学校所附设之预备学校，为入中等学校之终南捷径。自革命后此制遂废，无论贫富一律须入国民学校。此即革命后第一种之改革，亦即破坏旧德意志阶级教育之入手办法也。

中等学校又分四种：（甲）注重语言文字如希腊、拉丁语之类，以便将来研究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等，换言之，即偏于文科方面之预备。（乙）注重实用科学如物理、化学、算术之类，换言之，即偏于实科方面之预备。（丙）性质与上述乙种相同，惟其

地位较低。(丁)上述甲乙丙三种学校，或偏于文学，或偏于实科，皆不能得完满效果，故又创设丁种学校，即文实两科并重之学校也。

德国大学易进，而中学校极难毕业。故大多数之中学生皆被留级，往往超过法定修业年限至一二年之久始能取得毕业之证书焉。

从前德国学校除国民学校系义务教育外，其余中学校、大学校皆非有资财者不易肄业。自革命后政府乃规定章程，凡有天资而无财力之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是昔日以资财为标准者，今则以天资为标准矣。此即革命之后之第二种改革，亦破除旧德意志阶级教育之第二步办法也。

从前国民学校之教师须具备两种智识：(一)能讲《圣经》，(二)能音乐。换言之，即以宗教之精神陶镕儿童之性质。故其教育法规以宗教为中小学校之必修科目，类似吾国之修身一科。自革命后力改此种制度，使教育与宗教分立，且从前政府每年帮助教会经费以实施社会教育者，至是亦停给经费。此即革命后之第三种改革，然此系指社会民主党执政时而言，现在德意志新政府系中央党、民主党、国民党三党所组织，中央党多旧教徒，将来究竟恢复旧制与否，此时亦殊难断定也。

德意志大学制度与英美等国大学制度不同。英美等国大学系以养成人物为目的，德国大学系以研究学术，养成专门家为目的。德国能在世界学术上占极高之地位以此，而德国一般之智识阶级只有专门智识，对于人生毫不了解亦以此。譬如研究化学者，除自己研究之化学外一无所知。闻中国某君前次来德，晤德国某大学教授，该教授猝然问曰："我们已经没有'凯撤'了，你来做甚么？"其无常识也如此！

德国大学教授多系著名学者，然每登坛讲演，只顾自己发挥学理，初不管学生能否领会。盖其目的在研究他自己之专门学理，而不在教授学生。故德人富于求真理之精神，对于学术上有极大之贡献，未始非此种制度所收之效果也。

近来颇有提倡教育改造之说者，其言曰："吾德教育只在造就专门学术家，而对于一般人生及社会之常识均不具备，故往往一般学者为人利用，以造福人生之科学供人类作恶之工具。今后学校教育宜与社会接近。换言之，即提倡一种社会化之教育。"

反对者则曰："社会魔力甚大，吾人若一面研究学术，一面与社会周旋，则其结果必为社会所同化，吾人所求之真理亦为社会现象所左右，无异使社会永无长足之进步，故不如本求真之宗旨，猛勇前进，不顾一切。"以上两派议论将来谁获胜利，此时尚不可知，惟现在之大学精神仍与战前无异。试观今日大学生之思想，便可证明吾言之不诬矣。

世界新潮，其发源也往往出于大学，而德国则不然。今日之大学生类多思想腐旧，反对社会民主党所组织之民主政府，而赞成德意志之军阀派、帝制派。此次选举，大学

生所举者，多系德意志国性民党党员。德意志国性民党者，即军阀派、帝制派所组织之政党也。吾人骤睹此种现象，岂不惊异？其实此中亦有大原因在，请分述如左：

一、吾前段曾云，德国大学学生多系富贵人家子弟，此种人之脑中装满专制阶级思想。从前大学生之地位极为尊贵，今见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倡劳动平等之说，劳动家地位势力渐有凌驾一切阶级之势，彼大学生自思若祖若父之资本及地位行将根本推翻，于是反对现在之民主政治，且自谓脑力工作当较一切身体工作为尊贵，而现在之工人竟敢与吾辈比肩抗衡，大为愤怒。

二、现在之大学生在战时多在前敌作战，不知当时本国境内人民困苦情形。自谓在前敌为国努力，争最后之胜利，乃国内自乱，故极恨革命诸人。今日之政府即当时之革命要人所组织也，因之反对现政府，并对于民主政治十分怀疑。

三、在战前德国大学设备极为完善，战后因经济恐慌，各处大学常有倒闭之虞。于是大学生颇有今昔之感，愈信仰旧德意志之精神而反对现政府。

四、德国人有一种偏见，即自信德意志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此种偏见，大学生尤甚。今见强邻压境，旧日德意志之光荣一扫而空，处处视人喜怒以为忧乐，愈恨政府之无能而民主政治之不可相信矣。

由此观之，德意志之政治虽已改造，而大学之空气乃如此腐旧，故德国民主政治之前途，实不可遽抱乐观，非从速改造教育不为功。噫！帝国主义之教育，其流弊有如此者！吾东邻之某国与北京之某武人，尚极力提倡旧德意志式之教育，亦可以休矣！惟当此大学空气如此腐旧之时，有一事较为乐观者，即大学生近来主张参与校务及选举教授二事，连日正在鼓吹。此事果行，则大学内之空气或稍稍更换亦未可知。

外国人来此入大学甚易，只须有中国学校文凭（无论中学大学文凭均可）便可请求入校。先由该校给予许可入学证书，然后再由柏林政府正式允许便可入校，随意选择科目，自由听讲。

（上海《时事新报》）

三十 德意志全国皆工的新教育制度

我们理想的组织，是拿“全国皆工”的制度来代替“全国皆兵”的制度。从前当兵是国民的义务，以后作工是国民的义务；从前练兵须经过相当期间的训练，须受过一种兵事教育，以后作工亦须经过相当期间的训练，须受过一种工艺教育。这便是新旧两时代的分歧点，亦是人类思想进步的表现。

最近德国举行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由各州教育会代表所组织。其结果议决两个狠重要的议案：（一）以职业教育为义务教育，（二）改订专门学校的制度。我今先述第一个议案的内容。德国宪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欲使普通教育能够普及，凡为国民者皆负有入国民学校及补习学校的义务。……此种补习学校的内容，即是教授工作的技能，以为将来工作谋生的预备。凡已经毕业于国民学校的，便可直入此种补习学校。但是此种教育制度是从前没有的，所以现在有许多地方尚未设立补习学校，即或设立，亦不过一部分青年自由入校，而未含有普遍的强制的性质。

此次教育会议以为此条宪法规定用意极善，应即实行。惟补习学校（Fortbildung Schule）的名称未免太泛（记者按：德文原意系进一步学习之意，记者因其性质与吾国补习学校内容相同，故直译为补习学校），不如改为职业学校能将此校的性质完全表出。故该会遂议决改为职业学校，不用 Fortbildung Schule 的名称。

此种职业学校，凡已受过国民学校教育的儿童皆应再入此校，以完了他应受教育的责任。职业学校的宗旨有四：（一）使学生用一种补习的深造的方法，以预备他们将来能在社会上国民工作生活里尽一种责任；（二）使学生具备国民常识，以便将来参与国家生活（如政治生活等）；（三）引起学生探求普通智识的兴趣，使他们对于精神工作亦能了解；（四）使学生身体健全。

此种职业学校，一年须授课三百二十点钟，每年四十礼拜，每礼拜授课八点钟。时间分配以地方情形及经费情形为标准，管理教育的可随时斟酌减少钟点。每日教授时间只能在早七钟至晚七钟之内，任择一二钟教授。如体操及超过百二十钟的功课，须在晚上七钟以后教授。

宪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将受教育的责任年龄推广至十八岁。因国民学校须八年毕业，故受职业教育的期限只有三年。十八岁从职业学校毕业，同时工厂学习亦已完毕，故十八岁以后便可自由选择职业。职业学校每日授课时间，无论在工作前或工作后教授均可，惟每日授课与工作时间的总数，不得超过平常工作时间。对于工作时间及工作价值须详细规定。有人主张规定工作时间不属于学校规程，应由工作部规定（德国内阁有工作部）。

此种“应入职业学校”的义务，自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四月一日起实行，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四月一日，各地职业学校一律办齐。以上系此次教育会议关于职业学校案议决的内容，狠可以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刺激。我们在欧洲看见他们国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几乎没有一人是无职业的，比起我们中国游民，实在十分羞愧！但是他们的教育当局还是如此努力，要将全国人民的工作能力增高，实行此种全国皆工的教育制度，我们不能不十分佩服！吾国现在亦有实行强迫教育之议，我以为德国这种新教育的制度，狠有参

考的价值。

前面所说的系关于职业学校的议案。如今再说第二个议案“改订专门学校的制度”。德国现有专门学校的种类如下：

手工专门　美术工艺专门　土木工程专门　机械专门　高等机械专门　纺织专门　商业专门　高等商业专门　农业专门　治家专门　女子工艺学校　社会的女子学校

专门学校毕业期限，至少一年或一千点钟的功课。

专门学校的宗旨有二：（一）造成专门人才应社会的需要，且完成个人的职业生活；（二）使普通教育更深入，更推广。

欲使专门学校的性质与德国教育制度不冲突，对于入学资格须分两种：（甲）凡毕业国民学校的皆可入，（乙）凡毕业中学或同等学校的皆可入。入专门学校或系已经在社会服务的人欲图深造，故再入专门学校学习；或系尚未服务社会，入专门以后再行预备服务社会的能力。这种办法，便是使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联合的办法，使专门学校与高等学校居于同一的地位。

从前德国的教育制度是：国民学校——中等学校——大学

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国民学校{中等学校
专门学校}大学

这种新制度，有许多人反对，以为如此办去，把大学研究学问的性质取消了，而且专门学校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了。但是教育会议诸人以此种反对无坚实的理由，遂将他议决了。

私立专门学校，因为这回会议的时间短促未能讨论，是他们主张将来对于私立专门学校须加以限制。

总之这回改订专门学校制度，是与推广职业教育出于同一动机，换一句说，就是多多培养适于社会的技术和工作的人才，在德国教育史上算是一个大革命，因为从前德国的教育不注重“社会化”，这回改革便有“社会化”的趋势了。

此外还议决设立一种经济学校，专造就为国家社会服务的人才。此种学校类似吾国的法政学校，但是他的宗旨有“兼为社会服务”一语，这便是我们只等做官的法政老爷所梦想不到的了。经济学校毕业期限至少二年。他的内容分：（一）经济，（二）社会，（三）国家。教授课程如下：国民与私人经济学、法律与管理学、社会政治学、簿记学、财政学、德国语言文化学等。此外尚可兼习速记、打字、外国文等。入经济学校者，须有毕业职业学校或国民学校同等的程度，而且他的性情又与此校性质相符方可，其年龄自二十岁至三十五岁，此种学校对于聪明而失学的工人狠有利益。

教育会议将各项议案议决后，他们以为德国若照新教育制度做去，将来必有无限的

幸福，但是这种制度为从前未有的，故此次带有试验性质，须对于教授方面十分注意，所请的教授不在他知道的多寡，而在他讲授得法与否，定其优劣。

从前德国主张全国皆兵，不数年而遂霸世界，各国仿效，惟恐不及。现在德国又主张全国皆工了，不知我们“游民式的中国”亦能采择仿效么？

（上海《时事新报》）

三十一　德意志的工人大学

记者昨日在《德意志全国皆工的新教育制度》通信中，已将德意志普通教育的新趋势详为介绍，兹篇所介绍的“工人大学”，亦系德意志新教育计划中的一种，不久将见诸实行。

从前德国 Friedrich Panlsan 君有一句话：“教育自身是不能运动的，是以普通文化运动为转移的。”此次工人大学之设立，全由现代潮流所产生，更足以证明 Friedrich Panlsan 的话不错。

现代的潮流是什么？第一是民主思想，第二是工人在社会上的新地位。所谓民主思想，就是全体国民皆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共同工作的权利。因为要享受共同工作的权利，便不能不预备共同工作的能力，所以教育是实行民主主义的第一件要事。但是现代的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详言之就是“怎样使资本的价值加大”或“个人在经济上应怎样自由竞争”的教育。现在工人既在社会上得了相当的新地位，所以现在的新教育便须从工人方面打算。换言之，从前的教育是建筑在资本的、个人的经济组织上面，现在的教育是建筑在劳工的、社会的经济组织上面。

从前久居人下的劳动家不能受相当的大学教育，现在因为时移境迁，遂有设立“工人大学”的计划，以应工人教育的需要。

但是这篇通信内所谓“工人”的解释，不专是指在工厂内作工的工人，并包括在公共机关及行政机关服务的人员。因为欧洲人在公共机关或行政机关服务的，都是终日工作与工厂内的劳动者一样，亦无尊卑贵贱之别。不似我们中国的官吏，有“领干薪”、“兼差”的种种花头，又不似我们中国官吏有“大老爷”的头衔，与我们作工的“小百姓”有贵贱的歧视，这便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习惯上一个重要的区别。工人大学是社会民主党所极力主张的，不久便要实行。记者今将工人大学的宗旨、经费、学生、内容、课程等等详述如后。

（一）工人大学的宗旨

工人大学一面教授工人以必要的专门职业教育，一面教授工人以狠完善的普通知识。故大学的责任，不仅是使工人有完全的专门职业知识，而且使工人知道他的职业与社会的关系，然后他对于他的工作始有快乐之可言，否则如机械一般，毫无兴趣。换言之，使工作与理想联成一贯，建一个工人的“新人生观”。所以工人大学中极须注重社会学、哲学、历史、美术、政治学、社会主义等等学术。将来由这种曾受大学教育的工人在一般工人中传播新思想，于全体文化必发生重大影响。

（二）工人大学的经费

工人大学经费的用途大约可分二种：（甲）教员薪俸及教育用品等等，（乙）无力入学的补助费。（甲）项的经费由下列三种款子筹集：（子）国家的贴款，（丑）各省的贴款，（寅）各地方的贴款。（乙）项的经费由各种工人、职员、吏员集会中自由出资办理。因为这种教育是与工人、职员、吏员有重要关系，所以希望他们自由投资。现在德国有一千五百万的工人、职员、吏员，每年每人出一马克（每礼拜不过二非里徐）为数亦已不少，以之支持（乙）项经费必有余裕。

（三）工人大学的学生

初办时以千人为度，内中分（子）无津贴者、（丑）有津贴者（即津贴无力入学者）两项。惟两项人数各应若干，须加以详密的考虑。无论男女均须满二十四岁始能入校，而且他的精神、学力、性质须与本校所悬的标准相符，两年毕业。入校资格须有证书证明曾作工若干年或曾毕业他项学校。

（四）工人大学的内容

内容现分四种：（甲）造成为国服务人才（如国家各种机关），（乙）造成工业组织的人才（如各工厂之类），（丙）造成经济的人才（如公司银行之类），（丁）造成政治的人才（偏重外交人才）。

（五）工人大学的课程

课程分两种：（子）普通的，无论何科学生皆须学习；（丑）专门的，由各科学生各就其专门学习。

（子）普通的课程：

一、关于法律学的 （甲）法律学入门（三钟，系以每礼拜计算，下仿此），（乙）国民法律（二钟），（丙）国家法（四钟），（丁）管理法（三钟），（戊）工人法律（二钟），（己）国家法及管理法之实习（作文二钟）（庚）工人法律之实习（作文二钟）。

二、关于经济学的 （甲）工厂经济学大要（二钟），（乙）近代经济生活入门（二钟），（丙）普通的或理论的国民经济（五钟），（丁）专门的或实验的国民经济（四钟），（戊）社会问题及社会政治入门（二钟），（己）国民经济学的练习（如作文之类二钟）。

三、关于社会的精神生活的 （甲）国会及政党（三钟），（乙）日报的成绩及缺点（一钟），（丙）社会政治的精神基础（二钟）。

四、关于历史及哲学的 （甲）名学（一钟），（乙）哲学问题（一钟），（丙）社会的进化（如经济史、国家史、哲学史之类三钟），（丁）心理入门（经济心理为最要，二钟）。

（丑）专门的课程：

一、为国家服务的职员者 （甲）公共机关财政学（一钟），（乙）新地方政治（一钟），（丙）德国穷民事业（一钟），（丁）保护幼童的根本问题（一钟），（戊）收恤问题（二钟），（己）统计的方法（八钟）。

二、为工业组织的人才者 （甲）工业法（一钟），（乙）社会保险法（二钟），（丙）工作法律的基本问题（一钟），（丁）社会实习（二钟），（戊）同业事务（一钟）。

三、为经济的人才者 （甲）商业兑换各法（五钟），（乙）财政计算各法（八钟），（丙）工厂的银行的货物的交通的保险的经济学（二钟）。

四、为政治的人才者 （甲）国际法（三钟），（乙）外国研究（二钟），（丙）国际私法（一钟），（丁）领事事务（二钟），（戊）外交政策入门（二钟），（己）《凡尔塞和约》（一钟），（庚）地理（以经济地理及人民学为主，一钟）。

以上所说系工人大学的课程，骤视之似与工人无涉，何以名为“工人大学”？诸君须知，德国原有各大学思想极旧，大学学生常有反对民主之表示。此种工人大学即欲养成对内对外之“社会主义的人才”，专为工人谋幸福，以巩固工人的势力。至于工人的技术和工作的教育，则已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为之充分预备，已无再设工人大学之必

要。故工人大学的要务，即在造就社会主义的人才，扩张工人的势力。

（上海《时事新报》）

三十二　德国大学的危机

从前有人说“战争是进化之母”，经过此次大战的教训以后，我们才知道“战争是进化之敌”。战胜国的政府因为打了胜仗的原故，更坚其军国主义的野心，在社会方面则又因受战胜的狂热，养成骄慢奢惰的习气。战败国的政府因打了败仗的原故，赔款割地，生活日益困难，百业停滞，民德堕落。照这样看来，战争岂不是进化之敌吗？

教育是发达学术、促进进化的源泉，但是亦因为战争的原故不能积极进行，致有停顿破产之象。近代德国学者辈出，对于世界文化大有贡献，然推其所以致此的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大学教育。今各大学因受战败经济困难的影响，致使“自由教授”与学生皆有改就他业之倾向，此实可为德国学术界一哭！更可为世界文化一哭！

德国大学教授向分二种：（一）由国家聘请，每年给以薪俸；（二）系已得博士头衔者，欲对于学术加以深造，自愿到大学作教授，不取国家薪俸，惟听讲的学生须出学费（德国大学收费章程系以钟点计算。譬如本学期听某教授所讲之生物学，每周四点钟，每点钟十二马克，共缴四十八马克，即为一学期之学费。若听他门功课则须另自出费）。此种自由教授在战前每年可得五百个马克到二千个马克的束脩。战前物价虽贱，此区区束脩当然亦不能糊口。故愿作自由教授者，第一须具备坚苦卓绝的精神，不以金钱为目的；第二须兼他项职业如医生及中学教授之类。惟大学校办事人不喜此种自由教授兼领校外他项职业以分其研究学问之心，于是此种教授多兼校内职务以维持生活，如校医、助教、学校陈列办事员、图书馆员等项职务。凡研究自然科学的，用途尚属不少，若研究精神科学的，则谋生之道更窄，故战前充当自由教授者多中产阶级之人。自战后中产阶级全体破产（现在德国所有器具衣服皆须估价征税），作自由教授者多因受生活压迫改就他项职业。于是大学中愿充自由教授者遂大减少，此实为德国大学前途的绝大危机。因为大学中国家所聘之教授虽多积学之士，然在学术上奋斗最力者，仍当推此种坚苦卓绝的自由教授。一则因他们的地位不隆，声誉未大，正欲借此造学机会以作一鸣惊人之举；二则他们既不屑从事他项生利事业而来就冷淡生涯的自由教授，足见有造学的诚意；三则他们学术若真有表现，便可递补国家所聘之大学教授。故其欲望既大，奋斗最力。德国学术界之有今日，自由教授之力最大。今一旦因生活压迫，皆视自由教授为畏途，则德国学术界活动之原动力逐渐减少，此于学术前途必发生极大影响，不问可

知。现在德国有识之士多引以为深尤，主张此种自由教授每年须由政府津贴八千马克，亦不宜多给，仍保存昔日坚苦卓绝、牺牲一切就此冷落生涯的精神。近来德国工人每月可得一千马克左右；每年八千马克实不及一个工人每年所收入之款，故八千马克实不为多。吾国大学制度尚无自由教授之设，我以为自由教授亦系一种奖励造学的方法。

以上所说系教授方面的危机，至于学生方面，亦有不能继续求学之势。从前大学学生大部分系富室或中产阶级的子弟，其次系各机关办事人之子弟。大战后中产阶级破产，办事人所入无多，故真正能够供给子弟入大学的经费者，为数实属寥寥。现在闻有大学生因生活困难终夜在车站露宿的，亦可见其穷迫情形。在战前大学学生每月每人用度如下：

房金及早餐　　　　二十马克

午晚两餐　　　　　八十马克

买书及游资　　　　二十马克

每月共一百二十马克

一九一九年五月便增至每人每月三百五十马克。同年十一月，大学校调查学生费用，每人约需五百余马克。其表如下：

类　别	每　月	每　年
房　　金	六十马克	七百二十马克
火　　炉	二十五马克	一百二十五马克（寒天五个月之用）
午晚两餐	三百马克	三千六百马克
洗　　衣	十五马克	一百八十马克
添制衣服	约九十四马克	一千一百三十马克
书　　籍	约十七马克	二百马克
零　　用	二十五马克	三百马克
灯　　费	十二马克	一百二十马克
共　　计	约需五百余马克	六千三百七十五马克

最近数月物价又较去年十一月增涨，故每月五百余马克已不足敷用，大约每人每月需六百余马克。在战前约合中币三百元，为数真不小了（现在只合中币二十余元），德国学生何能担此重负？故在摆叶儿省（Payern）之大学生要求免费者约百分之三十三，在母醒省（München）大学生四千三百六十三人中，有免全费者六百八十四人，免半费者六百七十七人。

学生减除负担之方法，只有要求免减学费，然其数甚微，实无大补，而在学校方面则所受之损失甚大，故此免收学费之事亦不能全体办到。现在德国大学生已有日就衰退

之象，此实受大战之赐。请问读者，战争是进化之母？还是进化之敌？

（上海《时事新报》）

三十三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六篇）[①]

一

中等学校为将来大学专门教育之基础预备，且值青年智体两育发达之最要时期，倘中等教育不良，则学问既无基础，身体又不健全，不但高深学术无从研究，而且养成孱弱身体，白送了一个人生。其关系于文化之进步，民族之前途，何等重大！然而吾国今日之中等教育，竟以不良闻矣！此岂非极可痛心之事乎？记者固非教育专家，不敢多所妄议，惟记者固亦身受吾国万恶中等教育摧残之一人也，自赴德以来，观彼邦之大学教育，虽亦深厚宏大，然自揣脑力尚未大减，或可兼程并进，亡羊补牢。若夫中等教育，则往者已不复可追。兴言及此，实痛于心！彼当代从事中等教育之衮衮诸公，其罪实浮于张作霖、曹锟远矣！

记者既受中等教育摧残，引为终身之憾，近阅国内报纸，知孟实禄博士调查吾国教育，亦以中等学校不良为言。故记者此次特托柏林东方舆论社总干事 Dr. Linde 君介绍，前往参观柏林 Lichterfelde 地方之中等学校（Realgymnasium，或译为高等学校，惟其学级程度与吾国中等学校相近，故记者译为中等学校，理由详后），Lichterfelde 在柏林之南郊。柏林车尘马足镇日喧嚣，殊不亚于巴黎，而此地则树影鸡声，幽闲雅静，又颇似巴黎郊外之有哥伦布（即华侨协社所在之地）、上海之有徐家汇、北京之有清华园，此实为繁华尘中不可多得之一片清净土也。该地距记者所居约半钟电车之遥，先期由 Dr. Linde 君通知该校校长约于午前十钟在该校相待，届时记者前往该校参观，由该校校长 Prof. Dr. Schmidt 君殷勤招待，详细指示一切。浓情厚意，良可感也！

德国学制向分为三种阶级：（一）国民学校，（二）中等学校，（三）大学校。国民学校为一般国民应受之义务教育，其期限为八年。在战前，一般富家子弟羞与平民子弟为伍，故宁肯多出学费，直入中等学校所附设之预备班肄业，而不入国民学校。中等学校预备班之期限为三年，毕业后即直入中等班，其期限为九年，计前后共十二年。中等学校毕业后，便可直入大学或其他高等专门学校（Hochschule）肄业（德国高等专门学

① 本《文集》选录了其中一、五、六三篇。

校其地位与大学校完全相等，颇似吾国之所谓专科大学也）。自革命以后，无论贫富子弟皆须一律先入国民学校肄业，不得径入中等学校。所有从前各中等学校内所附设之预备班，亦从兹一律裁废矣。

现在德国凡满六岁之儿童，皆须一律先入国民学校肄业，其修业期限仍为八年。惟雄于资财、有志深造者，则可于国民学校肄业四年后，改入中等学校（从前中等学校所附设之预备班，其期限虽为三年，然欲将各种功课习完，亦往往需时四年。Dr. Linde君曾谓记者曰，从前彼在中等学校之预备班即曾费去四年光阴也），至于中等学校之肄业期间则仍为九年。故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学生，大概皆在十九岁左右之年纪也。中等学校毕业后，即可直入大学各科肄业（或其他高等专门学校）。若以吾国学制为喻，则德国之国民学校（Volksschule）即吾国之国民学校（或称初等小学），德国之中等学校（Gymnasium，Realgymnasium，Oberrealschule），则包含吾国之高等小学、中学、大学预科三种阶级；德国之大学校（Universität，Hochschule），则等于吾国之大学本科。惟 Gymnasium 一字，有人译为高等学校，此实大误；盖德人中固有称 Gymnasium 为“较高的学校”（Hohereschule）者（其意若曰 Gymnasium 比之国民学校，其地位较为崇高），然吾人不能直称之为“高等学校”（Hochschule），因德国之工科大学等（即高等专门学校），乃直正名为“高等学校”也。

德国中等学校约分为四种：（甲）Gymnasium，（乙）Realgymnasium，（丙）Oberrealschule，（丁）Realschule。前三种之修业期限为九年，毕业后可以直入大学校或高等专门学校，后一种之修业期限为六年，毕业后不能直入大学校或高等专门学校，其性质颇似吾国之所谓中等职业预备学校矣。此次记者所参观之中等学校，即上述之（乙）种 Realgymnasium，换言之，毕业后可以直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者也。

甲种中学，注重古昔语言文字，如拉丁语、希腊语之类，以便将来研究哲学、文学、历史学等等，换言之，即偏于文科方面之预备。乙种中学，注重近代外国语言文字（如英、法文字等等）及数学、自然科学之类，以便将来研究工业及自然科学等等，换言之，即偏于实科方面之预备。丙种中学，其性质与前述之乙种中学相同，换言之，仍系偏于实科方面之预备。惟课程中完全除去拉丁文一门，且英文、法文、数学、自然科学四门钟点亦较乙种中学为多，此则其不同之点耳。以上所述三种中等学校，其性质虽各有不同，而地位则彼此相当。换言之，凡在上述三种中等学校肄业之学生，其在未入该校以前，则须一律先在国民学校肄业四年；其在既入该校以后，则须一律修业九年；其在既出该校以后，则可直入大学校或其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故此种学校，无论其性质其地位，皆无异于国民小学教育与大学专门教育之间搭一过渡桥梁，恰与吾国之中等学校相类。丁种中学，其性质与上述丙种中学相同，惟其地位较低，修业期间只有六

年，毕业后不能直入大学校或其他高等专门学校肄业。大约此种学校之学，皆希望于毕业后再进其他商业学校或工艺学校补习一二年，获得一纸证书，便可至银行、公司、工厂、矿场任事，藉以谋生，不复再存讲求高深学术之奢望。尤以战后生活困难，已不容许中等社会之子弟有从容读书之余地，故入此校者尤为众多。吾人若就此校性质而论，直可呼之为中等职业预备学校。然即以此种中等职业预备学校而论，其语言、数学程度，亦已远在吾国所谓大学预科者以上矣。

二[1]

三

四

五

柏林 Lichterfelde 中等学校（Realgymnasium），其成立历史不过一十二年，故所有建筑陈设皆取新式。计该校共占面积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六平方米达，其建筑陈设等费，据该校校长 Prof. Dr. Schmidt 向记者云，系一百五十万金马克，约合华币七十五万元。此不过一中等学校而已，柏林此种中学之数，何止数十。今仅一校开办经费已有如此之多，以视吾国二三国立大学之区区建筑经费当局犹吝而不与者，真有天渊之别矣。

该校内部建筑，计有：（一）讲堂二十一间，每间约容四五十人之谱；（二）礼堂；（三）体育室及其回廊；（四）物理学讲堂三间；（五）化学讲堂四间；（六）唱歌讲堂；（七）校长室及其案牍房、会客厅；（八）教员室及其办事房；（九）图书讲堂及其模型陈列室；（十）教育用品及自然科学陈列室；（十一）藏书室二间；（十二）手工室；（十三）校长住宅；（十四）校役住宅；（十五）火夫住宅；（十六）厕所；（十七）游戏室（如划船室之类）；（十八）体操场等等。德国官立学校学生皆不在校寄宿，每晨八钟以前，各处中小学生皆各背书囊齐集学校大门之外，如吾国昔日科举时代之候考者然。一俟开课时间已到，校门始启，学生乃鱼贯而入。其在下堂休息之时，或在室外院中游戏，或在室中回廊散步，惟因天气晴雨关系，每日校中皆悬有一牌，上书“今日院中”

① 此二、三、四等三篇，旨在介绍德国中学的学制、开设的课程及变化情况，本《文集》因篇幅所限，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355 页至 366 页。

或“今日室内”字样。故学生院中游戏或室内散步，皆须听校长指挥。德人无论何时何地皆以整齐严肃为唯一美德，即此一端（如上课始开放校门，不得先入；游戏须指定地点，不得随意）亦可想见。该校礼堂壁上悬有二牌，饰以花圈，上书该校此次大战所有阵亡之教员学生姓名及其生年死日。计教员中阵亡者共四人，学生中阵亡者共七十二人。然此数系指当时尚在校中肄业之学生而言，至于已经出校之学生，其阵亡之数约在百名以上，尚不在内。该校全校人数不过六百，而阵亡之数竟有如许之多，从此亦可想见，欧战之于德国，其损失之大当何如也！

该校既系新式学校，故设有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实验诸室。譬如化学一门，建有特别讲堂，讲堂之旁即为教员化学预备室，预备室与讲堂之间有一门可通，门之旁又辟小窗一，为递送化学用品之用。穿过教员化学预备室再向前进，则为学生化学实验室，每数人共坐一桌，水管药品皆极全备。据云该校此种教育用具在开办时共费去三万马克之谱（约合华币一万五千元），此后陆续增加者尚不在其内也。实验室之外，又有各种物理、化学、生物学标本陈列室，虫鱼鸟兽、草木金石之类，无不应有尽有，搜罗之富，俨然一小小博物馆也。该校学生实验概不纳费，现在德国金融恐慌，物价奇涨，化学等项用品动值千万马克，然德国政府虽当此财政困难之时亦决不稍稍吝惜，因陋就简，仍令学生照常实验，以促学术之进步。此与吾国专门奉承军阀之政府常使校舍为之空虚者，其贤不肖之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耶？陈列室之外又有幻灯室，将各种虫鱼鸟兽、草木金石、山川风景、种族习惯图形，皆用电光放大，使学生如亲见其物，亲接其人，即如吾国地理上之长城风景与夫人物中之长辫小足，该校学生亦早已寓之于目，志之于心。幻灯室之外，又有藏书室二，将各种参考图书分门编列，任学生自由取阅。德国学生所用课本皆系自备，惟学生中有因家贫不能购置课本者，则由学校酌量租借，故该图书室于参考书之外，又列有各科讲义课本一架，专为借与此项学生之用。又德国中学生之学程，其初级生只等于吾国之高等小学，而高级生则又等于吾国之大学预科，其间相差甚远，故图书室中有专为高级学生预备之书（如各种专门科学书籍之类）或专为初级学生预备之书（如儿童文学之类），分门别类，秩序井然。当记者参观图书室时，该校教员某君曾谓该校尚储有纪述中国政俗人情之专书一部，亦可以想其收藏之宏富矣。

藏书室之外，又有绘画室，陈列各种图画及各种雕刻，以备学生模写之用。当记者参观该室时，该班学生正各据一案埋头作画。细察各人作品，或绘山水人物，或绘虫鱼鸟兽，几无一相同者。中有童子一人，年仅十二岁，所绘郊外风景一幅居然可观，该校图画导师即举以夸示记者，该校校长则用手连抚该童之首，以表示奖励之意。

以上所述，皆系该校关于智育方面之设备，此后当再述关于体育德育方面之设备。

六

记者昨函所述柏林 Lichterfelde 中等学校（Realgymnasium）各种设备，皆系关于智育方面者，今请再述关于体育方面之设备。德国中等学校之注重体育由来已久，当一千九百年时，德皇威廉第二知欲雄飞世界，非先有刚毅健壮之民族不可，欲养成刚毅健壮之民族，又非特别注重青年体育不可，故特下谕旨奖励体育。次年教育部发布中学教令，于体操一项特别加意。于是全邦各中学校于正式体操课程时间之外，更奖励打球、划船、游泳、滑冰诸技。故德人自少至老，游戏兴味之浓，精力体魄之壮，实为吾辈东方病夫所未能梦见。记者常见此间中国青年同学与德人共运行李，而其负重之力，乃往往不及德国一位六七十岁之妇人，良可慨也！自大战以还，德国处于战败地位，一般德人益知重兴祖国更非特别注重体育不可，于是向者德国之奖励体育系出于政府方面者，今则多发自社会方面，尤以爱国如命之青年学生为最。游戏运动之会几无日不有，各家报馆除于每日报纸中特辟一栏专事纪载外，更于每周发行写真周刊一次，纪载运动新闻，印刷游戏像片。其提倡之勤，亦可以想见一班矣。

该校体操场共有二：一在院外，一在室中。当记者参观时，该校学生正在院外操场自由运动：或在杠架上翻舞，或在平地上赛跑，更有好事学生高踞墙头树上拍掌叫好，兴高采烈，不可名状；其一种喧嚣嘈杂之声，有如戏院。德国学校管理极严，无处不保住整齐严肃之象，独于游戏时间则听其自由憨跳，以活泼其精神，强壮其身体，此真可谓宽严得其道矣。记者由院外操场转入室内操场，其时正有教员在彼处教练体操，室中悬粗绳二，其形颇似吾国之秋千，惟于绳端各坠铁圈一枚，学生用两手各攀一圈，足离平地，前后飞舞，盖所以练腕力也。其他一室，尚有划船设备，专供学生在室内练习划船技术之用。

德国中小学生除校中运动外，每月尚须由教员率领向附近各处旅行一二次。先期由其父母备办粮食饮料装入背囊，由该生自行背负，于黎明即起，集队旅行，往往尽一日之力而归。归时沿途歌唱，声音悠然，山花野草，杂置囊上。此种旅行之有益于身心训练，不言可知。而况旅行时教员往往利用机会指点历史古迹，采集博物标本，其有益于德智两育，亦殊不少。

其次再言德育上之设备。德国者，“偶象”之国也，每人心中皆各自有其偶象，或慕俾斯麦、毛奇、兴登堡，或慕歌德、康德、摆提火粉（德国音乐家），以之为其终身模范人物。故各校中之墙头壁上，无不遍悬各先烈学者之肖像，以引起学生观感，使之潜移默化。现在德国右派势力以大学生为中心，未始非此种像片引诱之魔力也。近来左

党主张将各校皇帝军阀像片一律取消，以改造青年思想，从此可以想见其关系之大矣。

德国中等学校管理极严，在战前系欲藉此以养成良好纪律之军士及保守秩序之公民。战后征兵制度虽已废除，而此种训练方法则至今未改。学生之于校长，有如兵士之于长官，唯命是听，不敢妄驳。所谓学生自治参预校务之说，在德国中等学校内迄未闻见。记者曾以此询问该校校长云："贵校学生亦有参预校务之机会否?"该校长即连摇其首曰："否否。"惟学生虽无自治之权，然对于校中各事则常有襄理之责，譬如整理校具、扫除教室，皆由学生担任，不用杂役，即其例也。

此外尚有所谓家庭代表会议，系由各学生家庭共举之家庭代表所组织。譬如该校有学生六百人，即由此六百人之家庭共举代表十人，与该校教职员共组一会，以沟通家庭学校间之隔阂，使管理之责易于实行。德国中等学校之管理，较之各国中学为严，而一至大学则完全任其自由，又较各国大学为宽。此种制度，颇与吾国从前科举时代之私塾书院相似：在私塾时尚须大受体罚，而一到书院则完全自由。其组织虽各不同，其精神则极近似也。

此次记者参观该校为时甚短，关于智育、体育、德育三方面之设备，所知尚不完全，惟该校校长已函约记者再到该校参观教授情形，俟将来参观后，再将教授方法详为介绍，此次能报告于诸君者，请止于此。惟尚有一事尚须附记者，即校长住宅是也。德国各中小学校长，于学校之旁多筑有庄严堂皇之校长住宅一所，凡任该校校长者必居是宅。而德国各校校长若不发生意外事变，又动辄担任数十年之久，无撤换驱逐之虞。因此校长对于学校校事，有如自己家务，努力办理，决无五日京兆[①]之心。记者尝参观中德意志 Taunus 山中之某村国民学校，其校长之家眷即住于该校楼下，楼上则为学生讲堂，此外尚有良田十余亩为学校产业，其每年收入亦归校长。故该校长除薪水外尚有额外进款。彼任职已四十年，娶妻育子，俨然成一田舍翁矣，即此一例已可概见。记者此次所参观之中等学校，其校长住宅建筑费系四万六千金马克，约合华币二万三千元，试问中国之中等学校，曾有人为其校长用二万三千元筑住宅者否？此中国教育家之所以不安于位，终想作官也。

① 语出东汉班固《汉书·张敞传》："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京兆，即京兆尹，官职名，汉代管辖京兆地区的行政长官，职权相当于郡太守。后用五日京兆指任职时间短暂或即将去职，也指凡事不作长久打算。

三十四　苟廷根大学之特色

记者日昨通信，鼓吹新来留德学生前往德国京外各城留学，不必群居柏林，其理由有四：（一）德国各地大学皆各有专长，（二）柏林生活常较他城为贵，（三）柏林风景不如京外各城，（四）柏林风俗不如京外各城之良善。今再举一实例，以证吾说。

日前记者曾因事赴苟廷根（Göttingen）一次，苟廷根者，即德国所谓“大学城”之一也。德国共有普通大学二十三所（工科大学等尚不在内），其设立地点除几处通都大邑外，其余多在各小城中，如 Göttingen、Giessen、Greisswold、Jena、Marburg、Tubingen（以上各城人口不过一万左右）、Bonn、Freiberg、Heidelberg、Rostock、Wurzburg（以上各城人口不过五万左右）等城是也。

此种小城，既非工商荟萃之地，亦非政治中心之点，论其人口面积，尚不及中国一个小县，徒以有一大学之故，四方学者群集，因而驰名中外。即以苟廷根而论，人口不过一万左右，而大学生徒竟有四千余人之多，大约该地居民平均每家须留寓学生一人。故此种小城之工商各业皆赖大学为生，换言之，此地居民完全在大学势力范围之下。此其所以名为“大学城”也。然诸君万不可因德国各大学城人口稀少、面积狭小之故，遂起轻视之心，而与上海中国公学所在地之吴淞相提并论。盖德国各大学城，地方虽小，而设备极为完全，有博物院，有图书馆，有美术院，有大戏园，有议事堂，有大公园，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论其建筑设备规模，尚远在吾国北京南京上海以上（德国此种关于文化之设备，不但各大学城如此，即其他无大学之各小城亦复如此，此所以德国文化能灿然于一时也）。故吾辈侨居各大学城，无论天然风景、人为设备，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决无冷淡枯燥之处也。

苟廷根大学以数学著名，当代德国各大数学家多出于其间。此校执德国数学界之牛耳者已近百年，故习数学者以此地为最佳。举其特色，约有三种：

一、该校数学教授皆是德国超等名角。该校既以数学著闻于世，故德国数学大师多群集此校担任教授。譬如德国最著名之数学大师 Klein，从前亦在该校担任教授，现在年事已老不复任职，然仍卜居该城未尝他往，亦犹吾国剧界大王之谭鑫培，晚年仍卜居知音者多之北京，而不肯贸然侨寓外江派之上海也。除 Klein 外，在现任德国数学教授中坐第一把交椅者当推 Hilbert，德国各处大学之数学教授多出其门下。当记者前次赴苟廷根国际青年团年会之时，曾一见此老于该城附近之山中，年事约八旬左右，蹒跚道上，神采焕然。除 Hilbert 外，如 Runge 亦为德国数一数二之数学大师。此外尚有在数

学界有名或无名之英雄若干人，无不集中该处担任教授。故在此地习数学者，既得良师之指导，又有益友之切磋，为他校所罕有。此其特色一。

二、该校数学设备比之他校较为完备。记者曾参观该校一次，计校内共设有四大橱柜陈列各种数学模型。此种模型不但为其他大学校所鲜有，而且在教育用品店中亦不能购得。盖其中多系该校教授各出心裁，自行制造，外面商店不能仿制，即能仿制亦无人能讲解。故此种模型极为可珍，模型下面多书有各该教授之名。除模型设备外，尚有盈筐满架之数学书籍以供学生参考，种类众多，列有专室。往往一位教授私人所有之数学图书，竟占房间一二，其丰富可想而知。此其特色二。

三、该校既以数学见称，故凡在数学界擅有专长之人，无不罗致聘请，常开临时讲演大会。譬如丹麦人 Bohr，为研究原子论最精之人，该校特请其举行临时演讲。自数学大师 Hilbert、Runge 以下，无不前往听讲。闻讲演时，Bohr 曾有一次将公式偶然写错一个，不能往下讲解，正在惶惑之间，Hilbert 与 Runge 二位教授即起自座位，争相奔向讲台代为改正，以免耽搁讲演时间，其一种活泼之气可以想见。此种临时讲演会常常举行，其于学生之知识进步上必有重大影响，不问可知。此其特色三。

以上所举三种特色，为荀廷根大学所独有，故习数学者以往此校为最宜。至于其他各大学校，莫不有其专长。譬如 Marburg 大学之于哲学，Frankfurt A. M. 大学之于经济，皆有特色。吾辈留学德国，可自由选择京外各校，初不必群居柏林。盖京外各校不但于学术有益，即以空气而论，亦较柏林清爽，至少可以多活十岁。记者若非通信职务所羁，早已逃往各“大学城”去矣。

（上海《申报》）

三十五　德国成人教育

序

“成人教育”之义甚广，本文所述者仅限于“民众大学讲习班”（Volkshochschulkurse）及“民众图书馆”（Volksbibliotheken）两种。盖此两种在“成人教育”之中甚占重要位置故也。德国民众大学运动，系受英国丹麦两国影响，故本文特为英丹两国此种运动各立一章，以明其源。关于德国“民众大学讲习班”之组织，则引宏博尔提民众大学（Hamboldt Hochschule）、纳生民众大学（Lessing Hochschule）、柏林民众大学

(Volkshchschule Gross—Berlin）三种为例，并将其今年（一九一九年）[①] 讲演组织详细介绍，意在使读者对于此项“民众大学讲习班”之性质和方法得一具体概念。至于本文所用材料，则选自下列各书：

1.《民众大学与大学扩张运动》(Schultze，Volkschochschulen und Universitäts—Ausdenungs Bewegung. 1897.）

2.《各文明国的国民教育之纪录》（Schultze，Archiv für das Volksbildungswese-naller kulturvolker. 1907.）

3.《国民教育之中央报告》(Lampa，Zeutralblatt für Volksbildungswesen. 1908.）

4. 普鲁士王国传达学校消息处之年书（Jahrbuch der Koniglich Preussischen Aus-kunftstelle für Schulwesen. 1913.）

5.《中央教育研究所年鉴》(Tahrbuch des Zentralinstituts für Erzichung und Un-terricht. 1920—1922.）

6.《现代民众大学》(Sohnreg Die Volkshochschule des Tages. 1919—1920.）

7.《民众大学方法之基本问题》（Weitsch，Grund Fragen der Volkshochschul-methode. 1920.）

8.《民众大学协会》(Scheffer，Die Volkshochschul—gemeinschaft. 1921—1922.）

9.《民众大学之目的与方法》(Maun，Von Ziel und Wegen der Volkshochschule. 1923.）

10. 宏博尔提民众大学一九二九年讲演目录（Humboldt—Hochschule；Vorlesun-gen undLehrgange，Herbst. 1929.）

11. 纳生民众大学一九二九年讲演目录（Lessing—Hochschule；Vorlesungen Jan. —Marz. 1929.）

12. 柏林民众大学一九二九年讲演目录（Lehrplan für；Volkshochschule Gross—Berlin. 1929—1930.）

13.《民众图书馆馆员之组织》（Dietrich，Organisierung der Volksbibliothekare. 1922.）

14.《民众图书馆馆员》(Hofmann，Der Volksbibliothekare. 1927.）

15.《教育丛编》(Rein，Handbuch der Padagogik. 1909.）

16.《教育辞典》(Roloff，Lexikon der Padagegik. 1912—1917.）

17.《教育辞典》(Schwartz，Padagogisches Lexikon. 1929.）

---

① 1919年：应为1929年。

18.《德国文化事业统计》(Deutsche Kulturstatistik. 1928.)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王光祈草于柏林国立图书馆

导　言

近代西洋教育思潮，常有三种特点：1. 教育不是特殊阶级独有之物，换言之即是反对“士之子恒为士”之思想，反对“有产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2. 教育永无完结之日，必须随时继续深造方可。此又与吾国所谓“毕业”，所谓“学成归国”种种思想恰恰相反。3. 教师对于被教者当视为“社会一份子”而教之，不应专以培养个人德性学业为其唯一责任。

因欲实现上述三种特点之故，德国教育界人士乃于正式高等教育机关之外，另设各种“民众大学讲习班”(Volkshochschulkurse)，国立图书馆之外，另设各种“民众图书馆”(Volksbibliotheken)。一则可以使不能享受正式高等教育之人亦有从事高等学术研究之机关，二则可使业已脱离正式学校生活之人亦有继续深造之可能，三则能使各种职业地位相异之人同在一班听讲，彼此得有接近机会，以便易于了解社会共同生活之意义。

但此处有二事应须声明者：即（甲）本书所谓德国“成人教育”，非尽指一班少年失学、壮而“补习”之人。盖德国为实行义务教育之国，少年失学者极占少数，凡在“民众大学讲习班”听讲或在“民众图书馆”读书者，多系已受普通教育而自嫌知识不足之人，工作余暇藉此“添习”。（乙）本书所谓“民众大学讲习班”，亦请读者不要呆看，不要以为其中所讲皆系高深学术。诚然，担任讲演之人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其所讲题目亦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应有尽有，但各种班次中，亦有一部分系灌输常识、授与技能者（如语言班、速记班之类）。因此，该项组织实具有吾国从前北京各大学所组“学术演讲会”以及各地青年会所设“实习班”两种性质。

上编　民众大学讲习班

第一章　英国之“大学扩张运动”

德国“民众大学讲习班”之组织，实受英国“大学扩张运动”(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影响。因此我们在叙述德国该项组织之前，不能不对于英国此种运动

略加考察。

当一八七〇年英国既已决施义务教育之际，其时有所谓“妇女教育促进协会”(Council for Promot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者，特请剑桥大学讲师（其后为力学教授）James Stuart 讲演“教授方法”一题。但该氏于一八六〇年左右曾到各处巡游讲演，尝得一种经验，觉得仅仅讲演一次或者连讲数个彼此毫不相关之题目，实对于听者无多大贡献。因此彼乃向该协会建议，与其单独讲演一次，不如开设一个讲习班，连将一个题目讲演数次，当较有益云云。其后该协会对于此项建议加以采纳，由该氏讲演关于天文学之题目八次，果然获得意外效果。未几，该氏复在铁路工人会议场内讲演气象学一次，其结果亦复异常美满。于是该氏好友数人群起效之，因而社会上对于此项讲习班之兴趣日益增长，为促进此种“大学扩张运动”而组织之团体与日俱加。此项效果遂使该氏兴会愈为浓厚，特在剑桥大学之中努力鼓吹运动，同时并提出说帖，颇受当局赞许，而各处职工团体要求设立此项班次之请愿书更如雪片飞来。于是剑桥大学决将一八七一年十一月该氏所上条陈请求在校设立“民众大学讲习班”一事，采入该校课程表内。第一次讲习班系由剑桥大学讲师三人担任，在 Nottingham、Derby、Leicester 三处举行。计每星期讲演一次，共十二次。其内容包括经济学、力学、英国文学三项。其讲演计划，大部分系采自该氏所拟办法。当该氏从前巡游讲演之际，为使听众易于了解计，曾印有一种“讲词摘要”，称为 Syllabus 散与听众。同时该氏更提出数个与讲演内容有关之问题，要求听众归家以后为书面之回答。此项书面答案，即于第二次讲演之时由该氏将其改正或解释之后，仍然退还本人，称之为“星期练习”（Weekly Exercises)。但其后察出，此项家中练习若欲其完全收效，则除了“讲堂讲演”与“讲词摘要”两种之外，尚须给与听众有向讲演者当面交换意见之机会方可。因此之故，该氏乃特别指定一个钟点，专为对于某种难题彼此互相讨论之用，其性质略似正式大学中之研究室然。每至讲习班终了之时，更举行笔试，并发给成绩优良者以“证书”（Certificates)，其资格系曾听讲十二次者为准。

当此项讲习班创办之际，不免常有令人失望情形，因彼时毫无公家接济故也。到了一八七八年，牛津大学遂亦加入此项运动，但试办数年之后复行停止。至于其他各处小城对于举办讲习班一事，诚然不少热心人士，但关于经济一层却皆无法解决（大约每个讲习班讲演十二次，需费三十六个到五十四个英镑)。因此之故，当一八八五年牛津大学重行开办讲习班之时，遂将十二次讲演改为六次，以节省经费，其结果大见效果，在开办之第二年，即已成立六十七班，听众增至一万之多。于是剑桥大学现在亦复照样办理，如法泡制，但对于此种只有六次讲演之短期讲习班，不复举行班竣试验。此外，牛津大学并施行两种新制：一为“游行图书馆”（Wandering Libraries)，一为“校外生”

(Affiliation)。所谓“游行图书馆”者，即选择与讲演内容有关之重要书籍若干，由讲演者随身带去，以便听众自由参考。所谓“校外生”者，系为鼓励听众而设，即是凡在讲习班听讲演而又具于某项资格，可以称为“牛津大学校外生”。其后剑桥大学更进一步，所有此项“剑桥大学校外生”如欲改作正式大学生时，则只须肄业两年之后，即可投考毕业考试（按大学毕业考试，通例必须肄业三年之后始准投考），但必须具有下列三种资格方可：(1) 必须曾入八个讲习班，每班十二次讲演，而且讲演内容皆系彼此有关之问题；(2) 班竣考试曾经及格；(3) 具有肄业大学之普通教育程度。

牛津大学于上述两种新制之外，更加设“函授”（Private Tuition by Correspondence）及“暑期讲习会”（Summer Meetings）两种，乃系仿照美国“家中自修协会”（Socity to Studies at Home，系 Anna Ficknor 于一八七三年在波士顿所组织者）及“Chautauqua 集会”（Chautauqua Meetings，其组织详见下文）两种办法。所谓“函授”者，系用通信方法教授，吾国上海商务、中华两家书店早已仿行此种办法，久为世人所习知，兹不再赘。至于“暑期讲习会”则在乘暑假时间，利用大学内各种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之类）以助讲解参考之用，来听之人以小学教员，尤其是女教员为最多，外国人往听者亦复不少。此项“暑期讲习会”吾国南京等地亦尝仿照实行。

关于“大学扩张运动”之本身组织则分两种，或者由一位有名人物自行组织号召，或者由各地分会出头组织，而教师及书籍两项则由附近大学供给。凡举行讲演之地，称为“中心”(Centre)。每一城镇皆有作为“中心”之资格，假如该城能任一切因举行讲演而发生之费用。至于小村小镇，则可互相联结起来成为一个“中心”。凡任教师者，除专门学识外，尚须具有讲演天才方可。因此凡欲充当此项教师者，必须先行试讲数次，由当事者加以精确评判，然后聘请。教师薪俸甚高，大约讲演十二次（每次一点钟）可得薪俸三十五镑至六十镑之多。每年工作期间虽然不多（通常讲演期间系由九月到十二月及正月到三月两次），但有许多著名学者竟自愿将其稳好位置辞去而专就此项职业。因为选择教师费力太大之故，于是往往等待教师任职若干年月之后，而另以班中成绩优良之学生起而代之，其在小村之中则派大学生（Student）或私家教授（Lay Lecturers，即教授之不在大学任职者）前往担任讲演。学生考试系在该班终了后一二十日之内举行，并由特定考试委员监察。大约每次笔试需时二三点钟之久，笔试卷子须直接寄交大学。参与每次考试之人，约占全班人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狠少至百分之二十。在赴考学生中，其及格者约占全数十分之九。据战前统计，英国因此项“大学扩张运动”所造成之人材为数约有六万之多（战前牛津大学每年约有此项听讲生一千至一千二百，剑桥大学每年约有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但此项听讲学生中工人终占少数。

英国此种“大学扩张运动”其势力影响，一直扩到美国、南非、印度、澳洲各地，

即吾国教育界中，亦尝仿照而行，惟恐或后矣。

美国在一八七四年即已有一种类似之运动，而且以该运动发生之地 Chautauqua 为其名称。该运动发生之初系带宗教性质，但其后讲习范围已不限于宗教事项，而兼及其他各科，成为一种方面极多、范围甚大之教育团体。每年夏季之时，纽约西南方面 Chautauqua 湖畔尝有男女三千以至一万之多前往该处，参与名人演说及音乐演奏等事。其在冬季，则彼等复相约聚集某城继续研究讲习。此外 Chautauqua 集会更特别注意"家中自修"，或以书籍直寄学生，或用函授方法。其结果向该会领书自修之人遍于美国，并超越国境直达墨西哥、波斯各地，甚至于监狱囚犯之中亦有向其领书自习者。

一八八七年，英国"大学扩张运动"传入美国，于是美国费城（Philadelphia）遂于一八九〇年开办四十个讲习班，计有听众五万人。纽约方面更于一八九五年冬季设立不收学费之"自由讲演"，听众数目直至三十九万三千二百八十五人之多。此外在煤油大王 Rockefeller 一八九二年所建设之芝加哥大学中更特设民众教育一系，规模甚为宏大。在开办之第一月即有听众一万五千人。由此可见美国此种"大学扩张运动"其成绩实远在英国之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

其在欧洲大陆方面，则感受此项"大学扩张运动"影响最早者实首推比国。其发起此事之人，则为 Geht 大学教授 Fredericq 及 Vercouilli 两人，于一八九二年秋季开始讲演，地点系借用大学讲堂，听者并不纳费；其所讲题目，则为荷兰、德国、英国文学。

未几，比京自由大学（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复追随其后，一八九三年春季，因大学教授 Leon Leclere 之提倡，遂有几位少年大学教授及大学生从事"Bruxelles 大学扩张运动协会"（Extension Universitaire de Bruxelles）之组织。其中分"总会"及"分会"两种，并办有极完善之"游行图书馆"。此外凡担任讲演者，必须身任"大学正教授"之人，或大学讲师而具有 Decteur agrege 或 Decteur special 头衔者方可。至于讲演规模，悉照英国办法，但听讲者不必做题缴卷。

Lieges 大学旋亦跟随其后，选举十二位大学教授担任此项讲演之事。所设班次以医药卫生及社会问题为多，此外并特为小学教师与妇女设立若干班次。

继比利时而起者则为奥国。该国对于设立此项讲习班最为出力者，当推维也纳大学讲师 L. M. Hartmann、教授 Reich 及 Jeger 诸人。因此，不到数年之间，各地相继设置（维也纳于一八五九年[①]，Inunsbruck 于一八九七年，Graz 及 Brunn 于一八九八年，Prag 于一九〇二年）此种讲习班，在战前每年由政府津贴一千八百克仑（Kr）。此外所有一切设备皆仿英国办法，但讲习班之"班竣试验文凭"却未具有官式效力。

---

① 1859 年：似应为 1895 年。

因奥国大学扩张运动之效果，于是德国方面亦起而效之。一八九六年，Jena 大学首先设立此项班次。未几，München 及 Leipzig 两大学亦复加入此项运动。到了一八九八年，柏林大学遂亦决定追随其后。但德国大学此项组织稍与奥国不同：第一，德国此项组织乃系大学教授之私人结合，与大学机关无涉；第二，德国此项讲习班并不举行班竣试验。

德国大学之设讲习班，为时虽较比奥两国为晚，但大学以外之私立“民众大学讲习班”却早已有之，且其势力亦远在正式大学所设讲习班之上。例如一八七八年柏林方面创设之 Humboldt Akademie（现名为 Humboldt Hochschule）是也。关于该项组织，将于下面第三章内详述，兹不再赘。

其在南欧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诸国，则除先后加入此种“大学扩张运动”外，并另设一种“通俗大学”（Universites Populaires）。其目的亦在提高民众教育，惟其组织形式略与上述“大学讲习班”相异而已。

至于北欧各国中，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亦皆先后卷入英国“大学扩张运动”潮流。但其中丹麦一国，却在英国发生此种“大学扩张运动”之前二十六年（一八四四年）即已设一种“民众大学”（Volkshochschule），在西洋教育史中甚占重要位置。现在德国北方乡村所设各种“民众大学讲习班”（Volkshochschulkurse），亦复多师其意，兹特另立一篇述之。

第二章　丹麦之民众大学运动[①]

第三章　德国之民众大学讲习班

德国“民众大学讲习班”（Volkshochschulkurse）共分两种：（甲）其设在“大学城”中者，则有类于英国之“大学扩张运动”。其所讲题目亦多涉及高深学术范围。所不同者，德国此项组织多系私法人性质，非如英国之直由正式大学机关出头办理耳。（乙）其设在乡间者，则有类于丹麦之“民众大学”，其所讲题目超出普通常识范围者极属有限。其规模之宏大，既远不如上述（甲）种“民众大学讲习班”，因此，本篇遂将其略而不论。

德国（甲）种“民众大学讲习班”多系每年分为三班：“秋季班”由十月到十二月；“冬季班”由正月到三月；“春季班”由四月到六月。夏季（七月到九月）则为暑假期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该篇，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388 页至 393 页。

间，不设讲演。来学人数以“秋季班”为最多，“冬季班”次之，“春季班”又次之。其原因一则由于秋冬两季天气甚寒，围炉讲学，实为人生乐事，到了春季，则天气和暖，大都不愿再处室中，误了春光；二则由于春夏两季工作实较秋冬两季为忙之故。柏林最大之“民众大学讲习班”名为宏博尔提民众大学（Humboldt－Hochschule）者，平均起来约有三万左右。每季约设一二百班次，每班约有五次至十次讲演（每礼拜举行一次，每次两点钟，多在晚间）。兹为易于具体了解起见，特举柏林三个最大之“民众大学讲习班”为例，分别叙述如下：

（壹）宏博尔提民众大学　该校系于一八七八年成立，现在已有五十二年历史，为柏林最早最大之“民众大学讲习班”。共设九系：（1）哲学系，（2）应用心理学、体育以及养生学系，（3）文学美术系，（4）文化系，（5）自然系，（6）健康学系，（7）数理工业系，（8）法律经济系，（9）语言系。此外尚有特别讲演等等，合计起来，共有二百八十余班。每班取费由五马克到十马克左右（每班讲演一个题目，约有五次至十次，每次两小时。此外关于旅行等等特别费用须另取），讲演地点十余处，分布柏林各区。并办有《宏博尔提杂志》（Humboldt－Blatter）一种，传达该校消息。每季开始讲演之时，先行印出“讲演目录”一册分送各处。该目录之中，除将讲演题目、地点、时间、学费、讲者姓名详记外，并于每种题目之下，将讲演内容择要录出[①]。

（贰）纳生民众大学　其规模不及上述宏博尔提民众大学之大，只有一百余个班次。但教师之中著名人物甚多。编者于数年以前尚未肄业柏林大学之时，亦尝一度往听，题目为“比较音乐学”。该班听讲人数虽不甚多（只有十余人），但听时均甚专心。讲六次（每次二小时）缴费六马克，换言之，每听一次约合中国大洋六角（如只听一次，则须缴费两马克，约合大洋一元二角），可谓昂贵已极。犹忆十余年前，梁任公先生在某处讲演，谓戊戌之时彼等在北京东华门附近办一图书馆，悬挂一张大地图，任人阅览；馆员每日须到东华门畔请人去看，并声言该馆备有茶点相待云云。现在国内请人看书，虽不必再备茶点，但出大洋六角甚至于一元二角去听讲一次，恐怕一时还办不到。

该校计设政治、自然科学等等二十余门，题目约有一百余种，通常每种讲演六次，共取费六马克。惟语言班则每一级每学期取费十马克。如有人同时购买四张听讲券（指班券而言），则奉送一张听讲券不取分文。讲演地点计有十余处，大都借用各处中学校房舍[②]。

---

① 以下列出宏博尔提民众大学1929年秋季班班次及讲演题目并部分讲演者姓名，因本《文集》篇幅所限，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395页至419页。

② 以下列出纳生民众大学1929年冬季班班次及讲演题目并部分讲演者姓名，因本《文集》篇幅所限，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420页至428页。

（三）柏林民众大学 上述（壹）（贰）两校，皆是团体所组织，至于柏林民众大学，则为柏林市会、柏林大学、工人团体各派代表所组织，故其取费亦较廉（每班讲演六次，只缴费二马克，已嫁妇人与短期工人只缴一马克，失业工人则完全不缴）。所有教师及学生均须各自负责不为党派或宗教之宣传。其“讲演目录”非如上述两校之以“门类”分别，而以“地域”分别，譬如柏林中区、南区等等。届期即将该区举行之各种演讲题目遍贴该区各街，以便该区居民就近往听①。

（上海《教育与民众》）

三十六　德国对于失学国民之救济

德国基础学制，向分三级：（一）国民学校。凡德国人民年满六岁者，均须一律入国民学校肄业八年。惟有志继续肄业中学者，则只须在国民学校肄业三四年即可。此为欧战以后情形。至于战前，则富家子弟羞入国民学校与贫民儿童为伍，自始即入中学肄业。而中学之内又特为彼等设置“预备班”；在该班肄业三四年之后，即可成为正式中学学生。战后，社会民主党人执政，乃将此项不平等制度废除。（二）中学校。德国中学毕业年限，在九年左右。其毕业程度，据余友常道直君言，约与美国大学毕业程度相等。常君专习教育，曾留学欧美数年，此言当有所据。（三）大学校。有了中学毕业文凭，便可直接入大学肄业，无所谓入学考试。至于大学毕业年限，无一定。如欲投考博士，则至少必须肄业三年以后方可（指文科而言）。但在德国大学生中，投考“国家考试”（亦须肄业大学数年之后）者，似较投考博士者为多。盖前者系实缺，后者系虚衔故也。“国家考试”类于吾国所谓文官考试：凡欲任官吏、当教习、作技师、充医生者，皆非经过此一度考试不可。其考试方法，系由政府方面特派专家组织考试委员会，临场会考。所考科目，非常之多，但以熟习了解为限，不必有所发明。外国学生，在原则上，不许投考此项考试。如欲投考，必须先行具结声明“永远不在德国作事”方可。吾友汤君腾汉在柏林大学研究化学，投考“国家考试”之时，即常经过此项手续者也。（其后汤君于“国家考试”及第之后，续肄业一年，提出论文，考得博士。）至于投考博士，则只由本校教授加以考试。其办法：先由报考者提出论文一种，以对于主科有新发明者为限，由两位主任教授鉴定。（此项教授，由学生自由选定；但其中一位，必须为

① 以下列出柏林民众大学1929年秋季班班次及讲演题目并部分讲演者姓名，因本《文集》篇幅所限，未予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428页至433页。

该科“正教授”方可。）按此项论文，乃系该生在该主任教授指挥之下，费了一二年工夫，修改又修改所作成者，当然提出之后，大多数系一帆风顺，颇少落等。审查及格之后，再行定期口试。由上述两位主任教授考试主科，其他两位“正教授”，则考试两种副科。此项考试如不及格，博士头衔，当然不能到手。如果口试及格，获得博士头衔，在事实上，亦不过仅仅证明该生“已能独立从事科学工作”而已，距所谓“学者”地位，尚有万里之遥也。

德国大学中学办理之宽严，殆有如南北极。中学校，平常管理既极严格，考试一事尤为酷辣。每年毕业考试之时，常有若干落第或畏考之人自杀。盖中学毕业一关，若不打过，不但不能进大学，即社会上各种地位较高之职业（如银行职员之类），亦无从问津。因为欲谋此项职业，亦以得有中学毕业证书为其条件故也。但是假如中学毕业一关打过，则全国大学皆可随意入学。管理及研究，均极自由。假如家里有钱，尽可肄业一二十年，实无人过问。上课与否，亦听学生尊便，（惟研究室略有限制，每次均须点名，每学期均须有研究报告。）故德国大学生生活，向以“醇酒妇人唱歌击剑”著名：自称为“自由少年”。但是韶华易过，转眼即须入世谋生。而德国社会方面，不但要求头衔，而且要求本领。于是此项“自由少年”生活，从此一日一日的“不自由”起来，乃不得不努力奋斗，而德国各项特出人材，亦多在脱离大学之后所造成，职是故也。

入大学肄业，既要中学毕业文凭，谋高等职业，亦要中等毕业文凭。但有许多青年，童年时虽无力入中学，但颇能自修，具有相当学力；或者因为中学毕业之时，仅有一二科不及格，致遭落第之厄。国家对于此项青年，势将永远屏诸大学肄业或高等职业之外耶？抑尚有其他救济之途耶？

吾人每在德国街头广告柱上，常见许多私立补习学校招生广告，如“补习一年，即可投考中学毕业考试”之类，触目皆是。盖有志向学而又碍于谋生之人，既不能按时到中学随班听讲，则只好取途于自修。在自修各科之中，如历史、地理、数学之类，尚能在家自行补习，德国书店关于此类自修书籍，亦复多而且善，但如其他实习科学，如物理、化学之类，则非在家自行补习所能为力者。下述各种私立补习学校，即应此项需要而起。倘贫而好学或中学落第之青年，补习若干时日之后，自信已有中学毕业程度，即可呈请国家特设之“中学毕业考试委员会”，准其投考。如能考中，则由此项委员会给与中学毕业证书，其效力与正式中学毕业者相等。不过在事实上，德国大学生中，由此种委员会考试出身者，终占极少数。此无他，德国中学教育本极发达，此种委员会权宜办法，乃属例外故也。

又德国中学，向分文科实科两种。前者偏重古代希腊文、拉丁文，以为将来入文科大学之预备。后者偏重近代英文、法文及理化等科，以为将来入理科大学之预备。但小

孩子入中学之时，年方十岁左右，只凭父母私意决定；迨到中学毕业之际，难免不因个人兴趣，改变方针。譬如实科中学毕业者，往往自愿投入大学文科肄业。而投考文科中哲学、音乐等等博士，又须有曾习拉丁文之证书，始准应考，于是，各大学之内乃专为此项学生附设“拉丁文班”，如习者自信程度已够，亦可呈请国家特设之委员会，准其考试。如及格，则给予拉丁文毕业证书。但大学生中之为此事而焦头烂额者，盖不知凡几矣。（因在中学时，拉丁文系九年之课程；而在大学中，则须一年学完。）

德国大学，最注重中学毕业文凭。其重要，远在大学毕业文凭之上。故吾国学生来此留学，只持本国大学毕业文凭，而无本国中学毕业文凭者，往往为其所拒。德国对于外国学生之“本国中学毕业文凭”，原则上系承认其效力，但亦分等级。譬如波兰、日本等国之中学毕业文凭，则往往不承认其“具有德国中学毕业”之相等程度。盖波兰中学内容，以其为德国邻居之故，德人知之甚详；而日本中学毕业文凭之上，则又因往往附有英文翻译之故，德人亦可借以察出日本中学程度故也。至于吾国中学毕业文凭之上，只有汉文，向例由吾国驻德使馆翻译，并证明此项文凭实与德国中学毕业程度相当。故中国学生之入德国大学者，只须考试德文一门，尚不感着十分困难。

波兰、日本等国留德学生之被拒者，往往只能在德国大学作一种“准大学生”。盖德国大学生分三种：（1）正式大学生；（2）准大学生；（3）旁听生。所谓准大学生者，其所享权利，所尽义务，与“正式大学生”相同，惟不得投考博士。如欲投考，必须经过特为外国学生而设之“中学毕业考试委员会”考试方可。而且在“准大学生”时代所肄业之学期，在原则上不能算入。

德国中学教育，如彼发达，而国家犹为本国失学青年特设“中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谋救济。至于吾国中学教育事业，既如此之衰微，更安可不为失学青年一谋出路？鄙意：凡投考大学者，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盖文凭虽不足以代表“本领”，然究属一种“成绩纪录”，可以作证。不过国家方面，应为一般具有相当学力而非正式中学之青年，设一取得“中学毕业文凭”之道。至于大学入学考试及格一事，似不宜当作“与中学毕业有同等学力”之证据，以防学校滥收学生之弊。

二十年三月二日自柏林寄

（上海《生活周刊》）

庚　留学问题

三十七　留德学界之近况

中国留德学生在战前只有数十人，欧战时大半回国，其仍留德国者只十余人。战后来德人数忽然增至一百余人，以民国九年来者为最多，上海同济学生约占全数十之六七，现在来德者仍络绎不绝。记者常推究其发达原因，大约有三：

第一、马克汇价低落，留德生活便宜。战前中币一元约购马克两个，战后德国金融紊乱，马克大跌，中币一元就现刻（十月）市价而论，可购五十马克左右，与战前相较约差二十五倍之多。德国战后物价虽亦异常腾贵，然其腾贵之程度却远不如币价之跌落。德国物价分两种：一种关于人生日用必需之物，较战前涨价五六倍，如粮食房屋之类；一种关于奢侈品非人生日用必需者，较战前涨价数十倍。吾辈留学青年自应节俭，除生活必需品外，其他奢侈品总以少购为佳。于是吾辈留德者，银价既较战前涨二十五倍，而生活仅较战前涨五六倍，两相比较尚差十余倍，此即今日中国学生留德之绝好机会也。

战前德国大学学生每人每月约需一百二十马克，合中币六十余元。吾辈远道来此求学，人地生疏，每月所需自较德国本地学生为多，故战前中国留德学生每人每月需中币一百元。战后物价腾贵，现在德国本地学生每人每月约需六百马克，中国学生每月若有一千马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其实，俭省者有六七百马克亦足），以现在市价而论，只合中币二十元（若俭省者，只合中币十五元）。其生活之优美安适，若移在北京、上海，至少非八十元一月不能办也。

德国大学极优待学生。若在校内进膳，每餐只收二马克半，较之外间饭铺便宜一半。坐电车、看戏剧皆可减价。故真正俭省者，每月有五百马克亦足敷用。读者勿疑吾言，以为德国本地学生每月尚需六百马克，岂有中国学生用度反较减少之理？殊不知欧洲人素来享受物质文明之幸福，虽一工人之家，其华丽优美，吾国达官贵人之公馆有时尚叹不及。故欧洲学生之起码生活亦较吾国学生生活为优；若能刻苦自励，每月五百马克尽足用矣。柏林方面留德学生，每人每月有用数千马克者，此种公子派头，非所语于

俭学。彼辈出入必坐汽车，早晨十二钟始起，饭后又几圈麻雀牌，夜间则逛堂子，完全是上海式生活。无怪乎彼辈身处欧洲，而其思想生活永远不受欧化。此西洋留学生之在国内所以大失信用也。

留欧官费，在德者每月二千四百马克，在法者每月八百法郎。若研究工业且真正用功者，此款本不为多，无奈许多官费生目的不在留学，直以官费为“干薪”。故往往有留欧十余年之官费生，叩其所学一无所有，而麻雀牌则随彼辈之踪迹而输入欧洲矣！

记者曾将留欧学生分为三种阶级：官费生为贵族阶级，自费生为中产阶级，勤工学生为劳动阶级。现在巴黎方面勤工俭学生与官费生感情不佳，恐将来留学界中不免发生阶级战争也。

德国方面无勤工学生，故只有贵族、中产两阶级。记者以为当此汇价大跌之时，正是中国青年求学之良好机会。若到外国来作资本家，有何益处？且易招外人嫉视。盖吾辈在欧不劳而食，对于欧洲工人早已心抱不安，更何必任意挥霍以引起人之嫉诟乎？

以上系述留学发达之第一原因由于马克汇价低落之故，吾今再述留学发达之第二原因。

自青岛为日人攻取后，德人所经营之青岛大学遂因之解散，其中一部分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学校。未几，同济学校解散，由中国政府接办。惟中国教育经费困难，接办后一切状况不能如前，于是同济学生多抱不安，正值马克价落，留德费用实较留沪为俭，故纷纷离沪赴德。且德国为学术先进之国，学校林立，亦易寻相当学校。计德国现有普通大学二十三所，工业大学十一所，林科大学四所，山岳工程大学三所，农业大学四所，兽医大学四所，商业大学八所，美术大学十六所，音乐大学十一所，中学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国民小学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三所，高等女学七百五十九所，私立学校一千五百五十八所。故无论研究何种学术，均可如愿而偿。入大学亦极容易，只须有中国学校文凭便可。惟德语程度须极纯熟，否则虽入学校亦无益处。盖德国大学教授之责任，系以一个学者资格研究学问，而不注重讲授方面。故其讲授务求其深，务求其快，至于学生了解与否，在所不问。记者有同济友人数人，在同济中德语成绩甚好，然入大学后，听讲上亦颇感困难。此后若有来德者，于语言一层须特别注意！

留法学生中途变更计划改赴德国，为留德学界发达之第三原因。赴法学生分俭学、勤工二种。现在法国俭学每月需二百五十法郎，合马克千余，故留德实较留法尤俭。至于勤工学生，亦有因不耐工作而改为俭学者，既改俭学之后，亦以德国生活便宜纷纷赴德。惟德国生活虽较法国为俭，然补习语言诸事则不若法国便利。因法国有华法教育会与法国各校特别交涉，一切均极方便，而留德学生则无此种组织也。

（上海《申报》）

三十八　留学界的两大潮流

中国留学界的派别，在十年以前可分为东洋西洋两种：大概留学东洋的多习政治经济，留学西洋的多学工艺实业。故就两派求学的性质而论，又可分为政治派与非政治派两种。东洋留学生人数较多，回国后互相吸引，在中国政治上造成一种东洋势力。又值其时国内人士多主张政治改革，他们所习的既是政治经济，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个个攀龙附凤，吐气扬眉，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横一世，惟我独尊之概。

在这个时候，西洋留学生（包括欧美而言）人数既少，且所学之工业实业又不合时宜，未为国人所重，而自己之西洋架子又放不下来与平民为伍，只好弃其所学，依附东洋派为政治的活动，把平日声光化电的知识，都换成“等因奉此”的花头。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故东洋西洋两派，所学虽有不同，而其结果仍是殊途同归，都埋着头来吃那一碗政治饭。

东洋派十余年来在中国所提倡的政治改革所造下的政治罪恶，我们暂且不论，我们现在所敢断言的，便是东洋派那一套旧把戏现在已经哄不着人了。所以我们认定东洋派是过去的人物，东洋派在中国的势力亦是过去的潮流，没有注意的价值。

近十年来美国留学界的势力大涨，考其原因，第一是北京清华学校每年都有一大批学生赴美；第二是美国教徒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专以派赴美国留学为饵；第三是国内人士都主张振兴实业，留美人才颇合社会需要；第四是中国政治方针渐由亲日而趋为亲美，留美学生颇为政府所重视。有此诸因，所以留美学生的势力渐渐布满长江流域，以至于北京、广州。他们在实业界的，狠能得资本家的欢心；在教育界的，亦狠能得社会的同情。平心静气而论，这种有用人才服务社会，较之东洋派专吃政治饭的总要高出一筹。但是在留美学生中，颇有大部分沾染美国拜金主义的习气，都以未来的中国资本家自命。他们狠想把中国造成美国式的共和，以便他们来做实业界的大王。现在中国本无资本阶级，但是留美学生却在那里努力制造。东洋派已经在中国造成政治罪恶，留美派又将在中国造成资本罪恶。东洋派之势力已渐渐到末日，而留美派之势力正如日方升。这是中国留学界的一大变迁，亦是中国留学界的一大潮流。

在这种留美学界势炎熏天的时候，法国方面忽然来了一千多个勤工俭学生。这些勤工俭学生的思想如何，学识如何，我现在暂且不论，若专就他们的精神及形式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之中心人物，与留美学生恰成了一个对抗阶级。我现在随便举一个例：譬如留美学生每次赴美的，都是坐头等舱或二等舱；每当离沪时，上海各团体皆

争相欢送，每到一个码头，便有专电报告“安抵横滨、旧金山……”平安消息；到了美国，每年又有一定的官费，真是享不尽的物质幸福。至于留法勤工学生呢，坐的是无等舱，在上海开船的时候，除了几个亲友，有谁与他们饯行拍照？每到一个码头，有谁与他们拍专电报告平安消息？到了法国，工厂生涯汗如雨下。谁不是妈生的，为什么留美学生那样阔绰，留法勤工学生这样的困苦（留美学生之不得不坐头等舱，自然亦有特别原因，但是以留美学生之阔绰，即或坐三等舱可以登岸，我恐他们亦不是愿坐的）？由这两种境遇看来，自然是留美学生慢慢的遂变成资本阶级，留法勤工学生慢慢的遂变成劳动阶级。“境遇可以影响思想”，这句话是我们素来承认的，而况留美学生所处之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勤工学生所处之法国是劳动势力布满的世界，他们安能逃出这个“同化作用”？

不但法国勤工学生如此，近来留德学界情形亦大堪注意。在战前到德国留学的，习军事的狠多，其时留德学生思想，当然脱不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色彩。自从革命后，昔日德国之军人世界一变而为工人世界，现在世界上工人最占势力的国家，除了俄国，便要算德国了。适值战后马克价跌，国人留学海外的，当以德国为最便宜，因而民国九年留德学生骤增加一百余人，而来者仍络绎不绝。将来德国留学界在国内思想界上，当然要占一部分势力。这些留德学生在这种工人势力最盛的空气中，自然是要受许多影响，故德法两国学生实有自然联络的趋势。德法两国的学术思想，有许多根本不同的地方，独对于这个劳动主义是彼此相同的。将来两国学生协力合作的基础，便筑在这个上头。至于英国呢，现在国内注意政治运动的人物多向伦敦出发。伦敦本为世界政治及金融的中心，与远东方面更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留学英伦的先生可以解决几个中国政治上的旧问题亦未可知，但未必肯加入社会革命队伍。照这样看来，中国留学界的潮流，可列表如下：

从前 { 东洋派——政治派 / 西洋派——非政治派 } 其结果两派携手造成中国政治革命

现在 { 美国派——资本主义 / 法国派——劳动主义 } 其结果两派相争造成中国社会革命

我所说的某派某派，当然是就大体而言。从前东洋派亦有研究工业实业的，现在留美学生中亦间有主张劳动主义的，留德留法的，亦有许多是抱贵族主义的。我常把法国学生分为三个阶级：官费生是资本阶级，自费俭学生是中产阶级，勤工学生是劳动阶级，足见留学生在同一国家之中已有三个阶级，何能专责留美留日学生？不过我这篇文章所谓某派某派，是就多数而言，并不是概括全体。

留美学生既然在新大陆努力制造资本阶级，同时留法留德学生亦在欧洲大训练其劳

动精神，终有一日两派要短兵相接。说到技术上，留美学生境遇甚好，自然容易求得专门知识；留法勤工学生艰苦备尝，当然不如留美学生之便利，但是留法学生的重要责任，不在求得高深的知识，而在训练一种专门技术及研究一种改革方法。现在有许多勤工学生，因为不易得着求学机会，便觉十分懊恼，其实这是自己忘了自己的责任。你试想想我们自食其力的留法学生，怎能比得安坐求学的留美先生？有人说劳工运动的动机是由嫉妒二字生出来的，我亦承认这句话。因为都是妈生的，谁该享福，谁该受苦？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反对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正当的消费影响及我们正当的生活。我们反对他们，是为人类谋幸福，是不准再有人胆敢奢侈，并不是我们看得眼热了，存一个“大丈夫固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之心，再做第二个资本家。所以我们主张劳工运动的，便要先存一个自己永远不奢侈之决心。只有穿起草鞋、荷起锄头的劳工运动者，没有带（戴）起金丝眼镜、口含雪茄香烟的社会革命家。做事要做像，不要做成四不像。留法勤工的先生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劳工运动的中心人物。我对于勤工学生不安于现在生活的朋友，要请他随时想着：“我的责任是甚么？要那一种生活才与我的责任适合？否则便要成四不像。”

留美学生的老师是煤油大王，勤工学生的朋友是留法华工；留美学生多带有几分基督化（这是教会学校及青年会的功效），勤工学生多带有几分反对宗教的精神。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

我们主张世界运动，当然没有国界的成见。留美留日学生，都是我们极亲爱的朋友，更无所谓彼疆我界。但是思想上若真是造成两不相容的派别，则彼此相争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凡主张劳动主义的，虽是异族他种，亦是我们的好友；凡主张资本主义的，虽是至亲好友，亦是我们的仇敌。

（巴黎《旅欧周刊》）

三十九　来德留学者注意

近来吾国青年学子因国内教育破产，多纷纷赴海外留学，同时又因马克汇价便宜，来德求学者更形踊跃。如此下去，则将来留德学界之发达，不难与留美留法学界争美。惟是留美学界既有美国政府之提倡，留法学界复有李石曾诸人之努力，组织既甚完备，招待尤为殷勤，为留美留法学界发达之重要原因。至于留德学生，则多是自告奋勇，远涉重洋；到德以后，又以人地生疏之故，何去何从，往往怀疑莫释。即如留学地点一项，在新来者不知德国情形，多齐集柏林一隅，以为较易求学。其实此种思想极为错

误。盖德国文化并非集中首都，京外各城大都有其特色。故记者之意，以为初来德国者，与其旅食京华，不如侨居各省。举其利益，约有四端：

第一，德国大学各有专长。譬如习数学者多往苟廷根（Göttingen，德国数学泰斗多居于此），习哲学者多住马波儿邪（Marbur，德国新康德派首领即居于此），习经济者多往佛兰克虎儿提（Frankfurt A. M. 该大学教授有著名经济学者数人）。此外各处大学莫不有其拿手好戏。故诚意求学者，初不必聚居柏林（其所习科目非在柏林大学不可者，则当然为例外），尽可前往京外各城，计其所得或更有加。

第二，柏林既系首都，生活自较他处为贵（然亦有例外，如莱因流域各城是也），如柏林每年需用一万马克者，在他处则只需七八千马克便可得同样之生活。以记者旅行经验而论，似乎南德意志各城比较中、北德意志各城为廉（闻南方巴燕首都门兴〔München〕最便宜，但排外之风甚烈，恐不能久留，留亦不舒服）。至于德人性情，南方人较北方人为活泼，与之相处较易忘形。

第三，柏林虽系首都，而风景却远不如京外各城。计记者所游各城，其风景之佳皆远在柏林以上。譬如 Marburg 与 Heidelberg 两城，则立于两山之间，更有小溪横贯其中，山色水光，如临画谱。又如 Stuttgart 则蹲踞四山之中，Göttingen 则 ü 斜卧平芜之上。此外各城，或在海边，或临河畔，要皆风景天然，宜于修养。而且德国大学生最喜转学，今年住此，明年寓彼，闻见既广，得益愈多。此事对于吾辈外国人之观风问俗者，尤感必要。

第四，柏林既系首都，五方杂处，风俗之坏冠于全国，引人堕落之事处处皆有。柏林是“有钱不够用”，外省则多是“有钱无处用”。而且柏林中国人太多，应酬甚大，外省则多是独居寡俦，来往较少，于时间上、经济上、练习语言上均极有益。尤有要者，吾国之到德者，不但须求学业上之进步，而且须谋生活上之改造。若就此点而论，尤应直接加入德国人之社会，而暂时与中国人之社会隔离。

有此四利，故记者极主张新来同学侨居京外各城为宜。德国共有普通大学二十三所，研究数理、医学、化学、哲学、政治、经济等科者可以入此。工科大学十一所，研究工业者可以入此①。

（上海《申报》）

---

① 以下列出德国普通大学 23 所、工科大学 11 所的所在地及成立年代，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453 页至 454 页。

四十　留德学生问题

朋友们要我作一篇《留德学生问题》，我因为忙于音乐著述，不能多写，所以只好从简论述如下。

（甲）派遣留学之宗旨　应该专注重“造成专门高深学术人才”。因为在今日国内一切学术设备皆极缺乏之际，欲养成一批科学、艺术、工程各项人才，其势非派遣留学生不可。反之，各种事业所需之普通常识人才，则在国内大学以及专门学校毕业已可，初不必再送到外国来，以省经费。

如此项宗旨不错，则派遣留学生到德国来从事纯粹科学、医学、化学、工程学、音乐学等等较深的研究，实是极应该的。因为这几种学问，德国在世界学术上确算是超等名角。

（乙）派遣留学生之方法　现在西洋留学生，可以大别为“官费生”和“自费生”两种。自费生是自己花自己的钱读书，其责全在彼之父兄，我们旁人不能过问，亦无从过问。换言之，父兄家教严一点的，可以“多读些书，少花些钱”，父兄家教宽一点的，可以“少读些书，多花些钱”。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讨论“官费生”一项。大概“官费生”之取得，有些是曾经过一度留学考试的，有些是直用其他方法而得的。假如派遣留学生宗旨在造就专门高深学术人才，那么派遣之时，至少该项学生应该具有能够造成专门高深学术人才的资格方可。

从来留学考试，多是由中央政府教育部（或地方官）执行。但是教育部中（或地方官）毕竟做官人多读书人少，对于该项学生是否具有研究学问之能力当然不能审知。因此我主张将来中央应组织一种“国家学会”的永久机关，其中应该聘任各种专门学者为会员，将来如考取留学生时，即由该会执行，并随时考核各国留学生成绩。

不过现在德国有一些官费生，事实上政府并未如期汇款，弄得别人穷苦不堪。那么，政府既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亦无权责备他人实行各种条件了。

（丙）社会对于留学生之误解　社会上有许多人以为留学生“留学某国，便亲某国”，这种事实，在从前一部分留美学生中诚然不少其例，但是这种亲美的留美学生，未必皆是在美国留学时所受感情上的影响（因为美国最贱视有色人种，事实上只有使人不快的），乃是在未赴美国以前，已经被“教会教育”或洋大人教育早把几根硬骨头弄软了。故凡民族根性深厚的青年，即或赴美留学，亦断不会完全忘却祖国的。至于留德学生，这种亲人忘己的恶习，更是绝不多见。

（丁）社会对于留学生之盲目崇拜　到德国来留学，若把德语完全打通，与夫所习

该科之基础知识一一获得，已经费了许多工夫。但是事实上至多亦不过等于一个德国本地大学生而已。德国大学生于考取博士之后，还须再行研究多年始能达到学者地位。而我国留学生只在德国大学住几年，幸而得一博士即扬帆回国，从此不再研究学问（事实上国内研究各种学问之设备亦本来没有），试问如何能得高深学问？但是吾国社会一听见“西洋留学生”五字，便与从前“翰林院庶吉士”无异。这真是社会的口味太差，我希望国内社会对于留学生不要那样盲目崇拜。究竟留学生有无本事，还须先拿考金石去试一试再说。

（戊）留德学生之现状　从前马克大跌之时，留德学生数逾千人。现在马克固定，生活甚贵，留德学生多陆续他去。最近据说只有三百人左右了，其中以研究医、工两科者为最多。当满清时代，留德学生本多学习军事者，现在德国打了败仗不得不偃武修文，而我们留德学界亦随之偃武修文了。

（上海《中华教育界》）

四十一　留学与博士

近来国内社会，对于留学归国之博士学士，似乎甚为失望，于是大有“群起贱之”之势，此正与从前之“盲目崇拜”同一错误。

平心而论，博士头衔虽彼此相同，而得之难易却迥然有别。譬如英国之“科学博士”，远较“哲学博士”为难。法国之“国家博士”，又远较“大学博士”为难。其在德国方面，二十三个普通大学之中，其考试宽严，亦复各处不同，有著名易考博士之大学，有著名难考博士之大学。在各种学科之中，又有某种易考，某种难考之区别。在同种学科中，因个人经济情形否泰关系，亦有难考易考之分。（譬如经济情形充裕的，可以先期出几百马克，聘请主任教授之助教，担任私人教习。该助教既随主任教授讲学多年，对于主任教授所重视之问题，及该教授之习惯，均知之甚熟。故助教所讲，均极扼要易记，最便于考试之用。此外，口试日期，大都由大学书记支配，有钱的可以向书记孝敬数十马克，该书记便将口试日期，分配在一二星期之内。譬如本星期考某门，下星期再考某门之类，在被考者方面，尚可于其间补行温习一二。倘若无钱为此，则该书记便将各科口试钟点，往往排在一日之中，接二连三，考得头昏眼花，因此而落第者，亦不乏其人。“钱能通神”，无论古今中外，皆然！）因此之故，若一味的笼统的轻视博士，实使一般从艰难困苦中获得博士头衔之人，十分冤枉。

余自信尚非《儒林外史》传中人物，但向来最喜劝人投考博士。余友朋之在德留学者，亦有十之七八曾应博士考试。盖德国大学系采“自由讲学主义”，对于学生读书，向来不加督促。诚然，德国大学教授对于教学之热心，可谓诚恳已极。譬如我们主任音乐教授，屡向研究室之学生表示：倘遇科学困难问题，无论白日夜间，均可前往询彼云云，可谓尽力鼓励学生求学。但学生自己如不力求上进，则大学教授亦只好听之，肄业一二十年，亦无人过问。至于投考博士，则至少须看过若干书籍，须预备若干时日方可。余友朋之在德赴考者，考后，精神多大为疲惫。此虽对于身体不甚妥当，但由此亦可证明被考者之如何吃力，并非如现在国人所想像，德国博士恰似前清“军功”，可由保荐者在印就之空白内，随意填上姓名可也。

余常见许多“名流学生”，往往表示自己不屑一考博士，而在实际上，乃不欲多卖力气，以遂其颓唐惰气而已。世间“高调”之中，往往藏有不少“暮气”，此一例也。

吾国近日教育机关用人标准，常有以“外国大学毕业或考得博士”为标准之一者。此事在欧人视之，最属可笑。据余所知，德国人之在外国考得博士而归者，必自向本国教育部述明所以投考外国博士之理由，而且非俟部中核准之后，不得使用博士头衔。即或核准之后，亦须于博士之上，冠以某国字样，如“法国博士”“英国博士”之类，以免与本国博士相混。德人之重视本国名器为何如者！至于此项外国博士，如欲在本国作事者，则非经过德国文官考试不可。实与吾国留学人士，一得外国博士头衔，便成为本国大学之“当然教授”不同也。又德国学者如欲在大学担任教授，必须先向教育部提出一种讲演论文，以作毛遂自荐。此项论文，类皆对于某项学理具有特深研究，教育部审查此项论文，如认为合格，则准其担任大学教授。但讲演题目，必须永远限定该教授最初向教育部所提出之“自荐论文”范围内，不得超越。因教育部只承认该教授对于该问题有特深研究，至于其他问题，则未敢轻于相许故也。譬如音乐系中，则最初提出“比较音乐学”论文者，只许永远讲“比较音乐学”；最初提出“乐器学”论文者，只许永远讲“乐器学”之类。只有“正教授”不受此项限制，凡关于音乐上之各种问题，彼皆可以随意提出讲演。至于“副教授”及“讲师”，则未享有此项权利，而且不若“正教授”之有一定薪水。故当德国大学“副教授”及“讲师”者，生活至为清寒，除“卖文章为活”，或“讨有钱老婆”两法外，只能呈请“学术救济会”，每月津贴若干，以维持其清寒生活。德国大学中“正教授”数目至为有限，故此项“副教授”及“讲师”往往有终身不能脱离其“穷措大生活”者。但吾人却不宜因此误会，遂以为“副教授”及“讲师”之学问必不如“正教授”。盖现在西洋“学术分工”，已到极为精深之境，“副教授”所精者，不必为“正教授”之所长。故在德国大学考博士，照章须由该科“正教授”考试，但学生之从事特殊问题研究者，类多从“副教授”讲习。迨论文草就，若

“副教授”既已签名，认为完善，则“正教授”亦只好随之签名认为完善，极少刁难驳斥之举。

吾国留学生之归国充当大学教授者，只须呈验文凭即可，一若“洋大人既已为我们考过，当然绝对可靠，不必再考”也者。至于先期提出讲演论文，请求教育部审查之举，更是闻所未闻。（西洋方面，亦有不须提出讲演论文，即可担任大学教授者，但只限于极为有名之学者而已。）本来，吾国教育部向来纯系官僚所组成，此外又无其他学术团体为之辅助。试问：虽欲考试，究竟何人能够主持？至于德国则不然。主持教育行政之人，多系“学者”出身，而“国家学会”等等组织，又能网罗全国硕学宏儒，故遇事皆有可以咨询之处。换言之，有“投考”者，同时亦有“主考”者。而现在吾国方面，则只有“投考”者，无“主考”者。其结果当然不能不听一般“外国博士”横行无忌。近来国内虽有“大学研究院”之设，但所网罗之真正硕学宏儒，究有几人？国家不重视真正人才，只重视亲戚私党；社会不重视真实学术，只重视虚荣头衔：此所以吾国学术永远不能稍有起色也。就现在世界学术进步程度而论，吾国在最近四五十年内，殆难望与人并驾齐驱，故留学一举，在最近三四十年内，实属必要。倘政府及社会方面，不从速奖励真正学者，以提倡讲学之风，并网罗硕学宏儒，组织考试委员会，以检查归国留学生；则吾国学术，势将永远不能独立，势将永为白族之殖民地！而衰颓国运，亦难望其挽回！盖现在无论任何国家社会事业，皆以“学术”为其基础，“学术”不发达，则一切皆不能发达。须知：做官赚钱一事，令郎令爱或贵亲尊友，虽优为之，而学术事业则非其所长，非专门人才不能为功！犹忆前年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张嘉璈氏在柏林时，曾谒德国国家银行总理夏赫提氏，询其理财之道，该氏答曰：“吾行若遇有问题发生，即向专家叩询。此项专家对于该项问题内容，盖无不如数家珍，洞悉毫末。于是吾人乃得筹划应付之道。贵国可惜缺乏此类专家，故一切皆无从说起。”可怜一个四万万人口偌大的国家，充满了气焰不可一世之党徒博士，竟寻不出几个专家出来！近来吾国金融被外人操纵，而全国对之竟束手无策！中国人才破产之现象，殆已昭然若揭，博士学士虽多，实与国家社会无益！

总而言之，余为主张留学之人，尤其主张留学者均须投考外国考试。（外国文官考试，或博士考试。）但吾国当局，必须对于一切得有外国头衔或未得外国头衔之归国留学生，组织一种专家委员会，加以严格检查，始准录用。而其根本问题，却在国家社会方面须极力提倡讲学之风，不以党见或私人关系，尽将全国学术机关握于一般不学无术者之手，庶几全国自爱之士、特出之才，不至望望然而去之。

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二日寄自柏林

（上海《生活周刊》）

辛　科学美术

四十二　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

德国的科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上对于科学家亦非常尊敬。但是欲在德国当一位科学家却是狠不容易：凡有一种新学说出来，必遭同时学者的攻击非难，不遗余力；若是理由稍不充足，立刻根本推翻，毫无商量余地；即或理由充裕例证确实，亦要经过狠久的怀疑期间，大家始能公认。惟其不轻于公认，故一般科学家始觉难能可贵，惟其难能可贵，故德国的科学遂在世界上占了第一位。

不过现在德国学术界辩论的方法与从前大有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从前彼此辩论，大约都在专门杂志上发表，其次则著书反对，再其次则在大学讲台上指摘非难。现在辩论方法便不同了，不但是在专门杂志上攻击，而且在普通日报上非难；不但是在大学讲台上指摘，而且特开大会在稠人广众之前痛诋。可见他们辩论的方法愈趋激烈，而科学家的徽号愈不容易加在头上了。

最近柏林开了一个“救济德国纯粹科学大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专反对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教授。先期遍发通知请了许多大学教授和博士，安斯坦教授亦是其中被请的一个。当开会的时候，他和他的女儿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笑容可掬的敬听他们大骂。

我在此地不能不将安斯坦的生平和学说着重介绍一下，因为他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奈端[①]，是科学中一个大革命家。

安斯坦（Einstein）是一位犹太人，但是他在德国住久了，亦可以称他是“准德国人”。他在一千九百零五年发表了一卷《特殊的相对论》，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又发表了一卷《普遍的相对论》，他这两卷书把从前科学的根本概念一齐推翻。世界上各国附和他的学者极多，而且替他寻出许多实证，说他发明的定律，比“奈端律”高明，恭维他是现代的哥白尼（自哥白尼说明地球绕日，我们便知平常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换言之，空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现在安斯坦教授又发明时间亦

① 奈端：即牛顿，下同。

是相对的，所以他的党徒称他为哥白尼再世），最近美国大学又给他一个名誉大学教授的头衔。安斯坦之于欧洲，其声誉之隆，关系之大，可想而知了。但是他仍逃不了第二祖国（德国可算是他的第二祖国）同时学者的攻击。

要介绍安斯坦的学说，不是一封通信所能办到的，现在我只能把他的学说与从前学说之相异地方写出来罢了。

我们从前所有的“科学根本概念”如空时、物质力、动作等等的原则，都被这位安斯坦先生推倒了。

一、从前说空间时间是绝对的（亦有人主张空间是相对的），安斯坦则谓空间时间都是相对的。

二、从前说物质是固定的，安斯坦则谓物质是变易的。

三、从前说力是物质乘加速度（力＝物质×加速度），加速度虽有变，而物质是不变的。安斯坦则谓不但是加速度是有变的，而且物质亦是有变的。

四、从前说明动作由静入动或由动入静，皆用喀李乃（Galilei）的 Transformation，因为喀李乃是主张绝对的。安斯坦则主张用鲁乃迟（Lorentz）的 Transformation，因为鲁乃迟亦是主张相对的。

我们从前所有科学皆建筑在这几个科学根本概念上，现在被他一齐推翻了，一切科学皆不免动摇了。所以为安斯坦的革命力量比昔日德国路德之宗教革命与马克斯①之经济革命，其影响还要大呢。

还有一层，我们从前讲物理学大半是拿力学来说明其他声光电等等，现在安斯坦则拿电磁学来说明其他声光力等等。他的相对论基础是筑于电磁学上的。

安斯坦的学说被许多英国学者替他实验，如关于水星移动问题，拿“奈端律”所不能说明的，而拿“安斯坦律”去解释，则恰与事实相符。关于安斯坦学说之实验成功，其例甚多，因怕冗长，此地暂不叙述了。

如今再归到开会时情形，是日来宾甚多，学者相聚一堂。首由费伦君（Panl Wehland）演说，痛诋相对论是安斯坦的空想，而德国人尚有崇拜他的，可为德国科学前途一哭。费君并列举自己所著反对相对论之书籍，请到会者皆购阅，以便共辟邪说云云。其次格尔凯教授（Gehrke）演说，则谓安斯坦之相对论出版后，曾自行修改数次，可见他自己都没把握。若说时间是相对的，则宇宙生存亦是相对的了。至于水星移动问题，可以用他种方法说明。前次日蚀之观察亦不足为安斯坦学说之证，而且相对论之说在一千九百零一年已有匈牙利人发明，安氏实非创始者云云。再其次又有一人拿各种自

① 马克斯：即马克思，下同。

己曾经实验的像片以证明安氏学说之无稽。还有一位俄国学者亦是反对安斯坦的，因为俄国政治关系未能出境来德赴会，他事后还觉狠懊悔呢。

是日开会攻击的虽狠利害，但是安斯坦的态度仍是狠安闲的，只是后来座中有两位暴徒大骂“我们非痛惩这位犹太人不可”，安斯坦便稍露不豫之色而去。

这回安斯坦遭此毋妄之灾的原因，第一是他的党徒把他恭维的太过了，因而激起反感；第二是德国人最恨犹太人，安斯坦亦受了种族之累了。

安斯坦本是柏林大学教授，因此颇抱不安，便有出国之志，瑞士大学闻之，即拍电邀请他去。但是最近有几位德国最著名学者，如 Lane、Brust、Rubens 等皆有论文发表，痛诋当日开会情形，并极力安慰安氏幸勿介意；德国教育总长亦致函安氏，劝其勿去德国，谓吾德科学全靠诸君维持云云。现在安氏究竟出国与否尚不可知。前日有两位中国朋友私谓安氏既要出国，不如请他到中国一行。但是我们回头一想，若是到中国去，究竟有几个人听得懂呢？现在中国去几位哲学家倒还可以，若是科学家，恐非一二年内所能领教呢。

我写完这篇通信，有狠多感想：第一，在现刻中国学术界上得名是狠容易的，只要看两部外国书，便可称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这是我们社会上论人取材的标准尺码太低了。我们以后要将这尺码抬高，不管他是天王星、海王星的留学生，或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西洋学者，我们对于他都要有一个严格的细密的批评。可惜中国只有“政争”没有“学争”，只有救国之国民大会，而没有救民族救世界之学术大会。第二，现刻中国青年研究学术的渐多了，但是没有基本科学作基础；筑了许多沙上楼台，终久是要倒的。第三，觉得中国在现代世界学术界上究竟占了一个什么地位？同时我又觉得我自己对于科学知识，十分惭愧。咳！算了，我不愿再写了！

（上海《时事新报》）

四十三　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

我上次在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的通信中，曾经把现代科学革命家、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介绍过一次。我说他的革命事业比之昔日德国路德之宗教革命与马克斯之经济革命，其影响还要重大。因为我们从前所有一切学术，其基础大半建筑在旧科学的根本概念上头，现在被这位安先生大革起命来，把旧科学的根本概念一齐推翻，所有一切学术的基础都不免动摇。你看他的影响有多么大呀！安氏的相对论在英美两国信徒极众，现在中国讲演之罗素亦极推崇安氏之学说。安氏学说之成功，亦多赖英美学者鼓吹实验之

力。但安氏学说在英美虽备受欢迎，在德国则大遭攻击（安氏是犹太人，生于德国）。上次柏林学者开会攻击安氏一次，颇使安氏难堪，遂有辞去柏林大学教授出游他国之意。当时瑞士大学闻之，即专电欢迎，后因德国教育总长及其他著名大学教授挽留，安氏始打消辞意。惟近来反对安氏的暗潮颇有继长增高之势，益使安氏不安于位。安氏遂决计出游美国，并拟到中国一游，预备在上海讲演。这是一个何等的好消息。

上次安氏受柏林学者开会攻击时，我们有几位朋友便思乘机劝他到中国一游。但是后来又想到中国的科学知识太不发达，恐怕听得懂的人狠少，并且寻翻译的人亦狠难，反不如多请几位杜威、罗素到中国去，比较的还能普及，所以我们当时的热望又冷下来了。现在安氏既是自己愿到中国来，我们正好趁势欢迎他，在我们“老大中国”中制造些“科学空气”，我希望讲学社的先生们特别注意！

安氏生于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他童年时代在德国之 München 居住，到了十五岁时便赴瑞士入 Aaran 之中学校，后又入 Zurich 之工艺学校，他的算学物理便在此处学的。有一位德国大学教授 Born 君曾访问安氏昔日瑞士的旧教习 Minkowski 君，问起安氏少年学生时代肄业情形。据 Minkowski 云：“他在我那里读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懂什么。”照此语看来，安氏少年时代是一位狠老实的学生，并不知道出风头。

一九零二年由学校毕业，得着工程师头衔。不久他便发表了一篇《特殊的相对论》。一九零九年在 Zurich 大学当教授，一九一四年到柏林充当“威廉皇帝物理学会”的会长。一九一五他又发表了一篇《普遍的相对论》。自从他这两篇相对论发表以后，在科学界里便起了一个大革命。从前不出风头的学生，现在便大出其风头了。

当英国学者到巴西去实验安氏学说的时候，Born 君曾往询安氏：“假如此次实验失败，君将如何？”安氏答云：“那就奇怪了。”足见安氏相信自己的学说狠是坚决。果然实验的结果一点不错。

德国学者对于安氏学说的态度可分三种：第一派，研究数理的人大半都赞成安氏学说。安氏的相对论是由数理及物理发明来的，大凡研究数理的多注重理论，而研究物理的则偏重实际。安氏的相对论是用高深的数理来证明，在理论上非常圆满，所以一般研究数理的学者大半赞成相对论。

第二派，研究物理的人大半都反对安氏学说。大凡研究物理的人多注重实验，对于高深数理是狠少研究的。譬如英国的电气学者 Faraday，他的实验虽然成功，而他的学说之理论，仍有待于擅长数理之学者 Mawel 为他的实验建立一个理论。可见物理学家只重实验不解高深数理的，实繁有徒。故德国一般物理学家对于相对论之数理既不甚了解，因而对于相对论大加攻击，说他不合乎物理实验。

第三派是折衷派，说相对论在数理上是狠圆满的，而在物理上则不必尽合。因为数

理是“非矛盾律”，而物理则为“因果律”。相对论之理诚不反乎“非矛盾律”，而于“因果律”则不无忽略之处。但是据我们所知道的，安氏的相对论在物理上实验亦常处处成功。所以批评安氏学说不合物理实验，亦非公允之论。

近来我的朋友魏时珍君参考了一二十种相对论的著作，现在着手翻译安氏所著的《特殊的及普遍的相对论》。安氏的著作虽多，但是成书的只有这一本比较的完善。此书是一种通俗的相对论，但是据安氏自序说，这本通俗的相对论亦要有高等学校毕业的程度才看得懂。据魏君云，关于相对论的著作好的甚多，这本通俗的相对论尚不是一种最好的。但是他译此书有三种理由：第一，此书是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自己著的；第二，此书颇近于哲学，狠可以引起中国人研究相对论的兴趣；第三，此书是一种通俗的，或者看得懂的人较多。现在他正在那里字斟句酌的慢慢地译呢。

（上海《时事新报》）

四十四　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

德意志自十九世纪以来，科学之发达，政治之修明，为世界各国所称许。自大战后，科学既无特殊进步，政治亦日趋凌乱，昔日称雄一世之德国文化，至是遂有夕阳衰草之感矣。记者曾推究其所以致此之故，除战争为进化之敌，直接摧残文化不计外，其原因尚有二：（一）昔日德国科学之所以发达，虽由于少数哲人学者抱“为学术而研究学术”之宏愿，而其最大原因，仍系国家奖励学者之得法。战前德国大学教授及博士在社会上之地位极高，因而薪俸收入亦较他项职业为丰富。名利所在，举国趋之，父兄之勉其子弟，亦以取得大学教授（Professor）及博士（Doktor）之头衔为荣。既取得此种头衔之后，在社会上谋生亦较寻常人为容易。察其情形，恰似吾国前清时代各家庭之希望子弟“入学中举”，既取得秀才资格之后，设帐所得之束脩，亦常较“白丁”为厚。争名攘利，中外一辙。故大学教授及博士者，德国之科举也。不过中国所用以取士为无聊之八股，而德国所用以取士者为有用之科学耳。战后物质缺乏，一般人急于谋生，因而轻视脑力工作（即学者教授之类），重视手力工作（即普通工人）。盖手力工作可以增加有形之物产，以应一人之需要；而脑力工作只能增加无形之生产，为现在一般人所不急需也。故现在普通工人每月之收入往往多于学校教师。于是向日以博士头衔可以谋得丰富生活因而研究科学者，至是多弃置学术而不顾矣。此德国文化衰落之第一原因也。战前德国为世界上著名之官僚政治，彼时官僚之奉公守法，办事之统一敏捷，实为官僚政治之极轨。战后共和政府成立，人民对于政治素无训练，又值战后百端待理，因而政

治上常有凌乱舞弊之感。从前官僚办事之奉公守法、统一敏捷，至是皆荡然无余矣。此又为德国文化衰落之第二原因也。由此观之，从前德国之科学与政治，皆未建筑在“学者自觉”与“人民自觉”之基础上，所以一遇外力便即动摇，此实为德国文化衰落之总原因也。近来德国少数有识之士，处此政治纷乱之时，观此文化衰落之象，以为前此所谓文明皆徒有虚表，只引起一般国民虚矫竞争之心，因而酿成此日国破家亡之痛，于是颇以西方文化有根本缺点，进而研究所谓博大冷静之东方文化，亦犹中国士人之一不得志便思逃禅。西洋人之嗜中国文化，颇似中国人之好谈佛老，此无他，动极思静而已。

然东方书籍译成德文者为数不多，且毫无统系，不足供德国人之研究。于是中国有辜鸿铭者乃应运而生，与德人某君合著一书，大提倡中国文化。此书一出，颇为德国人士所推重，报章杂志介绍，俨然以辜氏为中国文明之代表者。某学者并谓辜氏于战前便察知西洋文化之弊，大声急呼，而吾欧洲人始终不醒，以有今日，夫复何言云云，可想见其推重之情形矣。德国人既热心研究中国文化，无论其是否出于一时反动，要为中国文化输入德国之机会。愿作此种运输之业者，吾于此得两团体焉：一为华人方面之“中德文化研究会”，一为德人方面之“东方语言学会”。

一、中德文化研究会，为一部分中国留德学生所组织，其宗旨专在介绍中德两国文化，以扫除中德两民族间之误会。此会全由中国学生所组织，故所有经费，亦全由该学生等自行凑集。德人方面只能被推为该会名誉会员，以便随时咨询一切，除此种咨询而外，便与德人不生直接关系，故该团体可谓为纯粹华人之事业也。该会德文宣言发出之后，颇引起德人方面注意，愿与该会共同工作者现已颇不乏人。兹就记者所知该会预备进行之事项及其目的为宣言书所未详者，述录如左：

第一，该会以德国人对于中国学术上、政治上、社会上之情形毫不了解，因而中德之间极形隔阂，该会现拟随时发表关于中国学术上、政治上、社会上之论文，送登德国各报，使德国人认识“真正之中国”。第二，一般德国人脑中之中国人，男则发辫长垂，女则纤纤小足，所有饮食起居，皆未脱野蛮风俗，更兼德国旅华教士之报告，如杀子食鼠之事加意描写，更使德国一般妇孺视中国如《西游记》上之妖精，一见中国人便生鄙弃戒惧之心。当记者初到德国时，群目之为日本人，盖以中国人有发辫而日本人则无之也。日本人在德国著有《日本及日本人》一书，详述日本人之生活，故德国人极了解日本人，而中国则向无此类书籍。该会有鉴于此，拟编《中国》一书，详载中国历史、风景、美术、人物、家庭等之像片，并详细介绍中国之历史、风俗、文化、生活等等，期于两年内编成。昔日青岛德国官厅曾拟编辑《德国》（Dentschlandbuch für Chinesen）一书，其用意在使华人了解德人，今该会亦编《中国》（Chinabuch für Dentsche）一书，可谓后先相映也。不过德国经营此事者为官署，而中国经营此事者则为学生耳。第

三，德国博物馆往往陈列中国野蛮风俗图型，颇惹起德人对于中国之轻视。又有某德人因欲复往中国，所谋不遂，乃对德国学生大诋华人，极力形容中国人之野蛮，此于两国邦交亦属有碍。该会将来亦拟分别致函劝告，以减少德国人民之误会及轻视。第四，该会以向来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时则与国内学术机关不通音问，以致西学虽略有所窥，而对于国内学术界之情形则极形隔阂，又如前此之留学生一回国后，便与西洋学术绝缘，绝少再有接触之机会。该会之意，即欲将此种组织作为永久机关，使在国外时有得知国内学术界情形之机会，将来回国时，亦可借此机关常作学术材料之供给，此于学术前途亦极有益。总之，该会作宣传文化之事业，为青年国际运动之机关，实为海外华人之一种重要组织也。

二、东方语言学会，为德国人所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一年。该会以研究中国、日本、印度、波斯、阿剌伯、土耳其等国文化为宗旨。该会会长为哲学博士许迟（Dr. Schutz）。许君是佛兰克图书馆中国图书部部长，能识东方各种文字。据云该图书馆存有中国《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记者常与许君共译中国古诗，彼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极有兴味，并将彼所著关于中国学术各书见赠。彼之书室内悬有中国报纸一张，盖四十余年前之《申报》也。

三月十七日晚七钟，为该会开春季大会之期，记者以来宾资格参与斯会。是夜之会，有音乐，有跳舞，故售入场券，每人二十二马克，其价甚昂，然到会男女仍极众多，此亦可见德国人游戏方法之不同矣。此会可纪之点有三：第一、许迟博士所译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波斯诸国诗歌由歌者高唱。此歌者是舞台著名之伶人，高下抑扬，传神表意，听者屏息，如闻钧乐，此真不减昔日旗亭之风味矣。第二、土耳其人高诵土耳其诗歌，一闻其声，便知为东方人之音，令人忽忆亚洲诸民族，不禁有沧桑之感。土耳其人歌毕，极与记者周旋，并交换彼此住址，其意甚殷。记者有暇，或将走访其人，一叩土耳其之详情也。第三、东方式跳舞（疑系印度跳舞），奔驰旋转，不类人形。吾友魏时珍君谓其颇似妖精，其实扮演者，固系德国舞台最著名之女跳舞家也。记者是亦高诵中国古诗《击壤歌》，以为可以代表中国古代民族独立自由之精神，颇引起场中注意，盖彼辈实闻所未闻也。吾友魏君预备《中国诗歌形式变迁之大势》德文演说一篇，因为时已晚，未曾演说。该稿已为许迟博士取去作研究中国诗学者之参考矣。

德国研究东方情势之集会固不止此，然其他各会多含有政治上之性质，若专以研究东方文学为职志者，当首推东方语言学会。此又从事中德文化之介绍者，不可不知也。

（上海《申报》）

四十五　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

最近一礼拜中，德国发生两种集会，皆与中国文化有关，其一为中国哲学讲演会，其一为东方美术展览会。

最近一二年来，德国人之研究中国文化已成为一种潮流，或谓此种趋势全系战后一种反动。此语是否真确，吾人姑且不论，但就此种潮流观之，必发生三种影响：第一，中国古代文化必乘此种机会多多输入欧洲；第二，中国文化输入欧洲后，欧洲文化必感受多少之影响，将来或可产生第三种文化；第三，欧人能略解中国文化，则对于中华民族必加上若干之了解，或不至再以未开化之人类相待。故此种潮流对于世界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皆可谓有利无害，因而记者亦乐为介绍，非助国故党以张其帜也。犹忆前两月此间大学某教授向学生讲授经济学时，曾谓德国将来宜与中国携手以恢复德国，学生闻之，即用足擦地板，颇表示揶揄轻视之意（德国大学生习惯，凡教员上堂，或讲至精粹处，则用足连击地板，以表示欢迎之意；凡教员讲授错谬时，即用足大擦地板，以表示嘲笑之意），当时该教授即正色告学生曰："诸君尚以中国人为野蛮民族耶？中国古代学术实可与吾欧希腊学术并肩而立。中国人，聪秀之民族也，诸君慎勿轻视！"其时有中国人某君在座，真弄得"笑啼皆非"矣。

欲明战后德人思想之变迁，不可不先知战前德国学术界之情形。战前德国学术界，一自然科学之世界也，自哲学、文学以至于一切艺术，几无一不建筑于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而研究自然科学者，更排斥其他一切玄学（Metaphysik）不遗余力。柏格森，今日世界之大玄学家也，而德国科学家则谓柏氏之学说出发于一种极不明了之概念上。倭铿，德国最近之大玄学家也，而德国科学家则谓倭氏只善于选择迎合社会心理之题目以沽名钓誉，故倭氏在其祖国之声誉，远不如在英美日本各国。总之，科学家所承认者只有"真实"。所谓"真实"者，可以用尺子量，可以用天秤称，可以用显微镜窥，可以用数字算，此外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皆赐以荒诞不经之谥。在一方面观之，德国近数十年学术之发达冠绝世界，未始非此辈科学家提倡拥护自然科学之力，而在他方面观之，自然科学既握学术界霸权，所有一切思想皆须受"科学霸王"之束缚，甚至于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皆以是否合于科学而推断其是非。人道至此，可谓苦矣！语云"物极必反，束久必伸"，德国学术亦复如此。自大战后，有一部分学者颇厌弃科学霸王之束缚思想，遂有相率返于自然之趋势，于是久为科学家所痛骂之玄学，又有乘机而起之倾向。一人倡之，百人和之，遂形成一种潮流。虽尚有一部分科学家拼命抵抗，然大势所

趋，亦无可如何。中国者，玄学最盛之国也。德人近日之研究中国文化，遂成为一时风尚，“老子哲学”尤为一般士夫所乐道。此德人近日之所以有中国哲学之讲演也。

此地连日开中国哲学讲演会两次，主讲者为威廉博士。博士曾寓居中国者十余年，通中国文字，译有老庄孟列诸书，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亦尚有研究。此次受德人聘请来此公开讲演，其讲演大意如下。博士以为世界上无无文化之民族，惟文化有强弱之分。所谓强文化者，可以耐久，可以受他种文化之侵略而不惧，所谓弱文化者则反是。中国文化存于世界上者已四千年，在诸种民族文化中为最能耐久者。近来欧力东侵，遂使中国文化大有动摇之势。然吾人万不可以为欧洲文化较高，故能征服中国文化；其实中国文化所受欧洲文化之影响，不是欧洲文化之精粹，而实为欧洲文化之毒物。质言之，欧洲文化之侵入中国，无非枪弹战舰之毒物，遂使中国文化被强权压迫，大有丧其所守之倾向，此实为最可叹息之事（语至此，拍掌之声如雷）。

博士又谓，中国古代哲学实发源于初民祈祷式之《易经》。欧洲哲学大半立于“存在”（Sein）之概念上，而中国哲学则大半立于“变易”（Wandel）之概念上；欧洲哲学多系有目的之前进，中国哲学多系无始终之循环，春去夏来，花开花落，无始无终，循环不已，若能安心立命以顺此循环者，则其乐无涯。老子、孔子皆极推重《易经》，老子生于乱离之世，故主张顺天道之自然，以返于简易；孔子目击混乱之象，又主张应人事之变迁，以建立社会制度，中国数千年来之文化，即建筑于孔子学说之上。孔子欲用祭礼之法，使“现在”与“过去”相结，因之孔子学说遂渐趋“形式主义”，其末流之反动，则产出杨子之为我主义与墨子之兼爱主义。孟子生于孔子之后，力辟杨墨之道，孔子学说因而日昌。在第七朝代，佛教传入中国，成就一种佛教文学，贡献一种特殊价值，惟现在佛教在中国业已衰微云云。

博士又谓中德两国文化宜携手进行，德人宜打破从前之强权梦，中国在不久期间内，必能将吾国优先权取消，吾人慎勿轻视中国人。

此次讲演，售卖入场券，每人三马克，而来听者仍异常踊跃，亦可想见德人研究中国文化之兴味矣。不但学术界如此，即美术界亦有此种趋势。

战前德国自然科学既如此其盛，其影响遂波及美术界，一时盛行所谓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 Eindruck）者，即将自然界事物照实写出，与客观之现象不差毫厘，不能稍杂主观之见，所有光线之配置、地位之安排，处处皆须合乎自然科学及数学。故吾人一览战前旧画，风景天然，恍惚人在画中也。自大战后，自然科学之反动既起，于是一般美术家遂以为从前之美术太重客观而不重主观，若一草一木皆必与客观现象相符，何不用照相机摄影，何贵乎创造美术？因而大倡自我解放，注重主观之论，一时成为风气。又发生所谓表情主义（Expressionismus Ausdruck）者，即将自己心中之想像

写出，不管与客观之事实相符与否，换言之，爱如何画尽便如何画，不受丝毫束缚。故近日美术画，其所绘人物往往足长手短，头大身小，颇似妖精；其所绘风景，则又红蓝绿白，一塌糊涂，仿佛此中有真意，不足为外人道也。此种风尚，不独德国如此，即法国亦然。犹忆去年记者游巴黎卢森堡博物馆时，即见所谓新派画者杂陈于一室，其奇形怪状殊不减于德国也。当此种注重主观之表情主义盛兴时，旧画派大加攻击，一般国民虽亦不甚了解，然此种新潮仍如排山倒海而来，不可抵抗。于是不知不觉间，又与中国美术画之趣味相投。中国美术画者，大半皆表出主观感想，而与客观事实不甚相符合者也。片石孤云，以寄遐想；落花流水，聊写幽思。然若察其光线，按其地位，往往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德国新画派颇能领略此中神味，所以近日此地有所谓东方美术展览会之发生也。惟此会所陈列者，以日本美术为多，中国美术居少数，且皆劣丑不堪：绘画中以美人为多（此种美人画在中国或自以为是工笔画，颇合法度，而在德人视之，则处处不合规矩准绳，正合主观新画家之口味也）。塑像中以观音菩萨、罗汉偶像为最多。在记者视之，以为此种美术实有辱国光，而在德人方面则又视为宝贵之物，往往一画一像，皆非数百马克不办，此亦可谓各人好恶之不同矣。

记者以为吾国提倡美术之人，宜选择多种名画，分赠世界各国有名之博物馆，亦为发扬国光之一道。与其藏之于家，不如公之于众。犹忆记者游巴黎鲁渥博物馆时，世界各国名画皆灿然陈列，一至中国绘画陈列处（在一个极狭之过道处），贴有几张“门神画”，还有几张“机房教子”“赤壁鏖兵”之类，看后令人汗下如雨。鲁渥博物馆为世界上最著名之博物馆，而中国之陈列乃如此，其他更可知矣。鲁渥博物馆中有日本画专室，多是日本人送赠者。于此可以想见中日两国在国际上地位之悬殊实非偶然之事也。

德国思想界受自然科学过盛之反动，而有此种趋重东方式之倾向。然吾中国人闻之，不必引以为喜，更不宜灰其研究自然科学之热心。盖中德文化不同，其所需要亦因而相异。我之所需，或正为彼之所弃，我之所弃，或正为彼之所需，非如此不足以产生第三种文化也。吾人之责任，不仅在保存国粹，更不仅在模仿外国，而在创造新文化。吾聪慧勤俭之中华民族，终必为世界上最后胜利之民族。故誉我者，不必引以为喜，而毁我者，亦不必引以为忧也。

（上海《申报》）

四十六　德国学者与世界哲学大会

德国自战败后，所有国际团体，列强多未许其参加，大者如国际联盟，小者如万国

学生会，皆其例也。不但国际政治团体、青年学生组织如此，即专以学术为号召之世界哲学大会，亦在被排斥之列，如此次牛津哲学会议是也。然德国学者虽未参加国际各种学术集会，而对于各种学术集会之评论，则未曾一次放松。记者此篇通信所述关于此次哲学大会之评语，皆是闻诸德国学者。读者诸君于此，亦可以窥见德国学者对于近代哲学潮流意见之一斑矣。

最近英国牛津开一世界哲学会议，到会者皆法美英三国著名之哲学家，各有演说，以代表各该国哲学潮流之倾向。其共同讨论之问题如下：

一、思想动作对于语言组织之关系。

二、脑筋局部损伤于象征思想妨碍之问题。

三、国民性之问题。

四、“意义”之意义。

五、美术中之精神与方法。

六、柏拉图理想之存在为实体分析之假定否？

法国方面出席者为柏格森氏。柏氏演题为“前知与新异”（Prevision et la Nauveaute）。柏氏所讲演之问题，虽极特殊，而其归根结底，仍本于彼所主张之创造进化说。柏氏谓：“物理界中可以前知，而生活界中则不能前知，生活界中只有时时创造进化，世界过程永远是‘新’。换言之，将来不包含于现在之中，现在不包含于过去之中。质言之：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无因果之关系而已。吾人所能见者，只是已成之事实；及既见此已成事实之后，乃推想及于过去，始加以因果关系之名。其实生活界中无所谓因果关系，亦不能有所前知。”云云。有人询问柏氏战后世界舞台之戏剧如何？柏氏答曰：“假如我知道，我便把他写出来了。”此语亦表示生活界中不能前知之意也。德国学者对于柏氏学说之批评，则以为不但物理界中有因果关系，可以前知，即生活界中亦有因果关系，可以前知。此次大战之起，即由于一般学者“不管将来”四字所致，而柏氏此种思想，战后仍不更改，可叹孰甚！凡一事变之发生，不究其种因如何，防止之法如何，但在旁拍掌喝采曰：此创造进化也，是何异驱人类以入于陷阱乎？柏氏固注重实际主义者，然柏氏之跳舞于实际主义上，不过如欧洲人之跳舞于火山之上耳。现在欧洲有一种“力”扰乱“文化”，柏氏不知将此力导而顺之，乃以“怠战者”之态度立于旁边，一方面大倡其创造进化之说，他方面又听《凡尔塞和约》之存在。殊不知《凡尔塞和约》者，即他日事变之因也，将来之事变，吾人于此和约中便可前知一二矣。柏氏哲学，可以代表法国思想，然吾欧洲人对于此种哲学，实不可不严行拒绝云云。近来德人痛心于《凡尔塞和约》，因此批评柏氏哲学，遂亦不免牵动感情矣。

美国哲学者参与此次哲学会议，有一可注意之点，即美国哲学之独立运动是也。美

国从前哲学系隶属于欧洲哲学旗帜之下。欧洲从前哲学派别有所谓唯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者，其在美国方面，唯实主义于玄学及论理上颇占优势，理想主义于伦理及宗教上颇占优势。然以美国人天性注重实际之故，由唯实与理想主义之混合，遂产生三种哲学：（一）实验主义，（二）理想主义，（三）新唯实主义。此次哲学会议中，为实验主义之代表者为波丁教授（Prof. Boodin）。波氏谓实验主义之在美国方面，无论对于政治、社会、教育、宗教、科学任何方面皆有莫大影响云云。德国学者对于实验主义之批评，则以为美国人喜讲实际，谓世界不止一个真理；所谓真理者，即吾人之信仰上以为善者。从此真理之解释，遂不免产生一种特殊结果。质言之，宇宙不是一个宇宙，而且可以互相反对。此实验主义推论必得之结果也。其次为理想主义之代表者为罗西（Josiah Royece）。罗氏在一八五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之中，曾将宗教用科学解释以与哲学接近。德国学者谓罗氏思想，与实验主义首领詹姆斯之思想相合之处有二：（一）相信上帝，（二）相信灵魂。再其次为新唯实主义之代表者为孟塔古教授（Prof. Montague）。孟氏于一九一〇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六大教授发表新唯实主义之论文，新唯实主义始于哲学中占一位置。惟据德国学者言，此种学说在德国方面知之者尚属甚少。总之，德国学者对于美国哲学者之此次独立运动，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云。

英国方面在此次会议中，亦有一种特殊之现象，即哲学派别颇难加以分析是也。黑格士教授（Prof. Hieks）谓，英国哲学不能用一个标记以表明之云云。在德国学者之意，则以为此种不能用一个标记表明之情形，即系英国哲学之特色。英国在十八世纪本有特殊哲学，后因受外来思想之接触，如德国之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美国之实验主义等等，遂使派别极为复杂。现在英国哲学有理想派、唯实派、怀疑派，并有趋向玄学之势，而且有趋向二元多元之势。此德国学者对于英国哲学之感想也。此次会议中英国学者对于安斯坦之相对论极热心讨论，在英国之相对论著作亦较法国为多。故此次德国虽未参加，而德国所产生之学者安斯坦却已为会议中之重要题目矣。要之，此次哲学会议，可纪之点有五：

一、关于认识论上及论理上之研究甚少。

二、颇有玄学之趋势，此玄学又有多元之趋势。

三、各种矛盾倾向之交互混合。

四、容纳科学进步与宗教重兴之影响。

五、会议中未有特殊大学者，故讨论结果无完美答案。

德谚有云："寻求真理者，只能独自寻求，无同伴之可言。"（wer zur Wahrheit Wandert，Wandert allein：keiner kann dem andern wegbrunder sein.）盖以寻求真理宜深思苦索，决非会场上之所能奏效。故此次会议无大结果亦无足怪，惟藉此以表示各国

思想之倾向，亦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也。

（上海《申报》）

四十七 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此文为德国汉学家海尼士（Haenisch）所作。海氏从前曾在吾国武昌陆军学校担任德文教习，现在任柏林大学汉文主任教授，以熟习汉满蒙三种文字见称于世。此文系见之于德国名人谢米提阿德（Schmidt—Ott）七十岁纪念文集（名为《德国近五十年来之科学》）之中。该集由德国当代宿儒分任撰著，详述德国近五十年各种学术进化之情形。关于汉学一门，系由海氏担任（按该集系一九三〇年刊行）。

今年九月，为德国前任柏林大学汉文主任教授佛郎克（Franke）七十寿辰。译者特译此文以为佛氏纪念。佛氏长于历史，其所著《中国通史》一书，第一册出版以后，颇为欧洲学界所重视。吾人甚望佛氏长保其康健精神，将第二第三两册陆续完成，为欧洲史学界放一异彩。又佛氏所著《列强在东亚》一书，译者于数年前曾将其中关于还辽一役译出，名为《三国干涉还辽秘闻》。值此东北沦陷之际，国人读之，当有更痛切之感觉。

欧人论述中国文化往往有独到之处，足供吾国学者参考。近年北平图书馆等处尝喜购此种西文书籍，海氏文中所举各种汉学论著，颇可作为吾国购买德文汉学书籍时之指南。倘英法意荷瑞美日等国之汉学近况亦有类似海氏之论述，则吾国图书馆今后采购海外汉学书籍时，可免良莠不分之讥矣。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王光祈识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大学

“汉学”（Sinologic）为“中国学”（Chinakunde）之一部分，系以中国典籍为其研究源泉。斯学之兴，实以第十八世纪天主教牧师之工作为始，其后继以第十九世纪下半期之科学预备工夫，如约里（Julien）、乃改（Legge）、雪提（Schott）诸氏对于中国古籍之翻译及其所撰各种重要论文，以使吾辈今日得以继续研究是也。在德国方面，则有法伯氏（Faber）以及后来威廉氏（Wilhelm，一名卫礼贤）之翻译中国各种经书子书，史托斯（V. v. Strauss）之翻《诗经》及《道德经》，喀伯冷词（Gabelentz）所著之《中国文法》，格鲁白（Grube）所编之《中国文学史》，佛尔克（Forke）所撰之《中国哲学史》。此项“概论工作”现在似已告一结束。无论如何，吾人此际固已早入第三期之“专门工作”范围。所有德国方面对于汉学之工作，兹请简述如下：关于东亚语言学

之研究，德国学者曾占重要位置，譬如雪提、喀伯冷词、孔那狄（Corrady）诸人，根本上实属于“语言学者”之列。在德国重要语言学者格鲁白及谬南（F. W. Müller）两氏工作之中，吾人犹能察出喀伯冷词学派之势力。不过格谬两氏对于实学及文学甚为用力，往往超出纯粹语言学之范围。现在柏林大学方面关于东亚语言一学既设有特别讲座，此后吾德人对于斯学，当不致落居人后矣。

关于中国现行语言，则有阿润堤（K. Arendt）所编《中国北方官话》及初学用书。其中对于方法一点虽付缺如，但材料之丰富，观察之精密，实属世无其匹。此外，黑尔堤（F. Hirth）所著之《中国公文格式》以及墨能笃夫（Möllendorff）之各种著作，均有一述之价值。又最近纳辛（Lessing）及屋提曼（Othmer）两氏合著之初学用书，甚为世人所赞美。

至于字典辞典，则吾德人大为落伍，此实不能不自行承认。一九二四年儒登白格氏（W. Rüdenberg）曾著《华德字典》一书，编辑甚为得法，且合实际之用，但对于研究学术之需要却嫌不足，仍不能代替英法两国所出各种字典。惟吾人若将德人爱德尔（Eitel）所编最近由德国牧师改纳耳（Genahr）重新刊行之《华英字典》认为德国工作，则吾德关于字典一事，亦复不恶，因该项《华英字典》固曾享有内容详实之誉故也。此处吾人对于查赫氏（Zach）关于编辑字典之各种重要工作（按此项工作，吉尔斯（Giles）于其新版《华英大字典》之内曾加以采用）以及彼之评论中关于字典语言文学之材料，亦不可不提，不过该氏此项工作，因其叙述方法异常特别之故，往往将其实际价值损减。

就真正文学一项而论，如处妥理（Zottoli）所编之《中国文学类编》，马果理斯（Margoulies）所编之《中国古文》之类，吾德人尚自愧未能多所贡献。一如查赫氏所批评，吾人对于编辑中国文集一事，在语言的及字典的方面实有积极工作之必要。

反之，在轻易文字方面，如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词作品之类，则其情形却与上述不同。盖此类文学译成德文者现在已属不少，不过多是转译而成，至再至三，即或直从中国原文译出，亦只有少数足以称为适于汉学条件。此项译品大抵缺乏科学基础，且译者自身亦并不希望其具有汉学上之价值。惟关于文学史方面，吾德格鲁白氏所著实为一种模范作品。预料在最近的将来，尚能保持其第一交椅不坠，又新近威廉氏有一种关于文学史的通俗书籍之刊行。

对于中国历史一学，法人实居其首。只是夏往氏（Chavannes）之翻译《史记》一事，已足保持其头等位置，近来又由该国马斯拍罗氏（Maspéro）刊行《中国古代史》一书，至于吾国黑尔堤氏所著之此项书籍，实远不及彼。反之，黑氏之著《中国与罗马时代之东方》则甚有价值。此外德国方面可以称述之著作，尚有鲁斯体河（Rosthorn）

所著之《中国势力向西南方面扩充之研究》，德格鲁堤（de Groot）所译之与亚洲历史有关之中国典籍，豪尔（Hauer）所译之《开国方略》（系清朝开国历史，全本译出，实为译著界不可多见之事）。对于中国历史为概括的叙述者，则有老满（Neuman）、拍拉堤（Plath）之著作，佛里斯（Fries）之略史，孔那狄在法鲁克哈尔通《世界全史》（Pflugk Hartung：Weltgeschichte）中所发表之著作（系对于中国古史之意见）以及鲁斯体河之简明叙述，克老舍（Krause）之《东亚通史》。至于白郎德（Brandt）在黑尔摩提（Helmolt）《世界通史》（Weltgeschichte）中所发表之著作，则纯是一篇空言，毫无意义，因彼对于此项材料实无从问津故也。综观上述各种著作，其内容价值虽各不相等，但有一点却彼此相同，即吾人现有中国历史知识尚无力编著一种合于科学之《中国通史》。此种尝试，吾人尽可让诸其他外国学者为之。吾人对于中国历史现在较有研究者，只有三个时代：（甲）上古，（乙）元代，（丙）中国开关以后。此刻最关重要之事，实为继续夏往氏（法人）之《史记》翻译工作。盖夏往此项译作，恰于全书材料正有生气之处中断，而且吾人正可依据该书作一有统系之汉代年谱。佛郎克氏（O. Franke）实为首先设法了解中国历史叙述之一人，在其所著《中国历史》之中，以汉代为起点实有正当理由。盖中国文化之根基，虽起自周时，但其滋长繁荣，却以汉代国家之中侵入外族成分为始。

真正中国文化史，吾德至今尚无成书。威廉氏之著作，虽设法细将中国历史分为数个文化时代，但严格论之，亦不能称为中国文化史。盖吾人关于此事之预备工作实嫌太少。吾人此后实有先将《文献通考》中各篇分别加以翻译或照辞书格式编述各种沿革之必要。

关于中国政治学一项，吾德现有两种著作：（甲）德格鲁堤所著之《天下主义》（Universismus）。书中对于中国情形了解异常透彻，并将中国国家制度归纳成一个原则。其中所论各节有时虽不免拘束之弊，但就大体而论却甚为明白切要。（乙）佛郎克于其所著《教义》及《中国国教的历史之研究》中，对于中国国家思想之见于中国政治人物言论中者，择尤介绍于西洋。

对于地理一学，工作尚嫌太少。锐邪堤火粉（Richthofen）之著作虽为研究中国地理最为重要之书籍，但完全立于“汉学”之外，倘所述稍一涉及“汉学”范围，则立即陷于谬误，因作者毫未具有“汉学”知识故也，彼之大名竟使彼之错误为分外的延长。此外，魏根来（Wegener）及体森（Thiessen）两人甚有价值之著作亦不属于“汉学”范围之内。同样海尔满（Herrmann）之地图工作亦然（虽其工作对于吾辈汉学家亦有其相当益处）。迄至今日止，计有两种模范工作可以称述：一为佛郎克所著之《热河纪述》，一为亨里（Himly）译自《水道记》之《罗布泊》一章。在汉学家中，尚无立志

研究中国地理典籍（按此项典籍至为丰富）之人。而在地理家中又无人知道，此项典籍之内容实值得一使彼辈从事汉文研究，以至于能够独立看书。又他法尔氏（A. Tafel）曾著《西藏》一书，吾人可于此处附带提及。此君实属对于此项地理工作最为适当之人。假使一般探险游记作者对于中国著述先有相当研究，则其作品之价值更当如何升高！

“民风学”（Volkskunde）应属于博物馆学者之领域。吾德博物馆方面向来就偏重宗教祈祷以及美术工艺，而且博物馆前途又无何等希望，以致一般后起者为之裹足。其结果，许多重要工作皆未尝着手进行，惟格鲁白氏所著之《北京民风》，实为极有价值之模范作品，德国以外之汉学家亦无人能出其右者。同样，斯登迟氏（P. Stenz）所著之《山东省民风》亦为当世效法。关于民风问题，亦可应用辞书编辑之法，逐条加以解释，吾人可于亨里氏所编《中国游戏法研究》一书见之。该书是采自一本《满文字典》，编辑极为得法。至于劳法尔氏（Lanfer）所发表极有价值之许多博物馆文字，因其讨论对象既为美国博物馆，而且是用英文撰成，所以不得列入德国研究工作之内。中国关于民风之典籍异常众多，或为专叙一事，或为汇辑各门，或为各地专书，或为巨大辞典。要之，关于地点及事物，皆易使人寻得头绪。如欲研究此项材料，必须熟悉该地情形，了解该项事体。又博物馆员中之能为汉学工作者为数极少，为谋工作经济起见，凡是具有此项汉学工作能力，具有实物为其研究材料者，必须对于中国民风典籍时常加以研究。又中国碑帖学一事，吾人于此亦应提出讨论。按此学尚在幼稚时代，而且所处地位极为不幸。一般学者皆不知应将此事归入何方主办：图书馆乎？博物馆乎？抑大学研究所乎？在图书馆方面，只承认文字之用书籍形式印成者为典籍，而碑帖之具有此项性质者却极占少数。博物馆方面，有时亦收买此项碑帖，或由旅行之人带回，或是偶然遇机购得，但必须此项碑帖具有人种学或美术上之性质方可。大学方面之汉学研究所，固极希望收藏此项碑帖，但又苦无经费为之。因此之故，各处博物馆虽然间或藏有许多著名碑帖，但至今尚无一处为有统系的收藏，而且亦无一处有此收藏计划。按中国此项碑帖不但为数极众，而且有时对于历史、文化史、地理、民风、宗教、文学等等之研究极有关系。中国制帖艺术极为高明，因此项碑帖在中国方面亦为珍藏之品故也。最好在普鲁士国立图书馆设一收藏专部，查阅各种目录，并藉中国方面识者之助，逐渐采买大批碑帖，造成宏大收藏。

其在美术方面，吾德成绩比较良好。东亚美术近年以来极占优势，其在欧洲美术界所占地位之重要，实际上远胜于在中国自己艺术界中。德国博物馆中颇能采收若干极有价值之作品，而关于美术之良好著作亦复不少，为汉学家极愿阅读者。吾人但举几位大名，如格罗斯（Grosse）、扣买耳（Kümmel）、波尔邪满（Boerschmann）诸人之类即

足。惟上述著作之中如有不属于美学的作风的技术方面，而系属于美术的历史方面，则当然涉及汉学范围，是为上述著作所不能免之缺点。但在他方面，假若一位汉学家久处中国，收买美术作品既多，获得相当知识，能著极有价值之中国美术历史论文，亦为数见不鲜之事，黑尔堤氏所著之《中国绘画美术》，即为最好之例。

中国宗教，向来即为西洋牧师最喜研究之物。而彼辈对于此事不能纯作客观论述，又为当然事实。因此，牧师以外之人，间亦从事此种研究，以为比较能够客观一点。可以称述之著作，则有法伯氏所著之书籍以及格鲁白氏之论文。格氏此种论文系建筑于德格鲁堤氏英文巨制《中国宗教制度》一书之上。按德氏此项巨制原不属于德国汉学之内，其所以不能完成其业者，大概由于德氏被召前往柏林担任大学讲席一事之故，盖自此以后德氏只用德文写书、并改途研究其他事物故也。克老舍所著《儒道佛》一书，对于中国三种宗教作一概括叙述。道教之在外国，比较孔教吸引力为大，老子及《道德经》在欧洲典籍中已占有相当地位。从事此项玄妙典籍之研究，而以再三转译之本子，或完全武断解释之本子为根据，业已酿成一种流行病象。盖此类翻译早已超出汉学范围之外，其中只有史托斯之德文译本具有真正价值。在汉学中，佛教一种极占重要位置，其原因甚多：第一、佛教实为具有固定形式之唯一宗教。第二、佛学重要典籍，尤其是日本方面新刊之中国佛经，极引人发生研究兴趣。又因新疆方面发现古物及写本曾轰动一时之故，愈使佛教典籍为之增进不少。盖由此所发现之中亚文化关系，大半由于佛教居中联络。第三、因为德国大学投考博士，必须选习补助语言一门，逼得许多少年汉学家不能不从事梵文之研究，此种补助研究实属绝对必要。在一方面，因为对于文法严格训练之故，虽可使一般学习汉文之人免去武断解释中文书籍之弊；但在他方面，因为汉梵并习之故，往往自然趋向佛学一途，而与真正汉学脱离关系。盖彼辈日与不良中国译文为缘，对于汉文训练最易发生不良影响。又《中国佛教要览》一书系用英文著成，但为德人爱德尔所编，自一八七〇年出版以来，直至今日尚未有出其右者。此外，德国作者对于佛学之研究，尚有哈克满（Hackmann）及瓦乃色（Walleser）两人，最近从事翻译佛经之工作者为数亦复不少。

关于吐鲁蕃发现古物之研究，实与汉学一门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关于佛教方面必须参考中国佛经，而且往往只有用此一法，始能将其困难解决。对于此事，实以谬南氏之工作为首屈一指。此外更有大批少年汉学家参与其事，利用汉文以研究新疆发现之各方面。又孔那狄氏关于斯文赫丁（Sven Hedin）在楼兰（Loulan）所发现的古物之论著，实为模范作品，在此可以连带叙及者，尚有佛郎克对于突厥民族及西提亚民族的研究之论文。又对于中国属国如满洲、蒙古、西藏等地之语言、历史、地理研究，德国方面亦有若干贡献。

至于哲学方面，已有若干预备工作，业如前文所述。譬如法伯氏之工作即其一端。此外威廉氏曾为吾辈译出古籍不少，佛尔克氏则著有上述之《中国哲学史》，系以数十年专门研究与预备工作为基础，如彼所译王充《论衡》（按此项译著曾于一九一一年得着 Stan. Julien 奖金）、所著《哲人墨翟》之类。

关于工作方法，约有数点可以叙述的：吾人第一所宜从事者，为纯粹的文法学及发音学。斯学在语言学中并非属于手段，而为吾人研究之目的物，近来汉学家中常有校勘文字之举，欲使中国典籍之来源不明者，利用语言学方法以改订之，如哈鲁氏（Haloun）对于大夏问题之研究即其例也。初译全书而又十分详细，实不多见，因工作太大故也。同时复为人视作译匠工作，不甚尊重，因其中除重要各段之外，不免杂有许多无关宏旨之文故也。兹仅举一位纯粹从事翻译之人，如飞迟买尔氏（Pfzmaier）是也。惟对于此君之成绩，现在尚未有最后判断。至于全译一书之举，则有佛尔克氏之《论衡》及《墨翟》、豪尔氏之《开国方略》、威廉氏之《吕氏春秋》。此外关于摘译中国古籍，如德格鲁堤氏所译之与亚洲历史有关之中国典籍，以及德氏提议编辑一种中国典籍辞典，依照《图书集成》之例并摘译该处原文附之是也。又自由研究工作之中，而将所根据之典籍列出，并将重要原文及译文引出，实为至要。“概论工作”现在业已告一结束，已如上述。在“零碎工作”未有相当成绩以前，此类“概论工作”实难望其内容稳实，有所成就。关于自由研究工作一层，除历史一科外，其余各科多未达到成熟之境。校勘工作虽极重要，但必须具有相当训练之老手方能从事，对于典籍仅仅经过一次工作，势难遽用校勘工夫。

此外，关于工作手续，亦有应当注意之处如下：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代寻引证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曾为之。如果此举仅属于手续问题、节省时间问题（惟作者方面当然必须亲自审查一番），或者因为某项问题从书籍方面不能求得适当解决（惟此处必须将该中国助手之名每次注出），则实无反对之必要。最重要者，在著作之中不应含糊了事，必须使读者得知此项解决所由来。此种利用中国助手之益处，能使著者工作加速，成绩增高，纠正翻译错误。其害处则在阻碍著者独立工作之能力，妨害语言知识之进步以及字典事业之成就（吾德字典事业之未有发展，此实为其重大原因之一），而且汉学程度之真相不免为之掩蔽。因此之故，吾人若从高处着眼，此种工作手续实有反对之必要。其最要条件为：第一、培养个人独立工作能力，多多细阅中国书籍，常常用中国书籍作参考。第二、用自己研究结果以促进字典事业。第三、因为自己错误受人批评而得进步。

既极可靠、又易审查之补助材料，实为满文译本，因其解释方法最为详明故也。吾人著作须以中国书籍为主，而满文译本仅作为注解之用，固无待烦言。满文应属于汉学

之一部，至少在德国某大学内有此习惯。

在德国汉学界中尚有两个问题未能统一进行：即初学教授方法与拼写汉字方法是也。学习汉文之事，愈难愈慢，而初学教授方法问题亦复愈为急要。其重要目的，在使初学之人能够独立诵阅中国书籍。凡不能直接达到此项目的之事，如文法、读音、古字种种有趣的个别问题之类，皆宜视作无关宏旨，暂行置之不问。对于初学教授之法至今尚少讨论，适于大学采用之汉文教科书至今尚付缺如。就中国文字特质而论，实难先授学生以一本文法或者先令学生熟记各种汉字所能奏功，尤非强授学生以一种古籍（大半选自经书）解释各字原义所能收效。仇视文法者往往过于激烈，主张对于文法一事悉宜放弃，只有熟诵书籍始能达到目的，但如何诵解书籍之法，彼却一字不提。此外又有人主张，只有学习中国现行白话为唯一入门之路。此种主张对于在华外人之有欧洲教师为其顾问者，或有几分是处，至于吾德大学教育之中，此法却不适用。此法不但是“非历史的”（换言之“非科学的”），而且是不合于实用的。假若吾人能会普通白话，虽可以获得中国语言之感觉，并能明朗读音，但在他方面，此事对于初习汉学之人究属不关重要，并将其研究其他重要问题之时间夺去。比较可以实用之方法，似乎先从中国“叙事文学”之中（中国经书及小说皆不适用）解释其联字联句之法以至于短篇组织之道。如此经过若干时日，然后再将篇中所见文法之例加以归纳讨论，惟此种方法至今尚未通行。此外尚有一种理想办法，即德国学生于准备两年汉文之后，前往中国学院肄业，同时兼受欧华两国教师之指导以作实际练习。此种在华组织“德华学院”之希望，我们从前曾有之。

关于拼写汉字方法，德国汉学界中犹未统一，所有一切尝试至今皆归失败。英法两国各有其固定拼法，英国拼法已成为国际通用，而法国拼法则为法国所固有。但其中对于中国古音读法却保存其本来面目。吾德学者，或采英国式之国际通用拼法，或者各人自创新法。德国方面虽有一种汉字拼法，系以德文发音为基础，对于一般德国读者颇为合用，但因中国字音贫乏之故，学者对于中国古音读法势难加以放弃。因此无论英国德国拼法皆不能用。盖英德拼法系按照习俗通用读法，属于一种滑口之音是也。假如英德拼法一旦承认中国古音读法，则吾人将不胜欢迎。

最近时期，在汉学沿革中实为一种特别重要时代。

中国方面现在对于学术一事，亦复利用西法以为基础。汉学研究所、科学杂志、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现均次第成立。古物学及人种学之工作亦依照欧法进行。吾辈汉学家对于中国此种科学运动及成绩不应加以忽视。此外尚有一事应当补述者，即中国因为建筑铁路之故发现许多故物。在二十世纪初叶，河南境内发现龟骨文字，其来源可以溯至商代，于是中国古字学之研究一时大兴。其后政府不顾中国历来相戒勿伤地层之旧习，

派员为有系统的发掘，曾得许多意外效果。此种掘发，以古物学家安得生（Andersson）之力为最多，掘得之物亦有一部分存于瑞京博物馆内，以供欧洲专门学者之研究。其掘发目的虽只限于有史以前之遗迹，但吾人却希望关于初期历史之遗物不久亦可陆续掘出，对于中国最古时代之典籍研究，最好待至彼时再谈。吐鲁蕃之掘发，系从新疆沙漠之中发现许多完好古物与墨迹以及其他小物，其结果大规模之吐鲁蕃研究亦从此开始，而西历纪元后一千年间之东西文化关系亦复为之了然。按吐鲁蕃研究，往往必须中国典籍之助，于是“汉学”与“东方学术”（Orientalistik）遂联成一气，而“汉学”亦在德国方面由此被人承认为一种科学。德国学者对于此项吐鲁蕃研究颇有贡献，实为世人所共知。至于掘得之墨迹（在楼兰掘得者，可以上溯至汉朝时代）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佛学以外之中国典籍，曾使一般研究古书沿革之工作兴趣大为启发。

活字印刷虽为东亚之发明，然在中国方面却未通行，直至欧人势力侵入，尤其是日报刊行，于是铅印事业始得普及。其结果，刊成许多廉价新书，欧洲图书馆及大学生亦复同受其益。同时，中国新式书局并刊行关于汉学之许多良好补助书籍。又利用影印之法，发行规模宏大之古本丛刊，如《四部丛刊》及《四部备要》是也。此外，一九〇二年日本京都更刊行《三藏》一种，换言之即汉文佛经。此项规模浩大之丛刊，现由日本书店设法使其易于普及欧洲学界，实开佛典研究之另一纪元。自此以后，遇有佛经辞句之详实研究。又喀尔格冷氏（Kerlgren）之考定中国古音，实为发音研究之基本著作。

一九一二年清朝颠覆，旧日修史事业随之推翻。于是私人所撰之大批史料亦复从此自由出现。最近三百年之正史，既已依照中国官书于一九二八年编成出版，因此吾人得将私人著作以及欧人撰述，一与中国正史对照参阅。

最后尚有一事对于汉学极关重要者，为上海出版之《辞源》一书。其中所列用语至为丰富，并志其出处，实使吾辈翻译工作得一新而且稳之基础。可愧者，欧洲汉学家对于编辑《辞源》之举未曾参与，但吾人固尚有其应做之工作。盖吾人所需者，终系一种西文字典，对于各语来历尚须比较《辞源》，更要详细注明。除前述各种重要工作外，此项字典之编辑，实为促进吾德汉学不可稍缓之工作。现在吾辈各自从事专门工作，而汉学范围之大与夫汉学学者之少，实有彼此不能合作之处。合作之事，在学术上虽不能过于勉强，但若吾辈从事汉学之人对于上述希望勉尽其力，每次译述汉籍之时特别详细注解，并将现有字典加以补充及改正，实于汉学前途至为有益。乃蒲扯邪（Leipzig）地方之东亚研究所对于此种字典工作业已着手进行。

现在且言德国汉学一科设置之沿革。汉学一科在科学界中争得独立平等地位一事，最初极不容易，在柏林方面直到一九一二年始得立为正科。在柏林大学中，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三年之间，喀伯冷词虽继雪提之后任为东亚语言教授，但其实际纯限于语言方

面，而非真正“汉学”。谢乃甘（Schlegel）之著名批评，对于应用纯粹语言方法研究典籍不能有所成就一事曾痛言之。自一八九三年喀伯冷词死后至一九一二年之间，柏林大学之中遂无汉文一科。此二十年间之中断，实使汉文后起之人完全短缺一代。但其间汉文“票友”（Dilettanten）之作品，却如雨后春笋出现于世，实为其他学科所未曾有。因为中国文字特质，足使彼辈“票友”得以用为护身之符故也。吾人最难了解者，第一流学者如锐邪堤火粉氏对于东亚学术曾有许多贡献，而于汉学一门竟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大演其“票友”把戏。黑尔堤氏因为大胆发出几句非常评论之故，遂在本国之内不能再行安身。德国科学界中从此将彼丧失，彼亦旋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而去，德国汉学界不免大受损失。此外尚有一人亦是同样不幸，格鲁白氏系第一流之深思学者，对于语言、文学、实学皆有充分知识，极合于汉学教授资格，而彼对于汉学之讲授及研究，却只能在彼博物馆正式职务之暇为之。自一九〇八年彼死以后至一九一二年之间，柏林大学中遂完全没有汉文课程，直至荷兰汉学家德格鲁堤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之后，于是汉学一系始得坚定位置，而在德国汉学界中，亦复从此灌入一种新空气。按德氏系从实际训练出身，对于文法极为仇视，但在他方面，却为主张直接诵读中国典籍之先锋（彼在大战之前夕尚为大学研究所购置许多有价值之书籍）。彼之教授方法因为战时战后各种阻碍之故，虽未能全部收效（彼死于一九二一年），但在德国汉学界中却留下一种极有价值之影响，彼之后继者佛郎克氏则注重历史方面之工作。

乃蒲扯邪大学，实为德国大学中唯一无二具有久而不断之汉学讲授历史。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九年之间，喀伯冷词氏在该大学中担任东亚语言教授一职，其后由孔那狄氏继任，一直至于该氏去世之时（系一九二五年。又一九二二年之际，该讲座升为“正教授讲座”）。在彼将死前数年，彼被任为萨克森邦学会会员（Säch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按喀伯冷词及德格鲁堤皆为普鲁士邦学会会员，现刻在普鲁士学会中代表东亚学术一门者有佛郎克及谬南两人——继孔那狄氏之后任者，为白锐邪特思他台（Berichterstatter）。白氏当时系在柏林大学及苟廷根大学（Göttingen）两处担任副教授，但白氏调任后，此项副教授之位置亦即裁撤。乃蒲扯邪大学之“东亚研究所”系由“文化史及世界史研究所”改组而成，自一九一三年独立，时常加以扩充，汉堡方面曾于其“科学院”之中（按即其后之汉堡大学）先设“汉学正教授”一职，使其在“东方学术”（Orientalistik）中得占平等位置，其功实不可没。佛郎克氏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之间即曾担任此项正教授之职，并组织研究所，购置大批书籍。一九二三年，柏林东方语言传习所教授佛尔克前往汉堡继任佛氏之职。一九二七年，佛兰克府（Frankfurt A. M.）大学之中新设汉学正教授一职，而以威廉氏任之，威廉氏并组织中国学院一所，系以扶植德华文化关系为责任。因为该氏之不断努力宣传，如组织讲演

会、展览会、发行印刷物之类，在社会方面亦发生巨大影响。现在该氏虽死，吾人甚望此种热心工作仍能继续进行，盖吾人与现在之新中国实有时常联络之必要。此处尚有附带声明者，即上述中国学院以及乃蒲扯邪、汉堡、波恩（Bonn）各处之大学研究所皆设有华人讲师一席。而乃蒲扯邪及汉堡两处并有正式助教之设。除上述各种固定位置外，其在荷廷根、波恩、哈来（Halle）等处大学，用“委托讲演”名义聘有教授担任汉学一科（从前海登伯格〔Heideberg〕大学亦设有此项委托教授）。在荷廷根大学中从前曾一度为薛冷堡氏（Schlenburg）设置副教授一职，旋即裁撤。其后又于一九二五年设立“特定副教授”一席，并有汉学研究所一所。其在哈来及波恩两处，则中国部系附设于东方研究所之中。维也纳方面则由“领俸教授”鲁斯体河氏担任汉学一科。为储养外务人才起见，在柏林方面于一八八七年设有东方语言传习所，其教师以富有国外经验者为准。关于汉文方面，则有阿润堤佛尔克、许来（Schüler）、纳辛诸人先后担任其职。该传习所之中，不但凭借华人讲师之助练习中国北方口音，而且对于实际事物亦有充分讲解，因此对于大学方面之汉文教育具有一种补充之域。但该传习所之教授方法终为定章所限，只以实际应用为主。因此之故，若认该传习所之练习可以视作汉学研究之初步工作，其错误正与从前妄信该传习所毕业后便对于汉文一科极有把握者相同。此外据外交部新令，既对于译员资格不再承认，该传习所方面亦当从此不能再有养成汉文继起人才之望。

“民风博物馆”对于汉学研究之人，实属一种最重要之参考材料。而一部分汉学家亦复出自博物馆人员之中。譬如格鲁白氏，则在巴斯体羊氏（Bastian）之下对于柏林民风博物馆中之东亚部分加以扩充及保管。谬南氏更将其关于宗教历史方面之材料大加扩充，并在大学之中担任佛学教授。据最近政府命令，则博物馆中亚洲部分系由扣买耳掌管，东亚部分系由纳辛掌管，训练汉学后继之人。可惜柏林博物馆中未能全力进行，因东亚部分之内并“正式助手”之职亦不准其设立故也。此外，关于东亚方面之宝贵材料在乃蒲扯邪、闵星（München）、汉堡各处民风博物馆中亦曾有之，又乃蒲扯邪博物馆中之保管委员系一位汉学家。

各处大学研究所藏有大批中国书籍之事，余已于前文言之。又老汉学家中，一部分曾在中国居住多年，购有大批书籍，回国之时当然亦将其携归。此外收藏中国书籍之处，尚有柏林乃蒲扯邪、闵星、荷廷根、波恩各处图书馆以及哈来地方之德国东方社。其中收藏最多者，实为柏林国立图书馆，收罗之宏富仅在巴黎图书馆之下，而为其他欧洲各国所不及。当二十年以前，汉学一科在德国各大学中尚未被人承认之时，柏林图书馆方面对于中国书籍即已着手为有系统之收藏，从未间断。因此现在其中所缺书籍为数并不甚多。从彼时起，该馆对于汉学人员之借阅书籍极为热心赞助。此实吾人对于该馆

以及该馆之汉文部长侯来（Hulle）所应十分感谢者也，吾辈年老之人，犹能忆及从前情形。柏林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传习所、民风博物馆各处藏有少数之专门图书。乃蒲扯邪大学图书馆因格鲁白遗嘱保存其藏书之故，具有大批中国图书作其基础，可以再行扩充，白锐邪特思他台氏近为该馆在华采购大批书籍。苟廷根大学图书馆亦有盛大之中国藏书，闵星国立图书馆既有一八三〇年老满氏及一八五八年跨推买尔氏（Quatremère）之两大收藏素负荣誉，其后又陆续采购，故现在所藏极富，倘此项收藏一旦开放任人阅览，并在大学之中设置汉学讲座，则闵星或将忽然变成汉学中心亦未可知。可惜该处宝藏未能加以利用，自一八七四年拍拉堤死后，除黑尔堤氏之短期勾留该处外，未闻闵星方面有人努力研究汉学之事。

杂志问题，对于汉学一科关系极为重要。因为中国象形会意文字决非只用字母拼音所能满足，必须将原文印出方可。吾德缺乏中国铅字，实为汉学研究之最大障碍。因此遂不得不限于纯粹语言工作。《东方语言传习所年刊》（国立印刷局曾为该刊特制中国铅字若干）为德国汉学界之言论机关，其中曾发表不少重要文字，但受该传习所之惯例限制，不能不偏重实际应用方面。与该刊先后同时发行者，尚有在荷兰乃登（Leiden）地方刊行之国际专门杂志，名为《通报》（Tóung一Pao），其编辑所系在巴黎，为主持汉学坛坫之机关。黑尔堤氏曾在该志创刊之时发表文字。自欧战以后，德国方面深觉有自组机关发表文字之必要，《东方语言传习所年刊》一种实嫌不足。最初乃由素以研究美术为主之《东亚杂志》出填其缺，但其后该志因与汉学家不能长久合作之故，仍复专门从事美术文字。至于真正汉学杂志，则当推辛德莱氏（Schindler，为孔那狄氏之弟子）一九三二年所创办之《全亚季刊》（Asia Major）。吾人对于该刊在如此困难年头尚能继续维持出版，必须十分感谢，而且该刊实为吾德汉学界唯一无二之议论机关，因此该刊继续出版一事，吾人万不宜加以漠视。此外，《普鲁士学会会报》之中亦曾有重要汉学文字之刊行。又汉堡大学对于本校教授之大部汉学著作亦曾出力助其刊行。

上面报告，系在说明德国汉学历程正处于分工时代，其所作“零碎工作”不易引人注意，此外并说明德国汉学之初兴也如何困难，以及近十年来所种之危机如何挽救。吾人今日所处地位，恰有如谢乃甘（一八九四年）为喀伯冷词氏所发表之殁后哀启所言（但其所言，对于奥大利情形可惜不甚恰当），此后严格工作之人日益减少，实为势所必然。以今日之情形而论，实非对于久而且难、收获甚迟的学术加以研究之时。但在他方面，德国关于汉学之成绩，在此经济难境之下，一与外国相较尚不十分恶劣。最关重要者，现在国内少数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之人担任。最近十年之内将有一批汉学生力军开赴前线，吾人希望彼等甚能效法前辈，如德国汉学界近五十年来所产生之模范人物也。

（上海《新中华杂志》）

四十八　中国美术展览会

中国人在国际间之地位，被中国政府丧失了一半，被外国博物馆又送掉了一半。何以言之？中国政府虽坏，然知之者尚仅属外国上流社会阶级，究居少数；而外国博物馆之陈列中国各种丑相秽事，则普及于一般人民，妇孺皆知。吾人平居自命为“礼乐之邦”，其实在外国人眼中看来，简直是半开化民族。在德国各地除历史、美术、科学、交通各博物馆外，尚有所谓“民族博物馆”，此种博物馆专为陈列非亚澳三洲（间或包含美洲黑人）各野蛮民族生活状况之用（日本亦包含在内，但是没有俄国）。大约此种博物馆之陈列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非洲黑人及南洋群岛土人之生活状况，此所谓未开化之民族也。第二类为亚洲黄人之生活状况，如中国、日本、印度、安南、波斯、阿富汗之类，此所谓半开化之民族也。大约关于中国人方面之陈列，例如抽大烟、砍脑袋、拖长辫、包小足之类最为普遍，几乎无一处民族博物馆不有此项陈设。其关于日本方面之陈列，则多是击剑、决斗、剖腹、自杀之图。总之，德国人一览中日两民族生活状况，其所得印象，对于日本则但感其“怪”，对于中国人则直觉其“丑”。因而德国一般人民对于中日两国人虽皆以“非我族类”视之，然对日本人则尚有畏惧之心，而对中国人则无处不表示其轻视之意。此皆为民族博物馆所引起之心理作用也。

荀廷根中国学生会有鉴于此，欲谋挽救，由该会会长魏嗣銮君与该地国民教育所商议，能否开一讲演，以谋中德民族之相互了解。国民教育所正欲讲演中国风俗人情以晓国人，于是大为赞成，且愿代制幻灯照片以助讲演之用。计所制照片，言中国文字者五张，言中国衣服者四五张，言中国房屋者五张，言中国耕种者四五张，约共二十六七张。由魏嗣銮君讲演。惟该会会员以为仅是口头讲演而无实物指点，殊不足以改正德人观念，遂决计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初犹欲小做，继知德人对此有兴会者甚众，乃放盘做去，派人前往各城友人处借贷中国物品，结果共得二百余件，由 Hannover、Dresden、Berlin 各地寄往者尤众。其种类为绣货、瓷器、绸缎、古铜等件。德人见者，无不惊叹不置，谓为有生以来所未见，并临时有德国女子二人愿借中国衣服一试，当时即由该会会员为之穿带一切，拍照一张以留纪念。光艳夺目，欢迎若狂，盖不胜其羡慕之情矣。

该展览会共开四日。第一日专请该处大学教授及其家眷，计划到者约有百余人。第二、三、四日卖票，每人三个马克，惟大学生有证券者可以免票。计一连三日，来观者不绝于道。当开会时，每处陈列皆有中国同学招待，并加以指点说明。更有同学数人当

场写字，以说明中国用笔用墨之情形，德人见者极为赞美。盖东西文化不同，民族习惯当然亦随之而异；吾辈若以习惯异点相示，本不足耻，惟丑态则不可不注意耳（吾辈在此每向德人辩解，谓中国自革命以后即无小足长辫。然往往辩解未终，辄有中国拳师在此处卖艺，专从长辫小足上玩各种戏法，以博众人之彩。真是令人自己打嘴，欲哭无泪。同时日本人之在德国卖艺者，则无处不与德人争胜，譬如德人能跳高一丈者，日人则必跳高一丈一寸，以求胜过，而且大闹大舞，无处不表现其怪相。而中国人之玩戏法者，则无处不暴露其丑态。盖日本人所欲示人者在其异点，而中国人之所以示人者则其弱点耳）。此次开会共费数万马克，每人平均负担六七百马克。所费时间尤为不少，譬如事前事后，取物还物，往来奔走，无半日暇。在开会之地，复因贵重物件过多，恐有遗失，各同学轮班守夜，未常合目，其所费之劳力当为何如！惟劳力所费虽多，然因此争得几分民族光荣，所得精神快慰，亦复至为深大。会毕之后，同学高兴逾恒，遂大饮特饮，不觉酩酊，结果打坏酒杯两个。盖世间最快乐之事，固未有逾于为民族或恋爱而牺牲者也，人世之上，只此两事殊足令人生之死之歌之哭之，其他富位势厚，皆过眼云烟耳。

惟此次有一不幸之事，即开会既毕，由保险公司将各物寄还原主，竟遗失银杯一个，过期始发现。保险公司不愿任赔偿之责，现该会正请律师与之交涉也。

今年春季，记者与魏嗣銮君等会商中德文化研究会进行事宜。记者曾主张请托国内商务中华两家代制幻灯照片若干，其法先将中国人之衣食住及其他冠婚丧祭各种习惯与夫美术、史事、各种胜迹制成照片，用历史的眼光加以系统的说明。譬如中国人之衣服，在上古中古为何如，在近世（如满清时）及革命以后又何如（此种照片，可用伶人装办），由此类推中国人之饮食住居等等（此种照片，例如描写上古住居，则可到山西等处穴居人家摄影，一直进化到现在之半中半西房屋），皆可设法制成照片，再将说明书译为简短明了之英法德文字，由商务中华印就，送交各国留学团体。其照片分为二种：其一种则制成“斗方”样式，用精美镜匣装璜，由公使馆及其他团体与该国政府交涉，请其饬令各博物馆将旧日陈列撤去，换以此种照片；其他一种即制成幻灯照片，由该国各留学生持往各城讲演。其有益于中国人将来在国际上之地位，当属不少。吾相信此种照片，无论上自大学教授，下至乡曲贩夫，皆莫不以先睹为快。盖中华民族者，历史的民族也，进步的民族也，世界四分之一之人类也。长辫小足固极可笑，然吾人若以历史眼光观之，不尤愈于古代之披发文身乎？中国人共食制度虽不合卫生，然不尤愈于古代之茹毛饮血乎？中国人住室虽湫隘卑陋，然不尤愈于古代之穴居野处乎？故一切丑相秽事，若以历史眼光视之，则无不美术化，且表示中国民族正在进化长途之中也。盖中华民族为世界人类中成熟最迟之民族也，惟其成熟较迟，故愈能负重致远；与彼欧美

民族之成熟太早、少时了了者固大异其趣矣。吾不知商务中华两家，能为中华民族一挽回外国博物馆所送掉之人格乎？如果有此宏愿，则关于制片计划，译为英德法各国文字，相约各国同志讲演诸事，记者当一肩负之也。此种事业若在外国政府，当不惜掷数千百万金钱以为之，方今吾国昏迷沉醉不省人事之政府，当然不足语此。吾所希望者，即吾一般国民，每人皆有急起直追之责。不知国内教育界出版界国外留学界诸君，亦有以记者之言为然者乎（上项照片并可用之于国内通俗讲演，使国人知物质生活进化之程序，以促进其生活改造之思想，其有益于教育当亦不少)？

（上海《申报》）

四十九　德人对于中国绘画之批评

今年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四日，柏林方面，由中国政府、东亚美术学会、普鲁士美术学院三方合作，在普鲁士美术学院之中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之几近十万，售出名作约有五十帧。当柏林展览开幕之后，各种报纸均有评论。德国报纸中美术一栏向为该国美术学者所主持，换言之，报中评论颇足以代表德国一般美术专家之意见。兹特选译数种，以供国人参考。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王光祈识于德国莱茵河畔波恩大学

一

普鲁士美术学院陈列室之中，“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于星期六日开幕，列席者有中国驻德公使、德国教育部长鲁斯堤（Rust)、东亚美术学会会长索尔夫博士，以及其他中国美术界外交界名人、柏林社会上艺术界之第一流人物。

此种由中国政府促成之展览大会，包罗二百七十余幅中国现尚生存或最近亡故著名画家之名作，实为柏林艺术界中一种重要事件。盖德国方面如此规模宏大之现代中国绘画展览至今未曾有过也。

在一九二九年之际，吾人在此陈列室中虽曾有过机会得窥中国古代美术，其中主要部分计有瓷器、小雕刻、漆画等等。当时此项展览，颇引起吾人希望对于中国现代绘画亦有赏识之机会。

在德国方面，我们最能了解中国美术之学者，如索尔夫博士及扣买耳（Kummel)

教授等，对于此次陈列一事极为尽力，而此项展览因以告成。内容丰富深邃，可使吾人对于中国现代绘画，得一明了印象。

吾辈欧人对于此种绘画，深觉其表情之温柔与细致，十分巧妙。但吾人对于此种巧妙，只能用心领神会之法以了解之，若用理智评判，势将无从着手，因此处系另一世界故也。又此项墨绘所含之深厚思想与情感，或在仅仅几笔花枝之上，或在一张山水风景之中，吾人如欲真正了解，势非具有中国人之眼光与思路不可。

我们欧人对于向来所用评判欧洲绘画与其体态之标准，必须加以根本放弃。绘画一道，在中国人生活上及思想上所处之地位，迥与欧洲不同。彼另有一种生活背景，另有一种特别作用，此事吾人可于中国画家所用画具以及中国绘画应用方式之上显然窥出。

中国画家所用之工具为笔与纸（或丝轴），正与中国人书写所用之材料相同。中国画家是“写”图，中国观者是“读”图。中国画家并不欲绘一欧人所谓规模宏大之图画，亦不欲特为一种目的而绘画（例如西洋最高名画之中，亦无不有所为而作），乃系自将本人深思之结果用笔将其录记下来而已。彼但将一种思想，一种情感，表示于一朵莲花、一根竹竿、一张山水之中，以作其象征而已。

中国画家最善于抽象的图写，彼之画品与彼之字迹，其本质可谓彼此相同。因此在中国方面，绘画与诗词系立于同一阶级之上。在事实上，中国最著名之画家，同时多为最有名之诗人，直到今日犹系如此。节奏与感觉，为中国绘画之基本原则。《中国绘画展览会说明书》之卷首，对于中国绘画体质之解释，曾有一语极为扼要：“形态愈简愈好，思想愈深切愈好，是为中国绘画之根本精神。”

此外，关于中国绘画问题，关于中国人对于空间之特殊观念，关于中国人聚精会神之特色（此种特色，系由佛教及好寂观念所养成，在其书法笔势之中最能充分表现），尚有许多可以讨论之处。但吾人对于上述各点，均可直向此次作品自身之中求之。盖此次作品极能表示现在中国画家不受欧洲文明之诱惑，而以保存中国绘画特质为其重要使命。

此次展览会中可谓美不胜收，陈列之宏富令人难于一一提出讨论。而且各位作家属于何种画派（文人派、画院派、仿古派、折衷派），对于欧洲参观之人亦复不甚重要，因为此种画派之概念，只能用中国式观察之法始能了解故也。此外，《展览会说明书》中对于各种画派，亦曾有详细之解释。

如欲举出数种作品为例，则丁云轩所绘娇嫩无比之小鸟，刘海粟、潘天授[1]、吴茀之、叶少秉诸人所绘宽松飘逸之花草，以及余绍宋、吴湖帆诸人所绘远望无涯之山水，皆系一种名作。（本文作者 Robert Scholz）

---

① 潘天授：即潘天寿，潘天授为其早年之名。

二

中国之"有形艺术"（Die bildende Kunst），尤其是绘画，系一种"国家艺术"（Staatskunst），为数千年来传统思想所束缚，其唯一趋向即艺术作风之永久保存，遗传形式之遵守不变，发扬国粹之特别使命，实远较作者个性之自由发展为重要。此种艺术可使全国美术信仰达到某种高度，可使一种民族之宗教的、文化的、政治的生活为之增高，并将其精神表现出来。但在他方面，假如遗传形式之束缚力过大，则一般生于"艺术盛代"以后之美术家，无法将其个性表现，而一国艺术遂不能不陷于僵势。吾德人如欲了解中国近代绘画，则必对于东亚文化之特别规律、中华民族之特殊作风时常放在眼中方可。中国绘画之基本原则，其成立早在西历纪元后一千年左右，直至今日犹为中国画家所笃守，以御欧画东侵之势力。因此，中国绘画之严格风调，吾人初次见之甚觉特别异常，并常有过于单调之感，但在实际上乃是一种文明古国丰富美术之真实表现。凡欲往观普鲁士美术学院中新开之"中国现代绘画展览"① 所表示之海外特别文化者，必须先将我们北方民族向来所用之美术赏鉴标准放在一边，只用一种"原始感觉"以赏识中国现代绘画，当极有益。

此次陈列，是由中国国民政府、东亚美术学会、普鲁士美术学院三方共同主持，此实为中国近代美术生活大规模的初次陈于德人之前。此项陈列将美术学院之全部房屋占尽。而委员会诸君，更能使西洋房屋一一适于远东美术之陈列。中国绘画向来不用镜框（此与日本绘画不同之处），因此委员会诸君乃用若干木条嵌于壁间，使全室隔成许多段落，以免各种作品界限不清之患。

第一陈列室中所悬诸画，略有欧洲风味，其意在使参观之人由此渐渐达于纯粹中国作风之境。此种作家类多趋向写实主义，按此项主义在第十八世纪之时中国方面即已有之。该室之中只有一幅绘画系工厂烟筒林立，表示近代中国实象，画师为黎雄才，绘于一九三三年，名为《珠江之上》。在此室中尚有高奇峰之狮子一幅，系绘于一九二七年，此君为中国画家中最富于天才之一人，不幸于来德之前亡故，使其丰富艺术创作生涯为之断绝。

倘若吾人再向各室参观，则初入其间之时，顿有各种画派自成一家之感。而在实际上，中国方面亦确有南北两派之分，其成立之期已早在唐朝。北派要点在于形式之严，南派特质在于平面之象（Flächenhaftigkeit）。中国人以为，北派乃系画工，南派则为文

① 据前文，应为"中国近代绘画展览"。

人学士之作品。由此两种大派又进化而成各种小派，即文人派、仿古派、画院派、写实派是也。

吾人观察中国绘画，必须知道，中国画事已有一千余年之历史，以致中国绘画面目别具一种风致。中国画之价值，不仅在形态美丽而已，尤其重要者，为“气韵”一事。此二字定义，颇难注释。中国人或解为“生动”之意，换言之，即画家之感觉与性质。“气韵”乃是天生，非学力所能为。

中国画家之材料范围极为有限，只有山水、花鸟数种，而在此数种之中，样式亦复不多，永远是荷花、李花、松树、竹子之类。（本文作者 m）

三

此次普鲁士美术学院中所陈列之古国新画，将近三百幅之多，吾人必须加以综合观察方可。此种陈列，不应仅仅视作绘画展览，而宜当作一种远方幻境之特别旅行，当作一种神妙童话，当作一种山居野趣。恰恰此种沉思的、宁息的、安慰的智慧之印象，恰恰此种安静和平之感觉，最使参观之人有如身入异境甜蜜空气之中。挤满壁间之画上人名，何关宏旨？吾人必须凭空想像，对于每幅图画，仿佛皆筑有一种专室藏之，吾人独居此室之中，日与该画幽然相对。只有此种办法，或者能将东方精神领略一点。

或者只能如此！因为吾人对于此种东方精神之表现，实无何种其他方便门径、捷近道途将其领略。吾人观察此种绘画之时，总是用我们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眼光——此外亦实无其他办法——但是吾人安知，中国人所谓“美”者何在？所谓“丑”者又何在？即或吾人能将各种天才作品略为评判，但吾人对于此种天才作品，又安能将其解说或估价？虽然吾人对于上述种种，似亦无加以顾虑之必要。假如有人必欲对此仔细研究，则请阅展览详细说明书中之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此种中国古谚至今犹能保持其效力，但同时中国艺术一道却因此一语负担一种重大责任，获得一种重要地位。凡曾行过万里路，对于自然界曾有确切认识者，则始能将此自然界绘出；凡曾读过万卷书者，始能发生理想，寻得韵调之泉源。如此，吾人然后始能慢慢前去参观各种芍药、锦葵、芭蕉、松树、水仙、菊花以及鶺鸟、翠雀、海虾、金鱼、老虎、归家畜群等等，到处都是山水风景，一种东方式奇异特别之山水风景，观者如身临其中，永远是山峰瀑布花草树木等等。但是如能观察稍稍人微，则无不惊其作品变化之丰富，因而领悟中国古语所谓：“画山水，只能由内心绘出，不能向外面模写。”盖画家必须长久期间静观急波大浪、秋日深林，俟其确有心得之后，始能握笔挥毫，写其神意。此种作品之中，或者尚

深为传说[①]所束缚，或者比较自由一点，尤其是近代作家逐渐趋向开通一途，但其根本区别，彼此均不甚大。

山水之中，人物甚少，即或有之，亦不甚重要，从未见其有所作为。可以说此种人物乃是“大风景”中之“小风景”。譬如图中绘一饮者，正将其杯幽默的放在口边；又如图中绘出画家王冕正骑牛渡河，彼坐在牛背之上，手执树枝鞭子，静阅书籍，意态十分闲逸，遥有晚山小舟相映。此幅作品，并非成于古代太平之日，乃系去年所画。此事对于我们欧人，简直是一种不可思议之大谜：中国为内乱外患相逼之国家，而此种骚扰却未曾一毫侵入神圣艺术界中！中国艺术进化业已数百余年，在此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中，有时繁盛，有时衰落，造成一种永久的起伏现象。吾人不知此种现象，究系一种僵势？抑系一种大智？（本文作者 F. A. Dargel）

四

近数年来，吾人曾在此地常有机会得阅东亚美术，尤其是中国美术。在近代中国画家中，对于西洋画师观察禽兽山水之法，虽亦间有心得，然就大体而论，此种模仿欧风之尝试可谓完全失败，中国数千年来之精神终是保存不变。中国之理想，不在剧烈进化一如欧洲（欧洲因此种剧烈进化之故，曾成就许多伟大作品，直至今日犹陆续成就不已。但其结果却使人心日益不宁，生活日益复杂），而在古代老子学说（老子是《道德经》之作者）。此种学说系主张绝对保守，扫除物欲，颇与希腊坚苦淡泊学派（Stoa）之主张质朴知足寡欲无为者相似。

中国美术即系此种无为学说之部分表现。中国绘画之中无所谓热烈剧情，无所谓极端相反，无所谓明暗相斗，只是一种沉思的、静雅的，细致体贴自然，以写其不可言传之意。赏鉴近于女性，常偏嗜深永谐和之笔，是即所谓“气韵”，乃系一种天生的。中国画家所绘之物，并不求其处处逼真，亦不愿将其全部画出，只是略写其意并佐以诗词而已，最喜“意到笔不到”，换言之，只要意到即可。

因此之故，中国轴画之外形，无论其为墨描抑或淡色所绘，正与画中内容相似。永远是山水风景，花枝点缀（间或有鸟，间或无鸟）。小鸟乃系花草之精神，从渺小鹑鸟以至报晓雄鸡皆然。除鸣鸟之外，尚有水中哑鱼，垂钓之事盛行，正与法国相同。此种哲学的、幽静的钓鱼游戏，可以引起诗意、发明哲理。在《展览说明书》之序文中，将中国近代绘画之本质详细解释，分为文人派（自后汉张衡为始，以精神为重）、画院派

① 传说：应为传统之误。

(自第十世纪起，以形式为重)、仿古派（以模仿古人笔法为能)、折衷派（近于实写）四种。但此项分别对于我们现在来观之德人，却只能略会其意。盖画家个性，终属要素，在中国人眼中或者感觉各画内容变化多端，而在我们欧人观之，则只觉其彼此外形略有相似之处而已。此固势所必然，无须惊异者也。

吾人既非赏鉴家，亦非汉学家，乃是一位普通参观之人，对此数百幅图画，所得之印象良劣不一，因据此以为评判。至于画派之分别，只能算是第二等问题。因此，余只就各图之内容与画法最足以动吾心者，举列如下：张书旂之《飞雁》及《葵花牝鸡》，张大千之《王冕骑牛读书》，上海张聿光之《陶渊明赏菊》，广东赵少昂之《荷花金鱼》，郑曼青所绘极为细致之《海虾水萍》，北平齐白石之《松鹰》及《葡萄》，诸健秋所画十分娇小之《河中濯妇》，广东方人定之《归家畜群》，何漆园之《沉思》，谢公展之《荷池》及其题句，许征白所绘略表大意之《钓者》，徐宗浩所绘从容思索之《老子》，写实派高剑父之《山寺晚钟》，黎雄才之《长江之鱼》及《珠江》(珠江之旁，有烟筒林立)，刘海粟所绘之《落雁》，苏州陆一飞之《山茶花枝上之鹦鹉》及《松鼠葡萄》，沈迈士之《秋林散步》。

最能使余发生玄想者，实为沈子丞所绘极为优美之《露中林径》，南京唐三所绘十分简朴之《花间蝴蝶》，狄平子所绘情景深永之《晓风帆船》(其上有诗二首)，曾丽卿所绘极为秀丽之《孔雀与凌霄花》。此外，余再举汪仲山之《归家樵夫》(系画在绢上)。吴茀之之《寒鸦》，吴文质之《峡中松树》，女画家余静芝所绘十分柔嫩之《女子》(是用墨及淡色所画)。

在已故之画家中，则有郑叔问之《饮马池》，姜颖生之《春游》，黄山寿之《菊与鸡》，任渭长之《鸭与百合》，翁印若之《广西独秀峰》，南派吴窗斋之《两人观雁》。中国作家喜将画中前后层次用“叠列”之术以代远景写法，甚为幼稚，其内容材料亦复异常单调，易使吾人眼倦。中国绘画过于沉静，吾人对于此种与欧画最重活动之相反趋向虽极了解，但此种偏重沉静，实为欧洲画家早已经过之阶级。中国绘画之最爱零碎的描写自然界中之细节小事，实非吾人所能尽解。此种默思习惯，吾人业已丧失，只能于最短期间中，偶一回忆而已。中国美术为过去历史所束缚，对于生活之变迁不常，只认为过眼云烟，不足留意。而不知此种变迁不常之生活，正是人生之秘密，不过常以“人”为主体而已，在此瞬息流光之间，亦自有其美丽动人之处。总之，中国势将永远如昔不变：沉静，聪明，面带笑容，一如彼之大哲老子。(本文作者 Paul Friedrich)

五

本志曾屡次提及之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中所开之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已于三月四日闭幕。此次主持其事者，中国国民政府、柏林东亚美术学会、普鲁士美术学院三方，对于此次展览之结果当可十分满意。所有德国报纸对于此次展览，无不致其赞美之意。报馆主笔都能弃其成见以领会东方精神，尤其令人惊异者，中国美术意旨极与西方异趋，而竟能获得此地一般群众之了解，有时此等群众了解东方美术之程度，更往往比较专家为高。此次参观之人约有一万三千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更前后来观数次，其求知欲之大，可见一斑。而订购作品之人尤属不少，先后售去五十余幅，向使其中一部分名作可以任人购买，则售出之数当不止此。譬如苏卧龙之《紫藤花下之游鱼》，黎雄才之两幅山水《扬子江之鱼》及《珠江之上》，询购之人每日皆有。此外如叶少秉之《雨中荷花》，齐白石之《葡萄》，一定可以售出多份。最使人注意者，此项购主只有一小部分系柏林居民以及所谓知识阶级，此次对于中国美术最为崇拜者，乃系日与自然界接近之乡民。余在此处特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德国的将来》所发表之通信一篇摘录如下，因其最能代表此次大多数参观者之意见故也。

“余可向君保证者，即此次极不常见之东方展览颇使一般乡间之人（当然是指一般具有美术眼光及赏鉴能力者而言）深为触动，最感亲切。远较对于一般‘未来派’之德国都市美术作品专以损伤自然感觉、表示扭折病象为事者，所得印象为大。

“第一次余往参观，毫无预备。既无说明书，亦无同伴。逗留于此温柔画乡者三钟之久，有如身在梦中。余因念世界之上尚有此种较善之乐土，一种高尚纯洁之乐土，为吾国一百廿年前各大诗家各大美术家所悬想者，今日犹有此种乐土！现在外人虽日以炸弹相投，意欲消灭此种世界，但此种世界却仍依然生存，而且怡然自得。余甚欲前往中国一行，得向华人学习。因彼辈甚能领悟万物谐和之道，并用一种妙法，以使吾辈外人亦得会通其意故也。第二次参观，余有一女伴同行。该女士系来自乡间，未尝学问，非如余之以画为业者，但善于领悟与感觉。彼对于此次绘画展览，亦与余所得印象相似。第三次与余同往参观者系一乡下男子，曾参加欧战，并喜收藏新旧名画。此次参观，其一种狂热崇拜之情亦正与余相同。向使彼之经济充裕，则此次陈列各画，势将为彼购去一半。此君本属国家主义派，对于外国作品向来反对，然而对于中国绘画却有此种深刻印象。尤其是山水作品，最使吾人心醉。一种庄严的、动人的、确切的、柔嫩的画线，与夫强弱远近的表示，曾使吾人心弦为之共鸣。我们人类在大宇宙中所占地位，如何渺乎其小，我们人类在大宇宙中所占地位，如何中节合拍。

“吾辈得阅此次展览，心中甚为感谢。余之戚友系为‘绿星期’来此（译者按“绿星期”系德国一种“农事展览会”），余则家居柏林，经历不少。但余所喜游者，仍为山谷草地。其后，余因念此次绘画陈列，实使吾辈欧人惭愧，盖吾人早已成为高尚思想与优美世界之刽子手。吾人并曾身先作则，如何炸毁他人之万年文化，如何消灭他人之宝贵生活。”

在事实上，此次陈列各画，几无一种是取材于现代事实，岂非令人可异？吾人试一回思欧洲任何一国艺术，往往只须将其画中材料一看，即可判定其成立时代，而此次中国绘画陈列之中却不如此。吾人日在报张之上尝见中国方面各种政治的、工业的、精神的革命消息，而中国美术——至少就其取材而言——却未曾丝毫受其影响。其所取材大部分为自然界现象，为吾人所日常经历者。此种材料之入欧洲画界何等迟晚。当中国之山水花草虫鱼鸟兽各画业已独立发展之际，而其时西洋画界并山水花草作为附带背景之事亦复不知。此种逃出现在环境，沉醉于永久自然之美，实为中国美术最能吸引西人之处。

中国绘画材料之范围甚为狭窄，中国画家对于环境事物并不一一形诸笔墨。其所取材皆有一种象征古义，皆与彼之思想情感密切有关。山水乃是厌弃城市生涯之隐者环境，并表示人类与山岳、瀑布、湖海、江河相较如何渺小。因此中国山水画之中，山水所占地位甚大，而其中人形仅如昆虫或小点而已。至于植物，则永远是荷花、竹子、李子、松树，皆有一定象征，惟本文篇幅有限，不能详述。就材料范围而论，似乎中国现代绘画反较中国古画为狭，譬如中国古画，属于人物仕女者不少，而此次陈列之中，其以人为中心之画图，尚不到半打之数。

中国现代画家对于绘画工具一事，正与对于绘画材料一样纯系遵守旧章。中国画图皆是一种可以卷裹悬挂者，或用墨，或用水色绘于绢上或纸上，尤以画在纸上者为多。画上题句极占重要位置，往往占去画上许多地方。此处有一事可令吾人注意者，即现代日本绘画虽亦遵循古法，但对于装置及题句等等却另辟一种途径。日本画图近来颇喜用镜框装置，惟不与欧洲全同。日本画家能使挂图材料之支配恰与镜框相合，画上题句已不占重要位置。而作书运笔之法，在近代日本绘画中亦根本上不似前此之重要，其取材范围亦已不似中国之狭。至于中国现代绘画，正与该国古画相同。吾人如欲了解，必须先知中国之书法与画法有密切关系，书与画只算是一种同根之枝。因此画上题词内容不一，或为画家自题，或为友好所书，或为诗人题句，或为名流手书，要皆足以表示书与画之如何密切。

现代中国画家虽谨守古法，但吾人却不可误认中国现代作品只是一味呆仿古画而已。有许多过于聪明之人，往往以为中国近代作品只是一种模仿古画之劣品。中国古画

之价值，远非近画所能比拟云云。此种批评未免过于容易与浅率。诚然，中国近世代表作家亦不能上比宋代作品，但其不及之程度，亦正如德国近代画家作品不及古代丢尔（Dürer）、何尔本（Holbein）、格吕乃瓦德（Grunewald）三氏之作品而已（译者按：三氏皆德国第十六世纪之大画家），吾人于此实不应强分优劣，只宜论其彼此相异之点。此外，中国现代画家之目的亦与古代不同（当然只就传统画法可能范围之内），东方绘画作风之时代，远不如西洋作风时代划分之显然。而事实上，东方绘事所用之工具，亦远较西洋为温和，为简单。中国近代绘画亦自有其目的与表示方法，但必须对其作品详细加以研究者始能发觉。余意并不专指西画所引起之影响而言。中国近代绘画家之受西画影响者，尤其是此次柏林陈列所中第一室内所悬之作品，并非今日始学自巴黎、柏林。盖在第十七第十八世纪之时，中国、日本画家对于西洋“远景画法”（Perspektive）及人体研究之明暗问题，即已着手讨论，因此，现代中国绘画关于此类问题亦自有其数百年来之历史可据。而事实上，近代画家之中亦有一部分加以采行者。但欲此种作品获得效果，则东方原有意志却不可加以根本取消。假如旧有笔法完全放弃，全纸皆为墨色与颜色所绘满，则向来作书运笔之法不复存留，所画虽极动目，但吾人却不能称之为东方绘画矣。此次柏林陈列所中高氏兄弟（译者按：指高奇峰、高剑父两人）以及黎雄才诸人之作品最能引起观者赞美，盖能于中国本体之上而著以欧式装束，最使彼等注目故也。但此种作品中所含之中国精神却已微乎其微，关于离世思想、了解自然两点虽尚保存于画中，但所用工具却大部分采自外国。

在此次展览会作品之中，有两种大趋势颇为显然。其一，为西洋式之写实主义；其二，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画派”。但在中国方面，因特别缘故——请读展览会之说明书——此派被称为“文人派”，除此之外尚有第三派，属于仿古、折衷一流。其在中国方面则被称为“画院派”或“仿古派”，此种画派，在中日两国方面殆无时无之。盖远东方面，一种作风发明之后，往往永远不再淹没。画师之最高理想只在追踪前代名家，不惜笔笔模仿，在此次展览会之中，有许多作品是直接模仿唐、宋、元、明各代名画。中国人对于此种追念前辈之事特别有趣，而吾辈欧洲人对此则不甚感着兴味。又中国方面用西洋油画方法及材料作画之举现亦甚为流传，但本文之内不欲对此讨论，因此次陈列作品之中未有油画，亦不应有油画一种故也。

中国尚未达到太平之境，博大之中国现又陷于不安之状。中国数百年来之各种观念，现皆一一毁破，而西洋之科学及工艺却大奏胜利。但中国人之精神仍是旧精神，依然存在未灭。盖绘画为最能表现中国精神之作品，现在犹能保存其创造特性，向前进化不已。吾人甚望其能由固有之深厚根基永远继续创作。（本文作者 Wm Cn）

（上海《新中华杂志》）

壬　青年运动

五十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①

一、青年运动之派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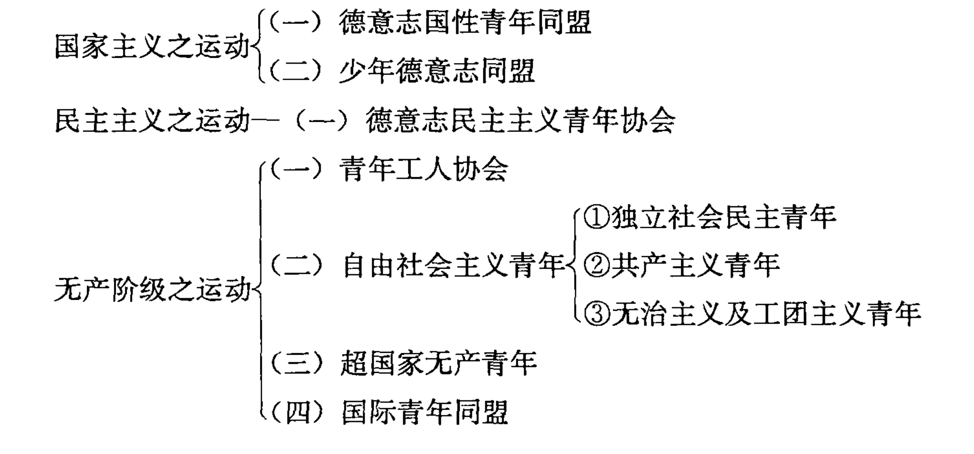
何谓“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青年运动者，“青年自己训育”（Lelbsterziehung der Jugend）之意也。与“青年培养”（Jugendpflege）一字不同，青年培养者，青年而由前辈加以训育也。更与“青年保护”（Jugendfursorge）一字不同，青年保护者，社会对于失教之青年，组织特种机关，而加以管理训育者也。若以德国为喻，则“自由社会主义青年”（Die freie Sozialistische Jugend）、“自由德意志青年”（Die Freideutsche Jugend）两种运动，可以称为“青年运动”，反之如“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Der deutschuationale Jugendbund）、“少年德意志同盟”（Jungdeutschlandbund）、“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Der Reichsdund der Deutsch demokratischen Jugendvereine）、“天主教青年男女协会”（Dir katholischen Junglings und Jungfrat envereinigungen Deutschlands）、“青年工人协会”（Verein Arbeiterjugend）等等，则属于“青年培养”，至于社会上所设之各种救济失教青年机关，则又当列于“青年保护”一类也。观此则知凡由政党或教会所组织之青年团体，专以制造该党或该会人才为目的者，只能谓之为“青年培养”，不能谓之为“青年运动”；若对于失养或失学青年，偶然做两桩慈善事业，设几处补习学校，亦只能谓之为“青年保护”，不能谓之为“青年运动”。所谓青年运动者，必须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倚赖过去人物，自行组织，自为训育，以良知为本，以真理为归，超然独立于一切政党教会之外者也。惟吾此次通信，意在综述德国全体青年活动状况及其派别，故篇中所谓“青年运动”，系兼指上述之第一种“青年运动”与第二种“青年培养”两项而言，以便于作概括的观察，为统系的论述，虽略背“青年运动”之义，当亦为读者诸君所不责也。且自欧战以还，德国一部分属于“青年培养”性质之

① 本文写于1923年2月，原载于5月24至7月6日的《申报》，后全文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五期。

团体，亦渐渐趋重“青年自决”一途，摆脱前辈势力范围，故记者列之于“青年运动”一类，亦尚去题不远也。德国无论何种运动，何种党会，莫不有其特定目的，而且此种特定目的，往往标题虽极简单，而工程却颇浩大，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收功竣事，于是不能不培养继起之人，为陆续奋斗之谋，所谓各党之青年运动（广义的下仿此），遂亦从兹兴焉。譬如德意志国性民党，主张国家主义，帝制主义，排斥犹太人，压迫劳动党，与彼声应气求之“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亦以此四种主张为号召青年之具，虽在此共和政体之下，其鼓吹帝制如故也，虽值此左党势盛之时，其排斥工人如故也。近年德国迭出暗杀左党首领案件，其凶手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有关，其运动之热烈，可以就此窥见一二矣。又如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社会主义，反对军阀政策，孤军转战，不屈不挠，战后皇室虽已推倒，工人虽亦得势，然左党激烈一派仍认为未足，更思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于是与左党一派志同道合之“青年工人协会”、“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超国家无产青年”（Die übernationale proletarische Jugend）、“国际青年同盟”（Der internationale Jugendbund）常与右党一派之青年运动立于反对地位，每次右党青年有所行动，左党青年亦必同时举行示威，以为抵制，此专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也。

德国自皇室推倒左党勃兴后，宗教势力渐就衰微，惟德国教会则始终雄心不死，仍欲于青年思想之中播下几许迷信种子，在旧教中则有“天主教青年男女协会”，在新教中则有“基督教青年协会”（Christlichen Vereine Junger Manner）、“德意志青年协会”（Der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在犹太人方面为抵抗德国右党及扩充犹太教义起见，则有“德国犹太青年协会”（Verband der Judischen Jugendvereine Deutschlands）之组织，此又专就宗教运动方面而言也。

除政治及宗教之青年运动外，尚有一种青年运动，其目的专在人生真义之追求，或性格身体之训练，如“自由德意志青年”是也。兹将德国各种青年运动，列表比例如下：



各种宗教之运动
- （一）天主教青年男女协会
- （二）基督教青年协会
- （三）德意志青年协会
- （四）德国犹太青年协会

自由青年之运动—（一）自由德意志青年
- ①游鸟运动
- ②寻路运动
- ③食素运动

二、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

德国自革命以还，内则左党骤占优势，外则协约严防复辟，因此之故所有从前帝国时代之军阀官僚，多被屏斥，此辈既失大权，又遭疑忌，报复之念，未尝或亡，加以战后外患日迫，内忧孔多，抚今追昔，感慨尤深，于是号召一般不得志之徒，结为党援，以推翻政府，恢复皇室，抵抗外患，重建祖邦为职志，如德意志国性民党是也。该党深恐一旦老成凋谢，继起无人，欲于青年界中，预辟将来途径，遂有所谓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发生。故吾人若一考察此种运动之由来，与其谓为“青年运动”，不如谓为“运动青年”，盖青年系处于被动的而非自动的者也。至于此种运动之实质，纯系一种爱国运动、政治运动，与吾国之五四运动相同，其不同者只复辟一点而已。

德国关于此种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约分两种：一为公开的，如“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及“少年德意志同盟”是也；一为秘密的，如前次暗杀德国外交总长那提老之秘密机关（Organisation Consul）等是也。惟此种秘密机关之党员，往往与上述两种公开的青年同盟有密切关系，而上述两种青年同盟又与国性民党有密切关系，此所以每次暗杀左党首领案件发生，左党之人皆谓右党为其主谋也。若在吾辈旁观人视之，则公开的青年同盟，其作用在宣传，使全国之人皆知某为卖国奸贼，某为爱国志士，导以理性，动以感情，所以增长一般国民判断贤恶是非之能力者也。反之，秘密的青年运动，其作用在执行，全国之人既经一番热烈宣传之后，虽知孰为奸贼，孰为志士，然欲其立即起而执行，去奸锄暴，此则为势所不能，因群众身家观念最重故也。若欲借重不正当势力，以推翻不正当势力（如吾国政客之联某军阀以推倒某军阀，借某外力以排斥某外力之类），此又为理所不许，因以暴易暴故也。于是执行之责，遂不能不完全坠于青年双肩之上，其法为何，即暗杀是也。故德国两年以来，暗杀左党首领之案凡四见，其由秘密机关宣布死刑而尚未执行者，更有数十人之多，大抵其人皆平日公开青年运动所指为卖国之徒者也。即此一端已大可想见公开的青年运动与秘密的青年运动之相互关系矣。

惟秘密的青年运动之详情如何，非吾辈局外人所得而知，兹可与诸君谈者，即公开的青年运动是也。

（一）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　该同盟创立于一九一九年正月，成立未久，即有会员五万以上，其人大半皆系青年男女学生，爱国思想充满脑筋，现在该同盟之机关，已遍设德国全境。该同盟系由正式会员、特别会员、名誉会员三种会员所组成，所谓正式会员者，凡德意志青年年满十二岁至二十五岁者，皆可自由请求入会，为正式会员；所谓特别会员者，凡超过二十五岁之老会员，则退而为该同盟之特别会员；所谓名誉会员者，凡对于该同盟有特别功勋者，得被推为名誉会员。该同盟于会员干事部外，尚组有名誉委员会一种，其中委员如 V. Chappuis、V. Lochow、Reinhard、Prof. Boethe、Prof. Dietrich Schafer、V. Studt、Stresemann、Traub 皆为右党中名高年老之要人也。该同盟每十四日发行会务报告一次，以交通会员消息，时常举行演说大会，以激励会员志气，每次国会邦会选举，该会辄从旁赞助右党，故右党近年选举之大获胜利，其得力于该同盟之处实不少也。至于该同盟之旨趣，据其宣言所云，第一建筑于德意志基督教义之上；第二敦品笃行，热心爱国，以重建祖邦云云。前者所以排斥犹太人之作用也，后者所以表示其国家主义之精神也。

（二）少年德意志同盟　此同盟之意义与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相同，惟在战前既已成立，其目的专在训练身体，以为将来从军之备，盖一赤裸裸之军国主义嫡裔也。战前德国系征兵制度，所有各中学校之训育，皆以服从长上、严守纪律为唯一美德，盖所以制造良好兵士也。故吾人常称德国中等学校训育为校中军事教育，至于少年德意志同盟，则直可谓之为校外军事教育，二者皆所以直接助成德国之军国主义者也。近来刺杀左党首领之案，屡次发生，其凶手多为退伍青年军官，盖彼辈欲从左党手中夺回政权，以重建其少年德意志者，非一朝一夕矣。惟彼辈之所谓少年德意志运动，系欲抵抗世界新潮，返乎昔日之铁血时代，与吾国之所谓少年中国运动，系欲适应世界新潮，创造未来之黄金时代者，根本不同，此亦可谓各人少其所少矣。

三、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

德国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其总机关为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Reichebund Deutsch—demokratischer Jugendverninigungen），约有会员二万以上，分会遍于德国各地，其出版物计有三种：（一）《民主主义青年》（Die demokratische Jugend，为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之机关杂志）；（二）《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运动》（Die Deutsch—lemokratische Jugendbewegung）；（三）《民主主义评论》（Demokratische Rundschau）。

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其性质完全为德意志民主党之预备学校，故照严格而论，应属之于青年培养一类，不能谓之为青年运动（惟本篇仍从广义解释呼之为青年运动）。在德国青年培养之团体中，如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青年工人协会等等，虽与政党亦有关系，却未尝明目张胆，直谓本会为某党之预备人才云云，一如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之所为。据该会柏林本部规约第二条云，本会系包括所有柏林城中立于德意志民主党基础上之青年男女，以引导其活动政治，并使民主主义青年之意志，向极有理想之政治，于党中发生效用云云，观此则知该会与德意志民主党之关系如何密切矣。

该会既以德意志民主党之理想为理想，则吾人欲知该会之主张，与其研究该会章程，不如检阅德意志民主党党纲，德国共有大政党七，若以劳资两级为分别界线，则属于右者有三：一曰德意志国性民党，二曰德意志国民党，三曰德意志民主党；属于左者亦有三：一曰多数社会民主党，二曰独立社会民主党，三曰德意志共产党；介于左右两方之中者，则有中央党（中央党中又分左右两派，左派偏于左方各党，右派偏于右方各党）。故就德国政党地位而论，德意志民主党系居于右党一方，其基础系建筑于商业家之上，其他两种右党，德意志国性民党则建筑于农业家之上，德意志国民党则建筑于工业家之上。其中犹太分子甚为不少，因德国大小商业多在犹太人手中故也。惟该党虽属右派，而其主张则常立于调和中立之地位，譬如对于内政，其主张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调和；对于外交，则反对《凡尔塞和约》，而赞成国际联盟；对于内阁，则主张右派之德意志国民党与左派之多数社会民主党同处一堂；对于经济，则赞成一部分生产机关社会化，而反对一切生产机关社会化；对于政体，则主张全民政治，而反对一个阶级专政（无论贵族阶级或劳动阶级专政皆在所反对）。因此之故，吾人又常呼民主党为中和派，盖以其主张不偏不激，常介于极左极右两派之中也。

德意志民主党之调和中立态度，既如上述，则其直接属于彼党之德意志民主主义青年协会，当然亦复和平中正，不走极端，既为政府所极嘉许，又为社会所不疾视，其为极有幸福之青年运动（广义的），可以推想而知。虽然，青年者非坐享幸福之人也，青年运动者，所以开辟未来黄金时代之途径者也。若一涉乎“中”，遂难免乎“庸”，“庸”也者，不合乎德意志之国民性者也。所谓德意国民性者何，以言乎旧，则旧到底，而欲以其军国主义征服全球；以言乎新，则新到底，而欲以其社会主义支配一世（如马克斯之徒）。徘徊于不新不旧之中，自命为调和立国而从中取利者，非德意志之国民性也。不幸而德国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适中其弊。因而其活动情形，遂远不如左右两派青年运动之轰轰烈烈矣。大凡一种运动皆各有其时代，民主主义之运动，若在德国皇室未倒之时，未尝不有声有色，一旦共和基础既立，遂不免失其重要意义，故民主主义运动之在德国，已可谓为过去，至多亦只能谓为维持现状（如防范旧党复辟之类），而不能谓

之为创造将来，不能创造将来者，非青年运动之本义也。故近来德国有思想、富情感之青年，多纷纷由“中间”分向“极左极右两方”而去，其尚保持中立态度者，人数既少，效力自减，此亦为近来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不复惹人注意之一原因也。

四、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上）

德国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可分为四种：（一）青年工人协会；（二）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其中又分甲独立社会民主青年、乙共产主义青年、丙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三）超国家无产青年；（四）国际青年同盟。请先述青年工人协会。

（一）青年工人协会之性质　该会虽与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超国家无产青年、国际青年同盟，同属于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然其性质则微有不同，盖上述三种青年运动，对于左派各党完全立于独立地位，而该会则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不无多少之关系。故就严格而论，该会只能谓之为青年培养，不能谓之为青年运动。然该会又与青年社会主义者（Jungsozialisten）不同，青年社会主义者系多数社会民主党中之少壮一派，彼辈对于社会主义不视作一种阶级战争，而视为一种文化事业，并主张将马克斯之理论大加修正，以适合最近五十年来科学上之新理，对于本党老辈敷衍目前、维持现状之态度，深致不满，前年曾在 Bielefeld 地方开一青年社会主义者大会，以表示其意见。至于青年工人协会，则为未满二十岁之工人（最近加入学生不少），尚未挂名党籍，所有该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间之联络责任，仅由青年代表负之，与青年社会主义者之直接属于多数社会民主党者不同。且该会信仰仍是多数社会民主党一派相传之马克斯主义，亦与青年社会主义者之主张不同。总之，该会为多数社会民主党卵翼之下之青年运动，以关系而论，与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超国家无产青年、国际青年同盟之完全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者不同；以思想而论，则又与青年社会主义者之主张修正马克斯理论者不同也。

（二）青年工人协会之组织　该会旧日中央机关，名为德意志青年工人中央部（Zentralstelle der arbeltenden Jugend Deutschlands），其部长为现在总统 Ebert，直至三年前社会民主党在威马举行党会之时，始将中央部解散，另行改组德意志青年工人协会总部（Hauptvorstand des Verbandes der Arbeiterjugend Deutschlands），由现任国家副秘书 Heinrich Schulz 君担任部长之职。吾人于此应注意者，即从前中央部长系由多数社会民主党中之年高望重者兼任，如现任总统 Ebert，即其例也。而改组后之总部部长，则由青年工人自行选举少壮有名之社会主义者担任，盖已由前辈羁绊，而趋重青年自决一途，故记者前函曾谓战后关于青年培养之团体，亦渐有改为青年运动之趋势，即指此也。该会当改组之时，共有会员六万五千人，较之战前约减少一半（一九一三年共

有会员十一万人），因其时有一部分会员，业已改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故人数不免锐减，该会机关杂志名曰《青年工人》（Arbeiterjugend），编辑甚为良善，惟其中文字多由党中前辈加以助力，即此一端，亦可想见该会始终尚未完全脱离老辈思想势力范围也。

（三）青年工人协会之运动　该会宗旨，系欲教导青年以社会主义之世界观，并使其能独立判断政治及活动政治（Die Erziehung der Jugend zur sozialistichen Weltanschaunng und zur selbstandingen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 und Betatigung）。换言之，该会所从事者，全为社会人才之预备，犹忆前年该会在 Bielefeld 开会时（与青年社会主义者大会相隔二日），其开会祝词有云，吾辈之集合，纯系一种教育协会，而不是一种政争机关，又谓吾会之目的，专在养成社会主义之人才，与吾同胞共为社会主义之生活云云，其为一种预备工夫，更是显而易见。据熟悉老社会民主党之运动者云，战前社会民主党在帝制威权之下，行动殊不自由，彼辈知革命时机之未至，而预备工夫之不可无，遂决意从工人教育下手，尤注重青年男女工人之教育运动，常教以种种唱歌游戏之法，于不知不觉中，灌以社会主义思想，此辈青年因而乐与彼辈周旋，久而久之，遂觉生我者父母，而爱我者社会民主党也。于是死心塌地，愿为该党效力，今日大名鼎鼎之左党要人，多当日少不更事之青年工人也。观此则知德国社会主义者，多系科班出身，与吾国社会主义者之由票友出身者，根本不同，因此之故，德国社会主义者对于本党宗旨有如圣经，终身行之，不敢稍背。而吾国则不然，共产主义领袖可以同时入公民阶级（Bourgois）所组织之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更可以平心下气，降格要求一个好政府，此亦中德两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之点也。

五、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中）

记者昨函所述之青年工人协会，系立于多数社会民主党卵翼之下，今日所述之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则超然独立于各党之外，称之为青年运动，可谓名符其实者也。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之发生，一方面固由于一般有思想之青年，反对各种政党为其保姆，他方面亦由于一般主急进之青年，不满意于多数社会民主党之持盈保泰，故自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分家后，其从前属于青年工人协会而赞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张之一部分青年，亦纷纷脱离青年工人协会，而另组自由社会主义青年。三派所有主张，亦较青年工人协会更进一步。其中复分为三派：（甲）独立社会民主青年；（乙）共产主义青年；（丙）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三派主张各异，壁垒森严，若将此项青年运动，与德国左派各党比较，则其式如下：青年工人协会等于多数社会民主党，主张最温

和；独立社会民主青年等于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张进一步；共产主义青年等于共产党，主张更进一步；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等于无政府党，主张更进一步。惟自青年工人协会以至于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其主张虽有缓急之分，而对于公民阶级之青年运动，绝对不能携手，则彼此完全一致，此外对于经济方面之要求，自由社会主义青年三派之中，亦尚有其共通之点，其条件如下：（一）对于未满十八岁之青年，实行每日六小时工作制度；（二）规定每礼拜最低度之划一工资额，以能充裕支持生活为度；（三）规定学习期间为两年，且包含实验期在内，为谋现在过渡时代便利起见，得延长为三年（现在学习期间系四年），并取消学习契约；（四）禁止夜间及礼拜日工作；（五）每年至少须给与四个礼拜之息养假期，在此期中仍支付全薪；（六）禁止未满十六岁之儿童作工，同时扩充义务教育至十六岁为止；（七）改订补习学校制度，使未满十八岁之青年皆有求学机会，每日午前上课（礼拜日不在内），不收学习及教品费用，在上课期间仍须支付全薪，青年得推举代表参与补习教育及专门教育之行政；（八）为社会主义青年建筑住所；（九）青年工人有选举列席于工人会议及工厂会议之权。以上九条，为其经济方面之要求，至于政治方面，则痛诋现代议院制度为公民派国家之构成（Einrichtung des burgerlichen Staates，德国左党常称右党为公民阶级，以别于无产阶级），此则自由社会主义青年三派所同声一致者也。

独立社会民主青年之机关杂志为《自由青年》（Die frei Jugend），其总编辑为（Engelbert Graf）。共产主义青年之机关杂志为《青年军》（Li junge Garde），销路一万五千，其发行名义，犹为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青年中央机关（Zentralorgan der freien sozialistischen Jugend Deutschlands），其首领为 Paul Schiller 及 Margot Ostler 两人。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之机关杂志，亦名为《自由青年》Freie Jugend，有读者五千人，其总编辑为 Erust Friedrich。独立社会民主青年及共产主义青年，皆主张工人专政为推倒公民权威不可缺少之手段，而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则高揭不用强权以达于社会主义之旗（Durch Gewaltlosigkeit zun Sozialismus）。因此之故，共产主义青年之机关杂志《青年军》，曾转载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中央部首席一函，大攻击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略谓：吾辈青年亦不能与无治主义者及工团主义者共事，因彼辈之经济主张，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一种小公民式的组织，在实际上，不久势必仍与公民派帝制派之白军共同工作云云。《青年军》所以转载此函之意，无非借他人之酒杯，消自己之块垒，换言之，即不赞成同辈中之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者而已。惟自由社会主义青年之中，虽分三派，然仍有其共通之点，在一定范围内，彼此仍有携手之必要，即所谓预备工夫者是也。盖无论共产主义或工团主义，要皆为现行经济制度革命后之一种组织，其在现行经济制度尚未推翻以前，彼此可以共同进行之点，正复不少，如上述之九

条经济要求，即其例也。此九条要求，犹系从前德意志社会主义青年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ss für die sozialistische Jugend Deutschlands）所提出之条件，换言之，即从前全国社会主义青年所承认之共同预备工夫，至今犹一步一步的往前做也。

六、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下）

记者此函所介绍之无产阶级两种青年运动，一为超国家无产青年（Übernationale proletarische Jugend），一为国家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er Jugendbund），与前函所介绍之无产阶级两种青年运动（青年工人协会及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微有不同之处。第一，青年工人协会与自由社会主义青年所信仰之主义，皆为十九世纪以来哲人学者所提倡之经济新理，而超国家无产青年及国际青年同盟所崇拜者，乃为一二千年以前耶稣孔子所发挥之伦理旧说；第二，青年工人协会系直接与政党（多数社会民主党）有关，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虽与政党无直接关系，然细按其中三派趋势（甲、独立社会民主青年，乙、共产主义青年，丙、无治主义及工团主义青年），甲派思想颇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接近，乙派思想颇与共产党接近，丙派思想颇与无政府党接近，故就广义言之，此两种青年运动，皆与政党不无多少之关系。而超国家无产青年及国际青年同盟则不然，不但与各种政党毫无直接关系，即欲将彼辈思想，一与德国各党比拟，亦深苦不得其例。故吾人若就此两种青年运动性质而论，可谓超然独立于各党政治潮流之外，而自成别调者也。

近世无产阶级运动，大抵皆以现代经济制度组织不良、分配未均、贫富悬隔，凡受物质压迫之人，皆应起而则要求物质解放，换言之，即要求物质欲望之满足是也。惟白人自利之心已成天性，前年印度诗人太戈尔在德演说，曾谓欧人为有组织的自利之民族云云，其实此语亦可用之于欧洲无产阶级。盖今日世界犹为内国无产阶级向内国有产阶级要求物质欲望满足之时，故世界工人联合一致之呼声尚与日俱高，若一旦经济大权移入工人手中之后，恐又将一变而为世界有力工人向世界无力工人要求物质欲望满足之势。故记者常谓今日中国人为外国资本家作工，将来中国人必为外国劳动家作工，实非神经过敏之词也。此种要求物质欲望满足之心，在一方面观之，能使物质发达，生活日益改善；他方面观之，人心永不知足，战争终无已时。因此之故，超国家无产青年之运动，遽欲使一般无产青年，于打破资本制度之后，更须有精神生活。国际青年同盟之运动，于奔走经济革命之时，更须注重寡欲二字，皆所以减轻物质欲望之微意也。超国家无产青年之言曰：吾辈但保持最高尚之目的及其理想，吾辈不相信现在强权的金气充满的世界，吾辈不相信世上的顷刻而相信灵界的永久（Sie verficht nur hochstc Zicle und Ideale und hat den Glauben an diese bestehende，gewalttatige，vom Geldgeist erfullte

Welt nicht，sie glaubt nicht an das irdisch Vergan gliche，sondern unr aus gottlich Ewige）云云，其非难物质世界之意，可谓溢于言表矣。至于国际青年同盟之会员，则分为内外两组，外组有不吃烟不吃酒两种禁条，内组更加上不吃肉一种禁条，并有一部分会员自愿终身不嫁不娶，以从事运动，则其主张寡欲之精神，更可以从此窥见一二。德国社会党人自战后得志以还，已不复如前此之卧薪尝胆，其党中要人之豪阔，往往与战前贵族无异，每每令人发生社会主义阀之感。明乎此，则知超国家无产青年之注重精神生活，国际青年同盟之注重寡欲生活，盖不为无因矣。惟此两种青年运动之思想，亦有与现代潮流不甚相合者，譬如现代思潮反对宗教，而超国家无产青年则独尊仰基督教义；又如现代思潮趋重群众政治，而国际青年同盟则独推崇贤人政治。超国家无产青年之言曰，在吾辈青年黑暗之中，放出一线光明，此即是世界之光，此即是世界救星，此即是基督教义云。至于国际青年同盟之组织，则主张领袖制度，反对德谟克拉西制度，所有一切计划，皆由大领袖传授小领袖，再由小领袖传授工人，并著有专书一部，以讨论德谟克拉西与领袖制度之良恶，又该同盟中人极崇拜中国之孔子，尤推重孔子之伦理学说，世人称之为德国青年运动中之孔派（此外青年运动中尚有老子一派，他日再详），亦可谓别开生面者也。

超国家无产青年，其总机关在 Breslan，有机关报一种名曰《火焰》（Dei Flamme），其首领为 Emanuel Hafner、Max Muller、Alfred Wiedemann 三人。国际青年同盟其总机关在 Gottingen，现有丛书三十余种，其首领为 Prof. Dr. Nelson。

七、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

德国关于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可分为三派：（一）天主教青年运动（旧教）；（二）基督教青年运动（新教）；（三）犹太教青年运动。兹请分述如下：

（一）天主教青年运动　在各种宗教青年运动之中，以天主教青年运动为最有势力，其基础完全建筑于天主教堂之上，故其组织极为严密有序，迥非他种宗教青年运动可比。其总机关共分两种，一为德国天主教青年男子协会总部（Generalsekrotariat der katholischen junglingsvereinigungen Dentschlauds），其地点在 Dusseldorf，共有杂志七种：（一）《青年指导》（Jugendfuhrung），（二）《天主教青年干事通信报告》（Korrespondenzblatt für katholiche Jugendprasides），（三）《青年会》（Der Jugendverein），（四）《守卫》（Die wacht），（五）《青年守卫》（Die Jungwacht），（六）《歧路》（Am Scheidewege），（七）《青年力》（Jugendkraft）。一为德国天主教青年女子协会中央部（Zentralverband der katholischen jungfranenvereinigungen Deutschlands），其地点在

Bochum，共有杂志四种：（一）《天主教青年女子协会干事报告》（Vorstandsblatte für katholischen jungfrauenvereine），（二）《青年女子协会》（Der Jungfrauenverein），（三）《母会》（Der Mutterverein），（四）《谋生》（Ins Lebenhi aus）。至于此种青年运动之意义，当然以制造天主教徒为唯一目的，据战前调查，德国共有天主教徒二千三百八十二万人，约占德国人口全体三分之一有余（其时德国人口共计六千五百万人）。彼辈团结之力甚为坚实，在政治方面，则有中央党为其活动机关，对于德国政治常有举足轻重之势，两年前更由该党组织青年学生团体一种，名曰新德国（Neudentschland），以为将来保持天主教义发扬中央党势之备，天主教青年对于宗教一事，常与左党立于反对地位。譬如德国宪法中曾谓国家权力系由国民赋与云云，本为左党得意之笔，而天主教青年则以为此种规定有违天主教义，据天主教义，凡一切最高权力，其原始皆由上帝赋与，若照现在宪法所定，系由国民赋与，则其结果国民势将随时更改国体，发生革命云云，因而对于现行宪法，大施攻击。又如战后左党执政，大削教会势力，从前德国国民学校以宗教为主要科目，限制极严，战后左党主张宗教与教育分离，宗教一科遂不如前此重要，而天主教青年则以为宗教与教育须谋一致，仍宜恢复从前宗教在学校中之固有势力。即此两例，已可想见天主教青年对于左党措施之如何不满矣。

（二）基督教青年运动　此派青年团体，亦有两种：一为基督教青年协会（Christlichen Vereine junger Manner），其机关杂志为《自由青年》（Freie Jugend）；一为德意志青年协会（Der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其机关杂志共有二种：（一）《忠实》（Die Treue），（二）《德意志青年协会之报告》（Mitteilungen aus dem Bund deutscher Jugendvereine）。就德国基督教徒数目而论，约有四千万人，本较天主教徒为多，然因其团结之力，远不如天主教徒之坚，故其青年运动亦远不如天主教青年运动之盛，惟有一事较之天主教青年运动略有进步者，即基督教青年运动，渐已由青年培养而趋于青年运动（狭义的）是也。此派运动首领 Emil Engelhardt 牧师，曾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Magdeburg 之会，提出一种建议，由全会通过，认为此后该会之原则。其大意略谓：吾人希望青年于自负责任之觉悟中，以独立创造其自己生活及民族生活，换言之，吾人宜努力由青年培养渐进而为青年运动（狭义的）云云，此则为天主教青年运动中所不多见者矣。

（三）犹太教青年运动　德国犹太教徒约有六十二万人，仅占德国人口全数百分之一，然其团结之坚，更逾天主教徒而上之。从前犹太教徒之在德国，为众所不齿，甚至于白昼不敢公然步行正街之上，惟百年以来，彼辈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于不知不觉间，遂将德国经济大权渐渐移入手中，大之如银行事业，小之如百货商店，犹太教徒皆占极大势力。其在政治界中，如那提老（去年被刺之外交总长）、西门（前任外交总长）

等，皆为一时名望。其在学术界中，如马克斯、安斯坦辈，又为百世师资，其民族复兴之象，实已蓬蓬勃勃，如日东升。吾人若将现在犹太民族与现在中华民族一较，则犹太民族可谓有人而无国，而中华民族则可谓有国而无人，有人而无国，则虽在欧洲强族压迫之下，亦可以翻身；有国而无人，则虽处亚洲土地肥沃之区，亦不能立足。故凡有志改造中国者，不必先问国之强与不强，但先问人之弱与不弱矣。犹太教徒既在德国占有最大势力，因而大为一般德人所排斥嫉妒，在大学校中则有反犹太人会之组织，而同时表同情于犹太人者，则又有反反犹太人会之号召，在犹太教徒自身，亦组有德国犹太青年协会（Verband der judischen jugenavereine Deutschlands），以为对抗之计，该会现有会员二万人，与右党青年运动（如德意志国性青年同盟即排斥犹太人最力）及其他各种宗教青年运动对抗，亦可谓独立不挠者矣。

八、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上）

自由德意志青年者，德国一部分爱自由富思想之青年所从事之青年运动也。既不同于右派青年之国家主义运动，亦不同于左派青年之无产阶级运动，乃一超然于政治意义之外，而追求独立自由人生之青年运动也。此种青年运动，在德国各派青年运动中，所占势力甚巨，兹请先述其进化程序如左。

（一）运动之起源　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胎儿，可以分为三种：（一）游鸟（Wandervögel），成立于一八九六年，其地点在柏林 Steglitz；（二）游会（Wandervere-in），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其地点在汉堡；（三）大学团（Akademische Freischar），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其地点在苟廷根。此三种运动，皆以改造青年生活为其旗帜，攻击当时青年之各种遗传恶习不遗余力，盖欲从旧人生而另组新人生者也。

（二）运动之成立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一日，一般思想相近之青年团体，大会于 Kassel 地方之 Hohen Meissner，计参与之青年男女共有两千余人，来会之青年团体，共有一十三种（如青年游鸟〔Der Jungwandervögel〕、大学生素食团〔der Bund abstinenter Studenten〕、前队〔der Vortrupp〕、自由学校村〔der Bund freier Schulgemeinden〕以及其他青年生活改造团体之类），与同时来比锡（Leipzig）地方所举行之国民

战争百年纪念遥遥相对。故当时德人多称之为反对来比锡战争[1]纪念之示威运动。开会之后，各团领袖，共议决规约一条曰，自由德意志青年，欲自决其行，自负其责，用内部真实，以构造其生活，至于内部自由，则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皆一致拥护。为谋彼此互相了解起见，得举行自由德意志青年大会，所有自由德意志青年之一切组织，皆禁止烟酒云云。于是自由德意志青年之运动，遂从此宣告成立，惟此时所谓自由德意志青年者，系运动之名称，而非团体之名称，至于来会之各种青年团体，亦不过加盟于此种运动而已。

（三）运动之分裂　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分裂，可以分为远因近因两种，该运动之中原分左右两派，右派偏重感情作用，Kund Ahlborn 为其领袖，主张无条件的青年自决，对于一切含有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学校政策的作用之团体，皆宜敬而远之。左派则偏重理智作用，Gustav Wyneken 为其领袖，主张创造一种青年文化（Jugendkultur），曾于一九〇六年在 Wickersdorf 办有自由学校村（Freie Schulgemeinde）一所，并刊行《发端》(Der Anfang) 杂志一种，为其实验鼓吹之用。两派趋向既不相同，争端自所难免，当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宣告成立之时，久已为一般守旧党人所注目，迨至一九一四年正月，巴燕地方出有新书一种，极力批评攻击所谓青年文化。巴燕中央党议员（Scblittenbaner）乃根据此书，于议会中提出质问，直谓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为纵情肆欲，宜付有司严禁云云。巴燕教育总长 V. Knilling 亦颇首肯其言，当此之时，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运命，盖已岌岌危于累卵矣。自由德意志青年为抵御外敌计，乃于一九一四年二月九日，在巴燕门兴开一大会，Heidelberg 大学教授 Alfled Weber 亦出席于此，力为自由德意志青年辩护，同时该运动右派首领 Ahlborn，亦用委员会之名义，发表宣言一篇，略谓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理想，并非如 Wyneken 一派所主张，而且 Wyneken 所主撰之《发端》，亦非自由德意志青年之机关杂志云云。盖外间既以攻击 Wyneken 一派之青年文化为名，故 Ahlborn 特发表此项宣言，所以减少攻击也，然在 Wyneken 一派，则以此种宣言，有违当初成立规约中所谓至于内部自由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皆一致拥护之语，即大学教授 Weber 亦谓此种宣言，善于外交词令，十分聪明，但是不勇敢不青年。因此之故，Wyneken 一派与 Ahlborn 一派益不相能，此分裂之远因也。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七日 Marburg 之会，Ahlborn 复提出组织问题，凡属于

---

① 来比锡战争：即莱比锡战争。1813 年 10 月 16 至 19 日，在拿破仑战争的第六次反法联盟中，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组成的联军与拿破仑一世统帅的法军及莱茵联邦的军队在莱比锡地域进行的决战。因有许多民族的军队参加作战，故被称为“民族大会战”。在会战中，由于莱茵联邦的萨克森步兵和炮兵投向反法联盟，拿破仑遭到失败，莱比锡最终落人反法联盟手中。会战的直接结果是拿破仑一世在德意志的统治最终崩溃，莱茵联邦解体。

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青年，应进而组织一种固定团体，至于参加此种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体之各种青年会社，必须该项会社系由青年自组，且具有完全自决之权者云云。Wyneken 当时以自由学校村代表资格列席，大感不利，对于此种提议，力加反对，谓此种狭义的固定的组织，有碍该运动自由精神之发展，然 Wyneken 一派，人数不多，反对无效，随即退出，一时从其后者如前队，如德意志国民教育团，亦无不纷纷宣告脱离关系焉，此分裂之近因也。Wyneken 一派预计于是年八月开会时，举行一种示威运动，以推翻此项组织，仍回到当初成立时之本相，惟其时适值欧战骤起，大部分自由德意志青年皆被政府征集，驱之于疆场之上，示威之权，因而搁浅。

（四）运动之复合。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西部德意志青年大会在 Lorley 举行，约有八百位自由德意志青年参与，而其中属于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体者仅有一百人，Wyneken 是时忽然发现其间，大施运动，乃由与会诸人共议决一条，曰今后自由德意志青年，仍为一种大运动之名称，一如当时 Hohen Meissner 成立情形，而非一种青年团体名称云。于是久已变相之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又复官还原职矣。一九一七年十月三日各首领在 Solling 会议，Wyneken 与 Ahlborn 之间，亦复言归于好，共组一立法会议，草成宪法一种，仍采 Hohen Meissner 当初结合本意，于次年三月二十九日在 Nurberg 开会通过，一时重行加入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者，又复陆续不绝，因而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在德国，遂成为一种极有势力之青年运动矣。

九、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中）

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四日恢复本来面目以还，范围日益扩大，如昔时从事游鸟运动、寻路运动或节欲运动之青年，无不纷纷加入其中，尤以游鸟运动为最，故现在自由德意志青年之分子，亦以游鸟运动为其中心。在德国普通人方面，对于自由德意志青年之运动，有时尚不深悉，而对于游鸟（Wandervögel）一字，则妇孺无不知之。盖游鸟运动之在德国，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且其行动，又极惹人注意，因而一般德人对之，皆有一种深刻不磨之印象也。

何谓游鸟运动（Wandervögelbewegung）？游鸟运动者反抗十九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及城市文明之青年运动也。成立于一八九六年，其发起人为 Karl Fischer，最初只限于柏林之 Steglitz 一隅，现在则蔓延全国，凡有德意志青年足迹之地，几无不有游鸟运动紧随其后，吾人从此亦可以想见其发达之程度矣。

德国自十九世纪工业勃兴以来，物质文明蒸蒸日上，一般青年因声色货利之引诱，遂不免流于奢侈，习于轻佻，所有从前日耳曼民族俭朴厚重之精神，皆将为物质文明一

卷而去，故有人谓文明（Zivilisation）者文化（Kultur）之敌也，实非无因之谈也。今请举德国男女装束为例，德国男子时装，多趋向英美式，女子时装则崇尚巴黎风，报章杂志，常有专刊介绍，其花样形式，几乎日日翻新，令人有应接不暇之势，吾国昔时所谓三寸金莲，久为世所非笑，其实现在德国女子之时髦皮鞋，其后底之高，口面之狭，足尖履地，瘦不盈握，其违乎自然，不合卫生，正与吾国之金莲三寸相同。又如女子衣服，其两袖之短，实不必捉襟，早已见肘，其领口之大，又不必解胸，早已露乳，虽值此隆冬天气，亦复只着丝袜一双，其薄如纸，而同时则于厚呢外套之外，更绕以兽皮。故就德国女子装束而论，实可谓一身而兼备春夏秋冬者也。至于德国男子之好修饰，亦复不亚于女子，本来西洋男服，短小精悍，是其所长，严装紧束，是其所短，更加以德国男子之矜持，虽在炎暑之时，亦未尝一去领带（此就中等社会以上之人而言，至于工人则为例外），全身披挂，终日如见大宾。余常谓中国人凡事过于随便，而德国人则又过于不随便，即衣履琐事，亦无不然也。游鸟运动即欲于此举世尚奢专重外表之际，而以简单朴实矫其风气。凡属游鸟运动之女子，皆着朴素无华之布衣一袭，所着之靴，宽大平稳，一如男子，其过激者，更往往赤足着履，不穿袜子。男子则只穿绿色衬衣一件，开胸露颈，不饰领带，长袜短裤，一如旅行，其过激者，更往往发长被颈，颇似狂人。彼辈每日结队成群，往来道上，一般行人，无不属目，受其化者，颇不乏人，此亦欧洲十九世纪物质发达之一种反响也。

游鸟运动之第一种精神，为反抗物质文明，既如上述。其第二种精神，则为反抗城市文明，德国工业发达，人力集中，乡居之民，群趋都市，即以柏林、汉堡两城人口而论，据一九一九年调查，柏林共有三百八十万人，汉堡共有一百四十五万人，其人口之杂居密集，可以推想而知。城市文明之弊，一方面则人烟稠密，易生疾病，他方面则良莠不齐，罪恶丛生。游鸟运动有鉴于此，主张一般青年，相率逃于自然，以恢复其健康，高尚其思想。故每逢星期休暇，辄于星期六晚，互携乐器，各带食粮，偕往附近山林，男女枕藉而卧，隔夜始行归来。吾人每于星期日深宵睡梦之时，辄闻窗外乐调悠扬，歌声宛转，此无他，游鸟运动青年新自森林归来也。此种运动之所以名为游鸟，即取其往来林中，有如飞鸟，无罣无碍，顺乎自然之意，此又为欧洲十九世纪都市集中之反响也。

游鸟运动除反抗物质文明及城市文明为其主要目的外，并极注重青年教育，吾人每过大街隙地之上，辄见一群儿童，携手围聚，游戏唱歌，烂熳天真，一团生气，中有青年男女数人为之指导，其人非他，即游鸟运动中之青年也。故游鸟运动从此方观察，又可谓为露天学校，更可谓为社会教育。所以德国有一部分家庭，往往将其子女送入游鸟运动，以资练习，此亦游鸟运动发达之一种原因也。

此种运动之目的，既在逃出物质，返乎自然，因与吾国之老子思想颇为接近，于是该派中人对于老子学说极为推崇，与国际青年同盟之信仰孔子不相上下。自由德意志青年右派领袖 Ahlborn 者，即偏于游鸟运动之精神者也，彼曾作文一篇，名曰《庄子解说中之道教》，文中极恭维老子，并谓老子堪作彼辈唯一无二之大师云云。即此一例，已可概见其信道之如何虔笃矣。

十、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下）

记者前函曾谓自由德意志青年系一种运动之总称，而非一个团体之私名，故凡与此宗旨相同思想接近之青年运动，吾人皆可纳之于自由德意志青年旗帜之下，初不必问其是否曾经正式加盟于自由德意志青年之运动也。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中心人物，以游鸟运动青年为最多，已如前文所述，此外如寻路运动及节欲运动，或其宗旨素与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相近，或其分子业已直接参加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要皆在德国青年运动中占有极大势力，兹请补述如下：

寻路运动（Pfadfinderbewegung） 原为一种世界的青年运动（英文名为 The Bog Scouts association，译义与德文微有不同，吾国方面亦有此种组织，惟系由基督教青年会倡办），本非德国之特产，惟德国同时尚有其他各种青年运动参杂其间，彼此互相影响，因而此项运动之内容，亦遂与他国间有出入，此则不可不知者也。德国寻路运动团体，共有两种：（一）德国寻路团（Deutscher Pfadfinderbung），（二）德国新寻路团（Pund deutscher Neupfadfinder）。若就德国寻路运动之内容而论，既可谓与时俱进，代有不同，在一九零九年之时，德国寻路团之信条，尚有忠于皇帝之语，至一九一八年之时，则改为立于共和旗帜之下，即此一例，已可概见。惟其根本主张，则尚未完全动摇，据该团一九一八年宣言云：吾人所希望者何事？第一，补助青年教育于学校家庭以外；第二，使青年之力于休暇时候，亦不至于无用或浪费；第三，使青年返乎自然，并于不知不觉间，以指导一切事物之变迁进化云云。至于该团所用之方法，其一，则为聚集一般青年，使之自为训育（Selbsterziehung），以增长其智识；其二，则为引导青年旅行游戏，于深林大野之中，以训练其身体；其三，则为禁戒一切烟酒，以培养其德行；其四，则为教以各种社会服务之方法，以救助其同胞（据该团中人云，该团男团员则租地一方，其所耕获，悉以济贫，女团员则职司缝纴，所得之资，亦尽以助人）。此外更有信条十种：（一）名誉为其最高价值；（二）忠爱祖国；（三）救助人类（每日至少必为人类做一善事）；（四）友爱忠实；（五）礼让知感；（六）爱护动物；（七）服从遵守；（八）愉悦知足；（九）勤工俭用；（十）言行纯洁。观此则知该团所谓游于自然、

青年自育等等，实与游鸟运动之宗旨相近；其不同者，不过游鸟运动之举止，较为奇特激烈而已。至一九一九年八月，更有一部分寻路团员，另组德国新寻路团，其所以号召于众者，一则曰：吾人欲用纯洁清白及内部真实，以构造吾人生活；再者则曰：吾人志欲改造吾人之内外生活，并相信未来之德国文化，可以组织新人新国云云，则更与少年德意志青年之思想若合符节矣。因此之故，游鸟运动及寻路运动，在德国青年运动中，皆占重要位置，而且德国一部分家庭，有时颇嫌游鸟运动举止过激，更往往将其子女送入寻路运动，故寻路运动之在德国，遂有与日俱进之势也。

节欲运动（Abstinenzbewegung）　记者前曾译为食素运动，惟德国此种运动之要旨，偏重不吃烟酒，含义较广，兹特改译为节欲运动。此种运动之发生，完全为反抗德国大学生之遗传恶习，德国大学教育之目的，全系重学，与英国大学教育之重品者根本不同，故德国大学生之跅弛，当推为世界第一。德国大学校中有种种集会，其宗旨专在吸烟饮酒，凡属会员，皆带一种特别小帽，五颜六色，奇形怪相。故吾人一入德国大学，有如身在剧院。此类团体，常在酒馆之中，租定客厅一间，为其团员大吸豪饮之所。除吸烟饮酒外，又复好色尚气，均臻极点。据前年佛兰克府花柳病展览会调查，大学生染此疾者，为数极为不少。又德国大学生之尚气好斗，已成风俗，一言不合，即相约比剑，往往致疾丧身，亦在所不惜。故凡脸上带有刀疤子伤痕者，其人即无异曾得武勇之头衔。所谓节欲运动者，即为反抗此种行为而发生，专以戒除烟酒为号召（亦间有主张不食肉者），其娱乐方法，则为组织辩论会、美术会以及其他游艺旅行之类，凡大学生之自好者，无不纷纷参加此种运动，有时且更进一步，以讨论新人生之组织，此则与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之宗旨，完全相同。因此之故，此种节欲运动之大学生团体，直接参加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者，极为不少。吾常叩问德国大学生曰："自由德意志青年，在大学中之势力如何?"彼即答曰："凡反对带红帽子绿帽子者，皆为自由德意志青年。"此其言虽不免过夸，然从此亦可以想见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在大学中之势力矣。吾此文所述之五种德国青年运动，虽其中间有一二违背时代思想之处（如国家主义运动、各种宗教运动之类），然其组织大抵皆极为严密有序，足供吾人参考。其尤令人神往者，更推自由德意志青年运动，超乎一切政治宗教潮流之外，专以追求人生真义为归宿，此则为吾国有志青年之所极应提倡者也。

（上海《申报》）

五十一 国际青年团（三篇）

一

八月十日为此间“国际青年团”（Internationaler Jugend Bund）开第四次年会之期，开会地点在苟廷根（Göttingen），距柏林约六钟火车之遥。先期由该团干事Schmidt君函邀记者列席，并由该团常驻柏林干事Dr. Hodann君向记者详述该团之组织及其旨趣，相约到会参观，情意极为殷勤。记者遂于八月九日午前十一点三十分由柏林乘车前往。午后六钟左右即抵该地，该团已派男女团员数人到站迎接；惟记者行步素速，于人丛中匆匆冲过，竟与该团团员对面相失。直至傍晚始在吾友魏时珍处与该团干事Schmidt君相遇，相订明朝赴会之约而别。

德国青年对于政治活动向分左右两派（参观记者去年四月十五日《德意志之青年同盟》，及八月二十六日《德意志左党之青年运动》通信），德国各大政党皆各有青年团体之组织，专为制造该党信徒之用。因此之故，德国青年于其年龄尚未及冠之时，已各有其政治上之信仰，或属左派，或为右党，终身以之，牢不可拔。当德国帝政时代，社会民主党即用此手段以培植其政党基础，著有成效，故现在德国各党无不仿而行之。惟德国青年团体有直接为政党所经营者，亦有超然于各党之外而自为一派者，国际青年团则属于后者一派。彼辈对于德国各党皆极鄙视，其中认为比较的可以携手者，只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由此观之，则该团实为德国极左派之青年团体也。

德国有一部分青年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又分老孔两派，德国近半世纪以来，因物质文明发达之故，一般人多趋重物质主义而丧失精神生活。德国一部分有思想之青年，遂相约逃出物质，返于自然。于是所谓“游鸟”（Wandervögel）及“自由德意志青年”（Freideutsche Jugend）等等团体发生。此种团体之团员，大率衣履务尚俭朴，行动极求自由，其思想极与吾国老子相近，并谓老子堪作彼辈唯一无二之大师云云。现在德国知识阶级中，几无一人不知老子，有时信仰过笃，并疑及老子或为今人伪托，否则何以数千年前便能产生如此伟大人物，其思想言论竟与现代最新潮流吻合？记者曾见德国某女士手执一本威廉博士所译之《道德经》当作诗读，爱不忍释，其信仰之诚，实有过于中国社会党人之虔奉马克斯矣。此为德国青年中之所谓老派，其势力极为雄大。盖“游鸟”及“自由德意志青年”两种团体，凡德国青年之爱自由、重理想者，几无不参加，其将为德国未来之最大潜势力，不言可知。其活动情形，记者他日当为专篇以纪述之，

兹不再赘。德国青年中除老派外，又有所谓孔派，此次记者所参与之“国际青年团”即属于此派。凡属“国际青年团”之团员，几无一人不知孔子，更无一人不知辜鸿铭。该团首领为荀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逊博士（Prof. Dr. Nelson）。彼有一次曾谓吾友魏时珍君云，“吾崇拜孔子之虔笃，或非君所能想像。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辜氏著作吾曾读十余次，每读一次必得新理解一次。君尚年少，或对于辜氏伟大人格尚未有深厚之了解”云云。其信仰虔笃，可谓彻首彻尾矣。该团每次开会，往往先读《论语》一节，颇似耶稣教徒之念《圣经》。即以此次开会而论，会场正面墙上高悬中国五色国旗二方，饰以花叶，而德国三色国旗反不与焉。至于是日演说，更屡次提及孔子，对于孔子文化所陶养之中国人，尤引为唯一无二之良友。大约德国青年中之崇拜孔子者，当以此为中心矣。

该团首领纳尔逊氏，在荀廷根大学担任哲学讲席。纳氏为德籍犹人，现年四十岁，彼于二十二岁时即考得博士。其时德国哲学界执牛耳者为 Cohen 氏，名满一世，而纳氏独著文攻击。一时哲学界大哗，谓此后生小子乃敢攻击前辈，于是纷纷著文驳之。因此德国哲学界中遂知有所谓纳尔逊其人，彼旋赴荀廷根，欲谋大学讲师一席。惟荀廷根大学教授开会结果绝对拒绝，彼乃索居于该地客舍之中，闭门读书。一日有造其门者，询客中有纳尔逊其人否？纳氏遂将其人延入室内，其人非他，即当今德国数学泰斗、荀廷根大学教授黑尔摆儿提（Prof. Hilbert）是也。从此二人极为相得，黑氏遂设法援引纳氏谋得大学讲师一席。未几，纳氏复欲图谋大学教授位置，继经该校大学教授会议结果，又遭拒绝，黑氏又从中设法，居然如愿而偿。从此纳氏遂在该校担任大学教授直至今日。黑氏常笑谓其友曰，“天下无不成之事，于何见之？于纳尔逊氏之居然获得大学教授一席见之”云云。盖以纳氏学敌之多，而终能插足大学也。近来德国康德学说势力日益坠落，而纳氏则独推崇康氏；近世学者多谓世上无客观真理，而纳氏则谓世上有一客观真理，寻得此种客观真理，乃为吾人最大义务，因此在哲学界中亦复卓然有所树立。其徒之信奉纳氏，殊不下于纳氏之信奉辜氏。故在德国青年思想界中，亦有其相当之位置焉。除德国青年外，瑞士青年中亦多有附和其说者。纳氏不久将建立政治哲理大学一所，并拟聘请辜氏来德担任教授。纳氏常谓将使德国青年得有瞻仰东方伟人之机会云云。有某外人亦为纳氏信徒，自愿捐助巨款以成此举。闻该大学于今年秋间即可成立，吾人于此亦可想见其魔力之大矣。

二

“国际青年团”是一性质极为复杂之团体，就该团体于修养方面而论，则有似吾国

之所谓进德会。该团分为内外两组，外组有不吸烟不喝酒两种禁条，内组则更加上不吃肉一种禁条。该团中人大概反对宗教，而且有一部分团员自愿终身不嫁不娶以服务于该团。该团男女团员一部分为大学生，一部分为工人。每值大学开学之时，彼此聚食，女子任烹煮之役，男子则任奔走之劳。此种共同生活，又有似乎共产组织。该团极注重体育，每晨须在操场内跑十五分钟始行上课，随时从事各种体育游戏锻炼身体，以为来日大难担任巨责之预备。往日该团缺乏体操教习，即有团员一人自告奋勇前往柏林学习体操，以便将来服务团中。即此一端，已足见该团团员之富于服务精神。并闻有女团员一人，因奉团中之命服务某项社会事业，过于劳碌，现已得病，更可想见其勇于牺牲矣。该团组织又颇类于军队，规律极为严格，既经团体决议之事，团员须绝对服从。每次开会均须点名，以防外人羼入，泄漏团中机密。在该团以外之人称该团为“过激派”，并谓比过激派还要过激。究竟真相如何，记者因未参加其秘密会议，不敢妄加评断。惟可以断言，该团实为德国极左派青年之一种组织也。总之，德人注重纪律已成天性，无论极右派之复辟党与极左派之共产党，其组织皆带有几分军队性质；而且无论办理何事，皆极起劲，决不似中国团体办事之轻松。即如现在德国经济困难，各地团员参与年会极为不易，然而此次参与年会者仍有二百人之多。更有年少男女团员违父母之命不远千里而来者。其热心团体事业之精神，实非中国人所能及。凡此皆足以见德人办事积极之一端也。

该团之目的，在训练将来政治之领袖人才，故征取团员极为严格。现在该团已成立四年，而团员只有五百人左右，于此可以想见其严格之一斑。该团主张首领制度，反对德谟克拉西。该团团员之服从领袖，有如兵士之服从长官。其训练方法，则先由团中领袖提出各种问题，著成专书，如《德谟克拉西与领袖制度》（Demokratie und Fuhreschaft）、《教育理想与政治理想》（Padagogisches and politisches Ideal）之类，再由各地团员随处聚集工人从事讲演，即以此种专书为讲演材料。讲演之后，复与工人辩论，辩论结果，仍趋到书中主张。譬如该团主张领袖制度，反对德谟克拉西制度，辩论结果即归到本题吾辈何以必须主张领袖制度之理由。讲演毕，即由听讲工人著成纪录，送交该团各地之领袖检阅。如有错漏之处，并即批出，令其修正，使工人对于此种主张有深刻之印象。总之，该团活动极有统系，换言之，即一切主张皆由大首领传授于小首领，再由小首领直接传授于工人，此该团活动之程序也。

此次该团举行第四次年会，于开会之前十日，各地小首领即纷纷齐集苟廷根。先是，该团大首领纳尔逊教授于各地小首领未到以前即提出种种问题，令其先行思考。届期各小首领齐集苟廷根后即行开会讨论。该团开会之期为八月十日，此种讨论会则从八月一日起开始，每日讨论九个钟头。第一次所讨论者为德国现在各种痛苦，例如经济之

困难、道德之堕落、教育之衰废等等；第二次所讨论者则为如何救济上述各种痛苦之方法；第三次所讨论者，则为既欲救济各种痛若，则本团宜如何积极进行；第四次所讨论者，则为《德谟克拉西与领袖制度》及《教育理想与政治理想》两书之内容（该团出有丛书三十余种，上述两书则为最近出版者）；第五次讨论选择团员之方法；第六次讨论团员对于团员及“非团员”之态度（当讨论此种问题时，有一团员曾起立质问：“吾辈对于外国人宜持如何态度?”该团首领即斥之曰，“吾国既名国际青年，更何有外国人内国人之分？现在君提出此问，足见君深受国家主义之毒，故不知不觉间遂形流露”云云。其不稍假借有如此者）；第七次讨论该团对于各党之态度（当时论此问题时，该团痛诋一切党派，其中认为比较的可以接近者，只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前后共讨论七次，讨论时只有彼此补充，绝少互相争论，决不似吾国“少年中国学会”讨论学会问题之激烈。此盖由于国际青年团系一种领袖制度，奖励服从；而“少年中国学会”则是德谟克拉西制度（“少年中国学会”始终未设会长理事等等名目，实为吾国青年团体中之最德谟克拉西化者），最奖励自由发展个性者也。

该团在开年会之前，除开讨论会七次外，中间曾全体旅行一次。既开年会之后，又复全体旅行一次。故凡参与该会者，不着游戏衣履即服旅行装束，磨拳擦掌，豪气逼人。此则又与吾国青年团体之缓带轻裘从容辩论者，大异其趣也。

三

记者此次关于“国际青年团”之通信，往往详述该团开会细节，盖以开会程序虽无关宏旨，而殊方异俗则足供吾人参考，故不厌求详。今请再与诸君一述当日开会之情形。

八月十日午前七钟，记者晨餐未就，而吾友魏时珍已临寓所，于是匆匆出户，偕往大学游戏场。其时该团团员业已群集该处，多向记者握手为礼。是日天气微冷，吾辈身着秋衣方嫌寒气侵人，而该团男女团员则无不只着卫生操衣一件，赤臂露腿。即以此种耐寒能力而论，吾辈实已自叹不如。记者曾谓欧洲青年之思想言论行为，吾辈因种种环境所限虽已相形见绌，然若能从此兼程并进，尚可亡羊补牢；惟身体之衰弱，则已成先天败征。偶与欧人相较，辄复隐痛于心！年来吾国青年团体，只知出丛书、编杂志，以求知识之增进；而对于身体之训练则多漠然视之。殊不知来日大难，正待健儿身手；若吾辈之孱弱身躯，则真不值白人举足一踢也。苟延残喘且不可得，事业学术云乎哉？此次国际青年团开会，第一步即为男女团员共同赛跑，第二步则为赛球跳高各种游戏。直至十点一刻钟，始离大学游戏场，同赴苟廷根附近之 Nikolausberg 山上。山中有咖啡

店一所，高踞峰头，可以俯览荷廷根全城，为该地风景最胜之处，该团会场即设其中。入门时检查招待券后，即一一自行签名于桌上，并注明职业年龄等等。随即购买午晚两次素餐券一张，价四十五马克。场中除正面墙上高悬中国国旗两幅，饰以花叶外，此外各处柱头桌上则置德国国旗，惟于旗上贴一红纸，以表明左党之意。场中有餐桌数十，每数人围坐一桌。桌上除国旗外，复饰满红花绿叶，颇为美观。坐定由该团首领纳尔逊君述开会词，并令与会诸人各自报告其姓名国籍。于是到会诸人一一起立，依次报告。计是日到会者，除中国人外，尚有英瑞法等国籍之人。报告即毕，即由该团干事Schmidt君报告一年来团务之经过情形。继由各地领袖报告各该地团务，大约多是关于工人教育之事。报告毕即行聚餐。各人位次皆依姓名第一字母排列，食品异常简单，只有马铃薯与荚豆两种。每桌皆派有团员一人，担任检查餐票及取携食品之职。食毕即出场休息，各携二三友人散步于峰顶谷畔。迨至午后四钟复行开会，由该团首领纳尔逊君报告筹办政治哲理大学情形。报告后，复稍事休息，略用茶点。用毕，群往山中一峰，席地而坐，静听Hessenberg君之长篇讲演。其时夕阳返照，微风徐来，男女青年，并肩临坐，山光人影，相与欣然。Hessenberg君之演辞甚长，约费两钟之久。彼极力攻击现代德国教育制度，谓从前德国佛烈大帝之教育宗旨，系主张凡能作世界上之一善良分子者，即可作国家中之一善良公民，此其主张，极为正当。迨至黑格儿氏一出，遂反其道，乃谓凡能作国家中之一善良公民者，即可作世界上之一善良分子。于是德国教育遂完全陷于国家主义云云。篇末更极力推崇柏拉图之理想。演辞既竟，复入会场举行晚餐，每人只有甜饭一盂，较之午餐更为简单。餐毕，为时约在九点，复赴山后峰头举行火祝。峰头积有干柴，高可盈丈；火光既起，山色皆红，与会诸人互相携手，围绕火前作一大圈。忽而乐声大作，群起环火跳舞，颇令人发生神秘思想。其时更有少年工人某君（年约十六七）起立演说，一种红色革命之精神，更蓬勃不可遏抑矣。

次日午后该团首领纳尔逊君复邀约记者及吾友魏时珍君与其他各地团员在其家开一茶话会，纳尔逊君并将彼与辜鸿铭君之往来信札举以见示。更有瑞士某女士以辜鸿铭所译之华籍，与德人威廉博士所译华籍，其意义间往往有相异之点，举以相询，孰真孰谬，何去何从。盖其校勘之勤，殊不亚于吾国之经生家，更不亚于吾国新学青年之熟读杜威、罗素著作矣。

此次之会，令人有三种印象：第一，该团开会首重体育，与吾国青年团体开会之专务清谈者，完全不同。第二，欧人团体办事积极，与吾国青年团体之办事轻松者迥然不同。譬如现在德国经济困难，旅费维艰，而远道与会者尚有一二百人之多。即此一端已可概见。第三，欧洲青年无论何种集会，无不兴趣浓厚，与吾国青年集会之索然寡欢者根本不同。譬如此次开会，深夜举行火祝，环火而舞，昂首而歌，使人有深刻不忘之印

象。不但青年团体之集会如此，即其他各大政党，每开年会亦无不举行各种游艺跳舞。同党之人，有如家人父子，兄弟姊妹，决不似中国党派之只谈政治，干燥无味。故记者以为欲救今日不知人生之中国人，只有多多培养其兴味，使知有生之乐，否则日趋衰暮，非至全民族皆陷于不生不死之状态中不止也！

（上海《申报》）

癸　杂著书札

五十二　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的感想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是法国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生于一七七二年，死于一八三七年，为近世所称社会主义三大创造理想家之一。所谓三大创造理想家者，即圣西门（St. Simon）、涡文（Robert Owen）、傅立叶是也。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农村上面的，据他的理想组织法郎克（Phalange）之计划，若每个法郎克包含一百三十五组（Serie），则其中便有八十组是属于农事的（以五十组从事耕作，以三十组从事牧畜），其余的二十组属于工业，三十五组属于教育游戏之类。因此之故，凡富于建设新村理想的人们，尤其是生长于农业立国的中华民族，偶然读了傅立叶的学说，更觉得加倍有趣。

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潮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中国的经济组织应该改造，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派别甚多，究竟那一派主义比较合式？改造中国的方法甚多，究竟那一种方法容易收效？这却是一个狠大的问题。

我以为实行主义，第一是不要忘了“时间”。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马克斯学说，觉得他在理论上的根据甚为圆满，但是他在实际上的效力究竟如何，我们总不十分清楚。直到我来欧洲以后，看见欧洲工业发达的情形，工人运动的状况，然后更觉得马克斯学说亲切有味。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时便没有这种感觉呢？这便是因为欧洲人现在是过的二十世纪时代，而我们中国的工业与工人，照目下程度，只算是过的十八世纪时代。前后相差两个世纪的时间，马克斯学说怎么能使中国人感着兴趣呢？

第二是不要忘了“空间”。为什么同是一个社会主义，在法国就变成工团主义，在

英国就变成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就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在俄国就变成布尔塞维克主义呢，这便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质不同，彼此好恶相异，所以社会主义也就随着空间发生了变化。上面所说的法、英、德、俄还是工业、文化、习惯都相差不远的，已有如此差异，若在我们远居东亚，习惯、文化根本不同的中国，其相差的程度又将如何?

由上述两点看来，中国虽然是急于需要一种主义，但是这种主义不是现成的，是要我们创造一个适于中国之“时与地”的主义。

因为这种原故，傅立叶的学说虽已不适于欧洲的“时与地”，但是对于中国的“时与地”却还有几分存在的价值，其最要之点有二：

一、俄国列宁政府的第一个敌人，不是资本家，不是旧皇室，而是一般农民。德国现在已算是一个“大半个社会主义政府”，而一般农民乃属于旧党方面而立于现政府反对的地位，足见农民这个东西，在社会主义上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了。我们中国的农民，既占去全体国民人数百分之八九十，我们断不能叫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都变成工人来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我们既时常口口声声的喊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那么，我们又断不能为了租界内少数工人，便忘了内地多数农民。总而言之，我们改造中国，第一步便应该就农民身上着想。若要实行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筑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因此傅立叶的学说，对于我们便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不但就中国情形言应该从农民方面着想，就是照世界分工而论，亦应该注意农业。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差不多先后变为“工商国家”了，大家对于农业亦不如前二三世纪之重视了，但是农产物终为一切工业品之源泉，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虽不能如前代自然学派（Die Physolkratische Lehre）的只承认农业为生产，而否认一切工商，但是我们为世界分工起见，亦初不必一齐放下锄头跑到工厂。

二、现在我们都知道都市的罪恶，而工业集中又为都市发达原因之一。近来有许多人主张化都市为乡村，但是在欧美各国若欲化已成的都市而为新设的乡村，这是何等困难的事?我们中国好在还没有几个大都市，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事业皆植基础于农村之上，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新式的组织，而且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皆建筑在一个基础上。朋友们！这便是我们未来的“工读互助社会”。

有人以为若照着傅立叶的计划另建新式村庄，一切旧式房屋皆在废弃之列，岂不可惜?朋友们！你试想想，我们故乡那种牛棚马棚式的房子还应存在吗?还不应该速起改造吗?我对于傅立叶的理想建筑，亦不是完全赞同的，我以为应该按照各地情形与各人嗜好，不能“划一不二”，使人强同。不过中国的居住应该根本加以改造，这一点我却是自信不疑。

傅立叶所拟的制度，其中有很多神秘奇怪的，我们读他的学说，只须研究他的根本

主张便够了，至于那些神秘奇怪的制度，可以存而不论。

总而言之，朋友们！现在我们最大的责任，便是农村改造，便是创造一种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

（坎拿大《华人工会刊物》）

五十三　中国人之生活颠倒

——青年烦闷之最大原因

一

我们一个人在这大宇长宙中，仅仅得着这一片有涯的生活，而学生时代的生活，又仅仅是这一片有涯生活中之小小一段。这是何等的可贵！但是被我们糊涂的师长、腐败的社会已经将我们的可贵生活白白的送掉了！既送掉了，便再也唤不转来，这是何等的残酷！我们若推原祸始，当归咎于“生活颠倒”四个大字。

一个人的生活，当依照年龄的老幼分作几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中，各有其特别嗜好之目的物，这种目的物是不能随意更换的，那个时期亦不能随意倒置的。若在正当时期内发表其正当嗜好，则个人人生立呈活气；若时期一旦错过，所嗜又不如愿，则个人人生立陷烦闷。一个民族的兴盛，全由于那个民族中的个人活气蓬勃，如朝日初升；一个民族的衰亡，又全由于那个民族中的个人烦闷颓丧，如冢中枯骨。欧洲人深懂得这个道理，凡在正当时期内之正当嗜好，无不使之自由发展，以助长其生机。故欧洲人无“过时”之叹，无烦闷之象，所有事业、学术，皆建筑在这种活气之上。反之，中国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凡在正当时期内之正当嗜好，务不使之自由发展，以斫丧其生机。故中国人皆有“过时”之感，皆呈烦闷之象，所有事业、学术，皆葬送于这种暮气之中。现在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督军造反，亦不是日本抢劫，是在我们举国青年的人生皆陷于烦闷。烦闷之最大原因，便是生活颠倒。这“生活颠倒”四字，真可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催命符”了。现在我们最大的责任，便是把全国青年引到一条生路上去。若是这个问题不得解决，则闹什么外交问题、内政问题皆是无益的。因为外交、内政问题即或一旦解决了，我们还是过的“猪的人生”、“狗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好处？

二

一个人的生活，究竟应该分作几个时期？这个答案，因为各人的观察不同，是不能

完全一致的，但是大体上仍不甚相远。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这几句话，是从生理上把一个人的年龄分为三个时期，每一个时期所嗜之目的物各有不同。不过孔子专从消极方面立论，说一个"戒"字罢了。孟子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这几句话，是把一个人的嗜好从年龄上分别起来，可以大别为孝弟、恋爱、名利三种，这是普通人不能跳出的原则。古今来违背这个原则的，五十而犹慕父母，据孟子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大舜。总之，孔子孟子对于一个人的年龄应分作几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中各有其特别嗜好，这个前提他们俩都是一致承认的。最近我读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说，他从心理学上观察，也把一个人的年龄分为五个时期，每一个时期为一种"欲"所支配。其次序如下：

一、童年时代（自一岁至十五岁），为友谊欲盛行时期（按此友谊二字似宜活看，颇与吾国之孝弟二字相近）。

二、少年时代（自十六岁至三十五岁），为恋爱欲盛行时期。

三、壮年时代（自三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为恋爱欲及好名欲盛行时期。

四、成熟时代（自四十六岁至六十五岁），为好名欲盛行时期。

五、老年时代（自六十六岁至八十岁），为家庭欲盛行时期。

傅立叶以为支配人的行为，不是"智"与"理"，而是"欲"。现代社会制度之下，因为各种"欲"皆未能正当发展，所以产生不安现象。而人们却错把"欲"认为一切紊乱秩序的源泉，当作一种危险有害的东西。

除以上三个人的议论外，我还有一段事实足资佐证。去年夏天，"德意志国民党"在一个大森林中开游艺会，我同了几个德人家庭前往赴会。那日开会情形给我三种深刻印象：第一便是开会前儿童争赛玩具。与我同去的那些小孩子，在会场中购了许多玩具，都跑到我的前面玩给我看。他们觉得天地间的快乐，再没有比玩具更好的了。第二便是开会时，国民党人登台演说德国政情，与我同去的那些年长的男子，都挤在台前静听，感慨欷歔，不能自已。他们觉得今日最重要的事情，再没有过于这场演说了。但是同时那些与我同去的年长的妇人，却仍然远远的坐在茶桌旁边，高谈德国生活昂贵情形，亦是感慨欷歔，不能自已。她们觉得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再没有过于面包跌价了。第三便是开会后大开跳舞会。与我同去的那些妙龄女郎及少年男子，既无意于儿童玩具，复无意于讲演政治及畅谈生活，至是忽闻将开跳舞，无不生气勃勃，兴致洋洋。音乐之声一起，男女之防立撤，于是相依相抱，大跳特跳，直至夜半十二钟犹不忍归。我素日认为性情庄重、不苟言笑之几个女子，到此亦莫不眉飞色舞，大有情不自禁之感

了。他们觉得今日的快乐，再没有过于男女跳舞了。我是一个外国来宾，而且有无限心事，当然对于儿童玩具、讲演、政治、畅谈人生及男女跳舞种种，都没有兴味。我那天自朝至暮，在会场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冷眼旁观，觉得欧洲人自少至老，无不心有所托，情有所泄，所以他们永远是活泼泼的，只知向前进取，不知烦闷悲观。我们中国人则大半落落寡欢，缺乏兴趣。我们二三十岁的青年，有时还比不上欧洲七八十岁老人之兴味浓厚。其最重的原因，便是我们那种应时而发的情，偏不准他发；那种应时而有的欲，偏不准他有。但是这种不准他发、不准他有的手段，既是违反自然，当然是不能持久的。那种情欲始终有发泄之一日，不过发泄之时，已经不是“应时”而是“过时”了，这便是中国人的生活颠倒。

照上面这段事实看来，更见得一个人的年龄大小与嗜好种类有密切关系，是不能随意更换倒置的。我这篇文章，当然不是为着大舜那种“非常人”做的，是为着我们大多数的“寻常人”做的。我以为“寻常人”的生活次序，可以分作下列四种：

一、自一岁至十五岁为游戏欲最盛之时。

二、自十五岁至三十岁为恋爱欲最盛之时。

三、自三十岁至六十岁为名利欲最盛之时。

四、自六十岁至八十岁为子孙欲最盛之时。

若以植物生长次序为喻，则第一种像萌芽，第二种像开花，第三种像结果，第四种像生子。如能应时而发，则生气勃然，如系过时始发，则生机斫丧。

三

欧洲人既深懂得一个人的生活次序，故他们不但不制为种种学说以禁欲，而且特为种种设备以助欲。现在我们试看一个欧洲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第一，欧洲人当小孩子一二岁知道游戏的时候，父母便给以若干极有意义之玩具。每逢佳节，亲戚友朋亦以此为馈赠之品。故德国中等家庭，其子女之玩具平均总在数十种以至于百种以上。年龄稍长，送入学校读书，其开始一二年所学的差不多都是关于游戏之事。渐长，虽略授以普通常识，但是游戏、溜冰、踢球及其他各种游戏技术，亦无不于此时加以训练。故德国儿童游戏技艺，每人至少在十种以上。总之，在十五岁以前，可以谓之为游戏生活，除游戏外，万事皆不过问，所有那些玩具的设备，都是专拿来助长他们游戏欲的。第二，到十五岁以后，情窦初开，遂知有所谓恋爱。其时所亟亟从事的，则为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诸技艺，因为非如此不足以得着男女交际的机会，更无以表示其温文尔雅的态度。做父母的虽值此战后经济困难之时，而此种学习音乐跳舞之费用决不吝惜。每逢休

暇之日，一对一对的初恋男女，互携乐器，偕往幽静的山林与繁华的园囿，以消磨他们春花秋月的时光。吾友宗白华君遍游德国全境后曾向我说过："德国所有美术建筑，察其设备，几无一不是专为男女私约而设的。"故欧洲青年男女除恋爱生活外，别无所谓生活，所有求学作事之奋发猛进，亦无一不建筑于恋爱之上。吾友周太玄君所作之《初秋的巴黎》一文（见《少年中国》三卷四期），描写巴黎大学生恐怕考试落第的情形，其中有一段说：

"……他们心中怕，怕的是若不能考过，失掉了他们的时光，阻止他们的愿望，辜负了父母家庭朋友的关心，更无以对那在暗中替他努力的心爱的人……"

可见他们的努力，大半都是为他们那个心爱的人。欧洲的习俗，恋爱虽狠容易，而结婚却狠困难，因非有能在社会上立足之技能不足以言谋生，生既不能谋，更安有婚之可结？他们为圆成恋爱好梦起见，故不能不向前进取，历尽千辛万苦皆在所不惜。每日辛苦之余，只须五分钟时间与其所欢一见，已足偿其一日之劳，决不知有所谓烦闷。所以欧洲青年在三十岁以前，可以谓之为恋爱生活，除恋爱外，万事皆不过问。所有那些音乐、美术、跳舞、山林园囿的设备，都是专拿来助长他们恋爱欲的。第三，到三十岁以后，则为名利欲最发达的时候。其时甜蜜之恋爱生活既已尽量领略，而人世渐深，争名夺利之念又随之而起。因欲求名，便不能不努力于学术功业；因欲得利，便不能不努力于工商事业。欲讲求学术的，便有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等可以利用；欲建树功业、发达工商的，便有政党、工厂、殖民地等等可以利用。因此之故，欧洲学术事业、工商事业皆能冠绝一时，推其原因，皆由于欧洲人不讳言名利的缘故。故欧洲人在三十岁以后，可以谓之为名利生活，除名利外，万事皆不过问。所有那些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政党、工厂、殖民地的设备，都是专拿来助长他们名利欲的。第四，自六十岁以后，则为子孙欲最盛之时。欧洲人到了六十岁以后，大概退老家居，由国家给以养老金（德国官吏六十五岁退休）。桑榆晚景，绕膝承欢，这是古今中外都相同的，不过欧洲人没有中国人那种"无后为大"的观念罢了。

总之，欧洲人无论游戏生活、恋爱生活、名利生活及暮年生活，都是及时而让其充分发展。因而他们的生机既未摧残，他们的事业亦日益繁茂。换一句说，他们一生学问事业，大半都是由于各种欲在他们背后督促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喜讲"动机论"的人看来，诚然不甚瞧得起，但是欧洲人却因此成就了许多伟大的事业，享受了一个愉快的人生。

四

现在试看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据我看来，则恰恰与欧洲人相反，无处不表现其“生活颠倒”的样子。当欧洲人尚在游戏生活的时期，正是我们在私塾中读四书五经，或是在学校内听教习讲人生哲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师向来奖励那种“静坐如成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学得一两样游戏技艺，所以我们的活泼天真与健全身体，都被我们老师断送了。当欧洲人十五岁以后已入恋爱生活的时期，又正是我们“以天下为己任”、“少年老成”、“男女防闲最严”、“以理克欲”的时候。假如我们那时偶然男女交际一次，便要加上一个“私德不修”、“有辱门楣”的头衔，甚至于因此竟要影响到我们终身学术与事业。但是恋爱欲这样东西的魔力，是谁也挡不住的。因此之故，一般青年人既怕社会制裁，外面不能不假装一个伪君子，至于里面呢，精神上的损失，便是烦闷，身体上的损失，便是手淫。所有活泼天机与健全身体，在童年尚未断送完的，到此遂不得不宣告“寿终正寝”了。当欧洲人三十岁以后，已入名利生活，努力学术事业的时期，却正是我们中国人狂嫖滥赌的时候。因为嫖是中国惟一的恋爱生活，赌是中国惟一的游戏生活。在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所压迫而不准发泄的两种欲，到现在真是关不住了，真是不得不横决了。而我们中国社会对于中年人发生这种嫖赌事实，向来又是“特许”的，因为中国社会向来奖励“少年刻苦，老来享福”。只要自己能赚钱了，嫖赌纳妾算不了什么事。我们试看现在的军阀、官僚、豪商、政客，叉十万元底的麻雀，叫几十个妓女陪酒，社会上是不大责备的，因为社会上承认他们已经到了该嫖该赌的年龄了。此外还有两个好例：我记得孙少侯君在他那篇忏悔文章里面（见上海《星期评论》）曾经说过：他中年晚年之所以纵欲，是由于他少年时代之绝对禁欲。还有一位中国社会的先觉某君，他在少年时曾做过一首诗，表示决不纳妾之意：“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作后人师。”但是后来听说他又已经娶妾了。又某君在少年的时候何等发扬奋励，但是后来在袁政府时代又大赌而特赌了。我所以举这两个例的缘故，并不是我承认孙君之纵欲与某君之纳妾聚赌是合理的，不过从此我们可以得两个结论：第一，童年时代之游戏欲与少年时代之恋爱欲，虽能压抑一时，但是终有一日要横决的；第二，中国社会亦承认这两种欲的势力，但是宁肯让他“过时”以后横决，决不准他在正当时期内为正当的发泄。因此之故，孙君及某君便不能逃出这两个圈子了。我们试想人到中年以后精力既富，学识亦丰，正是欧洲人奋斗进取、立功立名之时，而我们却被那种游戏欲与恋爱欲之蠢动纠缠不休，以至于一事无成。这是一个民族中何等重大的损失呀！在我们中国伪君子社会，向来不甚瞧得起欧洲青年男女之自由

恋爱生活，谓为伤风败俗。但是中国社会，却不知道欧洲中年以后之人绝少狂嫖滥赌之事。两相比较，我不晓得是谁得谁失？当欧洲人到六十岁以后，精力渐衰，正将退休领取养老金之时，而我们中国人却正是开始替国家做事之际。故充满政界高位的，大都是一些聋子瞎子、五官不全、酒色过度、行将就木之人。而且在这种白发龙钟、事务繁重之时，又到了该讨那红颜薄命替人生儿的姨太太之年龄了，又要重新再过欧洲人之少年时代的恋爱生活了。这便是中国人的生活，这便是中国人的颠倒生活！

五

从上面看来，我们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时期各有其所嗜。欧洲人能应时而发，故生气勃勃，中国人皆过时始泄，故暮气沉沉。现在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一）究竟一个人在某种年龄内所应嗜好之目的物，是否同时可以用他种目的物替代？（二）究竟一个人的嗜好时期是否可以随意前后倒置？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否”字。我有几位少年朋友曾经向我说道：“照我们现在年龄而论，应该过恋爱生活，但是中国社会不许，我们只好另选一种目的物，如学术事业之类，来替恋爱以寄我们无可奈何之情。”这种高调最易动听，而且我亦相信世界上有一种“非常人”可以实行这种高调。但是我们立言持论，总应该为“寻常人”着想，万不能把一个四万万人的民族，都使之成“非常人化”。我的朋友那种说法的错误，便是太重视一个人的理智作用而忽视了感情作用。寻常人的行为，受感情作用之支配大于受理智作用之支配。愈是感情丰富的人，愈不能以理智作用驾驭一切。所谓学术事业，皆偏于理智作用，要想用这种理智作用把一切感情冲动、生理要求都一笔抹煞，若不是自己解嘲，便是自己戕贼，这是万办不到的。即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到了，试问这种违背人生的禁欲，又有什么可贵？到头来不过自己为那种违背人性的中国社会多添一个可怜虫罢了。我看见许多青年，自己高调尚未唱完，因受欲的压迫而挨不住的已大有其人，我们更何必拿这种高调去骗其他的青年呢？我以为我们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投降社会（即是压迫正常情欲，敷衍腐败社会），一种是投降情欲（即是发展正当情欲，打破腐败社会）。除此外，所谓理智，所谓意志，都是废话。因为理智、意志，是拿来成就我们的学术与事业的，不是拿来戕贼人性、违背自然以敷衍社会的。以上是说明所嗜之目的物不能以他物替代的缘故。至于嗜好时期，亦不能前后倒置。儿童时代的快乐，决不是少年时代所能再得；少年时代的快乐，决不是中年时代所能再得；中年时代的快乐，决不是老年时代所能再得。这是由于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关系，不是用人力可以转移的。而且一个人的四种生活，分配在四种年龄内，正是天造地设，再好没有。在某种年龄内则为某种生活，专心

壹志，情不外溢，然后对于事业才能有成，对于人生才觉得有趣。譬如恋爱一事，我们若向小孩子谈起婚姻问题，他们的心中却正想着游戏；我们若向中年人谈起婚姻问题，他们的心中却又虑着饭碗；所谓纯洁恋爱的滋味，决非这两种人所能领略。至于少年人呢，那就大不同了。我常在德人的席上看见一对一对的初恋男女，他们那种甜蜜滋味，真是天倒下来也是不管的。从此，我们便知道一个人的嗜好时期，是不可以随意前后倒置的。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为什么我们自命高等动物的人类，偏偏要失时，并鸡豚狗彘之不如呢?

六

所嗜的目的物既不能随意替代，嗜好的时期又不能倒置，究竟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呢? 我以为：童年时代，须尽量发展其游戏生活，在童年时代之下半期（自十一岁至十五岁），则兼为恋爱生活之预备（德国儿童十二三岁时，父母便令其学习音乐，以为将来少年时代男女交际场中之用。在校中讲生理解剖时，则兼及交媾之学）。少年时代，须尽量发展其恋爱生活，在少年时代之下半期（二十岁至三十岁），则兼为中年时代名利生活之预备。中年时代，须尽量发展其名利生活，在中年时代之下半期（五十岁至六十岁），则兼为暮年生活之预备。如此一个人的生活始前后衔接，不致先后倒置。我最恨中国的教育家，把一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话，一齐都读与小孩子听，所有"持身接物待人"的古训，一齐都让小孩子去做，对于儿童当前的游戏生活与转瞬将到的恋爱生活，反毫不过问。总之，教育宗旨立得比天还高，而个人生活则一任其枯寂烦闷，并鸡豚狗彘之不如！近来有几位美国式的教育家提倡教育须注重实用主义，但是可惜只提倡了一半。因为他们以为学校所训练的，只是要与社会生活相应，而不知道学校所训练的，不但要与社会相应，而且要与个人生活相应。若是我们个人生活还是这样枯寂烦闷，即或社会事业日益发达，请问又有什么好处?

现在中国青年陷于烦闷悲观，有人说是由于智识恐慌的缘故。其实这种揣想未免太高尚一点，因为青年急于求知，诚然是一种事实，若因求知不遂便陷于烦闷悲观，则又未必尽然（因为少年时代名利欲尚未充分发达之故）。我以为青年烦闷的最大原因，便是人生问题未得解决，青年的人生问题，便是恋爱问题。其中有一部分烦闷的青年，已经直接知道是这个问题在那里作祟。其中又有一部分烦闷的青年，他们的生理感情间接为这个问题所支配，因而流于烦闷，但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总而言之，恋爱问题为少年时代之中心问题，不得正当解决，则流于烦闷悲观。现在我们要救全国的青年，只有把他们的人生引到正当轨道上去，务使每一个人的正当情欲，都在每一个相当时期内正

当发展，然后中国人才有生气，才不至成为冢中枯骨。

朋友们！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应该享受那种生活了？你还不急起直追呀！青年朋友们！你对于将来的世界人类，还有多少事未做呀！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旧社会的压迫，竟勉强遏止正当情欲，终日落落寡欢，以丧其乐生之心呀！

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草于德国佛兰克府

（上海《学生杂志》）

五十四　分工与互助[①]

旅欧杂感之一

分工二字是经济学上的名词，而且是十九世纪资本勃兴、机械发达所产生的结果。分工愈细，生产愈多（据亚丹斯密引造针为例，若分工则每人每日平均可造四千八百个，若不分工则每人每日至多只可造二十个），因之资本家遂大赚其钱，造成今日之资本世界。反之，劳动者因分工的结果，终日从事局部的劳动，毫无生趣，如同牛马，一旦被厂主斥革，既无全部制造的技能，不能独立营生，其结果仍展转投降于资本权力之下。故现在无政府主义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排斥分工制度，我以为这种见解，全是一种反动，并未适合事理。我们反对资本家，常常骂他们违背人道，摧残人类，但是伴资本主义而发生的一切制度，则不必尽是违背人道，摧残人类。只要我们用之得当，更将造福人类，何必一概排斥。譬如古代人民，终日劳苦，而所得之物质幸福则远不如今日，因为他们的仇敌，不是资本家，而是自然界。自资本制度勃兴后，一切企业皆为大规模的组织，实行分工制度，人力战胜天然，故生产丰富，造成今日之物质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的仇敌，已不是自然界，而是资本家，倘我们把资本家的枷锁打开了，又从新把自然界的枷锁带上，这岂不是愚蠢办法么？分工制度便是打破自然界枷锁的利器。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是由资本家指使，而由我们工人自动；所生产的结果，不是资本家夺去，而由我们工人处置，则分工制度我们实有利用的必要，不宜排斥。

分工原则不但是经济学上可以应用，即一切学术事业、社会事业亦应援用，始能收较大效果。现在学术发达，分工日细，个人终身专学一门，尚有惟日不足之叹，而况身

① 本文写于1920年9月19日，曾发表于《旅德周刊》，1921年1月15日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

兼数艺，见异思迁。我常常看见许多朋友，你若问他，什么都懂，但是其结果什么都不懂。这种多方面的学者，若在浅薄的社会中，自然是游刃有余；若一旦说到精深学术，便不能插嘴了。所以我希望一般朋友须认定求学是为现在社会或将来社会的，我们须各尽所能，专精一艺，所走的路愈狭愈好，愈没有人走愈好。因为我们的宗旨在使社会进化，在使社会上各分子得各尽所能，实行分工。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学术方面，至于社会事业更非分工不可。我们一个人所生不过百年，所居限于一地，社会上所应办之事如许之多，一个人的精力又如此有限，与其今日办这样，明日办那样，劳人草草，一事无成，不如聚精会神，专办一事，终身以之。因为一个人一生办不了几桩有益事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常见欧洲留学朋友，所学尚有一个范围，若问他将来究竟从事何种事业，则多瞠目不能对，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们在求学期间至少要确定将来事业的范围，与如何着手的方法。总之要时时自思，我是社会的一分子，我应该分工，不然便对不住衣食住三位先生。

我们既知道分工的意义，同时更应知道互助的关系。因为愈了解分工的人，愈感觉互助的必要；愈知道互助的人，愈感觉分工的利益。只分工而不互助，与只互助而不分工，都是得不了较大的效果。

互助二字本是生物学上的名词，现在已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了。我的朋友傅孟真君说："中国是无社会的国家。"无社会的国家，自然说不上互助二字。欧洲人爱国、爱社会、爱团体的思想，比中国人发达，但是他们互助的出发点，是由于智识，而非由于道德。他们知道一个人是不能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若不互助则不能得较大的利益。他们的互助是把利己心的范围扩大，谋个人较远较大的幸福。他们是以互助为手段，以利己为目的。所以外国社会表面上是很团结坚固的，而里面则个人对于个人之间，仍是冷酷无情的，利之所在，虽父母兄弟不能相顾。以如此利己的国民，而犹能爱护团体的原故，这便是因为他们的智识，知道非互助不足以达到利己的最大欲望。

外国人之互助，虽可以为普通人说法，而我们却不可引以为师。我们需要的互助，其基础是要立在道德上面。换言之，互助是我们人类应该的事，是我们"爱的本能"之冲动，行其心之所安，用不着先存报酬的观念。如此做去，方能造成"真正多情的社会"。

我们既知道分工的意义是各尽所能，互助的出发点是由于道德，现在我们便应该讨论怎样才能实现"分工互助的社会"。

我以为第一步须从团体训练入手。因为中国是无社会的国家，没有社会供我们训练。外国虽有社会供我们训练，但是我们将来大半是要回中国的，仍不能不先约同志实行分工，以便将来回国后共同工作。譬如研究农学的，便可邀集几位同志，甲去研究农

业化学，乙去研究农业机械学，丙去研究灌溉法、播种法，丁去研究农业经济，戊去研究……，精益求精，将来回国后，彼此合起来，便可组织一个很好的农事组织。又如研究新村的，我们亦可邀集同志，甲研究新村的经济，乙研究新村的教育，丙研究……，现在新村虽未具体实现，而我们脑中已先有一个新村雏形。以上系说分工的利益。至于互助呢，因为我对于外国社会的互助，尚不十分满意，所以我尤主张中国同志结合团体，实行我们理想中道德的互助。

我们既感觉人类有改造的必要，又认分工互助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进化的社会，我们便同时觉得自己在这人类全体中，究竟负一种什么责任？我们清夜自思，究竟我们对于社会分了一种什么工？自极高深的专门学术至极浅易的手工艺，我们究竟得着一种么？这种学术工艺对于社会究竟有无利益？我们所谓互助是否以此为手段，达我们利己的目的？假如以上各问题，我们都有心安理得的答案，不是自己骗自己，那么，我们分工互助的理想社会，立刻就在我们的面前了。

九年九月十九日自德国佛郎克寄

（《少年中国》）

五十五　德人对各国侨民的情感

欧战时，德意志以一国与世界各强国为敌，除了土奥保三国及少数的中立国外，都是他的敌国，他们对于敌国的侨民当然没有很好的情感，故战后德意志的国民对于侨民都含有几分排外的思想。

但是同是排外，其中亦有轻重之分，同是德意志国民，因为知识和地位的关系，对于各国侨民的情感亦有相异之点。我们详细考察他们对于各国侨民的态度，便可以窥见他们国民对外的方针。因为他们现在是民主国，他们的态度是与他们政府的外交方针有极密切的关系。

一、对于日本侨民的情感　我们中国一般人多以为，战后的德意志要想恢复远东国际的势力，必与日本勾结，故日德将结同盟之说喧传一时，即日本人心中亦有此妄想，故当欧战的时候很送了几次秋波。欧战后日本人来德国的亦复不少，并且极力邀约德国退职的军官到日本去，以便练兵打仗。但是中国人虽是这样推想，日本人虽是这样妄想，其实德意志人对于日本侨民的情感异常恶劣。当欧战以前，日本人对于德意志的一切文事武备，无不模仿的维妙维肖。在德意志人心中，亦以日本为远东的唯一良友，设有缓急，必定可恃，故对于日本人来德求学的异常优待，如颜料实验、医术实验、军事

学等等不肯轻易示外人以秘密方法的，而日本人独蒙优待，尽得其秘密方法去。迨欧战起时，日本竟加入协约，无端而夺取青岛。德意志见日本此种投井下石的举动，乃叹人心之险一至于此。某德国博士曾向记者说道："当德国向协约宣战时，曾宣言青岛系德国向中国租借的，将来必定由德国直接交还中国。日本以何因缘竟派大兵攻取青岛，而以从前在德意志偷得的军事知识还攻德国？此仇吾德意志人必不忘也！"于此可以想见德意志人对于日本感情的恶劣了。然此犹就感情方面而言，若以事实而论，德意志人尤有深恨日本之处，即战后德国的颜料、医术两业大遭损失是也。日本人在欧战前既尽得德国颜料、医术的秘密方法以去，乘欧战中尽将德国颜料的销场、医术的专利皆由日本侵占替代，于是德意志人更恨日本入骨，记者邻居的颜料商某德人即因此破产。现在外国人来德研究医学、化学及颜料等等，已不易得实习的机会，盖恐再遇第二个以怨报德的日本人。

二、对于中国侨民的情感　德意志人对于中国人的情感，则分两派：在一般下级社会的人，以为欧战与中国无甚直接关系，而中国竟向德宣战，他们颇以为滑稽，而且为德皇的黄祸论所欺，以为中国将与日本串通一气危害德国。此种思想不独德人为然，当记者旅居巴黎时，曾有一法国人谓记者曰："中国与日本将来是否要联合来攻欧人？"此皆黄祸论的遗毒，故德国下级社会对于中国人亦有排外之意。惟德国的政治家及知识阶级深知中国在国际上之关系，故对于中德宣战之事颇能相谅，并且知道中国需要德国的熟货，德国需要中国的原料。近来德国因为原料不足，各工厂多无工可作，又因运输不便，熟货停滞，价值下落，故彼等急欲恢复中德邦交，对于中国侨民颇有欢迎之意。记者初到德国，在警察署报到，警官问记者道："还有中国人来么？吾德人甚希望中国人来此。"读者诸君须知现在德国粮食缺乏，对于外人入境颇不欢迎，伊等独对于中国人如此客气，其中必有深意，不问可知。惟记者曾向某德国博士云："吾人所需与日本相异，日本需要贵国的军官，吾人则需要贵国的科学家。吾人来此不愿贵国政界之欢迎，而希望贵国社会上一般人的了解。"

三、对于俄国侨民的情感　德意志下级社会一般人对于俄国人的情感亦颇恶劣。因为战前俄国一切文化武备多学自德国，俄人来德求学的亦众，及欧战既开，俄德相攻甚烈，不念旧日之情，故对于俄人情感颇恶。惟德国知识阶级之人，则深知当时曾受德国教育的俄国青年在俄国政治上毫无势力，故亦能相谅。

四、对于美国侨民的情感　德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情感，则因时间上的关系而不同。当欧战初停，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件颇受德人的欢迎，德人皆以美国人为真爱和平的，故对于美国人情感极好。及巴黎和议，十四条无形取消，于是德人始了解美国参战的真意，非爱和平，乃爱资本。因为欧战中美国投资于英法两国甚多，倘英法战败，将

无力偿还美债，如今日俄国之于法国，故美国参战完全出于美国资本家之意。现在德人对于美国人的感情，已不如停战时的融洽了。

五、对于犹太人的情感　德人之对于外国人，其感情最恶者无过于犹太人。现在柏林政治上的实权多握于犹太人之手，因为犹太人的金钱势力很大，可以操纵一切。犹太人业商的甚众，德人呼伊等为寄生虫，既不作工，又专吮人血髓，恨之入骨。倘在途中德人与犹太人相遇，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打架，可想见其感情的恶劣了。

六、对于其他各国侨民的情感　德国与英法两国既是世仇，其感情之恶自不待言。其感情最好的，当首推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在欧战时是中立国，而且现在又组织粮食救济会以救济德国，其感情之好，亦是当然结果。德国排外风潮最盛的为各大学校的学生，因彼辈皆青年气盛，当此新败之余，举国皆有忧愤之色，彼辈青年受刺激最深，故视外人为仇敌；又兼彼辈受国家主义的教育，只知爱国，不知爱人，亦为排外的最大原因。

但是感情这样东西是不能恒久不变的，将来他们的环境若有更换，他们的感情当然亦随之而变，非此时所能预料的。

（上海《时事新报》）

五十六　德国工人思想之变迁

世界上各种团体，其组织之坚固，主张之一致，没有一个比得上工人团体的。第一，工人的利害一致。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都是一些急不及待、关系密切的生活问题。这个生活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一刻不放在心头的。问题如此简单，关系又如此密切，于是各国工人简单的头脑，不知不觉的集中到这一个浅显易明的生活问题上。利害既归一致，主张亦复相同，这是工人团体坚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工人的思想简单。大凡一个人最可怕的便是有思想，有了思想便要糊思乱想，他也糊思乱想，你也糊思乱想，其结果意见分歧，主张多端，不能用全力集中到一条路上去。所以各国普通政党没有一个彻底的主张，简单的标的，都是吃了有思想的人太多的亏。工人从前受过教育的很少，他们的思想十分简单，只要有一位首领指挥他们，他们便跟着走去，所以他们的行动颇能一致，这是工人团体坚固的第二个原因。但是以上两个原因，都是就从前的工人而言，现在的工人却不然了。从前的目标只是生活问题，换言之，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的目标，已由经济问题而进为政治问题，比较复杂多了。从前思想简单，盲从附和，所以能够一致；现在思想复杂，各人都要自出心裁了。因为这个原故，工人团体亦渐与其他普通政党相同，常常有分裂的消息，迥不似从前的

坚固一致了。

德国战前工人的思想可分两派：一派主张偏于物质方面，一个人日用必需的是衣食住三件事，这三件事若不先行解决，一切问题均不成问题。工人终日劳苦，所得极为有限，以之解决个人生活已嫌不足，而况还有妻室儿女要蓄养。因为物质问题不解决，故工人终身皆在穷愁无聊之中，没有人生趣味，处处受资本家之钳制，有如牛马。若要免除工人痛苦，宜速增进工人的物质幸福。其他一派之主张则偏于精神方面。一个人的生活不专是物质满足便可以谋得幸福的，精神方面尤为重要。在德国，阶级制度最为盛行，社会上对于军人学者十分尊崇，而对于工人则处处表示轻视之意，以为工人只是一群毫无知识、供人驱使的动物。大凡一个人若终日受人欺侮轻视，无论物质生活如何丰富，终是不愉快的。只要吾工人地位增进，为一般人所重视，虽粗衣恶食亦所欣愿，盖吾辈工人不是专谋温饱的动物。这两派主张既不相同，其所取之手段亦复因而互异。前一派则运动加增工价，以谋物质幸福之增进；后一派则运动工人教育，以谋社会地位之抬高。战前德国当局有鉴于此，实施其所谓社会政策，对于工人生活极力改善，工人之物质幸福逐渐增加，一部分工人因目的既达，其态度遂不似前此之强硬。惟其他主张增高地位之工人，尚因目的未达，仍继续为猛烈之运动。

战后社会民主党起而执政，工人地位忽而增高，又因战后一般人民均感物产缺乏，要求物产增加之心比要求知识增加之心还要急切，于是重视身体工作的工人，而轻视脑力工作的教员。因为前者劳力的结果可以增加有形的物产，而后者劳力的结果则系一种无形的的利益。一般人只能见着有形的而不能见着无形的，所以工人的地位不知不觉的遂超过大学教授的地位了，现在德国大学教授的薪水，往往不及一个打扫街道的工人，有许多大学教授因为生活困难都不干了。德国工人的地位既已增高，所有战前不能达到的希望均已一一如愿而偿，无论物质或精神方面均有圆满的结果。一个人最可忧的，是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而最可怕的，又是自己的目的居然达到。因为一旦目的达到了，便不能奋斗了，只享福了。诸君试思戊戌、辛亥以前中国的党人，又何尝不个个兴奋呢？但是一朝权在手便不同了，德国工人亦是犯了这个毛病。

欧战前，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算是一个步伐整齐颇能奋斗的政党。换一句说，那时候德国工人的团体十分坚固，德国工人的主张尚能一致（虽其时已有偏于物质或偏于精神之不同，但是因彼此目的均未达到，不能不携手进行）。到了一九一六年，社会民主党分为急进缓进两派，急进派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两派分裂的动机虽由于彼此的政见不同，而其重要的原因，实由于社会民主党中有一部分工人已得到物质幸福，不愿孤注一掷，挺而走险，所以主张缓进。其他一部分工人不以得着物质幸福为满，还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所以主张急进。故一九一六年社会民主党之分

裂，是德国工人思想变迁的第一表现。

这回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分裂，表面上虽是因为对俄问题左右两派的意见不同，而其重要原因，亦实由于德国工人思想上有重大变迁之故。我前面所说的德国工人在战前分物质精神两派，在欧战中一部分工人已达到物质欲望，因而有一九一六年社会民主党之分裂；其他一部分尚未达到精神欲望的，愤而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自大战后社会上工人之地位业已增高，独立党一部分工人已达到所谓精神欲望，德国有一句谚语："不要丢了手中的雀子，去捉屋上的鸽子。"其意便是不要丢了已经有了的雀子，去捉那靠不住的鸽子。现在若牺牲一切追随俄国，将来结果如何尚不可知，而现有境遇必先为之牺牲，实属不值，所以反对加入莫斯科会议。故此次独立党之分裂，是德国工人思想第二次变迁之表现。

而且每次工人开会，纺织业及其他精细手工业之工人多主张缓进，而煤铁矿及其他粗笨工作之工人多主张急进。因为纺织工人生活较佳，思想亦较复杂，故不愿破坏现状；煤铁工人生活苦闷，思想简单，故主张打破一切。由此更足以证明生活安适实为减少奋斗之重要原因。德国工人思想之变迁，实以境遇顺逆为关键。

照这样看来，德国工人中主张急进的，大抵是不安于现状之人；主张缓进的，大半是生活较为安适之人。德国民主党的机关报有一次曾经说过："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为经济组织变迁，人的思想亦因而变迁。现在德国工人的思想变迁，亦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变迁的原故。我们拿工人运动始祖马克斯的话来批评现在工人的行为，正是对症下药。"他这话虽然是说的很滑稽，却亦是批评的很深刻。我们研究德国工人思想变迁的原因，实离不了马克斯这个原则。

（上海《时事新报》）

五十七　柏林人之道德问题

德国在近一世纪之中，无论文事武功皆极发展，国内社会秩序之佳更并世无匹。究其原因，则一方面固由于教育普及，人人皆知自爱；而他方面则更有严刑峻法以随其后，人人皆有所畏。德国无论任何事体皆有一定规则，大街小巷之中无处不高悬禁令。譬如"此路不准行走，走则严罚"，"此车禁止吸烟，违者罚办"等等禁章触目皆是，故吾人初到德时，时常有法令如毛之感。德国一般人民生活于此种严刑峻法之中，一举一动皆须适合规矩，因而不知不觉之间养成守法恪己观念。然此种守法恪己观念之养成既由于被动的、人工的，非由于个人自觉的，则一旦国家稍有变故极易动摇。故自革命以

来，皇室推倒，守法观念遂迥不如前。即以柏林一城而论，最近一月犯罪之数竟达三千二百五十八人之多，持与战前相较，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矣。

吾国人往昔艳称之“道不拾遗”，在战前之德国实已早致此境。惟吾国人之所以“道不拾遗”者系由于“怀德”，而德国人之所以“道不拾遗”者系由于“怀刑”。盖德国法律，拾遗不报者有罪，拾遗之后立须报告警察，拾者可得该物价值百分之若干以为奖励，故拾遗者皆不敢不报。惟战后德人守法观念已不如战前，譬如最近柏林厅报告，在六月一个月之中因拾遗不报而犯罪者有二百六十人，其未经发觉者尚有二万人，即此一端已可概见。又如德国森林公园之中随处皆悬禁令，譬如“此条山径不准通行，违者重罚”、“此处花草不准践踏，违者重办”之类。在战前爱护公物之心渐已养成习惯，而近来此种良习亦已不能保持。据警厅报告云，六月份柏林一城犯森林违禁法者五十三人，犯践踏公园花草之罪者有一百二十九人。又如乘坐电车不购车票者，在战前可谓绝无仅有，而六月份柏林方面则发生二百零九次之多。又如柏林管理家犬之法极为完备，每家之犬皆须编列号数，缴纳租税，各犬项下皆挂铜牌，嘴上皆有口袋，而六月份发现犬主违禁者有七百四十四起。又如德国近来物价大涨，最近数日已较前涨至二三百倍，惟房租一项则因德国现政府主张“房产社会化”之故，至今只准房东比较战前增加数倍，可谓少极。而此区区房租，租者尚不愿如数缴纳。吾友德人某君有房屋数处，往往因收租之故与其租客口角，租客常诋之曰：“你到威廉皇帝第二那里要去!”其横蛮有如此者。因此之故，房东与租客之间常常口角打架，六月份柏林方面发生此类案件共有七十三起。又如德国警厅禁止虐待牲畜以维持人道，而吾友孙君主人蓄有一犬，稍不适意，即行将其枪毙。据柏林警厅报告，六月份虐待牲畜之案共有八十六种，至于因酗酒滋事之案更不胜枚举，犯杀人偷盗之罪者亦与日俱增。此实为战后德人道德堕落之一种表现，识者莫不引以为忧，然以记者来自无法国之故，早已司空见惯。吾国杀人偷盗之案，何日何地无之，践踏公共花草，放犬遍街咬人之事，更是家常便饭。故今日虽来柏林社会道德堕落之地，而持与故乡比较，相形之下，吾人已觉柏林为唐虞三代矣。在柏林警厅报告之中，有一事极可令人注意者，即柏林一城六月份自杀者一百零四人，得精神病者有一百人是也。此种现象则不尽由于道德堕落，而生活艰难实其重大原因。自杀一事为耶教所最禁，尤为意志最强之德国民族所排斥。自去年冬季马克跌价以来，今日猪肉每磅二十马克，明日便二十五马克，后日便三十马克，以至于每磅一百马克两百马克。衣服今日每套一千马克，明日便一千五百马克，后日便二千马克，以至于每套一万马克两万马克。如此陆续增涨，生活安能支持？于是向来每日吃肉两次者减为一次，再由每日一次者减为每两日一次，以至于每星期一次。在吾国“蔬食民族”，每月“打牙祭”一二次本不足奇，然在欧洲“肉食民族”则大感痛苦。因而“人生无趣”“生不如

死”之衰音，遂时来记者耳畔，尤以持家主妇为最。日前记者道经某街，有一群人集于某氏门首，据云其家主妇已于本日自杀。究其原因，则由于生活艰难不能往下支持，其亦大可怜矣。其有意志较强、把持稍坚，尚未至于自杀者，亦多因此陷于精神病况。吾人于此足见所谓“诅咒人生”、“赞美人生”种种说法，推其原因，固莫不与环境有密切关系者也。

（上海《申报》）

五十八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①]

五十九　柏林病院四旬记

（一）德国医院与民众健康

余留德虽已十一年余，但对于德国医院生活，却未尝领略一次。最近因患胃疡症（Ulcus）及贫血症（Anamie）之故，不得不到柏林国立大学医院诊治。其结果，卧病该院四旬，幸而得庆更生。其中见闻以及治疗情形，颇饶兴趣，兹特濡笔记之，以饷国内读者。

柏林国立大学医院，通常称为 Charite，位于柏林中心，为柏林最大之医院。其中包含内科、外科、眼科、耳科等等病院，每院各占洋楼一大座，外面环以短墙，俨如一座小城。该院之设，原为柏林大学的医科学生临床实习之用。所有内科、外科、妇科、童科以及传染病各科，无不特设专院，（附图一，系传染病院中之隔离小屋[②]。）均由德国著名医生主持其事，同时并兼任大学教授，以指导学生实习。该院人材既多，取费又廉，而且无病不医，于是遂成为柏林病人集中之地。不但柏林病人如此，即外城病人，甚至于外国病人，亦多送至该院医治。

该院每科之中，各分两部。一为取费部，一为送诊部。其在“取费部”中，又分三等：“头等病室”，每日十八马克；“二等病室”，每日十二个半马克。以上两等，皆系人各一室。除上述每日费用外，每星期每人尚须缴纳诊治费数十马克。“三等病室”，每日六马克八十分，系二十人共卧一间大厅之中，所有诊治费，均不另取，可谓便宜之至。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集》未收录该篇。可参阅《王光祈旅德存稿》第 607 页至 639 页。

② 图略。

柏林市立医院，为数亦复不少，几乎每区皆有一二个，其“三等病室”，每日亦只取六马克八十分。但此项权利之享受，只限于柏林居民，其他由外城来此者，则“三等病室”每日须缴十一马克。因此之故，凡外城居民之患疑难病症者，均由其“疾病保险公司”送往“柏林大学医院”，因取费既廉，人材又多故也。当余在该院养病之时，有一俄国铁路工程师，因患眼疾之故，已在莫斯科医院居住四月，但未得探出病源，乃由俄国医院当局将其送来“柏林大学医院”医治，此君亦卧在“三等病室”之中。此则不仅因其价廉而来，实为德国医界盛名所致故也。一年以前，英皇病笃，伦敦医生业已束手无策，乃密召“柏林大学医院”医生 Sauerbruch 前往，居然药到病除。但此事英德两方至今严守秘密，因恐有伤英国医界面子。最近英皇拨款一百万马克与 Sauerbruch 氏，为扩充柏林医院之用，借以报答该氏，外间始稍知其事。是时德国政府因实行减政主义之故，正拟裁撤“柏林大学医院”之一部，得此巨款帮助，喜可知也。

其在“送诊部”中，则来诊之人，只以无力请医者为限。换言之，富室人家，或缴有疾病保险之人，（按：德国各种职工平时均缴有疾病保险，病后由保险公司出资医治。）均不得来诊。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柏林大学之学生，虽系富家子弟，亦可得享此送诊权利，因该院固系柏林大学附属机关故也。送诊之后，由医生开方，病者自向外间药铺购买，仍回家中调治。但病者如果病势危重，则由医生留在院中三等病室调治。其一切费用，则由特组之慈善机关担任。总之，德国医院，从无眼看他人病死袖手不管之事。

至于吾辈在德国大学肄业者，每一学期，均缴有疾病保险数马克。倘在学期之中，一旦染恙，则由“大学疾病保险处”担任三等病室全部费用，惟在放假期间，则不担任，由学生自向大学医院交涉。家道贫寒者，可由医院方面斟酌情形，准其少缴一半或免缴全部。但此事对于外国学生似乎不甚容易，因德国自身现正十分闹穷也。余此次入院医治，正值暑假期间，故一切费用，皆出自个人私囊。照章，每个病人入院求治之时，先由医生诊察，若认为有病，而且必须住院医治始能收功，则由医生给与病人一纸凭单，再由病人前往“医院管理处”，请求准其住院。如有“疾病保险”者，则须将“保险证书”呈验，以后便由管理处直接函向该保险公司索款。倘无“疾病保险”者，则须预缴十日之费，计六十八马克，如早日出院，尚有余款，则由管理处一一如数退还。倘若既无“疾病保险”，又无养病之资，则由管理处通知院中特设之“救济病人的慈善机关”担任院中养病一切费用。

德国疾病保险法律规定：凡病人卧病期间超过二十六个星期者，疾病保险公司即不再行担任医院费用，而由国家所特组之“残废保险处”继续担任该病人之医院一切费用，以至于痊愈或死亡。倘该病人卧病二十六星期之后，继续作工一星期，然后再人医

院，则疾病保险公司又当继续担任二十六个星期之费。不过重病之人，安能继续作工一星期？而且医院方面，亦不准其出去作工，故此种办法，事实上只以“病愈出院之后，为时未久，又复大病之人”为限耳。

德国疾病保险，计分两种：一为“强迫保险”，如官吏工人之类，每月领薪之时，直由官厅或厂主从中扣去“疾病保险费”若干（通常大约每月十余马克），转交“疾病保险公司”，将来本人有病，便可直入医院，不出一钱。倘欲在家养病，则所有医生诊金、购药之资，皆由保险公司担任。此外，更由保险公司给与病人在家每日赡养费若干。一为“自由保险”，如普通商人之类，其保险费由双方议定（通常每月六马克左右）。其待遇则以保险费之多寡为转移。照德国疾病保险法律，若病人之疾，由医生诊出系在保险之前即已染得，而病人故意秘而不宣者，则“疾病保险公司”有拒绝担任费用之权利（按：保险时，即须自行注明曾有何疾等等）。但在事实上，亦不如此严格。当余在医院之时，有一酒店主人曾害足疾，害了一年之后才去保险，缴了一年保险费之后始入医院，彼所缴之保险费，不过七八十马克，而彼在医院所用之费，却在四五百马克以上，均由保险公司担任，未尝加以刁难。

余此次到院医治，原拟诊治之后，将诊治费照缴（是时内科送诊部正值暑假期间，停诊），仍回家中疗养。不幸诊治之后，身体不支，乃由该院内科主任医生用“紧急处分”法，直接送往“三等病室”，并未经过上述医院管理处之允准。盖病人如果病势沉重，无力自办一切手续，则医生可用“紧急处分”以办理之，不管病人有无力量缴费，是为医院收容病人之例外办法。

迨余次日精神稍稍复原，主任医生乃令余前往“医院管理处”办交涉。其后余到管理处接洽，并问：对于大学生，有无减费之举？该处办事人员答曰：“医院方面无减费之举，但是君若不能缴纳，可用大学生资格，向医生请求减半或全免。盖此事全属于医生方面慈善之举，与医院方面无涉。”旋彼又将桌上文书一封示余，并云：“此系贵国一位商人，肺病沉重，但无力缴费，现正在此医治。”彼又云：“照院章须预缴十日之费六十八马克，君入院时，带有钱来否？”余答之曰：“只有二十马克。”彼遂言曰：“好好！只预缴二十马克亦可。”余是时业已决定，将来全部缴纳费用，不向德国医生作此乞怜之举。一则现在德国实行减政主义，医院经费大行减少。当主任医生对余“紧急处分”之时，彼深恐余不能缴费，已再三踌躇（但未明言），倘余现在以请求减费之事累之，殊使彼陷于困难地位。二则上述吾国侨商，在此身染肺疾，无力缴费，德国医院既已不能不尽义务为之医治，余虽贫穷，但历来卖文之资，尚可孤注一掷，何必累人？（按：余留学德国十一年，全系卖文为活，未受任何国家私人家庭之资助。至今未尝欠人一文，亦未尝废学一日。）计此次在院四旬，共用二百七十马克左右，皆由余事后一一缴清。

（二）世界最流行之病

胃病为世界最为流行之病，轻者损及健康，重者致人于死。而且得病原因，至为简单，人人可以预防。治疗方法亦极容易，人人可以仿行（但以病轻者为限，病重者则非由医生剖腹开割不可）。特借本刊篇幅，述其大略，或亦为国内注意健康者所乐闻。

余所患者为胃疡症及贫血症，历时已久，但余却不自知。十年以来，令余最感痛苦者，惟头痛一事而已。此外，晚间饮食稍多，辄睡眠不安。而且工作效率近亦日渐减少，今年七八两月，更加上呕吐昏晕种种病象，以至于卧床不起。乃赴“柏林大学医院”中之第一内科病院（参看附图二之右边建筑①）诊治。经五日之检验，乃发现胃部某处，因食物不慎受伤，因伤而流血，因流血过久，遂成贫血之症，因贫血之故，以致头痛不止。

胃疡症之原因，系由于饮食之时，吃得太快，嚼得不烂，以及吃得太辣（如胡椒青椒之类）、太热，或误吃不易消化之物，于是胃部某处（尤其是胃部底口之处）受其侵伤，成为疮疽。其后该疮渐向胃壁侵去，轻者流血不止，重者则将胃壁侵穿，因而胃中食物冲入腹膜，酿成“腹膜炎”之症，往往不能医治而死。此种胃疡症，尤以我们瘦人最易发生。吾国饮食之中，最喜多用香料，而四川等省之爱吃青椒，尤称巨擘，故胃疡症之流传，似极普遍。不过患者莫明其妙，只笼统的称为“胃口不好”而已。大约胃疡症之主要病象，为消化不强，大便黑色（系流血所致），胃部疼痛（但余胃部却不疼痛，似非必具之条件）。至于治疗之法，轻者则只饮药静卧，并用特别食物，大约两旬以至于四旬，便可痊愈。重者（如伤痕不能合口，或胃壁业已戳穿）则非开刀剖腹割胃不可。但割了之后，身体虚弱之人，往往不能支持，引起其他病症，因而一卧不起。有时开割之后，病者饮食减少，亦复恹无生气（病室中，有一位年方二十五岁之德国青年，割后已五六星期，仍不能多进饮食）。故开刀之举，危险殊大。但胃疡已深，如不开刀，似又无其他办法。病室中有一位年方二十之德国青年，养了四旬之后，疮痕仍不能合口，于是主任医生乃劝其暂行离院，如其间仍无起色，则于明年春天来割云云，但该青年却严厉拒绝开割。余之胃疡症，幸属于轻者一类，未劳医生大施刀斧，即已痊愈。

病院中诊察病源，除有极明显之病征外，通常须用五六日工夫，始能确定究系何病，然后下药。著名德国医生之拿手好戏，即在善于诊察。但诊察手段之武辣，却使闻者吓退。病人每被诊察一次，如上杀场一次。因此德国病人之中，常有拒绝诊察而中途

① 图略。

离院者，余在院中时曾亲见两次。

检察之前，病人必须从早晨起不得稍进饮食。午前八时左右，即到X光线室内，将上半身露出，由医生细细检验。检验之时，如欲照像，必须先吃一碗形似石灰之白面一碗。此项白面，并不消化，六个钟头之后，仍随大便输出。当时余之胃部，曾照了四张像片。静立X光线之前，由医生在余肚外，将胃东按一下，西摸一下，连问此处痛否？彼处痛否？照像之时，病人并须止住呼吸少顷。总之，身体虚弱之人，受此一番磨折，殆已筋疲力尽，不堪承教矣！

但尚不止此。同日，并用橡皮小带，由鼻孔直穿到胃部，由带口灌入盐水一瓶，然后再将胃汁抽吸而出，察看是否含有酸素在内。抽毕，复令病人散步五分钟（是时皮带犹在胃中）。散步毕，再将病人卧于床上，并将床之下方两足（即病人足部一方面）高高垫起（约有一尺之高），于是病人在床上遂成倒悬之状，足高而头低。病人身体，须向右侧睡卧，鼻外橡皮小带之一端则垂于一个瓶子之内。如是者三四点钟。最初，带子之内流出白色泌液若干，其后渐流黄色胆汁，医生乃将瓶子换去。迨胆汁流满半瓶之后，始将病人倒悬之危解去。然后医生再将此项胆汁化验，以推断病人消化机关如何。

同日，又有医生一人，将余之耳部（约在妇女所带耳环之处）刺了一针，将血检验，以查看白血球与红血球之数量。其结果乃发现余之红血颜色只有百分之四十四。通常健康之人，其红血颜色从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若颜色减至百分之二十五，则不能再活。凡患贫血症者，大抵脸上毫无血色，精神亦复不振。吾国人之患此症者，似乎甚多。余之患此，系由于胃部流血过多，但饮食营养不足亦为最大原因。盖胃部既病，食量当然随之而减，更加以个人经济饱受压迫，于饮食一道太不讲究，亦为促成此病之原因。

同日，又有医生一人，在余左臂之中部，刺入血管之内，取出血液一小筒，以检验血内有病与否。余来此求诊之时，本已卧床数日，热度已高至三十八度，在第一日之中，先后饱受上述种种磨折，于是取血之时不禁昏迷过去，少顷，始苏醒转来。因此医生乃用“紧急处分”手续，留余住院医治。

次日饿了一个早晨，又由看护妇将我押至医室之内，放在一个睡桌之上，由看护妇用手将我双眼蒙着，更有几个医生将我按住。然后用一金属物质之筒子，有大姆指大小，拼命要从口内一直塞到胃部。并先用药水将口腔上面敷过，以便筒子入口擦出血时，亦不知痛。主任医生并向余云：“王先生，你是学医的么？这是检查胃部最好的机器！”但无论机器如何好，我亦只能将管子吞到喉管，再亦吞之不下！于是，此次检验遂未成功。据云：该筒塞到胃部之后，医生乃用显微镜在外面窥看，所有胃部内面情形，皆一目了然，此则非普通X光线所能办到者也。

其余数日，或检验肺部，或查看肾部。每日小便大便，均须化验。到了第五日，主任医生遂决定为胃疡症。从此，每日给我丸药四枚，名为 Atropin。令我终日卧在床上，不准起床，并用饮食治疗之法：第一日，吃生鸡蛋一枚，并牛奶少许。第二日加生鸡蛋一枚，以后每日递加一枚，加到八枚为止。从第八日至第十二日，每日除八个生鸡蛋之外，并有生牛肉泥一盘，熟火腿片一盘，饼干几片。普通病轻者，经此十二日之后，便可痊愈。但余病根已深，未能即痊，胃部犹流血不已。于是医生又用第二种饮食治疗法：每一点钟吃面酱（即麦面和糖煮成者）一盘。此外，早晚两餐，则食煮熟之鸡蛋各一枚及烤过之面包两片。午饭，则吃马铃薯泥及煎鸡蛋一枚。如是者又十余日。前后二十余日，至少吃了一百多个鸡蛋。院中各位病人，每人皆有特别饮食，恰与该病相适，由医生根据实际病状加以规定，不能由病人任意自主，固不独余等害胃病者为然也。

余在院检查之时，既每日早晨受饿，从第六日起，又只准吃一个鸡蛋，逐日仅仅递加一枚。于是到了第八日，饿得头闷眼花，同时又苦便结，于是遂在厕所之中昏倒，并将眉头之上撞裂一缝，流血满额。其后由看护妇一位，及同室病人两位，将余抬至床上。是时天色刚明，室中只有值夜班之看护妇一人，伊急忙打电话与主任医生。迨余苏醒之时，只见该看护妇将余之脉握着，吓得气喘不止。盖该看护妇为诸看护妇中之年纪最轻者，更事不多，故吓得如此。不到数分钟，主任医生已踉跄而至（按：主任医生皆住在院中别墅，故其来也极为迅速）。余乃告以厕所昏倒之事，于是该医生乃正色告该看护妇曰："须仔细小心看护！"该看护妇因余之故受此委屈，事后余为之抱歉不已。是日午前九钟之时，又由一看护妇将余载往外科病院施行手术，将额上伤痕缝好。

余到院两星期之中，每日头痛如故。主任医生遂疑余之头痛或与耳目方面有关，乃陪余到"耳鼻颈专科"病院。该院医生用 X 光线将鼻腔内部照一盈尺像片，检验结果，毫无疾病。其后又到眼科病院，检验之后，亦谓毫无疵点。余乃要求主任医生，送余到神经专科病院，检验头脑。但该医生不允，并谓余之头痛，系由于体弱之故，俟主要病源既去，头痛亦当自止云云。其实余幸而未到神经病院诊治，如去，又当受一次大罪。因为检验头脑及神经方法，系由医生在病人背脊之上，打入一针，将精液抽出化验。打针之后，病人在二十四钟之内，静卧床上，精疲力尽。吾国旧医之只验脉跳便武断病源所在，固然荒唐，而西洋医生所用之诊治方法，却亦未免过于武辣。因此，西洋人拒绝检验之事，所在皆有（又吾人既在内科三等病室养病，所有其他耳目等科检验之举，皆不再行缴费，亦属甚为便利）。

两星期之后，头痛即止。五星期之后，胃病亦愈。现在所余者，只是贫血一症。现在西洋医界医治贫血之剂，首推牛肝猪肝等等，尤以生吃收效最速。当余在治胃期间，

既不能生吃肝子，乃用肝子所制成之药水，用针打入股内。其后胃病既愈，乃继饮肝子药酒。余之血色，遂由百分之四十四升至百分之五十八。不过从此以后，遂归停顿，再亦不升。本来治血方法还有一种“移血”之举，换言之，即在健康人之臂上取血一筒，灌入病人臂上。余在院中，曾见一位六十五岁之德人，其来院时血色只有百分之三十二，久治无效，院中乃决定用移血之举。其后该德人之兄弟二人，前来院中，自愿给血与兄。但该二人之血，经医生检验，实与其兄之血不适，不能移转。继而该德人之子亦来院中，检验结果，其血实与其父之血相合，乃由医生施用移转之术。该德人之血色，立刻增至百分之六十五，医生遂允其回家休养。盖医院规矩，病人血色，至少须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始准其出院。余之血色，既只有百分之五十八，照例不能出院。但余因经济困难关系，乃恳切请求主任医生放余出院，回家休养。于是主任医生允许，并开一药单（大约系铁质药丸），给余回家医治。同时再三叮咛，饮食须要小心，宜多吃蔬菜水果，少吃刺激物品云云。余归家之后，十日之后，血色即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现在则更升至常人血色矣。

（三）第一内科病院生活

柏林大学医院中各科病院生活，不尽相同。余现在所述者，只是第一内科病院A站之生活（此外还有一所第二内科病院）。第一内科病院系三层楼建筑，内分五站，ABC三站，系收容男病人之所，DE两站，系收容女病人之所。每站有三等病室一大间，容二十人左右。（附图三，系三等病室之一部分①。）二等病室及头等病室各一二间，每间只容一人。每站有主任医生一人，助医七八人，看护妇八九人。换言之，每站医生与看护妇之总数，几与该站病人之总数相等。所有化验室、小厨房、浴室、厕所，无一不备。

每日早晚，医生临床诊问二次。早诊一次，约在午前九钟左右。所有该站全体医生均到，将病人之床，四面围住（附图三中之左边，即为医生早诊情形）。更有看护妇二三人，在旁记录药方。因主任医生诊询之后，宜用何药医治，随即告诉主任看护妇，其后再由该看护妇一一依法配合。晚诊一次，约在午后五钟左右。此次只有助医一人，前来各床，遍询病人安适与否，如夜间不能安眠者，则命看护妇给与安眠药片等等。

每站约有看护妇八九人，已如上述。每人每日作工九点钟，轮班看护，故终日终夜，均有看护妇在旁照料。每日早晨五钟，所有病人均须一律起床（晚间八钟，一律熄

① 图略，以下同。

灯就寝），起床之前，由夜班看护妇（只有一人）给与各人温度表一只，须插入粪门之内十分钟（A站规矩如此。至于其他B站等等，则只插在腋下即可），然后由该看护妇一一查验，填入床前所挂表单之内（每日午后三钟，如法再验一次）。同时并将病人昨日昨夜尿量多寡，填入表内。此外职务，则为病人整理床铺及分配早餐等等。七点半左右，主任看护妇临床诊脉一次，亦复填入表内。

院中每日用餐五次。第一次早餐，约在七钟左右，其食品为咖啡及糖酱面包。第二次早餐，约在八点半钟左右，其食品为可可及香肠面包。第三次午餐，约在十二点半钟左右，系热食，其食品为汤一，以及肉、菜、马铃薯若干，系由大厨房做好，送入站中，再由看护妇煮热分配，其味极淡。第四次为午后茶点，约在午后三点半钟左右，其食品为咖啡及小面包。第五次晚餐，约在五点半钟左右，其食品为牛奶及香肠面包。以上食品种类及次数，皆指普通病人而言。如系胃病或糖尿症等等，则其食品分配之法，与上述微有不同（闻友人张君言，院中疗治肺病之处，饮食极佳，有大学教授一人，专司病人饮食，别无他事）。每日吃药，皆在用餐之后。

每星期换洗铺盖等等一次，洗浴一次，秤身体重量一次。病人所着衣服，皆系院中特制，全体一律。病人带来之衣服则藏在库中，出院之时始行给还。

每星期会客时间只有三次（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均在午后二时至三时）。亲友之来访者，类皆手持鲜花，殷勤慰问。余虽孤处异邦，但德国男女友人之来访者，几乎每次皆有。故桌上香花常满，颇为一般德人所艳羡。德俗，同室病人，彼此互称为“汝”。对于看护妇，亦只呼“名”而不呼“姓”，所以示亲热也。每星期四晚间，有牧师一人，前来各床慰问，随后继以演说一段，病人之中有往往为之泣下者。每星期之中，有慈善机关女职员一人，前来访问。每见新来病人，辄询其有无医药之资，以及家中老幼生活，有无困难情形，如病人家道果贫，又无疾病保险，则该慈善机关即代为设法，至少亦可得到若干零用之费。

A站之中，并非治疗肺病之所，但病人之中往往有一人而兼数病者，如果肺病轻而胃病重，则亦留在A站医治。故站中各种病症皆有，尤以癌症一种，最令人胆寒。所谓癌症者，系一种恶性肿毒，生于体内或体外，疼痛异常，无法医治，只有开割一途，但开割之后，仍是十九无望。余之床铺对面，有一年方四十八岁之德人，系患胃癌，有吃必吐。其后由医生剖腹，将其割去，并在腹上开割之处，插一皮带，每日由看护妇从皮带中灌入牛奶若干，以延残喘，因彼已不能用口饮食也。在第一星期之中，居然大有起色，彼已能看报，能会谈。但到了第二星期之时，病势忽转，仍是有食必吐，不到三星期，遂呜呼哀哉。三等病室之中，每遇病人将临终之际，辄将其床移入洗浴室内或其他空室之中，听其寂寞死去。迨家人到时，大抵均在瞑目之后矣。此外，还有一位六十

五岁之德人，系患颈癌，开割之后，亦无效果。彼已三月不能进食，只饮牛奶少许，亦复随吃随吐。彼之神志，已不清明，终日吐痰于地，甚至于吐在桌子上、铺盖上。看护妇每到二三分钟，必须前来照料此君一次。但该看护妇却同时为余等预备饮食，有时洗手，有时不洗。余素有洁癖，观此常令余食不下咽，急欲逃出医院而归。

院中医生对于病人，皆极慈祥亲切，有如家人父子。至于看护妇，则因管理病人起居之故，稍不如意，即向病人干涉，但伊等对于职务，却极认真耐烦。

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病后寄自柏林

（上海《生活周刊》）

六十　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

西洋系“以争立国”，其长处在因互相竞争而一切事业皆趋进步，其短处则在人与人之间造成许多仇隙，以至于不能共生共存。反之，中国系“以让立国”，其短处在遇事退缩，而个人能力亦渐等于零，其长处则在中华民族能够共同生活数千年，为古代文明民族，开一例外。（按：古代文明民族，如埃及、巴比仑、希腊、罗马等等，皆早已灭亡，现在只有中国及犹太两族，巍然尚存。但犹太民族现只有一千六百万左右，而且散居世界各国，非若中华民族具有人口四万万，而且同居一个领域之伟大有力也。）

我们试翻西洋历史一看，所谓宗教战争、阶级战争等等，几乎无时无之。此项战争，皆系人民与人民之间，因信仰或身分相异而起之内争；与中国内争所谓刘项之争、军阀之争只为少数野心家所利用者，迥然不同。西洋人向来是自己信仰什么，便不准他人再有其他信仰，而且只以自己所信者为真理为公理；倘若他人不愿附和，则彼等务必设法威迫其异己，虽采最后手段，以至于彼此同归于尽而不辞。古代罗马人常有言曰：“公理所在，必须力争，即使世界因而陆沉，亦在所不惜！”（Fiat iustitia，et pereat mundus！对不住，拉丁文只有四个字，却被我译成二十一个汉字，但非如此，其意义不能明了。）最足以表示西洋人此种“固执己见”的精神，与中国人所谓毋固毋执毋必毋我的传统思想，恰成一个反比例。惟公理之本身，虽为绝对的、一定的、永远不变的，但因个人环境及智识之不同，其所认识之公理程度，却往往彼此不尽相同。譬如欧战时，协约国有协约国的公理，同盟国亦有同盟国的公理。又如德国内政方面，左党反对帝制，固有其所谓公理；右党拥护皇室，亦有其所谓公理。（数年前德国右党方面学者，如哲学家倭铿之类，曾共同发表宣言，直斥德国一九一八年之革命为一种犯罪行为云云。现在德国右党，尚沿用帝国时代的国旗，每遇节日，辄悬诸门首，毫不畏惧。试

问吾国今日尚有人敢悬大清帝国龙旗者否？即此一例，亦可以看出德人之顽固程度远胜于我。）倘若为争自己所谓公理起见，竟不惜坐视世界陆沉，其对于人类前途，当然危险万分。现在西洋方面，人民与人民之间，因宗教阶级种种隔阂之故，彼此已成深仇，各有乘机削灭异己之志。其所以现刻尚能苟安一时，未至互相残杀者，只因各国“中央权力”未尝解体，足以镇压而已。

吾人一入德国国境，但见旧教教堂与新教教堂往往邻立一处，彼此各不干涉。至于车上同坐之人，则又往往甲持共产主义报纸，乙持国家主义报纸，各自诵读，两不相问。吾人初见，往往以为德人何其如此彬彬然有礼也，而不知此项个人自由，乃系数百年来，牺牲无量鲜血所求得者。千辛万苦求得之后，复由政府用“无上威力”加以保护，始有今日。譬如号称“解除武装”之德国，却具有武装军警二十五万。以其器械训练之精、交通运输之便（交通愈便则军队调用愈灵），至少可以抵当中国军队一百万（假如说的客气一点）。以一百万军队，维持疆域人口仅及吾国四川一省之地方秩序，当然绰有余裕。至于法国方面，则更有正式陆军七十万，维持国内秩序，当然更可以高枕无忧。假定欧洲各国“中央权力”一旦解体，则邻居杀邻居之现象，必将立即发生，其祸实不可思议。

诚然，西洋各国亦常有革命之举，但其性质，多为“中央权力之转移”，而非“中央权力之解体”。从“帝国政府”到“共和政府”，只如一个商业公司更换董事，“主权”虽已移转，而“业务”却仍照常进行。其所以能如此者，全在“革命党人能先在社会上寻觅地盘，实力未充以前，从不轻于一试”而已。因此余尝谓：“革命家的最高道德”，是“如自知力量尚未达到足以担任国事之时，千万不要轻于一试”！

反之，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在政治方面，则向为“群而不党”（“群”与“党”之区别，只在前者系以“事之是非”为标准，见善则从，毫无成见。后者系以“党之主张”为基础，排斥异己，坚执成见。时至今日，岂有人敢再主张“不结团体，不定方针”，而足以处置国家大事者？不过排斥异己一点，却始终应该痛改），在宗教方面，则为“三教同源”（秀才的母亲死了，可以同时延请僧道到家，念经超度）。

存心“排斥异己”之人，以为异己既除之后，便可为所欲为，而不知他人愈受排斥，亦复愈自团结。譬如德国，从前因宗教关系，尝大行排斥犹太人。凡系犹太人，每到街上之时，必须带一顶尖帽子，以别于其他德国居民。而且只准从事医生、律师、商务各种下等职业——当时见解如此——于是犹太人为自卫计，乃不得不自相团结，并在医生、律师、商务各方面，养成举世无敌之人才。现在一般德国右党，痛恨犹太人，但国内许多学术经济事业，皆握于犹太人手中，却无法抵制。反之，犹太人初到中国之时（见陈垣氏所刊：犹太教徒初入中国，颂扬帝德之碑文），中国皇帝乃下圣谕，其大意略

谓：尔等犹太人来此甚善。朕将赐尔等良田若干，以便自耕而食。并赐居中国良民区域之内，以便同沐中华文化云云。当时犹太人尝立碑纪之，表示感激不已之意。彼等既不畏惧华人排斥，因而团结自卫之力，亦遂远逊在欧之犹太人。其结果，现在欧洲有所谓“犹太人问题”，而中国则无之。

西洋人“以争立国”之思想，当然不只应用于国内，同时亦复施之于国外。彼等对于与己争强之异国，势必诛之而后快。当西历纪元前第三世纪，罗马共和时代，其时罗马唯一敌国，乃是非洲北岸之卡尔他果（Carthago）海国。当时罗马执政官（等于现代总统）名为喀笃（Cato）者，每于议院出席之际，不管是日讨论何种议案，而彼之最后一语，终是：“此外，据余之意，吾人对于卡尔他果，非加以毁灭不可。”（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可谓念念不忘，其后卡尔他果终为罗马所灭。而喀笃亦得了一个绰号，曰 Cato Censorius，换言之，即“据余之意”的喀笃是也。倘若现在南京蒋主席，每于中常会议之终，辄结以一语曰：“此外，据余之意，吾人对于东京，非加以毁灭不可”，则闻者势将大吓而走。但此种言动，在西人耳中，却不以为怪。现在西洋各国政府，对于彼之敌国，盖无不存此“毁灭”心理，不过不似从前之公开宣言而已。而吾国此种敌忾之心，则向来远逊于西人。

西洋人因为善“恨”之故，是以西洋古代文明各族，大抵因“恨”而“争”，因“争”而“亡”。手灭卡尔他果海国之古代罗马民族，现在自己亦早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要之，“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各有其利弊。吾人须用“历史的眼光”，从“人类的立场”以观察之，然后决定：何者当争？何者当让？万不可迷信西洋进化，全在于“争”。至少，中国现在一般鸡虫得失之争，少数人割城据地之争，少数人私利之争，确与进化无关。

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自柏林寄

（上海《生活周刊》）

六十一　一位德国奇士

——捐款中国以征服欧洲

五月五日，意大利 Brixen 地方民庭，开审“德国乞丐富翁巴舍（Basse）之遗产继承纠葛”一案，颇与中国有关。其中情节，甚饶兴趣与兴奋，兹特纪其梗概如左。

有德人名为巴舍者，流落意大利地方，形同乞丐，去年九月饿死客舍之中。意国警吏检其行箧，乃发现巨额黄金，并有银行存款若干，总计约值五百万意币，约合华币一百万元。更有遗嘱一件，系将该款全部捐与中华民族，以作征服欧洲白种之用！吾国驻意公使闻之，乃偕秘书及领事，前往该地接受遗产，将存金及银行存款册子取去。但巴舍之妻在德接得此项消息，乃托其戚某女士延请律师，向该地法庭起诉，不承认中国方面有此继承之权；并指巴舍遗嘱为临死乱命，应属无效。盖在巴舍行箧之中曾有两种遗嘱。第一次遗嘱立于一九一三年，系将遗产全部赠与其族戚。第二次遗嘱则立于临死之前数星期，即将遗产全部赠与中国者。巴妻既在法庭起诉之后，法庭即令存款各银行，暂缓付款中国公使。因此，中国使馆方面只领到二万意国金币。此案将于五月五日开审，记者作此通讯时，胜负如何，尚不可知。柏林某报访员，曾与巴氏之戚某女士作一度谈话，其内容如下：

该女士云："巴舍为人，少时即甚古怪，无人能了解其性质。其父开一肉铺，生意颇好。尝令其子巴舍在铺学习一年，继而复遣其投戎。迨巴舍兵役期满归家，其父已死。于是巴舍遂将肉铺产业继承，并自行经营一年。但其性质殊不近于此项营业。因此彼将产业出卖，其间并与其母及弟妹发生意见冲突。最后彼乃将其继承所得之财产携走。是时彼之年龄约在二十左右，为人缄默寡言，尤其是仇视女性。

"最初彼到比利时，其后到法到美，未几复回欧洲，卜居意大利。彼精通各国语言，无论留寓何处，均能适应环境。当彼离家之后，即行开始从事股票投机生意。据云甚为顺利，所获颇丰。每隔二三年，辄回其故乡彭城（Bonn）一次，并在该处银行存有款项，但回来未久，旋又离去。

"彼虽富有资财，但其衣服极为破烂，而且生平最为吝啬。其家人有一次出游名胜，便中寄彼一张风景明片。但不久接得彼之回信，竟斥其家人，此后勿再浪费金钱，作此蠢事（指购寄风景明信片而言）。因彼此种古怪性质之故，以致亲族戚友之间，早已不通往来。其幼弟某（已于一八九九年死去）曾有一次在巴黎途中与彼相遇，但彼竟掉头不顾，扬长而去。其后于一九一三年，复回彭城，往访其妻一次。十年之前，尚有人在彭城街上见彼一次，弯背白发，衣服褴褛，直上前行，毫不左右顾视。自此以后，遂无人知其下落矣。当报端登载此次遗嘱之事，其家人始托该地女友代探其事，以及彼之生活情形。

"该地女友乃回书述彼当时惨死情形。据云：彼居一间小房之中，每月租金仅十二马克。在临死之前三月来住于此，无人知其来历。直到后来，始知彼于一九二七年曾旅居该地一次，但未几忽然失踪，尚欠房租三百意币未付。当时房主以彼系一可怜穷人，遂亦未尝追问。现在彼复来寓该地，终日闭居于小屋之内，不与人见。每日只离宅一

次，前往商铺购买牛奶、面包、马铃薯少许充饥而已。每遇女房东入屋打扫之时，彼则靠壁而立，呆视该房东之一举一动。

“一日，房东入屋，见其已死于地（按巴舍死时，年已八十有一）。据医生检验，谓系中风而死。并云：彼之饮食营养不足，以致身体如此虚弱。其后官厅验尸之吏，遍寻室中行箧，以为或者可以觅得少许金钱，以作葬尸之用。不料竟于破衣箱中，忽然发现二万意国金币。该吏大惊，更往下寻，于是银行存款、公司股票，以及奇异护照等物，皆一一出现。该吏立即通知法庭。法庭方面初不相信，最后遣一律师前来，将其财产一一清算，约合五百万意币，计值一百万马克（约合华币一百万元），同时并发现遗嘱两通，其一系立于一九一三年，以其财产继承权属于彼之戚属，其二，则系临死前数星期所立，即以其财产全部，捐助中华民族，以为将来征服欧洲白种之用者。其原文如下：‘下面签字之人，名为亨利巴舍，一八五〇年生于彭城，愿将其全部财产赠与亚洲中华民族，或中国政府，以为将来征服欧洲白种之用。余愿葬于祖茔内姑母某某之侧。’

“此事宣布以后，该地居民大哗。一日，保款律师之处，忽来三位华人——中国驻意公使及其秘书，以及 Bozen 地方中国领事。——要求该律师将巴舍全部财产交出。律师查核无误，遂将该项财产交给，中国驻意公使乃将二万金币，以及银行存款册子等等运去，并到巴舍死所临吊一次。最后更持花圈，前往坟园之中吊墓，但竟未寻得该墓，于是巴舍并此唯一花圈，亦无享受之福。

“此事系发生于去年九月。同时此项消息亦为巴妻所闻。其妻是时年方七十，寂居养老院中，乃将此事嘱余（其女戚自谓）办理。余因委托律师 Lachmuller 博士起诉。以该项遗嘱，系立于巴舍理智业已丧失之时，不足为凭。该律师并立即通知各银行，缓将款子交给华使，幸尚未晚。因此之故，华人方面，除两万金币之外，尚无所得。”

于是柏林某报访员，复问该女士曰：“女士以为此案能获最后胜利否？”

该女士答曰：“据我们律师所言，甚有希望。”

该访员复曰：“但是，如果巴舍对于欧洲各国真正得有不良印象，以彼时常周游各国，所见其广，殆不能全然谓其毫无根据。”

该女士复含笑言曰：“巴舍行箧之中，尚有法国秘密侦探证书一纸，苏俄政府信件一封，伦敦外交部信函一件，德皇威廉第二最近像片一张。巴舍行踪，真令人莫明其妙，即我们的律师亦不能解此疑案。或者彼曾为秘密侦探，亦未可知。但同时却与各国政府均有关系，总而言之，实在莫明其妙！我们所知者，只是巴舍曾做股票投机生意而已。其余一切，皆如难谜，正与彼之生平为人相同。”

记者按：此案结局如何，现在尚不可知。如果中国方面胜诉，则此项财产，似不宜全部皆拨作驻意使馆经费，或竟用之于内战，有负巴氏盛意。记者以为，至少须将其一

部分建一"巴舍纪念图书馆"，收藏中西"国防书籍"，以为中华民族将来发扬国光之备。

中国虽弱，但在欧人眼中，终以其土广民众，而且有悠久历史，将来终有发扬光大之一日。从前拿破仑曾有言曰："如果中国人一动，则全世界皆将随之而动。"数年前，英国方面曾出一种小说，描写中俄两国将来瓜分世界之情形，一时甚为流行。此次巴舍之发此奇想，恐亦受有上述英法各种见解之影响。但彼何尝料及中国频年只知内争，以致现在饱受外人铁蹄蹂躏，至今犹无自拔之道，奈何奈何！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六日寄自柏林

（上海《生活周刊》）

六十二　致柏林中国留德学会书

中国留德学会诸先生均鉴：

今日敝处接柏林博罗（Dr. Broh）律师一信，谓中国留德学会以王光祈关于留德学界之上海报馆通信为不符事实，将诉诸德国法庭云云。诵读之下，不胜太息！今请向贵会声明及质问者数事（光祈按：请参看本书第三十七篇之《申报》通信）：

一、律师来函所谓中国留德学会，是否即系贵会？若系贵会，是否系全体意思？或系少数人假借名义？尚希见示。盖光祈深信贵会不乏明达之士，必不为此无聊之举。

二、光祈直接致函贵会，系以留德学界一份子之资格，而非以上海报馆特约通信员之资格。盖通信责任自有报馆担负，亦犹诸君之不能以"自然人"或"法人"名义质问通信员之王光祈也。今请以留德学界一份子之资格，与诸君讨论通信员王光祈之"通信"。

三、王光祈之通信，系指留德学生，并非指明留德学会之学生。查留德学生未入贵会者尚有十之三四，且新来德国者多驰函相戒不入贵会。然则贵会以何因缘、以何权利，而能直接用贵会名义代表全体留德学生与王光祈在法律之下相见？即使贵会不知祖国有所谓出版法，有所谓报纸条例，有所谓国际私法，有所谓刑事诉讼法，而且丝毫不知柏林学生界一部分有所谓狂嫖滥赌之事实，徒以迫于公义，代鸣不平，怒深愤极，急不择言，随意加王光祈以毁坏他人名誉之罪名；然照法理言，毁坏名誉是"亲告罪"，换言之，须"自然人"或"法人"之"法益"直接受损害者亲自向法庭起诉；非若强盗杀人之罪可以间接由检查厅提起公诉，或他人（即指法益受损害者以外之人）前赴法庭告发也。查王光祈通信并未直接攻击学会，学会之法益并未受损害，故学会未取得"起

诉人”之资格。倘私人法益有受该通信损害者，只能由该私人出名亲自起诉，奈何假借一个大而无当之学会名义以与人谈法律耶？吾极不喜法律，昔日虽曾学习，今日则弃如敝履。然贵会既欲以法律相绳，则吾姑妄言之，亦请诸君姑妄听之。挽近士风颓败，无论何种小事，皆欲假借团体之名，以为成固可喜，败亦无伤。而团体中之自好者，又复避之惟恐不及，听其所为。此种风气已染中国全国社会，可为痛哭！惟此种伎俩，只可施之志行薄弱之青年，始可收恐吓之效；若王光祈者，则虽举全世界一切团体以反对之，或举全世界之刀锯鈇钺以加之，而王光祈仍秉诸良心，行之若素，此则可以告慰于贵会诸君子者也！吾曾闻留德学会昔日为马君武朱家骅诸先生所经营，原以便利吾国学子，而今日末流，乃至如此，可为一叹！吾敬爱团体，吾尤敬爱青年团体之留德学会，故不觉其言之长也。知我罪我，所不敢辞。

四、王光祈之通信原文，谓“柏林方面留德学生每人每月有用数千马克者”，文中所谓“有……者”，明明系指少数而非指全体。王光祈之不敢下全称肯定谓柏林留德学界全体堕落者，亦犹之乎贵会不能下全称肯定，担保全体留德学生中绝无一人曾经堕落也。

五、今请进而再言事实：王光祈所开罪于诸君者，第一即系言德国生活便宜，走漏神秘消息。其实王光祈全为俭学生说法，并非为奢学生设想。且信中谓“每月有一千马克即足，若能真正俭省者，每月有五百马克亦足敷用”。诸君尚以此言为狂语乎？请举例以明之：诸君或以王光祈为穷措大，过于俭省，不足为例，请言吾友张君梦九。张君居佛兰克城外，其每月生活费如下：

（甲）房金每月五十马克。

（乙）在附近之饭铺吃饭，每餐三马克，每月一百八十马克。每星期吃肉两次，每次五马克，每月四十马克。总共每月二百二十马克。

（丙）煤气灯每月二十马克。

（丁）房主服侍费每月二十马克。

（戊）理发、洗衣、洗澡每月三十马克。

（己）零用每月三十马克。

每月共三百七十马克。

然张君尚住城外，吾今再言城中生活。

吾友宗君白华居佛兰克城中大学之旁，每月生活费如下：

（甲）房金一百五十马克（服侍费在内）。

（乙）在附近吃饭，每餐四马克。每餐有香肠一节或牛肉一块（若在大学内吃饭，则每餐只需三马克。吾友郑寿麟君即常在大学内吃饭，郑君固非穷措大也，盖青年磨练

意志养成俭朴性质应当如是耳。吾对于郑君，除佩服外无他言也)，每月共二百四十马克。

(丙) 煤气灯每月二十马克。

(丁) 房主服侍费每月二十马克。

(戊) 理发、洗衣、洗澡每月三十马克。

(己) 零用每月三十马克。

每月共四百七十马克。

然宗君尚居佛兰克省城，今请再言柏林生活。吾友某专门学校校长居柏林城中，其每月生活费如下：

(甲) 房金每月一百七十马克。

(乙) 每餐五马克。

每月生活费不过五百马克左右。

惟某君是有职务之人，其交际费当然不在此数。吾辈在求学时代，固不必需用大宗交际费也。

其他朋友在柏林留学来函言柏林生活者，更不可胜数。故王光祈所谓五百马克者，并非无根之言也。

至于学费书籍费当然不在此数内，宜视其所学何科以为标准。故通信中有“若学工业且真正用功者，虽二千四百马克亦不为多”之言也。总之生活费每月有五百马克即足(指真正俭者者)。若每人住两间房子(老留德学生某君曾谓，战前留德学生绝少租两间房子者)，每一餐中国饭数十马克，此种派头当然非五百马克所能办也。

又通信中所谓嫖赌昼寝之事，王光祈皆确有所闻，不敢厚诬吾全国属望之青年，而诸君乃欲一手掩尽天下人之耳目耶？诸君亦知从前某会中有麻雀牌数副扑克牌数副乎？每到会中便闻“组织……组织”之声乎？后经他人提议，始将赌局改移各人之寓所乎？诸君亦知通宵大赌之事乎？诸君亦知某某两君因赌伤神以致死于异域之事乎？诸君亦知留德学界中有所谓“金刚”者乎？呜呼！吾书至此，吾心痛矣，吾泪滋矣！吾最爱之青年同辈乎，曾不一动其心乎？

以上所书，据吾所知者尚不止此，且皆语语有来源，惟今日尚非向诸君举证之时。盖吾今日与诸君相见者，系以道德为根据，而非以法律为准绳。吾辈到欧洲来谈中国法律，已属迂谬，若再谈外国法律，尤为无聊。故吾宁肯以道德为根据，请诸君自问良心，究竟柏林学生中一部分有无上述各事？王光祈之通信是否捏造？而暂不愿与诸君作法律上举证之手续也。

又信中所谓“德国工人之居室，虽中国达官贵人之公馆有时尚叹不及”云云，亦非

虚妄之言。王光祈曾旅食京华者七年，颇知京师大人先生之公馆，其卑陋湫隘，杂乱龌龊，曾不若欧洲工人居室之高朗堂皇，陈设精美。王光祈固非崇拜物质生活者，然欧洲物质生活之丰富精美，又非王光祈一人之私言也。惟此种情形，只可令国人知之，以促其物质生活之进步，而不可使外国人知之，以轻视中国。今诸君乃以诉之于外国律师之前，甚可惜也！吾辈身居欧洲，所享物质生活超过国内百倍。吾辈性质之脆弱因循，其成就又远不如前辈（如中国前代学者及事业家），而自奉则必过之，吾清夜思之，往往愧感交集，不能成寐。呜呼！吾最爱之青年同辈乎，君等曾一思今日祖国北方旱灾易子而食之事乎？吾辈以何功德而安坐欧洲不劳而食乎？欧洲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吾代表中华民族之青年乃日出而嫖，日入而赌，君等曾否一反省乎？吾敬告君等，君等所有之钱，非君等家中之钱，乃社会上一点血一点汗集成之金钱。君等若不猛省，社会革命之期恐已不远，行将见王孙泣路旁矣。王光祈以留学生资格所能告于诸君者止此。今更再附一言：查律师来函，谓王光祈须向留德学会及中国外交代表谢罪云云，阅之不禁哑然失笑！岂中国外交代表亦与贵会共立于"原告"之列耶？或吾贤明之外交代表，当不出此。若诸君对于王光祈之通信以为违背事实，触犯法律，何妨以一纸书与王光祈争辩？王光祈虽不敏，亦曾习法律之学于京师矣。若诸君能以中国法律与王光祈相见，王光祈尚可与之周旋，若引"洋大人"以自重，则非王光祈之所能从事矣。王光祈非不知德国法律者，亦非惧"洋大人"者，只不愿在"洋大人"之下与远涉重洋之黄帝子孙争胜负耳！虽然，倘诸君中有人必欲与王光祈在"洋大人"支配之下以求曲直者，则王光祈只有忍辱负耻，与诸君相见于外国法庭。惧人者非王光祈也。以现在王光祈之力，尚可延请一德国律师与之辩护，惟王光祈是顶天立地之男子，终不忍出此耳，宁肯受屈以至于死，亦不愿倚赖"洋大人"之力以与同族争此丑事也。诸君驰书骂我，我必不怒，诸君持刀杀我，我必不怨，惟引"洋大人"以自重，则吾泪涔涔下矣！曾不料吾中华民族之堕落竟至于如此，则吾理想中之"少年中国"，将永远不可复见，其痛苦实万倍于骂我杀我。诸君试思：假使德国人在中国有口角之事，将诉之于中国律师乎？抑诉之于本国律师乎？观世者便从此可以察知民族盛衰之几矣。

王光祈从事新闻事业者已十年，中间因议论得咎，为大吏所追捕、讼棍所敲诈者已不止一次。一身之外，了无长物，监狱生涯，是吾乐土。故王光祈不知"洋大人"之可惧，只觉诸君所行之可悲耳！

诸君多国内优秀青年，对国内言则为国人之所期望，对国外言则为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使诸君而努力也，则中国之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外国人之视吾民族亦不至以劣等二字见赠；使诸君而自弃也，则中国一线之希望，遂从兹断绝，而外国人之视吾民族更将狗马不如！吾最爱之青年同辈乎，君等曾一思之否耶？

王光祈此次来欧，抱有两大宏愿：拟集合欧美两洲素日生死患难之青年同志，一方面拟将中国文化播扬于国外，一方面拟将欧美文化介绍于国内。至于留学界中若有奋志向上者，吾将师之友之；若有专以嫖赌为生涯而冒充留学生之招牌者，吾亦将尽其力之所能至以攻击之，务使中国有用之金钱，不至消费于无用之地。故暴露留学界之丑况者，王光祈之责任也。王光祈前次所通之信，尚说其一二，倘诸君不惮烦，必欲与王光祈角胜负者，王光祈尚须将所有丑况一一寄回国内。即使王光祈不能执笔通信，而王光祈之同志尚多，担任通信者遍世界，传播留学界之丑况者，尚大有其人也，请诸君多预备律师费可也。

嗟乎！前有猛虎，后有毒蛇，此非吾青年今日之环境乎？国内老奸巨猾，已察知吾辈青年之多嗜多欲，现已筑起种种陷坑多方引诱，以便为其所用，只待吾辈归去——请君入瓮。诸君亦知前此之留学生有甘为妾妇之道而不辞者，其故安在？盖早已习成奢侈习惯，又乏术以自裕其生，故不得不出此耳。吾辈若能猛省，早养成坚苦卓绝之精神，彼以利来，吾不爱之，彼以名来，吾不好之；老奸之技，有时而穷，乾坤正气，赖以不灭。吾辈若不猛省，则今日之留学生，皆他年之妾妇也。书至此，吾心欲裂矣！

吾书至此，已嫌辞冗意杂。吾朋友之在德者，皆劝吾对于诸君此举可以置之不理。虽然，王光祈固以青年运动为第二生命者也，虽诸君偶有所蔽，而王光祈对于诸君之希望，仍不能一刻已也。倘诸君能开诚与王光祈相见者，王光祈仍将以师友待君等。来日大难，需才孔急，决无仇隙之可言也。

今旧历正月初五，正是故国逢春之际，北地风光，江南草色，令人回想，不胜依依。未识诸君中亦有回想祖国者否？国内父老兄弟姊妹正翘首望君等学成归来也！顺颂学祺！

王光祈谨启

民国十年二月十二日

附启者：函中所称诸君，系专指有意作赌徒嫖友之党援者，至于会中深思好学之士，皆为王光祈素所敬仰者，当然不在此例。若贵会并无此事，全系少数人捏造，即请早日示知，以免为贵会声誉之累。

六十三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

某某兄大鉴：弟去国以来忽逾五载，对于会务未尽微劳。清夜思之，每以为歉！近

接国内同志来函，颇以从速归国振兴学会之事相责。使弟归国之后，对于学会前途果能有所尽力，则此时虽暂荒学业，义何敢辞？惟弟默察年来学会，初则有“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继又有“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辩，全会骚然，不可终日。此种举动，在争之者或以为如剥春笋，愈剥而中心愈近；在弟则以为舍本逐末，愈争而去题愈远。盖少年中国学会之旨趣，在“用真实学术与社会事业两种，以造成中国社会基础；然后再由基于社会之实力，以解决政治问题”。而今同人所争者，乃专是如何政治运动，且专是政治运动中之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两派，纯恃口舌以争胜负，所有会事皆归停顿，并一会务报告亦不能继续维持，言之可为痛心！“真实学术”既不讲，“社会事业”亦不办，此岂非去题日远矣？因此之故，弟对于回国整理会务一层，不能不加以几分考虑。兹特拟就会事进行说帖一篇，附呈左右，即请尽量指教，迅赐回示为荷！俟弟将各处回信收齐后，再为统筹全局，计划一切。如弟认为多数同志在某种条件之下（按即说帖中所陈者）尚有合作之可能，则弟将不惜辍学归国，以随诸兄之后整理会事，否则弟仍愿多留欧洲数年以竟所学，为将来报效国人之道。盖弟研究音乐，现在始稍有门径，此时回国实是极大牺牲。倘弟个人牺牲而对于会事有益，则弟固毫不吝惜；若徒蒙辍学损失而会事依然不能进行，当亦非诸兄爱弟之道也。专此即颂
学祺！

弟王光祈顿首

民国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王光祈对于会事进行意见书

少年中国学会之旨趣，在“用社会实力以促进政治”。因欲造成社会实力，故不能不从“研究真实学术”及“发展社会事业”两点着手，此当初发起学会时所以只用此二语作为宗旨也（后来始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文词虽异，意义则同）。当时同人并非不知世界上有所谓“国家主义”或“共产主义”种种名词，而其所以不欲定为会中共同主义者，良以吾辈今日尚有一个“共同预备”与一个“共同仇敌”在前，不容吾党新派强分区域者也。

共同预备者何？今日吾国民众之知识与能力均极薄弱，社会之组织与道德亦均极缺乏，军阀之所以能专横者在此，外力之所以能侵入者亦在此。为今之计，非从事大规模之“民众教育运动”，实不足以扫除一切祸根。所谓“民众教育运动”者，系指一般“常识教育运动”。民众有了常识，然后始能鉴别主义的得失与夫运用主义的能力。无论你是国家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这第一步共同预备工夫，你总是应该做的。倘若你想利用民众的无知去宣传你的主义，那么便与外国牧师向小孩子传教一样，同犯“利用无

知”的罪恶！

共同仇敌者何？现在国内军阀与国外强权，总算是我们当头第一个大敌，此固无论国家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都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在国内仇敌中，共产主义者欲多添一点大商阶级、绅士阶级进去；在国外仇敌中，国家主义者又欲再加上一个俄国进去罢了。但是彼此所认为仇敌之范围虽各有宽窄不同，而眼前第一个大敌——内国的军阀专横及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总应该首先打破的。打破之后，再各自分头与其他小仇敌算账不迟。

若要打倒国内军阀之专横，须养成民众实力，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事民众教育的实施；若要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须促成东方民族之团结，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东方民族联络入手；若要使中国民族有独立自尊精神，必须先养成“民族文化”，以为其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学术。因此之故，我们学会内部宜分为三股进行：

一、民众教育实施股　先编大批常识小丛书，其中分（甲）关于政治经济问题者，（乙）关于农工商各业常识者两种。篇幅以一万字为限，文字以浅显为主。每书所讲，限于一个问题，自为起结，并随时灌入民族独立、自由、秩序、公益种种思想。每月之中，由本会会员亲到乡村或城市之中讲演及发卖四次。

二、东方民族联络股　先设一东方语言研究会，然后再联络各该国侨华人士，共同办一《东方民族杂志》，专介绍各该国近况，并随时延请各该国侨华人士讲演。吾会一部分会员，宜分习各该国语言文字，以便将来到各该国实地旅行。

三、专门学术研究股　本股宜设各种学术研究会，组织少年中国书院，举行各种学术讲演，附设少年中国图书馆，并主持《少年中国杂志》事宜。

本会会员对于上述三股事务，至少要担任一股（兼任两股以上亦可）。如不愿参加任何一股，或参加之后并不履行，则其无意为学会出力可知，吾会宜限于某个期间之内宣除其名。

我兄对于上述三股工作是否认为满意？如认为满意，究竟愿任何股工作，均请拨冗见示为荷！弟之行止，即以兄等回信齐到后决定也。

兹再将弟个人所愿任之工作，开列如下：

一、在民众教育实施股中，愿担任编辑常识小丛书十种（回国之后，以两年为限），并讲演及发卖事宜。

二、在东方民族联络股中，愿研究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并赞襄《东方民族杂志》编辑事宜。将来有机会时，并愿到阿拉伯及波斯实地旅行。

三、在专门学术研究股中，愿担任音乐学一门，并赞襄《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事宜。又弟有价值千余元以上之音乐书籍，愿悉数捐与少年中国图书馆。

六十四　与邵循正君书（附邵君答函）[①]

附　录

动的训练[②]

兄弟今早八钟始抵武昌，今晚五钟便要渡江搭轮东下，在武昌只有数点钟的勾留。承贵校教职员诸先生不弃，要兄弟演说几句。兄弟今天初来，未曾预备题目，不知从何说起。刚见着陈校长，他说：这次学生运动未得多大的效果，以后似应从和平的文化运动着手。

兄弟听着这句话，立刻便发生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此次偌大的学潮而得最小的效果？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以为这一次学潮无大效果的原因，便是因为我们学生素来无"动的训练"的缘故。因为无动的训练，所以他的动是一种冲动，而不能继续为有价值的活动。

譬如一池静止的水，我们偶然投一块石子下去，那水便动了；但是瞬刻之间，那水依然恢复静止的原状。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因为石子自身不能活动，二则因为投石于水的行为不是继续的。

我们中国的社会，好比是静止的水，这次学生运动，好比是投石于水。因为学生自身不能活动，所以瞬刻之间，那社会沉寂的状态又依然回复了，一切黑暗腐败的现象，仍依然如故。学生自身不能活动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有"动的训练"。

我们中国的社会是静的社会，西洋的社会是动的社会，中国人是静的生活，西洋人是动的生活。关于这个问题，本来不易解决，有许多人主张拿动的生活来救中国人不好动的弊，又有人为静的社会辩护，最好的例，如现代印度哲学者太戈尔，便是一位著名的静的社会辩护者。但是据兄弟的意思看来，觉得凡民治主义国家的国民，非有一种动的训练不可，如无动的训练，其弊有四：

一、隔岸观火　所谓"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对于社会、国家全是一种痛痒不关的态度。这如何能够适用民主主义呢？因为民主主义的精要处，就是在人

① 该篇收录于本《文集》之《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中。

② 该篇为王光祈1919年10月27日在武昌中华大学的讲演，原文载该校周刊。

民能够自动，而且是负责任的。

二、进化停滞 因为现代科学最重实验，注重调查事实，若是一味静止，那实验和事实从何得来？科学既不进步，我们人类的进化，岂不是因而停滞吗？

三、思想和身体都不能发达 思想愈思愈深，身体愈练愈强。若无动的训练，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从何而深？身体从何而强？

四、养成被动的性质 我们无动的训练，自然是不喜欢动。但是自然界与社会环境不准我们不动。我们的运动，既是受了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逼迫，不是出于自己心甘情愿的，那便是被动。换言之，我们的动作，若不是在我们自己思想指挥之下的动作，便是奴性的动，不是自动。

若是我们有了动的训练，我们的动，便是有价值的动。其利有四：

一、养成负责任的人 因为我们的动是自动，我们的行为是在我们自己思想指挥下之下行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民主主义的国家，最要紧的就是人人能负责任。

二、科学进步 因为我们既是好动，遇事留心研究，一定是喜欢实验。这种研究实验的态度，是科学进步的最大原因。

三、思想身体皆可发达 刚说过，思想愈思愈深，身体愈练愈强。推其原因，只是一个动字。

四、征服自然与征服环境 西洋人常常征服自然界供人类的利用，中国人常常被征服于自然界，完全受自然界的支配。譬如西洋人将电气拿来打电话行电车，中国人对于电气便尊之曰神，倘若被电击死，便给他一个不孝之名。这种神话虽是可笑，但是西洋人何以知道电气是一种可利用的东西？中国人何以视电气如此神秘？其原因便是西洋人喜欢研究，不安于现状，中国人不喜欢研究，对于现状安之若素。换言之，西洋人喜动，中国人厌动。

现在中国对于动的需要非常急切。我们只要动，没有不得效果的。譬如北京的文化运动，为时甚短，颇生许多影响，五四运动亦得全国同情。可见我们只要动，没有不生效果的。

现在我们知道应该动了。但是动的方向亦很要紧，若是动错了，倒不如不动。譬如曹汝霖卖国的行为，何尝不是动？不过是他动到日本去了。我以为我们若要动，有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很有我们活动的余地，这个地方就是：

“教育与实业两条平平坦坦的大路。”

因为教育可以革新我们思想，灌输各种知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诸君试思：我们既有了思想知识，又有了丰富优美的衣食住，岂不是我们生活已经达到很圆满的地步吗？我常常说宁肯作一位小学校的教员，不愿作一

位教育总长，宁肯作一位种树的人，不愿作一位农商总长。因为教一个学生，种一根树子，将来都是必有结果的，而且这个结果，我们心中有十分把握。若是教育总长、农商总长，便不能有十分把握了，恐怕其结果还生出许多意外的恶影响呢？有许多人嘲笑我是一位极端的社会改革家，我常常答道：我平生做事，专寻有效果的、有把握的做，若是没有效果的、没有把握的，我便不愿白费时间了。所以我希望诸君将来若是要动，请你在教育实业的范围内努力的动，包管你有效果，我敢保险。

以上所说的，系不动的弊病、动的价值以及动的方向。如今开始归到本题的意思：动的训练。

动的训练可以分两种：

一、个人的；

二、团体的。

个人的“动的训练”又可以分为思想的与身体的两种，前者如“我们应该怎样思想”的问题，后者如体育问题。我今天所说的是关于思想的“动的训练”。兹略举数例：

一、要有创造的精神　我们若是以现状为满足，则人类永远不会有进步。我们若是只在中国圣人、西洋学者偶像之下活动，亦是永远不会进步。我们要有创造的精神：凡是一个学说，经过我们思想一次的，都应该有一个最新的解释，最新的发明；凡是一桩事情，经过我们行为一次的，都应该发生一个最新的事实，最好的成绩。总之，世界是我们人力创造出来的，若是大家不思创造只知因袭，那人类的进步便永远停止了，地球亦到末日了！

二、要有批评的精神　无论甚么学说，我们对于他都要有一个批评的态度，不要笼统的崇拜，亦不要笼统的反对。把他分析开来仔细的研究。我们可以用一种日记本子把我们自己的见解录在上面，过了几日或是几年，我们又把日记翻阅一看，是一桩最有趣味的事情，可以验出我们知识的进步如何。

三、要有一个理想目的并寻出一个下手方法　我们青年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理想目的。因为没有理想目的，便为现状所困，永远不会有超越的思想，高尚的胸襟。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想目的。譬如我要把将来世界造成甚么样子？我个人在这个世界内是甚么一个地位？做一种甚么事务？这便是我的理想目的。但是只有理想目的是不成功的，还要有一个下手的方法。譬如我要改造世界，应先从甚么部分着手？我要从事某种事务，要先有甚么预备？这便是我的下手方法。

四、要对于自己心中不安的问题寻出解决的方法　社会上有许多问题，我们心中都是不安的，但是因为你们不去管他，所以也就不发生问题。现在我们对于各种不安的问题，都应该寻出一种解决的方法来。

若是以上四种能够切实实行，我们的思想必定是终日不得空闲，包管你不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以上所说的，是个人的“动的训练”，而且是属于思想一部分的。至于个人的身体上的“动的训练”，亦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但是因为我对于体育没有研究，所以不敢乱说。只有一句话奉告，即是从事生产的劳力工作，比较贵族式的体操似乎有益有趣。个人的“动的训练”略如上述，如今再说团体的“动的训练”。

上次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他说，要使中国民治主义实行，有三个方法。其中有一个便是多结小团体，先使个人有一种团体的训练。美国的小团体非常发达，凡遇一桩事情，大概先由小团体提倡实行，实行有效，然后政府采而行之，故收效最大。现在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便是团体的训练，关于团体事务大概不愿与闻。诸君试想，连一个小团体的训练都未经过，要他在偌大一个民主国里过团体生活，当然是不可能了。小团体与国家的组织有密切关系，而且有许多相同之点：小团体的规约，好比是国家的宪法，大家都不能违背的；小团体的会务，好比是国家事务，大家都应该努力的；小团体的团员，对于团体的义务权利，好比是国民对于国家的义务权利，丝毫不能推诿抛弃的。故小团体的训练久了，便养成民治主义的国民。少年中国学会有一位会员魏嗣銮君，他是一位狠能研究学问的学者，从前对于会务毫无趣味，后来曾慕韩君写信骂他，说他不适合于民主主义的国民。最近魏君自谓对于会务狠有兴味，差不多我们每次见面所谈无非会务，这就是团体训练的好例。

现在中国恶的势力尚有团体的训练，而善的势力毫无团体的训练。因为无团体的训练，所以善的势力的动作，是没有秩序的，没有统系的。若是善的势力有了团体的“动的训练”以后，我们将来便可以结合同志，在同一宗旨、同一目的之下，继续不断的奋斗。

诸君！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万恶社会，让个人孤单的奋斗是不行的了，非有团体的奋斗不可！

关于小团体的组织，我们有一个少年中国学会，诸君将来若要组织团体时，我们学会的规约或可以供给诸君的参考。如需要时，可以向贵校恽先生[①]处取阅。

总结今天所说的，希望诸君第一要有思想的“动的训练”。

一、要有创造的精神。

二、要有批评的精神。

---

① 恽先生：即恽代英（1895—1931），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又名蘧轩，字子毅，原籍江苏武进，1895 年生于湖北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 年 10 月，由王光祈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三、要有一个理想目的，并寻一个下手方法。

四、要对于自己心中不安的问题，寻出一个解决方法。

第二希望诸君要有团体的训练。多结合小团体，不必在形式上讲究，宜注重精神。前年贵省汤化龙先生游美时，有一封通信登在报上，他说："美国人初组织一种团体时，并未曾有一种精密的规定，不过他们能够逐渐进步，逐渐改良。"汤先生这句话狠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凡组织团体，对于章程讨论的非常精密，但是他们的章程讨论完毕，他们的团体亦同时消灭了。所以我希望诸君不要在形式上注意。并且希望诸君不要自以为团体太小，影响不大。其实世界上的事，有因必有果，我们既有所动作，将来必有结果，不过时间早迟问题而已。

总之，个人没有动的训练，则所有行为都是冲动的行为，团体没有动的训练，所有团体的运动都是无意义的运动、偶然的运动、不能继续的运动。这回学生运动未生多大效果，便是无"动的训练"。

兄弟今天这篇演说，可以算作陈校长所提出"为什么此次偌大的学潮得最小的效果"问题的答案。兄弟立刻便要渡江东下，不能与诸君畅谈，非常抱歉！但是希望此后永远与诸君作一位最诚实的朋友，常常通信。

西洋话剧指南[①]

例　言

（1）本书之作系在介绍西洋著名话剧内容，以便读者遇有机会观演西洋话剧之时，可以取来参考，至少亦可以作为茶余酒后之谈资。其次则为一般研究西洋文学之人先作一点预备工夫。因为诵阅一种西洋话剧脚本，外国语言程度甚好之人固可以数点钟之内看完，倘若语言程度尚低，则诵阅一种脚本动辄需时数星期以至数月工夫，始知剧中所演何事。此书既出，则初学语言之人可以先将该剧内容一阅，然后再读脚本，较有线索可寻。而且可以预先自由选择一剧诵读，其材料结构最合适自己口味者。西洋学习外国语言之人，大都先从外国剧本入手，以其兼有“普通会话”及“文学兴味”两种长处故也。

（2）吾人介绍一种剧本内容，可以应用“短篇小说”形式出之，以便读者易于了解，林琴南氏所译之《莎氏乐府本事》是也。然如此则剧中结构情形最不容易看出，而结构一事，却正是作者最费匠心之处，非短篇小说之平铺直叙，如“某生，某县人也，少时……一日途中……”所能比拟。因此之故，本书介绍剧本内容，系以其台上排演次序为准。如剧中前因后果有不易于明了者，则由余补叙一二，而用括弧符号〔　〕以别之。

① 该书为王光祈系统介绍西洋话剧的著作，193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本拟编四册，但以王光祈的英年早逝而不遂。因篇幅所限，本《文集》只收录了该书“例言”、“导言”。

(3) 所有剧中每折布景换景等事均一律记出。惟莎士比所作《国王纳贤》第二及《国王纳贤》第三两剧，系用英国历史事实，其中情节稍涉琐碎，余恐读者生倦，故只叙剧中重要情节，而将各折布景略去，是为例外。

(4) 本书所述各剧，系以有关西洋话剧进化而且现刻尚在排演者为限。因此之故，凡与西洋话剧进化无重要关系之作家皆不录。在历史上虽系重要作家，而其作品现已不再排演者亦不录。又西洋舞台所演各位大家之名作至为宏富，本书因篇幅有限之故，亦不能全数介绍，只能择其最为脍炙人口者而述之。

(5) 本书拟介绍西洋名剧一百二十种左右。第一册所介绍者，系自古代希腊至第十八世纪之名作。如希腊索夫克乃斯（Sophokles）、英国莎士比（Shakespeare）、西班牙喀尔德龙（Calderon）、法国莫里哀尔（Molière）及那森（Racine）、德国纳深（Lessing）诸人之类。第二册拟介绍第十八第十九世纪之交德国古典主义一派，如哥德（Goethe）、喜来（Schiller）之类，及德奥英罗曼主义一派，如德人克乃斯堤（Kleist）、奥人海伯尔（Hebbel）、格里尔帕察（Grillparzer）、英人拜仑（Byron）之类。第三册拟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诸人之著作，如那威易卜生（Ibsen）及白菊松（Björnson）两人、奥大利安村落鲁白（Anzengruber）、德意志苏达门（Sudermann）、蒿蒲提门（Hauptmann）、何尔慈（Holz）三人之类。第四册拟介绍表现主义诸人著作，如瑞典人史推德伯格（Strindberg）、德人凯色尔（Kaiser）之类，以及近代英俄心理语话大家如萧伯讷（Bernhard Shaw，英人）、王尔德（Wilde，英人）、托尔斯泰（Tolstei，俄人）、高尔基（Gorki，俄人）之类，德国童话戏剧作家如佛尔德（Fulda）之类。此外关于“新古典主义”（如德人爱尔斯堤〔Ernst〕之类），“新罗曼主义”（如法人罗斯坦〔Rostand〕及奥人何夫曼斯塔〔Hofmannsthal〕之类），亦复略举一二为例。

(6) 本书编列次序系以作家时代先后为次（以生年生月为准）。每人所作各剧，则以其成立先后为序。

(7) 本书对于剧中人名译音一事，往往故作种种区别。譬如同为一个 a 音，有时译为“阿”，有时又译为“亚”。又对于父子两人之名称，则往往故意只译其姓，或只译其名，要以便于叙述为主，读者幸勿诧以为奇。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王光祈识于柏林国立图书馆

本书为王光祈先生遗著，照王先生原来的计划拟编四册，系统地介绍西洋话剧的内容，以供国内学者的需要。不幸王先生未竟全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遽尔逝世。兹将遗稿两册，分为第一、二两编合订出版，读者虽未得窥全豹，但从这书里了解西洋话剧的

梗概，古典主义、罗曼主义诸名家著名话剧的情节，并可从这书的例言里，看到王先生编著时的苦心。谨此附志。

廿八年四月

导 言

（甲）西洋话剧之结构

西洋话剧共分四类：一曰悲剧（Tragödie），其内容系描写一段悲哀结局的历史。二曰趣剧（Komödie），其内容系表演一段滑稽可笑之故事。三曰悲趣剧（Tragikomödie），其情节虽甚滑稽，而结局却极悲哀。四曰庄剧（Drama），即情节虽甚严重，但结局终属圆满是也。

古代希腊及中古西洋话剧均不分“折”数，分为数“折”表演之举，系以文艺复兴时代为始。古代希腊话剧虽不分“折”数，但其中情节亦复分为数个“层次”。当时希腊大哲亚里斯多德（西历纪元前三八四年至三二二年）于其所著《诗学》（Poetik）一书之中，对于悲剧组织尝分为三个“层次”：即（1）缘起（Exposition）、（2）急变（Peripetie）、（3）结局（Katastrophe）是也。在“缘起”之时，先将剧中根本事实加以说明，其后继以“急变”一段，则将剧中悲欢离合之情达到最高之点，最后再用“结局”一段，将一切不祥结果一一表现吾人眼前。因此之故，古代希腊悲剧虽不分“折”数，然其结构却甚类于“三折”。至于近代戏剧论家对于戏剧分“折”之法较前益趋详细。德人法乃他格（Freytag，生于一八一六年，死于一八九五年）于其所著《作剧方法》（Die Technik des Dramas）一书之中，常将剧中“层次”分为五段，即（1）缘起、（2）渐紧张（Steigerung）、（3）最紧张（Höhepunkt）、（4）转机（Umkehr）、（5）结局是也。此种分段之法，正与英国莎士比及其后法德两国古典主义派之作品每每分为“五折”者正合。但剧情如果过于复杂，则作者却又往往于“五折”之外，再加上“引子”（Prolog）一段以冠之，或“尾声”（Epilog）一段以终之，以使观众明了前因后果。此外，西洋话剧之中只有“一折”或分为“四折”者，亦不少其例，要以剧情繁简为转移。

西洋话剧文体，或用诗词（譬如古代希腊悲剧，即为“无韵之诗”。按西洋诗词用“韵”一事，系以中古拉丁文学时代为始），或用白话（譬如第十八世纪之法国戏剧作品），皆系“说”而不“唱”。此正与西洋“歌剧”（Oper）之“唱”而不“说”者相反（但西洋歌剧中亦有一部分用“道白”者）。不过尚有一点吾人须加以注意者，即古代希腊话剧之中，往往杂有“歌队合唱”（Chor）。此种“歌队合唱”之性质，系介于“伶人”与“观众”之间（歌队所居地位，亦在“戏台”与“观众座位”之间。请参看拙作《西洋音乐史纲要》），换言之，即该项歌队常将观客看剧之后所得悲欢印象代为表示出来是也。

戏剧性质既在表演“一种”故事，故其“内容”必须“统一”。换言之，剧中所演各项情节，必须互有连带关系方可，此即古代希腊大哲亚里斯多德所谓“统一原则”是也。到了第十七世纪之时，法国古典主义派遂将亚氏“统一原则”误解，扩为“三大统一原则”，即（1）内容统一、（2）地点统一、（3）时间统一是也。彼等以为：凡演一剧，除内容必须统一外，其地点并须限于一地，其时间亦须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云云。此种主张，固有其一部分理由，譬如台上换景次数太多，以及剧情前后相隔太久，皆使观众印象容易陷于庞杂之虞，故作者必须设法避免。但地点必须限于一处，时间必须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却未免拘束太严，难使剧情发展。因此，第十八世纪德国话剧改革大家纳深（Lessing，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八一年）于其所著《汉堡剧谈》（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一书之中，对于法国此种“三大统一原则”尝加以激烈攻击，而以古代希腊悲剧，以英人莎士比作品为其唯一模范焉。

（乙）西洋话剧之短史

西洋话剧起自古代希腊，而古代希腊话剧，则又出自祭祀天神低屋柳琐斯（Dionysos）之祀。当希腊每年举行祭祀天神典礼之时，常用歌队化装歌舞。到了西历纪元前五三四年，遂由雅典作家特士匹司（Thespis）于歌队之外再加上一位伶人表演。其后又由希腊悲剧大家爱西鲁斯（Aischylos，生于西历纪元前五二五年，死于四五六年）再行加入第二位伶人表演，于剧中“对话”（Dialog）一道特有重大贡献。自此以后作家辈出，悲剧结构日趋完善。每当祭祀天神之时，辄连演三日悲剧，一日喜剧（Satyspiele），各地悲剧作家无不前来竞赛，每人必须提出三本悲剧一本喜剧，称为 Tetralogie，以作竞赛之用。其所以必须殿以一本喜剧者，因连演三日悲剧，观众情绪未免过悲，特以此聊解其忧故也。

希腊悲剧作家之中，以爱西鲁斯、索夫克乃斯（Sophokles，西历纪元前四九六年至四〇六年）、欧里匹德斯（Euripides，西历纪元前四八四年至四〇六年）三人为最擅盛名，世人称为“希腊悲剧三杰”。爱氏长于表现人类崇高意志，索氏善于窥察人类神秘心灵，欧氏精于描写人类热烈情感。其取材范围均以古代希腊英雄传说为限。在三杰之中，尤以索氏作品最为动人，直至今日，欧洲舞台每演该氏作品时犹有绝大叫座能力。

同时，希腊趣剧亦复渐渐发达，其最著名之作家，则有亚里斯妥方乃斯（Aristophanes，西历纪元前四五〇年至三八七年左右）及门南登（Menander，西历纪元前三四二年至二九〇年）两人。趣剧内部结构全与悲剧相同，惟取材则大异。亚氏所用材料大抵均系讥讽当时政治情形，门氏所用材料则多系描写当日家庭笑话。因此之故，亚、门两氏作品虽极名贵，但现在西洋舞台已不多演。此无他，因时代既已变迁，背景亦随之消灭，当日以为可笑者现在已失其滑稽性质故也。

其后罗马继希腊而兴，其戏剧文化完全抄袭希腊之旧，无足观者。迨基督教势力掩有全欧之时，于是基督教士每逢耶稣圣诞或耶稣被难之日，辄在市场之上搭台扮演耶稣故事，是即所谓“神剧”。其所用剧本，初为拉丁文，其后则渐渐改用各地本国语言，而扮演之人亦不复限于基督教士。到了第十五世纪之际，欧洲“人道主义”思想又复弥漫一时，于是又有一种“性剧”（Moralitäten）发生。换言之，即将各种抽象性质如善恶穷富等等扮成角色登台表演是也。计自希腊灭亡以后，前后一千余年之间，所谓西洋戏剧文化，仅有上述数种略加点缀而已。

直到第十六世纪之时，英国方面忽然产生一位伟大戏剧作家放万丈光芒，此人非他，即举世知名之莎士比（Shakespeare，一五六四年至一六一六年）是也。莎氏所作悲剧趣剧，均能将人情世故刻画入微，而其根本思想则在尊重人类“自由意志”，以为一切祸福皆由人类自造，此适与后来西班牙作家之迷信“运命”一说者根本不同。

西班牙在欧洲各国中为天主教势力最盛之国家，因而“命运”之说深入人心。其作家如费卡（Lope de Vega，一五六二年至一六三五年）、喀尔德龙（Calderon，一六〇〇年至一六八一年）等等，皆以“命运”“救星”为其作品基础（按，印度戏剧亦以救星为唯一解决之道，非如希腊戏剧之喜以悲哀结局）。但其描写技能却擅一世之长，于西洋话剧进化极有关系。

其后法国方面继西班牙而兴，而以“古典主义”为其号召。换言之，即以古代希腊戏剧为其模范作品，误解亚里斯多德之“统一原则”为“三大统一原则”。故其作品规律谨严、表演集中是其所长，但在他方面却不免板滞拘束之诮。其悲剧作家之最有名者，为柯尔乃节（Corneille，一六〇六年至一六八四年）、那森（Racine，一六三九年

至一六九九年）两人。其趣剧作家则以莫里哀尔（Molière，一六二二年至一六七三年）一人最为著名。莫氏洞悉世务，通达人情，故其作品之中描写各人个性维妙维肖，直开后世所谓“个性趣剧”（Charakterkomödie）之先河，彼之作品直至今日犹为各国舞台所常演。窃自第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戏剧作家只有莎士比一人可以与之抗衡，而二人皆系伶人出身，并擅绝妙文学天才，故其作品结构均具无限匠心，迥非并世其他闭户著作之人所能企及。

至于德国方面，其在第十八世纪初叶以前，舞台所扮演者皆系卑俗无聊之戏剧，为士大夫所不齿。到了第十八世纪中叶左右，始有德人果德西堤（Gottsched，一七〇〇年至一七六六年）出来提倡“法国古典主义”，其结果虽将前此卑俗戏剧一律加以肃清，但果氏作品自身亦复无多价值。直到德国戏剧改革大家纳深（Lessing，一七二九年至一七八一年）出世，对于“法国古典主义”大加攻击，而以古代希腊悲剧及英国莎士比作品为其唯一模范，并运用伟大文学天才制成各种话剧，以筑后来“德国古典主义”（Klassizismus）之基。

纳深之后继以哥德（Goethe，一七四九年至一八三二年）、喜来（Schiller，一七五九年至一八〇五年）两位绝代诗人，于是“德国古典主义”遂有如红日当天光芒万丈。所谓“德国古典主义”者，无他，即利用古代希腊悲剧体裁，实以德国民族传统思想，形式务求整齐，内容备极深厚，并以理想主义为其作品基础。换言之，剧中主要人物多为彼等理想中所拟之完人。

古典主义之作品，既系四平八稳，且具一定理想，有时殊为一般放浪文人所不喜。于是所谓“罗曼主义”（Romantik）者又复继之而起。对于形式方面极不讲究，一任文笔所趋。对于内容方面备极浪漫，尤喜荒唐故事（尤其是中古传说）。因此之故，吾人每读古典主义作品，辄有如中国律诗，规则最为谨严，而且剧中人物，恰有如《水浒传》中之武松、《红楼梦》中之林黛玉，为作者理想中之英雄美人。反之，罗曼主义作品，则有如一篇狂歌，极不讲究规律，其剧中人物，直等于蒲松龄之《聊斋志异》，正所谓“姑妄言之姑听之”。此种罗曼主义作家，在德则有克乃斯堤（Kleist，一七七七年至一八一一年）、海伯尔（Hebbel，一八一三年至一八六三年），在奥则有格里尔帕察（Grillparzer，一七九一年至一八七二年），在英则有拜仑（Byron，一七八八年至一八二四年），在法则有羽果（Hugo，一八〇二年至一八八五年），皆系一时俊杰。

《聊斋志异》读久了，脑中充满海上仙山，有时亦想改读《儒林外史》，看看真实世界。于是“罗曼主义”之后，又有所谓“写实主义”（Realismus）、“自然主义”（Naturalismus）、“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等等，一时风起云涌，以代“罗曼主义”而兴。所谓“写实主义”者，系将社会实情写出，不必向壁虚造。“自然主义”者，系

以自然面目为主，不必加以粉饰。"印象主义"者系将外面事物给与吾人之印象照实绘出，不必杂以主观成见。三者命名虽各不同，其程度虽亦各有深浅之别，然莫不以"客观事物"为其唯一对象。此则与"古典主义"之偏重理想、"罗曼主义"之最喜妄谈者根本不同也。客观一派之作品，既以描写社会实情为志，因而对于剧中语言动作皆力求自然，尤其是喜用"土话"。至于剧中人物，则由市井无赖以至儒林人物，无不应有尽有，其内容则多取材于社会问题。因此之故，此项社会问题之背景若一旦失去，则该项作品之价值亦将随之失去。古代希腊趣剧之不能延长其寿命者，正坐此弊，已于前文言之。易卜生尝有言曰：一部"不朽"名作至多只有三十年寿命云云，似即指此。此种客观派之作家，人材甚为众多，举其著者，则有易卜生（Ibsen，那威人，一八二八年至一九〇六年）、白菊松（Björnson，那威人，一八三二年至一九一〇年）、左拉（Zola，法人，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二年）、安村格鲁白（Anzengruber，奥人，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八九年）、苏达门（Sudermann，德人，一八五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蒿蒲提门（Hauptmann，德人，生于一八六二年）、何尔兹（Holz，德人，生于一八六三年）等等。

现实世界住久了，又令人回思理想世界以及浪漫生涯，于是又有所谓"新古典主义"（其代表作家为爱尔斯堤〔Ernst〕，德人，生于一八六二年）、"新罗曼主义"（其代表作家为罗斯坦〔Rostand〕，法人，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八年，何夫曼斯塔〔Hofmannsthal〕，奥人，生于一八七四年等等）者，意欲卷土重来，打倒客观一派。但其势力甚弱，不足与客观一派抗衡。其能代表反动势力足使客观一派惊惶者，当推"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所谓"表现主义"者，不管客观真相如何，但将作者自己主观所见表现出来即足。譬如同是一位耀武扬威的军阀，在文学家眼中看来，有时如一只"母老虎"，有时又如一只"母老鼠"，一以其主观所见为转移。其作品中往往饱含"神秘思想"（Mystizismus）及"象征意义"（Symbolismus），非尽人所能了解。凡白话之不足以表现其崇高思想者，悉改用诗歌以代之。"一个人自言自语"，为写实派所唾弃者至是又复盛行。其代表作家，则有史推德伯格（Strindberg，瑞典人，一八四九年至一九一二年）、梅德林（Maeterlinck，比利时人，生于一八六二年）、凯色尔（Kaiser，德人，生于一八七八年）等等。

此外英国之萧伯讷（Bernhard Shaw，生于一八五六年）及王尔德（Wilde，一八五六年至一九〇〇年），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ei，一八二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及高尔基（Gorki，生于一八六八年），则从心理学上以筑其作品基础。德人佛尔德（Fulda，生于一八六二年）之"童话戏剧"（Märchenspielen），则又喜用儿童解颐材料，使人顿忘现实世界，亦皆为今日西洋舞台盛行之作品焉。

第三编　诗词选编

目　次

一、旧体诗

1. 夔州杂诗（六首）（登载于《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36年4月19日，成都）（1924年春末，王光祈乘船出川，途经夔门时作。）

（1）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
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
蜀道仍荆棘，秦军正鼓鼙。
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

（2）白帝城边树，春秋处处深。
征吴存大义，入蜀系天心。
髀肉今难抚，夔巫日又沉。
遥怜东逝水，千古尚阴阴。

（3）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
中原还逐鹿，竖子竟成名。
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4）不知云外路，已作峡中人。
水落鼋鼍怒，风微日月真。
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
独有青城客，劳劳滞此身。

（5）两崖如壁立，一线漏青天。
乔木临风倒，苍藤带雨悬。
乾坤浮不老，云雾暗相连。
只合同僧住，时携买酒钱。

（6）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
四面奇峰乱，千年怪石尊。

江湖如有托，舟楫漫招魂。
无限浮生事，凄凉未忍论。

2. **寄内**（1914年夏秋作。时王光祈奔波上海、青岛等地，辗转至北京，觅得清史馆书记员一职，暂为栖止。）

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
敢夸秋思如明月，错把春愁诉夕晖。
天上浮云终有变，客中残梦不须归。
断蓬身世无消息，摇落江头雁又飞。

3. **乙卯秋节余廿三初度与黄廷锐登陶然亭感而赋此（二首）** 自注：苏子由年二十三，仁宗召举直言，子由极言得失，遂除商州军事推官。班超□□生活，曾滞兰台，怅望千秋，有同慨也。（1915年作。王光祈当年赠其家乡挚友崔干臣者。首载于韩立文、毕兴《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

（1）举世如狂乱象生，独来亭畔听秋声。
直言已愧苏推事，临眺应怜阮步兵。
南国干戈他日泪，西风芦荻故乡情。
年年江海都成梦，此日休疑节序更。

（2）西台痛哭谢皋羽，东观淹留定远侯。
投笔声威闻万里，临风涕泪亦千秋。
布衣长笑轻秦帝，残照相看类楚囚。
枯柳飘蓬无限意，还如王粲赋登楼。

4. **暮春送赵三之江南（二首）**（1915年作。王光祈当年赠其家乡挚友崔干臣者。首载于韩立文、毕兴《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

（1）车马临歧百感侵，天涯何处寄秋心。
蜀中杜宇声声唤，唤到江南春已深。

（2）去年落拓去都门，相对欷歔酒一尊。
今日送君过白下，秦淮河畔易黄昏。

5. **丁巳七夕同彭云生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赋**（1917年作。登载于《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36年4月19日，成都。）

客舍浑如梦，深闺漏正长。

百年一弹指，千里九回肠。
蟾影中天静，虫声永夜凉。
西风吹白露，秋意已茫茫！

6. **七月七日陶然亭晚眺**（1917年作。登载于《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36年4月19日，成都。）

细检平生事，无如此日闲。
秋心疏柳外，归思远峰间。
玉笛时呜咽，孤云自往还。
乐忧都一瞬，饱食且看山。

7. **无题**（1920年初作。首载于《黄钟流韵集》朱舟《王光祈诗词辑览》一文，1993年9月，成都出版社。）

竟日摩挲百炼刀，几回起舞首频搔。
岂将壮年销红粉，莫遣雄心付绿醪。
万里风云思猛士，一楼烟雨读离骚。
何当投笔从戎去，不使人间叹二毛。

8. **忏悔（四首）**（1920年初作。登载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1) 我生久伏危险性，纵马危崖却怨谁。
空过九千七百日，做人今始筑根基。

(2) 真忏悔者惟自杀，每思此语血如焚。
且将毁誉随流水，从此襟怀伴白云。

(3) 每接良朋责难书，始知身已堕泥涂。
而今百事都如梦，独向苍茫觅故吾。

(4) 名士英雄毒已深，良朋一语刺吾心。
从兹打破关头去，苦学勤工惜寸阴。

9. **无题（四首）**（1924年作。登载于《醒狮》周报第4号，1924年11月1日。）

夙昔原无著书志，早将身手许邦人。
只怜华族生机少，欲用黄钟起废民。

处世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
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
古人乐失求诸野，今我编书滞异乡。
借点西洋科学去，回家整理旧琴囊。
梦中未敢忘思索，病里时时把纸伸。
每到书成辄欢喜，先将心血报邦人。

二、新　诗

1. 哭眉生（有序）（1919 年作。登载于《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8 月 15 日。）

雷眉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国的好少年，是少年中国学会最忠心的会员，不幸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东京病故了！可怜他才活了十九岁！他的意志十分坚强，他的才思异常富锐。如今他虽是死了，我们更应该努力向前以实现他的理想。因为“少年中国”的新生命，全靠我们少年创造，全靠我们少年继续不断的奋斗。眉生是上了第一线殒命了。我们站在第二战线上的，应该立刻补上第一战线去，我们早晚都是要牺牲的，不要伤心。

民国八年八月十二日午刻，眉生灵榇由日本运归北京。我在车站上接着他的灵榇，叫了几声眉生他半声也不答应，莫奈何将他送到陶然亭畔去了！我在那萧萧芦苇的声中，做了几句哭他的诗。

（一）

眉生！记得我们去年相别时，
你说：“我们再见，当在巴黎。”
如今我们又相见了，
还是在少年的中国？
还是在理想的巴黎？

（二）

眉生！记得去年七夕的夜半，

我们在陈愚生家中相见。
你说："今晚席上，只有我们两人的心酸！"
我当时戏答道："你的心酸，与我有什么相干？"
如今回想起来，
真令我十分心酸！

（三）

眉生！记得我们去年创办学会，油印规约，
他扶病而起，面白如雪。
我们都劝你道："眉生你歇歇吧，不要太劳乏了！"
你说："我将为最后的奋斗，
我将作最先的牺牲，
即或今日便死，死后还要帮助诸兄。"

（四）

眉生！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何时才可以造成？
"少年中国"的眉生，
何时才可以复醒？
眉生！你今日已成了我的死友！
我只有抱着"少年中国主义"，一步一步地往前行走。

2. 去国辞（有序）（1920年4月5日作。登载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民国九年四月一日，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欧留学。又有会友涂开舆前往星加坡从事教育，共乘法船 Paullecat 由沪出发。四月五日，舟过香港，遥望数点青山，罗列海岸，因念去国日远，特制短辞五章，为舟中同人陶情励志之用。辞中用语，多系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砺者。此辞更得湖南姜君为之制谱。每当夕阳西下，海波不兴，同人辄斜倚栏干，歌此一曲，以度海上寂寞之生涯。九年四月七日，王光祈。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发挥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
惟我少年，乃能奋发。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只问耕耘如何，不问收获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纯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
惟我少年，有誓共休戚。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三、歌　词

1. 少年中国（晚于《去国辞》〔1920 年 4 月 5 日〕之后作。）

发挥科学精神，
努力社会事业，
不恃过去人物，
不用已成势力，
以满腔的热血，
洗污浊之乾坤，
愿青春之中华，

永无老大之日。

2. **少年中国歌**（1925年作，并由王光祈自己作曲，存有曲谱。见王光祈《各国国歌评述》，中华书局，1926年。）

少年中国主人翁，
昂然独立亚洲东。
手创东方古文化，
常为人道作先锋。
彼以耶来，我以孔对，
彼尚强权，我讲仁义。
请君看将来，将来谁胜利？

少年中国主人翁，
昂然独立亚洲东。
酷爱自由与平等，
从来天下本为公。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万事皆自由，何有于帝力。

少年中国主人翁，
昂然独立亚洲东。
环顾四邻兄弟国，
多在他人压迫中。
朝鞭夕唾，弗如犬豕，
睹此不平，安能自已。
且上昆仑山，高呼起起起！

3. **黄河**（1926年作，并由王光祈根据民间曲调《望妆台》编曲，存有曲谱。载于《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8期王光祈《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1927年2月。）

黄河黄河之水真正黄，
好像豌豆汤。
自称北方王，

谁敢和他比短长。

长城长城听了不服气，
偏要试一试。
由西筑到东，
从此黄河有兄弟。

4. **平沙落雁**（1926 年作，并由王光诉根据同名琵琶曲编曲，存有片断曲谱。王光祈《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进行了简单的评述。登载于《中华教育界》第 16 卷第 8 期，1927 年 2 月。）

天上雁鹅结队飞，
地下儿童拍手追。
雁鹅会摆队，
排成人字往前进。
前进复前进，
寻个沙滩解解闷。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
（此系形容雁翅扑沙之声，歌者宜以唇音出之。）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
哼…… …… ……
（此系形容雁鹅依然飞到天上，怡然自得之意，歌者宜以鼻音出之。）
雁鹅好快活，
天地真宽阔。

5. **种豆**（1925、1926 年作，并存有曲谱，王光祈自己作曲。登载于《中华教育界》第 17 卷第 3 期，1928 年 3 月。）

南山下，种豆子，
清早起，将草理。
晚来月下荷锄回家里。

草头露，沾衣履，
沾衣履，不要悔，
只望我的豆儿长得美。

6. **家书**（1925、1926年作，并存有曲谱，王光祈自己作曲。登载于《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3期，1928年3月。）

客从远方来，
交我一封信，
信上有邮花，
花上有邮印。
中有发信日，
下有发信地，
知是故乡来，
不读已欢慰。

7. **田家四季歌**（1925、1926年作，并存有曲谱，王光祈自己作曲。登载于《中华教 育界》第17卷第3期，1928年3月。）

春季里，春风吹，
花开草长蝴蝶飞。
麦苗儿秀了，
桑叶儿正肥。

夏季里，农事忙，
才了蚕桑又插秧。
早起勤耕作，
归来带月光。

秋季里，稻上场，
谷象黄金粒粒黄。
身上虽辛苦，
心里却安康。

冬季里，雪初晴，
新做棉衣轻又轻。
一年农事了，
饱暖笑盈盈。



8. **燕子**（时间不详。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

燕子尾巴好象叉叉，
一年要搬两面回家。
春来避暑秋来避寒，
不怕辛苦不怕难。
但愿我们寒暑假，
得与燕儿一堆耍。

9. **兵士**（时间不详。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

当兵的若是听见打战鼓，
排队伍。
倘若是我们亦有战鼓打，
真好耍。
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当兵的若是听见吹军号，
放步哨。
倘若是我们亦有军号吹，
将敌追。
务都务都务都务都。

当兵的若会打枪放大炮，
有赏犒。
倘若是我们亦有枪炮放，
将敌抗。
品棒品棒品棒品棒。

10. **春使**（时间不详。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王光祈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中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苦苦，苦苦，
林中高叫。
我们快唱歌，
我们快高跳。
看看春使，
即刻来到。

11. **谁愿知道**（时间不详。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

谁愿知道，
谁愿知道？
小女孩子怎样玩闹。
常把枕头，
当作儿抱，
乖乖快些睡觉。

谁愿知道，
谁愿知道？
小男孩子怎样玩闹。
常把手棍，
当作枪炮，
瞄准品棒打倒。

谁愿知道，
谁愿知道？
大女孩子怎样玩闹。
拿着镜子，
细看容貌，
照了又照再照。

谁愿知道，
谁愿知道？
大男孩子怎样玩闹。
骑着马儿，
扬鞭高叫，
快跑快跑快跑。

12. **冬天冬天**（时间不详。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

冬天冬天，
别了别了，
被你关在家中，
好象笼内小鸟，

小鸟小鸟，
关不住了。

冬天冬天，
别了别了，
你若今年再来，
千万不要太早，
冬天冬天，
别了别了。

13. **跳舞**（登载于《中华教育界》17卷3期。系王光祈根据德国民歌译词配歌。）

妹妹愿否同跳舞，
我的手儿给与汝。
往前行，往后还，
转个圈儿真不难。

汝之游戏真正妙，
为我初意所不料。
往前行，往后还，
转个圈儿真不难。

我们再来做一次，
因为心中甚满意。
往前行，往后还，
转个圈儿真不难。